

# 阴谋与虔诚：西藏骚乱的来龙去脉

徐明旭

<http://www.tangben.com/Himalaya.htm>

导论.....	1
1、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	1
2、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4
3、价值的矛盾.....	6
4、信息的困惑.....	12
第一部：西藏的自然和历史.....	14
第一章：西藏不是移民的天堂.....	14
1、缺氧危及生命.....	14
2、农林牧资源枯竭.....	17
3、西藏没有经济价值.....	18
第二章：农奴和奴隶没有人权.....	19
1、“仁慈”的农奴制.....	19
2、农奴没有人身自由.....	21
3、虚幻的幸福.....	23
4、黑暗、野蛮、残酷、反动.....	25
第三章：落后、停滞的社会.....	28
1、原始的贫穷.....	28
2、空白的科技.....	30
第四章：宗教---西藏的桎梏.....	32
1、汉藏文化心理结构大不一样.....	32
2、西藏的政治.....	35
3、西藏的桎梏.....	39
第五章：西藏自古独立吗？ .....	42
1、关于“公主神话”的神话.....	43
2、元朝不是中国吗？ .....	44
3、明朝与主权.....	46
4、清朝的章程.....	48
5、是主权还是宗主权？ .....	51
6、清朝不是中国吗？ .....	56
第二部：西藏问题的由来.....	57
第六章：英国殖民主义侵略.....	57
1、英俄角逐.....	57
2、第一次驱汉.....	59
3、西姆拉阴谋.....	61
4、“口头主权”与法律事实.....	64
第七章：从《十七条协议》到五九年叛乱.....	66
1、联合国袖手旁观.....	66
3、渐进主义失败.....	71
4、真相与是非.....	72
5、联合国积极干预.....	76
第八章：从平叛民改到文化大革命.....	79
1、谁撕毁了《十七条协议》？ .....	79
2、民主改革.....	80
3、扩大化与阴暗面.....	83
4、中共消灭了 120 万藏人吗？ .....	87

5、文化大革命.....	95
第三部：邓小平的怀柔政策.....	98
第九章“拨乱反正”.....	98
1、怀柔政策的来由.....	98
2、胡耀邦与阴法唐的攻守战.....	100
3、平反、统战、分地.....	102
4、提干、招工、加薪.....	104
5、复兴宗教.....	110
6、繁荣西藏文化.....	113
7、教育与语文.....	116
8、卫生与生育.....	119
9、建设与表演.....	121
10、输血与肿瘤.....	124
第十章：法轮常转.....	127
1、恐惧与崇拜.....	127
2、毛教的兴衰.....	128
3、宗教与文化.....	131
4、农牧民不关心独立.....	132
5、藏族精英恩将仇报.....	133
6、倒过来的种族歧视.....	138
7、藏族市民永不满足.....	143
8、中共藏官反对独立.....	148
9、喇嘛尼姑——藏独主力.....	156
第十一章：不和平的“和平示威”.....	159
1、1987年10月1日：火烧派出所.....	159
2、放在美国怎么样？.....	166
3、1988年3月5日：大闹大昭寺.....	170
4、班禅之死.....	173
5、1989年3月：拉萨戒严.....	176
6、九十年代：胡萝卜加大棒.....	182
第四部：新的冷战.....	186
第十二章：冷战在继续.....	186
1、从国会山到奥斯陆.....	186
2、从后冷战到新冷战.....	190
3、从双重标准到怪圈 22.....	195
4、从宗教迫害到政教分离.....	201
5、从“六四”到“一一一”.....	206
第十三章达赖喇嘛向何去？.....	209
1、“大西藏”的神话.....	209
2、西藏独立的灾难.....	214
3、戈茨坦的幻想.....	216
4、达赖喇嘛的骗局.....	221
5、西藏的未来.....	232
后记.....	239

# 导论

## 1、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当读者打开本书的时候，首先要问的自然是：作者为什么要写这本书？然后想知道的是：为什么作者认为他能写好这本书？

我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再回答第一个问题。

我生长在上海，家父因在国民党政府里当过两年文职小吏而被共产党迫害致死，这使我的生活自幼就蒙上浓重的阴影。每当我填写“政审表”时，那“家庭出身”和“直系亲属中有无杀、关、管”两栏总使我毛骨耸然。1964年，我侥幸考上华中工学院（今华中理工大学）（1）。1966年文革一开始，我就成了“黑五类”、“狗崽子”与“剥削阶级孝子贤孙”，受尽“红五类”同学的迫害和侮辱。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我因“恶毒攻击”毛泽东、林彪、江青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被批斗上百次，然后流放到贵州大山沟一家小工厂打铁。次年春又以“五一六分子”的罪名下狱，几乎瘐死狱中。林彪事件后，我侥幸出狱（2），但不平反，继续打铁。1978年，我侥幸考上杭州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生（3）。1979年，我发表中篇小说《调动》，描写中共基层官员的惊人腐败，影射中共高级官员的鲜廉寡耻。次年春，邓小平发起文革后第一场文艺批判运动，重点批判《在社会的档案里》、《假如我是真的》、《女贼》、《飞天》和《调动》等五大“毒草”。我遭到中共各大权威报刊如《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文汇报》、《文艺报》、《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浙江日报》、《安徽日报》、《北京文艺》等的围剿，新华社也专门发了这些报刊批判《调动》的消息，称之为“黑幕文学”（这个名称非常恰当，《调动》的确揭露了共官的黑幕）。杭州大学当局自然不甘落后，校广播台每天三次广播批判文章，校报则频频发表批判文章，一时间大有文革初全国批判“三家村”之势。又次年即1981年，邓小平发起第一次“反自由化”运动，杭州大学党委专门召开会议再批《调动》。刚好那年底我毕业，我被取消原定留校任教的资格，发配西藏。因为文字的缘故而流放西藏，有史以来我还是第一人，在我之前流放西藏的似乎只有南宋末代皇帝赵显（该字右边无“页”字，可惜我的中文软件无此字）一人。1957年的右派有流放新疆、北大荒的，却没有流放西藏的。

由于我是中共建政以来第一个进藏的毕业研究生，西藏当局起先对我很客气，让我自由选择单位，我于是变成了西藏文联属下的《西藏文学》杂志的编辑。不久，西藏当局发现了我的底细，派人严密监视我。幸而当时的中共总书记是胡耀邦，胡一贯反对整人，特别是文艺界人士，西藏当局不敢轻易加害于我。1983年秋，邓小平、陈云发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我在次年2月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召开的“清除精神污染”座谈会上拍案而起，痛斥他们给《西藏文学》罗织的“搞精神污染”的罪状，驳得他们哑口无言、恼羞成怒。早在1983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就发表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文艺组副组长卫建林的重头大批判文章《社会主义实践和所谓社会主义的异化》，又点了《调动》，与《在社会的档案里》、《在同一地平线上》及《晚霞消失的时候》并列，称之为“社会主义异化论”在文艺创作实践上的代表。西藏自治区党委见文大惊，要对我“旧账新账一起算”，一时间“黑云压城城欲摧”。幸亏胡耀邦在1984年2月至3月主持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时说了一句话：“你们西藏连什么是精神污染都没搞清楚，就在那里清除精神污染。”（我在西藏听到官方传达）方使我化险为夷。1986年，我

因患高山病申请调回上海，西藏当局对我既恨之入骨，又无可奈何，趁机将我“礼送出境”。

在西藏工作期间，我不仅乘车从珠穆朗玛峰与希夏邦马峰之间的山口翻越了喜马拉雅山，抵达中尼（泊尔）边境的樟木口岸，饱览了世界屋脊与顶峰的壮丽风光，而且深入社会，获得了大量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社会、历史、民俗信息。特别重要的是，由于我的身份是西藏某单位的一个雇员，而非临时性的观光客或考察者，我的藏族上司和同事自然不会拿我当客人招待。我因而得以从日常生活、公务活动乃至由利害关系引起的矛盾冲突中体察藏族的民族性格，这对研究一个民族来说至关重要，却是临时性的旅游、采访、调查和考察所难以奏效的。所以我自信比那些从未去过西藏或只去西藏旅游、采访、调查和考察的记者、文人、学者和专家更能写好西藏问题。

1990 年我来到美国，读了许多中英文报刊上有关西藏问题的报道和评论，也读了许多达赖方面的宣传品。我惊讶地发现，他们所说的东西和我在西藏看到的相去甚远，乃至截然相反。我仔细分析，又惊讶地发现，那些报刊文章的作者大多从未去过西藏，少数只去西藏作过旅游、采访、调查或考察，几乎没有一个在西藏长期工作过。他们关于西藏的信息大部分来自达赖方面的宣传。而达赖方面的宣传在揭示了某些真相（如毛泽东的暴行）的同时，也散布了大量谎言（如“西藏自古以来是个独立国家”、“清朝驻藏大臣是外交使节”、“汉人要消灭藏人”、“中共消灭了 120 万藏人”、“中国正在绝灭西藏文化和宗教”等等）。正如一位同情西藏难民的英国妇女 1959 年去印度采访了大量西藏难民后发现的那样：

我自己不得不从难民那里收集“故事”，但凭良心说，没有收集到一个我认为是“真实的故事”。照我的经验，我知道如果通过翻译进行交谈，要对如此众多的重大而又微妙的问题（不管提供情况的人是否亲历其事）做出评估是不可能的。从本性上说，普通的藏人都是可信的、诚实的。但也要认识到藏人心目中的“事实”与西方人所认为的确凿证据是不同的。认识不到这一点是危险的。藏农从生到死都习惯于把传说和神话当作事实来接受（4）。

她的发现对我来说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事，我在西藏时就发现藏人有创造神话传说的天才与把神话传说当作事实来接受、传播并深信不疑的天然倾向。借用文化人类学的术语，这是一种不同于理性思维的神话思维，是虽非藏族特有却数藏族最发达的思维方式。然而我仍然难以想象，受过西方民主思想和理性主义熏陶的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竟能如此公开地、大量地、毫无顾忌地、坚持不懈地制造和散布谎言，而且居然有那么多西方人（我在美国生活近十年所接触过的白人中的 99%）居然会欣然接受并深信不疑。为此我发表了许多文章，试图说明西藏的真相，并萌生了写一本书系统阐明西藏真相的念头，却一直苦于找不到出版者。直到 1998 年初，我结识了明镜出版社的何频先生，方在他的鼓励下动笔，这里特向何频先生致谢。

必须坦白说明，我不懂藏语文，“西藏流亡政府官员”达瓦才仁因此嘲笑我“不懂西藏语言而妄称了解西藏，并以西藏专家的架式指点山河，不觉得有点底气不足吗？”他还说我不懂藏语，所以虽在西藏住过四年，但和住在北京没有太大的区别，因为我在西藏看到的电视报纸都是中共宣传，而中共宣传全是“经过美化或修理、甚至完全编造的东西”。所以我在“国外写的大量文章，除了中共宣传----当然经过了改头换面、重新组装----真的还有什么西藏以外靠看中共报刊而不能知道的内容吗”（5）？

达瓦才仁说我的文章里只有中共宣传，这话完全不符合事实。读过我的文章的人都会发现，我经常引用美国藏学家戈茨坦（Melvyn C. Goldstein）和戈伦夫（A. Tom Grunfeld）的著作，达赖喇嘛、西方媒体、西方组织与联合国的言论、报导、书刊与文件，难道这些也属于“中共宣

传”吗？

我不懂藏语文，这对研究西藏确实是个缺陷，不过这并不等于说，不懂藏语文就不能研究西藏。在旧西藏生活过多年的中国老一辈藏学家柳陞祺说过：“藏文难学，懂的人不多，工具书也不够多，口语和文字有相当大的距离，有点像汉语文的白话与文言。这些都是障碍。要研究藏族社会历史，必须懂点藏语文，而且懂得越多越好，这一点我完全同意。但如果也把这一点简单化了并推向极端，认为不懂藏文，就不能研究藏族历史、社会、文化等等，我看也不尽然。因为语文毕竟是一种工具，它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不能替代一切学科。……拿佛教研究本身来作个比喻。”接下来他说佛教的典籍是用古印度的梵文或帕利文写的，藏文的佛典都是从哪里翻译过来的。但懂梵文与帕利文的藏人是极少数，为何不懂梵文和帕利文的喇嘛也能研究佛学呢（6）？

我对柳老的经验之谈深有同感。众所周知，许多西方中国问题专家并不懂中文，但他们照样着书立说研究中国问题。达瓦才仁自己虽然是藏人，却不懂藏文。他自己承认：“我喜欢藏文书，但是我读不懂。”他曾在 1996 年与 1997 年“汉藏对话会”上亲口告诉我，他也不懂英语文或其它外文。可见他既读不懂藏文资料，也读不懂外文资料，唯一能懂的是中国出版的汉文资料，却被他认为都是“中共造谣”，那么他就没有任何资料可读。他出生于 1963 年（7），那时西藏的农奴制已被废除多年，那么他在九十年代写的许多文章里为旧西藏的制度辩护的资料是从哪里来的呢？只能是凭空想象与捏造，无怪乎他所有的文章里引用的数字与事例全都没有任何出处。那样的文章也能算研究吗？

我在西藏时不仅仅读报刊看电视，还与大量藏人交往。西藏的藏族干部、职工、市民绝大多数能说流利的汉语，我和他们交谈毫无困难。诚然，他们不会对我讲知心话。但藏人天性外向、直露、坦率，尤其是与我朝夕相处的藏族上司、同事、邻居、朋友，他们在工作、生活中会不知不觉地流露出内心深处的想法与感情来；我也可以通过他们的言外之意、表情、声调、行为加以观察与体验。否则作家如何描写与其差距很大的人物（诸如少女、高官、罪犯、妓女等）的心理活动？

我认识的许多汉族老同事（汉人称之为“老西藏”，藏人称之为“老汉人”）也给我很大的教益。他们五十年代就进藏，会说流利的藏语，到过西藏的各个角落，有的甚至娶藏女为妻，对西藏的历史变迁与藏人的心理性格都有深刻的了解。当我们在饭桌上畅谈时，我常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

我还经常去拉萨各机关各单位及西藏各地县采访，了解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情况，这都是新闻媒体所不能取代的。

来美国后，我又从西方媒体、书刊获取信息。西藏问题本与国际政治密切相关，有了西藏的经历后，再从大洋彼岸返观西藏，自有“更上一层楼”之感。

达瓦才仁认为中国的出版物全部是中共编造的谎言，这话留待后文讨论。

注释：

(1) 这里所谓侥幸，系指当时华中工学院党委书记朱九思本人出身大地主，三十年代的武汉大学学生，十分爱才，而我的考分特别高，因而被录取。文革一开始，此事就成为朱“执行修

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罪证。

(2) 这里所谓侥幸，系指林彪事件后毛泽东下令各地释放一批“可关可不关”的政治犯。贵州当地的政治犯大都是文革初斗过当权派的造反派，或与之有私仇者，惟有我是外来人，与当地的掌权者无冤无仇，故获释放。

(3) 这里所谓侥幸，系指我在大学里学的是工科，那年破例允许跨专业报考研究生，我因而得以改行报考文科研究生。

(4) Grunfeld, A. Tom, *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New York: M. E. Sharpe, 1996), p148.

(5) 达瓦才仁，《西藏藏人如是说》，《中国时代》，1998年9月号。

(6) 柳陞祺，《应该争取有一个更大的藏学研究队伍》，《中国藏学》，1991年第1期。

(7) 达瓦才仁不懂藏文与出生年份均见：亚衣，《让西藏流亡者早日回归家园----访『西藏通讯』主编达瓦才仁先生》，《北京之春》，1997年11月号。

## 2、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动笔不久，就读到了大陆作家王力雄的《天葬---西藏的命运》（8）。这本书用迄今为止无人企及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剖析了西藏的历史变迁，特别是近二十年来西藏社会的巨大变化，印证了我在1991年发表的两篇论文《西藏问题：历史、现状与未来》和《西藏示威的真正幕后鼓动者》（9）的许多观点，诸如对今日西藏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共藏干出于既得利益反对达赖回来和西藏独立，但又暗中鼓动藏独示威以迫使中共加紧提拔藏干和增拨巨款；喇嘛尼姑出于宗教观念和对政教合一的怀念坚决要求独立；新一代知识分子出于自由民主理念向往独立；占人口大多数的农牧民和市民则持双重标准：现世靠中共，来世靠达赖；物质生活上认同中共，精神生活上认同达赖）。时隔七年，虽然中国及西藏的政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天葬》的论述可以看出，我对西藏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至今有效，这使我读此书时倍感亲切。

同时我还获悉，王力雄就是我七年前读过的政治预言小说《黄祸》的作者，他认为《天葬》不可能为西藏问题提供答案，因为“西藏问题几乎是无解的，那无解有一种宿命式的必然---不难想知：如果人类社会无法解决自身总体问题，又如何能治好局部发作的一处病灶呢？（10）”他这里所说的人类社会的总体问题，是指人类必将由于根本矛盾“于有限世界追求无限财富”而毁灭（11）。

早在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就在《自然辩证法》的“导言”里说过人类终将灭亡，不过他是从“一切产生出来的东西，都一定要灭亡”这一辩证法原理推断出来的，并未从人口与资源的矛盾方面加以论证。中国科学院的国情研究报告《生存与发展》（12）和何博传的《山坳上的中国》（13）则详细论述了中国的人口与资源的矛盾，暗示中国将很快灭亡。例如前者说中国资源的人口承载极限是15亿到16亿，照目前的中国人口增长速度，2015年将突破15亿。“我们正以中国历史上最严峻的生态环境，负担中国最多的人口和最大的活动能力，上述压力超过了大自然许多系统的临界平衡极限，已直接威胁当代以及子孙后代的生存条件”，那时（2015年）“恐怕连中华民族的基本生存条件都难以维持”（14）。前中国国务院环保局局长曲

格平和李金昌合着的《中国的人口与环境》则明确指出，中国人口一旦突破 16 亿，中国社会将全面崩溃。王力雄的《黄祸》用浪漫主义的图画，描写了这一末世景象。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既然地大物博的中国都将在大约二十年以后灭亡，其资源最贫乏的那一部分——西藏（目前其农牧业已无法养活其藏族人口，其工业几乎为零且无发展潜力）岂能逃脱此劫？既然包括西藏在内的中国都将很快灭亡，还有什么西藏问题可言可解？

进而言之，人类也将因人口突破全球资源承载极限而灭亡。不过人类是以国家为核算单位的，只要不爆发核大战，不出现核冬天，人均资源最少的国家如中国、印度势必最先崩溃、灭亡，人均资源最多的国家如美国、俄国势必最后崩溃、灭亡。这中间有个时间差，少则几十年，多则上百、几百年。先亡的国家必然会冲击后亡的国家，其冲击波必然会表现为黄祸式的难民潮。后亡国的反应是否会像《黄祸》描写的那样文明、人道（穷国允许难民过境，富国面对铺天盖地涌来的赤手空拳的难民一筹莫展、束手无策）尚属疑问。有道是“路急无君子”，焉知今日高喊“人权外交”的富国那时不会露出狰狞面目？

顺着这条思路推论下去，今日世界上任何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族和社会问题都是无解的，因而都既无探讨研究的意义，也无是非曲直可评说，惟一可做的只是描述——如王力雄所说的那样：“我只能展开一幅西藏的画卷，让你随我一起在西藏令人神往亦令人心碎的历史与现实中遨游。（15）”

这的确是一种老庄式的超然态度，可惜我无法仿效。孔子有句名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记得有人这样评说过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作为历史家，他深知世上所有文明都有衰落的时候；作为政治家，他却不得不竭尽全力维持美国文明繁荣昌盛。愚虽不才，却也不妨妄加类比：作为国情球情研究者，我深知包括西藏在内的中国与世界都将在不久的将来崩溃、灭亡；作为西藏问题研究者，我又不得不抛开这一前景，就事论事地分析西藏问题。《黄祸》里有句话非常深刻：“中国人都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其实世上各族都一样，科学家一再警告人类不可无节制地繁殖，不可无限制地追求物质享受，有多少人听进去了？西方民主大国至今仍在不遗余力地攻击中国的人口政策“侵犯人权”，更不必说罗马教皇对计划生育和人工流产的顽固反对了，所以人类在数代内灭亡是不可避免的。然而这句话（不见棺材不掉泪）也可以作另一种解释：虽然我自己、中国和人类都很快会灭亡，但只要我活一天，就要不管将来如何地做一天事，“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就是我写本书的出发点、原动力和基本态度。

注释：

(8) 王力雄，《天葬——西藏的命运》，明镜出版社，1998 年。

(9) 徐明旭，《西藏问题：历史、现状与未来》，当代中国研究中心，1991 年 10 月，美国普林斯顿；徐明旭，《西藏示威的真正幕后鼓动者》，《九十年代》，1991 年 3 月号，香港。

(10) 《天葬》，11 页。

(11) 王力雄，《但愿我在<黄祸>所写的一切永不发生》，《中国时代》，1998 年 3 月号。

(12) 科学出版社，北京，1989 年。



(13)贵州人民出版社，贵阳，1988 年。

(14)《生存与发展》，科学出版社，北京，1989 年，xiii 页、25 页。

(15)《天葬》，11 页。

### 3、价值的矛盾

解决了研究目的问题，接下来就是价值选择问题，即站在什么立场上分析西藏问题，用什么标准判断其是非曲直。王力雄在《天葬》的序里曾说起个中的难处：“今天，西藏的信息几乎被两部政治宣传机器所垄断。一部在北京，另一部在达兰萨拉。……关注西藏的人大部分只能把两部宣传机器当作主要的信息来源。糟糕的是，那两个来源提供的西藏信息几乎总是相互矛盾、甚至截然相反。面对这种荒谬状况，解决办法只好是先选择立场，决定站在哪一边，然后就把哪一边提供的信息当作真的去相信，而把另一来源的信息全视为谎言。”接着，他列举了许多矛盾，然后说：“这些矛盾具有如此的根本性，如果研究者把自己的立脚点与这些矛盾置于同一平面，哪怕他的初衷是想公允客观，也难以驾驭和解决如此不相容的矛盾。而一旦陷于这些矛盾，是不可能找到贯穿一致的脉络的，只能被矛盾的双方来回拉扯，最终或是投向一方以解决立场的统一，或是落入无法自圆的分裂。我思考西藏问题，多年一直面临这样的困难。从去除北京和达兰萨拉双方的宣传谎言入手，考察和确认其中的真实成份，却发现这样做的结果是无法建立一个完整框架，无法统一，只能在上述矛盾中身不由己地来回摇摆。经过长久的困惑，我终于找到了问题症结所在：我们不能将自己置身于那些矛盾之中，把那些对立当作互不相容的独立事物，在他们中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需要超越那些矛盾，站到俯视它们的高度，将它们视为统一体，是同一事物之内的不同侧面，从而对它们进行整体的综观和分析，才能最终找到避免分裂和摇摆的新思路。从这种高度来看，所谓的西藏问题就不再是仅仅属于北京和达兰萨拉的争执与是非。实际上，西藏问题是当今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的集中反映，是一个合并了各种矛盾的典型病灶。”于是又回到出发点上去——西藏问题无解。

我的解决办法是既不偏向中国政府，也不偏向达赖喇嘛，而是以国际公法和其他国际公认的原则为准则，以世界和平、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为归宿来分析西藏问题、判断是非，这也就是我的立场。

即使这样也无法避免矛盾。首先国际公法本身就有矛盾，例如联合国 1960 年《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宣言》第二条说，每个民族和人民都有自决权；第六条和第七条却说，主权国家不容分裂，主权国家的内政不容干涉，令人无所适从。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以联合国和西方民主大国在解决类似问题时的示范为准，即英美司法系统所谓的 case law。

王力雄可能会说，国际法对至高无上的国家主权的强调本身就是引导人类走向灭亡的祸根，它允许、引导和鼓励每个国家都只追求自己的局部的、短期的和相互冲突的利益，忽视和损害人类共同的、长期的和根本的利益。例如许多国家为了自身的安全竞相发展核武器，完全不顾核冬天对人类的致命威胁。又如每个国家都不肯减少能源消耗，完全不顾温室效应对全球环境的灾难性影响。这话不假。然而如前所述，本书既然只是就事论事地讨论西藏问题，就只能遵循今日世上公认的以主权为上帝的国际法。最坏的法律都比没有法律好，这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如果世上所有国家都同时放弃主权至上的原则，那当然很好。如果别国都不放弃主权至

上，只有一国部分放弃或糊里糊涂，那么它的近邻远强就会蜂涌而至，把它的领土和资源抢夺一空，它的人民就会吃苦遭殃，清代中国几乎被东西方列强瓜分就是教训。

王力雄想在中国政府和达赖喇嘛之间保持公允客观，其用心可谓良苦，可惜做起来并不容易。在西藏问题上，主权的定位至关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如果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共 1950 年进军西藏就是中国的内政，是中国内部的改朝换代；如果不是，那就是一国侵略另一国。同样道理，如果西藏属于中国，那么西藏独立运动就是分裂主权国家的叛乱，中国政府 1959 年用武力平息西藏叛乱就和林肯总统用武力平息美国南方叛乱一样，是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合法（国际法）举动；如果不是，那就成了殖民主义的暴行。对这个问题是无法用“俯视”和“超越”来解决的，只能根据国际公法用“是”或“否”来回答。《天葬》试图“俯视”和“超越”主权问题，结果出现了自相矛盾（后文详述）。

主权而外还有人权，联合国的有关文件当然是至高无上的准绳。然而当主权和人权发生冲突时，两者之间的关系也不是马上能分辨清楚的。前述主权和人权之一的自决权的矛盾就是一例。这也是难以“俯视”和“超越”的，只能用 case law 来解决。

甚至国际公认的人权标准本身也是有矛盾的，根据 1966 年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少数民族保持自己的传统文化、宗教、习惯、风俗、语言、和生活方式已被视为基本人权了，而且有人类学的文化相对主义作为理论依据。然而在经济迅速发展、交往空前频繁的今日，世上哪个民族的文化、宗教、习惯、风俗、语言和生活方式不在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下迅速改变？而且这种改变每每朝着经济发达、人口众多的民族的方向行进，连远在北极的爱斯基摩人都无法逃脱。如果说这种改变就是侵犯人权，那就无异于剥夺经济落后民族享受现代文明的权利，强迫他们像活化石一样滞留于中世纪，变成了新的种族歧视。同时也违反了 1986 年联合国《发展权宣言》关于“确认发展权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的条款，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侵犯人权（举世公认发展就是现代化）。西方人权卫士和达赖喇嘛所谓的“中国正在消灭西藏传统文化”就是一例。王力雄出于对“未受现代文明污染的”藏人的淳朴风俗的热爱，以人类学的文化相对主义为武器，批评中共在西藏的现代化政策，称之为“西藏的肿瘤”、“圣城沦落”，实际上不知不觉地陷入了同一个陷阱。他把书名题为“天葬---西藏的命运”，意思是说中共正在杀死藏文明，这与他称今日西藏为“藏人的最好状态”明显矛盾。按照他的说法，如果西藏实现了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西藏作为一个人文地理的概念，那时将不复存在，藏文明也就此走到了尽头”（16）。那么汉族及东方各族在西方入侵之前也没有工业，如今有了，而且越来越多，日本和“四小龙”则已实现了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这是否意味，汉文明及东方文明也在走向尽头呢？西方在工业革命前也没有工业，如今已实现了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这是否意味，西方文明已经走到尽头了呢？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周星说：“整个人类学，还没有为‘发展’寻找到一条不与文化相对主义冲突的新出路。……藏民族的同胞们，有权利介入发展的世界大潮，也有权利分享主体社会乃至全人类的一切文化财富；同时，我们都不希望藏族人民创造的那种适应于大陆高极的独特文化，由于‘发展’而丧失太多。（17）”这的确是个难解的悖论。正如社会主义大锅饭的失败证明了自私自利与好逸恶劳是人类的本性（或曰原罪）一样，今日拉萨藏人对现代物质文明与现代商业娱乐的狂热追求也证明了贪图物质享受与感官刺激（声色之乐）也是人类的本性。中世纪的田园风光、牧歌情调的确令人怀念、神往，然而有几个人愿意回到没有电灯、电话、电视、自来水与汽车的中世纪生活中去？外人要求保存西藏传统文化的呼声很容易使人想起“饱人不知饿人饥”这句话。假如有个藏人问：“你们洋人和汉人享赋了现代物质文明，却以保存西藏传统文化的名义禁止我们藏人享受现代物质文明，你们居心何在？”西方人权卫

士与王力雄、周星等将何言以对？

至于达赖喇嘛高喊“保存西藏传统文化”，纯粹是一种政治策略。从美国纪实电影《在西藏七年》（Seven Years in Tibet）中可以看出，达赖喇嘛自己在少年时代就醉心于玩汽车、电影放映机、收音机、留声机、画报、望远镜等来自英国的洋玩意儿，当时在西藏也只有达赖喇嘛一人有电灯、汽车和电影放映机。他还请奥地利登山家哈勒（《在西藏七年》就是根据哈勒的同名回忆录拍摄的）教他学英语。他今天也并不拒绝享用汽车、飞机、电灯、电话、电视、电影、家用电器、自来水、现代医疗等。达赖喇嘛可能会说，他不反对享用现代物质文明，他只要求保存西藏的传统价值、文化、宗教、语言、习惯、风俗等属于精神领域的东西。然而无数事实证明，追求与享用现代物质文明（电灯、电话、电影、电视、煤气灶、自来水、西式公寓、西式家俱、收录机、音响、电脑、大哥大、洗衣机、照相机、录像机、化妆品、摩托车、汽车、飞机、西装、牛仔裤、耐克鞋、啤酒、可口可乐、迪斯科、摇滚乐、歌厅、舞厅、酒吧、录像馆、咖啡馆、旅游、西式医疗等等），不仅会改变藏人的生活方式与风俗习惯（最明显的是服装打扮与娱乐方式；据至今仍在西藏的朋友告诉我，自从大部分拉萨藏人住进有浴室的公寓楼后，我在八十年代还见过的西藏传统的沐浴节——届时许多藏人在拉萨河里洗澡——就自动消失了），而且会改变藏人的价值观念与语言文化，导致拜金主义、崇洋主义、享乐主义与世俗主义。例如藏人以前脑子里只有超度来世，一有空就去转经拜佛，把余钱全部献给寺庙；如今藏人整天想的是赚钱享受，城镇青年一有空就去歌厅、舞厅、酒吧、夜总会狂歌劲舞、纵情声色，中老幼藏人则在家里目不转睛地看电视，一齐怠慢了菩萨，这样下去天长日久，能不潜移默化地改变藏人的价值观念吗？

如今连喇嘛都爱钱。十年前藏北那曲县当局动员藏民挖虫草致富时，喇嘛告诉藏民说那是“山神的肠子”，挖不得。现在连那里的喇嘛都在孜孜不倦地挖虫草卖钱。喇嘛好色贪吃，自古皆然，不过现在的喇嘛好色贪吃也沾了汉风洋气。据知情者告诉我，“三大寺”的青年喇嘛竟然穿上便装去拉萨的录像馆看港台与西方黄色录像；还有喇嘛穿便装去汉人开的饭店大吃大喝，他们花的可都是信徒供奉的钱。藏北的牧民以前生了病只知请喇嘛唸经，现在却流行“听诊器崇拜”。他们像迎接活佛一样地迎接下乡巡诊的汉族医生，看完病后坚决要求汉族医生用听诊器在他们的头上按一下，再在他们病痛的地方按一下，病人就露出欣慰的笑容，恰如被活佛摸过顶一样（18）。

又如藏人喜爱收录机、照相机、电视机、洗衣机、音响、摩托车、汽车等物，然而那些东西的说明书都是用汉文印刷的（这倒不是种族歧视，而是因为藏文没有科技词汇），藏人能不学习汉语文吗？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1988 年在西藏进行问卷调查时发现：拉萨老城居民中认为西藏的发展需要提倡学习汉语文的占 79%，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兼通汉藏文的占 93.8%。藏农牧虽然很少与汉人接触，却也有 94.3% 认为西藏今后的发展需要提倡学习汉语文，比拉萨老城居民的比例还高（19）。因为如今藏农已经离不开农药、化肥、农机、农业科技等，而那些东西的说明书或教科书都是用汉文印刷的（再说一遍，藏文没有科技词汇）。任何人只要到西藏去看一眼就会发现，今日藏人是如何狂热地追求金钱、渴望享受现代物质文明与现代商业娱乐。以至于中国政府在 1993 年 5 月放开粮价（同时给予藏人粮价补贴）时，藏人就上街示威扔石头、要求增加补贴与工资（后文详述）。

当王力雄描述西藏现实时，不得不肯定中共用巨款极大地提高了藏人的生活、教育、医疗水平，称之为“藏人的最好状态”；当他思考西藏问题时，却附和达赖喇嘛，谴责中共“毁灭藏文明”。这类矛盾在《天葬》中比比皆是，其因都是为了“俯视”和“超越”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的矛盾而使用相互矛盾的价值标准去评判同一事物或现象的缘故。

又如宗教信仰自由是基本人权之一，然而西藏有个喇嘛越多越好的传统。据戈茨坦说，1737年，喇嘛人数占了藏族男性的26%；王森则说占了一半（20）。由于西藏的尼姑人数和喇嘛相比微不足道（21），上述数字意味着有四分之一到一半的藏族妇女找不到丈夫（藏族虽然允许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但毕竟是少数），这岂不是侵犯藏族妇女的人权吗？还有，佛教规定出家人不得从事生产活动，这就迫使藏族妇女从事本应男人从事的重体力劳动，岂不又是侵犯藏族妇女的人权吗？中国政府为了保护藏族妇女的人权，限制喇嘛人数无限制增长，却被达赖喇嘛和西方人权卫士指责为“宗教迫害”与“侵犯人权”，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其实今日西藏的僧尼人数已达45000多人（不算没有编制的僧尼）（22），占藏族人口2%，远远高于佛教国家泰国僧尼的比例---0.7%（23）。

再如宗教自由和政教分离，游行示威自由（藏人每次示威都要使用暴力）和维持公共秩序，都是无法“俯视”和“超越”的矛盾。

更为复杂的是社会进步与人民幸福的标准。按照时髦的文化相对主义，各种生活方式没有高低优劣之分，那么衡量某个政府的政勤也就没有了客观标准。中国政府说它用巨款提高藏人生活水平是历史进步，王力雄也承认是“藏人的最好状态”；达赖喇嘛和西方人权卫士却说是中共毁灭西藏文化，王力雄也说是中共在“天葬”“藏文明”。然而细读西方民主大国的总统国情咨文和总统候选人的竞选演说，无不把促进经济增长和人民收入增加作为政勤来夸耀或施政纲领来许诺的，却从未提及保存少数民族（印第安人、爱斯基摩人和夏威夷土着波里尼西亚人）的文化和传统生活方式。可见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现代化（这在世上绝大多数人心中都是同义语）乃是衡量社会进步与人民幸福的首要标准。

至于人心和民意更是深不可测、捉摸不定的东西。且不说现在没有可能对全体藏人进行民意测验或公民投票，即便能，由于人心和民意时刻在变，而且同一个人在同一时刻也会“爱恨交织”，对许多问题的答案也会相互矛盾。例如美籍华人作家陈若曦去西藏旅游时问过许多藏人（相当于民意测验）：“西藏最需要什么？”不约而同的答案都是“现代化”（享受现代物质文明），若再问下去，有的说“同时要保持藏族文化”（中世纪式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有的说“也要高度自治”（汉人全部离藏）。陈若曦认为这“正是当今西藏的现状和矛盾”（24）。本书的分析将阐明，现代化和“保持西藏文化”、现代化和“高度自治”的确是矛盾对立的、不可兼得的东西。任何人抓住其中一点都可以指责另一点。中国政府 and 达赖喇嘛的争吵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此，王力雄的自相矛盾也来源于此，这也是难以“俯视”和“超越”的。

何况人心和民意就一定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吗？那是可以人为制造和操纵的。文革初期去中国旅行过的西方人都会对全民狂热崇拜毛泽东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并认为那就是中国的民意，事实真相又如何？达赖喇嘛利用西藏“全民”（本书将证明并不是百分之百）信教而又没有政教分离观念（政教合一一是中世纪的观念，在西藏有根深蒂固的传统）的特点，故意违背政教分离的原则（所有西方民主国家的立国原则），把佛教里根本没有的“西藏独立”说成是佛的旨意，从而使许多藏人不假思索地支持西藏独立，这样的人心和民意可以作为改变国际公认的西藏的主权归属的依据吗？

《天葬》的一大不足就是试图“俯视”和“超越”这些不可调和的矛盾，结果从文化相对主义走到了主权相对主义，产生了许多自相矛盾的观点。例如它一方面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并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单独放弃那个体系的原则（指“主权体系”---引者），哪怕那国家是由圣人所领导的”（25）。另一方面又说：“中共在本质上又是一个专制的权力集团，不容许任

何对其权力（包括其对西藏的主权）的触动和威胁。（26）”此话甚奇，难道西方民主国家就允许触动和威胁其领土主权吗？林肯为何不让美国南方独立？今日美国为何不让夏威夷、德克萨斯独立？英国为何不让北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独立？法国为何不让科西嘉、巴斯克和布列塔尼独立？西班牙为何不让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独立？加拿大为何不让魁北克独立？印度为何不让克什米尔和锡克独立？

《天葬》在分析宗教、民族问题时说，西藏在 1959 年“平叛民改”前，“由于没有阶级斗争，传统西藏社会是凝聚为一个整体，统一在宗教和民族旗帜下的”（27）。毛泽东用阶级斗争分化了藏人，结果就把西藏摆布于股掌（28）。“邓小平放弃阶级路线，对人而言是好事，从中共统治西藏的角度，却因此失去了分化藏民族的依据，藏人也就被其复活了的传统文化重新整合，再度凝聚为一体的民族。（29）”然而同书在分析今日藏人的利益分化时又说：“在藏民族重新一体化的表面之下，已经存在一种不可弥补的深刻分裂。藏人不再是一个同质的概念，已经有不同的甚至彼此对立的藏人。他们是不能以西藏民族几个字就可以囊括和说明的。（30）”这种自相矛盾的论述也说明了：在文化问题上可以搞价值相对主义，在政治经济上不能搞价值相对主义。当王力雄论述民族宗教问题时，他从文化人类学的文化决定论出发，得出藏族重新凝聚为一个整体的结论；当他论述政治经济问题时，他不知不觉地回到了阶级分析法，得出藏族已经被不同的政治经济利益分化为不同的阶级（或利益集团）的结论。“俯视”和“超越”变成了双重标准。

顺便说说，阶级分析法并非共产党的专利。马克思致魏德迈的信中说：“无论是发现近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彼此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了这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而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则早已作过对于各个阶级的经济解剖了。我所做出的新的东西就在于证明下列几点：一、阶级的存在仅仅是跟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二、阶级斗争必然要引导到无产阶级专政；三、这个专政本身不过是进到消灭任何阶级和进到无阶级社会的过渡……（31）”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当然是错误的，其危害更是有目共睹。但人们因不同的经济利益而分化为阶级，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政治态度，却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问题在于如何调节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使各阶级和平共处，共同推进社会发展。美国大选之年，美国报刊天天都在分析中产阶级（middle class），上层中产阶级（upper middle class），上层阶级（upper class）和下层阶级（lower class）的经济状况，以及他们由此而来的对两党总统候选人的竞选纲领的不同态度，就是典型的阶级分析法。本书在分析西藏问题时，也将广泛采用此法。

《天葬》中最奇特的部分是对达赖喇嘛的评价。一方面，它揭露了达赖喇嘛的许多谎言，正确指出：“邓小平时代，中共已经大大改善了西藏政策，达兰萨拉的宣称机器却没有做出相应调整，反而由于西方国家在国际政治中推行人权政策，为了获得西方国家对西藏的更多支持，达兰萨拉的宣传机器变本加厉地攻击中共，包括有意进行错误导向和胡编乱造地指控，这种宣传政策无疑受到了达赖喇嘛的宽容，因为在他自己发表的各种言论中，也同样看不到对中共改善西藏状况的正面肯定。（32）”达赖喇嘛为了打破中共的不理睬，只有主动出击，“因此，流亡藏人是不会容忍西藏社会从此变得安定的——尽管西藏境内的藏人正处在历史上最好的状态，尽管安定会使境内藏人少受牺牲，也会使中共的压迫缓解，但是中共统治下的西藏发生社会动乱，本身是海外流亡藏人从事西藏解放事业的资源，为了获得这种资源，他们有很大理由去推动和操纵西藏境内对中共的反抗”（33）。达赖喇嘛一贯声称，他的全部活动都是为了西藏人民的和平、安宁和幸福，除了西藏人民的和平、安宁和幸福，他不追求任何一己私利。上述两段话把达赖喇嘛为了自己及其主要追随者（想当总统、总理、部长、大使、议员、将军等等的流亡藏人）的私利、乞求西方的援助，肆无忌惮地制造谎言，欺骗国际舆论，

并且不顾西藏人民的幸福、安宁和生命安全，违背政教分离的民主原则，愚弄、煽动和操纵他们用石头向中国政府挑釁，制造暴力示威和流血事件的伪善面目揭露得淋漓尽致。

另一方面，它又说：“达赖喇嘛肯定是诚实的。(34)”“达赖喇嘛一方对中共的指责，无论在事实上有多少出入，其基本立场的真诚则更可以确信无疑。(35)”岂非自相矛盾？它还把达赖喇嘛吹捧为“国际社会最有影响力的伟人之一”，“完全当之无愧地名列在当今世界的巨人行列”，“有佛之大胸怀”，并表示“赞赏达赖喇嘛的和平精神与人道思想”(36)。如此崇高的形象和前述伪善面目统一得起来吗？

我理解王力雄的心理，他作为身在国内而又面向海外写作的作家，竭力想划清和中共的界线，显得公正、客观、不偏不依，于是企图“俯视”和“超越”中共和达赖的矛盾，结果不知不觉地走向双重标准乃至多重标准，出现许多自相矛盾的论述，既未能“避免分裂和摇摆”(37)，也“无法建立一个完整框架”(38)，这是令人惋惜的。

《天葬》还有一个不足，那就是未能直接引用外文资料，该书所引外文资料全部是别人已经译成中文出版的。这就导致两个问题，一是当译者出现错误时，该书也会引错。例如该书第 469 页说：“达赖喇嘛在他的自传中谴责……89 年拉萨藏人抗议期间‘中共至少杀害 2500 名无武装西藏人’……也都甚为离谱。”查达赖喇嘛自传的英文原版，原文的死亡人数是“至少 250 人”(39)，不知为什么台湾在翻译出版此书时，在这个数字后面加了个零，变成了 2500 人(40)，于是以讹传讹。

二是作者的视野因而受到很大的限制，无法参考尚未被人译成中文的外文资料。特别是《天葬》论述“西方裁判的国际拳台”(41)时，发表了一些近乎天真的看法，看不清其本质（详见本书后文），可能就与此有关。

注释：

(16)《天葬》，421-422 页、482 页、389 页。

(17)周星，《〈灵魂像风〉序》——马丽华，《走过西藏》，作家出版社，北京，1997 年，657 页。

(18)喇嘛挖虫草与听诊器崇拜分见同上书 667 页与 134 页。

(19)马戎，《西藏的人口与社会》，同心出版社，北京，1996 年，371 页。

(20)这两个数字分别见：Goldstein, Melvyn C.,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1991), p.21；马戎，《西藏的人口与社会》，同心出版社，北京，1996 年，170 页。

(21)据李安宅 1947 年对西康德格藏人的人口抽样调查，僧尼竟然占其总人口的 33.25%，其中喇嘛和尼姑各占 96%和 4%。《李安宅藏学论文选》，中国藏学出版社，北京，1992 年，270 页。

(22)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西藏自治区人权事业的新进展》，1998 年 2 月 24 日。

(23)这是泰国官方提供的数字----刘畅，《千佛之国见闻》，《人民日报》海外版，1993年6月23日。

(24)陈若曦，《西藏需要什么？》，《明报周刊》，1085期，香港。

(25)《天葬》，142页。

(26)《天葬》，492页。

(27)《天葬》，216页。

(28)《天葬》，516页。

(29)《天葬》，330页。

(30)《天葬》，339页。

(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北京，1972年，第4卷，332-333页。

(32)《天葬》，510页。

(33)《天葬》，516页。

(34)《天葬》，464页。

(35)《天葬》，6页。

(36)《天葬》，454、462、515、195页。

(37)(38)《天葬》，8页。

(39)Dalai Lama, *Freedom in Exile: the Autobiography of the Dalai Lama*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0), p.261.

(40)达赖喇嘛，《流亡中的自在》，康鼎译，联经，台北，1990年，311页。

(41)《天葬》，447页。

## 4、信息的困惑

价值坐标而外还有信息问题。如前所述，一名英国妇女发现藏人的神话思维严重歪曲真相，王力雄感慨说：“目前的西藏文献和资料经常是无法使用，因为它们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有大量矛盾，往往到了荒谬的地步。”他认为“更重要的来源应该是经验----即对西藏的亲身经验和体验。

那不仅因为经验本身最为真实，还因为经验能够帮助人在众说纷纭的西藏资料中辨别方向。（42）”我对此深有同感。

西藏的信息之所以混乱不堪、真伪莫辨，除了路途遥远、与世隔绝和藏人的神话思维外，还由于有关各方出于自己的政治需要，故意误导、歪曲和捏造。其中尤以达赖方面为甚，本书将详加举例。西方报刊的许多报道来自达赖方面，同样不可轻信。达赖方面一贯把中国政府发布的信息和中国藏学家发表的着述斥为“共产党造谣”，事实并非如此。中国出版的着述与调查报告对旧西藏农奴制的描述和精通藏语文的、经常去西藏各地调查的美国藏学家戈茨坦的描述就非常相似。戈伦夫则说过：“在试图总结五十年代的事件时，日益暴露出来的证据有助于证明中国对事件的说法的真实性。（43）”根据我在西藏生活的经验，特别是对中共自1980年以来在西藏问题上的思维模式、心理定势和政策惯性的体验，对本土藏人和在藏汉人（特别是官员）的思维模式、心理特点和行为方式的体验，我已形成了鉴别中共方面、达赖方面和西方报刊的信息真伪的敏锐嗅觉。

一般而言，中国政府公布的有关西藏经济、文化和社会的事例和数字大都是真实的。这是因为自1980年以来，中国政府确实真心实意地在西藏做好事，没有必要撒谎。即便是严厉谴责中共在西藏“侵犯人权”，坚决支持西藏独立的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在其最近发表的报告《西藏：人权与法治》中也不得不承认，中国政府大大提高了藏人的生活、教育和医疗水平及人均预期寿命（44）。再说有关西藏经济、文化和社会方面的信息要接受国际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粮农组织、人口基金会，世界银行等）与外国商业、旅游、金融、通讯等机构的监督，难以造假。我在西藏时问过在西藏自治区政府工作的朋友们，他们都告诉我，中国政府毋需在这些问题上弄虚做假。当然，由于那儿的干部素质低下，难免会有许多误差，需要仔细比较、核查。中国政府发布的有关政治方面的信息则比较复杂，有时真伪莫辨，对其有利的大肆宣传，不利的则闭口不提，好在我有许多渠道和西藏的朋友们联系，可以及时掌握真相。对于达赖方面发布的信息则必需审慎对待，其中确有少量真相，但也有大量的夸大其辞和凭空捏造。相对而言，西方记者和游客从西藏发来的报道较为客观。特别是某些通晓藏语并去西藏作过调查的西方学者，如前面提到的戈茨坦，其研究成果既客观又深入，是不可多得的好材料。

甚至术语也会引起困惑。达赖喇嘛一贯声称他所说的西藏是指“大西藏”，根据其自传《流亡中的自在》（*Freedom in Exile*）里的地图，这“大西藏”囊括了整个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省，以及四川省西部、甘肃省南部和云南省北部。而根据“西藏流亡政府”的地图（45），还包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南部和甘肃省的河西走廊。而本书所说的西藏仅指西藏自治区，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达赖喇嘛的实际控制区。当谈到达赖喇嘛所说的西藏时，本书一律称之为“大西藏”。

按照某些藏人的意见，汉人把藏传佛教叫做喇嘛教、把西藏僧侣都叫做喇嘛是不科学的。他们说称藏传佛教为喇嘛教就像称汉传佛教为和尚教一样可笑，而只有得道高僧才能叫喇嘛。达赖喇嘛也说把转世喇嘛（包括他本人）叫做活佛是错误的，可惜他没有解释为什么错误、错在那里（46）。不过语言学中有个约定俗成规则，我在西藏时经常听人（汉藏都有）把西藏佛教叫做喇嘛教，把西藏僧侣都叫做喇嘛，把转世喇嘛都叫做活佛，本书也就沿用这些通俗名称，其中并无任何褒贬之意。

最后，有必要给西藏问题下个定义。在我看来，西藏问题就是由于达赖喇嘛（包括十三世和十四世即现世）及其追随者要求西藏独立而中国政府（包括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准西藏独立引起的冲突。显而易见，这冲突首先是政治问题，同时也涵盖了经济、文化、宗教、社会等各方面的问題。



注释：

(42)《天葬》，9 页。

(43)Grunfeld, A. Tom, 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New York: M. E. Sharpe, 1996), p.149.

(44)Tibet: Human Rights and the Rule of Law (Geneva: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1997); Crossette, Barbara, "China clamping down tighter on Tibetans, Legal group reports", The New York Times 21 December 1997, A4.

(45)该图见 Tibet: Human Rights and the Rule of Law (Geneva: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1997), p.2.

(46)美国之音焦点透视节目 1997 年 9 月 13 日播放的夏伟对达赖喇嘛的访谈记录。

## 第一部：西藏的自然和历史

### 第一章：西藏不是移民的天堂

#### 1、缺氧危及生命

一提起西藏，许多人的脑海里马上会出现一幅美丽的图画：深蓝的天空，晶莹的雪山，辽阔的草原，成群的牛羊，金色的寺庙，五彩的经幡，淳朴的藏民，神秘的喇嘛……许多西方人把西藏看作地球上最后一块未被现代化污染的世外桃源，美国作家希尔顿（James Hilton）的小说《失去的地平线》（Lost Horison）中的香格里拉（Shangri-La）（1）。许多美国人还把西藏想象成类似开发前的美国西部那样富饶的处女地、移民的天堂，这些说法并不符合实际。

初到西藏的人第一个感觉便是由缺氧引起的高山反应：头痛、头晕、胸闷、呕吐、心跳加速、呼吸困难、食欲不振、全身乏力……如果原有心脏病，可能危及生命。即便只有点感冒，也会引发危险的肺水肿。因为西藏地处世界屋脊，大气压只有海平面的一半左右。从海拔 3700 米的拉萨到有人居住的最高点珠穆朗玛峰脚下的绒布寺，空气里的含氧率比海平面分别少 37%到 50%以上。虽然经过几天，健康的外人也能适应缺氧，可以自如地呼吸、活动。但他跑步、登高时，马上会发现自己的体力大大不如以前，一会儿便气喘吁吁。汽车在西藏行驶时只能达到一半马力左右。

事实上缺氧对人体的危害极大，外人长期在西藏生活，会引发脱发、低血压、高血压、心脏病、高原红细胞增多症、脑水肿、肺水肿和癌等疾病。汉族妇女如在西藏分娩，婴儿一出世就会死亡。据西藏卫生部门 1978 年统计，汉族干部在藏 10 至 15 年，患肺气肿的高达 30%；患

肺动脉凸出的为 16%；患高血压和心脏病的，拉萨为 20%，那曲高达 54%（2）。据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统计，在西藏工作过 30 年的汉人退休回汉地后绝大部分在两年内死亡（这个数字从未公开）。而许多汉人还等不到退休（中国政府规定在西藏男性退休年龄为 55 岁，女性为 50 岁）就在西藏死亡。据调查拉萨于 1976 年至 1984 年间汉族死亡人数中有 10.9% 是死于高山病（3）。鉴于西藏的汉人绝大多数是中青年，很少有老人和儿童，这个比例就格外惊人。

统计数字是枯燥的，让我举几个例子。1984 年 1 月 15 日，新任西藏军区司令张贵

荣在喜马拉雅山区视察国防公路时，因劳累过度引发心脏病而死，年仅 49 岁。我在西藏时的上司，西藏文联党组书记张耀民 50 出头就因肝癌去世。连四川藏人都怕缺氧，原西藏大学党委书记、四川省巴塘县藏人雍丕也在 50 出头时因肝癌去世。大名鼎鼎的十世班禅原不怕缺氧，但他从 1965 年起长住北京，不再适应缺氧。1989 年 1 月 28 日，他在日喀则视察时也因心脏病而死，年仅 51 岁（4）。由此推想，如果达赖喇嘛回到西藏，恐怕也难以适应了。

享有特权的中共高官尚且如此，在西藏的汉族平民就更悲惨。1984 年藏历新年初一，我被藏族同事强敬了几杯青稞酒。如果我在内地，这点酒本不算什么。可当时我却感到心脏狂跳、呼吸困难。要不是及时被送到医院去吸氧气，早就没命了。

诚然，土生土长的藏人天生适应缺氧，但他们的人均寿命自古以来就很短。达赖喇嘛和西方人权卫士常常把这说成是中共统治乃至屠杀的结果，然而美国藏学家戈伦夫却指出，旧西藏（中共进藏前的西藏）由于严寒、大风、缺氧、与世隔绝和缺少科学知识，死亡率很高，平均寿命很短；那时 90% 的藏人有性病，三分之一的藏人得天花（连十三世达赖喇嘛都在 1900 年得了天花），癫痫病也很流行，孩子的死亡率高达 40% 到 75%；号称圣地的拉萨之脏，可以从下文看出：“到处是垃圾，随地大小便，据说到处还可以看到动物的尸体。情况非常糟糕，由于臭气熏天，污物遍地，致使十三世达赖喇嘛几乎总在害病。当贵族骑马穿过拉萨市区时，总要用洒了香水的手帕捂住鼻子。（5）”由于空气稀薄，紫外线强烈，藏人的面容衰老得很快。

西藏交通之险恶也堪称世界之最。达赖喇嘛 1954 年去北京参加中国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解放军士兵为了保护他，沿路站成一排，有三名士兵因此摔下山崖而死。达赖喇嘛在自传里说：“只死了三个人，实在是侥幸。（6）”川藏、青藏公路修通后，车祸极为频繁。有人这样描写：

坑凸不平的搓板路车一跳老高，像匹野马难驾驭。在山区，路的面貌千篇一律，一面是直直的陡壁，乱石飞滚，一面是峡谷或河流，车左跳右跳，一个不留神就落到外面去了。因此处理车祸的经过也几乎千篇一律，把死者抬上来（如果没有被激流带往国外去的话），车不用再多看一眼。同时路又狭窄，拓宽路面，等于把千仞陡壁垂直削去一层，工程量浩大难求。

车辆会摇头。

在搓板路这种路况保持良好车况，简直是逼花猪生熊猫。我们见到一辆崭新的北京 212 吉普车，从接收地开到西藏腹地的军营，车体各结合部多处开裂，重新焊接后，斑斑驳驳车容很不雅。甘伟铭大校 9 月 19 日乘日本三菱越野车赶往拉萨，1100 华里爆轮胎 6 次。内地认可的好坏标准，在西藏要大打折扣。你说你身体好，在高原你可能反应强烈。你说是辆好车，高原路上却让它出尽洋相。相反你说是坏车，在雪域稀薄空气中它凑凑合合一发动就，而所谓好车却得了气管炎和心脏病。

司机会摇头。

路不行，车不行，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脚踏阎王殿，手把鬼门关，哪个司机想出车祸呀？那位副指导员，刮了胡子换了新衣，高高兴兴到机场接妻子。航班改日，回去的路上发生车祸，副指导员的死难算不算因公颇令领导费脑筋。第二天妻子神采飞扬、左顾右盼下了飞机，接站的战友闪烁其辞把她接到营房，领导同志表情肃穆，“你要坚强些”这句话实在说不出口。还有一位军官，收拾好房间等接站车回来，左等右等妻子就是不来。久别胜新婚，军官好不急，等来的却是车祸噩耗。爱妻曾发誓再也不来西藏，坐车吓死人，这回真应验了（7）。

找不到西藏车祸的统计数字，让我再举几个我亲历的例子。我在《西藏文学》编辑部时的两位女同事兼女作家都死在西藏的路上。其中龚巧明 1985 年搭乘的车翻落到陡壁下的激流中，享年 37 岁；田文 1987 年在弃车步行穿越被泥石流冲毁的公路时，被一块飞石击中后脑勺，享年 29 岁。还有位女同事兼女作家 1987 年在车祸中大难不死。一个十来个人的单位，在短短两年中就有三人出车祸。李白云：“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其实比起藏道来，蜀道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这样的地方，也能叫做“移民的天堂”吗？

注释：

（1）这本纪实小说发表于 1933 年，描写一个美国驻印度的外交官和三个朋友乘飞机翻越中印边境时因故迫降在一个雪山环绕的神秘峡谷中，当他们被当地居民救护后，发现那儿竟是一个神话般美妙的世界：没有战争，没有罪恶，没有贪婪，没有歧视，各族男女和睦相处，亲如一家。这本小说发表以后立即轰动西方，被译成多种文字，还被好莱坞拍成电影，风靡一时。那里的地名据说叫做香格里拉（Shangri-La），该词从此进入英语词汇，成为西方人心目中理想世界的代名词。据中国学者根据小说描写的地貌特征和民情风俗考证，认为香格里拉位于中国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甸县（邓高如、陈德杰，《香格里拉何处寻？》，《人民日报》海外版，1997 年 12 月 15 日）。

（2）《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1995 年，212 页。

（3）马戎，《西藏的人口与社会》，同心出版社，北京，1996 年，112 页。

（4）张贵荣与班禅之死见《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1995 年，282 页、347 页。

（5）Grunfeld, A. Tom, 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New York: M. E. Sharpe, 1996), pp.17-26.

（6）Dalai Lama, Freedom in Exile, the Autobiography of the Dalai Lama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0), p84.

（7）燕燕、张卫明，《血对西藏说》，沈阳出版社，1993 年，280-281 页。

## 2、农林牧资源枯竭

西藏的自然资源状况又如何呢？西藏的面积虽大（120 万平方公里，占中国的八分之一），大部分却是永久冰雪带、冰缘寒冻土、寒漠土、石山和高寒草原等，在这些地方，气候严寒，最温暖的月份气温也在摄氏 4 至 6 度以下，夜间要结冰，大气降水主要是下雪和冰雹。适宜农林业的土地（海拔 4100 米以下，最暖月的平均气温高于摄氏 15 度）极少，仅占西藏总面积的 11%。由于地形和土壤等条件的限制，这类地区中能用来发展农业的土地仅占西藏总面积的千分之一，产量也很低（8）。1997 年底，西藏共有耕地 334 万亩，只算藏族人口，人均 1.4 亩（9）。1991 年，西藏自治区卫生厅藏族官员扎西朗杰告诉台湾记者，尽管西藏只有二百多万人口，粮食已经无法自给，四分之一的人口要吃汉粮（10）。从 1985 年到 1992 年，西藏共运进粮食 848790 吨，平均每年 10.6 万吨。以人口 200 万计算，平均每人每年 53 公斤，相当于三个月的口粮。1990 年全国人口普查时西藏人口的 88.5% 是农牧民，却只能生产西藏粮食消费量的 75%，可见西藏的农业连西藏的农牧民也养不活（11）。

西藏的森林覆被率只有 5%，远低于世界平均值 24%，也低于中国平均值 12%。由于大片森林分布在地形陡峭、采伐困难的喜马拉雅山南侧和藏东南山地，只有十分之一的森林可供开采。然而藏农自古以来靠柴薪烧饭、取暖，每年要烧掉上百万立方米的木柴，远远超过政府砍伐的木材（12）。我在西藏农区采访时，看见家家户户墙头堆柴薪，却几乎看不到树木。在拉萨每天看见藏人拉着一车车树枝、树根和草皮沿街叫卖。如此竭泽而渔地破坏植被，使西藏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水土流失，耕地和草场沙化。拉萨周围的山上早已看不见树木。

西藏的牧场产草量很低，季节牧场不平衡，冷季草场严重不足。虽然西藏草场总面积很大，达 12 亿亩，占西藏总面积的 69%，但将近一半的草场每年鲜草亩产只有 50 到 100 斤，只相当于内蒙古产草量的四分之一到八分之一，另外还有将近五分之一的草场亩产不到 50 斤（这还是 1980 年的数字）。藏人自古以来还烧牛粪，致使有机质不能回归土壤，加速了草场的沙化。随着藏族人口爆炸，过度放牧更为严重，还有许多牧民砍灌木、掘草根作燃料，许多地区的草场明显退化，饲草越来越矮，覆盖度越来越低，优良牧草的比重越来越低，毒草逐步蔓延。冬春季节大批牲畜处于半饥饿状态，冬瘦春死的现象普遍存在（13）。如今（1994-1995 年）西藏有三分之一的草地退化，其中重度退化的占一半。还有十分之一的草地已明显沙化。在主要牧区那曲，其高寒草甸与高寒草原的平均产草量从六十年代的每公顷 2760 公斤与 1175 公斤分别减少到九十年代的每公顷 1107 公斤与 511 公斤，减少了 50-60%；与此同时，营养成分差或有毒的杂草增长了 20-30%。据统计，全西藏天然草场的载畜能力为 3766 万个羊单位，而目前（1994-1995 年）西藏已有牲畜 4323 万个羊单位，超载 557 万个羊单位（15%），草畜矛盾越来越尖锐。而西藏的畜产品也已无法自给，需要从内地调入（14）。

西藏粮食与畜产品不能自给和牧场因过度放牧而退化意味着西藏的人口已经超过西藏农牧业资源的承载能力，后文将证明，这已成为西藏骚乱的诱因之一。

注释：

（8）（12）（13）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孙鸿烈，《青藏的土地利用和自然资源的保护》，《揭开世界屋脊的奥秘》，地质出版社，北京，1981 年，98-102 页。

（9）1997 年西藏耕地数与藏族人口数（2339796）分见：西藏统计局，《西藏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1998 年，5 页、35 页

(10)《多子多孙未必多福，藏人生育观念丕变》，《中央日报》，1991 年 5 月 29 日。

(11) 马戎，《西藏的人口与社会》，同心出版社，北京，1996 年，119-120 页，397 页。

(14)《青藏高原环境与发展概论》，中国藏学出版社，北京，1996 年，149-150 页、163-164 页。

### 3、西藏没有经济价值

西藏的地下资源也十分有限，基本没有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等廉价能源，所以藏人要大砍森林、大掘草皮、大烧牛粪。只有一些铬铁、硼、锂、硅矿和盐湖，又苦于能源不足和交通不便。从理论上说，西藏有丰富的水能、风能和太阳能，但开发成本太高。1995 年中国政府投资 20 多万元，为西藏历史上第一座宫殿雍布拉克脚下的门中冈村 20 户藏农安装了太阳能供电设备，使之能点电灯、看电影，每户成本一万多元（15）。1998 年 12 月由中国政府投资 1700 万元修建的藏北安多县光伏太阳能发电站交付使用，其总装机容量仅 100 千瓦（16）。用《天葬》的话来说，这只能是“现代化表演”（17）。中国政府为了解决拉萨供电不足（我在拉萨时深受其害，近视眼每年递增 100 度；达赖喇嘛则在自传里称拉萨老城供电不足为种族歧视——详见后文），投资 20 亿元修建了羊卓雍湖水电站（18），却被达赖喇嘛斥为破坏西藏环境。

西藏地处亚洲腹地，四边和境内密布雪山，90%以上高于海拔 4000 米，又多深沟，内外交通极其险恶。目前只有藏北边缘可与青海通铁路，其主要部份难以修铁路（冬天冻胀、夏天融沉）。公路也因冬天雪崩、夏天泥石流而事故频繁、经常中断，加以缺氧使汽车消耗同样油料只能产生内地时的一半马力，这意味着西藏的交通成本极为昂贵。即使西藏有丰富的资源，能源和交通的昂贵决定了西藏难以发展工业。

诚然，西藏有世上最高的雪山、最蓝的天空、最灿烂的寺庙（因其空气最稀薄，阳光最强烈，寺庙金顶最辉煌）、最神秘的宗教、最独特的民俗，还有最辽阔的高寒草原和最奇特的高山植被（在喜马拉雅山的某些地方，自寒带到热带的各类植物垂直分布在半径仅十几公里的地方），自然和人文景观都十分壮丽，可以吸引海外游客。然而缺氧、严寒、交通险恶（经常翻车死人）和价格昂贵（交通成本太高），又使旅游业困难重重。1997 年西藏旅游营业收入 2.7 亿元，仅占全区国民生产总值的 3.4%；利润 2451 万元，仅占全区财政总支出的 0.6%（19）。

总而言之，西藏在经济上没有什么价值。与昔日号称“移民的天堂”的美国西部相比，真有天壤之别。藏独人士阿沛晋美也承认：“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西藏的土地资源供养两百万人口没问题，到三、四百万就困难了。水资源没问题。农业西藏不发达，粮食作物少，主要是畜牧业。矿藏不是很丰富，比较多的是铬和硼砂。没有石油，煤也少。但水能、太阳能和风能资源还比较有开发前途。（20）”西藏的藏族人口早在 1988 年就已突破 200 万（21），西藏的资源已经养不活西藏现有的藏族人口。如今西藏的藏族市民全靠中国政府用汉人的血汗（包括汉地运来的粮油肉菜）养活，西藏的农牧民也要依靠中国政府的资助进行生产（下文详述）。《天葬》说：“西藏却由于‘天’（指自然环境——引者）的因素，决定了其内部不具备现代化的条件和可能，它的现代化只能是外力加于西藏、并且由外力维持的。（22）”这是研究西藏问题时必需牢记

的事实，也是达赖喇嘛不得不承认的事实（23）。

注释：

（15）马书平、赵承，《点太阳----西藏首个太阳能示范村见闻》，《人民日报》海外版，1997年1月6日。

（16）《西藏建成大型太阳能发电站》，《人民日报》海外版，1998年12月25日。

（17）《天葬》，398页。

（18）张忠，《高原明珠亮万家》，《人民日报》海外版，1998年3月13日。

（19）根据下书中有关数字（旅游收入与利润、国民总产值、财政总支出）计算出百分比：西藏统计局，《西藏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1998年，1页、16页、99页。

（20）亚衣，《以佛的善念对待世界----访国际声援西藏中心政治分析员阿沛晋美先生》，《北京之春》，1995年5月号。

（21）马戎，《西藏的人口与社会》，同心出版社，北京，1996年，37页。

（22）《天葬》，378页。

（23）达赖喇嘛1997年11月28日在达兰萨拉告诉曹长青说，西藏需要中国的物质援助。曹长青，《抵抗撒旦的和平偶像----达兰萨拉采访达赖喇嘛记》，《世界周刊》，1998年4月26日。

## 第二章：农奴和奴隶没有人权

### 1、“仁慈”的农奴制

关于1959年以前西藏的社会制度，中共说是封建农奴制，达赖喇嘛一贯讳言农奴制，却也不得不承认是封建制，然后又百般美化之。达赖喇嘛曾告诉法国记者董尼德（Pierre-Antoine Donnet）：“如果您从社会制度及社会上不同的层次来看的话，西藏是属于封建制度。这好像是很不好的。不过，在事实上，大体而言，那个时期西藏群体是很祥和的，很快乐。中国人老是在提农奴与地主，实际上，地主与他们的雇佣之间的关系，说起来应该算是不错的。时常，这些单纯的人有一种属于地主的感受，使他们对地主忠心不贰。.....就是政治制度也是属于封建制的。（1）”最近，有个汉族女人向达赖喇嘛质疑时，他不得不承认农奴制，但仍然说：“虽然旧西藏社会是落后的，但是绝不像中国共产党所说的最黑暗、最残酷、最野蛮，绝对不是这样。在旧西藏社会中生长的人，如果你去看他们的脸，绝对是充满快乐的、笑咪咪的。中国的农奴制度，印度的农奴制度和西藏的农奴制度不一样。这里面的不同，西藏人之所以充满快乐，主要是由于宗教的因素。但是也有一些人，一些有钱有势的人，欺负自己的农奴，这样

的现象是有，不是没有，各个地方总能找得到。但是从总的说来，旧西藏的制度是比较好的，其中有一些仁慈、以善待人的观念，与中国和印度及其他国家，特别是与欧洲中世纪的农奴制相比是没有办法比较的，好多了，这主要是有一些爱和慈善的因素在内。当然个别的危害人的现象不是没有，是有的。(2)”达瓦才仁干脆把西藏农奴制说成是中共宣传(3)，如前所述，在他的语汇里，中共宣传就是造谣，他连达赖喇嘛都承认的事实也拒不承认，虽然达赖喇嘛向那个汉族女人承认旧西藏是农奴制时的汉语翻译正是他本人，上面引用的达赖喇嘛的话就是由他从藏语翻译成汉语的。

读过果戈里、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的小说的人都知道，农奴制和汉地封建制的区别在于：农奴是农奴主的财产，没有人身自由，而汉族农民和地主并没有人身依附关系。达赖喇嘛讳言农奴制，却也不得不承认西藏有农奴，“属于地主”。戈茨坦毫不含糊地指出，旧西藏的农民是世袭的被束缚于领主的农奴(4)，农奴主有权对农奴行使司法权(5)。“除了大约三百个贵族家庭，所有西藏俗人男女都是农奴，他们通过庄园以及对应的遗传关系归属于具体的领主，也就是说儿子生来就属于他父亲的领主，而女儿属于她母亲的领主。(6)”戈伦夫也说：“绝大多数藏人都是农奴……农奴被拴在他们主人的手中。为了能在地里劳动，他们必须纳税和服劳役。他们毫无权利，即使要走进寺庙要结婚，也要征得主人的同意。如果分属于不同领主的两个农奴结了婚，所生的男孩要归父亲的领主；如果是女孩，要归母亲的领主。(注意，这里的“归”字，原文是 *reverted*, 在英文里是表明财产归属的法律术语----引者)农奴要想离开庄园，哪怕是一小会儿，也要得到领主的许可。(7)”连坚决支持西藏独立的董尼德也不得不承认，旧西藏是“做得太过分的封建农奴制”(8)。而清朝钦差大臣张荫棠则说：“藏中差徭之重，刑罚之苛，甲于五洲，应一律废除，以苏民困。”(出处见第六章)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总不能说这些西方学者及清朝官员也是中共的代言人吧？无论西藏的农奴主多么仁慈，无论西藏的农奴多么热爱农奴主、在农奴主的监护下多么快乐，农奴制毕竟是农奴制。身为农奴就意味着世代失去了人身自由，即便他们生活富裕，即便他们不受虐待，他们仍然失去了最基本、最起码的人权。在中共划分的西藏阶级中，竟有一个“富裕农奴”，他们租有较多的土地，能够转租给“贫苦农奴”，或者雇佣“贫苦农奴”，甚至拥有朗生（奴隶），生活颇为富裕。按照中共的定义，他们的“剥削收入”超过其总收入的 30%(9)，相当于内地的“富农”。但他们没有人身自由，所以仍然是农奴。

注释：

(1)(8) 董尼德(Donnet, Pierre-Antoine), 《西藏生与死》( *Tibet mort ou vif*, Editions Gallimard, 1990), 苏瑛宪译, 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 1994 年, 台北, 85-86、47 页。

(2) 茉莉, 《达赖喇嘛访谈录》, 《北京之春》, 1998 年 5 月号。

(3) 《汉蒙藏对话---民族问题座谈会纪要》, 《北京之春》, 1997 年 11 月号。

(4) Goldstein, Melvyn C.,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1991), pp.3-6.

(5) Goldstein, Melvyn C.,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52.

(6) Goldstein, Melvyn C., "Taxation and the Structure of a Tibetan Village", *Central Asiatic*

(7) Grunfeld, A. Tom, 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New York: M. E. Sharpe, 1996), pp.12-13.

(9) 吴从众,《试述西藏的民主改革及其伟大意义》,《中国藏学》,1994年第1期。

## 2、农奴没有人身自由

这里所说的“没有人身自由”,具体意味着什么?上引戈伦夫的话已经指出,农奴被拴在农奴主的手里,没有行动自由和婚姻自由,被迫纳税和服劳役。他们和汉地农民(自由农民)的区别在于,农民可以自由地租这个地主或那个地主的土地,他们和东家只有租佃关系,没有人身依附关系。而农奴(哪怕是“富裕农奴”)却无权选择主人,也无权自由退租(除非逃亡)。农民交租的数量有一定之规,交完租就没事了。而农奴主却可以任意役使农奴全家,包括其子女。农奴的子女一出世就要向主人登记,到15岁就得为主人服劳役。农奴主甚至有权派他们长期远离家庭支差,几年不得回家。农民可以自由行动。农奴如想离开主人外出谋生、婚嫁、朝佛、流浪或投靠新主,必须向原主交纳“米波”(人头税或人役税),每年交一次,数额由原主决定,其意义就是维系人身依附关系。有的原主还要求他们每年回去一次干一定数量的活。有的农奴一户中各辈人分属几家农奴主,各交“米波”,也不鲜见。很多农奴不堪忍受压迫而逃亡,达赖喇嘛的噶厦政府就把他们抓起来,送还原主,他们往往要受到毒打。十三世达赖发过训令,禁止地方官员和僧俗权贵收留逃亡农奴,占为己有。清朝末年,噶厦政府针对逃亡农奴增多的现象,成立了专门机构“索囊列空”,登记和控制逃亡农奴,并强迫他们交人头税。农民结婚必须地主批准,除非想娶地主小姐为妻。农奴结婚必须携带礼品向农奴主报告,请求批准,如果结婚双方属于同一个领主,一般都会批准(农奴主需要增加农奴)。如果属于不同的领主,就有麻烦。很多农奴主不愿自己的农奴出嫁或出赘。即便同意,也要办理领属关系的转换手续。办法之一是嫁出者或赘出者向领主交赎身费,数额由领主决定。办法之二是交换农奴,通常在若干年后进行,恰好两家领主之间有互相交叉占有的农奴可以对等交换——男换男,女换女。常常是几起出嫁者或出赘者及其子女一起办理,由双方领主和地方头人协议后,立下文书,更改农奴的归属。下面是西藏档案里保存的一件文书的汉译文:

桑雄阿巴部落所存换人文书(10)

土鼠年(1948年)X月X日,一式两份

达扎拉让的属民(阿巴部落的人):女,珠吉,38岁。女,扎木,32岁;住在甲旺秋地方的甲尔测儿子,三岁;住在测部地方的甲则的儿子,三岁。女,勒争。

住在星桑地方的白珠桑姆珠,21岁;住在诺珠地方的儿子索则,八岁;儿子俄丹,五岁。女,央尖,30岁;其女测久,七岁;小女测白,五岁。男,朴布,24岁。加甲尔娜姆的妻子珠玛,48岁,他的五儿洞沙则,18岁。女,拙可,31岁。男,桑油。男,尼玛扎西。男,旺秋多布钦,47岁。女,才丹珠玛,46岁。女,阿泽,28岁。郭珠扑达。索马尔妻白马旺秋家四人,共男女25人,今后归属森巴部落。



森巴的属民甲知觉扎，37岁……（详名略——引者）共男女25人，今后归属阿巴部落。

以双方的百户、根布（均为小头头官名——引者）为代表，经过充分的协商，公平地进行了属民的交换。从此各属民及其全部遗产归新的领主，原领主不得进行干预。已商妥的协定，双方都不得违反。如果一方有违犯欺骗的行为，另一方将上告大法官，根据达赖喇嘛的命令，进行彻底的处治。

阿巴部落百户落柱和代表次仁拉杰（指印）

森巴部落百户甲尔那姆和代表百户多根（指印）

农奴主不仅可以交换农奴，还可以赠送、抵押、转让甚至买卖农奴，这也是汉族地主--农民关系中没有的。下面是一件西藏卖身文契的汉译文：

政教二制之上司法官：敬启

我等现将业已署名盖章自愿签订的契文要意照实呈报如下：

黑河地区格曲地方之属民才仁（男）的人价白银17两、青稞九克（克为西藏重量单位，约14公斤——引者），已由哲蚌寺吉索包热强年夏仓全部交与原领主。现上报官家获准，言明不论才仁未来有多少后人，保证今后概不直接或间接地丝毫提出有关自身人主争议的任何问题。此条不得有违。倘一旦发现有人提出与该条文相违的任何请求，则应在法官面前交付罚金三两，并保证此条文原封不动，照旧执行。

曲龙方面人主：索南拉珍（女）、哲蚌寺喇嘛洛桑赤程（印章）

保证人：哲蚌寺吉索（西）扎吉那康的欧珠多吉（印章）

下人属民才仁亦保证人前人后永弃谎言恶行、逃避己责等一切行为，永远规矩无二（手印）

保证人：黑河僧人康夏旦增（印章）、曲强（印章）

火鸡年（11）

汉族地主对农民并无司法权，西藏农奴主对农奴却有司法权，打骂是家常便饭。当然，农奴制下的农奴毕竟不同于奴隶制下的奴隶。农奴有自己的财产（生产工具、牲畜和生活资料），奴隶则一无所有。一般而言，农奴主不能随意杀死农奴，奴隶主则可以随意处置奴隶的人身。所以，农奴制介乎奴隶制和汉地封建制之间，农奴主对农奴的人身只有不完全占有。然而，不完全的占有也是占有，也是对人身自由的剥夺和对基本人权的侵犯。无论农奴主个人如何仁慈、善良，农奴制作为一种制度却是严酷的。在旧西藏，农奴的人数占了总人口的90%以上。此外，还有占总人口5%的“朗生”（奴隶），是奴隶制的残余。他们没有自己的财产，没有任何人身自由，完全被领主占有，处境更为悲惨。稍懂政治学的人都知道，一种社会制度是否人道、侵犯人权，并不在于当权者是否仁慈、善良，而在于制度本身是否保障人权、人道。旧西藏的农奴制和欧洲中世纪的农奴制一样严重侵犯人权，这是西方学者也承认的。戈伦夫指出：“西藏社会和中世纪的欧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没有证据证明西藏是一个乌托邦式的香格里拉”。

拉”（12）。达赖喇嘛企图用佛教的仁慈来掩盖和否认农奴制严重侵犯人权的本质是徒劳的。他连正视历史上的反自由、反民主、反人权的农奴制的勇气都没有，很难想象他关于西藏要自由、要民主、要人权的侈谈有多少诚意。

注释：

（10）多杰才旦主编，《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中国藏学出版社，北京，1996年，82页。

（11）民族文化宫，《中国西藏社会历史资料》，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北京，1991年，55页。

（12）Grunfeld, A. Tom, *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New York: M. E. Sharpe, 1996), p.9, p.23.

### 3、虚幻的幸福

何况达赖喇嘛治下的旧西藏的农奴主真的那么仁慈、善良吗？达赖喇嘛自己也说过：“我们藏人现在之所以承受这么多苦难，可能是我们在前世的无数轮回中，作过一些什么不好的事情，比如说贵族不善待人民，所以才有这个因果。（13）”达赖喇嘛岂不自相矛盾？在旧西藏沿用了三百多年的《十三法典》规定：“人有上中下三等，每等人又分上中下三级。”达赖喇嘛、活佛和贵族为上等，商人、职员和牧主为中等，农奴和奴隶为下等，铁匠、屠夫和送尸者则是下等下级人。“尊者滴血值一钱，卑者滴血值一厘。伤人上下有别，民伤官，视伤势轻重，断伤人之手足；主失手伤仆，治伤不再判罪。主殴仆致伤无赔偿之说”。“卑贱与尊贵争执者拘捕”。“不受主人管束者拘捕”。“人有等级之分，因此命价也有高低”，“上等人命价按尸量黄金”，“杀铁匠、屠夫等，赔命价草绳一条”。“打家劫舍、绑架破坏、偷盗杀人、持械行凶、平民造反，当施肉刑：挖眼、刖足、割舌、砍手、推崖、溺水、处死等，量刑判处，以儆效尤，而杜后患”。

这种对酷刑的滥用连上层人物都不能幸免，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藏军总司令龙厦 1934 年在权斗中失势后，竟被剜去双眼。这是达瓦才仁也无法否认的，虽然他不认为此举野蛮（14）。戈伦夫说：“一位在西藏住了 20 年的英国人说，她看见了无数挖眼睛和使人致残的事件。……西藏喜欢使用的另一种惩罚是拷打和断肢。佛教禁止杀生，于是西藏的官员把犯人鞭打得快要死时放走，让他死在别处。这样他们就可以说这是神的旨意。其他残酷的刑罚有割断犯人的手腕；用炽热的铁钩挖去他们的眼睛；捆住两个大拇指将人吊起来，使犯人致残；把他们缝在一个袋子里，然后扔进河里。（15）”1950 年 11 月 13 日的美国杂志《生活》（LIFE）刊登了一组照片，是美国外交官在拉萨实地拍摄的，其一是当众鞭打犯人的裸臀，其二是带枷示众。戈茨坦的《西藏现代史》（*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第 109 页（英文版）也有一张 1936 年拍摄的照片，照的是拉萨街头带颈枷和脚镣的犯人。达赖喇嘛自传《流亡中的自在》说：“在西藏可没有像脚镣、阉割这样的野蛮刑罚，这些刑罚最近已经遍及整个中国。（16）”不知他是否在装傻。他的这本自传出版于 1990 年，中共正在大肆迫害民运人士。不过至今未曾听说，中共阉割过什么人。达赖喇嘛的谣未免造得太离谱。

达赖喇嘛为农奴制辩护时还说过：

我确信西藏曾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之一。封建制度当然给压迫提供了可乘之机，但藏人总体来说并不是受压迫的人民。那里很少有过去的封建制度里兴起的人对人的残酷。因为在每一个阶级和一切人世的变迁中，宗教都有控制性的影响，同时是永恒的慰藉和支持。别的宗教的人们常说，轮回的信仰---即业力法则---意在使人们接受命运的不平等---也许是过于心甘情愿地接受它们。这只对了一半。一个贫穷的藏人会较少地嫉妒或憎恨他们富有的西藏地主。因为他明白，他们每人都在收获前世所播下的种子。但另一方面，业力法则决不是不鼓励一个人努力去改善他的现世生活。而且，我们的宗教当然也鼓励改善他人生活的意图。一切真正的布施总是一举两得---受施者得到了现世利益，而施者在今生或来世得益。在这层意义上藏人是不加怀疑地接受我们的社会制度的。尽管我们的制度是封建的，但它又与别的任何封建制度有所不同。因为站在顶层的是观世音的转世化身（指达赖喇嘛自己---引者）。他是几百年来，为所有人民所推崇的转世者。人们感到，在一切国家的次要官员之上，尚有他们可以绝对信任的正义的源泉，可供最后申诉。而事实上，没有一个兼具传统、教养和宗教美德的达赖喇嘛，会成为不公正的暴君。因此，我们都很幸福。欲望会带来不满，而幸福则源自和平的心灵。对许多藏人来说，物质生活是艰苦的，但他们也并非欲望的牺牲品。而且，在我们的千山之间，在我们的简朴和贫穷之间，存在，也许比世上大多数别的城市更宁静的心灵（17）。

如果说所有的人都沉溺于宗教的心灵宁静而不求物质的丰富、人身的自由和精神的解放就是极乐世界，那么教皇治下的中世纪欧洲更是人间天堂了，为何欧洲人还要发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推翻政教合一的封建制的大革命和工业革命呢？

戈伦夫在评论达赖喇嘛的因果报应论时指出：“如果完全从世俗的观点看，这一说法是想象出来的最狡猾、最有害的社会控制方式。对普通藏人来说，接受了这个教义就使他一生都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按照业的说法，如果一个人生下来是奴隶，这不是奴隶主的错，而是奴隶自己的错，因为他们前世肯定犯了什么错误。而奴隶主则是因为前世做了好事，因此这辈子要受到奖励。对奴隶来说，如果他想砸碎身上的枷锁，那他来世的命运注定要比今世更坏。这些想法肯定不会导致革命。如果说在西藏没有什么农民暴动，也就不奇怪了，因为人们普遍接受了关于业的思想。”“我认为，穷人未必会满足于他们的状况，而是由于无可奈何，只好听天由命。关于业的理论就是宣传要满足于今世的现状，才能在来世受益。业的理论不过是为了维护现状的许多教理中的一条。（18）”无怪乎马克思直接了当地把宗教说成是“人民的鸦片”（19）。

1948年联合国《普遍人权宣言》（United Nations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General Assembly, New York, December 10, 1948）第一条庄严宣布：“所有的人都是生而自由、平等的，享有尊严和权利。”1966年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第八条规定：“任何人不得使为奴隶；一切形式的奴隶制度和奴隶买卖均应予禁止。”喇嘛教用因果报应麻醉藏族人民，使他们“自愿地”放弃自己的基本人权，满足于当农奴或奴隶，实际上是一种巧妙地剥夺人权的理论。整天高喊“西藏人民要人权”的达赖喇嘛至今仍在为这种剥夺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的理论辩护，岂非咄咄怪事（20）！

注释：

（13）茉莉，《我的达兰萨拉之行》（下），《北京之春》，1998年8月号。

（14）达瓦才仁的原话是：“龙厦被剜眼是事实，但是否野蛮就另当别论了。”《再论中国命运与西藏问题》，《北京之春》，1998年1月号。

(15) Grunfeld, A. Tom, *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New York: M. E. Sharpe, 1996), p.24.

(16) Dalai Lama, *Freedom in Exile: the Autobiography of the Dalai Lama*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0), p.101.

(17) Dalai Lama, *My Land and My People*, (New York: Potala Publications, 1983): 《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十四世达赖喇嘛自传》，陈峰译，香港支持西藏之亚太广场出版，52-53 页。

(18) Grunfeld, A. Tom, *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New York: M. E. Sharpe, 1996), p.30, p.33.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北京，1972 年，第 1 卷，2 页。

(20) 本节关于西藏农奴制的论述参见下列著作：Goldstein, Melvyn C.,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1991); Grunfeld, A. Tom, *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New York: M. E. Shape, 1996); 多杰才旦主编，《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中国藏学出版社，北京，1996 年；《西藏社会历史调查》，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1988 年。

#### 4、黑暗、野蛮、残酷、反动

关于西藏农奴制的黑暗、野蛮、残酷、反动，中共曾经作过大量宣传，并在那四个形容词前面加上“最”字，令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极为恼怒。“最”字意味着比较，和谁比较？中共从未说明。也许中共的意思是和人类有史以来所有的社会制度相比，西藏的农奴制是最黑暗、最野蛮、最残酷、最反动的，这话未免太绝对。西藏的农奴制至少比吐蕃王朝的奴隶制好一点，那时藏王死了要用活人殉葬。但是西藏农奴制的黑暗、野蛮、残酷、反动却是事实。我在西藏时采访过许多旧西藏的农奴，他们都说中共对农奴制的描述是真实的，并强调“毛主席的恩情是永远不能忘记的”。《天葬》举了一个例子，说明在旧西藏“当奴隶的一天能喝两次酒，显然与中共宣传的旧西藏之黑暗也有差距。传统西藏的阶级关系不像中共宣称的那样残酷与黑暗（21）。阶级关系是否残酷与黑暗，主要不在于吃喝，而在于人际关系。我甚至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说明某些农奴主的仁慈。例如有个藏族研究者调查了山南地区乃东宗颇章庄园后写道：

朗生（奴隶---引者）在其主人家里所受的奴役和主人对他们的待遇、态度等也因人而异。如特林的几家大差巴（“富裕农奴”---引者）户家中的朗生，农忙时，男的可得各三升粮，女的可得二升粮。又如唐古乃家中的朗生，除放牛、放羊、做饭的三人外，其余的都干农活，主人一家均不参加农业劳动。又如无尼乃家中的朗生与该家中的人同吃同住，不分你我。又如唐炯布家中的朗生与主人家人的区别仅仅在于衣服，而吃喝都一样。又如查过努家中的五名朗生都住在房屋底层，年龄大一点的朗生一天一升糌粑，年幼的糌粑递减，只有在供佛和年节时，才给点青稞酒和酥油茶喝。有的差巴户家中的朗生，吃主人的剩饭，穿主人穿旧了的破衣烂衫。难怪在民改划分阶级成份、解放朗生的过程中，出现了有两户大差巴户被划为地主，而有些朗生不愿与自己的主人分居的情况。

这里的大差巴自己拥有奴隶（朗生），为何仍然是农奴呢？这就是西藏的特殊情况。他们虽然

富裕，却没有自己的土地，他们的土地是向农奴主租的。只因租来的土地多（旧西藏租地是世袭的，不能随便增减，这和汉地封建制不一样），所以富得可以拥有奴隶。按照中共的政策，他们再富，只能划为“富裕农奴”。但有两户待奴隶太苛刻，所以被划为地主（领主），以示惩罚。而待奴隶好的其奴隶竟然不愿与之分家。不管拥有奴隶的差巴多么富裕，他们的人身仍然依附于租地给他们的领主。上文还写道：

差巴（藏语，意为支差的人，即农奴——引者）每一家都多少不等地领种得有该庄园的一块差地。按所得差岗地的多少和优劣，为庄园承担繁重的乌拉差役。他们的主人虽然多次更换，但他们无权搬家迁走，没有脱离该庄园的自由。……如果某差巴逃后被找回来，就要受到谿堆（领主任命的庄园经理——引者）的处罚、鞭打，甚至被关押。

颇章庄园的属民如果嫁给其他庄园的属民时，其差巴户需如旧向该庄园支差，堆穷（“贫苦农奴”——引者）必须向该庄园交纳人头税，而且他们所生子女，生男归夫方领主，生女归妻方领主。……在差巴户中，若从其他庄园娶来女子，那么男家必须送一个女的或男的到女家顶替女子，嫁出也如此。……也可以采取向对方交纳人头税而不去人的办法。但是采用后一种办法时，必须是生儿随父方主人，生女随母方主人（22）。

由此可见，拥有奴隶的差巴仍然是农奴，因为他们没有人身自由。至于他们的朗生，无论主人待其好坏，都是主人可以随意处置的奴隶。

许多朗生的遭遇非常悲惨，下面的材料是 1960 年调查的：

原日喀则艾马岗区的哈布谿卡，是西藏大贵族噶胥拔的一个庄园。哈不丘波即是噶胥拔派任哈布谿卡的农奴主代理人。1960 年有二十六岁的哈巴仓姆局，被迫在哈不丘波家已当了十年女朗生。同年民主改革后，哈巴仓姆局翻了身，脱离了依附封建领主的苦海，成了真正的主人，并同翻身的贫农青年格三结了婚，安了家，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哈巴仓姆局一家，原来就是哈布谿卡的农奴，……哈巴仓姆局三岁时，一家就过行乞流浪的生活。十三岁时，母亲在饥饿、寒冷和病痛中惨死，哈巴仓姆局成了一个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孤儿。当时谿卡里的中等农奴吞久三巴把她卖给日喀则一个做酒的商人家庭去当佣人。每天割青草、找烧柴、打扫卫生、做酒……工作很多很累，稍不遂主人的心愿，便要挨骂。但是能吃饱，没有挨过打。

哈巴仓姆局十六岁的时候，因为一贯干活勤快，又比较聪明，被农奴主代理人看上了，因此被迫到哈不丘波家当朗生，成为完全失去人身自由的奴隶。十年奴隶生活，第一年是放牧羊群，在人迹很少的刺柴草地上，她看不见一个人，只有羊群作伴，衣服又破又少，成天冷得打哆嗦，糌粑根本不够吃，饿得心慌，就这样一天一天地挨过去。

第二年在家里做饭，给种田的佣人吃，并给主人洗衣服、带孩子。佣人们因为吃不饱，还没有完全认识到这是代理人的罪恶，很多人都责怪哈巴仓姆局把饭做少了，茶烧少了！事实上，佣人吃不饱，哈巴仓姆局也吃不饱，但她还要受到佣人们的误会和责难。……

从第三年起，她的主要工作便是割草、炒青稞、挖地、积肥和送肥，农闲时在家给佣人煮饭。一年到头，一天到夜没有一点闲暇的时候，过年过节的时候，主人们吃喝玩乐，而哈巴仓姆局的活，反而更多。这期间，对主人的侍候要是稍有不周到，便要挨打受骂。有一年过藏历

年，哈巴仓姆局由于没有把哈不丘波的妻子侍候好，就被抓住头发，打嘴巴，打脊背。哈巴仓姆局被打得钻到桌子底下，又被脚踢。有一次，哈不丘波的二女儿，是一个在家的尼姑，她道听途说诬赖哈巴仓姆局讲：“这个尼姑经唸得不好”，因此打了哈巴仓姆局一顿，全身落满了鞭痕。朗生挨打时，别的朗生是不敢求情的，自己更没有力量反抗，要到主人打累了才会罢休。有时遇到有干活的农奴来时，才会为她说几句求情讨饶的话。

哈巴仓姆局十九岁那年，被哈不丘波的两个儿子在他家三楼的经堂里强奸。一直到1960年民主改革之前，她都逃脱不了这两个野兽的凌辱。另一方面又受这两个野兽的妻子——沙珍的醋意打骂。哈巴仓姆局说，要是没有共产党，没有民主改革，她不知道还能活到几时，会变成什么样子。

朗生的食物是很低下的。哈巴仓姆局说，一天三顿饭，三顿饭从来没有一点酥油。早餐是豌豆糌粑稀饭，但糌粑很少，只是用手巴掌指缝中漏下去的少许豆面，喝一点有些酒味的水。

中午喝较稠的稀饭，茶杯大的小木碗，也只是二、三碗，根本吃不饱。哈巴仓姆局说，吃不饱，饿不死，就是一天的生活。别的朗生有爸爸妈妈，饿得支持不住，偷偷跑回家去，还能吃到一点东西，而哈巴仓姆局没有一个亲人，只有一年到头挨饿。她说，晚上的一顿饭，虽然吃不饱，睡着了，也就不知道什么了。总之哈巴仓姆局一天的食物，也就是一年的、十年来的朗生生活的缩影。她说白天劳动或放羊期间，由于吃不饱，由于天寒地冷，是朗生最痛苦的时刻。过年是能得到一点肉，也是死羊肉，发霉发臭的肉。就是这种肉，也不能自己动手，必须由主人用盘子均匀地分给朗生。

1959年12月民改工作组进村以后，哈巴仓姆局说，她二十多年黑暗的生活，现在见到了太阳。哈不丘波家对她改变了态度，给吃好的，给睡好的，给好衣服穿，又给她一个戒指。但她明白，这是收买她的行动，特别是代理人家属用一个铜戒指冒充金戒指拉拢她，使她更识破了农奴主阶级的面目。她说：“共产党对我的恩情是说不完的。想想过去，比比今天的日子，比看镜子还清楚，三大领主和代理人是吃人的野兽。”

民主改革以后，哈巴仓姆局分到的胜利果实有：八克（亩）土地、一头母牛、二分之一耕牛、五只羊、一间很好的房子、两把锹、两把锄、一个犁铧、一把刀。另外得到二十克青稞的工资、一口箱子、一整套家俱和一套从头到脚包括有内衣的服装，开始了做一个主人翁的幸福自由的生活（23）。

问题仍然不在于她吃的是什么、喝的是什么，即生活待遇，而是她的人身待遇，即人权状况。为什么她的主人可以随意买卖、打骂、虐待和强奸她？就因为达赖喇嘛所无限赞美的给藏人带来“幸福”和“心灵和平”的农奴制剥夺了她的基本人权。类似的例子成千上万，不胜枚举，许多比这还要严重得多。这样的社会制度都算不得黑暗、野蛮、残酷、反动，还有什么制度可以算？

《天葬》还用人类学的文化相对主义为西藏农奴制辩护，它说：“尽管达赖时代与现在存在社会制度上的差别，但是并非就如中共所宣传的，那时是‘野蛮黑暗的农奴制’。不同民族有各自在文化上的区别（政治制度也属于广义的文化），而文化无‘好’‘坏’，也就不能用‘进步’、‘落后’、‘野蛮’等概念进行衡量和比较。（24）”照此说来，人类社会就没有普遍的、共同的、公认的精神价值与道德标准了。联合国《普遍人权宣言》也就毫无普遍意义。当西方谴责中共的“镇反”、“反右”、“文革”、“六四”侵犯人权或前南非白人政权的种族隔离政策野蛮时，中共与前

南非政权也可以用“政治制度也属于广义的文化，而文化无好坏、进步、落后、野蛮之分”来为自己辩护。甚至希特勒也可用此理论来为德国国内的虐犹运动辩护，路易十六则可以此为法国革命前的封建制辩护，那么世上还有公理吗？再说一遍，我并不用贫富悬殊来衡量农奴制的好坏，而是用人权状况来衡量。联合国的《普遍人权宣言》发表于1948年，而西藏的农奴制一直存在到1959年，用前者来衡量后者，其结论只能是“黑暗、野蛮、残酷、反动”。

我理解王力雄的心理，他怕被人说成“为中共辩护”，甚至是“赞美中共”。毫无疑问，中共做过许多严重侵犯人权的事，与西方民主制度相比，中共的制度也堪称黑暗、野蛮、残酷、反动。但正如张荫棠指出的那样，西藏的“差徭之重，刑罚之苛，甲于五洲”——包括清朝的封建制——这位清朝大臣都认为西藏的社会制度是世界上最黑暗、最野蛮、最残酷、最反动的了。本书第八章将证明，中共的人民公社制度虽已堪称准农奴制，毕竟比西藏的农奴制文明一点，至少人民公社无权买卖社员。达赖喇嘛天天都在攻击中共，但他也从来不敢说，在中共统治下，藏人就像牲畜一样被买卖（中国至今有人拐卖妇女，那属于犯罪，是政府打击的对象），而这是在他统治西藏时天天发生的事情，并受到他颁布的法律的保护。黑暗、野蛮、残酷、反动等形容词都是相对的，那么当黑暗、野蛮、残酷、反动的中共废除更黑暗、更野蛮、更残酷、更反动的西藏农奴制时，我们作为历史研究者，为什么不敢肯定这种行动呢？林肯解放了黑奴，但他并没有给解放了的黑奴普选权，解放了的黑奴仍然是受白人歧视的二等公民，在美国南方仍然有种族隔离制度。所以在林肯废奴一百年后，马丁路德金还要领导黑人争人权，最后被白人种族主义者暗杀。和今日美国保障所有种族的普选权与其他人权的民主制度相比，在林肯废奴后的一百年间剥夺黑人普选权、在南方实行种族隔离的社会制度（那时也叫民主制度）也堪称黑暗、反动，但没有人因此否认林肯解放黑奴的正义性，同样我们也不应否认中共解放西藏农奴与奴隶的正义性。

注释：

（21）《天葬》，211页。

（22）米玛次仁，《颇章庄园的人身依附关系》，《西藏封建农奴制研究论文选》，中国藏学出版社，北京，1991年。

（23）《藏族社会历史调查》（六），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1991年，304-305页。

（24）《天葬》，482页。

## 第三章：落后、停滞的社会

### 1、原始的贫穷

当时的社会状况又如何？直至中共1951年进藏前，西藏没有任何现代意义上的工业，连一根火柴、一枚铁钉都不能生产。没有一寸公路，传递文书靠驿站。雅鲁藏布江上只有几座铁索桥，没有可以通车的桥梁。那时从康定驮运货物到拉萨，要翻越20多座山（其中许多是雪山），跨上百条江河，行程两个月以上。在西藏生活过七年的奥地利登山家哈勒（Heinrich

Harrer)曾这样描写西藏农奴搬运东西的情景：

大约 20 位苦力牵拉着一根木桩，鼻子里哼着单调的曲子，腰上围着粗硬的牛毛绳。他们汗流浹背，张口喘气，但是由于身边站着手执皮鞭、怒目圆睁的头人，他们根本不敢歇息片刻。这种强迫性的劳役是作为赋税的一部分摊给平民的，每到一个村镇，苦力就得到补充和更换。哼着小调据说能减轻疲劳，但我却认为他们是在麻痹自己……我真想朝着他们大喝一声：停下来喘口气吧！作为二十世纪的一位现代人，我实在不明白这片土地上的统治者为什么那么固执地反对改革与进步。非常明显，运输这些木料有着比用人拉更为省力的方式。中国人在数千年前就发明了车轮，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和生活的提高，然而在西藏这个角落里竟然看不到一辆车（1）。

1927 年，噶厦政府请英国人修了夺底水电站，装机容量仅 125 千瓦，断断续续工作，只有达赖喇嘛与少数豪门可以享用，维持仅十年就寿终正寝。农业停留在原始水平，大量使用木犁、木锄，铁质工具都很少。畜牧业仍采用原始的自然放牧方式，草场和牲畜品种退化，畜疫流行，兽类猖獗，一遇天灾牲畜就大量死亡。1952 年，西藏亩产粮食平均只有 80 公斤，人均占有粮食仅 125 公斤，远远低于生存标准；牲畜总头数仅为 974 万头，人均占有不到八头（2）。人民生活之贫困令人难以想象。多杰才旦回忆道：

五十年代初，我在拉萨看到城东、南、北有许多破旧不堪的贫民窟，触目皆是衣衫褴褛、风餐露宿、冻馁街头的乞丐，就连原地方政府的罪犯也因监狱不管饭而肩扛木枷、脚戴铁镣沿街乞讨，其情景令人触目惊心，至今难忘。农奴们的悲惨际遇，与那些身着绸缎黄袍、骑高头大马昂首而过市的领主官员们形成了鲜明的对照。1959 年藏历正月传召大会（一种大规模的宗教活动——引者）时，我曾参加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发放布施的工作，领取布施的除喇嘛外，还有麋集拉萨近万人的乞丐，须知当时拉萨市的人口总共才两万多人（3）。

那时西藏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学校，1940 年去拉萨主持现世达赖喇嘛的坐床仪式的中华民国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给国民政府的报告里对西藏当时的教育作了精辟的分类叙述，概括如下：

## 一、初等教育

1、喇嘛教育，只学藏文和佛经。

2、贵族教育，有“资仲学校”和“仔康学校”两所，前者设于布达拉宫，培养僧官，有学生五、六十人，课程为习字、算术、藏医和卜筮；后者设于大昭寺，培养俗官，有学生三、四十人，课程为习字和算术。

3、普通教育，拉萨有三所著名私塾，各有学生七、八十人，课程仅为识字而已。

## 二、高等教育，仅限于寺庙喇嘛研读佛经。

三、留学教育，计有留英者四人、留印者六人、在大吉岭或江孜英文学校者十人、曾游历英国或印度者三人。

另外，国民政府 1938 年至 1949 年办了一所国立拉萨小学，学生多为汉人子弟，藏族贵族还不



肯送子弟去那里（怕沾染无神论）（4）。当时西藏文盲率高达 90%以上。性病流行，人均寿命仅 35.5 岁。西藏人口在 1737 年清朝清查户口时约一百万，1953 年中共首次普查人口时，据达赖喇嘛领导的噶厦政府报告，仍是一百万左右（5）。两百多年来人口没有增加，可见其社会发展已经停滞。

注释：

（1）（2）本章开头至此资料包括引文参见：王贵，《西藏历史地位辩》，民族出版社，北京，1995 年，643-644 页。

（3）多杰才旦，《西藏问题不是人权问题而是维护中国主权问题》，《中国藏学》，1992 年第 2 期。

（4）吴忠信，《西藏纪要》，中央文物出版社，台北，1953 年，90-91 页。

（5）马戎，《西藏的人口与社会》，同心出版社，北京，30-33 页。

## 2、空白的科技

西藏传统的科技几乎一片空白。关于藏医药，戈伦夫写道：“西藏的医学是个大杂烩，包括放血、驱魔、诊脉、利用草药和神圣的唾液。他们认为圣人接触过的任何东西都有神奇的力量，因此很珍视活佛、特别是达赖喇嘛的大小便（把它们做成丸药吞服）。……人们认为僧人是神圣的，因此他们神圣的行动就能治病。他们治病的方法之一是在一张纸条上写上几句祷文，祈神赐福禳灾，然后让病人把纸条当药吞下去。僧人用手摸摸病人，据说可以治疗头疼。在脖子上戴一串由人的颅骨制成的、经过神赐福的唵珠，可以用来治牙痛。（6）”达赖喇嘛也曾得意洋洋地告诉董尼德：“我的确可以纾解某些痛苦。有时候，只要我对他们吹口气就可以。有时候，他们带着装满水的瓶子要我吹气，然后他们再喝被吹过的水。有些时候还蛮有效的。（7）”

对于天灾，拉孜宗杜素庄园的救灾办法如下：

（1）杜素庄园附近，有一个叫做“雅”的山峰，雨是从这山上降落的。因此一遇天旱，各家都出一个体力强壮的人，带上藏酒、茶和瓢等，去爬到山峰上。到了山顶，先吃一阵酒，然后将山上的石块往下滚，嘴里虔诚地唸，“雅古、雅古”（雅是山名，古是出汗的意思，连起来就叫雅山出汗），一直唸到山脚。到了山沟有水的地方，人们拿出瓢，摘下帽子，互相泼水。力大的青年男子，抱起妇女往水里扔，弄得她们满身湿透，个个成了落汤鸡才罢休。人们相信，这样，雅山有时“真的会下雨”。

（无独有偶，我在西藏时也曾有幸恭逢其盛。1983 年夏天，拉萨大旱，藏族青少年带着装有井水的桶和大瓢群集街头，看见步行或骑车的过路人，便用水轮番泼他们，我也不能幸免。看到行人满脸、浑身都是水的狼狈相，藏族青少年哈哈大笑。上班的人每天带一身水到单位，再带一身水到家，叫苦连天。《西藏日报》为此发文章，谴责这种“恶作剧”，也无济于事。直到老天可怜上班族，终于下雨才罢休。----引者）

(2) 把佛经《十万颂般若》搬到露天诵读求雨。

(3) 找一个大家公认为没有与人发生性关系的仍是处女的尼姑，背着泥菩萨到地里去转经求雨。

(4) 把水官和来瓦（专管唸丰收经的，共六人，由差巴轮流担任）扔到快干涸的水库里去，似乎是惩罚他们，说他们是“干水官”、“干来瓦”，但却失了职。

(5) 据说江热附近山上有一个叫做阿妈洛姆奇的女神，她专门管水。于是江热的已婚妇女们，选一个吉日良辰，找一个比较好欺负的男人，同到神山上去，让男人给她们倒酒倒茶，尊敬她们（平时是女人给男人倒酒倒茶）。据说这样会感动女神下雨。

(6) 全谿卡的大人、小孩同到洛吉山上去畅饮，并用糌粑作一个斗形的小杯，边做量粮食的动作，边吆喝过斗时的序数，以预祝秋天谷物丰收。

.....

雹灾没有办法防备，全靠冰雹喇嘛作法。夏天打雷增多，冰雹喇嘛便要上山守冰雹（他在山上专门有守冰雹的小屋）。如果天上出现乌云，冰雹喇嘛便拿出法器——一个糌粑捏的兔子，口里唸唸有词，将乌云引向他方。或是吹响人腿骨做成的骨笛，把乌云赶走。倘若法术不灵，下了冰雹，则推说是人们的“命运”，或者是地方上出了怀私生子的姑娘，或者是有了脏人入境。于是便要发动来瓦和大众进行一番深入的“侦察”。如果真抓住一个怀有非婚子的姑娘，或者什么脏人，则将全部罪过加之于她。如果这一年风调雨顺，不见冰雹，“理”当归功于冰雹喇嘛“法术的高超”。

.....

过去发生虫灾，人们束手无策，只有请冰雹喇嘛把虫“赶走”。冰雹喇嘛的办法是：先将沙子和用白色石头磨成的粉伴在一起，接。面对这些沙子和粉末唸经作法，使其神化，然后让孩子们用投器向地里投掷，以驱赶害虫（8）。

1990 年前去去过布达拉宫的人一定会发现，西藏古建筑的外表虽然极其富丽堂皇，内部却十分原始简陋。天花板是柳条，地板是粘土，楼梯是木板，屋顶也是粘土。窗户狭小，室内阴暗。所有梁柱都是木质的，已被虫蛀和腐烂得千疮百孔、岌岌可危（中共在九十年代初花了近一亿元、一吨黄金整修布达拉宫）。一幢 110 米高的巨型建筑（相当于 30 层楼）竟然全靠木头支撑，这在西方人看来近乎儿戏。有个西方建筑师参观后感叹说：“伟大的艺术，落后的技术。”的确，和欧洲、阿拉伯中世纪的教堂、宫殿相比，西藏的古建筑不过是儿童的积木而已。如果说前者是石头的交响乐，那么后者不过是不成调的儿歌。

注释：

(6) Grunfeld, A. Tom, 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New York: M. E. Sharpe, 1996), p22.

(7) 董尼德 (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与死》(Tibet mort ou vif)，苏瑛宪译，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台北，1994 年，89 页。

(8)《藏族社会历史调查》(六), 西藏人民出版社, 拉萨, 1991 年, 246-247 页。

## 第四章：宗教——西藏的桎梏

### 1、汉藏文化心理结构大不一样

西藏的宗教与西藏的文化密不可分, 在旧西藏, 宗教与文化几乎是二位一体的东西。当然, 从发生学的观点看, 文化先于宗教。

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根本特征。汉藏两族虽然同属黄种人, 外貌十分相似, 文化却很不相同。最明显的当然是语言, 但这只是表层的差异。更深刻、更本质的差异在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或民族集体无意识(1), 它起源于生存环境的差异。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里说过:“助成民族精神的产生的那种自然的联系, 就是地理的基础……自然的联系似乎是一种外在的东西; 但是我们不得不把它看作是精神所从而表演的场地。它也就是一种主要的, 而且必要的基础。”汉族自古以来生活在黄河与长江流域, 物产富饶, 气候宜人(2)。人间即是乐园, 现世犹如天堂, 饮食文化举世无双。所以汉族形成了一种李泽厚所说的“实用理性精神”, 经过孔子的归纳与阐述, 成为儒家思想的核心、汉族性格的特征。所谓实用理性, “是说把理性引导和贯彻在日常现实世间生活、伦常感情和政治观念中, 而不作抽象的玄思”。“基本特征是: 怀疑论或无神论的世界观和对现实生活积极进取的人生观”(3); “与此相当, 不是去追求来世拯救、三生业报或灵魂不朽, 而是把不朽、拯救都放在此生的世间功业文章中”(4)。孔子云, “未知生, 焉知死。”“未能事人, 焉能事鬼。”故“子不语怪力乱神”。表面上是存而不论、不置可否, 实际上是怀疑、否定, 故墨子斥之为“以天为不明, 以鬼为不神”。

与此相反, 原旨佛教认为, 人生最重要的不是追求现世的功业, 而是超度来世。它认为人生充满了生老病死等苦难, 人要摆脱这些苦难, 必须清心寡欲、反复苦修, 经过多次转世轮回、功德圆满之后, 才能跳出轮回, 摆脱苦难, 立地成佛, 即所谓修成正果。而所谓成佛, 乃是一种不生不死、无比快乐的抽象境界, 即所谓涅槃归真、常乐我净, 俗称“天堂”、“净土”、“极乐世界”; 汉人又称“西方极乐世界”、或简称“西方”、“西天”, 因为佛教自西域传来。

孔子既然认为人死后并无来世, 自然也就用不。超度来世。所以佛教传入中土, 就被实用理性改造成禅宗, 主张“顿悟”、“即身成佛”, 说是不必守戒、不必唸经、不必苦修、不必禁欲也可成佛。而所谓成佛, 也就是像常人一样吃喝玩乐, “一切声色, 尽是佛事”, 只消突然觉悟, 在日常生活中保持或具有一种超脱的精神境界(心灵), 也就是成佛。

如果说禅宗哲学不过是优游诗酒的汉族士大夫的思辨游戏, 那么不懂哲学的汉族老百姓就更加实用理性——他们去佛寺烧香磕头, 直截了当地祈求菩萨保佑他们现世陞官发财、多子多孙, 而不是超度来世、早证菩提。他们对宗教的实用主义达到了这种地步, 以至佛道不分、见庙就拜。所以汉族从无宗教迫害和宗教战争的历史, 却有宗教自由和宗教宽容的传统, 只是到了毛泽东才出现例外。

事实上，汉人什么宗教也不信，只信子孙。阿 Q 说过：“断子绝孙便没人供一碗饭吃。”汉人似乎认为，人死后会变鬼，鬼住在阴间，仍要吃饭用钱，其来源是子孙奉献的香火。如无子孙，就是“断香火”，在阴间无以为“生”，是人生及人死最大的悲哀与痛苦。所以汉人无论贫富贵贱、有无学问，都极端重视“传宗接代”、“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把繁衍子孙当成人生最高任务和最大乐趣。这种生殖拜物教或子孙拜物教与佛道两教乃至基督教都毫不相干。佛教认为人死后要转世、轮回，变成新人或动物，何须子孙供饭？道教企盼成仙，神仙不食人间烟火，也毋需子孙供饭。基督教说人死后或上天堂或下地狱，都是精神性的存在，更不用子孙供饭。汉人祈求菩萨保佑其现世陞官发财、子孙兴旺，可谓缘木求鱼、与虎谋皮。今天，受过良好西式教育的汉人恐怕不再相信死后要子孙供饭的说法了，但他们仍然认为没有子孙就算白活了。这已成为汉人的集体无意识。

藏人自古以来生活在缺氧、严寒、交通不便、资源贫乏、气候严酷、疾病流行、生命短暂的世界屋脊，生活极为艰难。处在这样生存状况下的藏族先民对于来自印度的佛教一拍即合，如获至宝，笃信至今，决非偶然。因为它给藏人提供了解脱苦难、超度来世、陞入天堂的安慰和希望。有趣的是，汉地禅宗也曾传入西藏，并在藏王赤松德赞主持下，与喇嘛们辩论，这便是西藏历史上有名的“顿渐争辩”（如前所述，禅宗主张“顿悟”---“即身成佛”；喇嘛教主张“渐悟”---渐次修行、经许多世后成佛）。最后以顿派告输而终，汉僧被遣回内地，禅宗在西藏从此被禁。因为藏人再怎么悟，也无法把世界屋脊想象成天堂与乐园（5）。董仲舒云：“天不变道亦不变”。这里的“天”可以理解为西藏的自然环境；“道”则可以理解为藏族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

藏族的原始宗教是本教，佛教传入后，与本教斗争了很久，几经反复，才取得统治地位。喇嘛教把本教的灵魂不死、灵魂转移的观念同佛教的因果报应、生死轮回、超度来世的观念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藏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或集体无意识。概括地说，就是“信仰高于理性，来世重于现世”。现实生活越是艰难的藏人，对宗教的信仰越是狂热，对来世的渴望越是迫切，对喇嘛越是尊敬，对寺庙越是慷慨。尽管他们中绝大多数一字不识，根本看不懂佛经，也唸不通一句佛经，对佛教的思辨哲学一窍不通，只会口诵“六字真言”（6）、手转经筒（经筒是一种银制的圆筒，表面上刻有经文，中央有长轴，藏人手持长轴，围绕寺庙或佛像转圈，边走边转动手中的圆筒，谓之转经。据说每转一次经筒就相当于唸了一遍经文，这是为了方便不识字的藏民朝佛而设计的东西，它几乎已成为藏族的标志性物件）、五体投地磕长头，向寺庙献上尽可能多的钱物，祈求来世投个好胎，交上好运，却是世上最虔诚的佛教徒。本书在论述西藏宗教时，即指这一意义上的、群众性的、通俗化的、以超度来世为目的的宗教（又称显宗或显教），而不是喇嘛们的、高深莫测的、经院哲学加神秘修行的宗教（又称密宗）。在西藏的社会生活中（包括政治生活），作为一种现实的巨大力量发挥作用的，主要是这种通俗化、群众性的显宗喇嘛教。

至于喇嘛们的宗教，是和森严的等级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吴忠信给国民政府的报告里描述过这一制度，他说：“喇嘛初入寺庙，概称学徒，由寺内担任教师之喇嘛，教以藏文之拼音及文法等，约三四年或四五年毕业，始授以经典，再约三四年，经考试及格，得称喇嘛。在学徒期间，须为寺中服杂役，升喇嘛后，则除诵经外，不做他事。……所有喇嘛，必须研读显教经典，约二十年读完，得应格西考试，及格后，再入密宗学院，习密宗经典，十数年后，积资可升法师或尊者，最后得升甘丹赤巴，造佛学之绝顶，然此仅为少数喇嘛，多数于考格西后即停止再进也。（7）”

西藏的密宗极为神秘，就因它被极少数高级喇嘛所垄断。与显宗主张累世修行、隔（许多）世成佛相反，密宗竟也主张“即身成佛”；而所谓成佛，也就是常人的快乐，不是“涅槃归真”（死亡）。他们修密时先要经过许多繁琐复杂的仪式，然后竟要“修双身”，即与处女性交，还把表现性交的“欢喜佛”堂尔皇之地供在寺庙里。当然，有资格“修密”的只是少数已取得格西“学位”的、有“慧根”的高级喇嘛。据黄教（喇嘛教一派，又称格鲁派，达赖喇嘛即该派教主）创始人宗喀巴的《密宗道次第广论》卷十四，灌顶是修密时必需举行的仪式。一个僧人从入密门到修习最高密法无上瑜伽密，要按照次第进行多次灌顶。密宗视灌顶为最庄严、最神圣的仪式，未受灌顶者是不能修习密法和阅读密宗经典的，否则不仅得不到成就，死后还要下地狱。

灌顶仪式必须由金刚上师执行。仪式在曼陀（绘有佛像、法器的修行道场）前举行，事先受灌者要沐浴，庄严装束，由上师手持一个内装“圣水”的宝瓶，向受灌者头上洒水，再用以人的头盖骨做的碗装青稞酒让受灌者喝。最高级的灌顶仪式是修无上瑜伽密之密灌顶，其法如下：修密弟子找一12、16或20岁的处女，引到密室内用幔帐围住的屏内，将此女献给她师，此女被叫做“明妃”（佛母）。然后由其师加持“金刚莲花”（男女生殖器），将“俗女身观空后，生天女身”。然后其师携“明妃”入屏幕内，行“大瑜伽怛特罗法”（“男女和合之大定”，通俗地说即性交，然后“入定”）。弟子在幕外以布遮目跪候。行毕，其师携“明妃”至幕前，以大拇指和无名指取“摩尼宝”（精液）置于弟子口中，同时唸诵《金刚曼经》。弟子要诵意为“希有大安乐”的咒语，把“摩尼宝”咽下。而“明妃从入定起，不着衣服，于莲花中取甘露滴（处女血），如是置于彼口中，彼亦如上而饮”。这就是所谓密灌顶。灌顶毕，弟子去遮目布。其师将“明妃”手置弟子手中，然后以自己的左手执他们的手，以自己的右手持金刚杵置弟子头顶，教训道：“诸佛为此证，我将伊授汝。”然后令弟子与“明妃”如法修“和合之大定”，“引生大乐”。

在密宗里“明妃”代表“智慧”，故密灌顶又称慧灌顶（8）。这样的宗教离老百姓的宗教相去何远，也不可能普及到老百姓中去。如前所述，喇嘛教的本质是麻醉人民，让他们相信他们现世的苦难都是他们自己前世做了坏事的报应，他们现世唯一可做的是虔诚拜佛以求超度来世，从而泯灭任何造反的念头。如果告诉他们，密宗可以让他们在现世就成佛，享受快乐，那他们还会有耐心等到来世吗？如果人人都去修密，谁来种地牧羊养活他们？哪来那么多处女当“明妃”？所以一定要把密宗高度神秘化，只允许极少数高级喇嘛参与。正因如此，它对西藏社会的影响也就远远不如显宗大。

注释：

（1）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概念是李泽厚提出来的，集体无意识是弗洛伊德的弟子荣格提出来的，李泽厚将两者作为同义词来论述，详见李着《孔子再评价》，《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北京，1986年。

（2）黄河流域在先秦时代森林覆盖面超过50%，河水是清的——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小组，《生存与发展》，科学出版社，北京，1989年，30页。

（3）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北京，1981年，50页。

（4）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北京，1986年，30页。

（5）拉萨被藏人称为圣地与天堂，其冬天严寒而漫长；冬春两季多大风，届时风沙漫天；达赖喇嘛曾告诉董尼德，布达拉宫“阴暗、很冷，而且老鼠成群，房间里还有一股恶臭”（董尼德

，《西藏生与死》，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台北，1994年，85页）。“夏天，布达拉宫陡峭的墙下的污水发出的恶臭弥漫了整个大厦”（艾夫唐，《雪域境外流亡记》，财团法人台北慧炬出版社，1992年，21页）。

（6）所谓六字真言是梵文 "om mani padme hum" 的音译，因有六个音节，被音译成六个汉字，故称六字真言。它原是印度佛教密宗的一句诵咒，引入西藏后，成为不识字、不会唸经的藏人拜佛时反复诵唱的“口头禅”，相当于汉族佛徒嘴中的“南无阿弥陀佛”。

（7）吴忠信，《西藏纪要》，中央文物出版社，台北，1953年，90-91页。

（8）李冀诚，《佛教密宗仪礼窥密》，大连出版社，1991年，97-98页。

## 2、西藏的政治

正如汉人用实用理性改造了佛教一样，藏人也用他们的习俗改造了佛教。佛教禁止杀生，藏人在缺氧与严寒下不能不吃肉。于是他们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吃肉，又歧视屠夫，把后者视为下等下级人，命价只有一根草绳。于是杀生的罪孽与惩罚全部由该死的屠夫来承担，其他人包括达赖喇嘛在内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大吃其肉。至今拉萨有一千多名土着回族，在西藏定居了好几百年。他们说藏语，信奉伊斯兰教，有自己的清真寺。在政教合一的旧西藏，藏人允许这些人不信喇嘛教，就因为他们大都以屠夫为业，承担了藏人不愿做却又少不了的“下贱活”。在1959年叛乱与1989年骚乱中，藏人都曾打砸抢烧拉萨的土着回族（详见后文）。

宗教---至少西藏的宗教---是一种要求人们盲目服从的、非理性的意识形态。当它和用权力强迫人们无条件服从的专制政治结合在一起，变成政教合一的精神--世俗力量时，便拥有不容怀疑、不容挑战的绝对权威。这种权威只有人格化才能发挥政治--组织功能，这便是罗马教皇和达赖喇嘛的由来。按照喇嘛教（实为其中的格鲁派，俗称黄教，因其势大，故可与喇嘛教混称）的说法，达赖喇嘛是慈悲菩萨观世音的化身（9）。所谓菩萨，是已经修成正果、证得菩提的候补佛陀。他们放弃了进入不生不死、常乐我净的极乐世界的机会，大公无私地返回人世间，帮助受苦受难的芸芸众生超度来世，即所谓慈悲为怀、普度众生。菩萨和佛一样也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为了感召凡夫俗子，观世音菩萨便化身身为肉胎凡人，这便是达赖喇嘛。肉胎凡人自然会死亡，于是便有达赖喇嘛的转世（班禅喇嘛则是无量光菩萨的化身）。达赖喇嘛开始只是宗教领袖，另有藏王（蒙古军阀）作为世俗领袖治理政务。1751年，乾隆皇帝废除藏王制，授权七世达赖喇嘛在驻藏大臣的监督下治理西藏政务，从此达赖喇嘛兼任政治领袖。在宗教--政治的双重绝对权威下，藏人把达赖喇嘛当成至高无上的神、超度来世的救星，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在这里反复使用政治这个词，是用现代政治学分析西藏历史。事实上，绝大多数藏人只有宗教意识，没有政治意识。正如达瓦才仁指出的那样：“民族、宗教、文化、政治，政治在西藏还是次要的，主要的是宗教和文化。因为西藏人没有什么政治观点，西藏人没有一个政党，它的观点就是宗教。（10）”“西藏民族不是一个政治的民族，而是一个宗教的民族，它把自己的全部而不只是大部的精力都投入了宗教，它对政治并不感兴趣。（11）”与此相应，绝大多数藏人也没有国家意识。自从吐蕃王朝于公元877年崩溃以后的四百年间，西藏没有统一的政权，当然谈不上国家意识。然后西藏被蒙古人征服、纳入元朝的版图。明朝时西藏仍奉明朝为正朔

，然后被纳入清朝的版图，受驻藏大臣的管辖。由于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挑拨和引诱，民国年间西藏上层中确有一个亲英派在策划西藏独立，同时西藏上层中还有一个亲中派（中央的中），反对独立。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奴既被剥夺了基本人权，自然也没有过问政治的权利与政治及国家意识。

中共进藏后、1959年平叛民改前，由于《十七条协议》规定西藏原有制度保持不变，内政仍由达赖喇嘛与噶厦政府管理，农奴不问政治的情况并无实质性的变化。从1959年平叛民改到1980年胡耀邦视察西藏，中共把西藏变成了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政治事实上变成了西藏的宗教，藏人也与汉人一样几乎人人变成了政治家与革命家，这个问题留待第十章论述。1980年以来，由于中共在西藏淡化政治，不遗余力地恢复与倡导宗教，喇嘛教重新变成了西藏民众的政治。那么宗教在今日普通藏民中究竟渗透到什么样的程度、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与发挥作用、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那是另一部着作的课题，这里暂且引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1992年去西藏调查后的两个研究报告的有关段落（12），让读者有个初步的印象。

其一调查的是拉萨郊区达孜县达村的情况：

达村是全民信教的社会，宗教在日常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无论贫富，每家必有经堂，作为供佛献祭的地方。达村的富裕人家，坚持长年在经堂点一盏酥油灯，贫穷人家每月十五、三十和佛教节日也至少要点一盏灯。每天更换供水，洗擦净碗更是每家必作的功课。粗通经文的人，往往还要一大早在自家经堂诵经，每家人一年至少要去一次拉萨大昭寺及三大寺，向寺庙或来村募粮的僧人捐助一些钱物。结婚、建房、生病、出生等大事一般已不请喇嘛唸经，但死人必须请喇嘛超度亡灵，起码也要七天请喇嘛一次，做完七七四十九天的斋祭期。村中心还设有供佛的“拉则”，作为集体供佛的场所。

佛教告诉人们，现世是苦难的，必须心安理得地忍受，一切都是因果报应，今世前世定，今世又定后世，要想获得好的轮回，必须克制欲望于现世，遵守十戒，严谨修行侍佛。宗教给人们以全套的人生观，并且有着现实的戒律制约人们的行为，于是，宗教给了人们完整的生活依据，强有力地调节着人们的行为，在维持社会和平与稳定上，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不杀生的观念使达村人十分善良，电视里的悲惨故事，常常使他们不忍目睹，对家庭不和、寻衅闹事十分厌恶；不淫欲的戒律，使达村人严格执行血缘外婚，甚至看电视时，也男人在屋里，妇女在屋外通过门窗看电视，绝不混同。我们在调查达村禁忌时，就发现追根溯源几乎都与宗教十戒联系在一起。

达村的宗教事实上可分作理论宗教和现实宗教两大部分，尽管表面上都统一在信仰藏传佛教上（该地区几乎完全信仰藏传佛教的格鲁派）。在功能上，理论信仰是对佛的崇拜，目的是为求来世的幸福，而现实信仰却是灵鬼的巫术崇拜，是为求得现世的平安。达村有两个“拉则”（祭台），一个是村中心的集体供佛拉则，一个是村边正对神山的祭供土地神的拉则。一是求佛祈福，一是求神保佑，功能和目的分得清清楚楚。村北边的红山，是达村人的圣山，相当于一方土地老爷，每逢藏历新年，每家必派代表祭祀一次，平时在每月十五、三十和佛教节日，各家分别到村边拉则煨桑（烧香或焚烧松枝——引者）献祭。在收割之后，还要在地里煨桑，感谢土地神一年的保佑和辛劳。在家庭里，每家的经堂是供佛的地方，每天换水，点灯，每月十五、三十和节日更盛，还在墙头煨桑。房顶的麻柳旗（经幡）是家庭兴旺的标志，正如个人身上总戴着活佛送给的红布条之类的东西一样，都是比较典型的灵力（马拉）崇拜的表现。此外，在厨房墙壁上大多画有蝎的图案，作为灶神的象征，平日禁忌弄脏灶台，藏历新年时还要在灶神所在的墙上挂一块供物。院墙的四角和大门上往往放着白石，作为神力支柱的象征。

许多家庭门上还贴有从寺庙买来的灵符，以驱除邪恶。每个人一出生，就从佛教护法神中确定他或她的保护神，当这个人死去以后，家人则专门供祭这位神灵。在曲松县的贡嘎沙乡，我们还见到以荆棘插门和以兔子头悬门上以除灾招福的灵力崇拜和更为明显的白石崇拜，甚至有将五星红旗插在麦堆上以祈求丰收的作法，相对落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使其比达村的灵鬼崇拜保存得更为完整。

达村的宗教信仰和当地的生产力水平、社会结构紧密联系，形成达村完整的文化体系。宗教是达村社会构成和运转的必不可少的整合制衡系统。

其二调查的是拉萨郊区曲水县拉热村的情况：

拉热村中，笔者访谈过的所有成年村民均表示自己信奉佛教。30岁以上的人都掌握一些有关佛教教义的知识。但他们的表述有时是不完善不准确的，较易于记住叙述性的内容，而难以记住抽象的教义。下面引述一个村民的谈话记录，此人现年33岁，贵族后代，目前在本村务农，农闲时也做小买卖。（叙述中藏语、汉语并用）

个案一：当然，我们信（佛教）。我们知道许多佛教中的“拉”（意为“天”或“神”）。当村里有人死了，在葬礼中，人们不仅要为死者祈祷，还要为“拉伊塔”（“饿鬼”）祈祷。“拉伊塔”看起来像一个人，他有一个非常大肚子，却有一个细喉咙，想吃东西又不能吃，所以他很悲哀。

“拉次仁”（长寿之神）享受着幸福的生活，在迷人的环境中通宵达旦歌舞不绝。他是永生的，他想死，想改变一下生活的方式，但一次又一次失败。他觉得很孤独，无法享受爱情和冒险，很痛苦。

人们还要为“拉玛寅”（“非天”或“阿修罗”）祈祷。事实上，拉玛寅既不是神也不是人，许多寺庙的墙壁上都有它的肖像，它常常得罪别的神，与他们打仗，但总是战败。它种了一棵树，长得很高，其枝杈达到了菩萨界，菩萨想控制拉玛寅，拉玛寅反抗控制，为自己而战，它战败了，很忧伤，它想摆脱这种境遇。

我们要为动物祈祷，比如马、驴等等。人们养它们仅仅是为了利用它们做工具，猪和羊则要被杀死当食物，毛牛（毛字当有牛字旁）为我们干一辈子活，也逃脱不了这种屠杀。动物为它们的命运担忧，人类成为生物之主，决定其它生物是否被杀，其它生物很恐惧。

在该个案中，这位村民显然是在谈论藏传佛教中最基本教义之一——“六道”观念。佛教中的“六道”的观念，是指众生在轮回时可能经历的六种存在方式，即六种可能性。六道中包括“天”，是指高于人类的上界生类，同时也指这些生类所处的境界，可分为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每一界中又分成几个或十几个“天”。村民口述的“拉次仁”就是指其中的一个“天”。该村民是以一个特定的、具体的“天”来描述“天”这一生类和境界的；这种描述方式，也反映了村民本人是通过一个具体特定的“天神”概念来理解佛教中“天”这种抽象概念。（这种描述方式又一次映证了本书的论点：藏人的思维方式是神话思维或神话式的宗教思维，而不是理性思维，所以他们记得住叙述性的神话故事与具体的神话形象，记不住抽象的教义。认识这一点对理解西藏文化与西藏问题至关重要——引者）

普通村民对佛教的理解，往往是具体而形象的，有时也不完全准确，但这种状况丝毫不影响他们成为一个虔诚的信徒。事实上，村民对佛教的朴素理解，表明他们是在自然而然地、逐步



地掌握这些观念和知识，没有通过正规的教育和刻意的宣传。佛教作为藏族传统的主流，是以“文化”或“民俗”的形式而不是一种特定的“宗教”形式代代相传的。藏族民众全体信奉佛教，所以在传统的人们眼中，除了佛教为主流文化之外，再没有可称为文化的东西。对于传统社会中的人来说，佛教教育就是正规教育，学习佛教文化是一个合格的社会成员必须经过的“社会化”过程。在每一个家庭中，长辈经常向儿童讲述一些含有佛教观念的故事或信条。事实上，长辈中也很少有人懂得用书面语写成的佛经或论述，他们日常所做的，只是用一些浅显的语言来启蒙和警示他们的孩子。生活在这样一种氛围中的孩子，连自己也感觉不到他们在未来必然会成为某一个特定宗教的信徒。他们只是觉得自己将来要成为一个有文化、有教养、遵从社会道德伦理、并获得更好的来世的人。这种处于一种佛教文化内部的无意识状态，正是造就未来虔诚信念的最好摇篮。

另一次访谈反映了儿童对佛教的了解和态度。

个案二：向六名 7--12 岁儿童出示释迦牟尼、十四世达赖喇嘛、十世班禅喇嘛的照片，并询问他们每一张图片中的人是谁，所有儿童都认识这些图片，并能准确叫出他们的名字。

问：他们现在在哪里？

五名儿童知道达赖喇嘛在印度，一名答不知道。五名儿童知道班禅喇嘛在日喀则。所有儿童都说释迦牟尼在拉萨，他们指的是拉萨寺庙中的释迦牟尼佛像。

问：你们知不知道班禅喇嘛现在的情况？

六名儿童都说班禅喇嘛去了极乐世界。

问：佛像前面的酥油灯和蜡烛是什么意思？

一名儿童说：“人们崇拜佛，为他点灯，表示我们喜欢他。”

问：你们从哪里得到关于佛教的知识？

一名 10 岁的女孩答：每天晚上睡觉前，爸爸都要讲一、两个关于佛教或村庄周围各种山神的故事。

一男孩说，学生可以从学校老师那里获得一些关于佛教的知识。在上藏语课时，老师（小学藏语课的老师都是藏人----引者）经常介绍一些背景知识，包括佛教经书、佛教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

一男孩说：我们经常随父母一起去寺庙朝佛。我们听不懂唸经。我根本不知道喇嘛说的是什么，但我相信那些东西很重要，必须保持安静，认认真真地听。

依照当地习惯，朝佛者通常不向僧人询问诵经的内容。在宗教意义上，朝佛者的虔诚比理解教义更为重要（这就叫做“信仰高于理性”----引者）。

调查报告还详述了村民宗教生活的各个方面，为了节约篇幅，下面改为转述。村民的宗教生活

可分为：1、日常礼仪。家家有佛像或经堂，天天烧香祈祷，佛像越多越好，同一佛像也越多越好。2、朝拜。具体分三种：一是该村离拉萨 60 公里，村民往往举家参加拉萨各大寺的节日活动。一村民说：“那种场面让人激动”；一村民说：“我们参加集体活动越多，信仰就越坚定”；一妇女说：“不仅仅是看热闹，也能开开眼界”（这些话都是用汉语说的---原注）。二是在婚礼、葬礼、建房、出远门时拜见或迎请喇嘛，或请教吉日，或超度亡灵。有时遇到奇怪的、无法解释的事件，也要请喇嘛颂经驱邪。三是日常朝佛，去附近的小庙或拉萨的大庙都有，当然庙越大越好，朝佛时必须布施酥油、钱等，当然必须磕长头（五体投地），磕得越多越好。

对于普通村民来说，信佛的目的一方面是祈求佛保佑他们现世收成好、家境好、身体好、生意好等（这是与汉人拜佛的目的一样的---引者）；另一方面希望自己来世转世到一个较富裕的地方或家庭中，有些妇女则希望自己转世为男人等（这种想法是大多数拜佛的汉人所没有的---引者）。他们因此虔诚地按照教规行事，对于教义不做任何质疑，而是视为天经地义。调查者曾问村民：“您知不知道您的前世？”“您的来世会不会知道您？”“如果转世对前世一无所知，转世还有什么作用？”“转世与前世之间感觉不到联系，还是不是同一个人？”村民中有些人称也想过这一类问题，但想不明白，无人因此对教义发生怀疑，而只是感到自己知识不足，他们认为活佛、高僧一定明白这些道理。村民对喇嘛、活佛是“崇拜”而非“理解”。当被问到“活佛是人还是佛”时，有的说“活佛是佛变成人，生活在人间”；有的说“活佛也是人，但比一般的人有能力，有许多佛的法力”，可见认识不一致。

注释：

（9）汉人为了增加观世音的亲合力而将其女性化，为避李世民之讳而改称观音。

（10）《汉蒙藏对话---民族问题座谈会纪要》，《北京之春》，1997 年 11 月号。

（11）亚衣，《让西藏流亡者早回家园---访<西藏通讯>主编达瓦才仁先生》，《北京之春》，1997 年 11 月号。

（12）徐平，《达村社区调查》；于长江，《拉热村社区调查与研究》，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西藏社会发展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北京，1997 年。

### 3、西藏的桎梏

德国哲学家费尔巴赫说过：“凡是将自己交付于神的万能的人，凡是相信一切发生和存在的事情，都是出于神的意志而发生和存在的人，他就永远也不会想法去消除世界的缺陷，无论自然的缺陷或社会的缺陷。（13）”藏人既然认为世上发生和存在的一切都是前世命定的，并把全部心思和精力都投入了超度来世，就没有心思和精力去改造社会或发展科技与生产。藏文典籍卷帙浩繁，几乎都是有关佛学和文史的，直至 1984 年中国政府出版的第一套藏文科技词典问世，藏文从无科技词典，也几乎没有科技词汇。今天，中国最大的五种少数民族语文（蒙古、维吾尔、朝鲜、哈萨克和藏）中前面四族都能用母语教授自然科学，惟有藏文因无成熟的科技词汇而无法做到（14）。语言是思维的工具和表现，科技词汇的阙如反映了科技思维的缺乏。科技需要理性思维，这和非理性的神话思维、宗教思维本来就是矛盾的。中世纪欧洲的宗教势

力百般阻挠科学研究、甚至残酷迫害科学家就是一例。本世纪上半叶，西藏的宗教势力千方百计地阻挠英文学校的开设，也是因为害怕引来西方的科学思想与理性思维。

西藏的宗教虽然不关心科技与生产，却消耗了西藏的大部分财富。1950年前，西藏耕地约300万亩，寺庙和上层喇嘛占有40%。1959年拉萨三大寺（哲蚌、色拉、甘丹）共占有土地14.7万亩，11万头牲畜和4万多农奴。在一般的情况下，寺庙所属的农奴要把收成的70%以上交给寺庙。寺庙不仅拥有庄园、牧场和农奴，还从事商业和放债。达赖喇嘛自己的放债机构1950年放债藏银303.9万两，年息10%。哲蚌寺历年放出的高利贷粮食累计达1亿6千万斤，银元1亿多元，债息收入占其全部收入的四分之一。寺庙放债的利率，借钱在30-50%，借粮在25%。此外，寺庙和喇嘛还从香客那里得到大量布施。换言之，当农奴将大部分收获交给领主（政府、寺庙、贵族）后，还要将一部分收入交给寺庙和喇嘛，所剩下的只够维持生存，不可能有资金来发展生产。而“在寺庙和贵族拥有的那些大庄园里，封建领主们既忽视生产，也未能推动耕地的实质性改进，这就造成了持续许多世纪的农业衰退”（15）。

英国殖民主义者贝尔（Charles Bell）曾援引噶厦政府1917年的财务报告分析西藏的收入和支出。是年噶厦政府收入72万英镑，布达拉宫收入80万英镑，噶厦政府从自己的收入中拿出27.4万英镑给布达拉宫。政府的收入来自税收、放债和政府拥有的庄园、牲畜等，除了噶厦政府，各宗（相当于县）政府也要拿出约一半收入给寺庙。正如戈茨坦指出的，西藏的喇嘛通过政府津贴、寺庙庄园、民间化缘和寺庙自己的金融活动吸收了西藏的大部分财源（16）。

寺庙的钱用在哪里？第一，耗资巨大的宗教活动。每个藏历新年的法事活动要耗去布达拉宫年收入的62%。1958年，西藏有2711座寺庙，每座寺庙里都有无数日夜点燃的酥油灯。第二，供养喇嘛。1958年，西藏喇嘛占总人口的11%左右。平均每两户平民要供养一个喇嘛。第三，寺庙的建筑和佛像等设施。西藏寺庙的众多、豪华常令游客惊讶，不知耗费了多少金银、珠宝、钱财和人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旧西藏的经济不是为人服务的，而是为佛服务的。宗教对社会财富的掠夺之烈，连中世纪欧洲都望尘莫及（17）。

自从1980年邓小平对西藏实行怀柔政策以来，西藏的农牧民富裕起来。但许多农牧民并没有把钱用来发展生产，而是千里迢迢去拉萨朝佛，向寺庙布施，花上万元盖家庭经堂，买昂贵的佛像、经书等宗教用品，生产和生活方式变化不大（18）。从表面上看，这是传统观念的顽固性；从本质上看，它反映了“天不变道亦不变”。

喇嘛教也像天主教，本性极端保守，把佛经当做万古不变的真理，把传统当做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曾在噶厦政府当过三任宗本（县长）的藏族学者恰白次旦平措回忆道：旧西藏“到处充斥，花样不得翻新的用语，噶厦政府官员夏天还戴，大皮帽子”（19）。戈茨坦说：“寺庙集团在噶厦政府中竭力阻挠实现现代化，在他们看来，现代化既有害于寺庙生活的经济基础，也不利于西藏佛教的价值垄断。在此期间（指1913年到1951年——引者），传统与变革之间产生了许多潜在的转折点。可是，在每一个转折点，寺庙集团及其在噶厦政府中的同盟者都支持最保守的主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寺庙集团主宰的噶厦政府一方面百般欢迎英国殖民主义者，乞求其支持“西藏独立”；另一方面，又认为“外来的英国文化对佛教继续在西藏一统天下的局面构成了直接的威胁”。“如果因为英国的教育方式和生活习惯的传入而使贵族和大商人逐渐英国化，宗教最终就可能会失去施主，西藏固有的特征也会丧失”。寺庙集团在1925年与1945年两次强迫噶厦政府关闭了西藏的英文学校，因为“英文学校会灌输外来的无神论思想，危害宗教教义和制度”。寺庙集团还严厉打击崇拜英国生活方式的军官集团和噶厦政府内部的改革势力，千方百计阻挠藏军、噶厦和社会的现代化。以至于可笑到这种地步：他们一

再请求英国提供现代武器，却害怕自己的军官去英属印度接受训练（20）。

噶厦政府 1950 年给联合国秘书长的呼吁信竟然由印度驻拉萨的代表辛哈（Shinha）起草的，因为噶厦政府的高级官员对国际政治与外交一窍不通（21）。他们对外界的一切都极端害怕，更不必说引进西方的科技与文化了。戈茨坦在总结旧西藏（他称之为“喇嘛王国”）灭亡的原因时说（他的巨着《西藏现代史——喇嘛王国的覆灭》的结论）：“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宗教是西藏政治中的一种和谐的力量，但是它又是一种导致分裂和纷争的力量。各种宗教集团为了扩大自己的声望和影响，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和角逐，他们在有关宗教利益的政策上不能达成一致，从而给二十世纪的西藏历史带来了灾难。不仅如此，僧侣越多越好的观念和年复一年的法事庆典，导致寺庙不断寻求更多的土地和捐赠，竭力反对噶厦政府为政教事业。想而削减寺庙财源的任何尝试。这又使寺庙集团拥护庄园农奴制的经济制度，并因此而成为极端保守的势力。当西藏力图适应二十世纪日新月异的形势时，宗教和寺庙就成为西藏社会进步的沉重桎梏。（22）”

欧洲历史上有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目的是打破天主教会对其政治的控制和对思想的禁锢，解放人性和人身，发展科技、经济、文化和教育。西藏从未有过文艺复兴、（欧洲意义上的）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也未发生过五四新文化运动那样的文化革新运动。换言之，“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从未光临过世界屋脊。有些主张“后现代主义”的西方人指责中国政府使西藏现代化是“毁灭西藏传统文化”、“侵犯人权”，他们把中世纪西藏想象成未受工业文明污染的世外桃源。不知他们自己是否愿意回到天主教会主宰一切的中世纪欧洲去？

达赖喇嘛至今仍在百般赞美旧西藏的宗教文化和政教合一，他在说明其西藏独立后的“施政纲领”《西藏未来政体与宪法特征要旨》中回顾历史时说：“西藏在历

代藏王和达赖喇嘛的领导下，在政教合一的制度下，确保了人民的和平、繁荣和幸福。（23）”这话与他的另一番话相矛盾：“我个人认为，旧西藏是不符合潮流的、需要改革的一种落后的制度”（24）。鉴于前者是达赖喇嘛在自己的机关刊物上发表的正式文件，后者只是私人谈话，一般应以前者为准。他还一贯谴责中共“毁灭西藏宗教”，“文化上的种族绝灭”，许多不明真相的西方人也随声附和、义愤填膺，不知他们是否要西藏回到喇嘛教、农奴制、政教合一三位一体的喇嘛王国去？

注释：

（13）《费尔巴赫哲学著作》下册，商务印书馆，北京，1962 年，670 页。

（14）程列，《关于藏语文如何适应现代社会之我见》，《西藏研究》，1997 年第 3 期。

（15）Karan, Pradyumna P., *The Changing Face of Tibet* (Lexington, Kentucky: The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 1976), p.81.

（16）Goldstein, Melvyn C.,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1991), p.816.

（17）以上对旧西藏经济的分析参见 Goldstein 上书与马戎，《西藏的人口与社会》，同心出

版社，北京，1996 年，170-177 页。

(18) 刘伟，《西藏农民新形象》，《西藏脚步声》，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1994 年。

(19) 《历史学家的眼光》，《西藏文学》，1993 年第 3 期。

(20) (21) (22) Goldstein, Melvyn C.,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1991), pp.816-821, p.708, p.37.

(23) Dalai Lama, "Guidelines for future Tibet's polity and the basic features of its constitution", Tibetan Review (October 1992).

(24) 茉莉，《达赖喇嘛访谈录》，《北京之春》，1989 年 5 月号。

## 第五章：西藏自古独立吗？

达赖喇嘛 1987 年 9 月 21 日在美国国会人权委员会演讲他的“五点和平计划”时说：“自从西藏帝王在一千多年前统一西藏后，我们的国家就一直保持独立，直到本世纪中叶。(1)”1988 年 6 月 15 日他在斯特拉斯堡对欧洲议会演讲时又说：“我们两千多年的历史一直是独立的历史。自从公元前 127 年立国以来，我们藏人从来没有把我们的主权让给任何一个外国。(2)”这话完全不合史实，而且自相矛盾。前者说西藏独立只保持到本世纪中叶（指 1951 年中共进藏），后者却说“我们藏人从来没有把我们的主权让给任何一个外国”。如果他把中国算作“外国”，那么达赖喇嘛在 1951 年 10 月 24 日致毛泽东的电报已经“让”了，电报全文如下：

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

今年西藏地方政府特派全权代表噶伦阿沛等五人，于 4 月底抵达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指定的全权代表进行和谈，双方代表在友好基础上，已于 5 月 23 日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十七条协议》---引者）。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卫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谨电奉闻。

西藏地方政府达赖喇嘛

公历 1951 年 10 月 24 日

藏历铁兔年 8 月 24 日呈 (3)

如果达赖喇嘛认为中国是他的祖国，又与他说的西藏自古以来是个独立国家相矛盾。让我们来看看历史。

## 1、关于“公主神话”的神话

在中国唐朝，西藏的确是个独立国家。对此中共从来没有异议，中共最权威的有关文件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白皮书《西藏的主权归属与人权状况》（1992年9月21日）说：“唐朝，藏汉双方通过王室间的联姻、会盟，在政治上形成了团结友好的亲谊关系，在经济和文化上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为最终建立统一的国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达赖喇嘛领导的“西藏流亡政府”为反驳白皮书而出版的《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4）承认：“由于迎娶尼泊尔和中国的公主对佛教在西藏的传播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接着引用了上面引用的白皮书中的那段话，然后说：“中国的上述说法与藏中两国的史料中都认为西藏和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强国之记载是相互矛盾的。”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矛盾，那段话并未否认当时西藏是个独立国家。这种“鸡蛋里挑骨头”的论战方法实在令人不敢恭维。诚然，这段话回避了唐朝和吐蕃王朝（当时西藏王朝名）之间的征战，但并没有像《天葬》说的那样编造“公主神话”，“似乎中国把公主嫁到哪，哪就从此属于中国了”；也没有“过分夸大文成公主对西藏的重要性”，“似乎是因为文成公主进藏才使西藏有了文明，包括医疗知识、技术工艺、烹调知识、蔬菜种子，甚至西藏的佛教都是文成公主带去的。就算这中间有若干真实，然而过分强调，就成了一种民族自大的倾向，似乎只要汉民族嫁出去一个女儿，就能改变另一个民族的文明和历史，并且成为两个民族世代代不可分割的根据。事实已经证明这不过是一厢情愿的神话”（5）。王力雄为了划清和中共的界线，编造了一个有关“公主神话”的神话。

白皮书说唐朝时，汉藏在经济和文化上建立了密切联系，这话既无“民族自大”，也非信口雌黄，而是有事实根据的。唐朝宫廷爱打马球，据说马球就是藏人发明的。唐时西藏建造的大昭寺和桑鸢寺都有浓厚的汉式建筑风格。众所周知，伟大的古老建筑是民族精神的形象体现。任何人只要看一眼藏人自己建造的布达拉宫、大昭寺与色拉寺的仿汉式金顶（大屋顶），就会相信藏文化深受汉文化的影响。从敦煌石窟中发现的大量唐代藏文译经有不少是当时从汉文译过去的，此外还有汉文经典《论语》、《礼记》、《战国策》的藏译本（6）。如果说庙堂建筑和经典文献属于精英文化，那么通俗文化如十二生肖本是汉人的风俗，藏人也有同样的十二生肖，流亡藏人甚至因为达赖喇嘛属猪而不吃猪肉，可见藏族也接受了汉族的风俗（7）。

注释：

（1）（2）Congressional Ceremony to Welcome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of Tibet（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2），p.81, p.76.

（3）《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1995年，35页；戈尔斯坦（戈茨坦，Goldstein, Melvyn C.），《喇嘛王国的覆灭》（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杜永彬译，时事出版社，北京，1994年，843页。

（4）“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西藏流亡政府安全部、西藏问题研究中心”翻译（由藏文或英文翻译成汉文----引者），达兰萨拉，1993年，本书引用此文时均见此版，不再一一注明。

（5）《天葬》，14-17页。

（6）程列，《关于藏语文如何适应现代社会之我见》，《西藏研究》，1997年第3期。

(7) 曹长青,《抵抗撒旦的和平偶像----达兰萨拉采访达赖喇嘛记》,《世界周刊》,1998年4月26日。

## 2、元朝不是中国吗?

关于蒙古人征服西藏和元朝把西藏纳入自己版图的史实,有大量史料为证,许多书籍作过论述,支持西藏独立的西方人和达赖喇嘛也无法否认,于是想出两条遁词来否认西藏属于元代中国。一是“供施关系”。荷兰律师范普拉赫(Van Praag, Michael C. Van Walt)在《西藏的地位》(8)里说元朝皇帝与西藏喇嘛之间的关系不是政治上的上下级关系,而是施主(皇帝)和被施者(喇嘛)之间的关系,并把它比附为罗马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间的关系。《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也说:“世俗的皇帝和宗教的上师喇嘛各是政教两方面的最高领袖。是双方以平等、相互依赖、相互尊重、相互崇信为基础的。喇嘛掌握西藏的政权是依恃施主的帮助。蒙古皇帝掌握政权并实施统治的合法性则承蒙于喇嘛的支持。”真是笑话。西藏喇嘛受封治理西藏固然依恃于元朝皇帝,元帝统治中国怎么会由西藏喇嘛来提供合法性?汉族不信喇嘛教,宋朝也不是西藏的属国,忽必烈灭宋靠的是蒙古铁骑而非喇嘛教。那时代强者为王,又没有国际法和联合国,武力就是合法性。就是西藏喇嘛也是因为害怕蒙古铁骑而归降的(这个“降”字是当时西藏的宗教领袖萨班在致西藏各地僧俗首领呼吁他们归附蒙古的公开信中自己使用的)。

庸庸讳言,当时元帝与西藏大喇嘛之间确实存在施供关系,即由元帝赐钱给西藏,由西藏大喇嘛充当元帝的“国师”和宗教导师。然而在政教不分的古代,宗教的外衣下面往往隐藏政治的内容。当人们用现代政治学的概念去分析古代时,故意无视这种宗教背后的政治内容,不能不说是别有用心,在学术上也是不严肃的。在皇权至高无上的古代中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元代帝师地位虽高,却是皇帝封的;而不是相反,由帝师给皇帝加冕,授予合法性,如中世纪的罗马教皇与欧洲君王那样。忽必烈给西藏的诏书说:“朕为教法及僧众之主。(9)”帝师向西藏下达的法旨都要以“奉皇帝圣旨”或“皇帝圣旨里”开头(10)。正如意大利学者杜齐(G. Tucci)指出的那样:“实际不是像西藏文献要我们相信的那样,一个给予八思巴(首任帝师---引者)的真正的供养,无宁是为了皇帝而特设的对西藏名义上的代理总督权。一句话,主持们(帝师、萨迦寺的住持)并不是国王或王公,而是官员,每次都须经过皇帝下诏颁赐印信加以任命的官员”,“藏人所说的供养,实际上不过是封给一个职务罢了”(11)。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教授李毓澍则说:“元朝建立后,曾经三次在西藏调查户口,划分十三万户。虽然名义上,西藏归帝师领宣政院直接管辖,但实际上这十三万户上有三个元帅府,受被封为镇西王的奥鲁赤(忽必烈之子---引者)控制,西藏是奥鲁赤的采邑,所有赋税、徭役由镇西王支配,王府的命令在西藏最有权威。所以元朝西藏并没有八思巴的政教合一。(12)”

范普拉赫无法否认西藏属于元朝,于是又想出第二个遁词。他说只有汉族皇帝统治的国家才算中国,元朝和清朝都不是中国。《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也说:“即便是蒙古的势力曾进入西藏,那么,在蒙古民族和其合法代表自由的蒙古国还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中国却声称拥有继承蒙古势力达及范围之主权的说法岂非霸道行径?”美国学者司马晋(James D. Seymour)也说:“不论蒙古人或满族人都不是中国人(13)。”董尼德也说:“把蒙古人说成是中国人,本身就是很虚假奇怪的事。(14)”

这种把国家与民族混为一谈的观点，在国际法上是十分荒谬的。假如有人在美国声称：美国的爱尔兰、犹太、西班牙、非洲、亚洲裔公民和爱斯基摩人、印第安人、夏威夷土着波里尼西亚人等都不是美国人，只有盎格鲁---撒克逊裔才是美国人，他一定会遇到麻烦，甚至被斥为种族主义者。中国像美国一样，也是个多民族国家，有 56 个民族，为什么汉族以外的民族就不算中国人呢？蒙古国（外蒙古）政府只能代表外蒙古人，不能代表人口比外蒙古多几倍的内蒙古人。就像德国政府只能代表德国的德意志人，不能代表瑞士的德意志人一样，哪怕德国的德意志人远比瑞士的德意志人多。何况外蒙古独立本是斯大林阴谋的产物，毛泽东在建政初为了乞求斯大林的保护和援助，出卖中国利益，承认外蒙古独立，这是两个共产魔头之间的肮脏交易。借口元朝和清朝的皇帝是中国的少数民族而否认他们的皇朝是中国的皇朝，就像借口叶卡捷林娜女皇是德国人、肯尼迪是爱尔兰裔而否认他们的皇朝、政府是俄国、美国的皇朝、政府一样荒谬。

《天葬》也说，“蒙古不是中国”；“其实中国那时和西藏一样，同是蒙古铁骑征服的对象。说起来还不如西藏，西藏尚能保持相当程度的自治，中国却是彻底地亡国”；“蒙古民族居住在亚洲广大区域，与中国完全是两个概念。硬把蒙古对西藏的征服说成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根据，这种‘阿 Q’式的逻辑显得既奇怪又不诚实”；“与其说是元朝中国对西藏建立了主权控制，还不如说是蒙古与西藏联手对中国实行了统治”（15）。

“蒙古民族”与“中国”当然完全是两个概念，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元朝这个国家是不是中国，而非蒙古这个民族是不是中国。再说一遍，根据国际公法，民族与国家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一个民族分居几国，一国内有许多民族，都是普遍现象。蒙古民族固然不等于中国，但也不等于元朝。元朝而外，还有好几个由蒙古人统治的国家与之并存，如金帐、伊儿、窝阔台和察合台等四大汗国。

《天葬》也承认：“在现代国际秩序建立以前，人类世界的状况基本是以不同民族之间的征服和融合为主的。（16）”例如英国是英格兰人征服苏格兰人、威尔士人和北爱尔兰人而建立的；美国是欧洲白人移民征服印第安人、爱斯基摩人和夏威夷土着波里尼西亚人而建立的；元朝则是蒙古人征服藏人和汉人而建立的。如果只有多数民族征服少数民族而建立的多民族国家才算国家，少数民族征服多数民族而建立的多民族国家就不算国家，岂非另一种形式的种族歧视？正因为蒙古人与西藏人联手压迫汉人，他们也就把自己的命运和汉人的纠结在一起，变成一个多民族国家了。

国际公法里有个“继承国”概念，例如国际公认俄罗斯为苏联的继承国，因为苏联的大一半领土和一半人口在俄国境内。那么元朝的继承国是谁？是今日的外蒙古吗？似乎不像。如前所述，元朝是蒙古人联合西藏人压迫汉人而建立的国家，而外蒙古只有蒙古人，基本上没有藏人和汉人。即便外蒙古的蒙古人也只占蒙古民族的小头，仅一百多万；而今日中国境内的蒙古人却有五百多万，俄国境内的蒙古人只有几十万。可见连蒙古人的大头也在中国。所以外蒙古不仅没有资格当元朝的继承国，甚至也没有资格代表蒙古民族。元朝的大部分人民（包括大部分蒙古人）和大部分领土既然都在中国，那么很自然，只有中国才有资格充当元朝的继承国。对此中国人包括推翻元朝的明朝皇帝也是这样认为的，所以《元史》成为中国“二十五史”之一。既然西藏在元朝已臣服于元朝中国，那也就意味，西藏那时已经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要证明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其实用不着追溯到元朝，追溯到 1727 年清朝向西藏派遣驻藏大臣就足够了，那也比美国独立早了半个世纪。



注释：

（8）Van Praag, Michael C. Van Walt, *The Status of Tibet, History, Rights and Prospects in International Law* (Boulder, Colorado, USA: Westview Press, 1987); 以下引用范普拉赫的话均见此书。

（9）《萨迦世系史》，德格版，98 页。

（10）《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1986 年，61-68 页。

（11）杜齐，《西藏中世纪史》中译本，李有义、邓锐龄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印，北京，1980 年，24 页。

（12）《西藏研究会讯》第 14 期，边疆问题研究委员会出版，台北，1992 年，43 页。

（13）司马晋(James D. Seymouyr)，《中国人看待西藏问题的历史性转折》，《中国之春》，1996 年 7 月号。

（14）董尼德(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与死》(Tibet mort ou vif)，苏瑛宪译，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台北，1994 年，98 页。

（15）《天葬》，17-19 页。

（16）《天葬》，23 页。

### 3、明朝与主权

明朝并未直接统治西藏，而是采取“众建多封、贡市羁縻”的办法。由于历史的惯性作用，西藏的僧俗首领都把取得中国皇帝的封赏当做向他人证明其合法性的必要条件。反之，明朝对不承认其权威的首领进行惩罚。例如阐化王阿格旺布死后，喇嘛们未经申请明朝皇帝的敕封，就将他的“敕文”交其子，违反了明朝规矩。明朝即令四川巡抚将其主持者逮捕至京，要斩首。后明廷谅其无知，改为充军陕西（17）。《天葬》认为明代西藏来朝贡纯属占便宜，因为明朝的回礼更慷慨。“把别人来占便宜当作对主权的效忠，只能被视为是缺乏自知之明的表现。（18）”《天葬》用近现代国际法关于主权的定义去衡量元、明两朝与西藏的关系是不恰当的，也是不公正的。

国际法学界公认，国家主权的概念最早是由法国学者博丹于 1576 年（中国明朝万历年间）在他的六卷集巨著《国家论》中提出的（19）。而作为近代欧洲国际关系产物的近代国际法的诞生，是以 1643 年至 1648 年（中国清朝第三代皇帝顺治年间）威斯特发里亚会议为标志的。至于近代国际法被正式地、全面地介绍到中国来，则是 1864 年（中国清朝倒数第三代皇帝同治年间）的事了。那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作为同文馆教习，经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Burlingame)鼓励，把 1836 年出版的美国国际法学家惠顿(Henry Wheaton)的《国际法原理》译为汉文，并经总理衙门大臣同意，在同文馆馆员协助下，出版成书，称为《万国公法》，献给总理衙门”（20）。

众所周知，中世纪欧洲虽然也有许多王国和公国，但他们并不具有近现代国际法意义上的主权。因为他们上要受罗马教皇的节制，各国君王即位须经教皇加冕才算合法。教皇派到各国的红衣大主教的权势可与国王相抗衡。教会在各国拥有大量土地和农奴（采邑），并向所有教徒征收“什一税”。教会的宗教裁判所可以行使司法权。在文化教育和意识形态方面，教会更有绝对权威。下要受大小贵族的牵制，每个贵族的领地（采邑）实际上都是个独立王国，贵族们拥有领地内的全部行政、司法、财政、军事大权。国王无权也（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无力对大小贵族的独立王国进行如今日的政府那样的管理。所以用近现代国际法来衡量，中世纪欧洲各国根本称不上是主权国家。当然罗马教皇和大小贵族也算不得主权国家。他们之间的关系处在“西方式的模糊”之中。法律是现实的反映。既然中世纪欧洲不存在近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那么当然也不会有国际法上的主权概念。换言之，当时的人类社会还没有进化到足以产生国家主权法的地步。因此，套用近现代国际法中的主权概念去衡量中世纪欧洲的国际关系就像用套现代人的婚姻道德观念去衡量原始人的群婚制（以及今日西藏农牧民中仍然存在的一妻多夫、一夫多妻、父子共妻、母女共夫、叔姪共妻、姨甥共夫和双夫双妻等现象）一样文不对题。

中国元、明两朝及清朝初期和欧洲中世纪同年，中国汉地虽无欧洲式的教皇、教会、贵族、采邑，但西藏却有，两地制度格格不入。加以路途遥远，交通和通讯不发达，中国皇朝与西藏的关系在那时也处在类似“西方式的模糊”之中。例如明朝册封西藏的大小僧俗首领就很像罗马教皇给欧洲各国君主的加冕。套用近现代国际法中的主权概念去衡量那时中国皇朝与西藏的关系也就像套用同一概念去衡量同期欧洲的教皇与国王关系一样文不对题。中共的理论家们千方百计论证中国元朝和明朝对西藏拥有完全的主权固属迂腐可笑，《天葬》承认元朝对西藏拥有主权（21）而否认明朝对西藏拥有主权更是缘木求鱼。在主权法的发源地欧洲还不存在主权国家与主权概念的时代去苛求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岂非荒谬绝伦而又极不公正？所以我认为讨论中国对西藏的主权问题，必须从西方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法律实践上确实建立了国家主权概念与主权国家体系的年代谈起。主权者，至高无上的权力也，需要教皇加冕赋予合法性并受红衣大主教与众贵族牵制的的国王就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教皇高于国王的权威是和欧洲中世纪同时结束的，一般以 1789 年法国大革命实行政教分离为界。虽然拿破仑 1804 年称帝时还特地把罗马教皇请到巴黎来给他加冕，但他从教皇手中抢过皇冠一事标志——教皇高于国王的权威的没落。只在那时，欧洲才进入了主权国家的时代。也只从那时起，我们才能讨论中国对西藏的主权问题。

注释：

（17）牙含章，《明代中央和西藏地方帕木竹巴政权的关系》，《中国藏学》1989 年第 1 期。

（18）《天葬》，22 页。

（19）《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北京，1984 年，815 页。

（20）王铁崖、魏敏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北京，1981 年，16 页。

（21）《天葬》，18 页。

## 4、清朝的章程

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从元朝起，中国对西藏的统治经历了紧（元朝）--松（明朝）--紧（清朝）--松（民国）--紧（中共）的循环，清朝比元朝更紧，具体表现在更加制度化和法律化。制度化就是从1727年（雍正五年，比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加冕分别早了62年和77年）起，清朝向西藏派遣驻藏大臣，直到辛亥革命，历时185年，从未间断。法律化就是清廷颁布了治理西藏的专门法律。1750年（乾隆十五年），西藏发生驻藏大臣被害事件；次年（比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加冕分别早了39年和54年），乾隆皇帝批准了进藏善后的四川总督策楞拟定的《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1792年乾隆派大军进藏打败尼泊尔侵略军，此役共由清朝国库支付军费白银1052万两，占当时全国税收总数的四分之一（22）；次年（比法国大革命晚了4年，但比拿破仑加冕早了11年），乾隆皇帝颁布了由大军统帅福康安会同达赖、班禅等制订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这些制度和文件标志清朝对西藏实行了主权管辖。

《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却说：“驻藏大臣的性质在当时类似于现代的使馆，同时又是因与众不同的施主与被施者关系等因素而留驻的。”“善后章程是施主满清皇帝向自己的上师达赖喇嘛提出改良建议而已。并不是类似国王向属下发布的命令。”历史档案俱在，让我们来看看事实。

首先，“章程”两字就是上级给下级的指令，而不是什么“建议”。用宗教上的供施关系来偷换政治上的隶属关系，不过是故技重演。宗教上的施主会给“自己的上师”制订章程并派官监督后者遵行吗？

1751年的《西藏善后章程》对西藏原来的政制作了重大调整，废除了郡王制度（原由世俗贵族担任郡王管理西藏政务），正式授命七世达赖喇嘛执政（原来达赖喇嘛只是宗教领袖，无权治理政务），并建立噶厦政府，设噶伦四人，其中僧官一人，俗官三人，受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的直接领导。噶伦集体办公，处理西藏政务：凡遇重大事项，务须请示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酌定办理，重要公文必需钤用清朝赐予达赖喇嘛的印信和驻藏大臣的关防。噶伦等重要官员，均需经清朝任命，颁发敕书。从此确立了由黄教领袖达赖喇嘛在驻藏大臣监督下统治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23）。由此可见，“章程”就是清朝皇帝给达赖喇嘛颁布的法律和命令，根本不是什么“建议”。至于驻藏大臣，是与达赖喇嘛平起平坐的皇帝代表，范普拉赫也不得不承认：“驻藏大臣的权力也增加了。除了统帅卫队和掌握邮政外，这些满洲官员现在还要成为噶厦政府的顾问。尽管他们不直接干预政府的行政（这话不对，他们与达赖喇嘛共同领导噶厦政府---引者），但他们所起的新作用使驻藏大臣拥有广泛的监督权，让人联想到施主的‘保护作用’，甚至会联想到施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天下竟有“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的外交使节吗？

1793年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的主要内容如下（24）：

- 1、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平等，共同协商处理西藏政务，西藏其他官员都要服从驻藏大臣。
- 2、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和西藏各大活佛的转世灵童，由驻藏大臣用“金瓶掣签”的办法认定。
- 3、噶伦、代本（西藏高级军官---引者）出缺，由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一起提出正、陪两个名单，奏请皇帝选择任命，其余僧俗官员均由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委任。

4、西藏的对外交涉统归驻藏大臣处理。外番写给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信要交驻藏大臣查验，并代为酌定回信。噶伦不得与外番通信，如外番行文噶伦，应交驻藏大臣处理。

5、西藏的赋税和政府支出，统归驻藏大臣审核和安排。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收支也要报驻藏大臣审核。

6、建立藏军。

7、铸造货币。

8、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亲属不得参与政务。

当然，章程的颁布是一回事，实际的执行是另一回事。《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借口九世达赖的认定未经金瓶掣签，证明西藏对章程可听可不听。事实是，自从这个章程颁布后，前后五个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中，有三个（十、十一、十二世）是经过金瓶掣签确定的；有两个（九、十三世）是经过清朝皇帝正式降旨批准免予掣签而确定的（25）。章程既然是皇帝颁布的，自然可由皇帝加以变通。

达赖喇嘛作为西藏政教领袖的地位既然是清朝皇帝授予的，自然还可以由清朝皇帝撤消。1706年，以风流情歌著称的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加措被康熙皇帝下令解押送京，死于途中（26）。1904年英国军队侵入拉萨前夕，十三世达赖喇嘛逃亡外蒙古，企图去俄国，被清廷革去名号。不久恢复，被召进京，跪见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行臣子之礼。他要求今后越过驻藏大臣直接向皇帝上奏，遭到拒绝。1910年，他逃亡印度投靠英国后，清廷又革去他的名号，并决定另寻达赖灵童（27）。1790年，乾隆皇帝谕成都将军鄂辉进藏查办八世达赖喇嘛兄弟商卓特巴等专擅舞弊案时说：“达赖喇嘛系朕所立，诸事如此废弛，实不能仰体心……至达赖喇嘛之兄弟商卓特巴等如此舞弊殃民……非但不应袒护，并应痛加惩治，特令此数人来京，实为保全达赖喇嘛，期于藏中有益之意。（28）”这哪里是“施主”对“上师”的行为，分明是主子训奴才的作派。

对达赖喇嘛及其兄弟尚且如此，其他藏官更不在话下。1728年，首任驻藏大臣僧格和玛喇一到西藏，就不顾许多藏官求情，将15个作乱的藏官如数正法。1844年，驻藏大臣琦善奏参摄政（达赖喇嘛成年前的西藏最高首领，同样要报清朝皇帝批准——引者）策墨林侵占百姓土地，勒索财物，隐匿逃犯等罪行，经道光皇帝批准，将其剥黄充军黑龙江。琦善还就当时的种种弊端拟定《裁禁商上积弊章程》二十八条，奏准施行。其中重申驻藏大臣与达赖、班禅平等，非与代办商上事务（摄政）之活佛平等，有事驻藏大臣对摄政以命令行之（29）。1906年，清朝派钦差大臣张荫棠进藏“查办藏务”，张参劾了昏庸腐败的驻藏大臣有泰和贪黷顽梗的噶伦彭错旺丹，惩治了一大批不法僧人头目和昏庸卖国的藏、汉、满官员，起用一大批爱国正直的藏、汉官员，全藏人心大快，交相称赞“张大人”。然后，他在西藏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显示了清朝对西藏的主权（30）。

1770年（乾隆三十八年），东印度公司的军队侵略不丹，不丹国王请求六世班禅出面调停。班禅给孟加拉总督赫斯廷写信，指出不丹属于西藏，要求后者退兵。赫一面撤军，一面派波格尔前往日喀则，求见班禅。当波格尔到达不丹首都时，班禅分别写信给赫斯廷和波格尔，阻止他们进入西藏。信中说：“西藏属于中国皇帝，皇帝已命令我不准莫卧尔人、印度人、巴坦人或英国人进入西藏。由于扎什伦布寺与北京相距遥远，无法写信请求皇帝批准，因此，波格尔

应当返回加尔各答。”后来赫斯廷又写信给班禅，请求允许波格尔前往日喀则。班禅写信给驻藏大臣和摄政，经商议后同意波格尔到扎什伦布寺。波到后，提出开放孟加拉与西藏之间的贸易，班禅写信请在拉萨的摄政派代表到扎什伦布寺。摄政代表答复波说：“摄政在他的职权范围内乐于做有关的一切，不过他同整个西藏地方都是属于中国皇帝的。”拒绝了波的要求<sup>(31)</sup>。英国人第一次与西藏接触，就从西藏当时的最高权贵那里得知：西藏是中国的领土。诚然，由于英国的武力侵略和金钱收买，西藏后来出现了一个亲英派，干了许多卖国勾当。即便如此，有清一代，在西藏问题上，英国始终不得不以清朝为交涉对象，后文将详述。正如戈茨坦指出的：“继十八世纪最初十年，即六世和七世达赖喇嘛的动荡年代之后，西藏已经隶属于满族统治的中国，这是毫无疑问的。<sup>(32)</sup>”

范普拉赫自知用“施主--被施者”的遁词无法否认清朝对西藏的主权，于是又生一计，他说《钦定藏内善后章程》是确立中藏关系的条约，“1793年的改制确立了满藏关系的保护性质，驻藏大臣主管西藏的国际事务，是西藏君主与中国皇帝的中介人，这次满清改革藏制的实质就是建立了典型的保护条款。”真是天下奇文。

保护关系是殖民主义时代的国际法概念，按照权威的《奥本海国际法》，“保护关系的产生是由于一个弱国依据条约把自己交给一个强国保护，其方法是把本国一切较为重要的国际事务交给保护国管理，保护国负责被保护国的国际关系。<sup>(33)</sup>”例如1881年《法国突尼斯保护条约》和1905《日本朝鲜保护条约》。清朝有关西藏的一系列章程根本不是什么两个国家签订的条约，而是清朝皇帝为了治理西藏而颁布的法令，清朝和西藏之间也从未签订过任何双边条约。条约属于外交范围，而章程属于内政范围，两者风马牛不相干。范普拉赫之所以要如此违背法律常识地生拉横扯，就是想把中国说成是西藏的“宗主国”，从而证明中国对西藏只有宗主权而没有主权，为西藏独立制造法律依据。范普拉赫是在步英国殖民主义的后尘，本世纪上半叶，英国千方百计要中国政府（清朝和民国）签字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始终没有成功（后文详述），他这样生拉横扯，就能成功了吗？

注释：

(22) (23) 王贵，《西藏历史地位辩》，民族出版社，北京，1995年，130页、119页。

(24) 牙含章，《达赖喇嘛传》，三联书店资料室印，1964年，43-51页。

(25) (26) (27) 王贵，《西藏历史地位辩》，民族出版社，北京，1995年，144页、107页、206-215页。

(28) 《清高宗实录》，1361卷，11-13页。

(29) 张其勤，《清代藏事辑要》，417-430页。

(30) 赵富良，《试论张荫棠“查办藏事”及其治藏方针》，《西藏研究》，1992年第2期。

(31) 余素，《清季英国侵略西藏史》，世界知识出版社，北京，1954年；杨公素，《中国反对外国侵略干涉西藏地方斗争史》，中国藏学出版社，北京，1992年，14-15页；荣赫鹏(Francis Younghusband)，《英国侵略西藏史》(India and Tibet)，孙熙初译，西藏社会科学院资料情报研究所编印，1983年，13页。

(32) Goldstein, Melvyn C.,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1991), p.44.

(33) 《奥本海国际法》第1卷第1分册，詹宁斯、瓦茨修订，王铁崖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北京，1995年，170页。

## 5、是主权还是宗主权？

无独有偶，《天葬》也认为清朝对西藏只有宗主权没有主权。它引用1944年英印政府外交部长根据英国百科全书告诉中华民国驻藏办事处长的话说：“对这个词还很难下定义，宗主权的伸缩性很大，这要看中央政府对一个地方的权力贯彻到什么程度。如果全部贯彻了，那就是主权，不然，就是宗主权吧。”然后说：“这种经验性的结论应该还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如果一定要用主权、宗主权的概念判断清代的中藏关系，我同意中国那时对西藏的控制更类似宗主权，而缺少主权性质。”因为驻藏大臣属员少、在藏时间短、与基层绝缘而被架空，清朝的章程并未得到完全执行，清朝未能完全控制西藏，西藏因而维持了实质上的独立（34）。如果只有由中央政府直接派官去西藏控制基层社会才算主权，那么这在清代由于技术原因是不可能的，在现代由于政治原因也是不可取的。众所周知，美国各州、市、镇的长官都是本州、市、镇人民自行选举的，毋需美国总统批准，总统也无权任免。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美国的中央政府对五十个州只有宗主权没有主权呢？在俄国、乌克兰、西班牙内部，还有许多自治国，如俄国的布里亚特共和国、卡梅共和国、鞑靼共和国、印古什共和国等，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共和国，西班牙的巴斯克自治国。莫非俄、乌、西三国对这些自治国只有宗主权没有主权？

国家主权的核心是国防、外交大权，美、俄、乌、西等国的中央政府虽然不掌握各州或各自治国的人事权，却掌握各州或各自治国的国防、外交大权，所以拥有对各州或各自治国的主权。清朝基本上掌握了西藏的国防、外交大权，还在某种程度上掌握了西藏的人事大权，所以拥有对西藏的主权。至于这些大权由于英国殖民主义侵略而不时打折扣（下文详述），并不影响清朝的主权，否则就变成侵略有理、强者为王了，那么世上还有什么公理可言？

宗主权是西方殖民主义时代的产物，今天的国际公法已经废弃不用。正如上述老殖民主义者、英印政府的外交部长承认的那样，宗主权的定义十分模糊。美国《布莱克法学词典》对宗主权（*suzerain/ty*）的定义是：“这是一个用以描述强国与属国之间关系的术语，非常含糊，没有明确的定义。（35）”美国《韦伯新国际词典》的定义是：“宗主国在各种程度上控制附属国的外交，但允许后者自理内政。（36）”《美国遗产学院词典》的定义是：“一个国家控制另一个国家的外交，但允许后者自理内政。（37）”《美国政府与政治词典》干脆没有“宗主权”和“宗主国”的条目，却有“自治”（*autonomy*）的条目：“少于完全独立，一个大的主权国家内部某一地区拥有某种程度的管理内政的权力。（38）”以上三个宗主权定义，第一个等于没有定义，第二、三个大同小异，即范普拉赫所说的“保护关系”。然而清朝不仅仅控制了西藏的外交，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西藏的内政，有以下史实为证。

1705年，康熙皇帝下令将不守佛规的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加措解押进京，后者次年死于途中。如此严厉地处置西藏头号宗教领袖，足见清朝对西藏的内政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1719年与1720年，清朝两次派兵进藏，征剿从新疆伊犁侵入西藏的准噶尔蒙古部，把西藏从

准军的蹂躏下解救出来（由于清军击败准军主力，颇罗鼐得以夺占拉萨）。清军进入拉萨后，严惩了准军立的第司(当时西藏最高首领----引者)达孜巴。

1727 年，西藏又发生首席噶伦阿尔布巴作乱之事。次年，清朝派大军进藏，处死阿尔布巴，任命颇罗鼐为郡王，总管西藏政务。

1750 年，西藏发生驻藏大臣诱杀郡王珠墨那杰、二大臣又被珠的余党杀害的事。次年，清朝派员进藏善后，并颁布了前述《西藏善后章程》，废除郡王制，把原属郡王的政治权力交给七世达赖喇嘛，正式确立了由达赖喇嘛在驻藏大臣监督下执政的政教合一制。

1792 年，乾隆皇帝派大军进藏驱逐尼泊尔侵略军。次年，乾隆颁布了前述《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又对西藏的内政作了重大改革，再次规定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共同治理西藏。其后西藏的五个达赖喇嘛，有三个是按照章程规定的“金瓶掣签”认定的，有两个是由清朝皇帝批准免于掣签的。西藏的最高政教领袖都要按清朝皇帝的旨意产生，又可以由清朝皇帝革去名号（1904 年、1910 年两次革去十三世达赖喇嘛）再次证明了清朝皇帝对西藏内政的至高无上的权威。

1844 年，道光皇帝将西藏摄政策墨林剥黄充军黑龙江，颁布《裁禁商上积弊章程》。

1894 年，十九岁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奉光绪皇帝令亲政。他当时年轻气盛，渴望有所作为，向理藩院与总理衙门请示了十个问题，主要内容如下：

1、达赖喇嘛认为 1888 年第一次抗英战争中藏军之所以屡战屡败，是因为驻藏大臣一再严飭不可用兵，致使军心懈怠。而升泰（当时的驻藏大臣----引者）议和，又一味妥协示弱，致使英国人恣意专横。总理衙门则认为藏人以弱乱强，漫无军纪，势不能支。朝廷权衡利害，煞费苦心议和撤军。事后达赖喇嘛不知自强，反称议和使藏军懈怠，阻挠胜算，事非属实。

2、达赖喇嘛认为锡金应归藏属。总理衙门认为，锡金在咸丰年间已立约附英，英国在此设官、开垦、修路、造桥之初，藏人并未力争，今欲收回旧属，徒费口舌而已。

3、达赖喇嘛希望阻止印茶入藏。总理衙门答：当初议定俟百货免税销藏五年后，方准印茶入藏，就是为了抑制印茶。如今期限已到，自应依约行事。

4、达赖喇嘛指控驻藏大臣挪用藏款。传闻朝廷拨赏西藏库银 40 万两，修筑藏印战争中破损之寺庙，但藏方所领银两与原数不符。理藩院驳道：前驻藏大臣升泰任内，先后拨款 12 万多，修筑靖西内外关卡城垣及各衙署房屋等，皆有册可稽，并无拨款 40 万两之事。

5、达赖喇嘛奏报不丹位于藏印交界，原与西藏结好，请赏给不丹国王爵衔，以慰其心。尼泊尔毗连藏地，与西藏订有盟约，现该国国王，兄弟不和，弟已附英，请降旨施恩劝勉。总理衙门同意此议，但如何羁縻不丹与尼泊尔，应飭令驻藏大臣查明办理。

6、达赖喇嘛控诉英人越境通商不纳税，又假冒委员索取税收。总理衙门辩称，按通商章程规定，英人可以自由往返贸易。

7、达赖喇嘛申诉：亚东分界通商后，升泰通告全藏，英国所贩杂货，如系藏内应用之物，即

准买卖，否则停止互市。现在英商所贩之品，多是枪、刀、火药、烟酒，与藏人民生不合，如今又要求印茶销藏。川茶本有大利，原茶税交库，地税交藏，如让印茶入藏，必打击川茶，且于税收多所窒碍，应一并禁止。总理衙门答：印茶入藏是英人力争之款，约中规定开埠后五年印茶始准销藏，就是为了保护川茶。

8、达赖喇嘛恳请清廷将亚东税收赏给西藏，以济军粮，并请施恩将驻藏大臣直辖的三十九族及喀拉乌苏八旗归西藏管辖。理藩院驳道：近年来西藏添兵设防，用款支绌，虽是实情，但达赖喇嘛席有全藏，于务本为农、通商惠工等一切生财致富之道，概不讲求，乃致贫弱不振。如今又欲兼辖三十九族及喀拉乌苏八旗（均为藏北蒙古族部落——引者），以为附益，真是不识大体。查三十九族及喀拉乌苏八旗归驻藏大臣管辖，是清廷控驭边陲的部署，用意甚远，不可轻易更张。

9、达赖喇嘛又指出，西藏兵源充足，但器械不足，想要制造，又无工匠，希清廷赏赐大小枪械火药铅丸等，或派匠赴藏制造。总理衙门答：整军经武，必资利器。藏人欲图自强，讲求器械制造，原所应为。然必俟勘界通商各事办有端绪后，由驻藏大臣察度情形，奏明核办。若遽设更张，恐于界务诸事，转多妨碍。

10、达赖喇嘛指控驻藏大臣罔顾西藏情势，要求今后遇有紧要事件，准由达赖喇嘛直接奏报理藩院处理，并请旨另赏印信。又驻藏大臣处事不公，则请朝廷另派京员来藏会办。理藩院答：一切照旧办理，勿庸异议（39）。

以上各条涉及西藏的外交内政军事经济各方面，从中虽可看出清廷对英国的软弱态度（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当时英强清弱，不让步不行），却也证明了：清朝对西藏确有主权，达赖喇嘛虽然不满，却只能请示清廷，无法擅自行动。而清廷的答复大都要驻藏大臣办理。

1908年，十三世达赖喇嘛觐见慈禧太后、光绪皇帝时，不仅下跪，而且几次请求今后有事可越过驻藏大臣直接向皇帝上奏，可见至清朝灭亡前夕，他仍承认并拜服清朝对西藏的统治权威。

1906年，清朝派钦差大臣张荫棠进藏，大刀阔斧推行“新政”，下文详述。

以上事实说明，清朝对西藏的政治制度和最高领袖都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并作了有力的、积极的管理。清朝对西藏拥有主权，还有什么疑问吗？

至于《天葬》下大力证明驻藏大臣被架空，西藏当局阳奉阴违等事，那是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有的。整个民国时代，各省军阀都在阳奉阴违中央政府；今天中国的各省当局也在阳奉阴违中央政府，我们能说那时和今天的中央政府对各省只有宗主权没有主权吗？西藏那时的自主权再大，也未超过美、俄、乌、西的各州和各自治国。如前所述，那些国家的中央政府对于各州和各自治国的人事可是连过问都无权过问的呀。根据《奥本海国际法》，像美国、俄国、德国、印度这样的联邦国家“是若干主权国家的联合体”，“联邦国家被认为是与它的成员国一起存在的一个真实的国家”，“一个联邦国家在一切方面是各成员国的对外代表，以致于在国际关系上，各成员国完全不出面。这就是美国的情形，所有模仿美国宪法的美洲各联邦国家宪法，也是这样。在这里，各成员国也是主权者，不过这种主权只限于内部事务”（40）。这里的论述与前述《天葬》所引的“英国百科全书”对主权与宗主权的定义明显矛盾。“英国百科全书”说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权力“如果全部贯彻了，那就是主权，不然，就是宗主权”。而根据前引美



国词典对宗主权的定义，宗主权就是一国管理另一国的外交而不管其内政。《奥本海国际法》却说，美国的中央政府（联邦政府）虽然只管各州的外交而不管各州的内政、各州在内政上仍是主权国家，这中央政府依然是一个“真实的国家”即主权国家（世上还没有人对此表示异议）。为什么不说不说美国对各州或某州只有宗主权而没有主权呢？

《天葬》说：“至今这么多中立史学家都认为中国在本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对西藏仅拥有宗主权，根源就在于上述章程（指《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引者）在西藏远非全部兑现，大部分时间仅停留于名义而已。美国却相反，虽然其占领夏威夷的时间不长，但是它对夏威夷实施了充分的权力，它对夏威夷的主权就从无到有，并且从有争议再到没争议。”（41）我不知道这里所谓的“充分的权力”指的是什么。如果是像《天葬》所苛求于清朝的那样，是派官去控制夏威夷的基层社会，那么根据美国宪法，夏威夷的所有官员（从州长到镇长）都是由当地人民选举的，美国联邦（中央）政府无权派遣一个官员去夏威夷，也无权撤换一个夏威夷官员。美国联邦政府虽然派有代表常驻各州（包括夏威夷），但他们无权干涉各州的人事与内政，其权力远远不如“被架空”的驻藏大臣。如果以美国联邦政府对夏威夷内政的权力为“充分的权力”的标准，那么清朝最衰落时期对西藏内政的权力都比美国联邦政府对夏威夷内政的权力充分百倍。

更何况，那些国家的许多州和自治国或少数民族地区正在闹独立，例如美国的德克萨斯和夏威夷，俄国的车臣、印古什、鞑靼，乌克兰的克里米亚，西班牙的巴斯克，还有英国的北爱尔兰、苏格兰，法国的科西嘉、布列塔尼，加拿大的魁北克，印度的克什米尔、锡克，斯里兰卡的泰米尔，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南斯拉夫的科索沃，土耳其的库尔德等，有些闹得比清代的西藏还要凶，如北爱尔兰、车臣、克什米尔、巴斯克、泰米尔、阿布哈兹、科索沃、库尔德等都在搞恐怖活动或打内战，为什么国际社会依然承认那些国家对那些地区拥有主权而非宗主权，唯独在清朝与西藏的关系上如此苛刻？这样做公平吗？

《天葬》还提到中国与西藏的“东方式的模糊关系”，“以‘藩属’方式治边”（42）。中国历史上确有“外藩”之说。清朝时，“中国朝贡之邦有定期者六：朝鲜、琉球、越南、缅甸、暹罗、南掌。朝鲜、琉球最恭顺，越南次之。其余三国不过是羁縻勿绝而已。”（43）“中国皇帝称这些国家为“外藩”。雍正皇帝说过：“云南为朕之内藩”，“安南为朕之外藩”（44）。这外藩有点像宗主权下的属国，中国皇帝只要求他们前来朝贡，并向他们提供保护。其内政自理，中国不派官驻军。外藩的统治者的更替，中国一般也不过问。但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则属于“内藩”，又名“藩属”。清廷设理藩院，专管内藩。据载有内外蒙、察哈尔、青海、西藏、新疆六地（45）。对他们要派官驻军，行使主权管辖。用国际法考察，他们应当属于中国领土。由此可见，清朝同内藩的关系并不“模糊”。

范普拉赫还说西藏当时“有权”与外国单独签订条约，以此证明西藏是独立国。1904年英军侵入拉萨后，确实草拟了一个不平等条约。但那时十三世达赖喇嘛已经逃走，清朝外务部电令驻藏大臣有泰“切勿画押”，英军头目荣赫鹏强迫达赖喇嘛逃走前指定的摄政签了字。英国政府马上意识到，这个条约没有清政府签字是非法的、无效的。英国于是向清政府施加压力。清政府派代表唐绍仪去印度谈判，唐要求英国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唐曾留学美国，知道主权与宗主权的区别及利害关系，他一再警告清朝外务部，不可承认对西藏只有宗主权）。英国只承认中国对西藏有宗主权，谈判陷入僵局。1905年英国保守党下台，自由党组阁，荣赫鹏的侵略战争受到自由党议员批评。沙俄不甘心英国独吞西藏，还在英军进攻江孜时就曾提出责问（46）。1906年中英在北京继续谈判，英国立场软化，双方签订《中英续订藏印条约》，将1904年的《拉萨条约》作为附约。这个条约闭口不提主权、宗主权，其第二款说：“英国应允不占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中国亦应允不准他国干涉藏境及其一切政治。”（47）”等于承认

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清廷虽然赔偿英国 250 万卢比，开放亚东、江孜、噶大克为商埠，却也挽回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明确了西藏地方政府无权单独与外国签订条约。有清一代，中国与外国签订的所有有关西藏的条约从未承认宗主权之说（48）。至于 1907 年《英俄协议》（49）背着中国相互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是两个殖民主义者之间的肮脏交易，从未得到中国的认可。当时的沙俄政府早已崩溃，其继承国苏俄早已宣布废除沙俄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今日的俄国也不曾宣布要隔世继承沙俄签订的条约，《英俄协议》还有什么法律效力吗？

注释：

（34）《天葬》，37-50 页。

（35）Black, Henry Campbell, Black's Law Dictionary (St. Paul, MINN: West Publishing Co., 1990), p.1447.

（36）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Springfield, MA: G.&C. Merriam Company, Publishers, 1976), p.2304.

（37）The American Heritage College Dictionary, 3d Edition (Boston,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93), p.1369.

（38）Shafritz, Jay M., The Harpercollins Dictionary of American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Harper Perennial, A Division of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2), p.46.

（39）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十条请示见牙含章，《达赖喇嘛传》，人民出版社，北京，1980 年，153-155 页；其他史实参见王贵，《西藏历史地位辩》，民族出版社，北京，1995 年。

（40）《奥本海国际法》，第 1 卷第 1 分册，詹宁斯、瓦茨修订，王铁崖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北京，1995 年，163-164 页。

（41）《天葬》，37-38 页。

（42）《天葬》，69-70 页。

（43）《薛福成选集》，538 页。转引自张植荣，《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的法律地位》，《西藏研究》，1993 年第 1 期。

（44）《国朝柔远记》，卷四，雍正六年。转引自同上文。

（45）《清文献通考》，卷 82，《职官号、六、理藩院》。转引自同上文。

（46）杨公素，《中国反对外国侵略干涉西藏地方斗争史》，中国藏学出版社，北京，1992 年，134 页。

（47）（49）这两个条约的全文见 Goldstein, Melvyn C.,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1991) 附录。

(48) 参见冯明珠,《析论清季中英西藏交涉中的“主权”问题》,《西藏研究论文集》,第2辑,西藏研究委员会,台北,1989年。

## 6、清朝不是中国吗？

范普拉赫和达赖喇嘛等无法否认清朝对西藏的主权,于是又重弹“清朝不是中国”的老调。《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说:“满清和西藏的交往与蒙古和西藏的交往一样,其中与中国并无半点关系。”那么清朝的继承国又是谁?他们能从世界地图上指出来吗?

事实上,清朝皇帝也自称中国人。雍正皇帝亲书《大义觉迷录》说:“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玁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50)”

清朝虽然不以中国为国号,却在许多条约里自称中国。如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1844年《中美五口贸易章程》(即《中美望厦条约》)、1858年《中俄天津条约》、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1858年《中法天津条约》、1860年《中英北京条约》、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1890年《中英会议藏印条约》等等等等,无一不是以“中”为国名。《中俄尼布楚条约》一开头就称康熙为“中国大圣皇帝”,条约中多次使用“中国”字样,如“将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为界,南岸属中国,北岸属俄”。其中未见“清国”或“满洲帝国”字样(51)。有时把“中国”和“大清”并用,作为同义词。《中英南京条约》第八条称:“凡系大英国人,无论本国、属国军民等,今在中国所管辖各地方被禁者,大清皇帝准即释放。(52)”1906年《中英续订藏印条约》说:“案查光绪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及十九年十月十八日,中国与英国所定两次藏印条约,其所载各款,西藏并未认为确实,亦未允切实遵办……兹大清国大皇帝、大英国全境大皇帝兼五印度大皇帝……(53)”今日地球上根本不存在一个满清国或满洲国,满洲的土地和人民都在中国境内,而且满族都说汉语,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所谓清朝不是中国论,无异于痴人说梦话。

注释:

(50)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4辑,中华书局,北京,1983年,4-5页。

(51) 《中俄边界条约集》,商务印书馆,北京,1973年,2-3页。

(52) 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上卷第1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95页。

(53) 戈尔斯坦(戈茨坦, Goldstein, Melvyn C.),《喇嘛王国的覆灭》(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杜永彬译,时事出版社,北京,1994年,856页。

## 第二部：西藏问题的由来

### 第六章：英国殖民主义侵略

#### 1、英俄角逐

西藏问题起源于英国殖民主义侵略。正如藏族学者多杰才旦说的：“在二十世纪初以前，藏文语汇中还没有‘独立’这个词。所谓‘西藏独立’，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帝国主义侵略的产物。二十世纪初以来，英帝国主义为了达到控制、霸占中国西藏的目的，除了诉诸武力、直接出兵、发动侵略西藏的战争外，还拉拢、收买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中的亲帝分裂分子，策划‘西藏独立’。（1）”有人用汉藏文化差异来论证西藏独立的合法性与必然性，那是站不住脚的。否则的话，世界上所有多民族国家包括美国、英国、俄国、印度在内都应该解体了。十三世达赖喇嘛为什么在 1910 年逃亡印度投靠不信佛教的英国统治者、对抗信佛教的满清统治者？是为了政治经济利益。藏人一向把清朝皇帝当成文殊菩萨来加以崇敬（2），现世达赖喇嘛也曾表达过前往文殊菩萨驻地五台山朝圣的愿望（3）。然而在关键时刻，文化与宗教却被十三世达赖喇嘛置于脑后，足见西藏问题的根源并不在于文化与宗教，而在于政治与经济，1959 年的叛乱再次证明了这点。这是理解西藏问题的关键，也是解决西藏问题的关键。

英国殖民主义之所以要处心积虑地侵略西藏，首先为了保护其“女王王冠上的珍珠”——印度，其次为了奴役西藏，再次为了建立从西部侵略中国内地的基地。然而它却打“帮助西藏独立”这样冠冕堂皇的旗号。一个在全球到处侵略、建立了“日不落帝国”的头号殖民主义强盗居然会帮助别人取得独立，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它为什么不帮助印度取得独立？

强盗终究是强盗。英国为了“帮助西藏独立”，在 1888 年与 1904 年发动了两次侵略西藏的战争，用大砲和诡计轰开了西藏的大门。英军在 1904 年入侵中曾以谈判为名欺骗藏军熄灭火枪的点火绳，然后突然开火屠杀毫无防备的藏军（4）。英军杀死数千藏人后侵占了拉萨，迫使十三世达赖喇嘛逃走。然而现世达赖喇嘛却在自传里说：“感谢荣赫鹏上校的远征探险，有个英国贸易使团驻藏近半个世纪。……英国人与西藏人向来友好。我国人民无论男女都认为英国人恭而有礼、具有正义感和幽默感，因而非常推崇他们。（5）”达赖喇嘛如此热情洋溢地感谢与赞美那次卑鄙的屠杀的指挥官荣赫鹏与其他英国殖民主义者，真是匪夷所思、无耻之极。不过这也不足为奇，那次战争后，西藏确有不少上层人物卖身投靠了英国人，其中包括十三世达赖喇嘛。

英国而外，沙俄也想染指西藏。它采取了更巧妙的办法，派俄国布里亚特蒙古人多吉也夫（德尔智）以学佛为名潜入拉萨。由于德尔智精通藏语与佛学，成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侍读经师，深受赏识。他利用黄教经典中关于北方将出现佛法大王的说法，经常向十三世达赖喇嘛灌输俄国沙皇就是佛法大王、只有俄国能帮助西藏对抗英国侵略的思想。后者竟然信以为真，在 1900 年和 1901 年两次派德尔智以“西藏特使”的名义率领“西藏代表团”去俄国“访问”，得到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接见。俄国报纸还大肆报道沙皇接见“西藏外宾”的消息。沙皇把自己派出的间谍当做“外国使节”来看待，可谓天下奇闻。德尔智第一次“访问”俄国时，沙皇送给十三世达赖

喇嘛一套东正教的金色法衣，并封他为“大主教”。十三世达赖喇嘛竟然分不清东正教与佛教的区别，深感荣幸。德尔智第二次“访问”俄国时，竟与沙皇讨论了西藏在彼得堡设立“西藏使馆”的问题。沙俄还用骆驼队穿过新疆运送大量银块、手表、枪支、珠宝给德尔智，让他广泛收买西藏上层。又派更多的布里亚特蒙古人潜入拉萨“学佛”，扩大德尔智的势力。养兵千日，用兵一时。1904年英军侵入拉萨前夕，德尔智终于说动十三世达赖喇嘛跟随他去投靠俄国，并在已住拉萨的70名武装的布里亚特蒙古人护卫下逃往外蒙古。不巧的是，当时俄国刚刚在日俄战争中败北，1905年又发生革命，尼古拉二世自顾不暇，哪有能力充当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救世主（6）？后者只得接受清朝的安排，先去五台山朝佛，再去北京觐见清帝。

十三世达赖喇嘛在五台山和北京期间，突然转了180度弯，向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Jordan）问候献媚，表示愿与英印殖民当局“诚意修好”（7）。当时清朝正趁西藏群龙无首之际，大刀阔斧地推行“新政”。一方面派川军进藏收权，另一方面进行“现代化”改革，诸如开路、修桥、办报、兴学等。《张荫棠治藏十九条》（8）第一条就要求剥夺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政治权力，实行政教分离。第八条说：“藏中差徭之重，刑罚之苛，甲于五洲，应一律革除。以苏民困。”简直就像中共那样要废除农奴制、解放农奴了（农奴制的基础是差徭地租，废除了差徭就等于废除了农奴制）。单这两条就极大地损害了达赖喇嘛的政治经济利益。所以他要认敌为友，向将其赶出西藏的宿敌英国求饶，旨在挟洋自重，对抗中央政府。这一策略，也被现世达赖喇嘛继承下来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在1909年底回到拉萨后，自恃有洋大人作后台，不理睬前来欢迎的驻藏大臣联豫，从而引发了后来的一系列冲突，终于发展到逃亡印度，完全投入英国殖民主义的怀抱。荣赫鹏获悉此事，大吃一惊，对西藏政治的变幻莫测感慨万千（9）。在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乞求下，英国驻华代办向清朝外务部抗议（川军入藏），后者回答说：“中国政府的意图只不过是维持西藏的治安和实行比以前更为有效的管制，特别是关于西藏对于邻国的义务。他们愿向英国政府保证不改变西藏的现状，他们丝毫无意变更西藏的内部行政。（10）”鉴于1906年的《中英续订藏印条约》有“英国应允不占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的条款，英国无话可说，只得暂令英印当局严守中立，同时屯兵锡金西藏边境，威胁清军（11）。

清朝派兵进藏并非第一次，早在1720年平定准噶尔军时，就派军进入拉萨，清朝在西藏的驻军一直保持到鸦片战争。后因西方列强侵略，使清朝无暇西顾。清朝此时派军进藏，本是为了捍卫国家主权，抵御英国侵略，完全是合法（国际法）的举动。即便要改革西藏的政治经济制度，也是中国的内政，此前清朝曾多次改变西藏的政制（诸如前述各章程），与英国有何相干？英国有什么权力干涉？今日回味张荫棠的《治藏十九条》，最令人感到惊讶的是他竟然要废除政教合一和农奴制、解放农奴，它已经超出了单纯的收权，变成“民主改革”了。一个封建皇朝的封疆大吏提出的改革西藏的纲领，竟与50年后中共提出的民主改革纲领如此相似，决非偶然。它说明，西藏当年的政治经济制度相对于清朝的封建制度来，仍然是落后的反动的。而中共的社会制度再专制独裁，都比西藏政教合一的农奴制进步一点点（后文详论）。

据说十三世达赖喇嘛逃亡印度之初，原有经海路去北京向清廷面奏之意。但清廷又一次革除他的名号，并下令另觅达赖喇嘛灵童，打消了他的这一念头（12）。此事即便当真，只说明他还想在清朝与英国之间玩弄两面手法。这时他已被疯狂的仇汉心理所控制，把英国殖民主义当成了唯一的靠山。静待良机，以图东山再起。

注释：

（1）多杰才旦，《西藏问题不是人权问题而是维护中国主权问题》，《中国藏学》，1992年

第2期。

(2) Goldstein, Melvyn C.,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1991), p.2.

(3) Pomfret, John(Washington Post Service), "Jiang Cracks Open Window to Tibet", *Tibet Press Watch* X:III (August 1998), p.15.

(4) 这段丑史众所周知，连美国公共电视台 PBS 在 1994 年 2 月 22 日的 FRONTLINE 节目里播放的为西藏独立张目的电视片《红旗飘扬在西藏上空》(Red Flag Over Tibet) 也描述了这段丑史并加以谴责。

(5) Dalai Lama, *Freedom in Exile: the Autobiography of the Dalai Lama*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0), p.61.

(6) 朱梓荣，《帝国主义在西藏的侵略活动》，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1980 年，48-52 页。

(7) (9) 荣赫鹏 (Francis Younghusband)，《英国侵略西藏史》(India and Tibet)，孙熙初译，西藏社会科学院资料情报研究所编印，1983 年，288-297 页。

(8) 吴丰培等编撰，《清代驻藏大臣传略》，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1988 年，268-270 页。

(10) 《英国蓝皮书》，5240 帙，196 页；转引自杨公素，《中国反对外国侵略干涉西藏地方斗争史》，中国藏学出版社，北京，1992 年，166 页。

(11) 荣赫鹏(Francis Younghusband)，《英国侵略西藏史》(India and Tibet)，孙熙初译，西藏社会科学院资料情报研究所编印，1983 年，302-304 页。

(12) 牙含章，《班禅额尔德尼传》，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1987 年，218-219 页。

## 2、第一次驱汉

西藏政治的变幻莫测确实令人感慨万千。正当清朝对西藏的权威达到历史的顶峰时，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的权威轰然倒塌。本来就军纪败坏、派系林立的驻藏川军发生内讧，互相残杀，争夺钱财，又大肆抢劫，乱作一团。这对十三世达赖喇嘛和英国殖民主义可谓天赐良机。在英国的支持下（提供武器），十三世达赖喇嘛派人回藏组织民军驱逐汉军、汉人。由于驻藏汉军自相残杀，又失去了中央政府的支持，被藏军全部驱逐出西藏，史称“第一次驱汉事件”。驻藏川军纪律败坏，扰民太甚，大部分西藏上层人士站在十三世达赖喇嘛一边，但也有班禅系统、拉萨的丹吉林寺、哲蚌寺的大部分喇嘛、噶厦政府的噶伦察绒汪曲杰布等官员站在汉人一边。察绒等人因而被杀(13)。1912 年远在印度大吉岭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向西藏发布了一个通告，要藏人将汉人驱逐干净，“总期西藏全境汉人绝迹”，被范普拉赫等说成是“独立宣言”，其实这个通告里没有一个字提到独立(14)。1913 年 2 月，十三世达赖喇嘛回到拉萨，发布了名为“圣地佛谕”的公告，宣布西藏独立。戈茨坦认为：“虽然在当时西方的术语中这算不上是一个正式的独立宣言，但……它清楚地表明了达赖喇嘛要求自由的愿望，以及在没有中国的封号、

没有中国的干涉情况下统治西藏的意图。(15)”十三世达赖喇嘛想独立，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他和他的幕僚对国际法一窍不通，既不懂得用国际法语言宣布独立，也不懂得在新闻媒体上发表，更不懂得与中国政府谈判和呼吁外国政府承认。所以没有任何政府（包括英国）承认他的宣布独立，也就不足为奇了。

与此同时，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召开西藏各界代表会议，讨论与中国的关系。据当时英国负责西藏事务的驻锡金专员、“西藏通”贝尔（Charles Bell）说：“西藏之官吏僧侣人民中，有左袒中国者，自无容讳，盖自然之亲近，及联合之久远，有以致之耳。(16)”这“自然之亲近”与“联合之久远”，的确说到了点子上。无论在种族、语言、文化、宗教上，藏汉两族都比藏英或藏印等族接近。清朝对西藏一向优厚，从不收税，反而给予财政补贴。据 1795 年西藏呈报清廷的报告说，布达拉宫每年收入 127000 两白银，但每年支出为 143000 两，不足部份由清廷补足（17）。清廷每年把四川打箭炉等地的税收 5000 两白银和大批茶叶赏给达赖喇嘛，却“免其正赋之贡”，“凡所纳税赋及向罚人银钱，俱存备公用并喇嘛唸经之费”（18）。十三世达赖喇嘛 1908 年觐见慈禧太后时，后者传旨今后每年赏赐前者银一万两，由四川藩库分季支发（19）。清朝对西藏的宽厚大度竟被现世达赖喇嘛作为“西藏自古以来独立”的证据，他对董尼德说：“在西藏，有些受中国行政管理的地区（指四川、青海、甘肃、云南藏区——引者）有向北京纳税，不过以面积而言，占地最广的中部西藏（指今日的西藏自治区——引者），则从来没有纳过税，在将近两千年之间，从来没有纳过税，我认为这个意义非常明显。(20)”照此逻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从未向西藏征税，反而给予巨额补贴，所以西藏自 1951 年以来一直是独立的了，那他为何要逃离独立的西藏？中国政府还给许多汉族贫困县免税与补贴，难道那些县也是独立国家吗？不过他无意中承认了，川、青、甘、云藏区从来就不受历代达赖喇嘛管辖。

注释：

（13）王贵，《西藏历史地位辩》，民族出版社，北京，1995 年，228 页。

（14）牙含章，《达赖喇嘛传》，人民出版社，北京，1984 年，240 页。

（15）Goldstein, Melvyn C.,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1991), pp.60-61.

（16）贝尔（Charles Bell），《西藏之过去与现在》(Tibet: Past and Present)，宫廷璋译，192 页。

（17）吴忠信，《西藏纪要》，中央文物出版社，台北，1953 年，85 页。

（18）马戎，《西藏的人口与社会》，同心出版社，北京，1996 年，180 页；《清实录、高宗朝》，69 卷。

（1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宫中杂档》；王贵，《西藏历史地位辩》，民族出版社，1995 年，208 页。

（20）董尼德（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与死》(Tibet mort ou vif)，苏瑛宪译，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台北，1994 年，104 页。

### 3、西姆拉阴谋

1912 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民，是曰民族之统一。（21）”4 月，袁世凯就任大总统，于同月 22 日发布命令：“凡蒙藏回疆各地方同为我中华民国领土，则蒙藏回疆各民族即同为我中华民国国民。（22）”这就是著名的“五族共和”。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四川、云南都督奉袁世凯命派军进藏，节节胜利。十三世达赖喇嘛又玩起了两面手法，他一面组织藏军抵抗川军并继续驱汉，一面派人通过新疆都督袁大化向北京政府提出恢复汉藏关系条件，又派人与四川都督尹昌衡谈判，赞成“五族共和”，要求中国政府照常津贴达赖喇嘛。他的目的是要用名义上的“西藏属于中国”换取中国政府源源不断送钱给他，同时却不允许中国在西藏驻军设官，他的算盘可谓精明透了。英国见势不妙，一面制止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中央政府谈判，一面直接出面干涉。1912 年 8 月 7 日，英国公使朱尔典向中国外交部提出五点条件：一、中国不得干涉西藏内政；二、中国不得改西藏为行省；三、中国不得派军驻藏；四、英国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要求根据上述各点订约，并以此作为承认中华民国的条件；五、订约前封闭一切经印度去西藏的道路（旨在阻止中国政府派官去西藏---引者）。9 月 7 日他又向中国外交部施加压力说，如果中国定要派兵进藏，英国当以实力帮助西藏独立。

袁世凯一面下令川军停止进军，一面驳斥英国的照会。指出根据 1906 年与 1908 年中英两个有关西藏的条约，中国有权干预西藏内政，有权派兵进藏，中英毋需再订新约，希望英国先各国承认中华民国。英国当然不会买账。袁世凯迫切需要英国的承认与借款，被迫同意举行英国提出的中、英、藏三方谈判，这便是臭名昭着的西姆拉会议（23）。

根据戈茨坦引证大量英国外交档案的描述，出席西姆拉会议的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代表夏扎首先要求中英两国承认西藏独立，并要求把“大西藏”划入“西藏国”的版图。中国代表陈贻范则要求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西藏的国防、外交必须受中国政府控制，中国本部与西藏的界线必须划在清末时达赖喇嘛的实际控制线上（大致等于今日的西藏自治区---引者），双方立场针锋相对。

英国不愿支持西藏独立，这倒不是因为它善良，而是因为 1907 年的《英俄协议》规定英俄两国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并相约不干涉中国西藏内政。如果英国公开支持或承认西藏独立，就会引起俄国抗议，影响英俄关系。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西姆拉会议始于 1913 年 10 月 13 日，英藏两方签字于 1914 年 7 月 3 日，25 天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正式爆发），英国要拉拢俄国对抗德国，怎敢得罪俄国？英国还怕西藏独立后与俄国结盟，危害英国利益。在英国的压力下，藏方被迫放弃独立诉求。《西姆拉条约》规定：中英两国承认中国在西藏享有宗主权；中英两国还承认“外藏”自治，不干涉“外藏”的行政事务；“西藏政府”对“内藏”拥有宗教权；中国承认英国在西藏的“特殊利益”，英国在“外藏”享有商业最惠国待遇；中国不得在西藏驻军设官等等。这里所谓的“外藏”和“内藏”，是英国仿效内外蒙古提出的概念，“外藏”指达赖喇嘛控制区，“内藏”指中国政府控制的川、甘、青、云四省藏区。戈茨坦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一条约的实质是把西藏变成名义上属于中国，实际上处于英国影响下的“自治”之中（24）。这与俄国策动的“外蒙自治”如出一辙。

袁世凯政府本拟接受“宗主权”等款，只因英、藏方面在划分“外藏”界线时胃口实在太大，引起新疆、四川、青海、云南等省都督巡抚和人民团体强烈反对，只得命令陈贻范拒绝在条约上正式签字。《西姆拉条约》最奇特之点是它的《附件》（Schedule），它规定：缔约各方承认



西藏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西藏政府找到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后，请民国政府授予封号；“外藏”官员的选拔、任命权在西藏政府；“外藏”不派代表参加民国议会等等。它既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就和条约正文的“宗主权”相矛盾，精通国际法、最善于讲究措辞的英国外交官决不会不明白这点。他们把这句话放在《附件》里，为的是诱骗中国政府在正约上签字，然后说要以正约为准，其用心可谓恶毒之至。英国甚至暗示要用战争“保护”西藏，并支持西藏对中国开战，以此胁迫中国政府签字。当这一切都无效时，英藏两方竟然撇开中国在条约上签字，并发表声明说该约对英藏双方都有约束力，只要中国不签字，中国就不能享受该约的一切权利。换言之，中国如果不签字，连对西藏的“宗主权”都没有了。

在这个会上，英国代表麦克马洪（McMahon）与十三世达赖喇嘛代表夏扎还背着中国代表签订了两个秘密协定，一是《英藏贸易条例》，规定西藏给予英印商人治外法权，没有英国同意不得向英印商人征收关税或其他税，实际上把西藏变成了英国的半殖民地。另一个是边界协定，即《麦克马洪线换文备忘录》，把“麦克马洪线”以南约九万平方公里的中国西藏领土（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加措就诞生在那里）划给英属印度。英国人利用藏人不懂地理学、不会画地图，在划界时又做了许多手脚（25）。这两个协定充分暴露了英国殖民主义的强盗嘴脸。当时英国答应以帮助“大西藏”取得独立作为回报。为了独立而割让领土、出卖主权，这样的独立也称得上“自由”吗？后来英国果然在外交上一再向中国施压，用武器支援西藏，煽动藏军向西康、青海进攻，结果都失败。噶厦政府后悔，一再乞求英国归还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土地，遭到英国拒绝，它因此哀叹“大虫吃小虫”。印度独立后，全盘继承了英国在西藏的殖民利益，不理睬噶厦政府的苦苦哀求，吞并了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中国西藏领土，还不断向北蚕食，终于引起中印战争，这是后话（26）。时至今日，达赖自传《流亡中的自在》中的“大西藏”地图囊括了大片汉族和其他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居住地，唯独把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土地划给了印度，其奴才心态与卖国嘴脸昭然若揭。有趣的是，达赖方面从来不敢提《西姆拉条约》和西姆拉会议，因为条约的《附件》规定西藏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份，对他们极为不利。他们在会上与英国秘密签订的两个协定更是他们羞于提起的出卖主权和领土的丑事。

他们津津乐道的是所谓蒙藏条约。《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说：“西藏与蒙古于公元 1913 年签订条约，双方宣布承认对方为独立的国家。”这真是天下奇文。1911 年 12 月 28 日外蒙活佛哲不尊丹巴在沙俄策动下宣布独立，孙中山坚决反对，世上无一国承认，连沙俄与它签订的 1912 年 11 月 3 日的《俄蒙协约》都规定俄国保护外蒙“自治”而非独立。1915 年 6 月 7 日，中俄蒙恰克图协定规定，俄国承认中国对外蒙的宗主权，中国承认外蒙的自治权。可见当时外蒙自己都不是独立国家，它有什么资格承认西藏独立？《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也说：“外蒙，从公元 1924 年开始，是一个为国际社会所承认的独立国家。”岂非自相矛盾？

外蒙的故事没有完。1924 年 5 月 31 日，苏联外长加拉汉与中国外长顾维钧签订《中苏协定》，规定外蒙主权属于中国，苏联将从外蒙撤军。但同年 6 月 13 日蒙古共党宣布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世上除苏联外，无一国承认。可见外蒙在 1924 年后也未得到国际社会承认。1945 年 2 月雅尔塔会议上，丘吉尔和罗斯福为要苏联出兵打日本，同意斯大林提出的“外蒙维持现状”。在苏美英的压力下，1945 年 8 月 14 日，中华民国政府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意外蒙举行公民投票。1945 年 10 月 10 日至 20 日，外蒙在苏联红军监护下投票，绝大多数赞成独立。1946 年 1 月 5 日中华民国承认外蒙独立。同年外蒙申请加入联合国，被拒绝。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为了讨好斯大林，立即与外蒙建交。1953 年中华民国政府废止 1945 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声明撤销对外蒙独立的承认，外蒙仍为中华民国领土。1961 年外蒙加入联合国，中华民国代表在投票时弃权。1987 年 1 月 27 日，美国与外蒙建交，中华民国发表声明，重申外蒙为中华民国领土。由此可见，外蒙独立得到国际社会承认已

是 1961 年的事，比《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说的 1924 年晚了 37 年（27）。

由于中国拒绝签字，《西姆拉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连英国都不承认西藏是独立国家，它签字又有什么用？这是连英国殖民主义自己都承认的，英印政府外交和政治部外事秘书 1915 年 9 月 3 日给贝尔的信说：“因为中国政府还没有在《西姆拉条约》上签字，俄国政府也没有接受该条约，因而条约现在是无效的。（28）”戈伦夫则说：“《西姆拉条约》在签订了许多年以后，仍然声名狼籍，而且不能得到执行。”“尽管《西姆拉条约》明显非法，但它却帮助英国达到了短期的目的，西藏实质上成了英国的保护国。”（29）

英国当然不会死心，它先用军火接济噶厦政府，唆使藏军趁中国军阀混战之际，从 1917 年 7 月到 1918 年 7 月攻占了川军控制的昌都地区和西康西部，然后由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出面，要求北洋政府重新开议藏案。他在 1918 年 12 月 6 日说：“本公使今敢声明，虽贵国屈膝奉送西藏于我英国，本国人民必不接受，然本国亦不愿贵国占领西藏。总而言之，若贵国不愿与本国重议西藏问题，俾早日了结，则此次于欧洲和议会内，本国自不能帮助贵国。”竟以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困境相要挟，逼中国承认《西姆拉条约》。从 1918 年 2 月到 1919 年 12 月，双方反复谈判。懦怯愚昧的北洋政府已经同意承认“宗主权”，只是不肯把青海南部与西康西部交给“外藏”去“自治”。1919 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使北洋政府认识到不可擅让领土，为了试探民意，北洋政府将有关交涉情况公布于众，全国舆论顿时大哗。四川省议会提出议案说：“边藏幅员百倍于青岛，利害关系亦远过于青岛，川人宜群起愤争，全国宜一致进行。”回民军阀、青海蒙番宣慰使马麒通电全国：“西藏固中国之领土……此约一签，终古难复。大好河山，一笔断送。凡属五族，谁不解体！”中国留日学生也通电话说：“西藏者，中国之版图也。领土主权，自始属我。”指出英国一旦控制西藏，则可侵入四川，进而沿长江东下，图谋各省。警告北洋政府不可重蹈外蒙复辙（30）。

北洋政府不敢再议。1919 年 12 月 6 日中国驻英公使施肇基面告英国外交部：“查山东问题，已激起抵制日货风潮，而中国全国人民之心理，视西藏问题亦与山东问题同其重要，倘将西藏问题同时提议，深恐激起国民猛烈之反抗，舆情如何，已可概见。窃维英国在华商务最盛，倘因此致生同一之扰攘，则不特有违中国本愿，亦有碍英国利益。”

英国殖民主义历来欺软怕硬，此时也无可奈何（31）。他们不无惊讶地发现，他们面前出现了新的对手——中国人民。这已不是义和团时代的盲目排外的拳民，而是初步具有现代政治意识的国民。至少中国的市民已经从西方侵略者那里学到了自由、民主、平等、爱国等思想武器，学会了报刊舆论、游行示威、罢工罢市、抵制外货等斗争手段。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形势（德国战败、奥国崩溃、俄国革命、英法削弱、殖民地民族独立运动兴起）使重组八国联军成为梦呓。鸦片战争的时代过去了。英国政府综合考虑形势，认识到不能为了西藏而危害其在中国内地的商业利益。朱尔典在同月发表的关于西藏问题的五点声明里不得不表示：“尊重中国为五族共建之国家。（32）”英国后来还在西藏问题上搞过很多名堂，诸如阻止国民政府护送九世班禅回藏、抗战时阻止国民政府测绘通藏公路、煽动西藏成立“外交局”等等，但都没有像西姆拉会议那样猖狂。直至印度独立、英国撤退，英国始终未能迫使中国政府承认对西藏仅有“宗主权”。这大概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在对西方的外交中打民意牌并取得成功的例子，由此也可想见为何中共不敢让西藏独立或变相独立。可以说任何人、任何党在北京掌权，都不敢让西藏独立或变相独立。

注释：

(21) (22) (23) 杨公素,《中国反对外国侵略干涉西藏地方斗争史》,中国藏学出版社,北京,1992年,173-177页。

(24) Goldstein, Melvyn C.,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1991), pp.68-76.

(25)《天葬》121页说:“因为当时的西藏已经摆脱了中国控制,虽然中国政府不同意,也没阻挡住所谓麦克马洪线的产生。”此言不实,当时中国政府根本不知道英藏两方关于麦克马洪线的秘密交易,详见杨公素上书上引页。

(26) 西姆拉会议的各种文件均见 Goldstein 上书附录。会议详情及麦克马洪线问题还参见杨公素,《中国反对外国侵略干涉西藏地方斗争史》,中国藏学出版社,北京,1992年,178-198页,224-229页。

(27) 参见《蒙古人民革命党简史》,人民出版社,北京,1990年;杨碧川,《达赖与西藏独立》,一桥出版社,台北,1997年;《中央日报》有关报道。

(28) Goldstein, Melvyn C.,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1991), p.80.

(29) Grunfeld, A. Tom, *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New York: M. E. Sharpe, 1996), pp.68-69.

(30) 转引自:胡岩,《“五族共和”口号的提出及其意义》,《西藏研究》,1995年第1期。

(31) 冯明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英西藏交涉与川藏边情(1914-1919)》,《西藏研究论文集》,第4辑,西藏研究委员会,台北,1993年。

(32)《东方杂志》,第17卷,第1号,143页。

#### 4、“口头主权”与法律事实

整个民国年间,中国政府并没有在西藏驻军设官,这是事实。《天葬》因此认为,中华民国对西藏只有“口头主权”,“西藏从本世纪的1912年到1951年40年间,实现并保持了完全的独立。无论中国人怎么狡辩那段时间它对西藏实行了何种主权,都只能被归于牵强附会。从这个角度评论,那是足以使西藏独立事业自豪的40年”(33)。这里所谓的“完全独立”并不符合事实。在这期间,西藏的土地上有英国、印度、尼泊尔的驻军,那三国人在西藏享有治外法权与免税特权,那三国驻西藏的代表还可以干涉西藏的内政(详见后文),西藏实际上已沦为那三国的半殖民地,所以也不那么足以使藏人自豪。

当然那时中国确实没有对西藏行使主权管辖,那么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还存不存在呢?如果清朝从来没有对西藏颁布章程、驻军设官、实行过主权管辖,如果清朝与民国曾经在任何一个国际条约里放弃过对西藏的主权,那么中国确实不再拥有对西藏的主权。可惜历史不是这样。虽然在清代,没有一个国际条约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但也没有一个国际条约否认过这一点,更无一国承认过西藏独立。民国年间也一样。尽管英国千方百计图谋西藏,却始终不得不

以中国政府（清朝、民国）为交涉对象，这就意味着它也不得不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1906年《中英续订藏印条约》第二款规定：“英国应允不占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中国亦应允不准他国干涉藏境及其一切政治。”等于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这种对中国在西藏主权的承认与对西藏独立的不承认在清代就构成了国际法上的法律事实，只要没有新的国际条约去推翻这一法律事实，它就会继续有效。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条约，所以谁也无法否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1919年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声明“尊重中国为五族共建之国家”。1948年8月2日美国国务院中国事务处副处长富里曼（Freeman）告诉自称独立的西藏噶厦政府派出的商务代表团说：“我声明，虽然在西藏存在，很大程度的自治，但是美国政府从前承认并且还将承认中国对西藏所享有的合法主权。(34)”1997年4月17日美国驻华大使尚慕杰（James Sasser）在访问拉萨时说：“美国政府从孙中山时期就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35)”1995年美国国务院声明：“从历史上看，美国一贯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至少从1966年起，美国的政策明确承认西藏自治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西藏自治区成立于1965年——引者）。这一长期不变的政策是符合整个国际社会，包括中国所有的邻国的观点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承认西藏是个主权国家。由于我们不承认西藏是个独立国家，所以美国也不和自称的‘西藏流亡政府’建立外交关系。(36)”美国总统克林顿（Bill Clinton）1998年7月27日在北京与中国主席江泽民联合举行记者招待会时也说：“我同意西藏为中国的一部分，为中国的一个自治区之一。(37)”这就叫做法律事实。有了这个法律事实，中共进军西藏就是合法（国际法）的行为，是中国的内政（改朝换代）；没有这个法律事实，中共进军西藏就是一国侵略另一国。

还有人说西藏那时是事实独立（38），这话就其不受中国政府管辖而言不算错。不过“事实独立”在国际法上没有什么意义。早在1974年，塞浦路斯的土耳其人就把政府军赶走并宣布独立了，至今只有土耳其一国承认它，联合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都不承认它。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也早就把政府军赶走并宣布独立了，国际社会至今不予承认，联合国还授权北大西洋公约集团派飞机、导弹和军队去禁止他们独立，这是联合国与西方民主大国处理“事实独立”问题的最新示范，即 case law。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莫尔多瓦的“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俄国的车臣也是如此。外蒙从1924年起就事实独立了，为何斯大林还要在1945年逼中华民国承认？就因“事实独立”并无法律（国际法）意义。何况那时中国没有在西藏驻军设官，是因为英国的非法干涉，把英国非法干涉的后果说成是西藏独立的合法借口，那还有什么公理可言？满族能以日本侵华期间建立过“满洲国”而要求独立吗？

范普拉赫和《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又说清朝不是中国，中华民国无权继承清朝对西藏的主权。清朝是否中国，前文已经作过论述，这里只引一条史料。1913年5月2日美国总统威尔逊（Wilson）致电袁世凯，承认中华民国，电文云：“是以美国政府及人民皆以余代表美国政府及我美人民欢迎新中国加入万国一家内（39）。”根据语义逻辑，“新中国”是对“旧中国”而言，威尔逊也认为清朝是旧中国，而不是中国之外的另一个国家。中华民国宣布继承清朝的所有条约义务，西方列强无一国表示异议，并继续按照他们与清朝签订的条约与中华民国打交道，无一国要求重新缔约。

退一万步说，国际法上还有一条，某个政府对某个无主（或主权有争议）地区的有效管辖超过50年，那个地区就可属于该国。可惜西藏事实独立的时间只有38年，还差12年。到2001年，中国政府与西藏噶厦政府签订《十七条协议》并得到现世达赖喇嘛的拥护就满50年了，那时达赖喇嘛还有什么话说！

注释：

(33)《天葬》，89、99 页。

(34) Goldstein, Melvyn C.,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1991), p.592.

(35) 中央社拉萨 1997 年 4 月 17 日电，《世界日报》，1997 年 4 月 18 日。

(36)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Tibet, (Washington, DC: State Depart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5).

(37)《江泽民克林顿记者招待会》，《北京之春》，1998 年 8 月号。

(38) 范普拉赫，《西藏的地位》；《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国际法学家委员会报告《西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西藏：人权和法治》(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Tibet and The Chinese People's Republic; Tibet: Human Rights and the Rule of Law, 1960; 1997, Geneva)；曹长青，《事实独立：民国时期的西藏地位》，《中国之春》，1997 年 11 月号。

(39)《中华民国政府公报》355 号，1915 年 5 月 3 日。

## 第七章：从《十七条协议》到五九年叛乱

### 1、联合国袖手旁观

1949 年 7 月 8 日，正当国民党在战场上节节败退时，西藏发生了第二次驱汉事件。原英国驻拉萨代表、此时的印度驻拉萨代表理查逊（Richardson）唆使噶厦政府把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拉萨办事处及其他在藏汉人全部赶走，其借口是他们中可能有共产党（1）。国民政府自顾不暇，只作了有气无力的抗议。中共喉舌新华社 9 月 2 日发表社论《决不允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领土——西藏》，指出驱汉事件“是在英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印度尼赫鲁政府的策划下发动的”，声言解放军一定要解放西藏（2）。这是中共首次公开在西藏问题上的表态，它毫不犹豫地把矛头指向了英、美、印三国。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同日，被十三世达赖喇嘛赶出西藏的九世班禅的转世灵童十世班禅（他仍流浪在外，并且不被十四世即现世达赖喇嘛所承认）致电毛泽东、朱德，拥护中共政府，希望早日解放西藏（3）。当时班禅尚未成年，这电报当然是其部下所拟。但它说明藏族（上层）也并非铁板一块，都要独立。是年最后一天，中共发表《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把解放西藏列为 1950 年的一项战斗任务（4）。

中共要“解放西藏”，本属中国内部的改朝换代。至今达赖喇嘛和西方舆论仍把此举称作“侵略”（5），这是不符合国际法的。联合国 1974 年 12 月 14 日通过的《关于侵略定义的决议》（Resolution Concerning the Definition of Aggression）第一条说：“侵略是指一个国家使用武力侵犯另一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或以本《定义》所宣示的与《联合国宪章》不符的任何其他方式使用武力。”无论中共作了多少伤天害理、祸国殃民的坏事，谁也无法否认

它建立的政府是中国政府，而不是外国政府。如前所述，既然美国在 1948 年就公开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至今联合国与世上所有国家都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么新的中国政府要接管西藏，当然是中国的内政，怎么能算作侵略呢？当时西藏并不在旧的中国政府控制之下（西藏驱汉也许就是为了避免给中共以这样的借口），然而中共仍把接管西藏叫做“解放西藏”，因为它声称西藏当时存在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下文将证明，这种说法是有根据的。

面临中共的巨大威力，噶厦政府号召“男尽女顶”地抵抗。1950 年 1 月 14 日，西藏摄政大扎宣布派遣“亲善代表团”去美、英、印、尼泊尔四国表明“独立”，另派一个使团去北京表明“独立”。1 月 20 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指出，任何国家如果接待西藏的“亲善代表团”，都将被认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抱有敌意；他还指出西藏应该派代表团到北京来谈判和平解放西藏问题。在此警告下，美、英等国碍于国际公法，不得不拒绝接待西藏的“亲善代表团”。西藏去北京的使团则滞留于印度（6）。

噶厦政府仍不甘心，把藏军主力十个代本（相当于团）七、八千人派往昌都，企图凭借金沙江天险抵抗解放军，印度给予藏军一万多支枪（7）。中共先派青海、西康的活佛去西藏“劝和”，结果失败。甘孜白利寺活佛格达到达昌都后，被英国间谍、昌都电台台长福特（Robert Ford）毒死（8）。中共于是从 10 月 6 日至 24 日进行昌都战役，歼灭藏军 5700 人（杀、伤、俘），占当时藏军总数的三分之一。藏军第九代本 300 多人宣布“起义”（9），其长官德格格桑旺堆日后官拜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其利可谓大焉。

昌都战役后，西藏的大门敞开无阻，印度坐不住了，它于 1950 年 10 月 21 日与 28 日、11 月 1 日连续向中国政府提出三项照会，主要内容为：对西藏采取军事行动，将使国际上有借口反华，会影响联合国讨论中国加入问题，引起国际紧张形势和导向大战；要求与中国政府谈判以调整所谓西藏在中国宗主权内的自治；除非中国停止进军西藏，印度不再劝告西藏代表团前往北京；要求保留印度从英国继承来的在西藏的特权（驻军、邮电、代表等）。

中国外交部复照印度，一一驳斥：西藏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外国无权干涉，与加入联合国也无关；无论西藏愿否谈判、愿否和平解决，中国都要进军西藏（10）。印度刚独立没几年，实力远远不如英国。中国态度一硬，它就马上变软。当时尼赫鲁还打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旗帜，拉拢亚非各国，想当日后被称为“不结盟运动”的领袖，不敢得罪庞大的中国，更不敢公开其对西藏的帝国主义野心。不无讽刺意味的是，今日中国的好友、印度的死敌巴基斯坦当时是亲美反共的，印度更需要拉拢中国反巴，至少不想两面树敌。而中国面对西方阵营的封锁，也想拢络印度、减少孤立，至少也不想四面树敌。何况当时西藏在经济上还有求于印度，解放军进藏后的部份物资也要从印度转运。总的说来，在 1959 年拉萨事件之前，印度对西藏问题尚能保持中立。

昌都战败，噶厦政府一片慌乱。1950 年 11 月 7 日，噶厦以“西藏民众大会”的名义给联合国秘书长送交一份由印度驻拉萨代表辛哈（Shinha）起草的“呼吁书”，宣称西藏是个“独立国家”，要求联合国阻止中国“侵略”。联合国秘书长认为，除非有个联合国会员国要求，否则安理会不会讨论这一呼吁。11 月 14 日，中美小国萨尔瓦多请求联合国大会讨论“西藏遭受外国侵略问题”，联合国秘书长决定先交联合国总务委员会讨论。11 月 24 日总务委员会开会，英国代表发言声称“西藏的法律地位并不明确”，主张“暂缓裁决”。印度独立后，西藏对英国不再有利害关系，英国顾忌自己在香港的利益，不敢得罪中共（英国是西方各国中首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者）。印度在接到中国政府严厉驳斥其干涉西藏问题的复照后决定退却，它的代表也发言主

张暂不讨论西藏问题。大多数国家都支持英印立场，美国代表最后也表同意。噶厦政府然后又给联合国发了一份“呼吁书”，再向美英两国乞求支持，仍然无人理睬，亲英印藏人大为震惊（11）。

当时朝鲜战争已经爆发近半年（12），以美英两国为主的“联合国军”正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在那儿打得难分难解，西藏问题本是从后门打击中国的绝好机会。在这样的背景下，美英等国尚且不敢利用联合国干涉西藏问题，可见西藏独立在国际公法上确实找不到任何根据，这就是前述法律事实的威力。

注释：

（1）杨公素，《中国反对外国侵略干涉西藏地方斗争史》，中国藏学出版社，北京，1992年，234页。

（2）《人民日报》，1949年9月3日。

（3）（4）《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1995年，2-3页。

（5）达赖喇嘛在其所有言论里一贯指责“中国侵略西藏”，毋需一一引证。美国国会1991年10月28日通过的《1992-1993财政年度美国外交授权法》第一条就说西藏是一个被占领的国家；第五条说1949年到1950年中国用武力侵犯西藏（United States Public Law 102-138, H. R. 1415: "Foreign Relations Authorization Act, Fiscal Years 1992 and 1993", Washington, DC, October 28, 1991）。美国国会后来通过的许多决议一再重复此言，西方报刊同声附和。必须说明，美国的行政部门（国务院）并不同意这一立场，也不受其约束，详见后文。

（6）（7）《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1995年，5页、13页。

（8）福特后来被解放军俘获，他供称格达活佛是他下令毒死的。----王贵，《西藏历史地位辩》，民族出版社，北京，1995年，416页。

（9）《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1995年，18页。

（10）杨公素，《中国反对外国侵略干涉西藏地方斗争史》，中国藏学出版社，北京，1992年，250-252页。

（11）Goldstein, Melvyn C.,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1991), pp.708-786.

（12）1950年6月25日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进攻大韩民国；7月7日联合国决定组织联合国军参战；10月8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下令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

2、《十七条协议》

噶厦政府无计可施，只得一方面派代表去北京谈判；一方面让年仅15岁、刚刚提前亲政的现世达赖喇嘛前往靠近印度的亚东，随时准备逃亡印度。随行的除了官员和警卫，还有一千多头

驮畜，驮的全是金银珠宝。它们被埋在锡金王宫脚下的一个马厩里，十年后才被运往加尔各答的一家银行，兑换成 800 万美元（13），这便是轰动一时的“达赖财宝”。

和谈从 1951 年 4 月 29 日起在北京举行，部份西藏代表在途经印度时拜见了尼赫鲁，请他指点如何与中国谈判。尼赫鲁劝他们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允许中国政府掌管西藏的外交事务，但力争不让中国在西藏驻军（14）。他们在北京开始提出的条件无异于与虎谋皮：西藏根本没有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解放军不必进藏；归还西康、青海两省和甘肃、云南藏区；勿听班禅、热振（被大扎害死的前摄政）派的挑拨（15）。达赖喇嘛后来说，当时西藏一共只有六个欧洲人：一个传教士、两个英国无线电报员、两个奥地利人（即美国电影《在西藏七年》里的那两个奥地利登山家）、一个白俄，哪来帝国主义侵略势力（16）？中国政府代表当时指出，印度在西藏亚东、江孜有驻军，印度人在西藏享有治外法权和免税免检的商业特权，还控制了亚东、江孜、噶大克等地的 12 个租界式的驿站；尼泊尔人也享有治外法权和免税免检的商业特权，还在拉萨、日喀则、江孜、吉隆驻军，噶厦政府每年要向尼泊尔进贡一万元尼币（17），这不是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又是什么？又拿出清代的历史文件，指出中央政府有权在西藏驻军。西藏代表无话可说，只好说：“如果他们在那里，那你们就把他们赶走。”中国政府考虑到与印度、尼泊尔的关系，不便公开称这两国为帝国主义，对他们在西藏的殖民主义特权也不予宣传，达赖喇嘛也就趁机装聋作哑，说西藏当时只有六个欧洲人，哪来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

中国政府还要西藏代表承认十世班禅，这对企图独霸西藏的达赖派来说也无异于与虎谋皮，谈判因而中断了一个星期，几乎破裂。西藏代表说，九世班禅在青海圆寂后，从青海、西康、西藏三地找到了三个班禅灵童候选人，至今未经中央政府确认，如何确定青海的这位班禅的合法身份呢？中国政府被难住了，只好去问班禅行辕秘书长，不料后者马上拿出 1949 年 6 月 3 日中华民国代总统李宗仁的封文：“青海灵童宫保兹丹，慧性澄圆，灵异夙着，查系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转世，应即免于掣签，特继任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原来他在国民党败退时，用重金活动，终于在广州找到了李宗仁，赶上了末班车。李宗仁发文后，随即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去青海，于 8 月 10 日在塔尔寺与青海省主席马步芳一起主持了班禅的坐床仪式。这时离青海易帜、马步芳逃跑只有一个月。有个西藏代表还不甘心，他说达赖和班禅坐床时必须互派代表参加，这个班禅坐床时，没有达赖代表参加，所以不能算数。中国政府代表马上拿出原达赖喇嘛驻南京办事处代表参加十世班禅坐床仪式的照片，西藏代表顿时哑口无言（18）。

西藏代表还坚决反对成立西藏军政委员会，中国政府代表说，将来西藏军政委员会的头当然是达赖喇嘛，西藏代表又面面向觑（19）。

5 月 20 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在中南海勤政殿签字（20）。当达赖喇嘛在亚东的流亡噶厦从收音机里听到《十七条协议》时，顿时乱作一团，有人破口大骂，有人痛哭流涕，也有人暗自庆幸。美国驻印度大使韩德逊（L. Henderson）劝告达赖喇嘛否决《十七条协议》，逃亡国外领导西藏境内的反抗运动，并再次向联合国呼吁。他保证美国将予以支持，然而他给达赖喇嘛的信既无署名，也不提美国，甚至连日期都没有。更多的只有口头建议，由达赖喇嘛的代表转达，这样的行为怎能让达赖喇嘛信服呢（21）？早在 3 月 21 日，中国总理周恩来就警告印度驻华大使潘尼加（Sardar Panikkar）：达赖喇嘛如流亡印度可能危害中印关系。印度答复说，印度可劝告达赖喇嘛不要流亡印度，如流亡，根据国际法，只给予难民身份（而非“流亡政府领袖”）（22）。这使达赖喇嘛大为失望。7 月 7 日至 10 日在亚东举行的“民众大会”进行了激烈辩论，放弃庄园逃亡外国的前景令多数藏人不寒而栗，因而主张回拉萨。藏独派坚决要求举行占卦，神谕也要达赖喇嘛回拉萨（23）。



达赖喇嘛于8月17日回到拉萨。9月9日，解放军的先头部队抵达拉萨，举行了耀武扬威的入城式，一万多藏人围观，噶厦政府也不得不派人欢迎。在此兵临（布达拉）宫下的形势下，噶厦政府9月24日至26日在拉萨又召开了“民众大会”，听取了从北京回来的谈判代表的详细说明，又经过激烈辩论，决定接受《十七条协议》，因为它允诺不改变达赖喇嘛的地位与农奴制，西藏的上层可以照旧生活（24）。10月24日，达赖喇嘛给毛泽东发了本书第五章开头引用过的电报，正式接受了《十七条协议》。

由此可见，达赖喇嘛之所以接受《十七条协议》，是由于中共对噶厦政府的军事威力加外交围堵，以及国际社会袖手旁观的双重压力。《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说，《十七条协议》是在军事恐吓下签订的，西藏代表受到生命威胁与囚禁，没有请示西藏政府的自由，连他们签字时盖的图章都是中国政府制造的。根据国际公法，在武力威胁下签订的条约是无效的，所以达赖喇嘛在1959年逃亡印度后立即宣布不承认《十七条协议》。达赖喇嘛在自传里也有类似的话。

且不说只提军事威胁不提国际社会碍于国际公法而不敢干涉的说法有欠全面，也且不说1919年的《凡尔赛条约》就是在武力威胁下签订的合法（国际法）条约，单说《十七条协议》并不是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国际条约，而是中国改朝换代后新的中央政府与原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一个和平接管西藏的协议。既然它不是一个国际条约，国际公法对它也就不适用。假如当时达赖喇嘛拒绝这个协议，中国政府用武力解放全西藏并废除达赖喇嘛的封号与权力，就像清政府多次做过的那样，也仍然是中国的内政，丝毫不违反国际公法。戈伦夫发表过如下评论：

如果这个协议是强加于人的，为什么达赖喇嘛和几乎所有贵族都回到了拉萨并和中国人一起共事？……如果有压制，为什么谈判持续了一个多月？北京本可以在几天内就将谈判结束的。……无论如何，事实是达赖喇嘛和他的官员都回到了拉萨，并同汉人合作了，这事本身就证明了《十七条协议》的合法性（25）。

注释：

（13）Dalai Lama, *Freedom in Exile: the Autobiography of the Dalai Lama*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0), p.169.

（14）Goldstein, Melvyn C.,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1991), p.759.

（15）秦文玉，《神秘雪域》，天地图书有限公司，香港，1995年，97页。

（16）董尼德（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与死》（*Tibet mort ou vif*），苏瑛宪译，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台北，1994年，34页。

（17）杨公素，《中国反对外国侵略干涉西藏地方斗争史》，中国藏学出版社，北京，1992年，263-272页。

（18）（19）秦文玉，《神秘雪域》，天地图书有限公司，香港，1995年，92-94页、89-90页。

（20）《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1995年，27-28页。

(21) (23) Goldstein, Melvyn C.,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1991), pp.798-828.

(22) (24) 《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1995年，26页、33-34页。

(25) Grunfeld, A. Tom, *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New York: M. E. Sharpe, 1987), pp.109-110.

### 3、渐进主义失败

《十七条协议》(26)第一条说：“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董尼德挑剔说：“中国人的这句话说得差了，既然是‘重新回到’，也就是表示当时的西藏并不是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这份资料的起草人不就是默认在1951年以前的西藏是独立的吗？(27)”董尼德的挑剔是徒劳的，既云“回到”，当然意味着西藏原先是在中国大家庭里的，只是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阻挠，与祖国大家庭疏远了。根据国际法，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使某个国家丧失领土，并不影响该国对失去的领土的主权，否则中国、苏联等欧亚国家包括董尼德的祖国法国就无权收回二战中被日本、德国、意大利侵占的领土了，董尼德接受这样的逻辑吗？

《十七条协议》规定中央政府掌管西藏的国防外交，西藏原有制度、达赖喇嘛及各级官员的地位与权力不变，意味着在西藏实行“一国两制”。这也是达赖喇嘛与噶厦政府能够接受它的原因。

但《十七条协议》第十一条也规定：“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这里没有说明改革的内涵，但证之以中共在内地进行的土地改革，大家都明白是怎么回事。这就像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达赖喇嘛与西藏上层的头上，随时可能落下。中共和达赖双方为了推行和阻挠改革，进行了长达八年（等于抗日战争）的反复较量。

中国政府收回外交权后，先后于1954年4月29日与1956年9月20日分别同印度与尼泊尔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度共和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与（排除了印度的干涉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王国保持友好关系以及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尼泊尔之间的通商和交通的协定》，赶走了印、尼两国的驻军，取消了他们的殖民主义特权，折价买回了印度控制的邮电企业和驿站，收回了中国的主权。

在内政方面，毛泽东采取非常谨慎的政策。戈茨坦指出：

在《十七条协议》签订后的几年里，与西方普遍相信的事相反，毛泽东在西藏推行的是温和政策。虽然他的最终目标显然是要把西藏社会主义化，但他的西藏战略却力图创造一种热诚的汉藏关系，减轻西藏上层种种担忧，这样他们就会真心实意地接受与中国统一和社会改革。中国人民解放军自称为“新汉人”，解放军官兵强调他们是来帮助西藏的，不是来剥削与压迫西藏的，他们小心翼翼地尊重西藏的文化与宗教。比如说，他们向拉萨地区两万喇嘛发放布施。解放军颁布了严格的纪律，以防止其官兵侵犯人民利益，要求他们用旧的中国银币（而不是纸

币)支付任何商品与服务。毛的温和政策也允许旧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制度保持不变。从1951年到1959年,不仅贵族与寺庙的财产未被剥夺,封建领主还被允许继续对他们自己的世袭受束缚的农民行使司法权。这一战略的核心是达赖喇嘛。毛把他当做能够推动封建与宗教上层(以及随之而动的广大群众)在新的多民族的共产主义中国里接受一个位置的牵引车。在这一时期毛的西藏政策是一种渐进主义(28)。

毛的温和渐进政策被中共称为“慎重稳进方针”,为此他千方百计地、不惜血本地拉拢、讨好达赖喇嘛与西藏上层,迟迟不去改编藏军(这本是《十七条协议》规定了的),对藏独势力的挑釁一让再让。他甚至设想过由中国政府出钱把贵族、噶厦官员、上层喇嘛(三大领主)的土地、牲畜等生产资料赎买下来,然后无偿分给农奴,再给三大领主做官发薪,实行和平土改,以求减少阻力、皆大欢喜(29)。然而他的设想未能实现,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戈茨坦正确地指出:毛泽东直到1959年暴动为止,一直采取渐进主义政策,不在西藏强行社会主义改革。但在不受《十七条协议》约束的四川藏区(原西康省),李井泉(四川省委书记)的民主改革(土改)却引发了血腥的反叛。西康难民与叛军进入拉萨,成为1959年暴动的重要原因。达赖喇嘛本来是信任主张在西藏进行改革的噶伦阿沛阿旺晋美、并愿意在西藏作某些改革的,但他无力控制西藏强硬的反汉势力。后者拒绝任何改革,并得到美国的鼓励与支持。他们与西康难民一起组织了1959年的武装暴动。西藏问题于是重新国际化。毛的渐进主义寿终正寝(30)。毛泽东既忽略了四川、青海藏区与西藏的联系,也低估了外国对西藏的影响,他在西藏的和平土改实验从一开始就注定不会成功。除了驱逐印度、尼泊尔殖民势力出藏外,他在1959年前只做了一件正确的事----不惜一切代价修成了青藏公路与川藏公路,从而使第三次驱汉事件遭到彻底失败。

注释:

(26)《和平解放西藏》,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1995年,125-128页。

(27)董尼德(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与死》(Tibet mort ou vif),苏瑛宪译,时报文化出版社企业有限公司,台北,1994年,41页。

(28) Goldstein, Melvyn C., *The Snow Lion and The Grag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p.52-53.

(29)列康尼章,《西藏上层反动派策划的叛乱是怎样发生的》,《中国藏学》,1989年第2期。

(30) Goldstein, Melvyn C., *The Snow Lion and The Grag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p.53-54.

## 4、真相与是非

关于1959年拉萨暴动的真相,人们已经写了很多。虽然对于两个关键的细节----是西藏军区主动邀请达赖喇嘛去军区看戏还是达赖喇嘛主动要求看军区的戏;是谁开了第一枪或炮----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仍在争论,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场暴动是噶厦政府主动发动的,其目的是要阻止改革,赶走解放军,摆脱中国的主权,实现西藏独立。

1956年，随着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作为《十七条协议》规定要成立的西藏军政委员会的替代物）的成立，中国政府一度在西藏大发展，它在西藏成立的各类机构----基巧办事处（相当于专署）、宗溪办事处（相当于县政府）、卫生院、兽医站、邮局、贸易公司、粮站、气象站、水文站、小学、干部训练班、青年联谊会、妇女联谊会等----多达406个，汉族干部职工17631人，藏族干部职工12673人（包括被中共请去做官的2613名藏族上层人士，占上层人士总数近半），后者已占西藏藏族人口的1.05%，全年开支1亿8千万元。然而毛泽东为了贯彻慎重稳进方针，下令在西藏大收缩、大下马，“减户、减口”（撤销机构、精简人员）。到1957年秋，西藏的汉族干部只留1500-1600人，汉藏工人只留500-600人，共两千来人。解放军只留13000人，其余也内撤（31）。在作了这样的大收缩后，中共怎么可能主动挑起事端呢？毛历来讲究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他为什么不在大收缩前主动出击？

达赖喇嘛的自传说，1959年3月10日早上，三千多藏人包围了他居住的罗布林卡，阻止他去军区看戏，理由是军区要绑架、毒死他。最后这句话一听就知道是煽动。叛乱发生后，毛泽东尚且指示西藏军区听任达赖喇嘛逃亡印度，不要阻挠。他为什么要在叛乱前让西藏军区设鸿门宴绑架、毒死达赖喇嘛？退一万步说，他真要绑架、毒死达赖喇嘛，只消召其进京朝觐即可，何必玩请客看戏的把戏？1954年达赖喇嘛就曾奉召进京参加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当时藏人也不曾因怀疑毛要绑架、毒死达赖喇嘛而闹事。可见1959年3月10日的拉萨事件完全是叛乱分子制造的阴谋。

聚集在罗布林卡门前的叛乱分子当场打死了一个藏族僧官，打伤了一个藏族军官。达赖喇嘛在自传里写道：“我怀着极大的悲痛，听说一位叫帕巴拉索朗加错的僧官受到愤怒的人群凶暴的虐待，最终被石头打死。这人由于他与中国占领军的密切合作而闻名于拉萨。……这一暴力事件使我极为苦闷。我让噶厦告诉中国将军，我不能去观看表演。”（32）。这个被打死的藏官是西藏第三号活佛帕巴拉格列朗杰（现任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哥哥帕巴拉索朗加错，时任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委员。他的尸体被持枪的康巴人（来自西康的藏人）捆在马尾巴上，头着地倒拖着驰过拉萨示众。那个被打伤的藏官是西藏军区副司令桑颇才旺仁增（33）。不久前有人称1959年拉萨事件为“和平抗议活动”，并谴责“中共武力镇压”（34），连达赖喇嘛都说是“暴力事件”，天下有这样的“和平抗议活动”吗？

当时拉萨人口不足三万（35），竟能在一个早上集合起三千多人，并敢打死打伤亲共藏族高官，按照政治学的常识，他们后面一定有个在藏人中具有极大权威的组织在动员与指挥。当时西藏只有两个权威的政治组织----中共与噶厦，如前所述，中共不可能做此事，那么只有噶厦会做此事。事实上也是如此，9日晚上，拉萨市长命令说：“达赖喇嘛10日要去军区赴宴，汉人准备在席上毒死达赖，每家都应该派一代表去罗布林卡情愿，要求达赖不要去军区。”10日早上，这一命令传达到各个居民和各个寺庙。拉萨警察首脑、藏军第六代本（团长）还亲自带人在街上来回奔驰，动员市民去罗布林卡（36）。

同一天，噶厦官员、叛军头目在达赖喇嘛居住的罗布林卡开会，宣布西藏独立。达赖自己则在逃亡印度前夕在边境宣布西藏独立，可惜尼赫鲁随即当面告诉他：印度不承认西藏独立（37），联合国与世上所有国家也都不承认西藏独立。达赖喇嘛公开分裂主权国家的行为已经超出了“和平抗议”的范围，变成了叛国活动。记得美国南方宣布独立时，林肯总统毫不犹豫地发兵镇压。1997年美国政府也用武力镇压了“德克萨斯共和国”。迄今为止尚无人谴责林肯或美国现政府“侵犯人权”。林肯纪念堂墙上的铭文还赞扬“他拯救了（国家的）统一”（In this temple as in the hearts of the people for whom he saved the union the memory of Abraham Lincoln is enshrined

forever)。为什么中国政府就无权拯救国家的统一？

当时拉萨的解放军只有一千多人，而拉萨的叛军约有七千人（38），在这样的实力对比下，解放军怎敢主动挑釁？毛泽东 3 月 11 日的指示是：“西藏工委（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引者）目前策略，应是军事上采取守势，政治上采取攻势。目的是分化上层，争取尽可能多的人站在我们一边；教育下层，准备群众条件。如果达赖及其一群逃走时，我军一概不要阻拦，无论去山南，去印度，让他们去。”同日，解放军总参谋部指示西藏军区：“在敌人向我进攻之前，应严守自卫立场，不先打第一枪，以争取政治主动。”（39）毛要西藏工委发动政治攻势纯属空话。当时汉人全部龟缩在各个据点里，被叛军层层包围，谁买他们的账？

3 月 19 日，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预感叛军进攻就在旦夕（当时西藏军区司令张国华在内地），制定了主动出击的作战方案，上报中央军委请示，迟迟得不到答复。20 日凌晨 4 点后，全城枪炮声大作，叛军向军区大院进攻。军区电台却生故障，告急电报发不出去，中央来电也无法接收。中央军委不得不从邮电系统拍发加急电报：“按原计划办，不动。”

在叛军的优势兵力进攻下，上午 8 点，军区大院已岌岌可危。谭冠三当机立断，先斩后奏，下令全面出击。各部队按原方案，先用大砲猛轰俯瞰军区大院的制高点药王山，两小时后攻占该山。下午 2 点起，用大砲轰击叛军指挥部与大本营罗布林卡，晚 8 点半攻占罗布林卡。然后用装甲车堵住拉萨市区各路口，分片扫清叛军。22 日凌晨，大昭寺叛军高举哈达投降。同日上午 9 点，布达拉宫叛军高举哈达投降。然后，郊外的三大寺也高举哈达投降。仅 30 小时（实际作战时间 23 小时）就平息了拉萨叛乱。

就在全面反击开始后六个小时左右，谭冠三通过修复的电台收到了国防部长彭德怀签发的电报，电报说由于兵力悬殊，不同意主动出击，要他们就地死守，缩小防区，等内地来军增援。谭冠三立即复电，告知反击已经开始。军委马上复电：完全同意你们的反击。拉萨战役结束，谭冠三电告中央，请求纪律处分。中央复电表扬，并说因拉萨取得战果，故免予处分（40）。此役共打死叛军 545 人，打伤、俘虏叛军 4800 余人。解放军死 63 人，伤 210 人（41）。

从谭冠三平叛的戏剧性故事也可看出，当时中国政府对西藏叛乱毫无准备，兵力严重不足，根本不可能设鸿门宴绑架达赖喇嘛，所以拉萨暴动完全是噶厦政府的预谋。叛军如此不堪一击，这是毛泽东、彭德怀都未曾料到的。当时叛军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噶厦政府的藏军，二是西康、青海等地逃来的暴动者，三是西藏本地的民军（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三大寺的喇嘛）。就个人体力而言，大多数汉兵是无法同藏兵相比的，因为汉人不适应西藏缺氧。但藏人军事素质极差，几乎谈不上训练，没有协同作战的习惯，又携妻带子、以军营为家。叛军来自四面八方，派系林立，互相倾轧，争权夺利，各自为战，缺乏统一指挥，指挥者也不懂战略战术，而且纪律极坏，扰民太甚，又无顽强斗志，稍有小胜则趾高气扬、称王称霸、不可一世，一遇失利就灰心丧气、弃甲投戈、望风披靡，大昭寺、布达拉宫及三大寺的叛军都是投降的。本来西藏地广人稀、地势险恶、气候严酷，解放军既不适应缺氧，也不熟悉地形，后勤又困难，叛军完全可以长期坚持游击战，却在三年内被基本肃清，六年内被全部肃清（42），出乎所有人的意外。当时美国名记者艾尔索普说中共平叛需要 20 万军队，根本不可能成功。在台湾的学者胡适也说西藏地广山高，中共不可能消灭叛军（43）。

事实上中共只用了几万军队。中共把平叛胜利归功于“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方针，说叛乱是为了破坏祖国统一、破坏民族团结、反对民主改革、维护农奴主利益，违背了广大农奴的根本利益，因而是不得人心的。广大农奴纷纷支援解放军平叛，使叛军极为孤

立（44）。叛乱当然是农奴主发动的，戈伦夫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叛乱决不是农奴和牧民发动的群众起义，它们是由部族的头人和富有的商人挑起和领导的。这些人如果没有暗地里得到外界势力的援助，也一定得到了他们的鼓励。”“西藏原来的寡头政治集团认为汉人发起的改革是对他们的权力和特权的直接威胁，因此他们大力阻止这些改革。”（45）

然而西藏的农奴自古以来被农奴主剥夺了学习文化、过问政治的权利，既不知独立为何物，也不知改革为何物，更不知独立或改革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或坏处，只知道转经拜佛、超度来世。当他们的主人——贵族、官员、喇嘛告诉他们：“红汉人”要消灭他们的命根子——佛教，达赖喇嘛号召他们拿起武器打红汉人，争取西藏独立时，他们也会跟着起哄。然而叛军对藏族百姓的抢劫、奸淫又使他们退避三舍。新华社记者林田的《西藏春潮》记录了他1959年7月在山南采访的见闻，当地藏人告诉他，叛军在那里把“吃的抢光，青壮年妇女奸污光，不给就抡起马鞭”。在卡达却德寺，“哲蚌寺来的一个参叛喇嘛要鸡奸一名年青喇嘛，年青喇嘛不从，被用刀杀死了。还有两个小喇嘛，每人被鸡奸一、二百次。”（46）

与之相反，解放军进藏已有8年，根据《十七条协议》，中共并不干预西藏的内政，因而与普通藏人毫无利害冲突，当然更未像西康土改那样乱斗乱打，而是纪律严明、待人和气、买卖公平、尊重宗教、尊重风俗、乐于助人（免费看病、办学、救灾、施舍等），已给许多藏人良好印象。他们僱用的藏族职工已尝到了红汉人的甜头。他们培养的藏族干部已有了“阶级觉悟”。普通百姓也知道红汉人并不像叛军所宣传的那样是青面獠牙的魔鬼。他们想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和红汉人血战到底。西藏全区有近九万人次卷入叛乱，其中42.8%是投降的。考虑到有六万多藏人（其中大部分是叛军及其家属）逃离西藏，被解放军在战斗中打死、打伤和俘虏的（亦即抵抗到底的）叛军只有两万多。有不少藏人在平叛中站在中共一边。中共在陕西咸阳办的西藏公学与西藏团校的3000多名藏族学员提前毕业返藏，其中500人参加解放军平叛，其余当干部“发动群众”。还有藏人为解放军带路、运货，甚至送情报、参加战斗。部份藏族中上层人士，明白了改革是历史大势所趋，始终与中共合作，班禅额尔德尼、阿沛阿旺晋美、帕巴拉格列朗杰就是这样，有的上层人士还亲上前线，向叛军喊话劝降（47）。昌都战役时“起义”的藏军第九代本不仅未参叛，反而参加平叛战斗，被叛军骂为“叛徒”（48）。总而言之，1959年西藏叛乱并不像达赖喇嘛说的那样，是什么全民族大起义。正如戈伦夫指出的，它不过是农奴主为了维护农奴制而发动的暴乱，虽然它打着保族保教的旗帜，因而能迷惑部份农奴。

注释：

（31）宋赞良，《和平解放时期西藏的财经工作》，《中国藏学》，1989年第4期；洛桑丹珠，《西藏社会的发展进步与党的统一战线》，《西藏研究》，1995年第3期。

（32）Dalai Lama, *Freedom in Exile, the Autobiography of the Dalai Lama*（New York: Harpor Collins Publishers, 1990），p.132-133；Dalai Lama, *My Land and My People*（New York: Putala Publications, 1983）：达赖喇嘛，《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陈峰译，香港支持西藏之亚太广场出版，1990年，164-165页。

（33）秦文玉，《神秘雪域》，天地图书有限公司，香港，1995年，126-127页。

（34）《支持达赖喇嘛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声明》，《北京之春》，1998年6月号。

（35）见本书第三章注（3）。

(36) 林田,《拉萨叛乱真相纪实》,《西藏春潮》,中国藏学出版社,北京,1990年。

(37) Dalai Lama, *Freedom in Exile, the Autobiography of the Dali Lama* (New York: Harpor Collins Publishers, 1990), p.134, p.141, p.146.

(38) 林田,《拉萨叛乱真相纪实》,《西藏春潮》,中国藏学出版社,北京,1990年;《当代中国的西藏》(上),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1991年,255页;王贵,《西藏历史地位辩》,民族出版社,北京,1995年,578页。

(39)《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1995年,91页。

(40) 燕燕、张卫明,《血对西藏说》,沈阳出版社,1993年,77-80页。

(41)(42) 王贵,《西藏历史地位辩》,民族出版社,北京,1995年,580页、582页。

(43)《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1995年,102页。

(44)《当代中国的西藏》(上),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1991年,264-269页。

(45) Grunfeld, A. Tom, *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New York: M. E. Sharpe, 1996), p.124, p.150.

(46) 林田,《西藏春潮》,中国藏学出版社,北京,1990年,10页、61页。

(47) 王贵,《西藏历史地位辩》,民族出版社,北京,1995年,582-604页。

(48) 燕燕、张卫明,《血对西藏说》,沈阳出版社,1993年,154页。

## 5、联合国积极干预

当中共1950年发动昌都战役时,联合国袖手旁观,从而迫使达赖喇嘛接受中国的主权;当中共1959年平叛、达赖喇嘛逃亡后宣布独立时,联合国却异乎寻常地积极。它在1959、1961与1965年通过了1353、1723与2079号决议(49),全文如下:

联合国大会 1353 号决议

1959 年,纽约

联合国大会

根据联合国宪章与联合国1948年12月10日通过的《普遍人权宣言》所规定的基本人权原则,考虑到西藏人民也像所有其他人民一样毫无例外地有权享有包括世俗的与宗教的自由在内的基本人权与自由,注意到西藏人民的独特的文化宗教遗产和他们传统享有的自治,严重关切包括达赖喇嘛的陈述在内的关于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与自由被用强力剥夺的报告,痛心

看到正当负责任的领袖们努力减轻紧张局势与改善国际关系的时候这些事件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并损害了人民间的关系：

1) 肯定它（指联合国大会---引者）的如下信念：尊重《联合国宪章》与《普遍人权宣言》所规定的人权原则对在法治基础上改善和平的国际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2) 呼吁尊重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和他们的独特的文化宗教生活。

联合国大会 1723 号决议

1961 年，纽约

联合国大会

回忆起 1959 年 10 月 21 日通过的关于西藏问题的 1353 号决议，严重关切在西藏持续发生的对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的侵犯和对他们传统享有的独特的文化宗教生活的压制的一系列事件，焦虑地注意到由大量西藏难民逃亡邻国所证明的西藏人民受到严重摧残的事件，考虑到这些事件侵犯了《联合国宪章》与《普遍人权宣言》所规定的包括人民与民族自决在内的基本人权与自由、并可悲地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与恶化了人民之间的关系：

1) 重申它（指联合国大会---引者）确信尊重《联合国宪章》与《普遍人权宣言》所规定的基本原则对于在法治基础上改善和平的国际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2) 庄严地重复它关于停止剥夺包括自决权在内的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与自由的行动的呼吁；

3) 希望会员国做出一切可能的努力实现本决议的目标。

联合国大会 2079 号决议

1965 年，纽约

联合国大会

牢记《联合国宪章》与《普遍人权宣言》所规定与宣告的人权与基本自由，重申它关于西藏问题的 1959 年 10 月 21 日的 1353 号决议和 1961 年 12 月 20 日的 1723 号决议，严重关切由大量难民逃亡邻国所证明的对西藏人民的基本权利与自由的继续侵犯和对他们的独特的文化宗教生活的继续压制：

1) 痛心地看到西藏人民的基本权利与自由继续受到侵犯；

2) 重申尊重《联合国宪章》与《普遍人权宣言》所规定的原则对于在法治基础上改善和平的国际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3) 宣告它确信在西藏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并压制西藏人民独特的文化宗教生活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并恶化了人民之间的关系；



4) 庄严地重复它关于停止剥夺西藏人民一贯享有的人权与基本自由的行动的呼吁；

5) 号召所有国家做出努力实现本决议的目标。

奇妙的是，这三个决议都没有指明其谴责的对象----也是其要求执行这些决议的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后者当时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国。戈伦夫评论道：

这些决议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它们甚至没有点中国的名，也没有对中国统治西藏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决议虽然玩弄词藻，但仅对所谓的在西藏“践踏人权”表示遗憾。联合国谴责别人的行为“不合情理”、“不公正”，却在这个时期剥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会员国资格，这真可谓自打嘴巴。难怪中国政府对这些决议一笑置之（50）。

关于“自决权”，留待后文讨论。联合国不敢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联合国的咨询机构国际法学家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缩写 ICJ）却点了名。这是一个专门收集共产国家侵犯人权记录、进行反共宣传的冷战机构（51）。它在达赖喇嘛出逃后立即成立了一个“法律调查委员会”，去印度向流亡藏人调查，同年与次年发表了两个报告----《西藏问题与法治》和《西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52）。它们以国际法学家的面目说，西藏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特别是从 1912 年到 1950 年是个独立国家，西藏有权废除《十七条协议》，宣布独立。关于这个问题，本书已经讨论过了。报告列举了大量的事例，揭露中共在西藏侵犯人权。戈伦夫指出，国际法学家们没有去西藏本土调查，也没有向五十年代访问过西藏的 70 名西方记者调查，他们的全部材料来自流亡藏人的一面之辞，而后者由于感情上的创伤和心理上的需要，为了赢得别人的同情，或者害怕被遣返，往往夸大其辞。他还引用本书在导论里引用过的那位英国妇女的话，说明藏人“从生到死都习惯于把传说和神话当作事实接受”。戈伦夫举例说，国际法学家们“把一些荒谬可笑的声明当作十分真实的资料加以接受，如孜本（噶厦政府官名---引者）夏格巴说‘西藏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农奴制’，又如达赖喇嘛说‘几乎每个藏人都从事农业生产，不管他怎样贫穷，他至少有五至六头牛和 30 只羊’”。“国际法学家委员会最不客观的例子是绝育问题。他们引用达赖喇嘛的话说，绝育是从 1957 年开始的，后来大规模地进行，‘两三个村庄的村民都做了绝育手术’。这位西藏领袖继续说：‘共产党中国借口防止某些流行病，于是采取了这些措施。他们对男人和女人进行了某种注射，使他们的生殖器软弱无力。他们还强行给予他们某些医学方面的处理，使他们的生殖器失去了生殖能力。’.....达赖喇嘛答应要对他的这些指控提出证据，但从未兑现。尽管如此，这些指控仍广为流传，似乎已经有了真凭实据。在法律调查委员会报告公布后的几年内，达赖喇嘛和国际法学家委员会都宣称已经掌握了绝育的确切证据。但他们找不出一个经临床检查的人来证明他们的指控。人们应该记住，性病过去在整个西藏蔓延，而阳痿往往是性病造成的后果。”（53）中国政府确曾派出医疗队，免费治疗在旧西藏广泛流行的性病。不料达赖喇嘛倒打一耙，说这种医疗使藏人失去了生殖能力，天下还有比这更无耻的谎言吗？中共在平叛民改中确实打死、迫害了许多藏人，这个问题留待下章论述。但国际法学家们捕风捉影、制造谎言的本领，堪与达赖喇嘛相媲美。

针对达赖喇嘛大叫大嚷“中国要消灭藏族”，国际法学家委员会的第二个报告说：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中国企图灭绝藏族；但是，有证据表明中国违反了藏族作为一个宗教集团生存的权利，但没有违反他们作为一个民族、种族或者人种生存的权利。这被称为“文化上的种族绝灭”。精通藏语文、多次去西藏各地调查的戈茨坦也认为，达赖喇嘛关于中国对藏族实行种族绝灭的宣传没有事实根据（54）。

注释：

(49)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1353 (XIV), 1723 (XVI), 2079 (XX).

(50) (51) Grunfeld, A. Tom, *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New York: M. E. Sharpe, 1996), p.180, p.147.

(52) *The Question of Tibet and the Rule of Law*, (Geneva: ICJ, 1959); *Tibet and the Chinese People's Republic*, (Geneva: ICJ, 1960).

(53) Grunfeld, A. Tom, *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New York: M. E. Sharpe, 1996), pp.148-149.

(54) Goldstein, Melvyn C.,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73.

## 第八章：从平叛民改到文化大革命

### 1、谁撕毁了《十七条协议》？

《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说，1954 年第一次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使《十七条协议》承认的西藏的特殊自治地位自然无效。该宪法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十七条协议》无效，但中国政府在 1956 年成立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把西藏的管理工作直接“兼并入”中国的管理范围内，因而违反了《十七条协议》。

《十七条协议》规定要在西藏成立军政委员会，结果没有成立，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取代。筹委会的主任是达赖喇嘛，其 51 名委员中只有三个汉人，其余均为藏人。1955 年中国国务院召开全体会议讨论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时，达赖喇嘛在会上表示：会议提出的事项“在今天的会上经过讨论、修正，做出决定，我们将愉快地拥护”。1956 年筹委会成立时达赖喇嘛以主任的身份出席了庆典并致开幕词、作报告（1）。《十七条协议》规定，西藏要改革，改革要与西藏领导人协商。成立自治区筹委会就是一项改革，并得到了西藏头号领导人达赖喇嘛的赞同和参与，怎能说违反了《十七条协议》呢？如果说成立经达赖喇嘛赞同并由他担任主任的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就是违反《十七条协议》，那么其责任要由达赖喇嘛来负，达赖喇嘛首先违反了《十七条协议》。

《以事实说明西藏的真相》又说，《十七条协议》规定不强制进行改革，所以中国政府在西康和安多（青海省）进行的土改违反了《十七条协议》。正如前一章引用的戈茨坦的话指出的，西康与青海不属于《十七条协议》的范围。噶厦政府的“外交局”1949 年 11 月 4 日致英国的求援信也说：“中共军队已侵犯兰州、青海和西康等中国省份；由于这些省份与西藏接邻，我们已经给中共政府领袖毛泽东先生送去一封官方信件，要求他尊重西藏的领土完整。（2）”可见噶厦政府自己在中共进军西藏前也承认，青海与西康不属于西藏。《十七条协议》的正式标题是《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既然噶厦政府也承认青海与西康不属于西藏，那么《十七条协议》当然不适用于青海与西康（包括被中华民国政府划入西康省的、被十三世达赖喇嘛用武力攻占的、被解放军在签订《十七条协议》前用武力解放的

昌都地区)。所以中共在那里进行土改,虽然不明智、不人道,从法律上说并不违反《十七条协议》。

达赖喇嘛在其第一本自传《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里说:“我们在路上(逃亡路上---引者)听到中国宣告解散我们的政府,我们对此才可以采取一些行动。当然,他们没有权利,法定的或者别的,来解散我的政府。事实上,他们打破了他们在十七条中所至今保持了的唯一的一条:即对不改变我的地位的承诺。(3)”这真是天下奇文。《十七条协议》第一条就规定,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第二条规定,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在达赖喇嘛的纵容下,噶厦政府宣布了“西藏独立”,派藏军进攻解放军,这意味着噶厦政府即在《十七条协议》上签了字的西藏地方政府公开撕毁了《十七条协议》。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还有必要遵守《十七条协议》吗?达赖喇嘛的指责就好比纳粹德国指责苏联抵抗德军入侵违反了《德苏互不侵犯条约》一样荒谬。必须指出,中国国务院3月28日的命令只是解散了西藏地方政府,其职权由西藏自治区筹委会行使,由班禅代理筹委会主任,因为筹委会主任达赖喇嘛那时已经出逃。但该命令并未废除达赖喇嘛的名号与职务,所以达赖喇嘛说中国政府改变了他的地位也不合事实。事实是他自己弃职出逃,自行改变了地位。达赖喇嘛的第二本自传《流亡中的自在》删去了这段话,可见他自己也认识到此言不妥。

注释:

(1)《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1995年,62页;《当代中国的西藏》(上),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1991年,214-224页。

(2) Goldstein, Melvyn C.,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42.

(3) Dalai Lama, *My Land and My People* (New York: Potala Publications, 1983): 达赖喇嘛,《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陈峰译,香港支持西藏之亚太广场出版,1990年,199页。

## 2、民主改革

中共巴不得噶厦政府撕毁《十七条协议》,它可以放手废除西藏的农奴制,实行它所说的民主改革,把西藏的政权全部收归中共,“一劳永逸”地解决西藏问题。1959年6至7月,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在班禅主持下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西藏全区进行民主改革的决议》。同年9月,筹委会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废除封建农奴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决定》,正式开始民主改革(4)。

本书第二章已经介绍过农奴制侵犯人权的情况,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农奴制的经济机制(5)。西藏的庄园农奴制与欧洲中世纪非常相似,政府、寺庙、贵族(即“三大领主”)拥有绝大部分土地,土地分属各庄园,每个庄园都有世袭的农奴和奴隶。主人把土地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叫自营地,约占总数的一半至四分之三,其收益全部归领主。其余的土地叫差地或份地,分给农奴耕种,其受益全部归农奴。农奴对差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但可世袭使用权。作为使用差地的代价,农奴必需为主人支差(藏语叫“乌拉”,据说是元朝时从蒙古语变来的),分内差和外差两种。内差是无偿地为主人耕种自营地,包括种、肥、浇、收全过程。为了防止农奴偷懒、怠工,有的领主派人手执鞭子在地头监督。另外农奴还要为主人无偿地砍柴、割草、剪羊

毛、捻毛线、织氍毹、背水、修房、运输、炒青稞、放牛等等，同时还要交付一定的实物与货币。外差是为政府（宗政府与噶厦政府）支差，实际上是各种名目的税，既有实物、货币，也有劳役，其中最为沉重的是为过路官员提供食宿与驮畜，如无驮畜则用人背。据 1958 年对山南地区囊色林庄园的调查，农奴的负担中 86.2% 是内差，13.8% 是外差。劳役差占 93.8%，实物差占 4.4%，货币差占 1.8%；庄园总收益的 73% 归主人，27% 归农奴（6）。由于西藏自然条件十分严酷，农业单产很低，大多数农奴很穷。林田 1959 年去山南采访时写道：“在一次全庄园居民集会上，我们看到，在三百来个农奴中，不管男女老幼，找不出一个穿一件整装一点衣服的人，找不出一个不赤足的妇女，几乎全是衣服褴褛，半赤身露体。农奴们吃的东西，只是早晚各一顿糌粑糊糊，中午一小碗干糌粑而已。在军管会没有发放救济以前，一个中等差巴户阿旺家，几个月没有吃到盐。（7）”只有少数农奴份地较多，才比较富裕。此外还有奴隶（朗生），他们没有差地，没有财产，由主人供给吃穿，终身无偿为主人服役。奴隶因无财产，故无家庭，其非婚生子女也是奴隶。

此外，三大领主还用高利贷盘剥农奴。政府放债的利息是借十还十一，寺庙与贵族放债是借七还八，也有借五还六的，借债时还要送礼。据 1958 年调查，囊色林庄园的农奴 75% 是欠债户（8）。许多债变成了子孙债，世代还不清。债主采用抢东西、收份地、逼欠债者卖儿女为奴，甚至毒打等手段逼债。高利贷的弊病连达赖喇嘛都无法否认。他在自传里说他曾决定首先废除子承父债的原则，一笔勾销所有无法偿还的政府债（9），《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说达赖喇嘛曾建议把寺庙和贵族的土地由政府收回后分给农民，还新建了一个改良机构，可见连达赖喇嘛与“西藏流亡政府”也无法否认农奴制的不合理性。可惜达赖喇嘛的决定与建议始终不过是画饼而已（10）。戈伦夫说：“达赖喇嘛有负众望，他没有指出西藏的统治集团就是公开反对改革的势力，不管这些改革是由谁发起的，他们一概反对。从历史上看，贵族们一直反对企图破坏他们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的任何努力。（11）”

按照中共的政策，西藏当时的“贫苦农奴”占西藏人口的 70%，奴隶占 5%，两者是“最革命的阶级”；差地较多、生活较富裕的“中等农奴”占 20%，“革命性较差”；差地最多，并转租给其他农奴的“富裕农奴”占 1%，“革命性更差”，但他们都是革命的依靠力量。农奴主（三大领主）占 2%，代表农奴主管理庄园的农奴主代理人占 3%，后者自己“不劳动”（中共从来不把经营管理算作劳动），代表农奴主压迫、剥削农奴，因而也属于农奴主阶级，两者都是革命对象。

中共的民政政策如下：在农区，第一步，对叛乱领主及其代理人的土地实行“谁种谁收”；第二步，进行“三反”（反叛乱、反乌拉、反人身奴役）“双减”（减租、减息）；第三步，划定阶级，分配土地。对叛乱领主及其代理人的土地、牲畜、房屋、财物全部没收，平分给全体农奴、奴隶、农奴主及其代理人。对未叛乱领主及其代理人，由中国政府出钱把他们的生产资料（土地、牲畜）赎买下来，平分给所有人，赎金由政府分期分批付给，并请他们中的头面人物到政府、人大、政协去做官拿薪。在牧区，第一步，对叛乱领主及其代理人 and 叛乱牧主的牲畜实行“谁放牧归谁”；第二步，开展“三反”（反叛乱、反乌拉、反人身奴役）、“两利”（牧工牧主两利）。对未叛牧主不没收、不分畜、不斗争、不戴帽（不划阶级、不定成份）。在寺庙，第一步，清查叛乱分子；第二步，开展“三反”（反叛乱、反人身奴役、反封建特权）、“三算”（算政治迫害账、算等级压迫账、算经济剥削账）；第三步，成立寺庙“民主管理委员会”，由“贫苦喇嘛”当权，对被视作农奴主的“上层喇嘛”进行专政。唯对其中未叛乱而又拥护改革的头面人物则请其做官。

叛乱领主发放的高利贷一律作废。未叛领主 1958 年前放的旧债也一律作废，1959 年放的新债按每元月息一分计。所有债务抵押品一律退还。乌拉差（为政府支差）也全部废除。

其具体做法是：先由各级政府派出武装工作组到各庄园去发动农奴与奴隶，成立“农民协会”，作为新的政权机构；然后，举行一系列“吐苦水、挖穷根”斗争大会，控诉叛乱分子与农奴主压迫与剥削他们的“滔天罪行”。对未叛乱而又拥护改革的领主不当面斗争，只搞“背靠背斗争”（即在领主不在场的情况下开会控诉其罪恶）；对叛乱领主或虽未叛乱但抗拒改革的领主则当面斗争、扫其威风，逼其投降、交出财产（12）。这种斗争会往往以捆绑、殴打收场，有时还打死人（13）。

据统计，西藏全区贵族和大小头人共有 642 户，其中未参加叛乱的占 27%；农奴主代理人约 4000 户，其中未参加叛乱的占 70%；大小寺庙 2138 个，其中未参加叛乱的占 55%；共有僧尼 112605 人，其中未参加叛乱的占 40%。总计要赎买的未参加叛乱的农奴主的生产资料占三大领主的生产资料的三分之一左右，价值 6000 万元。赎金采取分期付款，五万元以下的八年付清，五万元至十万元的十年付清，十万元以上的 13 年付清。寺庙只保留 553 个，僧尼只保留约 7000 人，对于保留的寺庙也分给一定土地，政府还给予一定的补贴（14）。

农牧民有了自己的土地、牲畜与牧场，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1959 年西藏全区粮食总产量达到 182905 吨，比 1958 年增长 4.5%；1960 年达到 205934 吨，比 1959 年增长 12.6%；1960 年全区牲畜存栏头数 1060 多万，比 1959 年增长 10%。1965 年全区粮食达到 290700 吨，比 1958 年增长 66.1%；牲畜存栏头数 1701 万，比 1958 年增长 54.6%（15）。农牧业连续六年大丰收，这段时间被中共称为西藏的第一个“黄金时代”（16）。

注释：

（4）《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1995，97-112 页。

（5）以下关于农奴制的资料数字参见：Goldstein, Melvyn C.,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1991); Grenfeld, A. Tom, *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New York: M. E. Sharpe, 1996); 多杰才旦主编，《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中国藏学出版社，北京，1996 年；《藏族社会历史调查》，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1988 年。

（6）牙含章，《试论西藏封建农奴制度》，《中国藏学》，1988 年，第 1 期。

（7）林田，《西藏春潮》，中国藏学出版社，北京，1990 年，119 页。

（8）牙含章，《试论西藏封建农奴制度》，《中国藏学》，1988 年，第 1 期。

（9）Dalai Lama, *Freedom in Exile, the Autobiography of the Dalai Lama*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0), p.79.

（10）王贵，《西藏历史地位辩》，民族出版社，北京，1995 年，540-542 页。

（11）Grunfeld, A. Tom, *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New York: M. E. Sharpe, 1996), p.116.

（12）吴从众，《试述西藏的民主改革及其伟大意义》，《中国藏学》，1994 年，第 1 期。

(13) 林田,《西藏春潮》,中国藏学出版社,北京,1990年,173-175页。

(14)《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1995年,111-112页、140页。

(15)《当代中国的西藏》(上),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1991年,296、319页。

(16)多杰才旦,《毛泽东与西藏的伟大历史变革》,《中国藏学》,1994年,第1期。

### 3、扩大化与阴暗面

现在来看事情的另一面。中共也承认:“平叛民改后期产生了严重违反政策的现象,扩大了打击面,侵犯了同盟者的利益,以至基本群众的利益。(17)”可惜语焉不详。《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倒是说了一些,但都没有班禅1962年5月给周恩来的《关于西藏总的情况和具体情况以及西藏为主的藏族各地区的甘苦和今后希望要求的报告》(简称《七万言上书》,因其有七万汉字)(18)说得详细,其主要内容是:

一、“混淆好坏,乱打一气。”把受骗或被迫参加叛军的人、达赖喇嘛过路时向他顶礼膜拜并献过酥油和糌粑的人、为过路叛军提供过食宿的人、聚众唸经的人,以及什么也没有做的人都当作反革命分子来打击。1987年3月28日,班禅在全国人大西藏小组讨论会上说:“平叛问题在青海等地搞得更是糟糕。……果洛地区打死了许多人,把尸体从山上拖下来,挖个大坑埋在里面,把死者的亲属都叫来宣布:‘我们把叛匪消灭了,今天是喜庆的日子,你们在尸体坑上唱歌跳舞!’……又如青海的夏茸噶布和马利地区的牧民等早把头人的几千支枪收起来,上交到政府。当时表示欢迎,并开了大会表彰他们,并带上了红花。可是回到住地一下车就全部抓起来,长期关押。”“1958年我在青海听到党内文件上说要挑起叛乱,压出叛乱,然后在平叛过程中,彻底解决宗教和民族问题。”“噶厦政府发生叛乱,只有我们拉让(指扎什伦布寺---引者)管辖区域未叛,当初给我们讲了要和平改革、采取赎买政策等等一大堆。可是,后来正式民改的时候却把我们整得屁滚尿流,使人感到吃惊!地方政府方面跑的跑了,留下的只有少部分,这些少部分人作为进步人士的典型安排了(做官---引者),我们整个儿坚定不移在家的却弄得够呛。当时我个人在拉萨还好,在家的从我父亲开始一个个都挨斗。拉让有个官员的老婆也被拘留,有一天把她提来审讯,叫她交代问题,她说:‘班禅这个坏蛋可把我气坏了!’话一出口,大家以为她要揭发出班禅的什么罪大恶极的事,聚精会神地听她说话,搞记录的人也在伸脖子准备把揭发出来的问题一字不漏地记下来。她开口说:‘我们跟班禅这个坏蛋,不参加叛乱是个大错误。要是他带头发动叛乱就好了,先把汉人杀个痛快,然后跑出去,我们离印度近,方便多了。可他要我们做什么进步、爱国,现在可好,逃不到印度,男女老少都被关押挨斗,受活罪。’说到这里他们叫她‘滚!滚!’这是真情,不是我随便瞎说的呀!”“在家的不如外逃的,事实真是这样,我个人有体会。例如,1979年达赖五人代表团来藏时,我父亲也进藏为处理家里的财产问题,可是没人理他。对五人代表团一人一辆小车,配了翻译、警卫员、陪同等一套人马。可我父亲呢,出入自治区大门都很难,站岗不让进就在门外风中等候。论职位过去西藏只有两个‘公’,一个是达赖大师的大父,一个是我父亲的大父,论旧社会的职位,我父亲比他们高得多,何况是一个进步人士。”(19)

青海平叛确乎特别残酷。1981年3月19日中共青海省委给中共中央的《关于解决1958年平

叛斗争扩大化遗留问题的请示报告》(20) 承认：

党中央关于平叛的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平叛斗争是正义的，必要的。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在平息叛乱中是做出了贡献的。但在当时领导上“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犯了严重的扩大化错误。违背了“军事清剿、政治争取和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方针，过分强调军事打击，忽视了政治争取，甚至违背“四不”政策，将归降人员加以捕办，违反区别对待的政策，错捕、错关、错杀、错斗以及乱戴帽子、乱没收的问题甚为严重。脱离当时实际，照搬农业区的做法，在平叛的同时，强办公社，使情况更加复杂，错误更加扩大。对宗教、寺院中的敌情估计不当，看得过重，打击面过宽，把当地寺院基本摧毁光。当时全省以平叛、防叛名义共捕了 52922 人。捕人数目达到牧业区藏族蒙古族总人口的 10%。玉树藏族自治州的曲莱县没有发生过叛乱，而捕办人数竟高达总人口的 21%。由于大量捕人，监所人犯拥挤，条件恶劣，生活困苦，造成在押人犯成批死亡。经过复查，错捕错判和在集训中死亡的，有 23260 人。错杀了 173 人。在错捕错判死亡的人数中，有安置为县级以上的民族宗教中、上层人士 159 人，民族干部 480 人。平叛斗争的扩大化，混淆了敌我界线，造成了严重恶果，对藏族蒙古族人民的民族、宗教感情伤害很大，影响了党的威望和军队的信誉，对民族关系，乃至党群、干群、军民关系都有很大损伤。

遵照中央指示，在 1961 年青海省委三级干部会议和西北民族工作会议以后，对扩大化的错误进行了许多纠正工作，将在押人犯 24365 人宣布无罪释放或“教育释放”，平反了一批民族干部的冤假错案，恢复和新安置了 380 名民族宗教上层人士，恢复开放了 137 座寺院，重申了党的民族、统战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拨出了一笔专款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和解决生活困难。所有这些，对于扭转困难局面，团结群众，安定人民生活，恢复与发展生产，起了很好的作用。但是，当时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平叛斗争扩大化的问题没能彻底纠正，还遗留不少问题，许多善后工作没有很好去做，还有一批案件尚未复查。1964 年，随“民主革命补课和“四清”运动的开展，纠正平叛扩大化的工作就中断了。尤其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期间，由于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党的民族政策遭到破坏，民族统战工作被取消，民族区域自治有名无实，民族平等团结被践踏，不仅使原来纠正错误所取得的成果损失殆尽，而且使平叛斗争扩大化遗留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和复杂，致使这个历史遗留问题拖了 20 年未得解决。

1960 年中共西藏工委书记张经武向中共中央报告时也承认：昌都地区捕训的人占该地区总人口的 4.7% 弱。其中错捕的，占已捕的 5%，可捕可不捕的占已捕的 10-15%。那曲地区捕训的人占该专区已开展工作的地区人口的 4.4%，其中错捕的也不少。其他地区情况好些。现在昌都、那曲捕人已经停下来，各地正集中全力纠偏和清理积案。他还报告：各地普遍忽视上层统战工作，对有的未叛上层人士未安排工作（做官----引者），有的虽安排了，但不适当（官太小----引者）(21)。

毛泽东时代的中共，一贯越左越好。何况 1959 年毛发起“反右倾”运动，1960 年西藏工委把日喀则分工委书记、副书记、秘书长全部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22)，谁敢不左？西藏那么大，各地形势当然不可能一样。有的地方叛乱严重，有的地方叛乱不严重，有的地方未叛乱，有的地方本身未叛乱，但有叛军路过。叛乱严重的地方，平叛搞得轰轰烈烈，那里的共军共干就受到上司的嘉奖，就可陞官。其他地方如不轰轰烈烈，那里的共军共干就会受到批评，甚至被视为“右倾”，受到处分，至少不能得到嘉奖与陞官。这就促使后者想方设法发现、制造敌人。民改也一样，班禅那里未叛乱，本应和平改革，但是不斗人、不抓人，那算什么革命？日喀则分工委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罪名就是民改中“右倾”。为了轰轰烈烈、陞官受奖，只好对班禅集团开刀。毛泽东曾承认，中共搞运动有一种“穷汉捉虱子，越多越过瘾”

的阿 Q 式的习惯（23），阿 Q 就因自己衣服上捉到的虱子不如王胡多而失望、不平、愤慨，觉得大失体统。中共斗人、抓人、整人、打人也是越多越凶越好越有成勳。

从班禅的描述还可看出共干的势利和崇洋媚外。达赖喇嘛不过逃到了印度，他的代表团回藏就受到如此隆重的礼遇，似乎他们都成了高鼻子、蓝眼睛的洋大人。同时还可看出，班禅的等级观念是何等根深蒂固，至死念念不忘旧西藏时他（准确地说是他的前世）的特权与威风。他忘记了，他和他父亲在旧西藏时受到达赖集团的排斥，根本得不到承认，也根本进不了西藏，他和他父亲在旧西藏一天也没有威风过。是中共逼迫达赖喇嘛集团承认了他，又派兵护送他进藏即位，给他高官厚禄，让他和他父亲大耍威风。班禅的嫉妒心与攀比心完全用错了地方，说明他毫无自知之明。不过由此可见藏人的嫉妒心与攀比心何等强烈，连堂堂班禅大师也无法免俗。

二、“大汉族主义”。《七万言上书》说：有汉干说：“藏族是一个被宗教和民族自尊心陶醉了的顽固民族。”他们“以藏文新词不够为借口”，“忽视藏文”，“认为一切旧的都是落后的，肮脏的和无用的”，“嘲笑藏装”，“对妇女的手饰，男人的辫子表现出不喜欢的态度，致使无法继续穿戴和留下来；对屋墙外的粉刷（藏人爱在墙上刷佛徽---引者）、屋顶的旗杆（经幡----引者）、婚丧送礼、庙会敬神、节日娱乐和民间体育等也看做无益多余的，致使大部分停顿等”。“在藏族中也有一些滑头巧语、随机应变、私利熏心之辈，在大汉族主义者面前逢迎装相”。

三、“反对宗教”。《七万言上书》说：“在西藏的各寺庙内发动‘三反三算’运动时，在实际工作中增加了反对宗教本身，并将其放在了主要地位。”“对公开表示了信仰宗教的人，戴以迷信分子和不喜欢革命等各种帽子，进行无法忍受的没头没脑的斗争和打击。”“在深山禅庵与寺庙中有许多从事终生悟静修禅，严守教行的虔诚教徒，他们视红尘诸事为毒树，悲观厌世；由于革命事业也是红尘之事，所以他们很少有人对之表示欢迎或积极的态度，这是不足为奇的，是可能有的，正常的。但是干部则认为他们有顽固不化的反动思想的基础，把不少这类教徒予以管制或关押等。”“除去四大寺等被保护的极少数寺庙外.....一部分汉族干部出主意，藏族干部动员，积极分子中的不明事理的人充当执行者，盗用群众的名义或戴群众的面具，掀起了消灭佛像、佛经、佛塔等的滔天浪潮，把无数佛像、佛经、佛塔烧燬，抛入水中，扔在地上，拆毁和熔化，对寺庙、佛堂、玛尼堆、佛塔恣意进行了疯象闯入般的破坏，盗走了许多佛像饰品和佛像神塔体内的宝贵物品.....公然无忌地污辱宗教，把《大藏经》用于沤肥的原料，专门把许多佛像和经书用于制鞋原料等”。“千方百计地使僧尼还

俗”，“竟有让喇嘛站一边，尼姑和俗女站一边，强迫他们互相挑选”。“民改前西藏有大中小寺庙 2500 余座，而民改后由政府留下来的仅仅只有 70 多座，减少了 97%.....全西藏过去僧尼总数约有 11 万多人，其中外逃者可能有一万，剩余约十万人；民改结束后住寺僧尼权且算作有七千人，也减少了 93%。”（班禅这里所说的保留僧尼数与前引中共的数字相同，保留寺庙数与中共的数字大相径庭，不知是否计算有误？----引者）“把生产列为一切事情的首位，老少僧众和善僧都被支配劳动过度，由于那些人过去没有劳动过，而处于无法忍受的境地”，“宗教活动（班禅特地提到了灌顶----引者）少如白天的星星”。

四、饿死人。1959 年到 1961 年，“西藏连续三年获得丰收”，但“初步括了合作社风”。“由于党给予轻税的照顾，爱国公粮是不重的”，但由于浮夸风，把虚报的产量指标作为根据，征收爱国公粮，挖了过去的存粮，“致在西藏的一些地方发生了个别人饿死的情况”。甘肃与青海省委在大跃进中大括浮夸风、共产风，大办公共食堂，饿死了大批藏人（以及汉人及其他少数民族----引者）。



正如前引戈茨坦与戈伦夫指出的，西藏的宗教本与农奴制难分难舍、互为支柱，就像欧洲中世纪的天主教会与封建制难分难舍、互为支柱一样。中共要连根铲除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势必限制西藏的宗教，最大限度地削弱其影响。加以西藏的寺庙本身就是农奴主，拥有大批土地、牲畜和农奴，还放高利贷。中共要解放寺庙的农奴，也得向寺庙开刀。何况有许多寺庙参加了叛乱。班禅面对达赖集团的排斥打击，需要中共的支持，所以反对达赖集团的叛乱。但他作为大农奴主、大教主、藏族领袖，从根深蒂固的贵族、宗教、民族情绪出发，必然对平叛民改、限制宗教本能地抵触。何况中共干部在执行中层层加码，搀进了根深蒂固的大汉族主义（这是几乎所有的汉人都有的）与痞子习气（这是靠“打土豪、分田地”起家的共干特有的）。值得注意的是，从班禅的《七万言上书》也可看出，当时西藏有许多藏族干部与积极分子积极参与了捣毁佛像、佛经、佛塔的运动，开了文革初“破四旧”的先河。

1962年9月17日，中共中央指示：“这次班禅既然利用筹委会上层人士的学习会，向我们进行攻击，我们就需要在学习会上同他们进行斗争”；“斗争的原则仍然应该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以斗争求团结”（24）。

在同年同月24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大谈阶级斗争，先批彭德怀的八万言申诉信是“翻案”，无中生有地说他勾结全世界反华势力（美、苏）。又批班禅，说他的《七万言上书》是“阶级敌人反攻倒算”（25）。

不过毛并未马上惩罚班禅。据达赖自传说，班禅在1964年3月拉萨传召大法会上演讲时说：达赖喇嘛才是西藏人民的真正领袖，并高呼“达赖喇嘛万岁”（26）。这件事从未见中国出版物提起，推想起来也不大可能。自本世纪初起，达赖集团与班禅集团就形同水火，他怎会那样说呢？

1964年9月18日至11月4日，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举行第七次扩大会议，一些“翻身农奴代表”列席会议。会议集中火力批判班禅的“反人民、反祖国、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指责他组织了一个反革命集团，妄图复辟农奴制，还图谋叛国。列席会议的翻身农奴代表声泪俱下地控诉了他残酷压迫、剥削农奴的滔天罪行。然后，他被押送北京，在全国人大会议上被批判，并被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代主任的职务（27），从此被软禁。文革初，他被中央民族学院的藏族学生批斗。1966年我去北京大串连时，亲眼看到中央民族学院藏族学生召开的批斗大会与大字报，除了上述政治罪名外，还揭露班禅虐待、殴打家中保姆，喜欢男色等事。班禅被斗后不久就下狱，在秦城监狱里关了九年零八个月（28），直到1987年才重新露面。

我看到的班禅《七万言上书》虽然是达赖喇嘛的刊物《西藏通讯》发表的，但我相信它是真实的，不仅作为班禅的原文是真实的，原文所写的事也是真实的。但某些西方记者对平叛的描述则是一派胡言。美国记者艾夫唐说，拉萨平叛使一万人丧生，城里所有男性藏人几乎都被捕，中国人将几千具尸体堆在罗布林卡烧了三天，臭气熏天（29）。法国记者董尼德说，至少一万人死亡，中国人在罗布林卡焚烧尸体，布达拉宫变成残垣断壁，色拉寺被夷为平地（30）。当时拉萨只有二万多人口，加上外来的叛军，也不过三万多，怎么可能有一万人被杀？4月15日，中共在拉萨召开群众大会，拥护中国国务院3月28日发布的解散噶厦政府、责成解放军平叛的命令，有二万多藏人参加。如果拉萨的男性藏人都被捕了，这样的会开得起来吗（31）？我在八十年代初去布达拉宫和色拉寺参观过，发现那里完好如旧。又看过六十年代初摄制的电影记录片，发现那时布达拉宫仍巍然屹立。艾夫唐与董尼德当时并未去拉萨现场调查，这些

谎言显然都是从达赖喇嘛那里批发来的（他们都采访过达赖喇嘛）。

注释：

（17）江平，《论慎重稳进方针》，《中国藏学》，1988年第1期。

（18）《西藏通讯》，1996年11-12月号，1997年1-2月号，1997年3-4月号。

（19）《班禅在人代会上谈平叛》，《西藏通讯》，1997年3-4月号。

（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汇编》(下)，人民出版社，北京，959-964页。

（21）（22）《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1995年，130页、124页。

（23）毛泽东此话从未正式发表，见文革中红卫兵印发的毛泽东文稿《毛泽东思想万岁》。

（24）《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1995年，145-146页。

（25）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时报出版公司，台北，1994年，381页。

（26）Dalai Lama, *Freedom in Exile, the Autobiography of the Dalai Lama*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0), p.233.

（27）《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1995年，158页。

（28）《阿沛和班禅就西藏问题答记者问》，《人民日报》，1988年4月5日。

（29）Avedon, John F., *In Exile From the Land of Snow* (U.K.: Michael Joseph Ltd, 1984): 艾夫唐，《雪域境外流亡记》，尹建新译，财团法人台北市慧炬出版社，1991年，240-241页。

（30）董尼德(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与死》(Tibet mort ou vif)，苏瑛宪译，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台北，1994年，66-68页。

（31）《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1995年，第100页；我也看过有关的电影记录片。

## 4、中共消灭了 120 万藏人吗？

达赖喇嘛从 1991 年起一贯反复声称：中共消灭了 120 万藏人(32)。“西藏流亡政府”还在《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里开列了明细表(时间范围是 1949 年到 1979 年)：

死亡原因	卫藏	康区	安多	总计
------	----	----	----	----

狱中折磨	93560	64877	14784	173221
被枪决	28267	32266	96225	156758
死于战场	143253	240410	49042	432705
死于飢饿	131072	89916	121980	342970
被逼自杀	3375	3952	1675	9002
批斗致死	27951	48840	15940	92731
总计	427478	480261	299648	1207387

据“西藏流亡政府”解释，这里的“卫藏”指西藏自治区中西部，“康区”指西藏自治区的昌都地区、四川西部、甘肃南部和云南北部，“安多”大致指青海省（33）。

中共在 30 年里杀死、斗死、逼死、关死、饿死了 120 万藏人，这确实是骇人听闻的罪行。这个数字经西方媒体大量引用，在西方激起了公愤，有人甚至把它与希特勒杀犹太人相提并论（34），无怪乎西方人几乎一边倒地同情达赖喇嘛与西藏独立。然而当我把中共统治下的藏族人口增长速度与同期中国人口增长速度加以比较时，却产生了怀疑。

据 1950 年 11 月 3 日噶厦政府要求联合国“制止中国侵略”的呼吁信称，当时藏族人口不足三百万（其原文是：a weak and peace loving people, hardly exceeding 3 million）（35）。这个数字不可能是当时噶厦政府实际控制区（大致上相当于今日的西藏自治区）的人口数字，而是当时全体藏族的人口数字。当时噶厦政府实际控制区的人口据戈茨坦说是“至少一百万”（这个数字包括昌都地区）（36），据国民党政府内务部 1947 年估计是一百万（37），据噶厦政府自己 1953 年上报中国政府的数字是一百万（这个数字不包括昌都地区）（38）。到了 1987 年 9 月 21 日，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人权委员会演讲时称藏族人口六百万（39）。由此可见，藏族人口在中共统治的头 37 年中翻了一番还多。

又据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报告《生存与发展》，中国人口 1949 年为 5.4 亿，1987 年为 10.8 亿，从 1949 年到 1987 年自然增长率年均 1.834%（40）。由此推算出 1986 年中国人口为 10.6 亿，可见中国人口在中共统治的头 37 年中只增长了 96%，比藏族人口同期增长率低了至少四个百分点。

中共 1949 年建政以后消灭（杀死、斗死、逼死、关死、饿死）了多少中国人（绝大多数为汉人）？丁抒研究大飢荒的专著《人祸----“大跃进”与大飢荒》根据中国政府近年来公布的六十年代的人口统计数字估算，三年大飢荒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至少 3500 万人，很可能与 4000 万“相去不远”（41）。丛进的《曲折发展的岁月》说：“1959 年至 1961 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的人口数，在 4000 万人左右。”金辉说：“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 4040 万。”又据《历史不再徘徊》估计：“低限值也在 4000 万人”（42）。我现在假设在中共统治下共饿死 4500 万人。被中共杀死、斗死、逼死、关死的人数没有可靠的统计。据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时估计，文革中各种形式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约 200 万（43）。文革是中共残

害人民最大最久的一次运动，几乎家家有人挨整，毛泽东统治中国 27 年，文革就占了十年。中共杀人第二多的运动当数五十年代初与土改同时进行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据劳改专家吴弘达考证，由毛泽东起草的以中共中央名义于 1951 年 5 月 16 日签发的《中共中央关于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的通知》以及这次会议的文件说：“关于杀反革命的数字，必须控制在一定比例以内，在农村中，一般不应超过人口的千分之一。……在城市中杀反革命，一般应低于人口的千分之一，以千分之零点五为适宜。”吴根据当时中国人口（5 亿多），推算出实际杀人数在 50 万到 100 万（44），我取 100 万。在镇反运动中有更多的人被判刑，其中许多人死于劳改，还有许多人（包括其家属）自杀，假设也有 100 万，则镇反死了 200 万人。中共整人第三多的运动是 1957 年的反右运动，共打了 55 万右派，加上准右派，共约 100 万人（45）。名义上对右派不开杀戒，但许多人（包括其家属）自杀，许多人死于劳改、劳教或其他形式的折磨，假设有 50 万人死于非命。此外还有“三反五反”、“反右倾”、“六四”等运动，假设也死了 50 万人，则共计 500 万人。我现在将这个数翻一番，即中共杀、逼、关死了 1000 万人，加上饿死的 4500 万，就是 5500 万。

由此可见，中国人口在失去其 1949 年基数的 10%（5.5 千万比 5.4 亿）的情况下，在中共统治的头 37 年中增加了 96%；而藏族人口在失去其 1951 年基数的 40% 强（120 万比不足 300 万）的情况下，在头 37 年中增加了至少 100%。由此可以近似地算出，在中共统治的头 37 年中，中国人口实际增加了 1.19 倍，即从 4.85 亿（5.4 亿--0.55 亿）增加到 10.6 亿；而藏族人口实际增加了 2.33 倍，即从 180 万（300 万--120 万）增加到 600 万。换言之，在中共统治的头 37 年中，藏族人口的实际增长率是中国人口的实际增长率的 1.96 倍，几乎高了整整一倍。无论从世界人口史看，还是从医学上、生理上看，这都是惊人的奇迹。（按中国人口包括藏族人口，但藏族人口仅占中国人口的 0.5%，所以藏族人口增长率对中国人口增长率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如将藏族由于自然条件特别严酷因而在历史上人均寿命就比汉族短得多（见第一章引戈伦夫的话）的因素考虑进去，这个奇迹就更加惊人。

对于这个奇迹，可能的解释只有两个：要么是中共在消灭了 120 万藏人以后，给予剩下的藏人以极其优厚的生活、医疗条件，使他们能以两倍于汉人的速度高速增长，想必达赖喇嘛都不会接受这样的解释；要么是中共并未消灭那么多藏人，所以藏人能以高于中国人口平均增长率的速度增长，这也证明中共对藏族的迫害还不如对汉族的迫害严重。

1998 年 5 月 3 日我在纽约“《天葬》讨论会”上说了上述意思，当时在场的藏独人士阿沛晋美后来说：“按人口比例来算，这个数据（指中共消灭了 120 万藏人----引者）太高了，我对这个数字始终是有保留的。我个人估计，整个藏区----包括西藏三地区（即“大西藏”----引者），大概有三、四十万人（被中共消灭----引者）。（46）”

那么中共究竟消灭了多少藏人呢？估计应低于被中共消灭的 1949 年中国人口基数的比例（10%），所以藏人在中共统治下仍然能以高于中国人口平均增长率的速度增长。既然 1950 年底藏族人口“不足 300 万”，那么被中共消灭的藏人应不足 30 万。考虑到藏人由于自然原因在历史上寿命就比汉人短得多，估计此数低于 20 万。当然中共杀死（其中大部分当死于平叛战场）、斗死、逼死、关死、饿死不足 20 万藏人也是滔天罪行。须知据张荫棠估算，西藏人口自乾隆初年到光绪年间的 170 余年内，也只减少了 80 万（47）。不过不足 20 万离达赖喇嘛所说的 120 万究竟相去甚远。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难道为了西藏独立，可以违背佛教的“妄语戒”，将事实夸大五倍以上？无怪乎戈茨坦认为，达赖喇嘛对于中国在西藏“侵犯人权”与“种族绝灭”的攻击“常常夸大其辞，远离事实”（48）。

我在 1953 年 3 月号《北京之春》上对“中共消灭了 120 万藏人”提出质疑（49）后，有个汉族女人在 1998 年 3 月 15 日当面向达赖喇嘛转达了我的疑问，她说：“另外一汉人对西藏流亡政府说的中共统治西藏以来有一百多万藏人遭到杀害这个数字表示怀疑。”达赖喇嘛回答道：

关于有 120 万藏人遭杀害的说法，这里有两个前提，第一是这些人不完全是在战场上打死的；第二，不是说某一个年限，比如说某一年杀死了一百多万人。

这个数字是从中国军队进入西藏，1983 年以前，这一期间，由于中国人进入的原因而死亡的藏人人口数字。这个数字中包括战死的可能有 20 万人左右，还有许多人死在狱中，比如说达赖喇嘛的医生，他被关进监狱时，一同被关押的大约百余人，活着回来的不过十几人而已，其他很多人是饿死的。由于飢荒，安多那一片大约是在 1959 年期间发生大飢荒，大批的藏人饿死，今天所谓的“西藏自治区”是在 1966 年、1967 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有大批的人饿死，像这样的情况一直到 1983 年、84 年为止。还有许多人是经受不起侮辱虐待，自杀了。

我们通过调查，是很多人来报告，说我们地区有多少村庄、多少家庭，有多少多少人死了，他们是怎么死的。我们收到很多材料和数字，把这些数字统计起来，就形成了这种大约有 120 万西藏人死去的推算。这是中国人进入西藏以后，到 1983 年为止，这几十年来，由于各种受迫害的原因死去的人口统计数字。

我们西藏流亡政府在这本书里有有关的统计数字，可能上报来的统计数字有一些重叠，例如某一件事情，有两个人来报告，因此重叠了。像这样的事情是技术性的，难免的（50）。

达赖喇嘛说“中共消灭 120 万藏人”的时间范围是中共进藏到 1983 年，而“西藏流亡政府”发布的《用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却说其时间范围是 1949 年到 1979 年，我们应该相信哪一个呢？不管时间范围如何，“中共消灭 120 万藏人”都是弥天大谎。时至今日，达赖喇嘛仍然罔顾妄语戒，坚持这样的弥天大谎。这也难怪，他作为“人权斗士”的世界声誉就是建立在“中国消灭了 120 万藏人”等弥天大谎之上的。如果他承认这是谎言，他就会在全世界面前声誉扫地。

如前所述，西藏的叛乱起因于中共企图废除农奴制、解放农奴与奴隶、实行孙中山说的“耕者有其田”。这本是与法国大革命、林肯解放黑奴、麦克阿瑟二战后在日本进行的土地改革及蒋介石在台湾进行的土地改革一样合乎历史潮流、尊重人权、申张正义、实现社会公正的行为。不幸的是，中共一开始就在西藏外围采用了法国革命式的暴力方式，从而激起了美国南方奴隶主式的叛乱。在平叛民政中，中共又滥杀、滥关、滥斗无辜或不该杀、关、斗的人，同时又企图消灭客观上确实与叛乱及农奴制纠缠在一起的、但被藏人包括农奴与奴隶视为命根子的喇嘛教，这就是李泽厚所说的“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的二律背反问题”（51）。中共的平叛民政本是为了把最基本的人权——人身自由交还给农奴和奴隶，结果侵犯了农奴主、喇嘛和部分受农奴主蒙蔽、胁迫或完全无辜的农奴与奴隶的人权，这真是个难解的怪圈与悖论。然而法国大革命与美国南北战争不也杀死了许多王室成员(包括国王与王后)、贵族、保王党人、教士、革命党人、市民、奴隶主以及受其蒙蔽、胁迫或完全无辜的平民、农奴与奴隶吗？“历史本就在这种悲剧性矛盾中行进”（52）。

撇开手段，单看结果，平叛民政至少做了两件好事：一是给农奴与奴隶以人身自由，这是比思想、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示威自由更为基本的人权；二是在西藏做到了耕（牧）者有其地（牧场与畜生），从而不仅实现了社会公正，还解放了生产力。旧西藏的农奴制使农奴没有任何生产积极性，他们在主人的自营地上怠工偷懒，甚至故意破坏；或者大量

逃亡，致使部分庄园土地荒芜、无人耕种。而老实耕种的农奴则不堪重负，未老先死。阿沛阿旺晋美说：“记得在四十年代，我同一些知心朋友曾多次交谈过西藏旧社会的危机。大家均认为照老样子下去，用不了多久，农奴死光了，贵族也活不成，整个社会就将毁灭。因此，民主改革不仅解放了农奴，解放了生产力，同时也拯救了整个西藏。（53）”连艾夫唐也不得不承认：“叛乱后的最初几年，农业生产大幅度提高。（54）”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天天都在攻击中共，但他们从来不敢攻击废除农奴制、解放农奴与土地改革本身；反而假惺惺地标榜他们本来也打算作这样的改革，可见中共的改革确实是合乎历史潮流的事情。

林田 1959 年去山南采访时，亲眼看到农奴与奴隶“翻身”的景像。他在日记里写道：

六月十日

凯松谿卡（“谿卡”是藏语“庄园”的译音——引者）今天举行斗争叛乱分子、地方恶霸的群众大会。从早上起，谿卡的大门里，双行道的楼梯上，人来人往，进进出出。本谿卡和外谿卡的农协筹委会委员，赤脚的妇女，戴破呢帽的男人，头发蓬乱、满脸黑胡须的老农奴都来了。中午，男女老幼集合在庄宅前的树荫下，大会开始了。当了叛匪小头目的谿堆（谿卡经理——引者）、索康（噶厦政府的首脑，已逃亡——引者）在凯松谿卡的代理人逃跑了。现在，跟着谿堆作了许多坏事的根保（谿卡小头目——引者）和小恶霸平措占堆被带到了会场前，面对大家垂头站立。尼玛次仁，那个从八岁起就给扎西家当差徭的小伙子，新当选的农协筹委会主任，今天第一次穿上了皮靴子，脸也洗得干干净净，站在一张满是油泥的小桌子前讲话了：“诸位乡亲们，现在大会开始了。过去，贵族索康、谿堆、根保、坏人坐在上面，把我们踩在下面，剥削、压迫了我们多少年，最后发动了叛乱，阻挡我们翻身。现在，中央政府和解放军帮助我们把他们打垮了，赶走了，消灭了。我们从地下站起来啦！我们第一次举行这样的大会，斗争坏人。……”接着他历数根保和平措占堆跟着谿堆干坏事的罪行，然后说：“我们的苦，像河水一样，不知流了多少年，今天还在流，今天，我们要把苦水倒出来！”

尼玛次仁一讲完，乌金又走上来，说：“今天我们开大会，就是要本着天下一家人的精神斗争这两个坏蛋，过去我们有苦有冤不敢说，今天剥削阶级灭亡了，以前被他们当成地下虫子的人，现在得到了自由……。平措占堆、根保作了许多坏事。以前他们跟着谿堆打人骂人，叛匪占据时，帮助叛匪抢东西。叛匪逃跑时，他们帮助叛匪把炮弹箱子藏在草里。把谿卡仓库里的贵重东西、粮食偷运到自己家里，那都是我们的血汗啊！……”

一个老妈妈站起来揭发：他们还藏了许多枪，勾结反动派，准备让反动派打回来。

一个名叫白干的青年站起来，呼呼喘气，说不清话，断断续续地说：我被他们打得说话不行了。我和姐姐从地里回来，拾了他田里的一穗庄稼，他就把我和姐姐毒打一顿。

一个蓬头垢面的小姑娘站起来就呜呜哭了。她是十三岁的孤儿白玛玉珍。父亲是个穷差巴，她很小时父亲出差病死在外边，妈妈背。她支差种地。一次妈妈割草时，和领主的狗腿子平措占堆吵起来，这恶霸就把她妈妈打得死去活来，妈妈流着鲜血爬回家来，第二天就死了，临产的孩子也死在肚子里了。白玛声泪俱下地哭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婆婆，瞪直了眼睛，泪水顺着枯瘦的脸向下流，她张开两手，呛地呼天：“我请共产党、人民政府、诸位乡亲们替我们作主，……我的两个外孙女，可怜的孩子，没有妈妈了，她们的妈妈被野兽吃掉了！这些野兽就是索康，就是勾结叛匪的谿堆和他的狗腿子平措占堆……。”全场男女老幼都哭了。这老婆婆就是小白玛的外婆，她说出了农奴们的共同遭遇。悲愤的呼声像春雷一样响了起来：“打

倒万恶的奴隶制度！”“消灭剥削压迫！”

本来会前已经讲好，斗争大会上只动口，不动手，还规定了不准带铁器和棍棒。

谁知乌金听着听着，走到前边，突然从怀里掏出一根短棒，朝半跪半坐的平措占堆背上打去。这个高个子麻子恶霸挨了这一下，就势向前一倒，碰得鼻破血流。这样一来，原来愤怒的群众，有些却一下子转为可怜起这小恶霸来了。这小恶霸家里的一个小朗生，一个脸像小黑鬼、衣服破成条的小姑娘，平日不知挨了主人多少毒打，现在却哇哇哭，为主人求情了。但也有人为乌金助威：“打得好！打得好！”

尼玛次仁把乌金拉到一边。请大家继续控诉参加叛乱的反动领主及其代理人的罪行。怒潮继续在会场上激荡。

八月五日

今天凯松谿卡农民举行庆祝民主改革胜利大会。……庆祝大会开始了，三十多个小学生，穿花衣，戴金丝帽，拿着花束、树枝，准备跳舞的妇女，也穿起了红绿绸衫、新靴子，笑容满面，他们多半是朗生，今天要尽情欢乐。其余男男女女坐了一大片，在帐篷荫凉下。

阿旺讲话了，这个穷差巴，九个孩子，老婆多病，经常一家人饿肚子，现在，有政府帮着，不愁吃穿了，差地属于自己了，一切负担废除了，从心底里乐。两个月来，他作为农会副主任，领导全村农民大闹翻身。今天，他穿着新的氍毹衣、皮靴子，端端正正站在台前，他说：今天，我们已经得到很大胜利，让我们尽情庆祝。每到这个时候，正是“望果节”（丰收节），可是往年望果节，正是我们绝炊断粮，望着庄稼愁交租完债的时候，今天，我们在这个帐篷里，穿着这样的新衣服，心里这样痛快，这是过去不曾有过的。这都是共产党领导我们得到的。

群众代表次旺扎西讲话了。他分地那天，站在油菜田里只是笑。今天他说：以前我们连手指大一块地也没有，如今每家分了十几、二十几或三十多克地，没有牲口，分了驴马，没有家俱，分了家俱，为啥不心花怒放呀！……

拉珠讲话了，这位满脸胡须的六十岁的老人，说：“共产党领导我们翻身胜利了，我这老头子来祝大家：‘扎西得来平桑错！’（吉祥如意）。在旧社会，拿我来说，几岁作差徭到十五岁，领主给我一块差地，可是我出比这块地还大还重的差。又压上一大笔债，大家知道，这债不是我欠的。

“藏政府也好，贵族活佛也好，他们的肚子是填不满的，百姓多少东西也填不满他们的肚子。

“我们在草地上放个马，他们说草地是他们的；我们在树林里拾个柴棍，说树林是他们的；我们走的路也是他们的。现在，我们走在路上，再不必向他们弯腰吐舌了（藏人表示恭敬的习惯行动——引者），遇见贵族老爷，我们可以大摇大摆从他们身旁走过了。土地、森林、道路，一切都是我们人民的了！

“乌拉废除了，差役取消了，朗生解放了，土地分给大家了，债契烧掉了，西藏地方旧政府千百年来压在我们身上的重担，新政府成立两个月就全卸掉了，这都是共产党给的，我们要在党领导下，团结得紧紧的啊！有今天，是不容易的，而明天，更要我们努力，只有团结才能

保住果实，建设新生活。”这老人讲得多好啊！

分工委王运祥书记讲话祝贺。他告诉农民三件事千万记牢。第一，要跟党走；第二，要团结；第三，要警惕反动的阶级敌人，保住果实，发展生产。

大家向毛主席像和分工委二位书记献了哈达。

歌舞开始了（55）。

可能是经过了翻译加工（由藏语翻成汉语），这些藏农的话都有党八股的味道。不过还是可以看出，西藏的翻身农奴对毛泽东和共产党是衷心感激、真心拥护的。因为后者确实在那时给了他们做人的尊严和切身的利益，即便是达赖喇嘛以来世天堂的名义也无法叫他们放弃毛与中共给他们的尊严与利益。这就是为什么西藏的老翻身农奴会对我说：“毛主席的恩情是永远不能忘记的。”“打土豪，分田地”本是中共赢得汉农支持、打败蒋介石的法宝，用在西藏也同样成功。蒋介石因而吸取教训，亡羊补牢，在台湾进行土地改革。又因他手里有日本人留下的企业，使他有资本赎买地主的土地，实行和平土改。蒋介石死后，台湾的老农披麻带孝，跪在路旁给他送灵。毛死后，西藏的翻身农奴也痛哭流涕。假如中共当初在西康、青海藏区不急于土改，或一开始就在那里实行赎买土改，西藏叛乱是否能够避免呢？中共平叛虽然合法（国际法），但后遗症极其严重。特别是让达赖喇嘛逃亡印度，从而使西藏问题再度国际化，这是毛泽东的头号失策。他只知道马列主义、阶级斗争和孔孟之道，根本不懂文化心理学、藏人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过于低估了西藏宗教的影响，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威力。他从来不曾想到，翻身农奴的感恩心理并不能遗传给新一代藏人；他那套穷共产主义的经济模式会导致身后的改革开放、崇洋媚外；达赖喇嘛会借助于洋人的威力重新在西藏发动骚乱（不拿枪的叛乱）。如果毛一开始就对全体藏族农奴主实行赎买土改，也许叛乱就不会发生，达赖喇嘛就不会外逃，西藏问题就不会国际化；如果毛在平叛民改后把经济搞得很成功，以致中国毋需改革开放、崇洋媚外、仰人鼻息（这是穷国对富国开放的必然结果），那么达赖喇嘛在外面也就无隙可趁。他想不到的事情太多了……

注释：

（32）"Address of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of Tibet in Yale University, October 9, 1991", Congressional Ceremony to Welcome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of Tibet,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2).

（33）见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出版的《西藏通讯》每期末页。

（34）《西藏问题的死结和东西经济差使民族问题恶化》，《中国之春》，1995年3月号。

（35）该信全文见：Goldstein, Melvyn C.,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1991), pp.746-747；他是从英国外交档案里抄来的，其档案编号为：FO 371/84455, Copy of UN file A/1658. original English version of Tibetan appeal, dated 11 December 1950。

（36）同上书，p.6。



- (37) Grunfeld, A. Tom, *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New York: M. E. Sharpe, 1996), p.250.
- (38) 马戎,《西藏的人口与社会》,同心出版社,北京,1996年,33页。
- (39) "Address by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of Tibet to the U.S. Congressional Human Rights Caucus, September 21, 1987", Congressional Ceremony to Welcome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of Tibet,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2).
- (40) 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生存与发展》,科学出版社,北京,1989年,15页。
- (41) 丁抒,《人祸---“大跃进”与大飢荒》,九十年代杂志社,香港,1996年增订再版,1997年7月修订本第2次印刷,7、374页。
- (42) 丛进,《1949-1989年的中国》第2卷《曲折发展的岁月》,272页---转引自丁抒,《人祸---“大跃进”与大飢荒》,7页;金辉,《“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社会》,上海大学社会学系,1993年4-5合期;《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出版社,1996年---转引自胡平,《社会稳定与个人权利》,《北京之春》,1998年8月号。
- (43) 赵淮海,《也谈文革》,《中国之春》,1993年1月号。
- (44) 吴弘达,《镇压反革命分子,中共按比例杀人》,《世界周刊》,1997年10月26日。
- (45) 许良英,《关于反右运动的片断回忆和思考》,《北京之春》,1997年8月号。
- (46) 安琪,《西藏人有民族自决的权利---专访自由亚洲电台西藏部主任阿沛晋美》,《北京之春》,1999年1月号。
- (47) 洪涤尘,《西藏史地大纲》,正中书局,南京,1936年,42页。
- (48) Goldstein, Melvyn C.,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p.72-73.
- (49) 徐明旭,《藏独是民主的末日》,《北京之春》,1995年3月号。
- (50) 茉莉,《达赖喇嘛访谈录》,《北京之春》,1998年5月号。
- (51) (52)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北京,1986年,325页、326页。
- (53) 阿沛阿旺晋美,《西藏历史发展的伟大转折》,《中国藏学》,1991年,第1期。
- (54) Avedon, John F., *In Exile From the Land of Snows* (U.K.: Michael Joseph Ltd., 1984): 艾夫唐,《雪域境外流亡记》,尹建新译,财团法人台北市慧炬出版社,1991年,256页。
- (55) 林田,《西藏春潮》,中国藏学出版社,北京,1990年,40-43页、84-86页。

## 5、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使平叛民改这场以道德代价换取历史进步的悲剧变成了闹剧。文革既是毛泽东利用、愚弄人民打击、清除政敌，从而导致中共内部疯狂地争权夺利、自相残杀的丑剧；也是毛煽动、愚弄人民残害精英、毁灭中西精英文化的闹剧（56）；更是毛残酷迫害、镇压人民其中包括被他利用、煽动、愚弄过的人，强化其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悲剧。全面论述西藏的文革过程，特别是其中令人眼花缭乱的派别斗争，不是本书的任务，那可以写一本与本书一样厚的书。本书只能作一简述，. 重讨论与西藏问题有关的事件。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首次接见红卫兵后，北京红卫兵掀起“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高潮，中央民族学院的藏族红卫兵先斗班禅，然后杀回西藏。在他们以及陕西咸阳西藏民族学院藏族红卫兵的鼓动下，藏人捣毁了除布达拉宫等八个著名寺庙以外的所有寺庙（那八个寺庙未毁是因为中共派兵保护）（57），连扎什伦布寺里历代班禅灵塔内的木乃伊也被藏人扔出来喂狗（这是我八十年代初去参观时听当地藏人说的，不过扎什伦布寺的建筑与世界最高的铜佛----强巴佛却完好如旧）。所有“阶级敌人”---贵族、噶厦官员、活佛、叛匪及其家属都再次遭到批斗、游街、抄家、示众、殴打、侮辱；所有僧尼都遭到批斗、污辱，被迫还俗；所有民间佛教用品----玛尼堆、经书、经幡、佛龛、佛像等也几乎全部被捣毁；所有宗教活动都被禁止；连类而及，所有民间节日、歌舞、艺术（包括说唱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民族手工艺品生产）、甚至集市贸易也全部被取缔；在城镇里，连藏装也几乎绝迹，代之以中山装与军便装（这都是我在西藏时听过来人说的）。

不过我对艾夫唐大肆宣扬的红卫兵强奸藏女的说法深感怀疑。他说：

早在1966年8月就出现了轮奸。红卫兵将扎木四百户藏人的女孩脱得一丝不褂，在外周游，开斗争会，最后将她们全奸污了。.....1966年至1967年冬季，革命造反派来到拉萨北面的那曲，在这里他们对大批游牧民也犯下了类似暴行。.....妇女们全身脱得精光，五花大绑站在结冰的湖面上，还有人看守。一位名叫卡玛夏拉的男牧民和他的女儿次仁卓玛被迫当众发生关系。在山南各地区也发生了相类似的暴行，.....日喀则的强奸和打人事件更多（58）。

众所周知，文革是一场以禁欲主义为特色的运动。文革初汉族红卫兵曾把裙子、紧身裤当作“四旧”来破除，因其有性感之嫌；凡是有过“男女问题”的人都被当作“坏分子”批斗、游街；所有裸体或半裸体的绘画与雕塑、描写爱情的小说与电影、性医学著作都被当作“资产阶级腐朽文化”而烧燬或禁止。北京红卫兵在“红八月”（1966年8月）里打死了数千“牛鬼蛇神”，却未听说过强奸或当众脱光妇女衣服的事件。在那时汉族红卫兵的心里，所有涉及性或色的语言、行为、乃至恋爱都是十恶不赦的罪行，他们怎么可能跑到西藏去当众脱光几百妇女并集体轮奸呢？即便是中央民族学院的藏族红卫兵也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所以这类事即便有，也是藏族流氓干的。

早在1966年6月1日毛泽东下令广播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后，西藏的干部职工就纷纷给领导贴大字报，并与“保皇派”（拥护领导的群众）展开激烈的辩论。随着全国形势的发展，被攻击的干部的级别越来越高。自治区党委为了“舍车保帅”，也不断抛出级别越来越高的干部供群众批斗，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兼《西藏日报》总编金沙、自治区党委常委惠毅然、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郭锡兰等。11月初，北京几所大学和西藏民族学院的红卫兵在拉萨贴出大字报，攻击以张国华为首的自治区党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967年1月，在上海“一月风暴”

的影响与中央文革的鼓动下，西藏造反派纷纷在各厅局夺权。2月5日，造反派“拉萨革命造反总部”（简称“造总”或“老造”）夺了自治区党委与政府的权，把各级汉藏干部斗得威风扫地，还要揪斗军区司令兼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张国华。可能是毛泽东的意思，2月24日“中央文革”来电说：“张国华同志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尽管他在工作上有缺点和错误，但基本上是个好同志。”（张国华抱病指挥了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并获大胜，毛因而对他高抬贵手、另眼相看）2月底，中央决定由西藏军区接管西藏自治区党委与政府的权力。刚好全国各地军头发动了“二月镇反（革命分子）”运动，张国华随即反击。他在3月（西藏的事总是比全国慢半拍）以“镇压反革命”为由，逮捕了“造总”的头头，夺回了被造反派夺去的各单位的权。他的行动得到了“西藏自治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造反总指挥部”（简称“大联指”，又称“老大”）的支持，该组织被“造总”称为“老保”（保守派）。3月，中央文革发起反击“二月逆流”的运动。4月，大批北京造反派红卫兵进入西藏，给“造总”翻案（又慢半拍）。5月，中央下令对西藏军管。几乎同时，张国华陞任成都军区第一政委，主持蜀政，不久出任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林彪嫡系曾雍雅调任西藏军区政委，曾给“造总”平反，引起支持“大联指”的军区副政委任荣的不满。从此“造总”和“大联指”各有后台，不断斗争，从文斗发展成武斗，使西藏陷入极度混乱之中。必需指出，西藏两派中都有汉人藏人，他们之间的斗争并非是汉藏矛盾引起的。双方都指责对方受达赖特务控制，并到处大抓达赖特务。文革中在拉萨从未出现过以宗教、民族为诉求的骚乱。倒是1969年，丁青、边坝、尼木、比如等县出现过以宗教、民族为旗号的暴动，打、杀解放军和干部，很快遭到镇压（59）。

1968年9月5日，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他们是中国大陆29个省、市、自治区中最后成立革命委员会的两个。西藏革委会先由曾雍雅任主任，1970年12月，随着林彪失势，曾被调走、降职，由任荣接替（60）。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办了几件大事：

第一，制造敌人。以“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名义迫害汉藏干部、职工、市民与部分农牧民。除了“反革命”、“农奴主”、“叛匪”、“上层喇嘛”等老罪名外，增加了“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达赖特务”等新罪名，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又以“补民主革命课”为名，在农区推翻民改时不划富农的政策，补划“富农”；在牧区推翻民改时不公开划阶级的政策，补划“牧主”、“富牧”等，使农牧区的“阶级敌人”比例由民改时规定的5%上升到7-8%；在城镇则推翻民改时不划资本家的政策，补划出206户商业、房产、手工业“资本家”，制造出一大批新的“阶级敌人”（61）。

第二，人民公社化。以“社会主义改造”为名，剥夺农牧民在平叛民改中分到的土地、牲畜。早在1960年，西藏的干部就迫不及待地要办合作社，当时中共中央还比较冷静，指示西藏五年内不办合作社，让藏农牧尝到民改的甜头。1965年起，西藏开始试办初级合作社，冠以人民公社的名称。1970年12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批示“照办”的《关于西藏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指示》，要求西藏“实现人民公社化”。西藏自治区革委会雷厉风行，用强力突击成立人民公社。由于阻力重重，直至1974年10月，才在西藏95%的乡办起了人民公社（62）。

人民公社号称“一大二公”，把民改时分给翻身农奴的大部分土地与牲畜收归社有，只给社员留下少量自留地与自留畜。社员们在集体地里消极怠工，就像农奴制时代在领主的自营地里消极怠工一样。人民公社又号称“政社合一”，既是生产企业，又是政权机关，不仅有财权，还有司法权，也很像农奴制时代的庄园。有人说人民公社是新的农奴制，确有一定道理。不过集体地的收成毕竟要以“工分”的形式分配给社员，不像农奴制时代的“自营地”的收成全部归领主；社队干部毕竟不能随便打骂社员，不能干涉或禁止社员的婚姻，不能强奸女社员，不能拆

散社员家庭，不能放高利贷，更不能买卖、抵押、赠送、转让社员，所以人民公社只是准农奴制。

人民公社的分配原则是“大锅饭”，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而人的本性是自私自利、好逸恶劳的，社员毫无集体生产积极性。中共还要他们“高原学大寨”，种植藏人不熟悉也不爱吃的小麦。更有甚者，西藏当局曾异想天开，要在西藏生产糖。他们投资数百万元，从内地购来成套设备，在昌都和拉萨办了两个制糖厂。然后强迫藏农种植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糖萝卜，结果收获的糖萝卜在价值上还不如青稞的十分之一。全部原料交那两个糖厂加工，仅够生产一、两个月（63）。如此折腾，自然是民不聊生、家家皆尽。以致1980年胡耀邦视察西藏时，发现藏农牧的生活水平较之民改前并无显著改善，愤怒地质问任荣：中央给西藏的钱都丢到雅鲁藏布江里去啦？

三、小兴土木。中国政府在文革中也给了西藏许多钱，从1966年到1976年，中国政府给西藏的财政补贴年均增长9.09%（64）。这一事实说明，即便在文革那样疯狂的时代，中共也并无掠夺西藏的企图。在“填补空白”、好大喜功的心理驱动下，这笔钱被西藏当局用来小兴土木，建造各种工程。1974年与1965年相比，西藏的工矿企业由80个增加到218个，主要工业产品由18种增加到70种；发电量增长6.7倍，水泥增长1.6倍。修通了中尼（泊尔）、滇藏两条公路。修建了贡嘎、和平、邦达机场。特别重要的是，修成了从青海格尔木到拉萨、长1080公里、年输油量在八万吨以上的输油管（65）。那些工矿企业大都像糖厂那样亏损连连，据统计，1965年到1968年，在“三线”建设的名义下，共投资7273万元，报废2300万元。1970年后，头脑发热、脱离实际的趋势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公开提倡“无米之炊”，在拉萨、昌都等地建造玻璃厂、化肥厂，浪费1500万元。又提出3年内修通拉萨到林芝的铁路，结果不了了之。向阳煤矿建成后挖不出煤来，480万元投资只换来一个“煤矿烧牛粪”的笑话。墨脱公路盲目上马又下马，浪费2000多万元。当时投资的几个电站效益也不好。塘河电站工期近十年，装机6400千瓦，千瓦造价4644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20倍；昌都金河电站302万元投资全部报废。1978年前后，全国掀起“三年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运动，西藏立即建立了50多个“农机修造厂”，却没有原料、技术、管理能力与市场，其投资又被扔进了雅鲁藏布江。不过盲目建厂也做了一点好事，比如当时建立西藏电力建筑公司，就是为了解决在文革中被迫还俗的青年喇嘛的就业问题（中共称：要算政治账，不要算经济账），今日该公司的总经理就是当年还俗的喇嘛（66）。那时修建的公路、机场、输油管为西藏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人民公社强迫农民大修水利也使农牧业有所发展，1976年与1965年相比，粮食产量由29万吨增加到47万吨；牲畜头数由1701万增加到2180万（67）。

总而言之，文革是一场漫长的恶梦，其残酷性足与其荒谬性媲美。广大藏民既失去了民改的胜利果实，又失去了传统宗教的安慰，许多人受到迫害，生活水平下降，其心中的怨恨可想而知。

注释：

（56）徐明旭，《试论文革文化》，《中国之春》，1997年第1期。

（57）参见《天葬》第8章第4节：“西藏寺庙是谁砸的”；马丽华，《走过西藏》，作家出版社，北京，1994年，172页。

（58）Avedon, John F., *In Exile From the Land of Snows* (U.K.: Michael Joseph Ltd, 1984): 艾夫唐

，《雪域境外流亡记》，尹建新译，财团法人台北市慧炬出版社，1991年，312页。

(59)(60)参见《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1995年，173-184页、186页、192页。部分史料来自我对知情者的采访。

(61)《当代中国的西藏》(上)，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1991年，第9章，“文化大革命中的西藏”；《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1995年，191页。

(62)《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1995年，136页、161页、191页、197页。

(63)江平，《论慎重稳进方针》，《中国藏学》，1988年，第1期。

(64)《当代中国的西藏》(上)，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1991年，380页。

(65)(67)《当代中国的西藏》(上)，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1991年，381页、380页。

(66)于长江，《西藏工业企业发展状况》，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西藏社会发展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北京，1997年。

## 第三部：邓小平的怀柔政策

### 第九章“拨乱反正”

#### 1、怀柔政策的来由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撒手人寰，溘然长逝，整整一个时代结束了。毛自以为英明天纵、洞察秋毫，却未能预见自己身后一个月的事：他自己指定的继承人华国锋10月6日逮捕了他的遗孀江青及其亲信。华国锋既要利用人民对毛的痛恨打击江青，又要高举毛的旗帜维护自己空前的独裁权力（党主席、总理、军委主席三位一体），可谓不自量力。邓小平为了夺取华国锋的权力，打出“拨乱反正”的旗号，发起“思想解放运动”。他说毛晚年犯了错误，背离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现在要拨清迷误，返回到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上来。针对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凡是毛作出的决策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的指示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邓小平及其亲信胡耀邦故意对着干，和毛的政策反其道而行之。在西藏问题上，他们遵循同样的思路：既然毛推行的是高压政策，那就要反过来，推行怀柔政策；既然毛不与达赖喇嘛谈判，那就要反过来，同达赖喇嘛谈判。

1978与1979两年，西藏释放了全部叛乱分子，平反了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其中最重要的是班禅案），允许流亡藏人回来探亲，恢复宗教活动。1979年2月28日达赖喇嘛的二兄嘉乐顿珠应邀到达北京，3月12日受到邓小平接见。邓告诉他，1959年的叛乱是不好的；西藏是中国一部分，中央与他们是内部对话，不是国与国的谈判（1）。

邓还邀请达赖喇嘛派代表团回西藏参观访问。他被中共自己的宣传所欺骗，一厢情愿地认为，达赖代表团会被西藏的“进步与团结”所打动，促进达赖喇嘛回归，他大大失算了。是年8月，达赖喇嘛三兄洛桑三旦等五人组成的第一个参观团先去甘南、青海藏区参观，所到之处，受到藏民热烈欢迎。中共中央书记处担心地问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任荣，如果这个参观团到达拉萨，会发生什么情况。任荣答，拉萨人民的政治觉悟比青海的藏农牧高得多，他们会坚定地站在党和祖国一边，不必担心出乱子。任荣如此自信，以至在参观团到达拉萨前夕，命令拉萨各居民委员会召集藏族市民开会，告诫他们对参观团要有礼貌，不要出于对旧社会的仇恨向后者扔石头或吐口水，因为后者毕竟是中国政府的客人。次日的情况大出任荣的意外，成千上万藏人涌向参观团。他们大声号哭、磕长头、献哈达、争先恐后地触摸洛桑三旦、请求他摸顶。当后者向群众煽动时，有人喊出了“西藏独立”、“汉人滚蛋”等口号（2）。随后的两个参观团到西藏时，这样的场面也一再出现。以至中国政府不得不驱逐由“少壮派”组成的、到处狂热煽动独立的第二个参观团，从而迫使第三个参观团保持低调（3）。

前文说过，毛泽东不懂藏人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与思维方式根本不同于汉人，邓小平、胡耀邦、任荣也不懂。邓、胡从统治汉族的经验出发，以为只消把一切过错推到林彪、“四人帮”头上，最多轻描淡写地说几句“毛泽东晚年错误”，并放松毛的高压政策，藏人就会像大多数汉人一样感激涕零、谢主戴恩。当时汉人中确有一些无耻文人，创造出“家鸡打得团团转”、“娘打屁股儿不恨”的奴才理论，向中共献媚邀宠。邓、胡们也信以为真。他们忘记了，藏族不是“家鸡”与“嫡子”，而是“野鸡”与“养子”。挨了打的野鸡会朝山里飞，挨了打的养子会记仇。

如前所述，毛泽东在文革中既剥夺了藏人在平叛民改中分得的现世财富，又剥夺了藏人超度来世的希望（这个问题很复杂，这里暂且这样说，后文将详述），许多人被整得死去活来，生活水平普遍下降。恰恰在藏人怨恨最深、思想最乱的时候，邓小平请来了达赖喇嘛的亲戚，这就使藏人心中压抑、沉睡了十几年的宗教感情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其影响是多方面的：第一，它提醒藏人（当然还要加上达赖电台与打进西藏的内线的宣传），远在天边的达赖喇嘛不仅健在，而且连中共都怕他，否则为什么在用武力将其驱逐出境二十几年后，还要恭恭敬敬地把他的亲戚请回来？可见只有达赖喇嘛才是藏族的救星与希望。第二，它告诉达赖喇嘛与全世界，在逃亡二十几年后，达赖喇嘛依然是藏人心中的偶像与神，从而增强了达赖方面向中国政府讨价还价的资本，口气越来越大，态度越来越硬。第三，参观团拍摄到了大量被捣毁的寺庙与藏人生活贫困的照片，用第一手资料向全世界显示中共罪恶，加上藏人狂热欢迎参观团的照片，在西方引起极大轰动，令中共大丢其脸、极为尴尬。第四，它狠狠地教训了邓小平、胡耀邦，使他们对西藏问题的严重性产生了新的认识，不得不重新考虑西藏政策。

1980年3月14日与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会上撤消了令中共丢尽脸面的任荣的职务，代之以阴法唐（解放西藏时进藏的师政委，平叛民改时曾任江孜分工委书记）。会议纪要指出，西藏的中心任务是用一切办法发展经济，提高藏民生活水平（4）。邓、胡决心用物质上的好处拢络藏人，换取他们的归顺；同时也为了改善中共在西方面前的形象，换取西方的投资与其他经济上的好处。按照中国的史学术语，姑且称之为怀柔政策。这一政策不仅仅为了稳定西藏，还为了配合全国的改革开放。胡耀邦虽于1987年初下台，邓小平也于1997年初作古，但他们制定的这一总政策却一直被中共执行到现在。

注释：

（1）《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1995年，213-220页。

(2) Goldstein, Melvyn C.,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p.61-62.

(3) Avedon, John F., *In Exile From the Land of Snows* (U.K.: Michael Joseph Ltd, 1984): 艾夫唐, 《雪域境外流亡记》, 尹建新译, 财团法人台北市慧炬出版社, 1991 年, 359-376 页。

(4) 《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 (1949-1994)》, 西藏人民出版社, 拉萨, 1995 年, 226-227 页。

## 2、胡耀邦与阴法唐的攻守战

同年 5 月, 胡耀邦偕副总理万里等领导人亲自视察西藏, 藏农牧的贫困令他震惊。5 月 29 日, 胡在西藏干部大会上慷慨激昂地演讲, 称“西藏现在的情况不十分美妙”, “西藏人民生活没有显着的提高”, “我们党对不起西藏人民”。他强调, 西藏的当务之急是发展经济, 尽快提高藏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万里插话, 称之为“一个发展, 两个提高”)。为此他宣布了六条措施, 总结起来是三点: 一是由中国政府给西藏更多的钱。上一章说过, 从 1966 年到 1976 年 (文革期间), 中国政府给西藏的财政补贴年均增长 9.09%; 此时, 胡许诺年增 10%。二是大批内调汉干 (把汉族干部调回内地), 大量提拔藏干。他说汉干进藏 30 年了, 他们的历史任务完成了。他要求西藏干部中藏人要占三分之二以上, 万里则说要占 80% (这里说的干部主要指党政官员)。三是大力发展西藏文化 (5)。

胡的讲话在西藏干部职工中引起强烈反响。大多数藏干当然欢欣鼓舞, 他们最听得入耳的是大批内调汉干、大量提拔藏干。他们趁机大肆嘲笑、挤兑汉干, 催他们赶快打包走路: 总书记都说你们在西藏没干好事, 你们的历史任务完成了, 你们还不快滚蛋!

汉干的反应十分复杂。那些“和平解放”与“平叛民改”时期进藏的汉干 (汉人称他们“老西藏”, 藏人称他们“老汉人”, 他们大部分有一官半职) 认为胡全盘否定了他们的丰功伟绩, 使他们陷入了被嘲笑被挤兑的不光彩境地。他们绝大多数出身贫下中农, 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根深蒂固, 对胡积极协助邓小平发动思想解放运动、批判个人迷信早就反感透顶 (由于他们的抵制, 思想解放运动在西藏毫无动静), 此时一齐大怒, 大骂胡“乱放炮”。后来进藏的“新西藏” (大部分是小公务员、专业人员与工人) 则欢喜若狂。他们在西藏并无值得自豪的光荣历史与丰功伟绩, 却深受缺氧、严寒、缺电、缺菜、高山病、物资匮乏、生活枯燥、交通不便、家庭分散、土皇帝 (上司) 跋扈、文革后遗症 (冤假错案平反不彻底、整人或整或被整或派性斗争造成的人际关系紧张) 之苦, 巴不得马上内调, 早日离开这块对他们毫无魅力的地方。

以上各点, 除了土皇帝跋扈之外 (当时西藏的土皇帝大多是“老西藏”自己), 其余各点, “老西藏”也同样身受, 甚至因进藏时间更长而更严重。据自治区党委 1978 年给中央的报告, 当时西藏的汉干中, 长期 (一年以上, 有的 15 年) 在内地治病, 基本不能回来工作的有 1035 人, 其中地专级官员 19 人, 占同级 8.2%; 县级官员 137 人, 占同级 10.6%。在藏边工作边治疗的共 3436 人, 其中地专级官员 28 人, 占同级 12.1%; 县级官员 183 人, 占同级 14.2%。一人在藏工作、与家属长期分居的达 50%。家分几处, 负担重; 或夫妻在藏, 子女在内地分托二至四处; 或夫妻在藏, 内地无家可归等情况的达 48.1% (6)。不言而喻, 他们中大部分是“老西藏”。平心而论, “老西藏”中许多人尚有毛时代培养起来的“献身精神” (献身西藏的革命事业最光荣), 并不怎么想内调。再说他们也明白, 以他们的学历、能力与年龄, 调回内地未必有西藏那样的地位与权力, 更无西藏那样的关系网。

有趣的是，许多“和平解放”与“平叛民改”时期加入中共的翻身农奴干部，一方面巴不得汉干统统走光，让他们当权；另一方面也反感胡否定中共进藏以来的“伟大成就”，因为这中间也有他们的一份功劳与苦劳。他们和“老西藏”联合抵制邓、胡的怀柔政策，特别是其中的宗教、统战政策，使之难以贯彻得如邓、胡所愿。他们（以阴法唐为首）认为，放宽政策发展经济责无旁贷，但无限制地拨款修复寺庙、恢复宗教活动将会或已经导致宗教狂热，等于在为达赖喇嘛效劳；无限制地给上层人士退赔、做官将会或已经使后者翘尾巴，甚至向西藏当局指手划脚，是向被平叛民改打倒的农奴主阶级投降。长此以往，有可能引发新的叛乱。

他们特别反感的是班禅，后者自平反后，重新出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他曾要求兼任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相当于省长），被邓小平以政教分离为由拒绝。他在1982年6月至8月去西藏视察时，虽也说了许多反对西藏独立的话，却引发了宗教狂热。单在拉萨和日喀则两地受其摸顶的藏民达30万人次。藏民对他夹道欢迎、献礼、磕头、欢呼，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均为历史罕见。以致7月6日在大昭寺举行佛事时发生混乱，踩死一人，挤伤11人。而班禅还认为自治区党委执行宗教政策是“收”不是“放”。阴法唐不同意他的说法。双方各自向中共中央告状，结果中央批评阴法唐“不尊重班禅”。1983年6月《西藏日报》报导六届人大会议时，没有刊登班禅的照片，班禅又向中央告状，中央批评自治区党委犯了“政治错误”（这在中共是很严重的事情）。自治区党委不得不专门写报告，说明会议期间新华社没有单独发过班禅的照片和言论（据其他人大代表说，新华社几次拍照，班禅均不在场），因此《西藏日报》无法采用班禅的照片和言论（7）。由此可见，班禅复出以后，野心膨胀，想当西藏的太上皇。而胡耀邦也事事迁就他，使他的野心越来越大。

邓小平、陈云1983年10月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发起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给了阴法唐一个借口“反右”。在中共的术语里，“反左”就是要放松控制，即实行怀柔政策；“反右”就是要加强控制，即实行强硬政策。既然“清污运动”明言“反右”，对胡耀邦的怀柔政策不满的阴法唐就趁机做文章。西藏的事情总是慢半拍，11月18日，自治区党委才给中央写报告，先表示拥护“清污运动”，然后说西藏也有“精神污染”，其表现是：政治上，反动势力（指达赖集团，当时胡耀邦不准公开点名批判达赖喇嘛，所以只好含糊其辞，反正大家都明白所指）的颠覆宣传十分突出（这是邓、陈发动“清污运动”时列举的“精神污染”的内容里没有的，是西藏当局自己的发明，目的是提醒中央放任宗教狂热的严重后果）；理论上，也有人宣扬“异化论”（这是“清污运动”批判的重点，虽然自治区党委成员谁也不懂什么叫“异化”，西藏也没有人宣扬“异化论”，但必须写上，才能与这场运动挂上钩）；文艺上，有人搞“自由化”（这也是“清污运动”的题内之义，必须写上，反正“自由化”是顶大帽子，到处套得上）；宗教上，有的同志不敢宣传无神论，有些民族干部说：“在西藏宗教是最大的精神污染。”目前在思想战线和宗教工作中，既要继续纠“左”，又要着重反右，克服软弱涣散、放任自流倾向（这“宗教工作”云云也是“清污运动”的题外之义）。图穷匕首见，自治区党委原来是想借“清污运动”，反对胡耀邦无限制地放宽宗教、统战政策。他们借“民族干部”之口说出“在西藏宗教是最大的精神污染”这句话，也可谓用心良苦。因为他们知道，如果用第一人称说出这句话，一定会被胡斥为“大汉族主义”、“违反民族、宗教政策”。12月12日，自治区党委又给中央写报告，说明西藏宗教势力抬头，干预政治、生产与教育。有的党员参加唸经、求神、朝佛、转经等。农牧区参与宗教活动的党员约占20%，有的地方高达50%，极少数党员要求退党。以此证明宗教政策上已出现涣散软弱和右的倾向，必须“反右”。

然而胡耀邦不买帐，仅仅过了一个月，自治区党委就收到了中共中央《关于在清除精神污染中正确对待宗教问题的指示》。该指示说，清污运动就是解决理论、文艺界的问题，宗教和精神



污染是两回事，要把正常的宗教活动和精神污染区别开来（8）。阴法唐只得转向，把规模极小、微不足道的西藏文艺界当成替死鬼，在茶杯里面掀风作浪，这就是本书导论里说过的、我有幸恭逢其盛的“清污座谈会”。

为了逼迫以阴法唐为首的自治区党委彻底执行怀柔政策，1984年2月至3月胡耀邦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胡指出阴在西藏又犯了“左”的错误（这是我在西藏听到的正式传达），特别是没有执行好宗教、民族、统战政策，对班禅、阿沛等尊重不够，对西藏宗教与文化不重视。胡强调要从个别到一般和从一般到个别两个环节认识西藏的特殊性，并列举了西藏特殊性的五大表现：地处世界屋脊、长期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单一藏族聚居区、全民信仰喇嘛教、外国势力策划分裂活动。他认为西藏当局对西藏的特殊性缺乏深刻的认识，在工作中有四个担心，即担心是不是在搞社会主义、党的领导会不会削弱、宗教影响越来越大后会不会出叛乱（不知为什么他只说了三个担心）。他说，丢掉这四个担心后，西藏工作就可能大进一步（9）。同年8月，胡又派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副总理田纪云到西藏，督促阴法唐彻底贯彻怀柔政策。1985年6月1日，胡终于撤掉了阴，代之以从未去过西藏的彝族人士伍精华（10），并一再指示伍在西藏大反特反“左”。当时藏人不服气，他们说，中央派个汉人领导西藏倒也罢了，汉族毕竟是藏族的老大哥；可彝族是藏族的小弟弟，凭什么来领导西藏？伍果然不负胡的期望，他穿上藏袍，置政教分离于脑后，亲自参加各种宗教活动，各级藏干纷纷仿效，在西藏上下掀起了空前的宗教狂热，伍因而被称为“喇嘛书记”。

胡耀邦的学历虽然不高，却是个非常聪明好学的人。他概括的西藏的五大特殊点也非常精辟。可惜他压根儿不懂藏人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与思维方式，天真烂漫地认为只要不惜血本地善待藏人，藏人就会投桃报李、将心比心，善待中共与汉人。他把邓制定的怀柔政策发展到了极点，实际上变成了绥靖政策。他说不要担心宗教影响大后会出叛乱，竟变成了怙语----1987年至1989年的拉萨三次大骚乱与十多次小骚乱实际上就是不拿枪的叛乱。那时他虽已下台，却还健在，亲眼看到了绥靖政策的后果，也不知作何感想。

1987年初胡下台时，传说有一条罪状是对西藏“太右”，“老西藏”们也曾高兴了一阵，以为中央对西藏的政策会有所收紧。不料赵紫阳接任总书记后，宣布西藏政策不变。他不仅继承了胡的绥靖政策，甚至变本加厉，终于导致了三次拉萨大骚乱，迫使他在拉萨戒严，这是后话。

注释：

（5）《天葬》附录四。该书未注明出处，估计录自中共内部文件。我在西藏时看过这个文件，内容大致不差。

（6）（7）（8）（9）（10）（11）《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1995年，212页、237-238页、264-265页、279页、278-283页、285页、291页、305页、213-237页。

### 3、平反、统战、分地

根据我在西藏的观察与有关资料，所谓怀柔政策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取消阶级与阶级斗争。给全体因政治、宗教原因受到迫害或惩罚的藏人平反。这项工作从

1978 年就开始进行，所有因参加过 1959 年叛乱而被判刑、关押或“群众专政”的藏人全部被释放、摘帽（这是中共的专用名词，意指不再被称为“反革命分子”，不再受到歧视、监视与管制）；所有在民改、社教（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革中被定为“阶级敌人”（农奴主、富农、牧主、富牧、坏分子、新资产阶级分子、资本家等）也全部被摘帽。六十年代初与文革中的冤假错案——诸如“小班禅案”、“七星党案”、“中华民族党案”、“地下寺庙、经堂案”、“复叛组织案”、“回民叛国集团案”等，以及数不胜数的反革命组织与分子、叛乱组织与分子、达赖特务等等——全部一风吹（11）。1983 年 10 月邓小平、陈云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下令在全国开展清理“三种人”（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与“打砸抢分子”），胡耀邦特地明令在藏族中不清理（我在西藏听到正式传达）。文革中共停发了给未叛领主的赎买金，此时也全部补发。文革初被造反派抄家的，也尽量退还；无法退还的折价赔偿。据统计，当时共补发了近百万元工资，折价赔偿被抄财物 800 多万元，补发赎买金 400 多万元（12）。是谓“落实对敌斗争政策”。

二、收买旧西藏上层。把大批昔日的“阶级敌人”——达赖时代的官员、贵族、上层喇嘛、新老活佛等恭恭敬敬地请进各级人大、政府、政协、佛协，高官厚禄养起来，享受各种特权。自 1976 年至 1988 年，共安排 2100 多名上层人士当官（13）。他们的子女也被送进中央民族学院、西藏民族学院镀银镀铜，毕业后也当干部。1959 年时的叛军司令拉鲁，曾坐过六年牢，然后当过十年农民，如今是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昔日的贵族吉普，曾是噶厦政府的五品官，如今是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是谓“落实统战政策”。

三、让农牧民休养生息。自 1984 年起，解散人民公社，把公社的土地、牲畜、牧场及其它生产资料全部分给农牧民，实行“两个长期不变”政策：“土地归户使用，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牲畜归户，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14）。自 1980 年起至今，不收农牧税、不派购征购农牧产品、不收农牧区工商税（即农牧民在自由市场上出售产品不交商业税；乡镇私营、集体企业也不交税）、不向农牧民摊派任何钱物，乡村干部的津贴全部由政府开支。政府还向全体农牧民提供免费医疗、免费教育（部分藏族中学生还由政府包吃、住、穿）、免费科技与兽医服务、免费或廉价（由政府补贴）生产资料（良种、机械、电力、油料、化肥、农药、农膜等）、廉价（政府补贴）茶和盐（这是藏农牧的头号生活必需品）、无子女者的养老金、各种扶贫款、抚恤款、救济款等，农牧民的汽车、拖拉机也免收养路费，还允许农牧民开采矿产（15）。实际上对农牧民实行半包养政策。

1992 年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去拉萨郊区达村调查时，发现“达村农业对国家的依赖性很强。达村使用的良种，过去一直是国家低价售给，价格相当于国家的粮食收购价，现在才逐步走向良种自给。使用的化肥、农药、农机更是国家高额补贴。一吨化肥国家约补贴 260 元，一台手扶拖拉机，约补贴 770 元，农药几乎是白送。农用周转资金往往也是国家无息、低息贷款甚至拨款，资金回收率非常低，事实上国家在相当大程度上承担农民的农业投资，农民享受投资带来的实惠。如 1990 年达村固定资产的 255848 元中，农民的自有资金只占 39.34%，银行贷款却占 53.87%，其它资金占 6.79%。资金的大部分购买了手扶拖拉机，到 1992 年我们调查时，归还贷款的数量相当少，乡信用社透支 15 万元上交县人民银行补助。躺在国家高补贴之上的达村农业，基础非常脆弱。”“达村的农业生产已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如过去打场、扬场需一、二月时间，现在因使用机器而只需 20 多天，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没有很好地转化为农业进步，反而加剧了农村劳动力的过剩，每年除了三个月的农忙外，四分之三的时间都是农闲，青壮年劳动力浪费相当严重。”（16）

据统计，1991 年西藏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为 455 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比 1979 年的 159 元增

长 160%。1996 年，西藏农牧民人均纯收入 975 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比 1991 年增长 48%，年均增长 8.2%。1997 年西藏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 1040 元，突破千元大关（17）。然而由于西藏的自然条件实在太恶劣（高寒、缺氧、干燥、大风等），又无发展乡镇企业的条件（如前所述，西藏由于地处亚洲腹地与世界屋脊，内外交通都极为艰险，又缺乏廉价能源，加以人口文化素质太低，又深受喇嘛教的非理性思维束缚，根本不具备发展工业的条件，何论乡镇企业），人口增长又过快（因为中国政府慑于国际舆论不敢要求藏农牧搞计划生育），藏农牧的人均纯收入仍远远低于全国平均值。1997 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 2090 元（18），藏农牧的人均纯收入仅为其一半。众所周知，全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提高主要靠东部沿海农村的外向（出口）型乡镇企业，这是远离海洋的西藏永远无法企及的。考虑到西藏以外的全国农民没有免费医疗与教育、廉价生产生活资料等福利，藏农牧的实际纯收入与全国平均值的差距要比统计数字显示的小。又考虑到西藏的自然与地理条件是全国最恶劣的，能做到这样已属不易，那是与政府的大力扶持分不开的。

据噶厦政府统计，1950 年西藏约 90% 的人口没有自己的住房，现在除了少数游牧区外，绝大多数藏人都有固定住房。1995 年西藏农村人均住房面积为 20 平方米。1952 年西藏每亩地粮食产量仅 80 公斤，人均占有粮食仅 125 公斤。尽管 1991 年西藏人口比 1952 年增长一倍多，但 1991 年西藏人均占有粮食仍达 290 公斤，比 1952 年提高 1.2 倍。1996 年西藏人均占有粮食 372 公斤，比 1991 年增长 28%。在人口增长了一倍半的情况下，人均占有粮食仍比五十年代初增长了两倍（19）。

注释：

（12）洛桑丹珍、赤来，《西藏社会的发展进步与党的统一战线》，《西藏研究》，1995 年第 3 期。

（13）（14）《当代中国的西藏》（上），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1991 年，401 页、413 页。

（15）同上，406-407 页；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西藏自治区人权事业的新进展》，1998 年 2 月 24 日。

（16）徐平，《达村社区调查》，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西藏社会发展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北京，1997 年。

（17）（19）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西藏的主权归属与人权状况》，1992 年 9 月 21 日；《西藏自治区人权事业的新进展》，1998 年 2 月 24 日。

## 4、提干、招工、加薪

四、大量内调汉族和其他非藏干部工人（以下简称汉族干部工人），大量提拔藏族干部、增加藏族职工。胡耀邦一声令下，西藏立即大规模内调汉人。最西边的阿里地区最积极，全区 918 名汉干，走 783 名，占 85%。各县的秘书、会计、统计、医生、兽医及其他专业人员几乎全部走光。结果医院的医疗机械无人会用，一般手术无人会做，危急病人无人会抢救，牲畜生病也无人会治，财会制度混乱，有的县委机关甚至连工资都发不出（因为无人会做工资表），商业供销无计划，贵的贱卖，贱的贵卖，各县区情况无法汇总上报（因无人会统计、总结），有

的县区工作瘫痪，有的县委连中央文件都无人能看懂。自治区党委不得不报告胡耀邦，请求西藏第二批内调时保留领导骨干和业务骨干，胡被迫同意（20）。

尽管如此，自1980年至1983年西藏共内调汉族干部20045人（包括退休者，下同），工人25069人，共45114人，连同家属子女约八万人（21）。1986年又内调汉族干部工人约17000人（22）。同时大量提拔藏干，到1984年底，全自治区民族干部（藏族与西藏其他少数民族如门巴、珞巴等族）占干部（包括领导干部与业务干部）总数的60%，民族工人占64%。自治区级官员30人，其中民族干部24人，占80%；地专级官员691人，其中民族干部539人，占78%；县级官员889人，其中民族干部668人，占75%；县以下官员全部是民族干部（23）。

必须说明，中共所谓干部，既指党政官员（又称“领导干部”），即统治者、当权派；也包括各种专业人员（小公务员、教师、医护人员、经济管理人员、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文化工作者、农艺师、兽医等等，又称“业务干部”），即老百姓、被统治者。在上述自治区、地、县级与县以下领导干部即官员中，民族领导干部即官员的百分比高达80%、78%、75%与100%，而包括领导干部与业务干部在内的混合干部总数中民族干部仅占60%，大大低于领导干部总数中民族领导干部的百分比。由此可见，在西藏，汉族业务干部在业务干部中的百分比要大大高于汉族领导干部在领导干部中的百分比。换言之，大多数汉干在西藏是干实事、卖苦力、受压榨的被统治者、老百姓，而大多数藏干是指挥、压迫、奴役汉干的统治者、官员。不仅如此，由于藏人在陞官、提级（职称）、加薪、分房、出美差、招工、考大学、家属医疗（藏人全民公费医疗，汉干家属却要自费）、中小学教育（藏人全部免费，农牧民子女还包吃、包穿、包住，汉人子女全部自费）、计划生育（藏干与藏族市民可生两胎，藏农牧无限制，汉人只能生一胎）等方面藏人都有优惠，除了极少数汉族领导干部以外，绝大多数汉人在西藏变成了时时处处受歧视的二等公民。

在西藏如果汉人打骂藏人，那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一定会受到严厉处分，藏人打骂汉人根本不算一回事。我认识的一个汉族大学毕业生与一个藏族姑娘恋爱，遭到藏姑家长反对。汉生不从，继续与藏姑来往，藏姑家人便把他打得死去活来。他还是自治区党校教师，却无处伸冤，愤而切脉自杀（幸被救活），凶手却逍遥法外。我还听说西藏某县一个新提拔的藏族县长一枪打死了一名汉族小干部，只因后者说了句“某某这种人连文件都读不通，也能当县长？”死者家属到处上诉，凶手稳如泰山。有记者告诉我这样的故事：某水电站的发电机出了毛病，不断跳闸，正在打扑克的藏族技师不胜其烦，干脆用胶布把闸刀捆死，致使发电机烧燬。这事放在汉人头上必定判刑，而那个藏族技师只作了口头检讨。1985年拉萨破获一个藏族青年流氓集团，他们轮奸与强奸了几十名藏族姑娘。如放在汉人头上，为首者必定枪毙，从犯也要判十来年徒刑。但该集团的首犯仅被判了两年徒刑（因为他们强奸的是藏族姑娘，如果他们强奸的是汉族姑娘，连两天刑都不会判，汉族姑娘告状根本无人受理），从犯全部“教育释

放”。我亲耳听到一个汉族老法官发牢骚，认为有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由于不堪忍受种族歧视与压迫，百余名与我同年或次年自愿进藏的汉族大学生毕业生（他们进藏时大多受到赞扬，有的还上了报纸、电视）纷纷放弃户口与工作逃离西藏（有的逃亡者还是西藏大学的教师与政府公务员，大都有很好听的工作），宁可去新疆、青海等地当“盲流”，1985年9月《中国青年报》还为此发过该报记者孙亚明写的内参《进藏大学生为什么纷纷逃离西藏？》。胡耀邦、乔石、胡启立、王兆国都在这份内参上作了批示，要求伍精华妥善处理，伍作的唯一的事是派人去逃亡大学生内地老家中好言安抚，劝他们回藏。

藏族国家职工（不包括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的比例也相应提高，详见下表（24）。

年份	年末职工	其中藏族	藏族百分比%
1965	62500	26600	42.56
1970	84424	36003	42.65
1975	114721	54726	47.70
1980	178433	95047	53.27
1985	152566	96896	63.51
1990	149144	95521	64.05
1995	151971	109478	72.04
1997	154262	115394	74.80

由此可见，到1980年，藏族国家职工就超过西藏国家职工总数的一半；到1997年，藏族国家职工占了总数的四分之三。1997年底西藏非农业人口（市民）为33.6万人，占总人口的13.8%；同年底有西藏户口的汉族为6.9万，占总人口的2.85%（25）。把1997年西藏市民总数减去汉人数，可知同年藏族市民总数为26.7万人。同年藏族国家职工为115394人，以每个职工有一个家属计（在西藏，只要一人为职工，其配偶也很快会变成职工。西藏市民可生两个孩子，平均每个职工有一个孩子），则藏族国家职工连子女总数当为230788人，占藏族市民总数86.5%。如把藏族国家职工家中的老人也算作家属，这个百分比还要高。由此可见，西藏的藏族市民绝大多数是由中国政府供养的职工及其家属，这一现象对分析西藏的局势与骚乱至关重要。

研究一下西藏国家职工的职业构成，可以发现他们究竟在干什么。下面是西藏国有单位各行业职工人数（年底数）对照表（26）：

行业	1980年	1990年	1997年
总计	178433	149144	154262
农林牧渔业	29417	9026	7322
采掘业	6143	3723	4435
制造业	12481	7624	5425
电水煤气业	7389	4544	5173
建筑业	16603	8379	5639

地质水利	6508	2687	2812
交通运输仓储邮电通讯	34913	20534	17630
商业与餐饮业	14921	11266	10136
金融保险业	1480	3172	5996
房地产业	0	304	100
社会服务业	566	4085	4933
医卫体育社会福利业	7250	10175	12031
教育文艺广播电视业	13484	19209	24034
科研与综合技术服务业	1625	2300	2388
党政机关与社会团体	26328	42116	45241
其它行业	0	0	967

从上表可以看出，西藏国家职工的大头是党政机关包括国家供养的社会团体如佛协、文联之类的官僚、办事员与辅助人员（中共把他们算作工人），其百分比从 1980 年的 14.8% 增长到 1990 年的 28.2% 再增长到 1997 年的 29.3%，翻了一番，占了国家职工总数的将近 30%，这是大量提拔藏干的结果。西藏只有 200 多万人口，相当于内地一个大县，却也算一个省级行政区，有 70 几个厅局，编制与内地 2000 多万人的中等省不相上下。西藏文联的编制 100 人，和上亿人口的四川省的文联编制差不多。1990 年，西藏党政机关与社会团体工作人员占西藏全体从业人员（包括农牧民）的 4.44%，而全国党政机关与社会团体工作人员仅占全国从业人员（包括农牧民）的 1.94%（27），西藏是全国平均值的 2.29 倍，西藏可谓世界上官僚密度最高的地方了。这些官僚机构的成员当然都不创造任何财富，然而他们及其家属需要消费与享受，于是便有服务性行业。

西藏国家职工的半数集中在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商业、公用、教育、文艺、卫生、广播、电视、科技、金融等服务性行业即第三产业，其百分比从 1980 年的 41.6% 增长到 1990 年的 47.6% 再增长到 1997 年的 50.1%。其中交通运输与商业炊饮等业的国家职工不断下降，说明其职能不断被私营企业分担。其他各项都有很大增长，特别是教育、文艺、广播与电视由 1980 年的 7.6% 增长到 1990 年的 12.9% 再增长到 1997 年的 15.6%，医疗、卫生、体育与福利等业从 1980 年的 4.1% 增长到 1990 年的 6.8% 再增长到 1997 年的 7.8%，都远远超过了同期的人口增长。在西藏这些行业几乎都是赔钱的，由政府补贴、供养。不能说他们与农牧民完全无关，特别是其中的教育、医疗、运输、商业、金融（藏农牧的医疗、教育与必需的粮、茶、盐、生产资料、贷款、日用百货等要由他们提供），但西藏第三产业的大部分却是为藏汉官僚及其家属服务的，当然他们还相互服务。有趣的是，九十年代在汉地发展迅速的房地产业在西藏无声无息，1980 年时从业职工为零，1990 年为 304 人，1997 年减少到 100 人。这当然不是说

，西藏不造房子，而是因为西藏市民（包括个体户与无业游民）的住房都是由政府免费分配的，这是藏独骚乱的最大成果，西藏堪称中国最后的社会主义大锅饭乐园。

第一产业的农林牧渔水包括国营农场、林业与农牧技术兽医服务等，其百分比从 1980 年的 16.5% 跌到 1997 年的 4.8%，主要因为农场工人大量内调。西藏农场生产规模很小，但农牧技术兽医服务对促进西藏的农牧业发展有很大的作用。

第二产业的采掘、制造、电力、自来水、煤气、地勘与建筑等业的国家职工的百分比也从 1980 年的 27.5% 跌到 1997 年的 15.2%，因为西藏的工业亏损严重，1982 年关、停、并、转了 33 个企业，工人大量内调（28）。与民生有关的工业如发电厂、自来水厂等不能关，藏族职工多的企业也不能关，只好都由政府补贴。建筑工程则让给私营企业承包。如前所述，西藏由于缺乏廉价能源、运输成本奇高、缺乏市场（人口太少）、缺乏熟练工人与技术、管理人员、特别是藏族的非理性思维方式及藏文没有科技词汇，不适合发展工业。所以西藏的工业无论如何改革，都不可能起色。从 1965 年到 1997 年，西藏地方财政收入中的企业收入年年是负数，1997 年高达 11071 万元（一亿多元）（29）。1997 年西藏分项财政收入中，国营企业上缴利润总额为 908 万元，交纳所得税 7401 万元，两项合计 8309 万元，但国有企业计划亏损补贴总额高达 11979 万元，还有国有企业所得税退税 228 元，两者相加为 12207 万元（30），也就是说国有企业净亏 3898 万元。由此可见，中国政府在西藏办企业，与其说是为了赚钱，不如说是为了送钱。其动机之一与建立庞大的官僚机构一样，是为了解决藏族市民的就业问题，或者说为了包养二十几万藏人（西藏藏族人口的十分之一强），在西藏造成一个效忠于中共的阶级——《天葬》称之为“稳定集团”（31）——和一批畸形繁华的城镇，作为中共统治西藏的社会基础和向西方显示其德政的橱窗。后文将证明，其结果适得其反。

五、大力提高藏族生活水平。如果说藏农牧的收入增加有一部份要靠自己劳动的话，那么藏族市民几乎全靠政府增加工资福利。1988 年，西藏职工年均工资是 2739 元，年均福利费（医疗、劳保、退休金等）583 元（32）；而同年全国职工的年均工资只有 1810 元，年均福利费只有 537 元（33）。同年西藏市民的人均收入是 1211 元，而全国市民的人均收入只有 1192 元（34）。西藏都高于全国。

1990 年西藏职工的年均工资是 3224 元，全国职工的年均工资只有 2284 元（35），西藏比全国高了 41%，因为 1989 年拉萨爆发了导致戒严的大骚乱，这就是中共包养藏人的结果。西藏的工资继续上升，1994 年西藏职工的年均工资是 7304 元，而全国职工的年均工资只有 4797 元，西藏比全国高了 52%。是年西藏职工的年均工资仅低于上海（7534 元）和广东（7410 元），高于北京（6671 元）和天津（5806 元），是最低省份黑龙江（3689 元）的两倍（36）。1997 年全国市民人均纯收入为 5160 元，而西藏市民为 5913 元，也高于全国平均值（37）。西藏职工平均工资大大高于全国平均值，但西藏市民人均收入与全国市民人均收入的差距没有那么大，因为汉族市民只能生一个孩子，而藏族市民可以生两个孩子。据在拉萨的朋友告诉我，拉萨自由市场的肉蛋菜价和北京不相上下。由于政府或单位大量补贴，拉萨居民的房租微不足道，水电、燃料等价格均低于北京，有许多单位干脆免费供应。但西藏职工平均工资却高于北京，可见拉萨市民的平均生活水平已高于北京。如前所述，西藏农牧民人均收入低于全国农民，而西藏职工人均工资却大大高于全国职工，西藏市民的人均收入也高于全国市民，说明西藏的城乡差别大于全国，这也是拉萨藏人大闹独立的结果。

1995 年，西藏市民人均住房面积为 14 平方米（38），远远高于全国市民人均住房面积九平方米（39）。1994 年拉萨市民 80% 用上液化石油气（俗称煤气灶，来自青海格尔木）（40）。1992

年西藏与全国及青海市民每百户拥有耐用消费品比较如下（41）。

	全国	西藏	青海
自行车	190.0	219.0	169.0
摩托车	2.8	5.0	3.8
黑白电视机	37.7	3.0	20.6
彩色电视机	74.9	99.0	85.3
照相机	24.3	35.0	25.5
录放像机	10.0	14.0	4.1
游戏机	11.3	21.0	8.8
组合音响	4.0	7.0	3.1
钢琴	0.5	3.0	0.3

由此可见西藏市民的生活水平大大超过全国市民的平均值。其彩电拥有率已达到 99%，照相机与录放像机拥有率比全国高了近 50%，摩托车、游戏机与音响拥有率几乎是全国的两倍，而钢琴拥有率竟然是全国的六倍。考虑到把钢琴从上海运到西藏是一项多么浩大的工程，简直堪称奇迹。这里没有计算电冰箱与空调机，因为西藏夏季非常凉爽短暂，我在拉萨时从未有过穿短袖衬衫的机会。冰箱与空调在西藏没有多少用处。

注释：

（18）任仲平，《评改革开放二十年》，《人民日报》海外版，1998 年 12 月 17 日。

（20）（21）《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1995 年，250 页、299 页。

（22）《当代中国的西藏》（上），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1991 年，438-439 页。

（23）《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1995 年，300 页。

（24）（25）（26）西藏自治区统计局，《西藏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1998 年，49 页、34-35 页、52-53 页。

（27）张可云，《青藏高原产业布局》，中国藏学出版社，北京，1997 年，85 页

（28）《当代中国的西藏》（上），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1991 年，419 页、424 页。



(29) (30) 西藏自治区统计局，《西藏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1998 年，100 页、101 页。

(31)《天葬》，404 页。

(32) 西藏自治区统计局，《西藏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1989 年，499 页。

(33) 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1989 年，101-151 页。

(34) 马戎，《西藏的人口与社会》，同心出版社，北京，1996 年，189 页。

(35) 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 年，120 页。

(36) 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 年，113 页。

(37) 任仲平，《评改革开放二十年》，《人民日报》海外版，1998 年 12 月 17 日；西藏统计局，《西藏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1998 年，13 页。

(38)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西藏自治区人权事业的新进展》，1998 年 2 月 24 日。

(39)《安居方能乐业》，《人民日报》海外版，1997 年 10 月 17 日。

(40) 刘伟，《西藏人民走向小康之路》，《人民日报》海外版，1995 年 8 月 28 日。

(41)《青藏高原环境与发展概论》，中国藏学出版社，北京，1996 年，200 页。

## 5、复兴宗教

六、重建寺庙，提倡宗教。如前所述，文革初期捣毁了绝大多数寺庙，禁止一切宗教活动。1971 年林彪事件与 1972 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后，中共允许有限度地恢复宗教活动，并拨款修复了大昭寺（42）。1980 年胡耀邦视察西藏后，中国政府拨出巨款修复寺庙，解除了全部宗教禁令。到 1997 年底，中国政府已拨款三亿多元修复了 1787 座寺庙和宗教活动场所，住寺僧尼达 46380 人。政府给予僧尼生活津贴与公费医疗，还给部分僧尼发薪。由中国政府出资，1983 年创办了西藏佛学院，1987 年创办了北京中国藏传系高级佛学院。各寺庙也开办了学经班，由政府津贴，1997 年底有 3270 学僧。由政府供养的自治区佛教协会（佛协）办有佛教刊物《西藏佛教》和藏文印经院（设在木如寺的拉萨印经院），出版了许多宗教典籍和研究著作（43）。如前所述，伍精华 1985 年出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后，带头参加宗教活动，西藏各级官员纷纷仿效，在西藏上下掀起了空前的宗教狂热，是谓“落实宗教政策”。

“西藏流亡政府”出版的《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宣称：1959 年前西藏有 6259 座寺庙，592558 名僧尼，这些寺庙在 1979 年前除八座外全部成为废墟。592558 名僧尼中 11 万人被迫害致死，25 万人被迫还俗。它说的寺庙与僧尼数字与“西藏流亡政府”出版的《西藏通讯》发表的前述班禅《七万言上书》相矛盾。后者说，1959 年前西藏有大中小寺庙 2500 多座，僧尼 11 万

多人。为何相差这么大？“西藏流亡政府”也许会说，班禅说的是西藏自治区的数字，他们说的是“大西藏”的数字。如果是这样，那么据《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1988年藏族共有600万，其中200万住在西藏自治区，400万住在中国其他省份。可见中国藏人总数与自治区藏人成三比一。而同书却说“大西藏”有592558僧尼，与班禅指出的自治区有僧尼110000人成5.38比一，远远超过了三比一。姑且假设1959年前中国藏族总人口是300万，而自治区藏族人口是100万，（具体数字不重要，只要比例是三比一就行）。那么在1959年前由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根据《十七条协议》直接统治的西藏（自治区）僧尼占当地藏族人口的11%；而在中共直接统治的、并已发生了民主改革和摧毁寺庙的川、青、甘、云四省藏区，僧尼（592558--110000=482558）却占那里的藏族人口（300万--100万=200万）的24%，是前者的2.18倍，这是多么荒谬的数字啊！对此只可能有两种解释，要么是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在1959年前就在自己统治的西藏（自治区）内进行了比中共的民主改革还要残酷的迫害僧尼的运动，从而使他们在当地藏族人口中的比例不足川、青、甘、云藏区内僧尼在当地藏族人口的比例的一半；要么是《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所提供的数字都是凭空捏造的，所以该书所谓的“事实”与“真相”也像“中共消灭了120万藏人”一样都不过是弥天大谎而已。

由于越来越多的西方游客去西藏旅游，达赖喇嘛无法矢口否认中共自文革结束以来恢复了宗教自由，于是他想出了新的遁辞，他在1995年访问美国时告诉美国人说：“藏人已被允许去寺庙祈祷，但他们经常不被允许接受布道；藏民已被允许在菩萨前烧香，但他们不被允许纪念重大的历史或宗教节日”（44）。这话又是弥天大谎。精通藏语文、经常去西藏各地调查的戈茨坦指出：即使在拉萨戒严期间，“只要拉萨人不参加政治异议活动，他们就可以自由地到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会见朋友，请僧侣做佛事，聚会等等”（45）。请僧侣做佛事，不就要唸经吗？佛教的唸经不就是布道吗？西藏的头号宗教节日是藏历新年的传昭大法会，1988年3月5日的大骚乱就是借传昭大法会发动的，当时有多名国务院的部与自治区级的领导人坐在大昭寺里面观看（参加）法会，还进行了电视实况转播（后文详述），大昭寺内外有几万藏人参加，怎能说藏人不被允许纪念宗教节日呢？当然，达赖喇嘛把3月10日（1959年叛乱首日）定为“自由抗暴日”，年年在达兰萨拉开会纪念，中国政府当然不会允许在西藏纪念这种违反国际公法的叛国事件。

达赖喇嘛在同一个讲话里还告诉美国人：中国消灭了120万藏人，摧毁了6000座寺庙、宗教场所和古迹（46）。关于消灭120万藏人的问题，前面已经澄清过了。他在控诉中共摧毁寺庙时，闭口不提中共修复了寺庙，这就和他在同一讲话里说的“藏人已被允许去寺庙祈祷”相矛盾。如果那些寺庙至今仍是一片废墟的话，藏人怎么可能“去寺庙祈祷”呢？

《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也承认藏人自1977年起有了“磕头、转经、诵经、烧香、立经幡、点供灯等外在的表面形式的佛事活动”的自由，但又引用达赖喇嘛的话说：“中共所谓的宗教信仰自由只是习俗和信仰的外在形式而已，对佛教在深度、广度上真正攻练，学习，弘扬等方面，采取公开或秘密、直接与间接等方式加以反对和否定。因此，这如同中共所认为的一切宗教都是迷信一样，佛教也就变成了一种迷信。”佛教是科学还是迷信的问题，宗教界与学术界已经争论了几百年，而且还要继续争论下去，这属于学术自由，达赖喇嘛无权禁止，也作不了定论。达赖喇嘛所谓的“在深度、广度上真正攻练，学习，弘扬”，如果指的是喇嘛学习、研究佛经，那么如前所述，北京有中国藏传系高级佛学院，西藏有西藏佛学院、西藏佛教协会、《西藏佛教》杂志、拉萨印经院和各寺庙的学经班，它们都是专门学习、研究佛经的，并由中国政府出资供养。我想中共还未能培养出足够数量的精通古藏文与藏文佛教典籍的干部来监视、干涉那么多机构与遍布西藏各地的1787座寺庙的学习、学术活动，并阻止其朝学术上的深度与广度发展，除非那些机构与寺庙的喇嘛自愿为中共效劳，在内部捣鬼。如果指的是本

书第四章所述的要十几岁的处女作“明妃”的“慧灌顶”之类，那么我想，称之为迷信都还是轻描淡写。如果西方人权卫士有一天忽然问达赖喇嘛，这种灌顶活动是否侵犯了无知少女的人权（在美国，成年人诱奸 18 岁以下的少女，即便后者愿意，也属犯罪，必须判刑），达赖喇嘛何言以对？难道只有让这类侵犯藏族少女人权的宗教活动死灰复燃，才算有了宗教自由？按照政治学，宗教自由从来指群众性的宗教信仰与活动的自由，既然达赖喇嘛都承认，藏民有了宗教活动的自由，无论他怎样诡辩都无济于事。

《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还指责说：“对入寺僧侣的数量也作了限制”，这是事实。我在本书导论里已经根据戈茨坦的话指出，西藏有喇嘛越多越好的习惯，旧西藏的喇嘛多达男子的四分之一，甚至一半，这是对藏族妇女的人权的严重侵犯。我在本书第四章里还引用戈茨坦的话，指出喇嘛教是阻碍西藏社会、经济发展的桎梏。曾在噶厦政府做过官的藏族著名老学者恰旦次旦平措也说：“以前我对宗教就有看法，寺庙搞大了，对国家没有什么好处。那么多人，吃着，喝着，那么多年轻力壮的，不去生产，对民族也没好处。（47）”中国政府为了保护西藏妇女的人权和藏族的繁荣昌盛，不得限制西藏喇嘛的人数。尽管如此，如今西藏的僧尼（没有编制的僧尼不算在内）仍然占到了西藏藏族人口的 2%，大大超过了佛国泰国的僧尼所占人口的百分比 0.7%（出处见本书导论）。

甚至美国国务院的 1997 年西藏人权报告（48）都承认：“有些旅游者报告西藏的僧尼增加了。”“有一千名宗教人士成为西藏各级人民代表或政协委员。”“政府继续拨巨款修复文革中被毁的寺庙，部分是为了发展旅游业。寺庙继续招收与训练年轻僧侣以继承西藏佛教传统，但禁止 16 岁以下的孩子出家为僧。”“当局允许许多传统宗教活动和群众性的宗教信仰，只有会引起政治异议的活动被禁止，并遭到迅速镇压。”“政府允许许多宗教活动，但不允许那些鼓吹西藏独立或分裂主义的宗教活动。”鼓吹西藏独立的活动的活动是政治活动，不是宗教活动，所以充其量只能说西藏没有政治自由，却不能说西藏没有宗教自由。

戈茨坦也说：中国政府允许西藏人民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使宗教与文化自由（49）。世界上哪个国家允许违法的宗教与文化活动？难道只有允许喇嘛尼姑以宗教的名义煽动藏人分裂主权国家并打砸抢烧，才算有了宗教自由？美国有这样的宗教自由吗？

注释：

（42）Grunfeld, A. Tom, *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New York: M. E. Sharpe, 1996), p.187.

（43）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西藏自治区人权事业的新进展》，1998 年 2 月 24 日。

（44）（46）"Statement by His Holiness the XIV Dalai Lama on His September 1995 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Tibet Press Watch* VII:V (October 1995): p.4.

（45）Goldstein, Melvyn C.,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93.

（47）《历史学家的眼光》，《西藏文学》，1993 年 3 月号。

（48）"Full Text of U.S. State Department's 1997 Report on Tibet", *Tibet Press Watch* V:I (February 1998): pp.6-9.

(49) Goldstein, Melvyn C.,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73.

## 6、繁荣西藏文化

七、大力繁荣西藏文化。胡耀邦在西藏讲话时对西藏文化特别是西藏歌舞大加赞扬，认为汉族由于孔孟之道的束缚，在歌舞上无法与藏族相比。他在两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都反复强调要大力发展西藏文化，将其和发展西藏经济并列起来，称之为“两个发展”。这一政策一直被中共执行至今，并未因胡的下台而中断。我在西藏文联工作时，亲眼看见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抢救、搜集、整理、出版、研究、传播、发展、繁荣西藏的文学艺术与文化遗产。例如西藏文联办有藏文的《西藏文艺》、《邦锦梅朵》，汉文的《西藏文学》、《西藏民俗》等刊物；西藏文化厅办有汉藏两种文字的《雪域文化》，西藏社会科学院办有汉藏英三种文字的《西藏研究》等刊物。此外还有《中国藏学》、《西藏民族宗教》、《西藏佛教》、《西藏社会发展研究》、《中国西藏》、《西藏艺术研究》、《西藏体育》等汉、藏、英文刊物。西藏文联下属的西藏民间文艺研究会积极搜集西藏民间文艺，并有自己的汉藏文报刊，已出版了许多西藏民间文艺作品与多集《西藏民间故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号称世界上最长的史诗，达赖喇嘛与噶厦政府从来没有为之作过任何事情，中国社会科学院却成立了专门的《格萨尔》研究中心，在西藏也有专门机构搜集、录音、整理、出版《格萨尔》，好几位说唱《格萨尔》的民间艺人被请进上述机构，成为国家干部（我曾采访过他们），其子女也被安排工作。迄今为止，中国政府已经搜集《格萨尔》说唱资料 5000 多盘、录像数百盘；整理出文字 4000 多万字，出版藏文本《格萨尔》70 多部，总印数达 300 多万册，还出了 20 多部汉译本；自 1989 年以来，中国先后主办四届《格萨尔》国际学术讨论会，中国搜集、出版、研究《格萨尔》的成就在国际史诗研究界得到好评（50）。

到 1997 年底，全国共有藏学研究机构 50 多个，研究人员及其辅助人员 2000 多人，召开学术讨论会 60 多次，完成课题 300 多个，出版和正在出版的藏学著作 400 多部。西藏各地共有多功能群众艺术馆 35 座，乡村文化室 380 个，电影发行放映单位 650 个（在农牧区免费放电影）。1990 年来译制藏语影片 630 多部，8500 多个拷贝。西藏现有公开发行的藏文报刊 23 种。西藏古籍出版社与西藏人民出版社都出版了大量藏文图书。已建成无线电台两座，无线电视台两座，广播发射或转播台 35 座，电视转播（差转）台 240 座，卫星地面接收站 700 多座。西藏的电台与电视台都用汉藏两种语言运作，可以同步收看中央电视台的节目。投资近亿元的西藏自治区图书馆已于 1996 年 6 月正式开馆，藏书 59 万册，内中藏文古籍十多万册。投资九千多万元的西藏博物馆也已于 1997 年 10 月交付使用，总建筑面积为 22500 平方米。西藏自治区档案馆保存了大量藏文档案。西藏现有全国重点保护文物单位 18 处，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67 处（重点保护意味着由政府出钱派人保护）；专业艺术表演团体十个，小型专业演出队 15 个，业余演出队和藏戏队 160 多个。为了推动藏语文的规范化、标准化与信息处理现代化，西藏自 1994 年起进行“信息技术藏文编码字符集”国际标准的研制工作，并于 1996 年在丹麦的哥本哈根举行的多文种编码国际标准审定会议上获得通过。1995 年，西藏成立了藏语文术语统一标准化委员会，并开始编译出版科技资料藏文目录（51）。所有这些都是达赖喇嘛统治时期不可想象的。

达赖喇嘛一贯指责中共“毁灭西藏文化宗教”，称之为“文化上的种族绝灭”（52）。他一方面抓住中共在平叛民政与文革中捣毁寺庙大做文章，闭口不提中共在文革后修复寺庙、复兴宗教

的事实，好像后者从来没有发生过、西藏的寺庙依然是一片废墟一样；另一方面又抓住中共拨出巨款、派出大量专业和辅助人员提高藏人生活水平、使之生活现代化，指责中共大量移民西藏、进行汉文化侵略、企图消灭藏族与西藏文化。中共在文革前与期间的确做过许多毁灭西藏文化宗教的坏事，但它从 1977 年以来承认了错误，大力恢复与提倡西藏的宗教，复兴与发展西藏的文化，至今已有二十多年，那么还能说中共现在仍然在毁灭西藏的文化宗教吗？关于达赖喇嘛指责中共限制宗教的问题，上文已作过论述，这里只谈移民问题与汉文化侵略问题。

自从 1980 年以来，中共派出大量工程技术人员、经济管理人员、科学家、教师、医护人员、文化工作者及其辅助人员进藏，大兴土木，建造医院、学校、商店、文化馆、发电厂、输电网、电视发射转播网、自来水厂、上下水道、公寓楼等等，目的是让藏人享受现代物质文明。大量施工人员进藏，吸引了许多小商小贩（中国政府称之为流动人口）进藏开店设摊，提供饮食、娱乐、商业、修理等服务，这都是市场经济中必不可免的现象，世界各地概莫能外。然而达赖喇嘛 1987 年 9 月 21 日在美国国会人权委员会演说“五点和平计划”时却闭口不提进藏人员的目的，大声疾呼地指责中共大量向西藏移民，甚至说“即使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中国官方资料也证实中国人口（指汉人----引者）比藏族人口多”（53）。这又是一个弥天大谎，从来不存在这样的“中国官方资料”，因为从来不存在这样的事实。达赖喇嘛拿得出这样的“中国官方资料”来吗？

关于“大西藏”的人口问题，留待后文再说。1997 年底，西藏自治区人口为 2427357 人，其中藏族 2339796 人，占 96.39%；汉族 69205 人，占 2.85%；其他少数民族 18356 人，占 0.76%，其中人数超过一千的都是西藏本土少数民族，如门巴族、珞巴族、回族、登人（登字有单人旁）、夏尔巴人、纳西族等（54）。根据西藏的交通条件和我在西藏时的经验，我相信这里的汉族人数属实。这个数字可以从西藏汉族国家职工人数得到验证。如前所述，1997 年西藏国家职工为 154262 人，其中藏族 115394 人，假设其余都为汉族，则汉族国家职工为 38868 人。许多西藏的汉族职工把家属留在内地，即使俩口子都在西藏工作，子女也往往放在内地亲戚家。把上述西藏汉族人数除以上述西藏汉族职工数，得到 1.78，即每个汉族职工有 0.78 个家属在西藏，符合上述情况。

必需说明，这里的数字是指户口在西藏的汉人。不带户口进藏的施工人员与小商小贩不在内，因为后者是临时性的流动人口，并无定居西藏的打算。如果他们也算移民的话，那么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潮水一样涌入中国（包括西藏）的欧美日韩港台商人也是移民了，天下还有比这更荒谬的逻辑吗？那么在西藏的流动人口有多少？《天葬》估计 1996 年夏季高峰时（流民怕西藏的严寒，一般春天进藏，秋天离藏）西藏的流民为十几万到 20 万（55），加上有西藏户口的汉人七万，不足 30 万（流动人口中有许多回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我把他们全部算作汉族）。西藏的解放军人数是个机密，据现任中国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王贵说，西藏的驻军从来没有达到以万为单位的两位数（56），根据西藏的交通条件和我在西藏时的经验，我也相信此说属实，那么连军人（西藏军人中也有许多藏族与其他少数民族，我也把他们都算作汉族）在内，西藏的汉人最多不过 30 几万，离 234 万藏人相去何远，怎么可能超过呢？

我在导论里已经指出，现代物质文明必然要改变经济落后民族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这是世界性的现象，西藏也不例外。达赖喇嘛把藏人生活现代化说成是毁灭西藏文化，说明他要剥夺西藏人民享受现代文明的权利。联合国 1986 年《发展权宣言》说：“确认发展权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达赖喇嘛岂不是剥夺西藏人权，强迫他们停留在中世纪吗？我想西藏人民特别是西藏青年是决不会答应的。我在西藏时就亲见拉萨藏族青年如何如飢似渴地追求现代物质文

明与商业娱乐，其狂热程度丝毫不亚于文革刚结束时的宗教狂热。马丽华也发现，西藏农村青年对庆祝传统节日不感兴趣，“藏戏他们不肯看了，只想电影电视，民间舞他们也不想跳了，只想着城里的什么……交谊舞迪斯科”（57）。连强烈谴责中共“毁灭西藏文化”的董尼德也承认：“老一辈的还在手转经筒，口诵咒语，年轻的一代却梦想没有神祇，没有菩萨，只有金钱、时装、物质享受的天堂。（58）”达赖喇嘛有本事叫历史的车轮倒转吗？

1998年9月1日刚刚访问西藏归来的意大利议会“中国之友”协会主席在罗马发表声明说，包括他在内的意大利议会代表团一致认为，中国政府在改善西藏的基础设施、保护文物、提高当地人生活水平和促进内地与西藏的交流方面都取得了积极成果。声明说，意大利议员们看到，西藏在宗教信仰方面有广泛的自由，西藏的众多寺庙受到了很好的保护和维修；西藏的学校在教授藏语；藏人可以自由地请藏医看病；西藏行政部门的藏族工作人员已由1979年的30%增加到现在的70%；藏民在计划生育和服兵役方面还受到特殊照顾（59）。我想任何不怀偏见的人到西藏去，都会有同感。

注释：

（50）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西藏自治区人权事业的新进展》，1998年2月24日；赵川东，《生生不息的<格萨尔>》，《人民日报》海外版，1997年8月9日。

（51）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西藏自治区人权事业的新进展》，1998年2月24日。

（52）达赖喇嘛这类言论多得数不清，举不胜举，这里只举几个最近的例子：1996年12月3日他在接受国际法学家委员会采访时反复指责中国在西藏进行“文化绝灭”(cultural genocide)---*Tibet: Human Rights and the Rule of Law*, (Geneva: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1997), p.352；1998年3月10日他在“自由起义”39周年纪念会上讲话时说：“北京在西藏推行的政策，几乎是一种蓄意的文化绝灭政策”---《北京之春》1998年4月号91页；1998年5月9日他在美国波士顿与中国学生学者对话时说：中国对西藏实行宗教文化绝灭，在国际上声名狼藉---曾慧燕，《达赖、魏京生波士顿见面密谈》，《世界日报》，1998年5月10日；达赖喇嘛在1998年6月接受西班牙记者采访时说：中国对西藏进行文化大屠杀---《西藏前途，达赖表示悲观》，《世界日报》，1998年6月29日。

（53）Dalai Lama, "Address to the U.S. Congressional Human Rights Caucus---Five Point Peace Plan for Tibet", Congressional Ceremony to Welcome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of Tibet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2).

（54）西藏自治区统计局，《西藏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1998年，35页。

（55）《天葬》，352页。

（56）王贵，《西藏历史地位辩》，民族出版社，北京，1995年，604页。

（57）马丽华，《走过西藏》，作家出版社，北京，1997年，463页、479页。

（58）董尼德(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与死》(Tibet mort ou vif)，苏瑛宪译，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台北，1994年，26-27页。

(59) 新华社记者刘儒庭,《意大利议员发表声明指出中国对西藏政策正确》,《人民日报》海外版,1998年9月3日。

## 7、教育与语文

八、大力提高教育水平。西藏的藏族学生从小学到大学全部免费,农牧区中小学推行寄宿制。中国政府还对部分藏族中小学生包吃、住、穿。1997年西藏有小学4251所,在校生300453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78%,而旧西藏的适龄儿童入学率不足2%;中学90所,大学四所,中专16所,西藏青壮年文盲率比1951年前下降41个百分点;1997年教育投资占自治区财政预算支出和预算内基建投资总额的18%。从1985年以来,中国政府在内地一些省市创办西藏初中班,在北京、天津和成都各建一所西藏中学,到1997年内地各类西藏班(校)共招收藏族学生18000人,已有5000大中专毕业生回藏工作。西藏所有学校与内地的西藏班(校)都以藏文为主课,实行双语教学(60)。由于西藏地广人稀、交通不便,西藏目前的教育事业当然无法同内地人烟稠密地区特别是大中城市相比,但与旧西藏不足2%的儿童有机会入学、而且只能学语文与佛经相比,可谓天壤之别。

问题出在传统藏文没有科技词汇和现代社会科学词汇,无法教授中学数理化生(物)与大学、中专理工医农、社会科学课程。旧西藏识字的大多是喇嘛,只知有佛经,不知有数理化生、理工医农与现代意义的社会科学(经济学、法学、文艺学、美学、西方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当然不会创造有关词汇。为此中国政府化了很大的力气创造藏文科技词汇,早在1976年民族出版社出版的《汉藏对照词汇》中就有大量科技词汇。1982年青海省民族宗教委员会成立了藏文名词术语规范委员会,组织许多专家,花了12年时间,编纂了有史以来第一套藏语科技词典:《藏汉英数学辞典》、《藏汉英物理学辞典》与《藏汉英化学辞典》,在1994年出版并通过鉴定,从而填补了藏文出版史的空白(61)。与此同时,1982年成立了五省区(藏、川、青、甘、云)藏文教材协作领导小组,到九十年代初,编成全套中小学各科藏文教材(62)。

西藏自治区人大1987年颁布的《西藏自治区关于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若干规定(试行)》规定:在进一步完善小学藏语文教学体系的基础上,从1993年的初中新生开始,初中阶段藏族班除汉语文与外语课外,大部分用藏语文授课;从1997年高中、中专新生开始,大部分课程用藏语文授课。据统计,到1992年下半年为止,西藏用藏语文授课的小学在校生达177735人,占小学生总数的92.7%,小学用藏语文授课的教师7062人,占小学教师总数的81.7%,全区小学基本实现藏语文授课。从1989年秋季开始,拉萨中学、拉萨市一中,日喀则地区中学和山南地区二中招收首批初中藏语文授课试点班学生,这批学生于1992年从初中毕业,除部份陞入中专、技校外,其余陞入高中藏语文授课试点班。到1993年下半年为止,全区中学有70多个藏语文授课班(包括四个高中试点班),在校生3000多人(63)。

可惜这些藏语文试点班成勳并不理想,问题仍出在科技词汇。青海省民族宗教委员会语文办公室主任、青海省藏文名词术语规范委员会副主任、藏语文专家程列着文指出:

1、历史上的藏文化严重存在着重文轻理的倾向。在我们的文化宝库中,虽然也有天文、历算、医学、建筑等属于自然科学范畴的知识财富,但大量的则是佛学、历史、文学、语言、文字等社会科学知识。即使是自然科学范畴的知识,仍充满着浓厚的宗教色彩,社会科学知识亦

文史不分，无现代意义的科学分类。在古代，尽管藏族很重视翻译事业，但主要出自信仰上的需要，重文轻理倾向同样突出。在藏文出版史上，虽然卷帙浩繁，却未曾有过理科词典，很少有人搜集、整理、规范理科名词。这一切，就是人们常说的藏文化的先天不足。

2、藏文虽然历史悠久，却发展缓慢，在表达自然科学知识方面更为突出。重文轻理，在古代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但近代以来，随着新文化运动，各种语言文字都注意吸收和反映具有现代意义的自然科学知识，物理、数学、化学、生物、地理等各种学科的名词术语及其基础理论知识，在民族语文中应运而生。汉语文自五四运动以来，一改传统的重文轻理倾向，出现新学。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探索科学救国之路，积极向西方学习，随之现代意义的自然科学各门学科产生了。时至今日，就文字而言，用汉语文表达反映一切自然科学知识，已毫无困难和问题。国内有自己民族文字的蒙、维、朝、哈等兄弟民族的文化，在这方面的发展步伐也很快，特别在全国解放后几十年中，更有长足的发展。与之相比，古老的藏文则远远落后了。从民族教育的教学领域看，全国通用的五种少数民族语文，除了藏族，其他四个民族都用母语进行自然科学授课，唯独藏语文至今尚过不了这个“关”。这一难关主要就在于词汇。

3、包袱沉重，迈步维艰。藏文从创制到现在，已有 2500 多年的历史。但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遗产往往会成为包袱，阻碍前进，许多近乎糟粕性东西，弃之不甘，食又无味，甚至可能是绊脚石。藏文与蒙文相比，二者在古代可说是无法可比，蒙文字母先后两次在藏族学者的协助下设计而成，作为一种民族文字，到十三世纪才起步，比藏文约晚 1800 多年。蒙医也是由藏医引进发展而成的。这些事实说明，古代藏文远比蒙文发达。但现在的事实是藏文赶不上蒙文的发展，在科技方面、社会交际功能以及文化遗产的继承等各方面蒙古语文早已超过了藏语文。

4、用词混乱，亟待规范。新中国的诞生，迎来了藏汉翻译史上的春天，翻译事业的兴旺促进了藏语文的繁荣发展，但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这主要是新词术语的混乱现象，具体表现在造词用词上的以旧代新、以文代理、以积代名，造成了词无标准，概念混乱，词义不明，表达不清，以及语言污染等严重问题和后果。究其原因，在造词用词上只知应付，不求质量，只想眼前，不管将来，这是造成混乱的主要原因。而且这种混乱现象主要是藏文界自己造成的，原因在于自身。没有理由怨天尤人。

从藏语文的现状看，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特别是高科技发展的形势需要，在这方面落后于其他少数民族语文，其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藏民族的主人翁意识在淡化。可以说藏民族是一个主人翁意识不强、科技意识很弱的民族，不少人看不到现代科技高速发展的形势，看不到自己民族落后的现实，满足于以往的成勳，沾沾自喜于浩瀚的佛学典籍，安于现状，不求进取，从编纂综合性的藏汉对照辞典来说，有史以来只有过两部较权威的词典，一部是《格西曲扎大辞典》，是蒙古学者编写的；另一部是《藏汉大辞典》，是汉族张怡荪先生从 1928 年起历时 56 年完成问世的。两位编纂者都不是藏族，仅此可见藏民族主人翁意识之一斑。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要教育人们真正认识到，藏语文要想赶上现代文化的发展水平，就必须吸取历史教训，承认自己的弱点。藏语文的发展首先要弥补自己的先天不足，要奋起直追，倍道兼行，其关键在于藏民族自身，这正是引起质变的内因（64）。

该文没有举例详述藏文科技词汇的问题，让我从另一位藏文专家的文章里找几个例子。其一为一身两任类，即把两个不同的术语翻译成同一个藏文名词，或者说用同一个藏文名词表达两个不同的概念，例如：“比重”与“重量”被翻译成同一个藏文名词，类似的还有“密度”与“含量”、“气候”与“气象”、“音波”与“声波”、“癌症”与“肿瘤”、“遗传”与“繁殖”、“光柱”与“光束”



、“功率”与“能量”、“拉力”与“引力”、“压力”与“压强”、“鲸鱼”与“鳄鱼”、“节肢动物”与“无脊椎动物”等（这些词汇都引自民族出版社 1976 年出版的《汉藏对照词汇》——原注）；其二为半生不熟类（即程列所说的“以旧代新”、“以文代理”——引者），从原有的旧词汇中借来作科技名词，带有浓厚的非术语性的俗气。如将“挥发”翻译成“消失”、“水平面”翻译成“水面”、“垂直”翻译成“径直”等（引自《汉藏对照词汇》）；其三为随意增删类，即不忠实于原文，任意增删原文的意思，如将“天体运行”翻译成“群星运行”、“虹吸管”翻译成“虹形管”、“导体”翻译成“电导体”、“人体解剖学”翻译成“人体构造细探学”、“热带”翻译成“炎热带”、“亚热带”翻译成“热带”、“天然气”翻译成“天然煤气”、“页岩”翻译成“油石板”、“甲壳类”翻译成“骨壳类”等（引自《汉藏对照词汇》）；其四为冗长拗口类，有的已经不是词，而是词组或句子（即程列所说的“以积代名”——引者），如将“日照”翻译成“太阳照的地方”、“染色体”翻译成“吃染料的微物”、“地对空导弹”翻译成“从地上往天空中打的导弹”、“航空母舰”翻译成“飞机降落的船”、“减速运动”翻译成“速度逐渐降下来的运动”、“超高压”翻译成“超了高压”、“终年积雪”翻译成“整年雪不化”、“原始人群”翻译成“远古时代的自然人群”、“恒温”翻译成“不变温度”等（引自《汉藏对照词汇》）；还有一词多译而又无定名类；顾此失彼类与错译类等等。究其因，现有的藏文翻译界素质太差，不懂自然科学；藏学界长期重文轻理；强调意译甚于直译（65）。前两点原因与程列说的相似，第三点可能与藏族的思维方式有关——如前所述，藏族天性倾向神话思维，喜欢对事实加以改造发挥，上述“随意增删类”就是如此。词汇是语言之本，教材是教学之本，使用这样的藏文科技词汇编出来的藏文教科书，怎能叫藏族学生学好数理化生？

关于藏人为何看不到藏语文落后于现代社会的原因，留待下章分析。上述两文至少说明了，西藏的中学之所以难以用藏语文教授数理化生，其责任完全在于藏族自己不争气，造不出成熟的藏文科技词汇来，并不是中共阴谋毁灭西藏文化，否则中共为何要花大力拨专款组织人马编写藏文科技辞典和藏文中小学教材；为何允许蒙古、维吾尔、朝鲜、哈萨克诸族用母语教授数理化生？藏族一向以蒙古族信奉藏传佛教（喇嘛教）为荣，不知是否对蒙古文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以及蒙古学者帮藏族填补藏文辞典空白感到惭愧？

达赖喇嘛一贯攻击中国政府在西藏的中学里不得不用汉语教授数理化生是“毁灭西藏文化”，然而他自己在印度开办的流亡藏人中学里也不得不用英语教授数理化课程。达瓦才仁也承认：“以儿童村为主的各学校大部分已实现了小学数理化、社会科学等课程全部用藏语教学，初中以上才开始以英藏两种语言教授。（66）”可见流亡藏人的小学还不能完全用藏语文教学，初中开始用英藏两种语言教学，想必是用藏语文教授与西藏文化有关的课程，用英语教授数理化，其因想必也是没有藏文科技词汇。如果说中国政府在西藏的中学里用汉语文教授数理化生是毁灭西藏文化，那么达赖喇嘛在流亡藏人的中学里用英语教授数理化也是毁灭西藏文化。无怪乎戈伦夫要说：“达赖喇嘛经常谴责中国在西藏自治区的学校里用汉语讲课，这话听起来令人感到虚伪，因为在印度的藏族学校里，教学语言是英语。（67）”达赖喇嘛还利用绝大多数西方人不知道藏文没有科技词汇来欺骗西方舆论，例如他 1996 年 12 月 3 日接受国际法学家委员会采访时说，中国对西藏的“文化绝灭”的例子之一是：“在中国的高考中，中文成勛比藏文成勛更重要。”（68）既然藏文没有大学理工医农、现代科学词汇，那么中国的大学里自然只能用汉文授课，汉文成勛当然比藏文更重要。为了照顾藏族考生，中国政府一贯对藏族降低录取分数线，降低率高达 50%（下章详述）。如此优待藏人，还能叫“文化绝灭”吗？达赖喇嘛要求藏族只学藏文，不学汉文（否则就是文化绝灭），这意味着他要求藏族永远不学科技知识与现代社会科学，永远停留在中世纪，这才是对藏族实行现代文化绝灭。

达赖喇嘛如此热爱西藏文化，他一贯声称，惟有流亡藏人保存与发展了西藏文化，然而他们流亡印度 40 年，至今编不出一本藏文科技词典来。中国政府至少编出了三本藏汉英三对照的

藏文科技词典，由此可见，至少从 1980 年起，中国政府比达赖喇嘛更加重视保存与发展西藏文化。

注释：

（60）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西藏自治区人权事业的新进展》，1998 年 2 月 24 日。

（61）《藏语自然科学辞书的可喜丰收》，《中国西藏》，1995 年第 6 期。

（62）马戎，《西藏的人口与社会》，同心出版社，北京，1996 年，380 页。

（63）西藏自治区民族教育研究所白玛次仁，《对藏语文授课工作的思考》，《西藏研究》，1994 年第 2 期。

（64）程列，《关于藏语文如何适应现代社会之我见》，《西藏研究》，1997 年第 3 期。

（65）普日科，《试论汉译藏基本科技术语中存在的问题》，《西藏研究》，1993 年第 2 期。

（66）达瓦才仁，《流亡求生的西藏民族》，香港《开放》，1997 年 3 月号。

（67）Grunfeld, A. Tom, *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New York: M. E. Sharpe, 1996), p.179.

（68）*Tibet: Human Rights and the Rule of Law* (Geneva: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1997), p.352.

## 8、卫生与生育

九、大力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旧西藏只有三所设备极为简陋的官办藏医机构和少量私人诊所，从业人员不足百人，加上民间藏医也只有 400 多人。1991 年西藏有 1197 个卫生机构，平均每千人口拥有病床 2.3 张，医生 2.1 人，分别相当于和高于中国平均数。到了 1997 年，西藏有 1324 个卫生机构，平均每千人口拥有病床 2.5 张，医生 2.5 人。西藏的人均期望寿命从旧西藏的 35 岁增加到 65 岁（69）。连国际法学家委员会 1997 年的报告《西藏：人权与法治》都承认，西藏的医疗服务有了很大的改善，极大地提高了西藏的人均预期寿命（70）。

中国政府自 1980 年以来对全体藏族实行免费医疗，这是中国其他 55 个民族包括汉族都没有的。近年来，鉴于公费医疗浪费太大，中国政府在全国进行公费医疗改革，在西藏对占西藏藏族人口近 90%的农牧民依然实行免费医疗，对没有工作的藏族市民（包括职工家属）也实行免费医疗，对有收入但不是国家职工的市民（例如个体户）酌受部分医药费，对国家职工（不论汉藏）由单位给每人每月发一定数量的医药费（具体数目由各单位自定），用超了自己出钱，用不完归己；住院费包括医药费报销 70%到 95%（各单位根据工龄自定）。汉族干部的家属看病全部自费。与此同时，达赖喇嘛治下的达兰萨拉流亡藏人看病免费，药费与住院费却须自理（71）。

达赖自传说：“关于保健方面，的确增加了数目可观的医院，就像中国政府说的那样。但是医

院却偏袒汉族移民。(72)”这又是谎言。西藏城乡医疗条件悬殊，这是事实。如前所述，1997年西藏市民总数为33.6万人(不包括住在城镇里的农民)，其中汉人6.9万人，占总数的20.5%；藏人26.7万人，占总数的79.5%。汉藏职工享受同样的公费医疗，藏族职工家属也有公费医疗，汉干家属却没有公费医疗，更不必说汉族流动人口。我在西藏时亲见自治区人民医院(西藏最大最好的医院，也是自治区政府干部的公费医院)里有许多藏农牧病人(包括住院病人)，他们全部免费，这是汉族农民做梦都不敢想的。可见西藏医院偏袒的是藏人，而不是汉人。

西藏地广人稀、交通险恶，农牧民分散在极其辽阔的地方，去拉萨及地、县、乡医院看病远不如拉萨市民看病方便，这是西藏的地理条件造成的，却也成为达赖喇嘛指责中国政府的理由(73)。且不说达赖喇嘛统治西藏时，农牧民根本不可能去医院看病，所以达赖喇嘛根本没有资格为此指责中国政府；单说西藏人口仅占中国人口的0.2%，其面积却占中国面积的12.5%，如果西藏的医疗网点也要像内地一样密集，中国就必须把全国12.5%的医疗费用在只占中国人口的0.2%的西藏人身上。换言之，西藏人均占有的医疗费将是中国人均占有医疗费63倍，如果考虑到把医疗设备与药品运到西藏各地去的交通成本与维持西藏各地医院运作的其它成本(人员、能源等)远远高于内地，这一比例恐怕要上升到100倍。达赖喇嘛认为这样做合理吗？是不是有另一种种族歧视的嫌疑？

我在西藏时亲见，中国对占西藏人口近90%的农牧民不搞计划生育，对藏族市民要求每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对在藏汉人也和内地一样只准生一个。连美国国务院的1997年西藏人权报告也承认，藏人在计划生育方面较之中国其他民族有优惠(74)。《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指责中国政府要求藏族市民生两个孩子是“灭绝西藏民族”，却闭口不提中国政府只准全体汉人生一个孩子，莫非在他们眼里，汉人就不算人？《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还造谣说，中国政府“对农牧民在执行计划生育时虽然宽大，实际上凡生育第三胎者均被处高达1500至3000元人民币的罚款，超过两胎的孩子将得不到粮户本”。最后一句话漏了马脚，农民哪来的粮户本？

戈茨坦在1985年至1988年曾专门去西藏各地考察计划生育问题，其研究报告《中国在西藏自治区的节育政策----神话与现实》(75)说：在拉萨市，汉族干部和群众实行中国内地城市的节育政策，一对夫妇只允许生育一胎，藏族干部和群众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二胎。在西藏农牧区(农牧民约占藏族总人口的90%)，虽然计划生育受到赞扬，但他们却未发现任何证据表明农牧民生育受到任何限制。相反，有个有很多子女的妇女竟然来问他们要控制生育的药。在拉萨北郊，计划生育家喻户晓、广泛实行，这里的妇女有的做过人工流产，但这里没有强制性节育政策。西藏自治区实际上正处在一个人口高出生率阶段，并不存在一个导致人口下降和威胁藏族生存的所谓强制性控制藏族人口的政策。该报告最后指出，艾夫唐之流对于中国政府在西藏强行控制人口、侵犯人权的报告与其说反映了西藏的现实，不如说反映了流亡藏人和他们的反华支持者的强烈情绪。本报告(指戈茨坦的报告----引者)表明政治上的强烈情绪如何容易误导客观事实。

注释：

(69)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西藏的主权归属与人权状况》，1992年9月21日；《西藏自治区人权事业的新进展》，1998年2月24日。

(70) Tibet: Human Rights and the Rule of Law (Geneva: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1997),

p.17.

(71) 曹长青,《西藏流亡者的声音》,香港《开放》,1998年2月号。

(72) Dalai Lama, *Freedom in Exile, the Autobiography of the Dalai Lama*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0), p.234.

(73) 参见达瓦才仁,《谁在制造西藏的神话?》,《北京之春》,1997年2月号。

(74) 同(48)

(75) Goldstein, Melvyn C. and Beall, Cynthia M., "China's Birth Control Policy in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Asian Survey* XXXI:III (March 1991), pp.285-303,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9、建设与表演

十、大兴土木。为了庆祝198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胡耀邦在1984年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决定投资4.8亿元,命令九个发达省市派出近两万人,在西藏兴建43项工程。其中能源七项、交通两项、建材两项、饲料加工一项、商业四项、文体九项、教育两项、卫生四项、市政建设两项、旅游八项、其他两项(76)。《天葬》称之为“现代化表演”,“它的目的是为了表演,为了制造一个形象,而不是为了西藏社会自身的需要。”并举出如下例子:

拉萨饭店、机场至拉萨的道路、机场宾馆、自治区医疗大楼、西藏体育馆、西藏大学教学楼、西藏电教馆、西藏图书馆、泽当饭店、那曲群艺馆、西藏大学艺术楼、拉萨剧院。

《天葬》说,从上述项目,“不难看出其中的表演性质”(77)。除了拉萨剧院和西藏体育馆外,我实在看不出上述项目为何“不是为了西藏社会自身的需要”。像自治区医疗大楼所在的自治区第一人民医院是西藏头号大医院,43项工程为之安排了三层门诊楼、两栋五层的住院楼、一层急诊部及药库、制剂室等,总建筑面积达一万多平方米,投资2200万元。在建成后的九年中,门诊人数与住院病人(大多数是享受公费医疗的藏人,包括农牧民与喇嘛尼姑)每年以20%的速度递增,尽管已有工作人员约800人,仍在超负荷地运转。在580多名专业人员中,藏族高级专业人员占30%,藏族中级专业人员占72%(以上均为1994年的数字)(78)。如此造福西藏人民的工程也是“现代化表演”、“不是为了西藏社会自身的需要”吗?

还有西藏大学教学楼与艺术楼、西藏图书馆、西藏电教馆等是为了提高藏人的教育水平,也“不是为了西藏社会自身的需要”吗?王力雄大概没有在贡嘎机场至拉萨的旧路上坐过车,所以不知道旧路之糟糕。他知道拉萨的班机都是早上起飞的,却不知道拉萨的普通职工并没有让单位派车送机场的特权,更不必说单位不在拉萨的职工以及没有单位的人、西藏以外来的人,他们不得不提前一天坐机场的大客车到机场,在那里的招待所住一夜。我每次从拉萨回内地,都要在机场住一夜,所以我知道旧的机场招待所有多小多破。我有一次去晚了,招待所已经客满,幸好发现一个朋友,已经先我到达并找到了床,让我和他挤着睡。所以机场至拉萨的新公路与机场宾馆也是必不可少的设施。那曲群艺馆是有一万多居民(大部分是藏族)的那曲镇的主要娱乐场所,夜夜爆满。拉萨饭店建成前,西藏没有星级饭店,如何发展旅游业?泽当饭

店位于藏族发祥地山南，古迹众多，1993 年该店完成营业收入 470 万元，实现利润 100 万元，创汇 128 万元（79），怎能说是“现代化表演”？43 项工程中还有羊八井地热电站扩建、羊八井至拉萨输变电、拉萨火电厂改造，以及在西藏各地的太阳能、风能开发等七个能源工程；拉萨上下水工程、贡嘎机场扩建、拉萨中学扩建、拉萨水泥厂等有关交通、建材、教育、卫生、饲料加工、市政建设等 13 个项目，以及部分商业、文化、旅游项目，恐怕也不能说是西藏不需要的“现代化表演”。至于建造大昭寺广场则是为了方便藏人拜佛，后来却方便了藏人骚乱。毫无疑问，像西藏体育馆、拉萨剧院、龙王潭公园改造等工程，并无实用价值，确有“现代化表演”之嫌。但也有不得以的苦衷，为了堵西方人权卫士的嘴（后文详述）。

为了庆祝 1995 年西藏自治区成立 30 周年，1994 年江泽民在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决定投资 23.8 亿元，在西藏兴建 62 项工程，到 1997 年底，实际投资已追加到 36.7 亿元（80）。62 项工程的具体内容（81）如下：

农技推广体系建设、左贡县玉曲河农业综合开发、仁布县解放水渠、满拉水利枢纽工程、优质油菜生产和加工、乃东县油粮加工厂、拉萨油粮加工厂、藏西北绒山羊基地、林芝东久林场开发、西藏边茶厂、丁青县水电站、巴青县水电站、措美县水电站、芒康县盐井水电站、聂荣县水电站、米林县南伊水电站、沃卡河一级水电站、朗久地热电站、拉萨西郊输变电工程、昌都电网改造、香卡山铬铁矿、申扎金矿、扎仓茶卡硼镁矿、昌都水泥厂搬迁、马查拉煤矿、西藏自治区藏药厂扩建、拉贡公路改建、格尔木炼油厂至 101 油库输油管、拉萨新华书店、中尼公路中坝至拉孜段改造、贡嘎机场储油设施、拉萨西郊长途电话枢纽楼、拉萨至日喀则光缆、12 个地面 VSAT 站、布达拉宫广场、拉萨市环行道、泽当镇道路改造、日喀则上下水工程、狮泉河镇上下水工程、自治区党校暨行政学院综合楼、37 个边境与贫困县机关建设、边境口岸建设、西藏博物馆、乡级太阳能广播电视接收站、林芝宾馆、日喀则第二中学、乃东中学、嘉黎县中学、贡觉中学、朗县中学、生育健康培训中心、自治区传染病医院、

拉萨市医院住院部、自治区党政办公楼、北京西藏大厦、塘河电厂改造、沃卡潭三级电站改造、林芝八一电厂改造、拉萨水泥厂回转窑改造、昌都粮油加工厂改造、林芝县粮油加工厂改造、西藏农牧产品加工出口基地。

这里有多少属于西藏民生所必需的，多少属于“现代化表演”，请读者自己判断。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大工程，例如布达拉宫整修工程，中国政府花了近一亿元、一吨黄金（82），旨在弘扬西藏文化。1994 年 5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古迹遗址专家参观后也对整修工程表示满意（83），如此巨大的投资当然是不可能从门票里收回的。又如投资十亿元的一江两河综合开发工程，在西藏的主要农业区兴修水利与电站、改良耕地、改良牛羊、开发荒地、推广先进技术、培训人员、建桥筑路、植草造林、建造商品粮基地、副食品基地与科技示范推广基地等，旨在并已经大幅度提高农牧业产量。开发开始后八年，占西藏人口 30% 多的该流域 70 多万农牧民已经获益，人均纯收入已由开发前的 1989 年的 602 元增加到 1997 年的 1253 元，翻了一番，高出全区农牧民人均纯收入 168 元。开发区的粮食、油菜籽、肉类与奶类产量由 1990 年的 34.5 万吨、1.19 万吨、1.43 万吨与 3.7 万吨上升到 1997 年的 45.71 万吨、2.48 万吨、2.44 万吨与 4.41 万吨。改造低产地 7.5 万亩，扩大保灌面积 30 万亩，新建良种繁育基地三万亩，蔬菜保护基地 230 亩，新建和改扩建农技推广站、畜类防治站 22 个，改良牲畜 1.45 万头，培训人员五万多人次；形成了一批“旱能灌、涝能排、田成方、林成网、渠相连、路相通”的高产稳产田；还造林 20 万亩，使开发区的年大风日数由六、七十年代的 50 天下降到现在的不足 30 天，大大减少了风沙侵害，控制了水土流失。全区连续十年农业丰收，80% 的农民盖了新房（84）。然而因为中国对藏农牧不收税，不派购征购农牧产品，所以农牧业发展后的好处

全部归藏农牧所得，中国政府收不回一分钱的投资。再如投资 18 亿元、历时八年多、总装机容量为九万千瓦的羊卓雍湖抽水蓄能电站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型水电站，它使长期缺电的拉萨电网增加两倍以上电力（85）。然而西藏的电力工业从来是政策性亏损的大户，这样巨大的投资是永远收不回来的。

达赖自传指责拉萨的“藏人区 15 瓦到 20 瓦的电灯是你能看到的最亮的灯光，但是电灯经常不亮，尤其是在冬天”。而“中国区灯火通明”（86）。他忘记了他自己统治西藏时，全西藏只有一个 125 千瓦的夺底水电站，只供他一人与极少数豪门享用，所以他根本没有资格指责中国政府向藏民供电不足。他把拉萨老城叫做“藏人区”，把拉萨新城区叫做“中国区”是错误的，也是别有用心的。所谓拉萨老城区，一般指 1950 年以大昭寺为中心的老式藏房区，面积约一平方公里，1988 年人口约三万。拉萨新城区一般指中共进藏后在老城外修建的新建筑群，1980 年的面积约 24 平方公里。1990 年拉萨有户口的居民为 139810 人，其中藏族 96341 人，占 69%；汉族 40418 人，占 29%，其他民族 3051 人（其中大一半是中共进藏前就住在拉萨的回族，他们说藏语，信伊斯兰教），占 2%（87）。把全市的藏人数约十万减去老城的藏人数三万，还有七万藏人住在新区，并大大超过全市的汉人数，怎么能把新区叫做“中国区”（在达赖喇嘛的语汇里，中国人即汉人）呢？我在拉萨时就深受缺电之苦，冬天水枯，没有水力发电，缺电更甚，所以中国政府要修羊卓雍湖电站以造福藏人占 69% 的全体拉萨居民。然而此举却受到《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指责，说是“这些建设的主要目的是为汉族居民和建在藏区的或中国的各大工厂供电。而对西藏人民不仅毫无益处，反而建造这类水利电站直接破坏。西藏的自然环境，威胁。人民的健康，从而损害了西藏人民的总体利益。”拉萨新区的藏人都与汉人混居在单位分的房子里（我在西藏时的邻居大多数是藏人），中共想单独给汉人供电也做不到。把羊卓雍湖的电送到内地去，不啻是现代化的天方夜谭，只有神话思维者才想得出来。不建电站要受到达赖喇嘛的攻击，建设电站又要受到“西藏流亡政府”的攻击，这叫中国政府如何是好？

注释：

（76）《当代中国的西藏》（上），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1991 年，425-426 页。

（77）《天葬》，399 页。

（78）（79）多吉占堆，《四十三项工程惠泽今日高原》，《中国西藏》，1995 年第 1 期。

（80）张忠、王建新，《援藏工程发挥显著效益》，《人民日报》海外版，1998 年 5 月 16 日。

（81）边吉，《援助西藏的六十二项工程已隆隆启动》，《中国西藏》，1995 年第 1 期。

（82）《江泽民、克林顿记者招待会》，《北京之春》，1998 年 8 月号。

（83）刘伟，《给历史留下一座丰碑》，《西藏脚步声》，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1996 年。

（84）贺广华，《西藏加快一江两河开发建设》，《人民日报》海外版，1994 年 4 月 7 日；刘伟，《充满希望的高原》，《西藏脚步声》，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1996 年；王建新、张忠，《西藏综合开发一江两河，七十多万农牧民获实惠》，《人民日报》海外版，1998 年 10 月 3 日。

（85）白冰，《羊卓雍湖电站竣工移交》，《人民日报》海外版，1998 年 9 月 21 日。

（86）Dalai Lama, *Freedom in Exile, the Autobiography of the Dalai Lama* (New York: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0), p.233.

（87）马戎，《西藏的人口与社会》，同心出版社，北京，1996 年，409-428 页。

10、输血与肿瘤

十一、巨额补贴。以上各项都需要大量的钱，西藏的企业（包括商业）只亏不赚，农牧民则不缴税，这钱从何而来？当然只有靠中央政府补贴。下面是列年来中国政府给西藏自治区政府的财政补贴（不包括专项基建投资如上述大工程与驻军费用）及其占自治区政府支出的百分比（88）：

年份	中央补贴(万元)	补贴占支出%
1960	2725	18
1965	11804	104
1970	18345	173
1975	29179	122
1980	60104	129
1985	105772	103
1989	123715	104
1990	124389	96
1995	313440	90
1997	339776	89

从上表可以看出，从文革爆发前夕的 1965 年（自治区正式成立之年）到文革结束前夕的 1975 年（毛泽东时代），中国政府给西藏的财政补贴年增 15%；从 1975 年到 1980 年的华国锋时代年增 21%；从 1980 年到 1989 年的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时代年增 12%；从 1989 年到 1997 年的江泽民时代年增 22%（这里算出的年增率只是近似值，旨在给读者一个大致的概念，不是统计学意义上的年增率）。无论哪个时期，都超过了中国财政收入的年增率。

上面是纵向比较，再来看横向比较。1988 年内蒙古人均工农业产值为 986 元，西藏仅为 440

元，不足内蒙古的一半。在消费水平上，情况颠倒过来。同年内蒙古职工平均工资为 1641 元，外加社会福利费 213 元；西藏职工平均工资为 2739 元，外加社会福利费 582 元。西藏比内蒙古高了 79%。1990 年中央给内蒙古的财政补贴为人均 130 元，而给西藏的为人均 566 元。1988 年中央财政补贴占各自治区政府开支的比例如下：广西 45%，内蒙古 53%，新疆 60%，宁夏 63%，西藏 100%。1994 年广西和内蒙古的经济发展使中央补贴在其总收入里的比重降低到 13% 和 27%，宁夏和新疆变化不大，而西藏仍高达 83%（89）。1997 年中央给内蒙古的补贴的比重又降低到 22%，而西藏反而上升到占其总收入的 92%，总支出的 89%（是年西藏财政赤字）（90）。从 1993 年到 1997 年，西藏的国内生产总值连续五年增长达到两位数，1997 年高达 13.4%（91），其实这个数字只及中央给西藏的财政补贴年增长率的一半，有什么可夸耀的呢？

这么多钱用到哪里去了？首先，给西藏的 15 万多国家职工（其中四分之三为藏族）发工资。1997 年西藏国家职工工资总额为 164175 万元（16.4 亿元），占当年自治区政府总支出 381952 万元（38.2 亿元）的 43%。这只是给职工的现金，如加上职工的住房、医疗、水电、燃料、交通及其他福利（西藏各单位经常发放食品），其总数超过一半。其次是行政企业管理费，1997 年仅现金支出为 96864 万元（近十亿元），其中很大一部分花在公费吃喝与旅游上。再次是文化教育卫生事业费，1997 年为 78837 万元（近八亿元），这是为西藏人民做好事实事。第四是价格补贴，1997 年为 16680 万元（1.7 亿元）。西藏人民必需的茶、盐、糖、布、服装、燃油（汽油、柴油、煤油）、药品、日用百货、烟酒、食品、工农业生产资料等都要从内地调入，其价格必须和内地差不多，这巨额运费就要由政府补贴。1992 年政府对每市斤本地粮（在西藏议价收购的）补贴 0.455 元，对内地粮每市斤补贴 0.67 元，而销售价本地粮为 0.43 元，内地粮为 0.457 元，不算收购、储藏与运输成本，仅仅补贴价就高于销售价。甚至从尼泊尔进口的粮价都比内地运来的粮食成本低 30%。八十年代中期政府撤消国营副食店，给全体市民发副食补助，让他们自己去自由市场买菜。1993 年政府放开粮价，给予全体市民粮食补贴，结果引起藏人示威。第五是企业（工业、商业、建筑、运输等）亏损，1997 年国有企业计划亏损为 11979 万元（1.2 亿元）。这笔钱也和价格补贴一样，花在西藏人民头上。例如西藏发电成本巨大（火电厂的燃油须从青海送来，水电站建设管理成本高昂），但对市民只象征性地收一点费，对农牧民免费，这亏损当然只能由政府补贴。煤气灶与自来水也一样。还有些企业亏损连连，因有许多藏族员工，也只好由政府补贴维持（汉族员工可以内调）。加以为了解决藏族市民的就业问题，所有的企业都人浮于事，毫无效率可言，岂有不亏之理？第六是支援农牧业，1997 年高达 14169 万元（1.4 亿元），计有小型农田水利和水土保持补助费、支援农村合作生产组织资金、农村农技推广和植保补助费、农村草场和畜禽保持补助费、农村造林和林木保护补助费、发展粮食生产专项资金支出等项目。如前所述，中国政府对农牧民不收税，不派购征购农牧产品，却免费或低价提供生产资料、技术服务，低息或无息提供、甚至白送贷款，自然要大量贴钱。第七是“落实政策”，1997 年在自治区财政支出表上的“其他”项高达 51384 万元（五亿多元），同年自治区银行的“国家对个人其他支出（相对于职工工资奖金而言的其他）”则高达 61488 万元（6 亿多元）（92），占自治区财政当年支出的 16%。据了解这是对寺庙与个人“落实政策”的赔偿，包括文革前与文革初寺庙被砸、佛像被毁与个人被抄家的赔偿，可能还包括给寺庙与僧尼的津贴。上述各项相加略微超过同年自治区政府的总开支数，是因为文化教育卫生科学事业费等项中包含了职工工资，计算时有重叠。

综上所述，西藏的经济是不折不扣的输血经济，1992 年前西藏的财政全靠中央补贴，其后也基本上靠中央补贴。据知情者说，从 1992 年起西藏财政之所以小有收入，主要不是来自发展生产，而是来自向内地“转让”中央给予西藏的优惠政策的收益，即把中央给西藏的平价（计划价）物资以议价（市场价）倒卖给内地；还有把中央允许西藏免税进口的物资加价转卖给内地。



中国政府给西藏的财政补贴在中国各少数民族中是最优厚的，藏族已经成为中国 56 个民族中名副其实的贵族。

《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也承认中国政府给了西藏财政补贴，但说其中“绝大多数实际上只是做为中国干部和工作人员的平常开支费用以及为迁移定居西藏的中国人提供各种补贴而已”；又说“在所谓的财政补贴之分配过程中，在城市与乡村间有着惊人的悬殊”。美国国务院 1997 年西藏人权报告也说：“中央政府和其他中国省份给西藏经济大量津贴，从 1989 年至 1996 年每年递增 10.5%。90% 以上的西藏预算来自自治区外。西藏还享有广泛的经济与税收优惠政策。”“总的说来，政府的发展政策提高了许多藏人的生活水平，但许多好处被汉人捞去了。”

诚然中国政府给西藏的财政补贴并未平均分给每个藏人。其主要受益者是 15 万多国家职工，其中四分之三约 12 万是藏族（1997 年），可见至少四分之三的好处被藏族捞去了。以每家两个孩子并且不算老人计，藏族国家职工及家属达 23 万多，占西藏藏族人口的 10% 左右，占西藏藏族市民的 87%（有关统计数字出处见本章前文）。换言之，中国政府用汉族纳税人的血汗包养了十分之一的藏族，使之变成了藏族中的贵族、中国的贵族中的贵族。他们的人均收入高于中国市民的人均收入，实际人均生活水平与北京市民不相上下。占西藏藏族人口约十分之九的农牧民也从免税政策、支农政策、物价补贴、免费医疗教育及社会福利等中分享了部份中央的财政补贴，但只能说中国政府对他们实行半养，他们在相当程度上还得靠天吃饭。由于西藏的天特别严峻，他们的人均收入低于中国农民的人均收入，这就与藏族市民构成了巨大的反差。中国政府目前还没有财力把藏农牧也全部送进城里包养起来，即便有，西方人权卫士与达赖喇嘛更要指责中国政府毁灭西藏文化了。西藏的城镇特别是拉萨就像荒凉原始的世界屋脊上的畸形繁华的现代化绿洲。正如《天葬》指出的，西藏自身的资源不可能产生和供养现代化，西藏的现代化只能由外力（中国政府的财政补贴即汉族纳税人的血汗）来维持，《天葬》因此把现代化称为“西藏的肿瘤”，说它不是西藏的繁荣，而是西藏的疾病（93）。这个问题留待后文讨论。

达赖喇嘛说：“中共的目的只有掠夺。他们对西藏作的极少的投资，宣传得非常强，但是对他们从西藏掠夺去的东西，却一声不吭。（94）”达赖喇嘛举得出中国政府从西藏“掠夺”的具体内容与证据吗？如前所述，西藏历代达赖喇嘛与噶厦政府搜刮的财宝早在 1950 年就被达赖喇嘛自己运到锡金去了。1959 年叛乱时，大批逃亡贵族、活佛、藏官又带走了自己的财宝，留在西藏的可供中共掠夺的财宝也就所剩无几。中共自 1980 年以来年年都在向寺庙与旧贵退赔，其数额每年高达数亿元。直到 1997 年，都占了自治区财政支出的 16%。

《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甚至还说：“其实，如用现金数额来计算，仅仅从西藏运往中国的木材，其价值便大大超过了中国声称的所谓给予西藏的财政补贴数。”真是天大的笑话。1997 年运出西藏的木材共 12931 吨（95），是年中央给西藏的财政补贴为 339776 万元。一公斤木材能值 263 元吗（且不说伐木和运输的高昂成本）？何况出售木材的收益也和西藏开矿的收益一样全部归西藏自治区财政，用在西藏各项包养藏人的事业上，中央政府不收分文。连“西藏流亡政府官员”达瓦才仁都承认：“西藏暂时来说在物质利益上面对中共没有什么好处（96）”，非常难得他说了一句真话。

注释：

（88）西藏自治区统计局，《西藏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1998 年，99 页。

(89) 马戎,《西藏的人口与社会》,同心出版社,北京,1996年,218页。

(90)《内蒙古综合经济实力增强》,《人民日报》海外版,1998年12月25日。

(91) 罗布次仁,《西藏经济去年增长一成多,再次超过全国平均发展速度》,《人民日报》海外版,1998年1月5日。

(92) 本段统计数字见:西藏自治区统计局,《西藏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1998年,60、267、104-105、101页;粮价比较数字见马戎,《西藏的人口与社会》,同心出版社,1996年,204-205页。

(93)《天葬》,421-422页。

(94) 薛伟,《像朋友那样真诚相待----达赖喇嘛访谈录》,《北京之春》,1996年4月号。

(95) 西藏自治区统计局,《西藏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1998年,234页。

(96) 亚衣,《让西藏流亡者早日回归家园----访<西藏通讯>主编达瓦才仁先生》,《北京之春》,1997年11月号。

## 第十章：法轮常转

### 1、恐惧与崇拜

中共在平叛民改中捣毁了大部分寺庙,遣散了大部分僧尼;在文革中捣毁了大部分剩下的寺庙,遣散了全体剩下的僧尼,还禁止一切宗教活动。说毛泽东企图消灭西藏的佛教,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然而由西藏的自然(天)决定的藏人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道)并未因此改变,他们需要新的宗教来填补心灵与生活的空白,这个新教就是毛泽东的共产乌托邦主义(简称毛教)。

《天葬》对西藏的“神界轮回”作了精彩的论述。它说西藏的宗教起源于莫名的恐惧,由恐惧而敬畏,由敬畏而产生神。毛泽东用恐怖手段打倒了西藏的旧神,藏人就把毛当作新神来崇拜。邓小平放弃了恐怖手段,藏人就不崇拜他,重新崇拜达赖喇嘛。

法国十八世纪哲学家霍尔巴赫说过:“恐惧第一个在地上创造出神”;“人之所以迷信,只是由于恐惧。人之所以恐惧,只是由于无知。人缺乏对于自然力量的认识,于是设想自然受一些看不见的势力支配,认为依靠这些势力,想象它们可以发起脾气来对自己不利,也可以有利于自己的族类”(1)。西藏地广人稀,自然环境又特别严酷,孤立无援的藏人的恐惧自然格外强烈。自然而外,还有社会。西藏的统治阶级特别残酷,他们的刑具并不像《天葬》说的那样只是“文化象征”(2),尊贵如藏军总司令龙厦尚且惨遭挖眼就是明证。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无论是农奴还是贵族,都无法摆脱对自然、对社会、对命运的恐惧,神于是应运而生。

藏人的原始宗教是本教，主张灵魂不死、灵魂转移。这是所有原始人包括汉人的祖先的本能，导源于神秘莫测的梦。那时人们不理解梦的生理原因，认为是灵魂的活动。死人会出现在梦里，可见人死后灵魂仍然存在，至今有些汉人还认为死人会“托梦”。由于本教的教义较简单，敌不过庞大复杂的佛教。更重要的是，佛教为时刻生活在恐惧中的藏人指明了一条简明扼要（这对没有文化的藏人特别重要）、极为诱人而又无从验证（这也同样重要）的出路——因果报应、超度来世，从而使几乎全体藏人都沉溺其中，难以自拔。由此可见，佛教并不是藏族与生俱来的宗教，藏人自古以来就有接受外来宗教的传统，只要它适合他们的需要。

藏人同时还有崇拜强者的传统。他们的神既然是从恐惧中产生的，自然具有比使他们恐惧的东西更强大的威力，否则如何保护他们免于恐惧？到过喇嘛寺的非藏人士一定会对其偶像的狰狞恐怖与色情淫荡产生深刻印象，所谓欢喜佛就是两者结合的典型，那是汉传佛教绝对没有也无法想象的。关于色情淫荡问题暂且不论，只谈狰狞恐怖。那既是他们害怕的东西，又是他们崇拜的偶像。他们在历史上接受过蒙古人与满洲人的统治，因为后两者显示过强大的军事威力。当英国人刚开始进入西藏时，他们坚决将其拒之门外。然而当英国侵略军在 1904 年杀死数千藏人，打进拉萨，用实力表明自己比满清更强大后，藏人就把自己的崇拜由满清转向英国，达赖自传中感谢英国侵略军头目荣赫鹏、赞美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文字就是明证。那么毫不奇怪，当毛泽东通过平叛民改打断西藏上层的脊梁骨后，藏人包括被打断了脊梁骨的上层人士也会转而崇拜毛，何况毛也确实给了西藏下层人民以看得见的利益呢？

如前所述，藏人信仰佛教，是因为它许诺他们通过现世的修行可以换取来世的好运。正如本书第二章所引戈伦夫的话说的那样，西藏的穷人安于现状只是出于无奈。贪图享受、要求尊严是人类的本性。穷奢极欲、爱摆排场的西藏上层就为农奴和奴隶做出了榜样。农奴和奴隶之所以虔诚拜佛，不就是为了来世能像眼前的上层那样尊荣富贵吗？那么当毛泽东打倒了上层，把他们的土地、牲畜、房屋、衣物无偿分给农奴和奴隶，并把原先的上下层的社会地位翻了个个，使后者在现世就享受到他们渴望于来世的东西时，他们岂有不欢喜若狂、感恩戴德之理？

注释：

（1）霍尔巴赫，《神圣的瘟疫》，《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北京，558 页。

（2）《天葬》，294 页。

## 2、毛教的兴衰

藏族百姓对毛泽东的崇拜既然是建立在恐惧加感恩的双重基础上的，这种感情当然要比原先仅仅建立在恐惧上的宗教感情更加强烈。然而藏族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毕竟不同于汉族，他们除了出于人类的本性贪图现世的享受外，还要超度来世。而中共的意识形态却是无神论，不承认有来世。它不仅捣毁了大部分寺庙、遣散了全部僧尼、禁止一切宗教活动，还反复向藏人宣传没有来世、幸福只在现世的思想，那么藏人如何解决超度来世的问题呢？

瑞士哲学家兼心理学家皮亚杰（Jean Piaget, 1896-1980）提出的发生认识论（Cognitive Development）（3）认为，人们在接触新事物时，会自觉不自觉地用自己头脑里固有的概念、

逻辑、价值体系去诠释新事物，将其解释、翻译成自己可以理解的东西，他称这种机制为“同化”（assimilation）。当年西方探险家斯坦因去敦煌盗窃文物时，哄看守人王道士说，他是印度的唐僧，倒朔着唐僧的路线到中国来取经了，后者马上对这个洋唐僧肃然起敬。英国人与俄国人拉拢藏人时，都哄他们说，只有英国女王与俄国沙皇才是西天大菩萨的化身。十三世达赖喇嘛确曾相信过后者，还接受了后者赐给他的东正教大主教金色法衣。诚然，中共从来不曾告诉藏人说：只有毛泽东才是西天大菩萨的化身，只有共产主义才是最好的宗教。中共只告诉藏人，只有毛泽东才是藏人的大救星，只有共产主义才是真正的天堂。在同化机制的作用下，藏人马上把毛泽东诠释为西天大菩萨的化身，特别是文殊菩萨的化身（如前所述，藏人曾把清朝皇帝当作文殊菩萨的化身来崇拜）；把共产主义诠释为佛教里的天堂。文革捣毁了寺庙与佛像，禁止一切佛事，却大搞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刚好填补了藏人的宗教感情与仪式需要。

藏人于是把毛像当成佛像，把鞠躬敬礼当成磕头，把毛的著作、语录当成佛经，把毛语录牌当成玛尼堆（藏人常在路口堆石，插上经幡，围之转经，藏语称为玛尼），把“早请示、晚汇报”当成祈祷，把去北京当成朝圣，把“毛主席万岁”当成“六字真言”，把“毛主席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当成毛的“转世灵童”……确曾有许多藏人围绕毛的塑像、语录牌转经。“早请示、晚汇报”、唸语录、唱颂歌这一套本是中共从基督教那里学来的仪式（祈祷、唸圣经、唱赞美诗），用以取代佛教仪式也顺理成章，如前所述，藏人本有接受外来宗教的传统。至于某些细节上的差异——诸如毛的服装扮相与菩萨大不一样；佛教里的天堂是在另一个世界，而共产主义天堂则在子孙后代的人世；转世灵童只能在其前世死后诞生，而毛泽东死时华国锋已经 56 岁了等等——藏人倒不甚计较，可以忽略不计。1982 年我进藏时，华国锋已下台一年，内地已看不到他的相片，西藏的党政机关和百姓家里，依然并排悬挂 毛华的像。当年十三世达赖喇嘛把俄国沙皇当成“北方佛法大王”，把沙皇让德尔智带给他的东正教大主教的金色法衣当成袈裟时，也不曾计较过扮相与式样的差异——十三世达赖喇嘛虽未见过沙皇，却见过德尔智带给他的沙皇照片，他的秘书长还随德尔智去过俄国，见过沙皇。

当然也有藏人不为毛教所动，坚信佛教，偷藏佛像，在夜深人静时悄悄拜佛、祈祷。戈茨坦的新着《雪狮与龙》就说起有个藏女在文革中冒着被邻居检举的危险在家里点酥油灯拜佛的故事（4）。但文革中藏人狂热地捣毁寺庙与佛像、疯狂地检举、批斗“达赖特务”（已故的西藏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卢耀曾的妻子、藏人达噶在文革中曾被检举为“达赖特务”，遭到残酷批斗，卢也陪斗）、至今坚决要求独立的藏人仍崇拜毛泽东（5）等事表明，许多藏人确曾虔诚信仰过毛教。

唐山地震，毛泽东驾崩，华国锋也很快下台。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放弃对西藏实行恐怖手段，改为用现代物质文明收买。藏人便不再崇拜他们，转而崇拜美国。他们从种种渠道（中国的电视报刊、进藏汉人的言行、达赖和西方的电台、归国探亲的流亡藏人）得知，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连中共都害怕它、崇拜它、千方百计地迎合它、讨好它，而美国是支持达赖喇嘛的，所以达赖喇嘛也和美国一样强大。中共从 1979 年起邀请了几批被他们赶走的达赖喇嘛的代表团衣锦还乡、待为上宾一事向藏人证明，中共也怕达赖喇嘛，藏人于是重新崇拜达赖喇嘛。藏人在历史上曾有过恐英（国）崇英（国）的传统，此时很自然地转换成崇美媚美。邓、胡、赵给藏人享受现代物质文明，他们开始还有点感恩。后来，他们天天从达赖与西方的电台、达赖喇嘛派遣的间谍、喇嘛尼姑那里听说，中共消灭了 120 万藏人、掠夺了全西藏、在西藏犯下了滔天罪行，中共也一再向藏人道歉，承认毛泽东时代的错误，答应赔偿，他们便不再感恩，而把中共给他们的所有好处都看成是赎罪，无论多少永不满足。因为人欲无止境，何况他们从电视里看到了西方生活方式，中共给的那些算什么？洋人个个有汽车，中共能给每个藏人发一辆汽车吗？

邓、胡、赵反对个人迷信，不再大量发行领袖相片并对之搞崇拜仪式，这当然是好事。然而藏人有崇拜活的偶像的本能需要。中共废止了毛泽东的“转世灵童”华国锋，1983年初在西藏下令禁止悬挂华的相片，却没有发行新的领袖的相片，藏人就用达赖喇嘛的相片来填充空白。1983年中共发行过六十年代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在一起的相片，但邓的形象很不显眼，也未用行政权力大力推广（我当时在西藏）。1986年9月自治区党委与政府办公厅曾向全体藏人赠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画像，这两个办公厅联合发出的通知说：“悬挂、张贴和摆放领袖像，是一种符合西藏人民传统习惯和心理素质的宣传教育形式。在赠送中央政治局常委彩色肖像时，要热情细致地介绍每一位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姓名、职务，宣传他们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新的‘长征’，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所立下的丰功伟绩。”为此还举行了隆重的赠送仪式（6），说明西藏当局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可惜他们忽略了如下环节：第一，既要树立偶像，就只能独树一个。不突出个人，搞集体领导，不符合藏人的心理需要，没有用处的。第二，既要树立偶像，就要有相应的强制性的崇拜仪式，如文革中的“早请示、晚汇报”，唸语录、唱颂歌，到处立塑像、语录牌，高呼万岁等等，最好是磕头，方能收旗帜鲜明、印象深刻、条件反射之效。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要用一字不识的藏人也听得懂的宗教式的语言（而不是藏人听不懂的“新长征”语言），大张旗鼓地宣传唯一的偶像，把今世与来世的一切好事全部归功于一人，将其说成是无比伟大、无所不能、战无不胜、法力无边的神，方能把达赖喇嘛从他们的心中挤走。当然他们即使想到了也不敢做，那么他们赠送的肖像就只能被藏人当作废纸。说句笑话，如果中共那时在西藏大量发行邓小平的相片，大搞文革式的个人崇拜，并告诉藏人：“邓小平就是文殊菩萨（或观音菩萨）的化身，你们只要崇拜他，就可超度来世。”也许藏人就不会那样狂热崇拜达赖喇嘛，也不会发生那样严重的骚乱。

邓、胡、赵还拨款三亿多元，修复了1787座寺庙，招收了46380名僧尼，由政府发薪或津贴（西藏数字，不包括川青甘云藏区），使藏人重新回到熟悉到骨子里去的佛教氛围中去，显赫一时的毛教顿时灰飞烟灭，达赖喇嘛重新变成至高无上的神。

注释：

（3）Piaget, Jean, *Logic and Psychology*, Translated from French by Marjorie Gabi (New York: Basic Books, 1957); *Insights and Illusions of Philosophy*, Translated from French by Wolfe Mays (New York: World Pub. Co., 1971); *Adaptation and Intelligence: Organic Selection and Phenocopy*, Translated from French by Stewart Eam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4）Goldstein, Melvyn C.,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60.

（5）《天葬》339页说藏独示威者也崇敬毛泽东；徐邦泰1996年去达兰萨拉访问时，问一个坚决要求独立的藏族青年领袖“汉人中您最佩服的是谁”，后者竟回答“毛泽东”——徐邦泰，《中庸是金箴》，《中国之春》，1997年11月号。

（6）《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1995年，321页。

### 3、宗教与文化

自 1980 年胡耀邦视察西藏以来，中共为了向西方显示其尊重西藏人权的诚意，与达赖喇嘛展开了一场狂热吹捧西藏文化的竞赛。胡在西藏干部大会讲话时就带头吹捧西藏文化，时至今日，中国的新闻媒体与出版物包括学术刊物与著作对于西藏文化仍只许说好，不许说坏。谁要是指出西藏文化的缺陷或不足，就是大汉族主义、违反民族政策（这与西方文化人类学的文化相对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妙）。最奇怪的是，中国所有媒体与出版物在提到藏族与藏人时，都要说成“藏民族”、“西藏人”、“藏族人”、“藏族同胞”或“藏族人民”（有时简称为“藏胞”与“藏民”），绝对不能单独用“藏族”与“藏人”两字，似乎称他们为藏族与藏人就是不敬，尽管它们提到汉族与汉人时却一贯单独称“汉族”与“汉人”，并不以为有什么不敬。

自 1985 年以来一直担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西藏自治区党委文教书记的丹增更是张口闭口“我们西藏拥有世界上最伟大、最悠久、最光辉、最灿烂的文化”，“西藏的宗教就是西藏的文化”（这都是我亲耳听到的）。姑且不论西藏文化是否是世界上“最伟大、最光辉、最灿烂”的文化，单说“最悠久”就不够格。就拿西藏的佛教来说，它是从印度传来的，可见西藏的宗教没有印度的悠久。诚然佛教传入之前西藏有本教，但本教能被佛教取代，可见本教不如佛教伟大、光辉、灿烂。据“西藏流亡政府”机关刊物《西藏通讯》每期末页介绍，藏文是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时代创制的，藏文字母则是仿效梵文字母的。那时汉文已有了数千年历史，那么藏文也没有汉文与梵文悠久。甚至达赖喇嘛都要比丹增谦虚一点，前不久达赖告诉一个汉人说：“西藏的佛教是最好的佛教。（7）”虽然这话能否得到泰国、缅甸、斯里兰卡、柬埔寨、日本、韩国等国的佛徒的首肯尚属疑问，他们似乎从未请达赖喇嘛去布道、加持，但至少他没有说“最伟大、最悠久、最光辉、最灿烂”之类的胡话。达赖喇嘛大肆吹捧西藏文化不足为奇，他就是要煽动藏人的民族自大情绪与排汉仇汉心理。中共信任与重用的西藏文教书记在吹捧西藏文化上比达赖喇嘛还要达赖喇嘛，中共岂不是自挖墙脚吗？

不过丹增有句话说对了，西藏文化的确是宗教文化，类似于被天主教会垄断的欧洲中世纪文化与汉族的儒家文化（有人称之为儒教），其共同特点是政教合一（特指西藏与欧洲）、压抑人性、轻视科技。欧洲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与资产阶级革命，打倒了政教合一，改造了中世纪文化，使之顺应自由、民主、人权、理性、科学的历史潮流。中国汉族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于一役，“打倒孔家店”，提倡白话文，号召解放个性，从西方引进科学与民主，改造了儒家文化，使之顺应自由、民主、人权、理性、科学的历史潮流（当然没有欧洲那么彻底）。西藏从未出现类似的文化宗教改革运动，更未出现理性启蒙运动，西藏文化至今仍然是一个中世纪式的宗教文化。虽然中共废除了政教合一，在文革中“消灭”了西藏宗教，但 1980 年后，中共又不遗余力地恢复了西藏宗教，于是中世纪式的西藏宗教按其本性又要求恢复政教合一，每次骚乱都由喇嘛尼姑打头阵就是明证。西藏宗教重又吸收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劳动力（僧尼越来越多）与民众的时间精力，使之不能用于发展生产。藏文至今无法译介科技知识与现代社会科学。更重要的是，喇嘛教的非理性的思维方式继续束缚藏人，使之无法发展科学与民主的必要前提——理性思维，藏人重又狂热崇拜达赖喇嘛（比毛泽东的个人迷信更厉害）就是明证。

甚至藏人中的有识之士也在摇头。有位至今仍在西藏工作的朋友告诉我，他曾听到西藏文化厅的两个藏干议论宗教。来自拉萨的藏干说：西藏的“宗教政策”落实得不够，西藏的宗教还应大发展。来自甘南的藏干则说：藏族之所以落后，就是宗教麻醉人民，阻碍社会和科技发展，现在宗教搞过头了。然而中国政府自 1980 年以来给西藏巨额补贴，又派出大批汉族专业人员进

藏大兴土木并管理各种现代设施，把现代物质文明免费奉送到藏人手中，让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地坐享其成，根本感觉不到有学习科技知识、培养理性思维的必要。中共不计血本培养的藏族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文史哲专业的，不学科技就不知道西藏文化的缺陷，也不知道天高地厚。在对西藏文化只许说好不许说坏的指导思想与舆论环境下，他们大都成为和丹增一样的西藏文化至上主义者，西藏大学藏文系的学生在历次骚乱中打冲锋、被称为藏独系就是明证。1988年3月5日骚乱时，西藏大学藏文系学生班长洛桑丹增持刀刺死了在大昭寺外面徒手站岗的武警班长、康定藏人袁石生（8）。他被捕后，他的同学纷纷去探监，尊他为藏独英雄。他被判死缓，由于美国某些议员的关切，他被一再减刑。我在西藏时就听一个藏族同事说过：我们西藏有世界上最好的文化，我们藏族不需要你们汉族！----虽然他也和所有的藏人一样不遗余力地争工资、争福利、争房子、争美差（这些被争的东西都是中共用汉族的血汗提供的）。中共用汉族的血汗包养西藏的结果是被包养的藏人得出藏族不需要汉族的结论，可谓始料未及。

注释：

（7）曹长青，《抵抗撒旦的和平偶像----达兰萨拉采访达赖喇嘛记》，《世界周刊》，1998年4月26日。

（8）秦文玉，《神秘雪域》，天地图书有限公司，香港，1995年，206-208页。

## 4、农牧民不关心独立

我在上面用“藏人”一词，当然是泛指，具体到每个藏人，情况又很不一样。一般而言，文化程度越低、年龄越大、离拉萨或各中心城镇越远、从中国政府那里得到好处越少（相对而言）、与汉人交道打得越少、生活越贫困也越传统化的藏人如大多数农牧民，对达赖喇嘛越虔诚、对中国政府越尊敬、对汉人也越友好；反之，文化程度越高、年龄越轻、离乡村越远、从中国政府那里得到的好处越多、与汉人关系越密切、生活越富裕也越汉化的藏人如藏族干部、职工、市民，对达赖喇嘛越不虔诚、对中国政府和汉人越仇恨，这种矛盾的现象是怎样产生的呢？

前一种藏人是本色的藏人，他们只有宗教意识，没有政治、国家意识。他们虽然从宗教感情出发，对达赖喇嘛最虔诚，却听不懂达赖与西方电台的政治宣传，不知自由、民主、人权、独立为何物，也不崇美媚美，没有民族主义狂热，没有政治野心，所以不恨中国政府；远离花花世界（中心城镇），不看也看不到电视，对生活水平的期望值低，并不狂热追求现代物质文明与现代商业娱乐，与汉人接触也少，所以不嫉恨汉人；由于中国政府自1980年以来，不仅不迫害藏人，不限制宗教活动，反而分地、畜到户，取消农牧税和农牧区工商税，给予农牧民大量好处（全民公费医疗与教育、免费或廉价生产资料与技术服务、各种优惠贷款与福利救济等），他们对中国政府和汉人颇为感激、尊敬。用一个藏族老农的话来说：“共产党管现世幸福，达赖喇嘛管来世幸福。”现世来世的幸福他们都要，于是在物质上认同中共，在精神上认同达赖，两者并行不悖，也不觉得有什么矛盾。当他们刚好身在骚乱现场（这样的概率当然是很小的）、受到喇嘛尼姑以达赖喇嘛名义的煽动、处于宗教狂热中时，也会跟着高喊独立、打砸抢烧汉人商店与政府机关；当他们蹲在家乡的承包地里、享受中共的好处时，又尊敬政府、善待汉人。中共对藏农牧只实行半包养政策，尚未养成他们一切依赖中共供给的心理。即便家乡的喇嘛尼姑向他们宣传达赖喇嘛的独立主张，他们也不过是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

，他们想不出独立对他们有什么好处。这样的藏人在农牧民中占了绝大多数，所以拉萨的骚乱始终扩散不到乡下去。1990 年全国人口普查时发现，西藏“农林牧渔业劳动者”占全区在业人员的 79.1%，其中文盲半文盲占 79.4%，小学毕业占 19.7%，初中毕业占 0.8%，高中专毕业占 0.1，大学毕业为零（9）。如此低下的文化素质是藏农牧一方面虔诚信教，另一方面又听不懂藏独宣传的根本原因。

如今 50 岁以上、出身农奴和奴隶的藏人对农奴制的黑暗残酷与中共的解放之恩尚有记忆，他们至今认为“毛主席的恩情是永远不能忘记的”。近年来中共在寺庙里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运动”时，请要求独立的年轻喇嘛的父母去给他们忆苦思甜，据说还颇有成效。有位朋友告诉我，1986 年他去当雄乡下时，听说有个 40 多岁的乡党支部书记“请假回家”（退党辞职）了。我的朋友去采访他，他说现在共产党为资产阶级服务，穷人贷不到款，富人贷款送上门；寺庙越修越大，（乡村民办）小学却因没钱解散了，所以他不干了。谈话间，他向一位乡邻借两百元钱，后者说只有二、三十元。这时一个昔日的“富牧”的儿子表示愿意借两百元给他。他说：“你的钱再多我也不要。”“富牧”之子说：“你怎么这样说，你以前也没有整过我嘛。”他说：“我以前不整你，是因为党的政策好。”人民公社解散后，农牧区基层干部失去了权力，他们中许多人因不善于经营而变成了穷人，而昔日被专政的“农奴主”、“牧主”、“富农”与“富牧”及其子女却因头脑灵活而发了财。但中共当年培养出来的翻身农奴干部依然保持了当年的“阶级立场”。虽然不合时宜，却至少说明，藏农牧中还是有一批人至今对达赖喇嘛与旧西藏的社会制度持仇恨态度。如果藏独真的成了气候，只要中共一声令下，他们就会坚决投入反对藏独的战斗中去。至于说他们已经老化，很快会消逝，那么他们是达赖喇嘛的同辈人，可以奉陪到达赖喇嘛也消逝。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1988 年去西藏进行问卷调查时意外地发现，拉萨老城市民中有 4.8% 不信教，而农牧民中竟有 12% 不信教（10）。据知情者说，去拉萨朝佛的藏人在“喇嘛书记”伍精华时期达到高潮，1990 年以来大幅度减少。可见信教与否和文化程度有时并不成正比关系。推想起来，在经济改革大潮中，大多数拉萨老城市民的生活反而没有某些头脑灵活的农牧民改变大，后者中间某些人（如前所述，这些人往往是文革中的“阶级敌人”及其后代）学会或适应了新的、现代化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尝到了个人奋斗、精明计较、理性思维、发家致富的甜头，原有的安贫乐佛、不思进取、超度来世的宗教观念因而被轰毁。不言而喻，藏人不信教的比例要高得多，可见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西藏总的气候（天）固然恒古不变，但城镇及其周围与公路沿线的小气候（局部的天）却变了，那里的藏人的文化心理结构（道）也会跟着变，这就是皮亚杰所说的“顺应机制”（后文详述）。

注释：

（9）西藏自治区人口普查办公室，《西藏自治区 1990 年人口普查资料》，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1992 年，第 2 册，366 页、421 页。

（10）马戎，《西藏的人口与社会》，同心出版社，北京，1996 年，238 页。

## 5、藏族精英恩将仇报

城里的中青少年藏人在生活方式上已经汉化西化了。他们爱吃大米、川菜甚于糌粑、羊肉，爱喝啤酒、可口可乐甚于青稞酒、酥油茶，爱穿西服、牛仔裤甚于羊皮袍，爱点电灯甚于酥油



灯，爱用自来水甚于河水，爱乘汽车、摩托车、飞机与骑自行车甚于骑马，爱烧煤气灶甚于牛粪，爱看西医甚于藏医，爱学汉语文、英语文甚于藏文（为了经商赚钱），爱住西式钢筋水泥公寓甚于石木藏房，爱用沙发、大衣橱甚于藏凳、藏柜，爱跳迪斯科甚于踢踏舞（藏族民间舞，跳时脚不离地，反复搓动，踢踏有声），爱听爱唱港台流行曲甚于藏族民歌，爱去歌厅、舞厅甚于寺庙，爱看电视、电影、录像甚于转经拜佛……他们享用的这些现代文明的成果，全部是由中国政府用汉族纳税人的血汗钱和汉族进藏专业人员的血汗提供的，而不是他们用自己的血汗与智慧创造的。这样一来，他们和中国政府及进藏汉人就难分难舍了。正因如此，他们就更加仇恨中国、嫉恨汉人。因为他们受过中国政府提供的免费教育，会听达赖和西方电台，会喊自由、民主、人权、独立的口号，晓得西藏是藏族的西藏，西藏自古是独立国家，中国用武力霸占了西藏，中国消灭了 120 万藏人，中国毁灭了西藏文化，中国在西藏犯下了滔天罪行，中国还派出那么多汉族专业和辅助人员进藏大兴土木，建造发电厂、输电网、电视台、电视转播网、电影院、医院、学校、商场、舞厅、歌厅、宾馆、录像馆、公寓楼、自来水厂、公路、机场……这不是殖民主义又是什么？何况进藏汉族专业人员还拿和藏族职工一样的高薪和津贴，穿的用的比藏人还洋气，业务与技术比藏人还好，新名词、新花样比藏人还多，在藏族的土地上神气活现，叫我们藏人怎么气得过（请回忆前文所述班禅的毫无自知之明的嫉妒心与攀比心）？我们藏族一定要把所有的汉人都赶出去，把西藏变成藏族的一统天下。我们有达赖喇嘛做领袖，达赖喇嘛有美国支持，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富裕的国家，西藏独立了，美国会给我们比中国政府给的财政补贴更多的钱，让我们生活得比现在更富裕、更现代，就像我们从电影电视里看到的美国人那样！----以上的话并不是我凭空想象，而是我和我曾在或至今仍在西藏工作的朋友在与藏族同事长期共事中听到、观察到、体验到的藏人特别是其中受过“良好教育”的中青年藏人的普遍心理，这也就是《天葬》所说的“藏人对汉人的依赖和对汉人的憎恨存在。一个难以思议的正比关系”（11）的由来。

我之所以在“良好教育”上面打引号，因为他们所受的教育是否良好尚属疑问。中国对藏族学生在高考中一向实行优惠政策，1983 年西藏高考录取分数线对藏汉考生分别为 100 分和 200 分，相差一倍。有个藏族考生六门课总分仅为 60 分，也被录取为大学生（12）。1986 年至 1991 年西藏对少数民族考生的高考录取分数线仅为 200 分，而同年其他省市的录取分数线都在 400 分以上。1989 年西藏大学录取的数学专业 36 名新生中，数学最高分为 51 分，最低分为 12 分，平均 26 分（13）（按 100 分为满分，60 分及格）。西藏高考分数奇低反映了西藏中小学质量奇低。在西藏教育最发达的拉萨市，1989 年中小学毕业生考试成勳如下（14）：

类别	汉文班		藏文班	
	平均分	及格率	平均分	及格率
小学毕业汇考	47.1	35.0%	23.1	1.0%
初一新生统考	50.9	39.6%	22.5	0.0%
高中升学考试	20.6	4.3%	9.2	0.0%
高一新生统考	25.7	3.9%	9.5	0.0%

据在西藏工作过 30 年的一位教师朋友告诉我，藏族学生的数理化生（物）成勳普遍很低。1990 年高考时，西藏共有 345 名少数民族（绝大部分是藏族，此外还有西藏当地的门巴族、珞巴族

等)考生报考理工医农类,占全部少数民族考生 934 人的 37% (63%报考文科)。这些理科考生的数学平均成绩为 18 分,物理为 16 分,化学为 20 分,生物为 16 分 (15)。学校只好降低录取分数线,把大量不合格的考生录取为大学生。从表面上看,这是藏文没有科技词汇所致。1980 年以来,自治区教育部门花大力气编译藏文中小学教材,为此创造了大量藏文科技词汇,所以才能在拉萨市的中小学里开设藏文班。然而造词并不是简单的字母相加,而是塑造概念的过程。这些藏文教材里科技词汇表意的准确度及教材的编写质量都大成问题(前文已详述)。从深层看,它反映了西藏文化缺乏理性思维的缺陷,所以藏族学生大都避难就易地报考文科,报考研究生者更是如此。1988 年西藏高校少数民族教师共有 185 人,其中教授数理化的仅占 8.65% (16)。不学数理化就无法培养理性思维,从而使西藏文化缺乏理性思维的缺陷更难纠正,西藏文化至上主义更加昌盛。

西藏的教师水平又如何?西藏各大学的汉族教师大都是两年一换的内地各大学援藏教师,难有稳定的统计数字。1987 年西藏各高校共有少数民族教师 185 人,无一毕业研究生;大学本科毕业生有 66 人,占总数的 36%;没有大学本科学历的有 119 人,占 64%。西藏各中专共有少数民族教师 218 人,其中大学本科毕业生有 70 人,占总数的 32%;没有大学本科学历的 148 人,占 68%。西藏各高中共有少数民族教师 81 人,其中大学本科毕业的 36 人,占总数的 44%;没有大学本科学历的 45 人,占 54% (17)。经过十年发展,有大学文凭的少数民族教师大为增加了。然而他们大多数是由那些没有大学文凭的高中、中专与大学教师培养出来的。不难想象,以如此低的考分进校的藏族学生在如此低质量的教师教育下毕业时专业水平如何,然而他们都被当作大学生毕业生和毕业研究生分配工作。由于中共高度强调培养藏族干部,他们大多很快被提拔为官员,领导许多汉族业务干部。又不难想象,面对有真才实学的汉族同事或部下,他们的心态如何。他们在内心深处自然明白自己的业务水平远远不如自己的汉族同事或部下,但为了维护自己及藏族的面子与尊严,他们又要摆出比汉族同事或部下更高明或者至少一样高明的样子,结果不免经常出洋相,甚至出事故。恼羞成怒之余,他们恨不得把汉人全部赶走,那样就再也无人和他们比较、出他们的洋相了。所以越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藏人即藏族精英越恨汉人,越要闹独立。

《人民日报》驻拉萨记者刘伟写道:“电视里西方国家的先进使看电视的人目瞪口呆。以前在西藏,藏族人参照对象只有汉人,良莠并收,现在呢,参照对象由单一的汉人变成多元系数,有外国游客,有香港人和明显富有的印度、尼泊尔商人以及归国藏胞。于是一些藏族人把怨气出在了拉萨的汉人身上。我认识一个年轻的藏族大学生,他给我说,如果当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和英国签约,西藏就归东印度公司了,西藏会和印度一样发达起来。汉人的政治灾难害了你们汉人,也害了我们藏人。(18)”由此可见,缺乏理性思维不仅妨害藏族精英学好自然科学,还妨害他们学好社会科学,使他们难以具备一个现代人必须具备的起码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常识。那位藏族大学生似乎不知道印度早在 40 多年前就脱离“东印度公司”独立了,也不知道今日的印度比中国还落后、贫穷,他单凭他在拉萨街头看见的印度、尼泊尔富商与富有的归国流亡藏人,就得出十三世达赖如把西藏卖给英国西藏今日就会像印度一样“发达”的结论,真叫人啼笑皆非。西藏四周都是高耸入云的雪山,拉萨就像一口深井,从井底看世界,不免会产生井蛙观天的效应。

中共优待藏族的本意是希望藏人感恩戴德,结果适得其反。他们低估了西方与达赖宣传的影响,也忽视了人性的某些暗区。《天葬》说:“奇怪的是那些从小被送到中国内地‘西藏班’、‘西藏中学’和‘民族学院’的藏人,往往反汉情绪最强,而且越在中国内地的中心大城市(如北京)上学,学历越高,越有西藏独立的意识。(19)”一点也不奇怪。如前所述,藏文没有科技词汇,中国政府虽然千方百计地创造藏文数理化词汇,编纂藏文数理化词典,编译藏文中学教材

，由于翻译人员的素质太差，未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至于大学理工医农与社会科学词汇，在藏文里一概阙如。那么无论在西藏的大学，还是在北京的大学，都只能用汉语文教授除藏文以外的所有课程。藏族学生本来就缺乏理性思维，再用非母语的汉语文学习，困难自然比汉族同学大得多。所以中共要将藏族考生的录取分数线降低一半，然而这样反而更糟糕。藏族学生入学后一开始就落在汉族同学后面，大多数直到毕业时都赶不上去。虽然汉族老师与同学受纪律约束，不敢嘲笑他们，他们自己心里就很不好受。如果现在还是“遣唐使”时代，他们只会更加钦佩、崇敬汉文化，更加虚心、谦恭地学习汉语文。因为那时东亚各族只知道世界上唐朝文化最发达。然而当今世界乃是信息时代、人权时代与文化相对主义风靡的时代。当他们从西方与达赖电台及其他渠道的宣传听说西藏自古以来是个独立国家，中国侵略了西藏、消灭了120万藏人、毁灭了伟大悠久光辉灿烂的西藏文化、把西藏变成了殖民地，中国在西藏犯下了滔天罪行，全世界都严厉谴责中国侵犯西藏人权，世界头号强国支持西藏独立时，他们就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原来我之所以学习不好，在汉族老师与同学面前抬不起头，不是因为我智商低，也不是因为藏文化比汉文化落后，而是因为受到了中国殖民主义的歧视压迫，只有西藏独立了，我才不会受汉人的歧视压迫。于是他们变成了西藏独立的坚决拥护者，中国与汉人不共戴天的敌人。

这种情形颇类我在文革中的见闻。文革前几年，毛泽东大力推行阶级路线，中国各大学不得不降低录取分数线，招收了许多学习不好的贫下中农子弟。他们入学后功课赶不上，在领导、老师与同学特别是学习好出身不好的同学面前抬不起头。文革一开始，毛泽东教导他们，文革前中国所有的学校都被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专了政，他们顿时欢喜若狂。因为他们恍然大悟：原来我之所以学习不好，在领导（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老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同学（剥削阶级孝子贤孙、黑五类、狗崽子）面前抬不起头，不是因为我脑子笨，而是因为我被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专了政。为了反抗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迫害，他们便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疯狂地虐待、折磨、侮辱与迫害党委领导（放低录取分数线把他们招进大学的恩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执行人）与众教授，以及出身不好而学习很好的同学。可见恩将仇报也是普遍的人性暗区，并非藏族独有，特别是当有极其强大的权威以某种极为崇高的理论与口号大肆煽动的时候。这些在内地的藏族学生的心理状态与文革初的某些汉族贫下中农大学生的何其相似，只不过是将毛泽东的教导换成了西方与达赖的宣传、将阶级斗争与路线斗争换成了自由、民主、人权、自决、独立而已。

使藏族学生心理失衡的因素远不止学习一项。单说汉地大都市的繁华就足以令他们由震惊、艳羡发展为失落、自卑，因为他们读完书就必须回西藏，不可能终身享受那种繁华（现任西藏自治区文教书记丹增曾为复旦大学末代“工农兵学员”，他在毕业时曾要求分配在上海工作，足见藏人对汉地大城市的艳羡与留恋）。而且越是在中心大都市如北京，这种失落与自卑感就越强烈。失落自卑到极点就会产生逆反心理（阿Q就经常由极度的自卑转变为极度的自尊，当别人嘲笑他头上的癞疮疤时，他就说：“你还不配”。国学大师辜鸿铭则说：西方人嘲笑中国人脏，中国人就是脏得好；西方人嘲笑中国女人缠小脚，中国女人就是缠小脚缠得好），这时西方与达赖电台宣传的自由、民主、人权、自决、独立就变成他们的心理武器，强烈的失落与自卑就变成对与汉人的疯狂嫉恨与仇视。许多来美国的汉族留学生与访问学者也经历过类似的心理历程，只不过将嫉恨的对象由中国与汉人换成美国与白人而已。可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还有藏族天生能歌善舞，不免引来某些汉族女同学的好奇。几番交往后，前者便试图向后者求爱，结果大多被拒。或者明知会被拒绝，根本不敢启齿，只在心里暗自煎熬。无论是公开被拒还是暗自煎熬，都被当事者视为奇耻大辱，都会引起极端自卑，于是西方与达赖电台宣传的

自由、民主、人权、自决、独立就变成了使极端自卑逆反成疯狂嫉恨与仇视的酵母。

其实这类故事在西藏也每天都在发生。在西藏各单位里都有一批业务能力强的汉人挑大梁（正因如此，他们才被派到西藏去）。这就引起藏族同事与上司的嫉妒。这种同行嫉妒与平庸上司对能干下属的嫉妒在汉族内部也司空见惯，但在西藏却会在西方与达赖的煽动下转变成民族仇恨与独立诉求。

又如西藏各单位的汉人每一年半可以回内地探亲三个月（这也成为藏人嫉妒的理由，如今藏人也可同样带薪离职探亲，虽然他们的家属就住在本单位的公房里），他们回到单位时，就会带回来许多新玩意、新花样、新知识与新话题，诸如时装、皮鞋、家电、录像、CD、化妆品、流行歌曲、流行画报、都市趣事、明星轶闻等，这些自然也会引起藏族同事的好奇与艳羡。按照文化相对主义，这些东西和羊皮袍、邦锦、卡垫、酥油桶、经幡、玛尼堆、欢喜佛、转经、神话、藏戏等并无高下好坏之分。可惜绝大多数藏人并不懂文化人类学与文化相对主义，无法超脱于“他妈的汉人就是比藏人文明、先进”的错误观念。于是产生失落自卑感，然后被西方与达赖的煽动逆反成民族仇恨与藏独诉求。

再如西藏的汉族职工只能生一个孩子，又善于安排生活，经济上自然比收入相同却生了两个或更多孩子又不善于安排生活的藏族同事富裕些，于是这也成为嫉恨的原因，而对汉族同事的嫉恨在西方与达赖的煽动下很容易发展成对中国的仇恨与对藏独的向往。

甚至中国政府给西藏的财政补贴也成为汉藏矛盾的原因。本来西藏的汉藏职工享受同样的待遇，连中央照顾不适应缺氧的汉族职工的缺氧津贴，天生适应缺氧的藏族职工也分文不少。然而藏人却认为中央的财政补贴是给藏人的，汉人到西藏来是来同藏人抢夺中央的财政补贴（我就亲耳听到这样的话）。汉族职工自然不服，他们中大部分是专业人员，在内地也不愁找不到饭吃。他们自愿或被迫到西藏来，本是为了向藏人提供现代化享受，为此他们在个人健康与家庭生活方面作出了很大的牺牲。藏人不仅不感激，反而说他们是来抢藏人的饭吃，并时时处处压汉人一头，更何况中央给西藏的财政补贴本是全国汉族的血汗，说起来进藏汉人更有优先权。汉人自然不敢把这话说出来，但藏族精英也猜得到，于是更加嫉恨汉人，在西方与达赖的煽动下，又变成对中国的仇恨与对藏独的向往。---有人可能会问，西藏独立了，中国政府就不会给财政补贴了，藏族精英会不知道？如前所述，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既然美国如此关心西藏人权、支持西藏独立，西藏独立后，美国一定会送更多的钱给西藏，让他们生活得更富裕更现代（不要忘记藏人的思维方式是非理性的神话--宗教思维，最善于幻想）。

苏联崩溃后，民族主义成了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思潮。西方趁机推波助澜，利用民族主义肢解了南斯拉夫，间离了捷克斯洛伐克，还想以此分裂中国，西藏便成为他们的突破口。在西方的大力煽动下，西藏的许多精英产生了幻觉，似乎西藏一独立，他们个个都能当上总统、总理、部长、大使，到国际舞台上大出风头。中国政府给他们的官再大，也超不过省（自治区）级，哪有总统、总理、部长、大使威风、荣耀、过瘾、潇洒？

注释：

（11）《天葬》，7页。

（12）赖存理，《藏族智力开发之我见》，《西藏研究》，1986年第4期。

(13)(14) 大罗桑朗杰、房灵敏,《西藏数学教学的特点、问题与发展对策初探》,《西藏研究》,1992年第2期。

(15) 吴德刚,《中国西藏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理论研究》,云南教育出版社,昆明,1995年,106页。

(16)(17) 包智明、苏日娜,《西藏自治区民族教育分析》,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西藏社会发展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北京,1997年。

(18) 刘伟,《西藏脚步声》,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1994年,334页。

(19)《天葬》,365页。

## 6、倒过来的种族歧视

《天葬》举了很多诸如汉人不愿与藏人同座之类的例子,证明西藏问题起源于汉人对藏人的种族歧视(20),这个观点与达赖喇嘛如出一辙。他们都回避了如下事实:自1980年以来,中共在政治、经济、文化、卫生、教育、生育、社会、司法各方面实行抑制汉人优惠藏人的政策,并让藏官掌握了绝大多数单位、部门的实权。即便是少数掌实权的汉官,受中央的“民族政策”的严厉节制,对藏人也万事让三分。所以今日西藏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事实上,都不是汉人歧视、压迫藏人,而是藏人歧视、压迫汉人。绝大多数在藏汉人已变成了二等公民,他们即便在心底里歧视藏人,也不敢表露出来,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对藏人更是万事让十分,所以会有那么多进藏大学生放弃工作、户口逃离西藏。我在西藏文联工作时,文联主要领导还是汉族(“老西藏”),却也受尽了藏族上司与藏族同事的气。汉族上司虽然同情我,其官职也比欺负我的藏官大,却对我爱莫能助,他根本不敢管束飞扬跋扈、目空一切、横行霸道、胡作非为的藏官。在藏官当权的单位,汉人的处境更为悲惨,时时处处(分工、提干、升级、评职称、分房、分福利、去内地出差、报销、请假等)受到歧视、刁难、排斥、打击,年轻汉女还会受到藏族上司的性骚扰。

王力雄从未在西藏的任何一个单位工作过,所以从未尝过被藏人倚仗权势欺负的滋味,也没有机会看见那种场面。他在西藏接触了大量在藏汉人,而有西藏户口的汉人大部分是为藏人提供现代化享受的专业人员(有的也有一官半职,但无实权)及其家属。他们进藏时曾经披红褂绿、敲锣打鼓,被誉为“建设边疆、振兴中华”的英雄,到了西藏却变成了受藏官奴役与压迫的现代奴隶,自然是一肚子气。他们在藏人面前敢怒而不敢言,不免要在同胞面前大发牢骚,于是王力雄满耳朵都是汉人嘲笑藏人的话。他从文化相对主义出发,认为汉人发牢骚时描述藏人落后愚昧的话都是种族歧视,却看不到藏干(包括藏官与一般藏干即公务员)对汉人的种族压迫。他把汉藏关系紧张片面地归结于汉人对藏人的种族歧视既不公平,也不合实际,未能揭示西藏问题的实质。

当然,在西藏的汉人免不了会有文化优越感,即便不敢公开流露,也足以让某些敏感的藏族精英觉察。正如王力雄发现的,藏农牧习惯于随地大小便,他还引用吴忠信的话说拉萨市民也有这样的习惯(21)。至今拉萨老城居民也还保留了这样的习惯,只消到八廓街走走就可知道。从文化相对主义来说,这种习惯无所谓文明或野蛮。从存在决定意识的观点来说,藏农牧在荒原上随地大小便是天然合理的。然而当藏农牧在拉萨新区的商业街上随地大小便时,就难以用

“不同文化的价值体系是不可互换，也不可相互作为标准的。在一个文化体系中是不好的，在另一个文化体系却可能是好的，只要当事人自己觉得好，局外人是否有相反的观点并不重要（22）”来辩解。因为这种行为已经影响了公共卫生，侵犯了别人即“局外人”的人权（享有良好的环境也是人权）。1983年3月胡耀邦发起“文明礼貌月”活动时，拉萨市政府发出布告，禁止在拉萨市内随地大小便、随地吐痰等，还组织藏族小学生上街宣传。结果差一点引起人命案：有个藏族牧民在大街上小便时被小学生发现，后者上去劝阻时，前者竟拔出刀来挥舞，吓得后者四处逃奔。当有个汉人把这事当作笑话说时，我注意到未读过大学的藏人哈哈大笑，而读过大学的藏人眼里露出愤怒的神情。后者自然明白随地大小便是不文明的行为，觉得那个藏族牧民在汉人面前丢了藏族的脸。正因如此，他就更加仇恨不随地大小便的汉人。这一方面说明他有了民族文化群体感与荣誉感，另一方面也说明他的狭隘与缺乏反省精神。

也许王力雄会说那个把此事当笑话说的汉人是种族歧视。无庸讳言，绝大多数在西藏的汉人不懂文化人类学与文化相对主义，他们必然会自觉不自觉地用自己的价值观念去评判藏人和西藏的各种事物与现象；就像美国人一贯用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念去评判汉人和中国的各种事物与现象一样。美国人还理直气壮地声称，他们的价值观念是人类公认的价值观念。这里暂且不讨论在大都市的人行道上随地大小便与人类公认的卫生、环境、法治与人权观念的关系。单说按照心理学，用自己的价值观念评判他人是人类的共性与本能，连儿童都是如此。如果说汉人用汉人的价值观念去评判藏人就是种族歧视，那么藏人用藏人的价值观念去评判汉人也是种族歧视，世界上所有民族在评判其他民族时都在搞种族歧视。换言之，人类的天性就是种族歧视。将种族歧视的定义宽泛到如此地步，的确是一件得心应手的武器，可以用来打击任何人、任何民族。在西藏问题上，则可随心所欲地打击汉人，把一切问题都推到汉族对藏族的种族歧视上去。

让我们来看看美国学者对“歧视”（discrimination）的定义：“任何剥夺特定集团的公民权利的行为”（Any kind of action taken to deprive members of a certain group of their civil rights）。种族歧视当然是“任何剥夺特定种族的公民权利的行为”。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种族歧视是一种行为，不是思想与言论。第二，被视为种族歧视的行为指的是剥夺公民权利，不是其他。上述学者对“种族主义”（racism）的定义是：“认为一个种族的人的智力或其他品质比其他种族的人要高。有关专家特别关切的是政权化的种族主义。这种种族主义渗入到社会机构如教堂、学校、政府和商务。它使少数民族的成员难以参与社会 and 取得进步。”（Belief that people of one racial group are superior in intelligence or other qualities to people of other races. Experts on racism are most concerned about institutional racism. This racism that is built into the structures of society like churches, schools, government, and businesses. This kind makes it harder for members of minority group to participate in society and get ahead.）（23）。值得注意的是，种族主义虽然是一种思想，但他们强调的仍然是种族主义的行为。

从《天葬》所列举的一些汉人对藏人的种族歧视的例子看，有的确实是种族歧视，如在咸阳火车上汉族女学生拒绝与藏人同座、在青海汉族司机要汉藏乘客分座之类（在西藏自治区恐怕汉人就不敢那样做）；有的却很难说，可能是因为王力雄不了解西藏所致。例如他在西宁宾馆里听一藏区汉官说：“喇嘛搞女人是犯罪，顶小喇嘛沟子不犯罪。”还说：“宗喀巴有一次看到鸡交配，不禁拍着巴掌大笑起来，他这下可找到办法解决喇嘛的性欲了。从此就有了‘鸡奸’的说法。”王力雄评论道：“那位官员对这种下流笑话之所以能够三十多年信以为真，津津乐道，我想就在于他三十多年一直是透过歧视的眼镜看西藏。虽然纪律约束使他不会把这种歧视公开亮在藏人面前，但是必然会影响到他的思维，也肯定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他在藏区工作的决策和行为。”（24）

王力雄可能不知道，西藏寺庙里确实普遍存在同性恋。1966年我去北京串联时，在中央民族学院看到藏族学生写的大字报，揭发十世班禅喜欢鸡奸小男孩，并讥之为“佛光照耀在男孩的屁股上”。由于中共的禁欲主义政策，那时的青少年极其缺乏性知识，如果事出无因，他们怎么想象得出那样的事呢？我当时根本看不懂。无独有偶，平叛民改时，林田也在山南一个寺庙里发现：“叛匪在时，哲蚌寺来的一个参叛喇嘛要鸡奸一名年轻喇嘛，年轻喇嘛不从，被用刀子杀死了，还有两个小喇嘛，每人被鸡奸一、二百次”（25）。戈伦夫也说：“虽然同性恋被认为是一种罪恶，但在僧人中间似乎很普遍。在俗人中间几乎没有这类事情发生。在格鲁派（即由宗喀巴开创的、以达赖喇嘛为首的黄教——引者）同性恋似乎已经成了一种趋势。有报道说，对同性恋甚至给予了鼓励，因为这证明有关的僧人是‘独身的’——意指没有和女人发生性关系。当然也有例外，有些在政府中任职的格鲁派僧人就和异性有性关系。”他还说，“铁棒喇嘛”（寺庙里负责治安的喇嘛——引者）“为了鸡奸而绑架男孩，这类事件经常发生，以致一些男孩不得不成群结队一起走，以免受害”（26）。查戈伦夫的资料来源，都是在旧西藏住过很长时间的欧洲人，如达赖喇嘛的英文老师、奥地利人哈勒（即美国电影《在西藏七年》的主角），英国驻拉萨代表黎吉生，他们都会说藏语，出版了回忆录，被西方称为“西藏通”，可见西藏喇嘛盛行鸡奸确是事实。王力雄可以说，在西藏文化里鸡奸不是罪恶或坏事，按照文化相对主义，那个汉官不应从汉族的道德观出发嘲笑喇嘛鸡奸。但他不能说，那个汉官出于种族歧视，对汉人捏造出来的丑化藏族的“下流笑话”“信以为真”，“津津乐道”。因为那个“下流笑话”的确是事实，所以也谈不上是种族主义。

更重要的是，那个汉官只是在私人场合把这个真实的笑话告诉了另一个汉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不能被解释为剥夺少数民族的公民权利的行为。因而根据美国学者的理论，这不能算是种族歧视。

王力雄还说：“至于伦理方面的因素，藏族跟汉族的差距就更大了，例如藏人的性观念虽然开放，但是用色相去换取金钱却被他们视为极端羞耻的事，而已经‘市场化’了的汉人，早已经步入‘笑贫不笑娼’的境界，当妓女挣钱自然也就是汉人多。（27）”真是天大的笑话。卖淫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之一，连古罗马都盛行嫖妓。在“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古代中国，尚未“市场化”的汉族中也有的有妓女与男妓。藏族就那么圣洁吗？我亲耳听一位藏族老作家说过，旧西藏拉萨街上甚至有流浪艺人为了小费而当众表演性交的事。我在拉萨时经常听到八廓街有藏族妓女的传闻，那时汉族流民尚未大量涌入西藏。纪实文学《神秘雪域》记录了一个藏人的话，也讲到八廓街有藏族妓女。《拉萨骚乱纪实》则写到了一个被八廓街派出所所以卖淫罪收容的藏族妓女（28）。

王力雄还说：“我亲自听到过一位中共军队的高级军官这样表达他的民族观：‘人都有人性和兽性双重性，区别在有的人性多，有的兽性多。先进的民族人性在兽性之上，落后愚昧的民族兽性在人性之上。要知道，对付劣马的方式就是用铁夹子夹它的耳朵，它立刻就老实。’那位高级军官参与了1989年拉萨戒严的指挥。可想而知，他这种‘哲学’会在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29）”

王力雄在同书中引用过1934年被噶厦政府剜眼的原藏军总司令龙厦对1939年随吴忠信去拉萨的国民政府官员朱少逸的谈话：“西藏当政者愚昧无知，吴委员长与之讲道理讲客气，直如对牛弹琴，安能望其了解？彼等又如顽皮之学童，老师仁爱优容，于是学童滥交害友，日趋放纵；一旦老师赫然震怒，鞭以马鞭，则学童又安分如初矣；试观自尼泊尔人来藏，拉萨即成为尼泊尔人之势力；英国人来藏，拉萨即成为英国人之势力；今中央主管大员来藏彻底解决

藏事，实易如反掌耳！（30）”

细品龙厦对藏族性格的分析，与那位中共高级军官的“哲学”有异曲同工之妙。此话出自藏人龙厦之口，王力雄总不能说是种族歧视或种族主义吧？那么，他们在相隔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不约而同作出相似的描述，恐怕不能说是出于偏见，而是对客观存在的事物本质的真知灼见。再说，那也只是那个中共高级军官在私人场合对另一个汉人的言论而已，并未构成剥夺公民权利的种族歧视的行为。拉萨戒严的确是一个政治行为，下一章将证明，导致拉萨戒严的骚乱即便放在美国也会遭到严厉镇压的，1992年4月布什总统派兵开枪镇压洛杉矶黑人骚乱就是一例。虽然洛杉矶的黑人也打着“反对种族歧视”的旗号，至今还没有人指责布什总统侵犯人权或种族歧视。

假如有汉人说汉人比藏人能干与勤快，王力雄一定会说这是种族歧视或种族主义。然而戈茨坦却发现：“在西藏的汉人相当吃苦耐劳。甚至那些激进的西藏民族主义分子宁愿雇佣汉人而不是藏人，因为汉人的工钱低而又省却不少麻烦（比如，汉人在工作期间接受差的食物，也不要求西藏传统的礼物青稞酒）。（31）”有个藏族作家也告诉美国记者 Lena H. Sun 说：“甚至藏人也宁可雇佣汉人，因为汉人更能干更勤快。（32）”王力雄可能会说，在西藏文化里能干与勤快不是美德，无能与懒惰也不是缺陷。根据文化人类学的文化相对主义，不同文化的价值体系是不可互换，也不可相互作为标准的。在一个文化体系中是不好的，在另一个文化体系却可能是好的。上述美国学者与记者透过歧视的眼镜去看待藏人，用美国文化的价值观念去衡量西藏文化，所以会发出那种污蔑藏人的报道。不过根据上述报道，似乎对汉人与藏人作出上述价值判断（汉人比藏人更能干更勤快）的也不是上述美国学者与记者，而是他们所采访的藏人，而且是藏族精英，莫非藏族精英自己在种族歧视藏族自己？再说，戈茨坦自己就是著名文化人类学家，美国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人类学系主任与教授。想必他不会不懂什么叫种族歧视与种族主义。显然他认为客观分析藏族的性格，指出其按美国价值观是负面的地方，并不算种族歧视或种族主义，否则天下就没有学术自由与言论自由了。

那么在今日西藏究竟有没有种族主义与种族歧视呢？当然有，那就是中共的一系列抑汉优藏政策，这是不折不扣的针对汉族的政权化了的种族主义。即美国所谓的“倒过来的种族主义”（reverse racism）。这种政策经各单位的藏汉官员执行，变成了不折不扣的侵犯与部分剥夺汉人的公民权利的行为（例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同工同酬---包括福利、医疗、陞迁---的权利、平等地享受教育机会的权利、不受性骚扰的权利等等）。西藏的最高领导自治区党委书记虽然是汉人，但他受中央的节制，也不得不执行这种抑汉优藏的种族歧视政策。汉人（哪怕是汉官）充其量只敢在私人场合对别的汉人发发牢骚，根本不敢在实践中违反这种政策。相反，他们自己都是这种政策的受害者。王力雄对这种抑汉优藏的种族歧视政策视而不见、不置一辞，却对汉人私下里发的牢骚大加挞伐，并将其夸大成西藏问题的根源，可谓本末倒置。

王力雄还举了一个兵站放电视的例子：“只要一开电视，附近的藏族老百姓就携家带口一起来，把电视房挤得满满。他们听不懂汉话，无须保持安静倾听，彼此大声地喧哗议论电视画面，加上孩子哭叫和打闹，兵站的人也看不成电视。开始兵站的人装作关掉电视不看了，等藏民散了再接。看。很快藏民也明白这种把戏，关电视也不走，除非停掉发电机。电视必须靠发电机看，发电机声音成了一种信号，无论何时只要一响，周围藏民就自动到兵站集合，等着开电视。兵站曾经关闭大门不让人进，藏民却善于翻墙，不但挡不住，为了报复这种不友好的举动，还会从外面把兵站大门反锁，不让兵站的人出入。为了看电视这件小事，兵站的士兵与藏民打过多次架。兵站人少，寡不敌众。如果事闹大了，变成军队与地方的矛盾，也是对军队的处分重，所以兵站就干脆不发电也不开电视了。”不过这一次，王力雄没有把这事归罪于汉兵的



种族歧视，他很宽大地说这是“文化上的相互误解和习惯上的相互不适应更准确”。不过他仍然认为汉人必须为“我们已经习惯的自我意识和权利计较感到羞愧”（33）。按照他的意思，汉兵应该天天开放这种令双方都看不成的电视（藏人听不懂，汉兵听不清），才算高尚。假如他家住在西藏，不知是否愿意让大群吵吵嚷嚷的藏族邻居天天挤满他家看电视、弄得他自己也看不成？

此事虽小，却颇能说明问题。它形象地证明了中共的抑汉优藏政策使解放军都变成了受了藏人的欺负也只有忍气吞声的二等公民，这与王力雄反复论证的汉人在西藏歧视藏人的结论刚好相反。如果把这件事放在美国，又会怎样？美国天天指责中国侵犯西藏人权，想必是世上最尊重人权的国家了。然而美国是个法治国家，一切要依法办事。美国的军队并无天天招待驻地周围的老百姓看电视的法定义务，所以他们从一开始就不会允许老百姓进兵站。老百姓也就不会产生去看电视的念头，后来也就不会为此发生冲突。即使发生了类似的冲突，也要按法律办事，遭到法律惩处也是挑拨闹事的老百姓，而不是军人。中共为了讨好藏人，在西藏推行抑汉优藏政策，使藏人恃宠撒娇、得寸进尺，时时处处都要占汉人的便宜、压汉人一头，而且永不满足。我在西藏时发现，藏人借了汉族同事的钱或请后者回内地时带买东西后常常不还钱。据一位在藏北工作的朋友告诉我，藏北只要一下雪，哪怕连地面都未盖住，就大叫大嚷“雪灾了”，要求中央与自治区政府拨款救济。当中共与汉人不能或无法满足藏人的无限制的欲望时，西方与达赖的煽动便使他们产生了对中国与汉人的仇恨以及对西藏独立的向往，这才是西藏骚乱的根本原因。如前所述，那些藏农牧倒未必会因此产生独立的念头，但在拉萨城里，事情确实如此。

注释：

（20）《天葬》，第10章。

（21）《天葬》，381页、358页。

（22）《天葬》，390页。

（23）Scholastic Update, Vol.121, No.15, April 7, 1989.

（24）《天葬》，361页。

（25）林田，《西藏春潮》，中国藏学出版社，北京，1990年，61页。

（26）Grunfeld, A. Tom, 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New York: M. E. Sharpe, 1996), p.33.

（27）《天葬》，433页。

（28）秦文玉，《神秘雪域》，天地图书有限公司，香港，1995年，227页；刘伟，《西藏脚步声》，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1994年，313页。

（29）《天葬》，361页。

（30）《天葬》，115页。

(31) 转引自马戎,《西藏的人口与社会》,同心出版社,北京,1996年,81页。

(32) The Washington Post 15 September 1994.

(33)《天葬》,363-364页。

## 7、藏族市民永不满足

如前所述,1997年西藏(非农业户口的)市民总数为33.6万人,其中藏族为26.7万人,占总数的80%。藏族国家职工(官员、普通干部、工人)为11.5万人,占西藏国家职工总数的四分之三。西藏藏族市民中87%是国家职工及其子女,如加上这些职工的父母,则要超过90%。其余藏族市民是政府资助的集体单位职工、个体户、个体户雇用的工人、临时工与无业游民,以及他们的家属。

1990年拉萨市民(不包括农业户口)为139810人,其中藏族为96341人,占总数的69%;汉族40418人,占总数的29%;其他民族3051人,占2%,其中大一半是回族,他们在拉萨已居住了许多代,以藏语为母语,信奉伊斯兰教。拉萨藏族市民中的成年人大部分是国家职工或大学生,只有总人口约三万的拉萨老城八廓街是例外。据1988年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抽样调查,拉萨老城户主中国国家职工(包括退休职工)占老城总户数的41%,无业游民占38.5%(他们以摆摊、打零工为生,年均收入855元),个体户占15.6%,农牧民占1.6%。1988年老城藏族市民中54%的学龄人口(六岁及六岁以上)是文盲,大大高于1990年人口普查时拉萨城关学龄人口中的文盲比例25%,绝大多数老年藏人不懂汉语。最后,拉萨老城的藏人只有4.8%不信教,其余都信奉以达赖喇嘛为首的格鲁派即黄教(34)(西藏佛教分黄、白、红、花教四大派,达赖喇嘛只是黄教之首)。从上面的统计数字可以看出,拉萨老城藏人的文化程度比藏农牧高得多(后者文盲半文盲占79%),所以许多人听得懂西方与达赖的宣传;无业游民的比例比拉萨新区高得多,所以许多人对中国政府有怨气;绝大多数信奉黄教,所以许多人对达赖喇嘛比藏农牧还虔诚(藏农牧中不信教的高达12%,信教者分属四大教派)。加以地处西藏宗教中心(大昭寺),与流亡藏人有广泛联系(很多流亡藏人是从老城出去的,1979年以后纷纷回来探亲,其中有许多达赖喇嘛的间谍),所以历次藏独骚乱都由老城藏人充当主力,以老城为基地与中心,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在西藏时的同事、已故作家秦文玉在西藏住过13年。1989年3月5-7日拉萨骚乱时他在现场观察,戒严后采访了许多藏人,包括老城的藏人。下面是若干藏人在回答“为什么会发生藏独骚乱”时的话(35):

“骚乱对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共产党管辖下,我们是老百姓;独立了,我们还是老百姓,反正当官轮不上我们。这一回和往常一样,参加闹事的人有三多:无业的多,待业的多,乞丐、想沾便宜的多。如果有共产党的人,那是自己没把自己的孩子管好。

“不错,上头这几年对落实政策抓得很彻底。政策落实了,统战人士天天来要房子,国家又没有妥善安排,叫居民往哪里搬?有的被逼,搬出来,无家可归,只得投亲靠友,有的全家五、六口人,只能住一角季(即一根柱子周围的房子,约七、八个平米)。这些过去的房主人拿到了房子,有的翻修了自己住;有的自己也不住,而是租给内地来做买卖的。一般房租每

月一角季四百块钱，当然我们现在比民主改革前还是好多了。那时住不上房子，还得交耳朵税。

“年轻人的教育无人管，有人做小偷，甚至有的做了强盗也无人管，家里没办法，政府又不管，怎么可能不闹事呢？”

“我们八廓街的居民，大多是合作社的手工业工人，工资收入都不太多，可是酥油、牛肉的价格涨得这么厉害，哪里受得了？75年时每斤酥油1.5元，80年每斤四元，眼下每斤涨到10.5元，怎么吃得起呢？牛肉也是这样，只能看看咽口口水。其他的物价也是见风涨。

改革好，我们都拥护。改革后可以信教，可以做买卖，想做什么都可以，也不怕头上戴帽子，不怕说错话挨批斗。过去多年做不起的卡垫和藏柜，都做起来了。但是开放不好，开放使内地的汉族生意人都涌到拉萨来了，他们像饿鹰似的，恨不得连肉带骨头把什么都吞进去，赚钱的本领贼大。钱像流水一样哗哗地被他们都赚去了，生意都被他们抢去了，开放不好，一点都不好。

“一闹起来，日子一点也不安稳，心慌得很。经常有传单贴在门上，‘吃糌粑的站出来！’‘赶走汉人，西藏要独立！’独立之后，也是山那边的人回来当官儿，我们能得到什么好处呢？但独立之后我们能见到益西罗布（指达赖喇嘛----引者）。

“我49年就当基层干部，不是图享受，是信共产党。这么多年，讲良心话，大多数人生活水平还是提高了。但是共产党的模样却不如过去好看了。干部到底为谁？嘴上说的和实际做的不一样。大长官现在跟谁亲？广播里喊的和实际做的也不一样。老百姓人口越来越多，住房却越住越小，儿子女儿都长大了，工作却不能都得到安排。现在什么都要考试，当个清洁工人都要考试，考扫把？30年了，共产党办了不少好事，一想起第一个八年就心里发热。现在呢？难说.....我们这一片500多户，16个党员，党员和家属没有参加，只有十个青年参加了，出自七户人家。一个30多岁，其他都是20上下的待业青年。这些青年跟我们当年不太一样了，叫他们不要闹，孩子们说：‘你给我工作呀！’”

改革开放，群众有一句话，“自己的家乡空着的，光辉照亮了别人。”内地的生意人到了拉萨，除了唸经和背尸体送天葬台不会干之外，其他什么都会干，抢了当地人的饭碗。本地的裁缝、鞋匠都很失望。改革开放，引进人才和技术，而不是劳务输出。我们这儿的劳力多得很，首先要眼于本区群众的利益。现在内地各个省区都分得那么清楚，寸土不让，更何况我们边远地区、民族地区呢。清理，不能光清理康巴人和朝佛的，也要清理黑包工队。市场管理人员，对钉鞋的本地人吆喝“去去去”，赶得跑来跑去；对那些大户却亲热得像贴牛粪饼，唤他们“阿伯喂！”

拉萨居民住房难。这几年国家拨款，修了不少居民楼，但主要是分给干部住的。普通居民房子小，光线暗，还有很多摇摇晃晃的老掉牙的房子。这些房子主人没办法，有时成群打堆地住到城关区的会堂里去。可是你站到布达拉宫上往下一看，东边，北边，黄黄的一片尽是小院子加楼房，大多是一幢幢的私房。盖得那个漂亮呀就跟壁画上一样。请问普通老百姓谁盖得起？请问你几十年不吃不喝工资加起来有多少，能盖得起小宫殿一样的花园楼房？

鸡下蛋还得有个窝，没有窝怎么下蛋？现在居委会什么也没有。一个月十块钱办公费，连电话费也不够付。手无寸铁，发了根电警棍，又没电，不如烧火棍。居委会现在只有打狗的权，扫

地的权，挂牌子的权。骚乱一闹起来，连你的扫把都拿跑了。有人说居委会搞土政策，但我们的土政策是为了贯彻洋政策。一个月开两次会，不来扣副食补助，当然是土政策。但居民一个不剩地都来了。后来群众说，“亏得你在大会上讲了这么多，要不我们的孩子又得遭殃了。”我们居委会在这次骚乱中只有一个人参加。群众都庆幸得很。戒严，是对坏人的打击，对群众的保护。过去群众举起双拇指说：“解放军好！”现在有的武警同志检查证件吆喝人把口罩摘下来。解放军检查了证件还向你敬个礼，还扶老人，这一扶就把金珠玛米（藏语“解放军”的音译——引者）的威信扶起来了。

城市管理最基层是居民大院。这次骚乱发生后，达木林居民大院第一组的组长用身子堵住大门，大声喊道：“谁也不准出去！谁出去我揭发谁！”这是一位退休的藏族老工人。事后这个大院因为清清爽爽，没伤人没死人，大人小孩又围，叫他“波啦”（爷爷），打心底里感谢他。可是居民组长一分钱津贴也没有。逢年过节干送一条哈达，有时一点点酥油，真拿不出手。群众反映，以前开会太多，一个礼拜三、四次，现在又开得太少了，大家像河滩上的沙子，捏不拢来。

我们的党政机关、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机关有没有抹油的？税务、工商、城建被砸，群众出气，是否政策上有问题？是否原原本本把中央的政策落实到基层了？不正之风，走后门，执法犯法，贪污腐败等现象，连骚乱分子都在议论呢。共产党经营了 30 多年，还是有威信的。对违法乱纪、欺压群众的典型处理一批，威信就又起来了。

从收容审查的情况看，17 岁至 28 岁的占 7% 左右，这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堆龙德庆一个女学生说，我数学本来学不好，老师非要叫我学，我在班里骚乱一下，西藏独立了，我就不用学数学了。

还有个骚乱分子说：西藏独立了，汉人都走了，中央给我们的钱就不会给汉人赚走了。

短短几段话，包含了大量的信息。自从 1984 年中国政府投入巨资兴建 43 项工程后，大批汉族、回族与其他民族的个体户追随施工人员到西藏经商，这本是西方向中国推荐的市场经济法则所致。达赖喇嘛与西方人权卫士一贯指责他们是企图淹没藏人的非法移民，那么到中国去经商、投资的西方商人又算什么？既然西方商人可以到中国去赚钱，中国内地的商贩为何不可以到中国西藏去赚钱？这些内地商贩自然要按市场经济法则办事，像西方商人一样赚取商业利润。这就使一向看惯了国营商店的低物价的藏人大为愤慨（国营店的物价之所以低，是政府不惜血本补贴的结果）。藏人一方面挡不住汉回个体户出售的国营店里没有的新潮产品（时装、皮鞋、家电、化妆品、美食、家俱等等）与时髦娱乐（摇滚舞会、卡拉 OK、黄色录像等等）的诱惑，另一方面又心疼化掉的钱。在他们看来，汉人天生只应送钱给藏人，怎么可以赚藏人的钱呢？连那个藏独英雄都承认，他的钱是中国政府（在西藏人人都把中国政府称为中央）给的，但他竟然认为西藏独立后中国政府还有义务送钱给藏人，可见在藏人心目中，中国政府与汉人包养藏人是天经地义的、永世不变的。如今汉回个体户竟敢赚藏人腰包里的中国政府给的钱，无异于太岁头上动土。所以藏族市民既离不开汉回个体户，又恨透了汉回个体户。每次骚乱都首先打砸抢烧汉回个体户，连达赖喇嘛 1993 年 5 月 25 日发表的声明在谴责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用催泪弹驱散打砸抢烧的骚乱者）的同时，也不得不对藏人袭击汉人商店表示遗憾。他甚至说，如果藏人再使用暴力，他就要退出藏独运动（36）。藏人对汉回个体户的态度与北京上海市民既离不开个体户的商品，又嫉恨个体户发财的眼红病如出一辙，可见人性都一样。只是汉人恨个体户，发发牢骚而已。藏人却把藏独骚乱当成了发泄这种眼红病的绝好机会。

《天葬》证明了，汉回个体户在西藏赚的主要是中国政府给西藏职工包括藏族职工的钱（37），这是那个藏独英雄也承认的。由于西藏的行政大权已交藏官掌握，汉回个体户要在西藏赚钱，就必须向税务、工商、城建的藏官行贿，把他们赚来的钱中的很大一部分交给藏官，方能得到与维持营业执照。后者拿到了贿赂，自然对他们格外亲热，于是藏人也迁怒于他们，连他们一起砸。

如前所述，美国学者与记者也发现，藏人在工作态度、技巧与对报酬的要求方面都竞争不过内地来的汉族流民，连藏族个体户都宁可雇佣汉人。这本是市场规律所致，然而藏人竞争不过汉人，自然又是满腔愤怒。

如前所述，早在1980年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孙鸿烈就发现西藏牧场严重超载，西藏的畜牧业已经到顶了。中国政府给藏人的钱越来越多，藏族人口也越来越多，可酥油牛肉由于自然资源限制无法同步增产。按照市场法则，其价格自然会飞涨。进藏汉人吃不惯西藏的酥油牛肉，他们吃的是内地运去的猪肉菜油。酥油牛肉由藏人直接在自由市场出售，中国政府既不经营也不收税。它们涨价与汉人及中共毫无关系，却也被藏人认为是中共与汉人的罪恶，成为藏独骚乱的诱因。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中共给昔日的阶级敌人、今日的统战人士落实了政策，后者反而不参加骚乱。《拉萨骚乱备忘录》就写到一个贵族公子去印度见了达赖喇嘛，后者要他留下，他宁可回拉萨。而昔日的翻身农奴被剥夺了胜利果实（房子），就去参加骚乱。骚乱者最恨统战人士，骂他们是“藏奸”，要砸政协。这里可能也有眼红病在起作用。中共从其“统一战线是党的三大法宝之一”的教条出发，只顾讨好早已威风扫地、老朽不堪、在藏族百姓中毫无号召力的旧贵族，却忽略了经过文革训练的、敢闹敢打的平头百姓，结果吃了大亏。

中国政府从八十年代开始才要求藏族市民一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文革前与文革中根本无暇控制人口，藏族市民人口爆炸。西藏的企业只亏不赚，难以给高速增长的人口提供发薪机会。无业游民与待业青年自然满腹怨恨，他们认为中国政府天生应该把他们包养起来的，藏独骚乱就成了他们惩罚、报复中国政府的手段。

西藏的党政官员也像内地的一样腐败，而且由于天高皇帝远而更加腐败。如前所述，西藏的藏官已占西藏党政官员的80%以上，由于中共在纪律约束上也实行抑汉优藏政策，也由于汉官谁也不想西藏养老、繁衍子孙，所以在西藏用公款造私房或多占好公房的绝大多数是藏官。藏人羡慕在眼里，恨在心里。这与内地汉人痛恨官倒与腐败的原因是一样的，然而各自的结论却大不一样。汉人认为要根治官倒与腐败，必须实行民主政治，所以他们参加或支持八九民运；普通藏族市民并无这样的政治常识，他们不知民主为何物，单知借藏独骚乱发泄对藏官腐败的怒气。孔子云：“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汉藏人性何其相似乃尔。

藏官们何止多占好房、从事官倒而已，他们贪污腐化、贪赃枉法、营私舞弊、吃喝嫖赌、横行霸道、胡作非为、飞扬跋扈、不可一世，被藏人称为新的“三大领主”。这笔账自然也要被藏人记在中国政府身上。有好几个藏人告诉我，他们宁愿要汉人当上司，因为汉官处事比藏官公正、清廉，我在西藏时深有同感。1983年我曾去樟木口岸采访，亲睹回来探亲的普通流亡藏人在海关过境的情景。汉官对他们的态度不冷不热、公事公办。藏官则盛气凌人、趾高气扬，把他们呼来喝去、任意斥责，似乎他们都是些犯人。对流亡藏人中有点“身份”的，经统战部门打招呼，则奴颜卑膝，百般逢迎。我不禁想起鲁迅的名言：“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这正如上海的工人赚了几文钱

，开起小小的工厂来，对付工人反而凶到绝顶一样。(38)”可见人性哪里都一样。

1988年3月骚乱后，西藏某部门对参加了1987年9月27日与10月1日、1988年3月5日三次骚乱的某居民区的190人作了一次调查。其职业分类是：

非国家干部职工市民127人，外地来拉萨的朝佛者和流民49人，干部职工14人。

对127名非国家干部职工市民再作分类调查，结果如下：

1) 独立者（出于明确的政治目的，坚决要求独立的）12人，占9.4%；

2) 复仇者（对中共政府有很深的仇恨，一定要推翻中共政府的）13人，占10.2%；

3) 发财者（趁火打劫）17人，占13.4%；

4) 出气者（因为物价、住房、税收、招工、招生等心中不满的）29人，占22.8%；

5) 盲从者与胁迫者（受藏独分子煽动或胁迫的，大多是青年。比如藏独分子喊“吃糌粑的站出来，把吃大米的赶走”，挨家挨户敲门，要他们参加骚乱，并说如不参加，将来达赖喇嘛回来了，就要严惩他们，许多藏人就跟着参加。过后告诉中共警察，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参加，只知道跟着别人走，跟着别人喊，跟着别人打砸抢烧。盲从者的人数这样多，几乎占一半，似乎不可思议。但只要看看上文所引用的居委会干部的话，就可明白这是真的。那话说，有个居委会在骚乱前把居民叫来教育了一番，结果该居委会只有一人参加骚乱。还有个居民大院在骚乱时有个老工人出来拦了一下，结果无人参加。戒严后未参加骚乱的人衷心感激这些居民干部，可见藏人的盲从心理何等强烈）55人，占43.3%；

6) 精神病患者一人，占0.8% (39)。

上述有明确政治目的、坚决要求独立的与对政府有仇恨的加在一起还不及出气者多，那些盲从者估计也有莫名之气要出。我在文革中发现，越是贫穷、文化程度低的人越喜欢跟。别人瞎起哄，越是喜欢趁群众性骚乱之机攻击比自己富有或文化程度高的人。说到底，这是一种嫉恨心理在作怪。由此可见，藏独骚乱也像八九民运一样，成了许多藏人对各种使他们不满的现象的泄愤口。这些现象中有的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美国也有通货膨胀、贫富悬殊、僱工竞争、失业、贫民窟等），有的是专制政权特有的（腐败、特权），有的是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引起的，也有的是人欲无止境造成的。中国政府既然要把藏族市民包养起来，藏族市民就理所当然地要求它满足其各种各样的、无穷无尽的欲望，并把一切不满----包括中学生学不好数学----都归咎于中国政府。

每次大骚乱后，中国政府都要给藏族职工加薪，控制物价，拨出巨款加盖住宅，免费分给藏人特别是骚乱主力的老城居民。拉萨老城总共只有8000多户居民，却有2000多户在1988年至1990年搬进了新房；到1997年底，共有5226户搬进了新房(40)。既然骚乱能够立竿见影地带来巨大的物质好处，那么藏人自然越闹越起劲，中国政府只好再增加好处，结果形成了闹则生利、越利越闹的循环。1993年5月中国政府在西藏放开粮价，这本是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改革，社会主义的粮本与粮票一向是西方的嘲笑对象，在中国内地也已放开粮价，没出任何问题。为了照顾藏人，中国政府同时给全体藏族市民粮食补贴，这可是西方都没有的仁

政。不料藏人嫌补贴少，于5月24日在拉萨示威。开始只要求增加粮贴与工资，接。就高呼“西藏独立”，因为他们知道中国政府最怕藏人闹独立，虽然要求增加粮贴与工资和要求独立是相互矛盾的。要求增加粮贴与工资意味着承认中国政府是他们的统治者，有义务包养他们；要求独立意味着不承认中国政府是他们的统治者，如果他们有骨气，就不应该用汉人的臭钱。他们还用石头袭击汉回个体户，虽然后者与放开粮价毫无关系（41）。由此可见，藏族市民确实确实被中共的包养政策宠坏了，就像被父母宠坏了的小孩一样，动辄以哭闹逼迫父母满足其无理要求。

当邓、胡、赵制订与推行怀柔政策时，一厢情愿地认为藏人的思维方式也和汉人一样，是实用理性，因而能自觉认识到自己的利益与中共密不可分，从而自觉服从中共的统治。他们完全不了解藏族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与思维方式，大大低估了达赖和西方所煽起的民族主义情绪与对美国的幻想。加以中共历来喜欢进行虚的政治宣传和学习运动，诸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却很少进行实的利害关系教育运动。汉人从实用理性出发，会自觉考虑利害关系，毋需中共耳提面命。中共似乎不好意思或想不到告诉藏人：你们现在享受的现代物质文明都是中国政府用汉人的血汗提供的，西藏独立了，你们就要回到旧西藏的生活水平上去。你们以为美国会出大钱包养你们？看看俄国和东欧的榜样吧，他们变天后美国给了多少施舍？

注释：

（34）马戎，《西藏的人口与社会》，同心出版社，北京，1996年，238-239页、367-368页。

（35）（39）（42）（43）秦文玉，《拉萨骚乱备忘录》，《神秘雪域》，天地图书有限公司，香港，173-240页。

（36）（41）《拉萨再发生示威，中共续施镇压》，《世界日报》，1993年5月26日；《达赖扬言退出藏独运动》，《世界日报》，1993年6月2日。

（37）《天葬》，第13章。

（38）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二心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73年。

（40）刘伟，《西藏脚步声》，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1994年，70页、84页、144页；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西藏自治区人权事业的新进展》，1998年2月24日。

## 8、中共藏官反对独立

如今不仅一般藏族干部、职工和市民对美国、达赖和藏独充满幻想，连中共自己培养的藏族官员都在两头讨好，大耍两面派。许多藏官把子女送到达兰萨拉去留学。

许多藏官白天在机关里说党话、做党事，俨然是党的好干部；晚上在家里却对着达赖喇嘛的相片顶礼膜拜。1986年以来，现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奎元下令党员不得信教，干部不得把子女送到达兰萨拉去（已经去的要叫回来），还命令公安部门收缴干部党员家里的达赖相片，结果走过场。据知情者告诉我，许多藏官把达赖像放在毛泽东像的背后，白天让毛像朝外，

晚上翻过来。中共培养的藏族第一个音乐指挥家俄珠多吉则别出心裁，把达赖像放在贝多芬像的背后。前几年，西藏歌舞团团长去香港访问，西方记者问他如何看待达赖喇嘛，他说达赖喇嘛是我们藏族的精神支柱，回来后也无人过问。西藏文化厅厅长强巴平措在“地专班子调整”时，被揭发有三大问题：一是把文化厅的女演员当成自己的妃子；二是用公款修私房；三是托人通过达赖喇嘛的哥哥活动德国文化机构邀请他访问德国。陈奎元认为前两件都是小事，第三件不是一般问题，结果也只是将他平级调任实权较小的西藏文联主席兼党组书记。1989年3月拉萨骚乱时，中国政府决定从3月8日零点起戒严，3月7日晚上7点广播。为了保密，胡锦涛于3月7日下午5点才将此决定传达到厅局级干部，可是骚乱分子在下午两点半就在冲赛康市场宣布：今晚中共要行动，我们马上撤退（42）。这说明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和常委中就有人在暗中煽动、指挥藏独骚乱。流亡藏人的电脑新闻网 World Tibet Network News 发表的西藏新闻有许多是中共的机密，事后被证明是真实的，可见达赖特务已经成功地打进了中共西藏核心领导机构。然而中共至今对他们连立案侦察都不敢（我在西藏的朋友告诉我），拉萨戒严后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与常委里无一人受到处分。中共对于自己豢养的、吃里爬外的藏族奴才尚且如此害怕、不敢严加管束，又怎能指望藏族百姓服从它的统治？

诚然，中共藏官吃里爬外与其说是为了效忠达赖，毋宁说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暗中煽动和指挥藏独骚乱，可以向中共施加压力，迫使其加紧撤退汉官、提拔藏官、加拨财政补贴，达到陞官发财的目的；强巴平措里通达赖集团，可以去德国公费旅游。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指出，人们在认识新事物时，除了同化机制外，还有顺应机制（accommodation），即经过一定的调节过程，使自己的认知结构部分或全部顺应新事物。中共藏官特别是中高级藏官长期受到中共的训练与汉官的影响，其思维方式已经顺应汉人的实用理性，懂得冷静地计算利害关系，利用中共的绥靖心理为自己牟取暴利。他们暗中煽动和指挥藏独骚乱，并不意味着他们真的向往西藏独立，更不意味着他们盼望达赖喇嘛带流亡政府回藏夺权。果真那样，他们岂不就得下台，失去中共给他们的地位、权力、特权、高薪、津贴、汽车、华宅、警卫、仆人、医疗、旅游、妃子、宾馆、豪宴……？相对于思维方式，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是更为深层、更为稳固的东西，某些中共藏官为了自己现世的荣华富贵，反对达赖喇嘛回藏掌权，但这并不妨害他们为了超度来世而偷偷顶礼膜拜达赖相片。他们的逻辑仍然是：现世靠中共豢养，来世靠达赖超度。

确实也有完全汉化、不信佛教的藏官；出身农奴或奴隶、对中共忠心耿耿的藏官。1989年骚乱时任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的康巴翻身农奴子成对秦文玉说：

『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这是我们法院工作的至高原则。民愤极大的打砸抢分子，也必须查明实据，证据确凿，量刑定罪。3月5日大骚乱，三路汇合在大昭寺广场，北路、南路、东路领头的是谁？打旗的是谁？总指挥是谁？必须一个一个查明实据，人证物证，铁证如山，然后提交法律判决。策划、煽动分裂祖国的骨干分子必须严惩。

分裂思想不是今天才有的。59年一次，69年又一次，尼木、比如，卷进去18个县，抢粮食仓库，杀解放军，打砸抢，这一次加了个“烧”。69年在藏医院靠西的大语录牌上出现了“西藏独立队”的传单，后来很快破了案。……

有个著名的藏族老教授说得好：假如西藏真正独立了，首先要爆发内战，康巴人与卫藏人，山那边流亡藏人与山这边的红藏人，首先要打内战，藏族历史上多次发生过，藏王朗达玛死后他的两个儿子还打得血流成河，各自割据，西藏分裂了三百多年，那才是黑头藏民的大灾难呵。』



时任武警拉萨支队上校政委的翻身农奴曲达告诉秦文玉说：

『59年咱们没有原子弹、没有氢弹，只有一杆枪外加一个小背包。人家有噶厦政府、有军队、有几千座寺庙，还有国际上那些白色朋友的支持。那时咱们国家打过了抗美援朝，也挺穷的。但那时人心齐。群众对党的话百说百信，能把心掏出来点灯。』

62年中印边界自卫反击，群众拼命支前，一仗就把山那边打得落花流水。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情况就有些变了。党政机关的作风变了，军队的好作风慢慢也有点丢了。党和军队的威信都没法跟从前比了。不错，是从文化大革命以后开始变的。我们和老百姓过去的关系是鱼和水，现在呢，有点像云和水。三大法宝还要不要？当然要。但不能一根鞭子放羊，无主无从。放羊还得看头羊呢。党的建设恐怕是带头的。从根本上端正党的作风，提高党的威信恐怕是主要的。党的建设带了头，党的政委党的组织党的群众路线真正有了一个新气象，与此同时再抓枪杆子和统战工作，恐怕局面就完全不同了。这次骚乱少数党员干部也卷了进去，相当一部分人观望同情态度暧昧。有一个单位的党支部书记和经理打包票：本单位没有一个人参加骚乱，结果呢，一下子就查出了五个，还搜出“青年大会党”的纲领，还有烧货物的汽油箱。妈妈的，我们的人在为谁说话？有意无意地在掩护谁？去年3月5日骚乱，公安武警战士受伤300多人，牺牲一人；今年3月5日及后两天的骚乱中，公安武警战士又受伤400多人，牺牲一人。伤亡这么大，国家和人民的财产损失那么大，部份干部群众还很不理解，对我们还有意见。有人认为公布的骚乱分子和围观群众16人死亡的数字打了埋伏。天晓得，既然死了人已是客观事实，那么死16人与死17、18或更多一点并不会改变问题的性质。当然并不排除有的骚乱分子受伤或死亡后隐匿不报这种情况，但根据我们的6所医院及各个渠道汇总的情况，千真万确死亡者只有16人。现在最让人难过的是真话受人怀疑，流言却总信以为真。我们有些干部战士包括我自己，有时真想骂娘，或者躲起来哭一场。这里我透露一点军事秘密，不得已透露一点军事秘密吧。被骚乱分子用小口径步枪打伤的两名战士所在的九中队，那天面对那样严峻的局面，战士手里拿的不是枪而是盾牌和木棍。牺牲了一名班长的三中队，有35名战士端着枪，另75名战士拿着木棍。说起来外界简直不相信：战士们手上的那35杆钢枪，却没一粒子弹，全部都是空枪！集中保管的1400发子弹全部由一名排长背在军用背兜里，排长坐在200米开外的汽车驾驶室里。我们的小战士就是这样端着空枪冲锋，眼睁睁地用胸膛面对飞石与枪弹，眼睁睁地被打倒在血泊中。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没有这样的军队，我不知道有谁打过这样窝囊的战争，我们对不起的是这些小战士的父母和他们的亲人……（43）。』

这里姑且不论细节的真伪，单说这两位中共藏官的立场、感情、思维与语言，就可看出他们已完完全全汉化、党化了。这种完全彻底站在中共立场上的藏官我在西藏接触过很多，例如我在西藏文联时的上司、文联副主席、中共党员、藏族作家益西单增在1987年10月1日骚乱后，在《西藏文学》1987年10月25日增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斥“独立”的梦呓》，下面是其全文：

『打一块石头六毛钱，打呀，笨蛋，想到要钱就得动手。这真是赚钱的好机会，千载难逢。六毛钱是一盒烟也是二两酒哪，只有傻瓜才不干。朝那些维持秩序的警察们的头上，朝那些公安人员们的头上，朝那些敢于阻挡的人群头上，朝那些把头从窗户里伸出来的人身上，朝那些手拿相机和录像机记者的脸上，朝区党委大门的牌子上，区人民政府的牌子上，朝那些看不顺眼的任何人的脑袋上……。』

钱发动的世界奇迹出现了。为了抽一口烟喝一口酒的乞丐们懒懒地站起来去拣石头；流窜而来

的盲流们欢喜若狂；还有那些打扮得很时髦的无业地痞，几方面的人精神一下子振奋起来，几分钟内变成了拉萨街上的雇佣军，变成了效忠分裂分子的冲锋队。

带着宗教感情而在政治上一窍不通的长袍大汉，赤裸双臂，拆下马路边沿的大块水泥砖，碰撞粉碎，供应长驱直入的打手们。街上的有的房门突然打开，从里面倒出一堆又一堆几天来准备的大量石子。吼喊声如狼，比狼声更尖更犀利。打不还手的武警指战员回避，无奈石子如雨，他们一个个地倒下去了，鲜血染红了八角街，染红了人民路！

披袈裟的人很懂行，掀翻汽车是为了漏油，一把火黑烟冲天，十几辆汽车和几十辆摩托顿时化为灰烬。“来呀，谁让你藏在楼里，出来打呀，谁不打两天后会有人来找你算账！”是泥沙，又是旋风，大有颠倒乾坤之势。冲击派出所，抢走收留在那里的犯法分子。电视机、录音机、卡垫、地毯、户口档案、居民身份证，还有枪支弹药。各取所需，各显其能。如此“西藏独立”。顷刻间子弹在燃烧的火光中频频爆炸……大楼、商店变成了残墙断壁。

“西藏独立”好不威风。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的十月一日。分裂分子中风大喊：“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我以为太阳被雪山狮子旗遮住了，我以为地球发生了逆转，仔细一看，原来只是墙头上的草在风中动了一动！

不知是什么时候学会了笑里藏刀----微笑着接近你这个记者，还说：“你的照相机真不错，给我看看！”你一交给他，他立即把相机掷在地上粉碎：“狗杂种我要你的命！”如果你稍迟半步，石头就要砸破你的脑瓜！某些个洋人受到分裂主义分子的欢迎，什么相机、录像机请尽量使用！

当宗教感情变为第一的时候人要发疯，一个披袈裟分子狂呼“独立”，挽起胳膊倒上汽油燃烧汽车。这真是英雄形象，怎能不激动人心！不过，他早就想去自杀，而且也不是为了这个“独立”。一个女的把光屁股对准消防车，硬是阻止了去救火的消防车的四个轮子！

分裂分子拿起冲锋枪乱扫，无辜的孩子，少女倒在血泊里。抢商店，抢行人的自行车和手表。“西藏独立”的十八般招式都用了出来！

雪山狮子旗，写“西藏独立”的标语满街都是，奇怪的是愿当分裂分子的人都不懂“雪山狮”是何原意，“西藏独立”又是什么东西！有一种人说“苍蝇也是肉”，有人想吃苍蝇便跟随而去！

“西藏独立”喊了几十年，难道它真是那么迷人吗？就像第一次吃口香糖的人那样，还想吃一次吗？政教合一的达赖政权和他的噶厦政府，领主是领主，农奴是农奴，还想独立到那里去呢？所以，历史上喊叫的“独立”其用意是摆脱中央政府的领导，去投靠殖民主义者的怀抱！有的群众说得好：“有的人总不喜欢吃自家锅里的肉，非要去喝外人碗里的汤！”

那么，现在又搞“西藏独立”，它的意义何在，它有什么好处？人民是追求光明与幸福，如果“西藏独立”比社会主义好，比社会主义光明和幸福，那我们就没有话说了，我们应该去追求真理。人总是向往好的嘛，大多数人总是能够分辨好与坏嘛！可是，分裂分子的主张或者叫想干的事；第一，把达赖喇嘛请回来，继续当他从前的政教合一的总头目，不是皇帝的皇帝，不是总统的总统，政治加宗教，奴役加鞭子。那么往下又该怎么做呢？就算满足了追求者们的宗教感情和宗教愿望，又如何过日子呢？分裂分子的有一句话说得很彻底：“各归各，听从命

运的安排。”解释应当是这样的：过去的领主仍旧去当领主（共产党拉拢的例外），过去的农奴当农奴，乌拉差役制度不变，各就各位。当然，“那些有功的”（分裂分子），大部分要变成新领主，要做“人上人”！旧社会所安排的命运是不能变了，解放前是什么样子就按那个样子办，你解放前穿什么就穿什么，吃的是什么就吃什么，住什么样的房子就住什么样的房子，现在的一切要全部废除，这叫做“纯纯正正地做个藏族人，做个信教徒。保存藏族特色，保存古老文化！”美国的有些先生叫嚷这是“人权”。那好，既然有人想代表西藏人民的利益和意志，我们就召集一个万万人的大会，让大家举手表决，看有哪些人听从“人权”的安排去当领主，哪些人愿意放弃现在的生活去当农奴和奴隶！让我去当奴隶我是不干的。在共产党的解放下我好不容易得到人身的自由权利和幸福生活，我才不把受奴役当作什么“人权”的追求！叫我去当领主我也不干，我自己干活吃饭，为什么还要去欺负他人和剥削他人？！

历史是个铁面无情谁也不能搬倒的巨人，你想要“西藏独立”，还要问问历史干不干？如果历史说我愿意倒。走，倒回到原来的位置上，那么，太阳也就会从西边出来了！

我敢肯定地说，过去当农奴的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不愿再去挨鞭子。佛教是与人为善的，为什么要打人呢？群众说：“我们是信教徒，但旧社会我们是羊，领主任意宰割我们。现在我们能充分地信仰宗教，我们已经是过上好日子的人了。可是，现在还有人想把我们当成羊来往狼群里赶，用心太恶毒了！”

“西藏独立”的第二种做法是：赶走共产党，赶走汉人，杀掉所有反对独立的人！那个时候西藏也就真的清静了，由现在的几个无人区变成几十个无人区或者几百个无人区。农奴制度几百年没有抓住人心，共产党政府几十年就使西藏人民心服口服。

数一数吧，分裂分子，你们究竟有多少人！恐怕你们的人还没有西藏现有的工厂、学校、医院、商店、商楼大厦、公路、街道多，你们会有什么胆量和能量！“我们要自治，我们要独立！不要中国人，也不要外国人！”稀稀落落的几个分裂分子，叫你们去拆共产党领导下几十年来建设的人手都不够，还想把世界倒过来？你们不想要的，人民群众非要不可。你们想把已经觉悟了的翻身农奴再赶回到原始人的蛮荒生活当中去----男不男女不女，遮上不遮下，遮下不遮上。冠之以美名：“人权”，想靠个别美国人来标榜和抢救，这是当今最大的幼稚、狂妄和无能！我是欢迎你们按照“人权”去修行的：“独立就是跟外界的一切断绝关系，像喇嘛修行一样长年住在山洞里。”你们不能打倒人民群众，因为人民群众与你们根本不是一条心！“修行”是你们的唯一出路！

“西藏独立”的第三种前途是去请外国人来帮忙。请求给点援助，给点钱，开恩赐福，可怜可怜。这是必然的，因为农奴制度的几百年，没有给西藏的经济和建设带来福音，相反是贫穷和衰败。农奴能生产的一点东西都让寄生虫们拿去了，还能留下什么钱？！现在的群众说得好：“祖国母亲每年给八九亿钱来建设西藏，还有哪一点对不起西藏人民？”可是分裂分子说：“不去要汉人主动给的，而去要自己愿意讨的，这叫普度众生，真正信仰！”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人去指导西藏的政治，难免要出现袈裟加牛仔裤，尼姑跳迪斯科的事情。洋人从来不明白给钱和东西，你不跟。他走，他就要你的命！在历史上许多侵略分子想霸占西藏，尽管西藏山高缺氧，但毕竟是旅游的好地方，单是紫外线晒黑皮肤这一门生意，就能使脸色惨白的洋人把算盘珠子从一拨到十。

西藏能够独立吗？能让西藏独立吗？我敢断定，在中国除了共产党，别的任何集团和个人制定不了比现在更好的西藏的社会制度。如果你不信，咱们再举例子比较，该对比的都拿来对比

！』

姑且不论该文的党八股腔，也不论文中的奇思异想和奇特逻辑（他自己不喜欢口香糖就认为别人也不喜欢；他认为洋人之所以支持西藏独立，是因为看中了西藏阳光强烈，可以晒黑他们的白皮肤），单看它所表达的立场与感情，毋庸置疑，是坚定不移地站在中共一边的。我在西藏时同益西单增朝夕相见，对他极为了解，深知他是个只要有官做连自己的亲娘老子都可以出卖的大官迷。他什么宗教也不信，只信权力拜物教。他当然明白，只有中共才会把他这种不懂藏文、只会用汉文写作的藏人捧为“著名藏族作家”（读者从上文即可见其汉文写作水平之一斑），给他高官厚禄、荣誉地位、华宅轿车，几乎年年给他颁奖，还让他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罗马尼亚与南斯拉夫（1984年）。所以他会坚定不移地站在中共一边反对达赖喇嘛与藏独骚乱。

与他类似的还有我的老相识、现任西藏作家协会主席的“著名藏族青年作家”扎西达娃。扎西达娃的父亲是藏族，母亲是汉族，按照中共的政策，他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族别。他选择了藏族，因为中共给藏族许许多多优惠与特权。事实上，西藏的汉藏混血儿个个选择藏族。如果真像达赖喇嘛与王力雄说的那样，藏族时时处处受汉族歧视，他们都应该选择汉族才对，为什么要选择据说是“二等公民”的藏族呢？扎西达娃虽然享尽了作为藏族的好处，出尽风头，官运亨通，连连得奖，频频出国（美国与德国），却与益西单增一样不懂藏文，只能用汉文写作。假如西藏独立，达赖喇嘛决不会承认不会用藏文写作的藏人为藏族作家的，更不会给他们高官厚禄、荣誉地位，所以不管他们主观上如何以“藏族作家”自居自傲，客观上却只能靠汉族为生。

又如前西藏大学校长、现西藏民族学院院长次旺俊美是北京师范大学1970届毕业生，由于文革影响，只读了一年书，连个学士学位都没有，也从未发表过学术论文。一个既无学位也无学术成果的人竟然可以当大学校长，还被中共吹捧为“藏族青年学者”，真是天下奇闻，举世无双。所以虽然他出身贵族，却坚决反对达赖喇嘛与西藏独立。因为他知道，只有中共才会给他高官厚禄、荣誉地位、华宅轿车与出国机会。假如西藏独立，达赖喇嘛手下有的是欧美大学的博士、硕士，哪里轮得到他当大学校长？

再如现任西藏自治区文化厅厅长德吉措姆，平生只在《西藏文学》上发表过一篇汉文短篇小说，还是由编辑根据她提供的文理不通、别字连篇的故事重写的，居然也被中共吹捧为“藏族女作家”，让她以此头衔参加1995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她果然不负所望，很卖力地为中共说话（44）。

“西藏流亡政府”的机关刊物《西藏通讯》1998年9-10月号发表的《中共特色的信教自由》援引西藏林周县扎嘉寺两喇嘛（已逃亡印度）的话说：“1997年中共派来由十余名藏人官员组成的‘爱国主义教育工作队’进驻他们的寺院，寺院方面看到来者全部是藏人，以为不会像其它寺院那样强制他们批判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寺院也可以避免其它许多寺院被强行关闭的厄运，因此立即腾出几间僧舍供他们居住和办公，并尽力招待周到，在发下来的学习材料中大部分是有关中国宪法的精神与一些有关条款和四项基本原则等内容，寺僧们为了避免寺院被关闭而硬着头皮死记硬背有关宪法和四项基本原则等内容，期望以此能过关，但不曾想到中共政协委员、工作组的首领一个叫降巴的藏人开会说我们要和达赖喇嘛针锋相对，我们与达赖喇嘛是敌我矛盾以及其它许多让僧侣们痛心的言论，迫使寺僧离开会场返回各自的僧舍。考试时，这个降巴又威胁说：寺院能否继续存在下去，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实践自由能不能享受要看你们对反分裂和批评达赖喇嘛等问题上的表现。”可见达赖方面也承认确有中共藏官坚

决反对达赖喇嘛与西藏独立。

大多数中高级中共藏官都像他们那样具有明确的利益意识，他们与中共之间虽也勾心斗角----那是奴才看准了主子软弱可欺而趁机敲诈----归根结底仍然是只有在中共的卵翼下才能作威作福的家奴。

中共培养的藏族高级干部的素质之低劣真令人难以置信。我在西藏时听目击者描述过这样一个场面：有人去自治区文化厅联系工作，受到当时的厅长格桑杨刚的刁难，气得破口大骂：“你们文化厅的女演员都是破鞋，呸！”厅长大人毫不示弱，马上回敬他一个“呸！”那人再回敬厅长大人一个“呸！”厅长大人再回敬他一个“呸！”两个堂哉皇哉的藏官就在光天化日之下、众目睽睽之中互相“呸”起来，就其次数、响度、射程、流量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对抗赛。堂堂西藏文化厅长都像个沐猴而冠的跳梁小丑，其他藏官的文化素质可想而知。

1990 年人口普查时发现的西藏干部的文化程度如下（45）：

教育水平	专业人员%	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办事人员%
文盲半文盲	6.3	7.5	3.7
小学	39.2	33.4	20.7
初中	22.0	21.5	39.7
高中、中专	23.7	25.3	29.3
大学	8.8	12.3	6.6
总计	100	100	100

表中的“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即党政官员，“办事人员”即一般公务员，“专业人员”即业务干部，中共将这三类人统称为干部。这表未将汉族与藏族分开，是个缺陷。1996 年藏族与其他西藏少数民族干部在西藏（三类统称的）干部中占 74%（46），如前章所述，藏官的比例一定会高于这个比例，藏族专业人员的比例则会低于这个比例。无论如何，藏族都要占大多数。根据我的经验，藏官与藏干的平均教育程度均低于汉官与汉干。现在假设汉藏干部的平均教育程度相同，那么上表也可看作藏官与藏干教育程度的分类统计。从该表可以看出，藏官中有 7.5%是文盲半文盲，小学与初中的占 54.9%，高中专与大学的仅占 37.6%，其素质可想而知（且不说文凭与实际文化程度之间的差距）；而藏族专业人员（科研人员、工程师、教师、医生、农艺师、记者、编辑、经济师、技师、兽医等）中竟也有 6.3%是文盲半文盲，61.2%是小学与初中程度，大学程度的只有 8.8%，真是不可思议。如前所述，西藏高校 64%的少数民族教师没有大学本科文凭；西藏中专 68%的少数民族教师没有大学本科文凭；西藏高中 54%的少数民族教师没有大学本科文凭。中共为了向外界显示其“提拔藏族干部与培养藏族人才的伟大成就”，或者叫做“藏族干部茁壮成长”，采取了揠苗助长的办法，把大批文盲半文盲与小学初中毕业生提拔为官员、科研人员、工程师、教师、医生、农艺师、记者、编辑、经济师、技师、兽医等，可谓世界奇观。不过后者并不会因为有了响亮的头衔而在一夜之间具备相应的才干与能力。天下也只有中共才肯豢养这些废物，离开了中共的卵翼与汉人的血汗，这些飞

扬跋扈、不学无术的寄生虫如何生存？

可笑的是，由于中共一贯执行抑汉优藏政策，对藏官与藏干只许吹捧与嘉奖、不许批评与惩处，这些中共豢养的寄生虫还以为自己真的具备了与其头衔相称的才干与能力，千方百计地、不择手段地排斥、打击汉官与汉干。他们中虽也有不少头脑较清楚的人明白自己与中共的利益联系，但也有不少人糊里糊涂，对达赖喇嘛充满幻想，以为西藏独立了自己还可以陞官发财。现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奎元 1996 年 5 月 14 日在西藏自治区人大和政协六届四次会议上说（47）：

『必须郑重指出，在我们党的队伍里，在反对达赖分裂主义集团，批判达赖、打击分裂主义势力的严肃政治斗争中，还存在思想不一致、步调不统一的问题。……至今仍有许多人对达赖的本质认识模糊，在反对达赖集团的斗争中，有的人政治立场不坚定，没有站在反对达赖集团的立场上，没有站在维护国家、民族、人民利益的立场上，党内也时常出现消极的、不负责任的甚至错误的言论。在反对分裂斗争中，我们不仅面临同分裂分子的斗争，也面临内部思想不一致的问题。

达赖是什么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当站在什么立场上看达赖？李瑞环同志讲得很清楚：“达赖是图谋西藏独立的分裂主义政治集团的总头子，是国际反华势力的忠实工具，是在西藏制造动乱的总根源，是阻挠藏传佛教建立正常秩序的最大障碍。”身为共产党员，对这样的人怎么能去顶礼膜拜？放弃了同达赖集团的斗争，西藏的稳定就不可能实现。每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都必须正确认识达赖集团的本质。达赖集团拼死进行分裂活动，是其阶级本质决定的，也迎合西方敌对势力遏制中国的需要。达赖集团对于我区的破坏力和影响力究竟有多大，这不仅仅取决于达赖集团在宗教和政治上的能量，更重要是看我们反分裂斗争的水平和威力。达赖集团之所以还能够一定程度上肆虐，也在于我们的认识有差距，打击力度有时还不够，政治敏锐性不强，政治鉴别力不高。有些党员认为批达赖是冒犯神灵，要得罪群众，自己不作斗争，还对党和人民的斗争存有非议，这是完全错误的。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如果把达赖看成是宗教上的偶像，在反分裂斗争中，回避对达赖的批判，就不可能在政治上领导群众向以达赖为首的分裂主义集团作坚决有效的斗争。我们根本不承认他是什么宗教权威。』

从陈奎元的口气不难看出，确实有许多藏族党员干部把达赖喇嘛当成宗教偶像，暗中顶礼膜拜。至于说他们中有多少人出于“现世靠中共豢养，来世靠达赖超度”的想法，并不希望西藏独立；有多少人是坚决要求西藏独立的，恐怕谁也弄不清。

当然，不信佛教、反对藏独的藏人仍会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苏联崩溃后，民族主义已成为世界潮流与新兴宗教。英国政治学家霍布斯班（Eric Hobsbawn）指出：在教育程度落后、民众缺乏公民意识与民主政治经验的国家或地区，当原来的独裁统治消解以后，语言与种族的认同就自然而然地变成了唯一的价值。与宗教类似，民族主义是属于简单的、明确的、直觉式的信仰，比复杂的政纲与宪法更容易被文化程度低的民众所理解与接受（48）。何况还有达赖与西方电台在日夜不停地煽动西藏民族主义。藏人或者把达赖喇嘛看作民族领袖，更加起劲地闹事，坚决要求独立；或者用民族自治为武器，更加积极地排斥汉人，在中共体制内牟取权、名、利。西藏自治区政府驻内地各办事处历来是进藏汉干的安乐窝，前不久，在藏干的坚决要求下派出了藏官去领导各驻内办事处，以监督与控制汉干在内地的活动，可见藏干的排汉情绪已强烈到何等地步。我在西藏时就发现，即便是真心反对达赖与藏独的藏官如益西单增之流也照样千方百计排斥、刁难、压制、打击汉族干部，特别是其中学历高、能力强的，有时到了不可理喻、丧心病狂的程度。我不知道其动机是业务上、生活上的嫉妒，还是民族主义

，也许是两者的复合。联想到半个世纪以前，汉族内部的地域之见也何等利害，以致各路军阀只信用本省籍人士（直系、皖系、奉系、桂系、粤系、滇系……），无情排斥外省籍人士；而藏人内部的地域之见（前藏、后藏、藏北、西康、青海、甘南……）也毫不逊色（藏语分三大方言区：西藏、西康、青海，其差异不亚于汉语各方言），可见排外情绪原是人本性，而且往往和文化素质与封闭程度成正比。

#### 注释

（41）《拉萨再发生示威，中共续施镇压》，《世界日报》，1993年5月26日；《达赖扬言退出藏独运动》，《世界日报》，1993年6月2日。

（42）（43）秦文玉，《拉萨骚乱备忘录》，《神秘雪域》，天地图书有限公司，香港，173-240页。

（44）丁辉，《西藏百万妇女享有充分的人权》，《人民日报》海外版，1995年9月6日。

（45）西藏自治区人口普查办公室，《西藏自治区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1992年，第2册，421页。

（46）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西藏自治区人权事业的新进展》，1998年2月24日。

（47）《中国之春》，1996年10月号，43-47页。

（48）霍布斯班（Eric Hobsbawn），《新民族主义的危险》，美洲《时报周刊》（China Times Weekly），总350期，1991年11月9-15日。

## 9、喇嘛尼姑——藏独主力

如前所述，西藏的宗教从未经过欧洲宗教改革那样的改革，至今仍是一个中世纪式的宗教。中共自1980年以来全面复兴、大力提倡宗教，这个中世纪式的宗教就必然会按照自己的固有传统运作，并要求恢复以达赖喇嘛为首的政教合一制度。何况还有达赖喇嘛在电台里煽动，暗中派人去西藏指挥。上述陈奎元的讲话里提到：“今年3月9日达赖集团的头面人物之一桑东活佛（现任“西藏流亡议会议长”——引者）一语道破天机，他说，他们37年的‘主要教训在于未能一贯地执行政教合一的政策，过分地强调了宗教而忽视了政治’。他强调指出‘要利用宗教把人民组织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在西藏历史上，甘丹、哲蚌与色拉三大寺拥有巨大的政治影响与经济实力（庄园与农奴），噶厦政府的许多重大决策都要有三大寺参与才能决定。1959年叛乱时，三大寺也最积极。所以，毫不奇怪，在八十年代最后三年拉萨历次骚乱中，三大寺的喇嘛都充当了先锋。

《人民日报》驻拉萨记者刘伟在1987年10月1日拉萨骚乱时“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采访了一个喇嘛”（大约是谎称自己是海外华人，这样才能逃脱被打的命运，而且让闹事的喇嘛友好地回答问题），下面是他们的对话：

问：你赞成西藏独立？为什么？

答：赞成，西藏本来就是西藏人的嘛，我们有达赖喇嘛，汉人有吗？汉人吃糌粑喝酥油茶青稞酒吗？我们不一样。

问：你愿意当喇嘛？

答：当然，藏族人最光荣的就是当喇嘛。

问：你对政府的宗教政策怎么看？你认为西藏人现在的生活还不错吗？

答：他们汉人把我们西藏的寺庙都毁了，当然该他们修。我们喇嘛不如以前了，以前我们有很多吃的，老百姓供应，噶厦也专门供应，现在钱很少，寺庙里很多值钱的东西他们都拿走了。汉人在拉萨修了很多新房子，但不是我们住的，拉萨城就是修得再好，我们也不需要。我们希望的是到处都有寺庙，人人都可以做喇嘛，汉人没来以前，我们西藏人和平相处，没有斗争，没有更多的贪心，贪心多了会下地狱，汉族人把他们的贪心带来了，也教坏了我们一些藏族（49）。

刘伟还记录了警察审问一个参加骚乱的喇嘛的对话：

问：你为什么要游行，怎么来的？

答：我们自己来的，我们应该享受我们的一切。

问：享受什么？

答：独立。

问：什么是独立？

答：不知道。听了广播，达赖喇嘛在国外说西藏要独立，我们喇嘛就要响应。

问另一个十来岁的小喇嘛，他回答说：西藏文化革命前是独立的，汉人搞了文化革命，西藏就不独立了（50）。

这两段话颇能说明今日西藏喇嘛尼姑的心态。他们作为出家人，对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与现代化等等一概不感兴趣，反而认为那是贪心，要下地狱的。他们的理想是寺庙与喇嘛、信徒与供奉越多越好。中共虽然修复了许多寺庙，津贴了许多僧尼，但剥夺了寺庙的庄园与农奴，而且限制寺庙与僧尼无限制发展，自然要引起僧尼的不满。这真像本书第四章所引的戈茨坦的《西藏现代史》结论所说的那样：西藏宗教有一种喇嘛越多越好的观念，为此就要向社会索取越来越多的土地与捐赠，反对噶厦政府为了政教事业而削减寺庙财源的任何尝试，顽固拥护庄园农奴制，因此成为极端保守的势力和社会进步的桎梏。----戈茨坦的结论是针对 1950 年前的西藏宗教的，只消将“反对噶厦政府为了政教事业而削减寺庙财源的任何尝试”、“顽固拥护庄园农奴制”这两句话改成“反对中国政府为了藏族的繁荣昌盛而限制寺庙无限制扩展”、“顽固复辟政教合一的旧制度”，放在今日西藏宗教头上也丝毫不差，可见西藏宗教本性难移。



必须说明，1985年8月21日自治区党委批转了自治区统战部、宗教局《关于清退“文革”中没收寺庙珠宝、玛瑙的意见》的通知，命令全区银行、财政、文管（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其它单位把文革中存放的寺庙的珠宝、玛瑙全部退还给寺庙。1988年1月24日，自治区党委与政府又批复自治区统战部、民族宗教委员会关于《拉萨三大寺和大昭寺当前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处理意见》，命令西藏各单位把保存的寺庙文物全部退还寺庙。对三大寺在文革中被查抄的的财物，按1985年拉萨市政府核实并宣布过的数额，减去已落实的甘丹寺七万元、色拉寺五万元、哲蚌寺五万元，其余一次性落实给甘丹寺95万元、色拉寺78.8万元、哲蚌寺77.6万元。寺庙僧尼和市民一样享受肉价补贴。老年僧尼由政府包养（51）。如前所述，自1980年以来，自治区财政每年都有巨大的落实政策支出，绝大多数是给寺庙文革中损失的退赔。有个藏族干部都对此有意见，他说：“一些市民住房条件非常不好，而有职位的干部，有钱人在郊区修了一幢又一幢小楼，心里当然不满意，没钱吗？每年国家把几十万、几百万丢给寺庙，老百姓得到什么呢？”（52）”当然，无论中国政府如何退赔寺庙，喇嘛尼姑是永远不会满足的。

西藏独立本是政治诉求，与佛教没有任何关系。佛经里从来没有“西藏独立”的内容。然而达赖喇嘛利用自己是“观音菩萨化身”的神话与中世纪西藏政教合一的传统，借宗教的力量煽动藏独。喇嘛尼姑们虽然不知独立为何物，但出于对达赖喇嘛的绝对崇拜，自然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是林彪在文革中狂热吹捧毛泽东时说的话，他还说毛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何况他们也朝思暮想回到“到处都有寺庙，人人都可以做喇嘛”，信徒如蚁、供奉如山，宗教可以干预政治、三大寺可以决定西藏前途的达赖喇嘛时代。西藏独立与僧尼的利益就这样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

喇嘛尼姑的观念至今停留在中世纪不足为奇，奇的是西藏民众至今仍保持着政教合一的中世纪观念，把喇嘛尼姑当成自己的精神导师，把达赖喇嘛当成“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神，这才是令中国政府最头疼的事情。有个藏族小女孩告诉警察：我不知道旧社会，也不知道新社会，抓喇嘛反正不对。还有个藏族老太太在骚乱后的座谈会上说：共产党如今的政策这么好，寺庙里的喇嘛不好好唸经，跑到城里来闹，好好的生活给扰乱了。国家有法律，寺庙有规矩，跑出寺庙做坏事就不配做喇嘛。达赖喇嘛不会搞独立的，他在印度怎么会指挥到八廓街呢？去印度探亲，听过达赖喇嘛讲经，他还说过共产党的好话，让我们在西藏的藏族，好好干活，好好唸经。活着靠共产党，死了还得靠达赖喇嘛呢。我最恨的是那些乘骚乱中发财抢劫的坏人，骚乱闹得那么大，就是他们，也不抓他们，这些人大摇大摆在街上走，有的还说：太痛快了，再来几次骚乱。现在听说抓了好多喇嘛，教育教育还是放了他们算啦，因为喇嘛会唸经（53）。

可见在他们的脑子里，压根儿就没有政教分离、喇嘛不得干预政治的概念。这也难怪，中共自己从1980年以来就在大力倡导宗教，“喇嘛书记”伍精华还带头参加宗教活动，怎能叫老百姓分清宗教与政治的界线？倒是有个头脑清醒的藏人在座谈会上说：政府总是翻过去的事情，总想做出宽怀仁厚的样子，过去的伤疤越揭痛，当然怨恨之心由此而生。修吧，哪怕是再恢复和平解放前的两千多座寺庙，再制定哲蚌寺7700人、色拉寺5500人、甘丹寺3300人的喇嘛定额，宗教政策仍然不会让一些人满意。因为西藏过去是政教合一社会，总不至于落实到政教再合一，三大寺重新过问西藏政治，宗教人士出任西藏各级政府领导吧？

马上有个学生模样的藏族青年说：我们西藏应该有现代化，应该有一个和平安宁的环境，但是出于信仰的原因，也应该有达赖喇嘛（54）。----还是那句话：现世靠中国政府包养，来世靠达赖喇嘛超度。既然中共的意识形态永远无法解决藏人超度来世的需求，既然中国政府的财力永远无法满足藏人对现代化享受的欲望，那么邓小平的怀柔政策就永远不可能取得成功。

达赖喇嘛自然不会放过任何机会。在其洋高参们的指点下，他一心仿效伊朗教主霍梅尼的“黑色革命”，在西藏进行“酱色革命”（西藏喇嘛穿酱红色袈裟）。除了日夜向西藏广播、派特务去西藏活动外，还以亲自接见与摸顶（藏人传统，被活佛特别是达赖喇嘛摸顶会交好运）为诱饵吸引藏人偷渡印度。然而这些藏人去印度后就想留下，达赖喇嘛无钱包养他们，于是改变策略，他利用中国政府允许流亡藏人回去探亲之便，派大批流亡活佛回原寺活动。他深知：利用一个活佛，可以掌握一座寺庙；控制了一座寺庙，就控制了一个地区。“喇嘛书记”伍精华不知是计，反而大加欢迎，将他们奉为上宾。有人这样描写流亡活佛衣锦还乡的场面：

“活佛回来啦！”活佛乘着中国政府派出的高级轿车来到原寺：“达赖喇嘛很想念大家，他让我来看望你们！”众人欢呼，有人下泪。“达赖喇嘛是我们藏人今生的依靠，来世的希望，是藏人的救星，藏人的代表。呼喊一次达赖喇嘛万岁，等于唸诵了一亿次六字真言！”

活佛还串家走门，自古以来活佛何时亲自走进藏人家？藏人感激涕零。

活佛留下大堆达赖喇嘛的照片、像章、录音带、语录与小册子，还有他用过的法器、垫子与衣帽，带着大量布施走了。

“藏历5月15日达赖喇嘛要在月亮中出现了！”

有个活佛回到主寺后，把所属各分寺人员悉数召来，集中了四省区40多座寺庙80多个活佛，1600多僧人，主持了长达两个多月的“讲经活动”，灌输藏独理论与思想（55）。

流亡活佛回达兰萨拉后向达赖喇嘛报告：他们的藏独煽动取得了巨大成功；伍精华则去北京向胡耀邦、赵紫阳报告：他的统战工作取得了伟大成就。

注释

（49）（50）（52）（53）（54）刘伟，《拉萨骚乱纪实》，《西藏脚步声》，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1994年。

（51）《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1995年，309-310页、334页。

（55）直云边吉，《达赖喇嘛----分裂者的流亡生涯》，海南出版社，海口，1997年，219-221页。

## 第十一章：不和平的“和平示威”

### 1、1987年10月1日：火烧派出所

自从1987年至1989年西藏爆发三次大骚乱以来，西方对“中国侵犯西藏人权”的谴责声浪陡然升高，至今已有十余年，毫无和缓的迹象。达赖喇嘛也趁机大造舆论，把今日西藏描绘成人间

地狱。西藏问题因而变成今日国际政治的热点之一，西方妇孺皆知的热门话题。达赖喇嘛因而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一跃而变成国际政治明星。这三次大骚乱标志，邓小平制定的、胡耀邦与赵紫阳执行的怀柔--绥靖政策彻底失败。也标志着西藏问题的大升级，进入新的更加激烈对抗的阶段。如果说 1980 年邓小平对西藏改行怀柔政策的意义可与 1951 年毛泽东和平解放西藏相提并论的话，那么这三次大骚乱的意义可与 1959 年叛乱相提并论。事实上，这三次大骚乱乃是不动枪炮的叛乱（这只是就其总体而言，实际上骚乱中有个别藏人动了枪）。对中国政府来说尤其要命的是，紧接着这三次大骚乱与拉萨戒严的是北京戒严与“六四”大屠杀。这就使上至国家要人，中至社会名流，下至平民百姓的西方各色人等得出了几乎一致的结论：那三次大骚乱和八九民运一样是和平的抗议活动，而中国政府对拉萨骚乱的镇压也像“六四”大屠杀一样是对和平的抗议活动的大屠杀。于是“中国严重侵犯西藏人权”就成了西方人的共识，而达赖喇嘛对西藏局势的描绘无论多么离奇荒诞、骇人听闻（诸如说中共消灭了 120 万藏人、正在毁灭西藏文化等），都被西方人信以为真、毫无保留地接受，并予以真诚的同情。以致在西方形成了一边倒的支持西藏独立的舆论，达赖喇嘛的话则“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任何人---哪怕是严肃的美国藏学家---只要对达赖喇嘛及西藏独立表示异议，都会被视为“中共走狗”。尽管西方的政府从未颁布过禁令，西方的电视、电台与报刊却从不发表与达赖喇嘛及西藏独立相左的言论。甚至在达赖喇嘛宣布“放弃独立”许多年、克林顿总统也公开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之后，西方媒体仍然在异口同声地、不遗余力地鼓吹西藏独立，似乎达赖喇嘛与克林顿从未说过那样的话。究其因，就在于那三次大骚乱与“六四”给西方的复合印象太深刻太恶劣了。

历史毕竟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尘埃落定的十余年后，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拉萨三次大骚乱的真相。

达赖喇嘛在 1989 年 12 月 11 日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仪式上说：中国政府从 1987 年 9 月到 1989 年 3 月“残酷镇压”藏人的“和平示威”，单单在 1989 年 3 月中国政府就杀死了至少 200 名藏族示威者（1）。《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也说：中国政府“残酷武装镇压”从 1987 年开始的“和平抗议运动”与“和平示威游行”。中国政府因而违反了 1948 年 12 月 10 日联合国通过的《普遍人权宣言》第 20 条规定的“每个人都有和平集会的权利”，是对基本人权的严重侵犯。

达赖喇嘛的自传揭穿了他们自己的谎言。达赖自传说：1987 年 9 月 27 日与 10 月 1 日“两次示威都遵循相同的模式。起先是一群喇嘛聚集在大昭寺前喊叫‘西藏独立’，很快就有成千上万俗人参加，一齐呐喊。忽然一营安全人员出现，不加警告就逮捕了僧俗 60 来人，押到几乎就在大昭寺对面的公安局。他们被捕前都遭到毒打。民众要求警官释放这些示威者，忽然又冒出几十名手提摄像机的安全人员，拍摄群众。有人因害怕被认出，开始向安全人员扔石头。少数藏人惊惶失措，动手推翻警车并点上火。安全人员开始鸣枪。大多数藏人很克制。当有些安全人员丢下枪逃跑时，藏人捡起枪来往地下砸。在 1987 年 10 月 1 日的骚乱中，警察局很不幸地被示威者焚烧。他们是想烧燬大门，救出被捕的同伴。与此同时，安全人员不断出来把藏人拖进去，并加以殴打。当群众最后被驱散时，地面上躺着至少十几具尸体，其中有几个孩子。当夜与接下来的几夜，好几百人在家中被捕。最后有 2000 多人被捕。他们中大部分受到拷打，有报告说 40 人被处决。（2）”

达赖喇嘛在这里也不得不承认，藏独示威者首先动武，向警察扔石头、烧警车，还烧了警察局（八廓街派出所）。这能算“和平示威”吗？放在美国又如何？如果警察真的朝人群开了枪，他们自己还会扔下枪逃跑吗？派出所还会被烧吗？莫非藏人都有刀枪不入的功夫？

时驻北京的法国记者董尼德对这两次事件的描述更为详细：

第一幕：

1987年9月21日，达赖喇嘛在举世注目下，抵达美国做十天的访问。第一次被邀请到美国参众两院组合的国会，达赖喇嘛就在那里发表了一篇非常重要的演说，他建议和中国对话。这就是著名的《五点和平计划》……（其要旨是要中国从“大西藏”撤军，连美国国务院都认为这是变相独立，不能予以支持，后文将详述——引者）

八名美国国会议员对达赖喇嘛的这项建议，正式发表他们对它的个人支持，并且联合写了一封信给中国总理赵紫阳，向他施加压力。达赖喇嘛在美国的巡回访问获得广泛的支持，使得中国政府极为恼火。他们强烈指责美国国会公然干涉中国的内政问题。……

第二幕：

1987年9月24日，中国政府在拉萨筹划了一场令人发指的公审。15000名的西藏人被召集到拉萨市的“西藏体育馆”，参加审判大会。当天，有八名被判囚监，两名被判死刑。其中一位，格桑扎西被当场当众就地处决，一枪毙命（这话显然不实，西藏体育馆是幢非常漂亮的建筑，中国政府怎么可能在体育馆里面枪毙犯人呢？——引者）；另外一位，索南坚赞也在两天后被枪决。北京宣称，这两名被处死刑的犯人是杀人凶手。流亡在外的西藏人则说，他们是为活动西藏的独立而牺牲性命。在体育馆里公开审判，是中共认为最具有民众教育成效而不断运用的一贯手法。许多的西藏人认为，这个审判实际上是中国政府对达赖喇嘛访问美国的回应。有很多人认为，这件事是即将展开的暴乱的发动信号。

（据我在西藏的朋友告诉我，那些被处决与判刑的藏人确实是犯有严重罪行的、非杀、判不可的刑事犯。达赖喇嘛1996年12月3日在接受国际法学家委员会采访时说：“让我给你另一个例子。我们流亡了38年。在这里很少谋杀案，只有两、三个。最近十年里，至少有五起谋杀案——大部分是近年来从西藏逃过来的藏人干的。他们的思维方式与行为大大改变了。他们不再容忍与尊重他人。这些案子可悲地说明了西藏的传统文化、社会态度、和平举止与同情心已经被中国的统治改变（3）。”连达赖喇嘛都承认近年来逃亡达兰萨拉的藏人比老的流亡藏人更倾向于谋杀，为什么在西藏本土就不可能发生藏人的谋杀案呢？如果本土藏人杀了人也可以依法惩处，岂不是会有更多的藏人被谋杀吗？——引者）

第三幕：

1987年9月底，在拉萨的政府办公楼及民宅的墙上，贴出了一张张的标语、海报。根据一些值得采信的资料显示，这些都是外国人所贴的。这些标语、海报抄录了1987年6月16日美国众议院人权委员会所通过的决议，并且控告中国在西藏侵犯人权，是1950年以来造成西藏百万冤魂的元凶罪首。

（关于中共是否消灭了120万藏人的问题，前面已经澄清过了。董尼德说，这些标语与海报是外国人在拉萨张贴的，我很怀疑，我想更可能是达赖喇嘛的特务张贴的。不管是谁张贴的，都说明外界势力在用谎言煽动藏人骚乱，可见骚乱确实是有外来阴谋背景的，并非如达赖喇嘛所说的是人民的自发反抗。——引者）

结局：

达赖喇嘛在华盛顿发表演讲的第六天，拉萨公审的第三天，拉萨发生了令中国政府大感意外的严重事件。在这个阳光煦煦的美丽星期天早晨，大约在十点钟左右，十几位西方的观光客正在优哉游哉地在拉萨市区观光，其中大部分正在出神地注视着大昭寺的珍藏。数百名从西藏各地坐巴士，坐卡车，骑马或是徒步而来的朝圣藏人，和往常一样聚集在大昭寺前面拉萨旧市区的中心广场。突然间，26名手持着代表自由西藏的蓝、红、白、黄旗帜的喇嘛，穿着茶色的长长袈裟，绕着大昭寺跑了起来。“雪山狮子旗”上画着两只在三座大雪覆盖的峰顶（代表西藏、康及安多）前面咆哮的狮子，以及藏传佛教的法轮。然后在一群呆如木鸡的人潮前面，他们开始高声喊叫：“西藏要独立！”“中国人，滚出西藏！”这一小撮的人，沿着环绕大昭寺的八廓街游行了五圈，然后走向“西藏自治区”的“人民政府”办公大楼。这次示威游行，前后加起来还不到一个小时。

刚开始的时候，中国警察手足无措，经过一阵犹豫不决之后，他们开始干涉，并且进行逮捕示威游行的人，平常并不报道中国国内种族纠纷问题的新华社，在两天后发布了这一示威游行的报道：在西藏人的记忆中，这一类的事件，从文革结束以后，就没有发生过。第二天，阿沛阿旺晋美以中国人大副主席的身份，发表谈话，认为“这些扰乱治安的骚动分子，只是一小撮人，孤立的，并没有得到人民的支持”。胆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在虎额捻须，并且高声疾呼对自由的渴望，的确是需要有相当胆量的。这些示威游行的人，事先也很清楚地知道，他们的行为一定会受到中国以叛变罪犯的名义，而施予严刑峻责的。然而这个第一次的警报，也只不过是另一次大规模暴乱的前奏而已。

在这件骚动结束后不到一星期，还没有完全消化的北京领导，再度受到一次更为沉重的打击。1987年10月1日，中国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38周年。这一天是国庆，因此是不上班的国定假日，北京显得一片寂静。从1949年开始，习惯上这一天是政府干部好好利用国库公帑大摆筵席，互相庆祝大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性日子。然而1987年的10月1日，对北京却是个可怕的梦魇。相形之下，在拉萨，这一年的这一天，却是令人无比振奋的大好日子。联结中国最高指挥部和地方的红色电话，从一大早就响个不停。

早上九点时分，好几百名的西藏人和平常一样，聚集在大昭寺前面的广场。也像平常日子一样，朝圣者沿大昭寺绕行，口中喃喃地唸六字真言。其中几位穿着紫红色袈裟的喇嘛，也有一些全身积满散发阵阵恶臭的污垢、皮肤上长满痘瘢的乞丐。当然也有一大群的西方观光客，他们对事情发生始末的说法一致。突然间，在喇叭声中，40余名的喇嘛每人手持一面小型的“雪山狮子旗”，从大昭寺走出来，口里大叫反对中共在西藏的口号。他们绕着大昭寺高喊：“西藏是个自由独立的国家！”这一次，中国警察不再迟疑，立即行动。几分钟后，大部分示威游行的人都被拖入就在附近的警察局。这是一栋三层楼房，居高临下地监视这个广场。

人群中马上掀起一股极大的喧哗。很快地好几百名西藏人，聚集在警察局门口。一阵阵狂风暴雨般的石块砸向警察局。100余名中国警察火急般赶来支援，其中有50余名配带着AK-47式冲锋枪。这是中国制造，行销全球的仿俄式冲锋枪。在西藏，维护治安并不是普通警察的任务，而是全责交付武装警察。所谓武装警察，就是专门保卫政府机关、外国大使馆及外侨住宅区的特种警察。双方僵持了好几个小时。局势越来越紧张，不过治安单位坚持不放人。

在警察局前面，武装警察和群众对峙；敌对两边仅仅相隔几公尺的缓冲区。面对中共的武装警察，数千名心怀新愁旧恨的西藏老少男女，高声辱骂中国人。恨从心头起，恶就向胆边生。

小孩子猛朝头顶钢盔的武装警察丢石头。一个小孩捡到一把中国警察落荒而逃时遗留下来的枪，突然，这个小孩手握枪管用力朝地上打，一直打，打到木制的枪托破裂成片。面对这幅不可置信的情景，中国武装警察一动也不动地僵在那里。脸上流露出畏惧的神情，中国警察感到一场严重的暴乱就要来临了。他们在警察局的四周，安置了十余部车子来加强防护。

西藏人将车子放把火烧了起来。几分钟后，一股浓厚的黑烟直冲万里无云的蓝天。不久之后，警察局本身也起火了，很快地，长长的火舌从窗口翻卷了出来。治安人员握紧了冲锋枪，接着，整个广场充满了自动武器所发出来的哒哒噪音。一开始也只是朝头顶上的几次警告性射击而已。是那位守在警察局屋顶上，配有手枪的警察，首先直接朝群众射击，他可是全神贯注地在打活靶。紧接着，冲锋枪也开始向人群直接扫射。前面几排的人倒了下去，鲜血开始染红了地面。

有些被关在着火的警察局里的西藏人、喇嘛，趁乱翻窗而逃。其中有几个人像兔子一样被射杀。美国纽约州水牛城来的观光客 William Kerr 说：“我看到三个人死在大昭寺前面：一个青少年背部中弹，一个男士心脏中弹，第三个则是头部中弹而亡。”来自 Kristnehamn 的瑞典籍观光客 Lars Pertersson 说：“我看到一个男人头颅破裂倒在地上，鲜血不断地从他的头部涌出来。”伦敦来的 Leon Schadeberg 指出另外有一位年约 15、16 岁的男孩头部中弹，死在送往医院的途中：“我看，他死去。大量的血不断地从他的口中流出来。”此外，一位不愿意表明身份的旅客说：“一位妇女走向我，并且把我带到邻近的一条小巷子里。她用中文对我说，有一个人被打伤，马上就要死了，她希望我能拍几张照片。他躺在一部运货的马车上。这是位 25 岁的男人，胸膛上有个弹孔。他的鼻子、嘴巴不停地呕出大量的鲜血。人群自动地闪开让我照相。我正在照的时候，他死去了。我照了几张。对我来说，这已经是太多了。”

屠杀一开始，大昭寺附近马上乱得一团糟。中国武器所发出的清脆响声，在西藏人群中产生了极大的震撼作用：人数顿时少了一大半。不过还是有一群人冒着生命的危险，留在那里。愤怒到极点的西藏人，把守在大昭寺顶上，正在用录影机拍摄暴乱情形的中国便衣警察狠狠地揍了一顿，并且把他的录影器材砸得稀烂。人群把一具西藏人的尸体摆在木板上，高抬过头，走向纷纷退避的警察。很多西藏人要求外国旅客做证，请他们照相并且向全世界发表这件事实。一个西藏人对西德籍的观光客说：“我们和中国人战斗到底。”另外一位观光客说：“很多的西藏人对我们说，他们很高兴今天所发生的事情。”在附近的商店里，西藏人看到中国人就臭骂一顿。暴乱很快就侵袭了整个拉萨市的藏人居住区。石块仍旧不停地打向警察局，而且持续好几个小时，救火车没有办法靠近。警察局的火势不断地蔓延，到午后一时许，在一阵轰隆的撞击声中，屋顶倒塌了下来，博得人群的阵阵掌声。警察局继续烧了一整个晚上。

死在大昭寺前面广场上的青少年有个名叫罗桑单增的弟弟，他现在也逃到达兰萨拉的“西藏儿童村”。我在他的学校里见到他的那一天，我看到的是个在外国人面前怯生生、眼光不敢抬起来的小孩。他身上穿的依旧是那一套磨得破旧不堪的中国式衣服。这次的访问谈话气氛相当沉闷，因为，据他的主任说，他还没有在打击中平复过来。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罗桑单增。

你今年几岁？

我今年 11 岁。

你是什么时候到这里来的？

1987 年，几月我就记不得了。

你能不能对我说，你哥哥被杀死那一天，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我看到所有色拉寺的和尚都来了。他们人数很多，也许有 200 个吧。

罗桑单增停了下来。我们可以听到他的同学们，利用课间的时间在玩耍的叫喊声。

你知道你哥哥是被子弹打中而死的吗？

是的，我知道。

事情是怎样发生的呢？

事情发生在示威的时候。我哥哥也参加了示威。我哥哥的一位朋友和中国人打架。他们拳打脚踢地打来打去。我哥哥尝试，把他的朋友拉开，不要和中国人打架。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头被子弹打到。他几乎是当场死亡。

他几岁？

我哥哥卡萨大约有 18 岁。

你也丢了石头吗？

我和我自己的那一群在一起。我们也示威。我看见一辆摩托车，我们把它放火烧了。我们之中有一个人带着有火柴。几个人从油箱中倒取汽油，随后我们就把这辆车放火烧了。我们大约有六、七个人。那时候中国人还忙得很，因为他们正在尽力地想要驱散示威的人潮。摩托车就被丢在那里。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年纪较大的朋友说，所有属于中国人的东西都要烧掉。所以我们就把摩托车给烧了。

你认为你们这样做对吗？

罗桑单增无言以对。

.....

中国政府发表了一份只有六人死亡的伤亡报告；全部是警察。西方观光客所提供的消息则说有 13 人死亡，六名中国警察，七名西藏人，另外还有十余名受伤（4）。

引文长了一点，却也出于无奈。因为只有引用坚决支持西藏独立的西方人的话，才能叫怀有偏见的人买账。董尼德的描述想必根据在场的西方游客，比达赖喇嘛的详细，因果关系也比达赖喇嘛说得更清楚。他的描写说明，藏人首先使用暴力，用石头砸警察、烧警车与派出所，然后警察才开枪。起先朝天上开，然后才朝人群开。就是这样的暴力行动，却也被董尼德叫做“和平示威”（5）。他说中国政府宣布死了六人，全部是警察，这是错误的。新华社拉萨 1987 年 10 月 2 日电说：“拉萨市昨天发生一起由少数分裂主义分子为配合达赖喇嘛分裂祖国活动而蓄意制造的骚乱。他们举着‘雪山狮子旗’，呼喊‘西藏独立’的口号，公然殴打公安人员，纵火烧了八廓街公安派出所的房子，烧燬和破坏了一些汽车。闹事者还用石块砸公安人员和在场的群众，并有人抢了公安人员的枪支，向公安人员和群众开枪。据初步了解，在骚乱过程中有六人死亡，19 名公安人员受重伤。”可见中国政府也承认死了六人，但决不是警察或汉人。如果是警察或汉人的话，中国政府一定会大肆宣传，将其尊为烈士，就像后两次骚乱时它所作的那样。可见中国政府默认那六个死者是藏人。董尼德引用西方游客的话说，警察死了六个，这是虚构；藏人死了七个，离中国政府公布的只差一个。他们虚构有六个警察死亡一事表明，他们的话并不可靠，还是中国政府的数字可靠。

一年以后，十世班禅告诉中新社记者：“去年 10 月 1 日少数喇嘛上街游行，执勤的公安人员把他们带到就近派出所进行劝说教育。部分群众要求放喇嘛，同武警发生争吵，后来他们烧汽车和房子。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的有关部门都一再下令强调不准开枪。我查了当时的录音，确实下了不准开枪的命令，广大武警都严格执行了不准开枪的命令。但是当派出所楼房起火快要倒塌，被火围困的公安干警和喇嘛面临生命危险的危急情况下，个别公安人员朝天上和地下开枪警告，直接中弹而死亡一人，被跳弹打死一人，还有一人是枪走火打死的，骚乱中死亡的另外三人中，两个是被石块打死的，一个是从楼上跌下来摔死的（6）”他没有说明死者的族别，但他没有说其中有警察或汉人，可见都是藏人。其中三人被警察枪杀，两人被藏人自己用石头砸死（警察不会用石头砸人），那名摔死者原因不明。

班禅在 1988 年 4 月 4 日七届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对记者说：“去年 9 月 27 日、10 月 1 日和今年 3 月 5 日，先后在拉萨一个小小的范围内发生了骚乱事件。第一次只是很少数的喇嘛发动的，追随的群众有一两千人。当时将这少数的喇嘛收容审查。10 月 1 日的骚乱情况比较严重，骚乱分子烧了公安派出所，烧了汽车，打伤了很多。当时收容审查了一批闹事的人，有的很快就放了。当我受中央的委托去处理这一事件时，还有 74 人继续收审。经过我们的工作，释放了 59 人，直接参加骚乱的喇嘛、群众全部都宽大处理、释放了。还剩下的 15 人，大部分属于犯有打砸抢烧等严重刑事罪行的人，还有一两个没有直接参加骚乱，而是搞地下破坏活动的喇嘛没有释放。我回到北京后曾向中央反映，这 15 人中有些人还可以得到宽大处理。中央领导对我的意见非常赞赏。如果不是又发生今年 3 月 5 日的骚乱事件的话，这 15 人中的一部分是可以得到宽大处理的。……去年未得到宽大处理的 15 人中，只有三人被正式逮捕。（7）”班禅提供的数字（死六人，抓 74 人）与达赖的数字（当场死十几人，抓 2000 多人，另有 40 人被处决）大相径庭。他们两人都是菩萨化身，不知谁违反了妄语戒？由里根总统（Ronald Reagan）签署的《1988-1989 财政年度美国外交授权法》（8）说的是“至少打死六人”，没有提到处决。也不知谁在造谣？

#### 注释

（1）"The Nobel Peace Prize Lecture Delivered by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in Oslo, Norway", Congressional Ceremony to Welcome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of Tibet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2).

(2) Dalai Lama, *Freedom in Exile: the Autobiography of the Dalai Lama*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0), pp.254-255.

(3) *Tibet: Human Rights and the Rule of Law* (Geneva: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1997), p.353.

(4) 董尼德 (Pierre-Antoine Donnet) , 《西藏生与死》 (Tibet mort ou vif) , 苏瑛宪译, 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台北, 1994 年, 165-175 页。

(5) 同上, 199 页。

(6) 《班禅谈去年拉萨骚乱》, 《报刊文摘》, 1988 年 3 月 1 日。

(7) 《阿沛和班禅就西藏问题答记者问》, 《人民日报》, 1988 年 4 月 5 日。

(8) U.S. Public Law 100-204, Foreign Relations Authorization Act, Fiscal Years 1988 and 1989, Wasington, DC, December 22, 1987.

## 2、放在美国怎么样？

拉萨骚乱时我已经离开西藏, 但仍然住在国内。据我的骚乱时在现场的朋友告诉我, 骚乱的过程大致如下:

1987 年 10 月 1 日上午 9 点 45 分, 40 来名喇嘛在八廓街举着雪山狮子旗, 高喊“西藏独立”游行示威。转了几个圈子后, 拉萨市维护社会治安指挥部命令八廓街派出所制止游行, 但不准开枪。警察将示威喇嘛全部带进派出所审问。街上的藏人就向警察与派出所扔石头, 许多人家抬出早已准备好的成筐石头来。有些藏人将一辆汽车推到派出所门口, 引燃油箱。有些藏人冲进旁边的胜利消费社和其它商店, 拖出成捆的毛衣、毛毯、大衣、棉毛衫等, 浇上汽油, 堆在派出所门口焚烧。有个藏族妇女的个体户摊上的氍毹也被抢走, 丢进火中燃烧, 那个藏妇下跪哀求也无用。藏人又烧了停在八廓街与大昭寺广场上的 11 辆汽车与八辆摩托车; 打砸抢烧了八廓街办事处、许多国营商店、汉回个体户与尼泊尔侨民店。老城到处是燃烧的车辆、货物与房屋, 空气里弥漫着塑料与轮胎燃烧的臭味, 不时有轮胎爆炸的巨响。

当六辆消防车开向派出所救火时, 有个年轻藏女背对打头的消防车褪下裤子, 扭动光屁股(按藏族习惯, 这是对人最厉害的侮辱与诅咒, 意思是叫观者像狗一样去舔她的肛门, 至今藏农牧中仍有大便后叫狗舔肛门的习惯; 同一天, 还有个年轻藏女对着新华社记者的照相机镜头光屁股), 引来许多藏人围观, 消防车被迫停下。雨点般的石头向消防车砸去, 许多消防人员受伤, 只好撤退。

八廓街派出所是一幢石木结构的藏式楼房, 除了墙体是石头外, 柱、梁、门、窗、楼板、楼梯都是木质的, 很容易燃烧。此时已经浓烟滚滚, 随时可能塌顶, 上级指示藏族所长索朗撤退。但派出所外是不停地砸石头的大群藏人, 根本冲不出去。索朗一再请求允许开枪, 上级始

终不准。就在房顶即将崩塌之时，警察自行开枪，先朝天开，没有效果，才朝人开。藏人四下逃窜，警察才逃离火窟，被扣的喇嘛也乘机逃跑。

喇嘛们将一名被枪杀的藏人放在木板上，抬着在八廓街游行。起先追随者并不多，这时一直在大昭寺顶上领呼口号的一个老喇嘛下楼来，把手连同胳膊伸进烈火里，空气里顿时充满了焦肉味（这个老喇嘛由中国警察及时送往政府医院抢救，才保住了性命）。此举大概唤醒了藏人的某种原始记忆或集体无意识，围观的藏人一齐呐喊，捡起石头，冲向连接大昭寺与自治区政府的人民路（拉萨新区最主要的商业街），打砸抢烧路边的每个商店机关，一直冲到自治区政府门前。那里有几百武警严阵以待，但也不敢开枪。藏人也不敢再冲。一群藏族孩子大摇大摆地走向自治区政府门前的汽车，在上千藏人的围观与几百武警的注视下，从容不迫地点燃油箱，武警也不敢制止。天黑下来，藏人逐渐散开。

这次骚乱后，欧洲议会与西德议会通过决议，谴责中国政府侵犯西藏人权（9），美国国会则通过上述《1988-1989 财政年度美国外交授权法》，谴责中国政府开枪镇压“无武装的示威者”。假如这事发生在世界上最自由、最民主、最尊重人权的美国又会怎么样？

美国的法律规定，任何人要享受和平的游行示威的人权必须事先向警方申请，在警方批准和在警方规定的时间、按警方规定的路线游行示威。如果事先不申请，或者申请了不被批准，或者批准了不按规定的时间、路线游行示威，警方有权取缔。游行示威时不得破坏任何私人或公共财物，不得破坏环境卫生，当然更不得使用任何形式的暴力。对于违反法律、抗拒警方执行公务的，警方有权使用强制手段。六、七十年代，美国曾爆发大规模的反对越南战争的示威与黑人民权运动，美国政府毫不犹豫地用暴力镇压。在 1967 年 7 月底特律黑人骚乱中，政府出动了坦克、直升机与军队，用机关枪与步枪扫射骚乱者，打死 41 人，打伤 2250 人，逮捕 4000 人（10）。在 1968 年 8 月 29 日芝加哥的反越战示威中，警察用催泪弹、警棍与刺刀对付示威者，打伤、逮捕各数百人（11）。我曾从美国电视里看到过那天警察殴打、逮捕示威者的情景（档案录像）。肯特州立学院（Kent State College, Ohio）有个示威学生在校园里被警察枪杀，有个女学生对尸体大叫的照片顿时传遍世界。在董尼德的祖国，1968 年“五月风暴”时，法国警察也曾用力镇压学生运动，打伤数百名学生（12）。

西藏喇嘛在游行示威前从未向警方提出申请，按照美国的法律，警察有权制止他们游行示威。当他们不听从时，警察有权扣留他们。藏人向警察扔石头、焚烧汽车与派出所、打砸抢烧商店机关，更是不折不扣的暴乱，警察完全有权开枪镇压。1992 年 4 月美国的一个地方法院判决殴打黑人 Rodney King 的白人警官无罪后，洛杉矶的黑人曾借口“反对种族歧视”、“争人权”，袭击政府与警察机构、大肆抢劫商店、打人杀人、烧汽车与房屋（包括警车与政府建筑）。布什总统（George Bush）毫不犹豫地派军队开枪镇压。在那次骚乱中洛杉矶共有 55 人丧生（不清楚其中有多少人是被暴徒打死的，多少人是被警察打死的），2300 多人受伤，被烧或被毁的建筑 1000 多幢，事后有 5000 多暴徒被官方起诉（13）。迄今为止，世上还没有人指责布什总统派兵开枪镇压洛杉矶黑人骚乱并逮捕审判暴徒是侵犯人权，为什么中国政府开枪镇压藏独骚乱并逮捕审判暴徒就是侵犯人权呢？

甚至 1987 年 10 月 6 日路透社北京电也说：“一位西方外交官说：所有大国都有它们自己的少数民族问题，所以它们不会指手划脚，吩咐中国人在西藏做些什么，从而把注意力引向它们自己。”英法两国议会就从不通过谴责中国侵犯西藏人权的决议案，因为英国自己就有北爱尔兰与苏格兰独立问题；法国则有科西嘉、巴斯克、布列塔尼与大西洋独立问题（英法两国只敢躲在欧洲议会的背后，以欧洲议会的名义通过决议干涉西藏问题）。加拿大与西班牙也从不

西藏问题说三道四，因为它们自己有魁北克与巴斯克独立问题。连庇护达赖喇嘛的印度政府也不敢公开谴责中国侵犯西藏人权，因为它自己正在血腥镇压克什米尔穆斯林的独立运动。

1976年至1980年曾任西德驻中国大使的“中国通”埃尔温维克特在1987年10月8日西德《世界日报》上发表文章，评论这次骚乱，全文如下（14）：

#### 达赖喇嘛的言论及喇嘛的行动

西藏骚乱产生的原因是容易看出来的。但是，在这些骚乱和达赖喇嘛前不久在美国众议院一个委员会提出的五点计划之间肯定有某种联系。

前一段时间人们从达赖喇嘛阵营里听到的是压低了芦笛声，而这个计划听起来则像是号角。他的计划虽然没有明确要求西藏在政治上独立于中国和完全自治，但它无疑指向这个方向。鉴于西藏在政治上、历史上同中国的长期联系，这是一个爆炸的计划。

是不是达赖喇嘛谋求同中国对抗？或者他只是没有考虑到他的讲话对西藏僧侣的影响，而对这种影响作出了错误估计？或者是否有可能，中国当局近来允许喇嘛们有较多的活动机会，而他们把较为宽容的中国方针看成是示弱？他们是否感到一阵晨风使思想复辟，即使也许不是完全恢复他们的权力地位？

中国领导近年以来已经看到并且承认他们在西藏所犯的错误。这些错误是早在五十年代，而不是在所谓文化革命中才犯的。但是，北京领导近年来已经主动设法弥补前失。不仅恢复了寺庙，而且主要的是也在财政和经济上作了大量投资。

西藏一切可通汽车的道路是中国人建的。几百所学校建立了起来。人们在西藏看到的一切技术设备、拖拉机和汽车，都来自中国内地。西藏人虽然知道转经筒，但是，就几年以前，当地西藏人还觉得机器轮子是可怕的。西藏在喇嘛和贵族的统治下不是欠发达，而是根本不发达。只有在寺庙里才有教育，才有人识字。

现在人们从我们新闻媒介的某些评论中得到的印象是，目前的骚乱主要涉及民主和人权问题。这人权虽然不是德国的发明，如果好好想一想就知道，它在西方其他国家得到的实践远比我们这里长久和一贯。有些人甚至认为，我们这里不久前还粗暴地蔑视人权。可是，在此期间我们把这一切都补上了，在数据保护方面我们现在在世界上遥遥领先。因此对下面一点谁也不应该感到奇怪，那就是恢复了法律意识的我们先于世界上一切其他民族感到有责任到世界所有地方去建立人权和民主，尤其到不关我们痛痒的遥远国家去建立人权和民主。而在邻近的地方，在提及像民主德国这样一些地名时，人们则小心翼翼。

至于西藏，也应劝人们小心为妙。因为，十分可怀疑的是：西藏寺院好斗的喇嘛关心的是人权，或者他们像海纳盖斯勒那样把这个课题看成是争取选民的一个未被占领的领域。说明白点：西藏的喇嘛对人权没有概念。在他们居统治地位时也从没有实践过人权。不属于贵族或僧侣的人民，当时都是农奴。直到不久前西藏人民还生活在中世纪。但是，他们想重新得到自己的达赖喇嘛。

如果达赖喇嘛回到西藏，他对人民的政治权威和权力将会是无限的。这是北京所担心的。他作为精神领袖，对北京来说是不成问题的。但他的政治力量对中国人来说是个问题。他的归来会

影响西藏政局的稳定。

达赖喇嘛不久前在华盛顿提出的计划，虽没有明确地说，但最后结果是要求西藏人民的自决、自治主权。这样，他就不是从精神领袖，而是以流亡西藏人的政治领袖的身份出现了。但他的要求同中国的下述观点是不相容的，即西藏最晚从十三世纪起就属于中国了。

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一观点无可争辩。从国家法的角度看，西藏自忽必烈时代以来同中国就有依附关系。自从1720年以后，在拉萨有中国的驻防部队。1912年，即最后一代中国王朝被推翻以后，中国部队被尼泊尔帮助下的藏人赶走了。接着，当时的达赖喇嘛宣布西藏独立。对此中国从未承认过。

当毛泽东1950年再次派军队开往西藏并再次占领这个地方时，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行使否决权，否定了联合国对上述行动的谴责，因为它认为上述行动是合法的。但是，当时驻安理会的中国代表不是毛的人，而是蒋介石的人。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或新加坡，对于中国人来说，西方新闻媒介经常散布的印象，即毛于1950年派军队到一个享有主权的外国，是完全不可理解的。

如果把西藏今天的形势同苏联占领下的阿富汗相比的话，那只能遗憾地表明他对历史和政治的无知。因此，出于历史和政治的理由不能期待北京会把西藏从中国的国家联合体中分离出去。

如果西藏的形势缓和了，北京肯定会感到高兴，这也是因为10月25日在北京召开的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对进一步的改革方针作出了重要决定。好斗的喇嘛教徒1959年曾试图把中国人从西藏赶出去并恢复自己原来的政权，这在当时遭到了惨败。在此之后达赖喇嘛离开了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去过流亡生活。如果达赖喇嘛呼吁寺庙的教徒和长老采取克制态度，从而使类似事件不致重演，那他才是明智的和负责任的。

西藏人是一个有自己的语言、文化和宗教的民族。但他们却生活在中国的国家联合体里。这个国家联合体和西藏人民之间的关系还是很需要改善的。

但是，只有经过一个长期的过程才能达到改正的目的。过去几年的政策表明，已经在朝这个方向走了。事实上值得希望的是北京为西藏人提供自决权，虽然这种自决权按权威的国际法专家的观点不包括脱离这个国家联合体的权利，但是，这种自决权应该为西藏人提供独立决定自己事务的可能性。但是，只有通过一次漫长的、有耐心的对话，只有当喇嘛教僧侣放弃了自己的政治领导权要求并局限于从事宗教活动，才能实现这样一种事态发展。

这位西德的“中国通”分析得多么好啊。如果事先不告诉读者此文作者名字，很可能有人会为它出自中共理论家之手。

注释

(9) European Parliament, Strasbourg, October 14, 1987; West German Bundestag, Bonn, October 15, 1987.

(10) Goldman, Peter, "An American Tragedy, 1967--Detroit", Newsweek 7 August 1967.

(11) "The Battle of Chicago", "Lots of Law, Little Order", "War Photographer on Michigan Avenue", Newsweek 9 September 1968.

(12) Deming, Angus, "France at the Barricades", Newsweek 27 May 1968.

(13) 《洛城骚乱五周年，复元稍有起色》，《世界日报》，1997年5月27日（该报数字来自 The New York Times 26 May 1997）； "Fire and Fury: America on Trial", Newsweek 11 May 1992.

(14) 转引自：直云边吉，《达赖喇嘛----分裂者的流亡生涯》，海南出版社，海口，1997年，203-206页。

### 3、1988年3月5日：大闹大昭寺

1987年国庆骚乱后，许多“老西藏”认为这是1987年初下台的胡耀邦对西藏宗教势力即藏独势力姑息容让的恶果，要求改变西藏政策。当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扩大会议研究西藏问题，出乎许多人意外，新任总书记赵紫阳一开会就说：“这次骚乱事件，基本上是长期‘左’的结果。”并决定委托班禅处理西藏宗教问题（15）。《西藏日报》随后发表社论，严厉批判西藏干部的“极左思潮”。

如前所述，在中共的语汇里，“左”就是要加强控制，“反左”就是要放松控制。既然赵紫阳认为拉萨骚乱的根源是“左”，西藏现在必须“反左”，那就应该进一步放松对西藏宗教势力即藏独势力的控制，而不是加强控制。

1988年藏历新年即将来临，根据赵紫阳的意图，“喇嘛书记”伍精华决定照常在大昭寺举行传召大法会。为了向西方显示中共对西藏宗教的宽容，特地邀请了西方记者到现场采访，还出动了7辆从日本进口的电视转播车作实况转播。为了预防喇嘛闹事，班禅受赵紫阳委托先去拉萨安抚众僧。1月26日，他在伍精华等陪同下，召开三大寺喇嘛代表座谈，会上班禅宣布释放去年国庆骚乱后被捕的74人中的59人；自治区政府主席（省长）多吉才让宣布了前章引述过的给三大寺落实政策、退赔巨款的决定，并当场向甘丹寺退还了《大藏经》、金盃，付给文革被抄财物的退赔款。但哲蚌寺喇嘛益西群培抢过话筒说：“西藏历来是一个独立国家，1950年汉人以帮助为名，占领了西藏”；“那些游行要西藏独立的喇嘛本来就没有错误，没有罪过，应该统统放掉”；“我们要独立，落实政策是装样子”等等。班禅与伍精华马上驳斥了他，但没有采取任何措施（16）。

许多老喇嘛闻到了年轻喇嘛要闹事的气息，建议把传召大法会的地点从拉萨老城的大昭寺移到拉萨郊外的哲蚌寺，伍精华不同意（17）。

当时身在成都的董尼德这样描写：

一直到传召大法会结束的前一天晚上，一切活动都很顺利地按照计划进行。政府官员已经开始相互道贺了。所有的活动是如此有条不紊地进行，以至于五位被邀请参加的外国记者中有四位兴趣索然，认为没有什么看头，而提早收拾行李打道回府。他们的报导当然也就是错误的。3

月5日，只剩下法新社的通讯员 Patrick Lescot 一个人。《洛杉矶时报》的记者也于当天清晨搭机离开拉萨。几个小时之后，拉萨枪声大作，血花四溅。（那四个西方记者提前离开表明，他们对中国政府不惜血本弘扬西藏佛教这样尊重西藏人权的好事根本不感兴趣，他们惟恐西藏不乱----引者）

1988年3月5日星期六，大约是早上9点50分的时候，聚集在大昭寺前面广场上的数百名喇嘛，把整座广场映染成一片紫红带金的潮海。25000名虔诚的信徒，也在寺前凝神伫立。传召大法会的最后一天。只有一个“迎强巴”的节日。大昭寺里的强巴佛像，被请出来，装上木轮车，由几名喇嘛拥护着绕大昭寺游行一周。按照节目表，今天应该是以赛马和跳舞圆满收场的，可是喇嘛们有他们的想法。在轰轰的祈祷声中，忽然在年轻喇嘛的行列中，数十只握紧的拳头朝天高举。他们蜂拥而上，抢了庆典主持人的麦克风。整个广场回荡着从数百跳动的胸膛中挤压出来的高叫声：“西藏要自由。西藏要自由。西藏要自由。西藏要独立。西藏要独立。西藏要独立。打倒中国的压迫。打倒中国的压迫。打倒中国的压迫。达赖喇嘛万岁。达赖喇嘛万岁。达赖喇嘛万岁。”

这些喇嘛心里有数，他们被中国治安单位照了相。他们也知道，他们是逃不过警察的控制的。他们还知道，他们打的是一场不可能赢的仗。他们当然知道，有六个军营包围着拉萨。他们更知道，不管他们有多么英勇，有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可以像秋风扫落叶般地收平所有的叛乱活动。

紧接着，一阵暴雨般的石头砸向大昭寺附近的警察。几分钟后，好几百名的喇嘛开始绕着大昭寺移动。马上就有数千的藏胞加入他们的行列，并且高唱民族主义的歌曲。爬上大昭寺顶的喇嘛，朝着武装警察的车子及在现场转播传召大法会的拉萨电视台的采访转播车丢了大量的石块。20分钟后，19部警车匆匆赶到现场。2000名戴钢盔、拿盾牌、带警棍的武装警察，花了十几分钟摆好了阵式后，发射催泪瓦斯弹驱散了广场上的人潮。百余名的喇嘛被抓进卡车。午后，治安人员终于找到了法新社的通讯员，并且警告他要他马上回旅店。他一回到旅店就被监视，禁止外出。所有的电话线，传真线都被切断，拉萨和外界完全隔离。

过了一阵，四处响起了自动武器特有的连发枪声。一开始，中国政府是想要避免使用武器的，因为在早上，警察都没有携带枪械。6000名藏人和警察对峙了一个下午，很多中国人开的商店被抢、被烧。示威人群对“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的办公室及警察局特别眼红。不少的警察被打，私下处死（18）。

董尼德的故事大约来自唯一在现场的西方记者、法新社通讯员 Patrick Lescot，所以颇为生动。达赖喇嘛的描述就逊色得多：

起初还能维持平静，但在3月5日有些喇嘛呐喊要求释放名叫犹鲁达瓦才仁的活佛，他是上年10月未经审判而监禁至今的许多示威者中的一个。接着，当典礼进入最后一项，把强巴佛抬着围绕八廓街游行时，聚集的人群大骂中国占领西藏，向在一旁监视的警察扔石头。安全人员一再冲进人群，用棍棒与电警棍殴打他们。后来，军队就开火了。不是随便扫射，而是有目标地射杀抗议者。藏人且战且退，有几百人受伤。中午，警察袭击了大昭寺，打死至少12名喇嘛。有一个先被毒打，然后被挖出双眼，最后被从房顶扔到地上。西藏最神圣的地方变成了屠场。

拉萨的藏人区怒吼了。晚上，大约有20家其主人对藏人不友好的汉人商店被烧。同时，安全

部队频频出击，抓走了数百名男人、女人和儿童。

当时只有几个西方人在拉萨，而且都不是记者（达赖此言不实，根据董尼德，当时至少有一个法新社的通讯员 Patrick Lescot 在现场——引者），所以消息几乎全部被封锁，几周后我才听到详情。这次动乱无论在规模与范围上都超过去年秋天的那两次。结果实施了两周宵禁，至少有 2500 人被捕，所有拉萨的藏人都感到恐惧（19）。

董尼德与达赖喇嘛都忽略了或隐瞒了最重要的细节：在法会进行过程中，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丹增与来自北京的两名国务院的副部长自始至终坐在大昭寺内楼上观礼（参加？）。闹事一开始，寺内的喇嘛们就朝他们冲去，要把他们打死，被他们的保镖拼死挡住（但不敢开枪），他们被迫从面街的窗口缒墙而下（顺着绳子爬下来），本书插图中即有他们缒墙的照片。所以是喇嘛们首先把“西藏最神圣的地方”变成了动私刑的场所。汉人从无挖眼的习惯，达赖喇嘛根据西藏风俗来想象“中共暴行”，谎称中共警察挖了一名喇嘛的双眼，只能表明他自己内心深处有些什么东西，董尼德的描述就没有挖眼的细节。

不过董尼德与达赖喇嘛的描述都表明，这次骚乱仍然是藏人先动手打警察。董尼德还说：藏人首先砸警车与电视转播车（它们的任务可是弘扬西藏佛教），在场的警察都没有带枪，藏人用私刑殴打、处死警察。他们俩也都承认，藏人打砸抢烧了许多商店，董尼德还说藏人袭击了佛教协会与警察局。然而这一事件仍然被他俩叫做“和平示威”，中国政府的镇压则被叫做“侵犯人权”。美国众议院在同年 5 月 11 日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犯西藏人权的决议》，也把藏独暴力示威叫做“和平示威”，谴责中国政府镇压暴力示威“侵犯人权”（20）。天下有这样的和平示威吗？联合国《普遍人权宣言》规定得有“人人都有打杀警察、砸汽车、抢烧商店的自由”这样的人权吗？这样的事放在自由民主的美国与法国，政府能容忍吗？

董尼德特地提到有警察被私刑处死，确有其事。骚乱发生时，武警班长袁石生（四川康定藏人）与士兵杨玉成正在大昭寺南侧拉鲁家的楼顶上执勤，诚如董尼德指出的，他们手里没有枪，只有警棍。骚乱开始后，30 多名藏人用石块、汽车摇柄、铁棍殴打他俩，还用刀子刺杀他俩。袁石生受重伤后被暴徒扔出窗外，当场死亡。杨玉成死命抓住窗沿，捡得一命（21）。经调查，持刀刺杀袁石生的凶手是西藏大学藏文系学生班长洛桑丹增，他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连董尼德都认为“这是个非常宽容的判决”，他的共犯索南旺堆被判无期徒刑。另外只有 25 名藏人被判三到 15 年徒刑，董尼德认为这是中国政府“企图妥协的低姿态动作”（22）。由于美国议员的关切，罗桑丹增被一再减刑。中国政府把袁石生尊为烈士，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班禅也亲自向他致哀。

一个月后，班禅告诉记者：

今年 3 月 5 日的骚乱事件开始是由 100 多个喇嘛发动起来的，后来追随他们一起游行的有几千 人，加上围观群众，最多时不过万把人。这次骚乱事件现场死了四个人。一个是我们的武警战士，被骚乱分子打成重伤，从楼上扔下来；一个是喇嘛，被乱石当场打死；还有两名群众是当公安干警正当防卫，对天鸣枪警告时，中弹打死的。另外有一人受伤后送到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在骚乱过程中，我们的武警战士、公安干警 330 多人受伤，参加骚乱和围观的群众，被乱石打伤送到医院治疗的有 110 多人，也可能有些人受了点轻伤未到医院治疗。这次骚乱我们共收审 200 多人，这仅仅是收容审查，而不是关监狱。其中罪行较轻的，大部分会得到宽大处理。……

今年3月5日的骚乱事件后来发展得比较严重，是因为我们一部分领导人被骚乱分子包围起来，他们的生命受到严重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救出这些领导人，警察曾经动手用棍子打了骚乱分子，确实打得比较厉害。因为当时为了救出这些领导人，许多警察被骚乱分子用石头打伤，这种情况使警察生气了，见到喇嘛就打得重了一些。但是说一些喇嘛被毒死了，这是根本没有的，完全是造谣。如果有一个喇嘛讲了这样的话，那么，他本身就不够当一个喇嘛。他违背了宗教的戒律，宗教戒律是不允许说谎的（23）。

班禅说武警朝天开枪，怎么会打死两个藏人呢？达赖喇嘛对此嘲笑说：“我不禁怀疑中共是否暗示他们发明了一种专嗜藏人鲜血的子弹。（24）”我问过在场的朋友，他们说当时乱石如雨，武警趴在地上朝天开枪，有个别的未把枪垂直向上，所以打中了人。班禅说有一个喇嘛被乱石打死，显然是藏人误杀。班禅的数字（死四藏人一警察，抓200多人）与达赖的数字（死至少12喇嘛，抓至少2500人）又大相径庭，不知谁在违反妄语戒？

注释

（15）（16）《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1995年333-335页。

（17）Goldstein, Melvyn C.,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p.81-82.

（18）董尼德（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与死》（*Tibet mort ou vif*），苏瑛宪译，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台北，1994年，182-183页。

（19）Dalai Lama, *Freedom in Exile, the Autobiography of the Dalai Lama*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0), p.257.

（20）House Resolution #4570, 100th U.S. Congress 2nd Session, 1988, pp.71-73.

（21）秦文玉，《拉萨骚乱备忘录》，《神秘雪域》，天地图书有限公司，香港，1995年。

（22）董尼德（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与死》（*Tibet mort ou vif*），苏瑛宪译，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台北，1994年，187页。

（23）《班禅和阿沛就西藏问题答记者问》，《人民日报》，1988年4月5日。

（24）Dalai Lama, *Freedom in Exile, the Autobiography of the Dalai Lama*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0), p.254.

## 4、班禅之死

这次骚乱并未改变赵紫阳的看法，这从班禅的话中可以看出，班禅受赵的委托处理西藏问题，俨然是西藏的太上皇。他在同一场合回答“西藏为什么会发生骚乱”时说：



有外因，也有内因。外因就是国内外极少数分裂主义分子相互勾结，策划煽动；内因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工作中存在着“左”的错误倾向，给人民造成了很多思想上、精神上，以及物质上的创伤，成为不稳定因素，这就给国内外的少数分裂主义分子策划、煽动骚乱留下可乘之机。……

达赖喇嘛同西藏发生的骚乱有什么关系，你们只要自己看看就会清楚。去年9月，达赖喇嘛在美国众议院人权小组委员会上发表演说，就西藏问题提出了五点计划。以后不久，在西藏内部的分裂主义分子就扬言他们要支持达赖喇嘛的五点计划，从而在拉萨煽起了骚乱，这是清楚的。至于他们在地下、背后搞的活动，我今天不准备说，我只想讲讲这两件事的现象和联系。他要干这种对自己的民族和宗教不负责的事是不好的，不应该的。……

西藏的许多干部是在“左”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左”的思想在他们头脑中影响很深，不是一时可以改变的。因此中央拨乱反正、落实政策的正确精神，在他们“左”的思想阻挠下，一时贯彻不下去。……西藏干部中的“左”，汉族中有，藏族中也有。有高级干部，也有一般干部，就是说，有“左”的思想的干部数量比较大，人数也比较多。……

要改进西藏的工作，必须从三方面努力：一、要搞好民族区域自治，实现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区域自治；二、要用很大力量去医治过去“左”的政策所造成的种种创伤，也就是要认真落实各个方面的政策；三、要大力发展西藏的经济文化建设，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使西藏逐步得到发展进步和繁荣。这三方面工作都做好了，就从根本上解决了西藏的长治久安问题。……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目前也还不够完善，要继续加以完善。在宗教信仰自由方面，我们开放了许多寺庙，尊重和保护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同时我们也还需要落实政策，还有很多工作要做（25）。

总结班禅的治藏纲领，就是：一、要把西藏全部官员都换成藏人，彻底实现藏人治藏（这是他反复强调“名副其实的区域自治”的真正含义）；二、要恢复1959年前的寺庙数目与影响，实际上要恢复政教合一、喇嘛治藏的旧制度（这是他要求进一步落实宗教政策的真正含义）；三、要中国政府给西藏更多的钱（这是他要求“大力发展西藏的经济文化建设，不断改善人民生活”的真正含义）。实际上是要恢复没有达赖喇嘛的达赖喇嘛体制，却要中国政府继续用巨款包养西藏。那么合乎逻辑的结论是请达赖喇嘛回来再当政教合一的最高首领囉？这显然不合班禅的心意。虽然他在同一场合也说了只要达赖喇嘛放弃独立诉求，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就可以回来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无论住北京还是住西藏都可以。但他的真实想法是由他自己来当西藏政教合一的最高首领。据知情人告诉我，班禅一再要求出任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赵紫阳都已同意，被邓小平坚持以“政教分离”为由拒绝。

1988年6月15日至29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主管治安政法工作的乔石到西藏考察，旨在发现西藏骚乱的根源。他在西藏讲话时说：落实政策不能没有边，不能没完没了、永远落实下去。落实政策的目的是，眼点是要有利于广大藏族人民，落实政策侧重政治上的解决问题。对寺庙落实政策的同时，要加强寺庙的管理，不能管理混乱，失去控制，在落实政策的同时，又不使寺庙成为骚乱的据点（26）。在西藏政协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当与会的统战人士——昔日的贵族、官员与上层喇嘛——纷纷批评中共的宗教、语文、经济政策，要求建立更多的寺庙、招收更多的喇嘛、学校里只用藏语文不用汉语文、中国政府给予更多财政补贴时，乔石愤怒地反问他们：中共已对过去的错误作了赔偿，给了他们高官厚禄，他们还要中共做什么？把他们过去的仆人还给他们、让他们像旧社会那样生活吗（27）？

乔石的话与班禅的话针锋相对，反映了中共内部主张停止对藏独势力执行绥靖政策的那部分人的声音。根据他的指示，西藏当局成立了寺庙政治清理工作办公室，从该年8月下旬起派出九个工作组共181人进寺庙，对参与骚乱的僧尼进行“政治清理”。据他们报告，自1987年9月27日至1988年9月，拉萨发生大小十次骚乱，有11座寺庙、四所经堂和西藏佛学院的400多名僧尼、学僧参与。经过两个月的清理，宣布解脱161人，参与骚乱后下落不明暂挂九人，清除出寺25人，经过收审查清问题后原则上要清除出寺的16人，工作组进寺前由寺庙民主管理委员会按自动离寺处理的15人，流动僧尼交当地政府处理四人，无依无靠留寺以观后效的一人，待处理的24人（28）。这样温和的措施当然解决不了问题，更大的骚乱不可避免。

1989年1月17日，班禅在日喀则扎什伦布寺主持迎接五至九世班禅遗体入灵塔仪式；22日又主持了班禅东陵扎什南捷开光大典。文革前，五至九世班禅各有灵塔，文革初被藏族红卫兵捣毁。塔内的木乃伊被扔进河里，由信徒捡起秘密收藏（29）。此时由中国政府出资670万元、黄金218斤、白银2000斤、水银1330斤、铜11277斤、木材1099立方米、钢材117吨、水泥1106吨、石料71782块修了班禅东陵，把五位班禅的遗骸全部供放在里面。班禅在开光大典上说：“宏伟壮观的灵塔和灵塔祀殿，是中国共产党民族宗教政策的正确性和真实性的象征，是藏汉两大民族团结的象征，是西藏宗教界和广大僧俗人民爱国主义的象征。”“文革的破坏是全国性的，不是专门针对藏族或西藏的，更不能说是汉人消灭藏人的文化。利用文革的破坏，特别是利用宗教寺庙遭到的破坏，来煽动民族情绪，破坏民族关系，纯属别有用心。”（30）

然而第二天，他在一次座谈会上发表了平生最后一次讲话，大发牢骚，下面是英文《中国日报》的报道的译文：

自治区最高宗教领袖班禅大师星期一说，近30年来，西藏为了开发所付出的代价比实际上获得的还要多。

专程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扎什伦布寺主持五至九世班禅大师遗体合葬灵塔祀殿——班禅东陵扎什南捷开光典礼的班禅大师表示：自解放以来，自治区有极大的改变。不过他说：“我们也付出了极高的代价，我们永远也不应该重犯这种错误。”

在文革期间坐过九年零八个月牢的这位宗教领袖指出，就西藏的情形而言，由于极左分子的错误而造成的祸害，比右倾分子所造成的损害要严重得多。

班禅大师在一次和拉萨市以及其它五个地区的党政高级领导的讨论中，发表了他个人的评论。他对他们说，西藏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也汲取了可怕的教训。大部分领导干部明白这些教训。班禅说他是一个坦诚的人。他补充说，有一些领导完全忘记了悲惨的往事，有些甚至又开始重复这些错误。从封建农奴制度一下子跳到社会主义制度的西藏社会，连社会主义最基本的阶段都没有达到。今后的重点应该放在改正极左的错误上面。

班禅大师说，在最近几年里，西藏和邻近的汉族地区在经济上产生了差距。西藏应该努力利用丰富的资源，迎头赶上经济发达地区。

班禅大师说有一些对西藏不友好或者敌对的人，利用这些经济上的差距，企图破坏汉藏关系（31）。

1月28日，班禅由于不适应缺氧加上操劳过度，心脏病发作，在中共为他建造的宫殿德钦格桑颇章逝世。中共在扎什伦布寺为他专门建造灵塔与祀殿（32）。许多人猜测他是被中共暗杀的，我以为不可能。且不说赵紫阳一心依靠班禅安抚西藏喇嘛，纵观班禅的一生，尽管他不时发些牢骚，在关键场合还是忠心为中共说话的，这是由他的地位决定的。如果西藏真的在达赖喇嘛领导下独立了，他岂不也要像其前世一样被达赖喇嘛赶出西藏啦？他死了，中共到哪里去找像他那样身份的藏人帮中共说话呢？

注释

（25）《班禅和阿沛就西藏问题答记者问》，《人民日报》，1988年4月5日。

（26）《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1995年，338页。

（27）Goldstein, Melvyn C.,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92.

（28）（30）（32）《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1995年，341-347页。

（29）董尼德（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与死》（*Tibet mort ou vif*），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台北，1994年，293页。

（31）China Daily 25 January 1989.

## 5、1989年3月：拉萨戒严

1989年3月10日是噶厦政府叛乱30周年，西藏当局非常紧张，但在赵紫阳的“反左”指示约束下，对预期的骚乱束手无策。班禅生前也未能劝阻三大寺喇嘛闹事，他死后自然更没有人能叫他们太平。

关于1989年3月5日至7日的拉萨骚乱真相，至今疑团重重，真伪莫辨。海外民运杂志发表的《刺刀直指拉萨----1989年西藏拉萨事件纪实》（33）（以下简称《刺刀》）是迄今为止描写最详细的文字，在海外华人中特别是民运人士中影响极大，被视为描写那一事件的权威之作。达赖方面在美国出版的中文杂志《西藏论坛》曾摘要转载（34）。

根据《刺刀》的描写，这场骚乱似乎是中国武警制造的“国会纵火案”（35）：

3月5日凌晨，中共西藏武警部队接到了由中共武警总司令李连秀签发的作战动员令后，立即编排了战斗序列计划；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五、特务分队紧急抽调300人扮成市民和僧侣在5日上午打入八廓街和拉萨其他闹事地点，配合公安厅、市公安局的便衣完成造势的任务。1、烧燬大昭寺东北方向的塔经。2、砸抢市城闹区（原文如此----引者）的粮店，引发市民哄抢商店物资。3、除指定地点外，不得对其他设施进行攻击。4、在完成以上任务后，所有行动人员全部撤至雪域旅馆（拉萨只有“雪域旅馆”----引者），并清点人数，此项任务属于绝密，任何执行人员均不得将此任务外露，违者严惩。

（3月5日中午12时左右，由喇嘛尼姑带头的示威开始----引者根据原文略写）中午12点40分左右，人们开始冲击八廓街派出所，大小不一的石块、砖头砸向派出所的门（我在西藏从未见过砖头，藏式建筑用石头，新式建筑用水泥----引者），顷刻之间，派出所被愤怒的示威者摧毁了。很多人挤在派出所里，这些人中有些显得很老练，他们搜查派出所的每一个房间，然后撬开办公室里的所有抽屉，开始很仔细地翻阅着档案柜里的纸张，行动异常敏捷。随后，他们将档案纸张装进了随身带来的麻袋里，挤出了派出所，消失在人群之中，全部过程只有十分钟左右，一些藏人发现了这一情况，尾随着他们想看个究竟，但在八廓街口处，被上面人围殴，有两名藏人被人用皮带活活勒死。没人知道这些人是谁，也没人知道他们拿着这些档案去了哪里。

5日中午1点40分，武警部队开始向人民广场发射催泪弹（拉萨没有“人民广场”，只有大昭寺广场，1995年又修了个布达拉宫广场----引者），人群立即大乱。.....2点10分左右，大昭寺正面的高大‘塔经’被人点着了，熊熊的烈火直冲天空。（按这根缠满经幡的高大木杆树立在大昭寺侧面的八廓街南街上，而非“大昭寺正面”，这是我亲眼看见过无数次的，它是在3月6日傍晚7点30分藏独示威者焚烧附近的春晓商店时被风吹起火的（36）----引者）塔经显然被浇上了大量的煤油和汽油（《民主中国》为该文配的插图----作者提供的照片----说明：“3月5日被武警便衣烧燬的塔经”），高温使人们一时无法接近，正当一部分藏人提工具准备灭火的时候，武警士兵从人民广场两侧的高层建筑上向塔经周围的群众开火（方位？----引者），藏人见开了枪，都纷纷抛掉手中的水桶和灭火工具趴在了地上，然后猫着腰迅速地跑进了八廓街里。有七、八个藏人被打倒了，受伤的藏人忍着伤痛大声呼喊，希望在街里的人能赶来救护，但密集的枪弹把八廓街转经道口封得死死的，没人能冲出去救回那些受伤者。

下午3点左右，武警特别分队开始合围位于市中心的八廓街，他们用催泪弹射向人群，迫使他们退入八廓街的几条狭窄的巷子，藏人们利用八廓街中搭起的障碍物做为掩护，和前来的武警部队展开了激烈的对抗。由于藏人们顽强的抵抗，武警占领八廓街的企图未能如愿。正当400多名手持盾牌和冲锋枪的武警从八廓街里退出来的时候，青年路、北京东路一带也开始了激烈的对抗，300多名武警士兵被藏人的砖头、石块儿封锁，无法对市中心地带构成钳形包围。（我不明白既然武警可以对藏人开枪，为什么敌不过藏人的砖头与石块？还有，冲锋枪必须用双手掌握，武警手持了冲锋枪，怎么可能再拿盾牌？----引者）

下午3点至5点，武警部队奉命分别弃守了市中心的城关区政府、市公安局城关分局、吉日派出所和居民委员会、拉萨市小学和城关区粮站。藏人们在占领这些地方时，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挡。城关区政府的牌子被藏人们砸毁，市公安局城关分局临街一面的窗户全部被藏人们砸烂。由于武警部队在人民广场一侧的严密防守，藏人的冲击自治区政府和军区大院的设想已不可能施行（由此可见那次骚乱是藏人有计划有组织的暴乱，而不是像《刺刀》所说的那样是中国武警制造的“国会纵火案”----引者）。于是，他们从八廓街的北面 and 东面涌出去，在北京路、林廓路、青年路一带设置了对武警的防线。由于武警方面对市中心的弃守，这时的拉萨市中心地区基本为藏人们占领。一时间，市区内大乱，内地来拉萨经商的人害怕藏人们的报复，纷纷放弃了自己的饭馆和商店，向城外躲避，但是绝大多数藏人们不但没有伤害他们，反而帮助他们向城外疏散。在青年路、北京路一带，很多内地人在藏人的掩护下向外城转移。但当他们刚刚走出北京西路和青年路时，却遭到了来自武警防线一侧的攻击。催泪弹和石块儿雨点般地打了过来（我从来不曾听说过武警会用石块作武器，既然他们早已开枪，

此时为什么不开枪？----引者），使他们不得不退回到藏人的防线内，他们不明白武警部队为

为什么要攻击他们，藏人们也不明白。在林廓路，30 几名年轻藏人护送着一些内地人和藏族的老弱病残人员向外城突围，待他们刚刚冲过武警设置的警戒线时，就被密集的冲锋枪弹封锁住了（此处又说武警开枪了----引者）。随后，有成百的武警包围过来，带走了这批人。防线内的藏人们看到这一幕，他们用话筒向武警方面喊话，试图说明那些藏族青年是护送汉人们去城外避难的。但对方的回答是机枪和冲锋枪的点射及十几枚催泪弹----几乎没有任何对话的可能，也没有任何办法走出去了。藏人们面对现实，似乎预想到了形势的险恶。

由于城区失去了供应，一部分藏人市民开始收集物资。城关区粮店被砸开了，正当人们蜂拥上前准备装这粮食的时候，却有人往粮食里泼上了大量的汽油、柴油，点燃了熊熊大火，在其他地点，物资被藏人们从商店里抱出来堆放在街上准备分发给群众的时候，也被一一点燃烧毁了，汽车、救护车、大量的自行车等交通工具也被这样处理掉了。这时的市区，到处火焰冲天。一些藏人猛然明白了这是武警便衣们干的。于是，他们见到汉人和内地人就打，他们在这种严酷的现实开始绝望了。

这是《刺刀》对 3 月 5 日即第一天骚乱的描写，真是栩栩如生、骇人听闻，令人无法怀疑其真实性。

然而达赖喇嘛的自传却告诉我们完全不同的故事，他说：

自 1989 年 3 月 5 日起，拉萨又出现三天示威。其表现的强烈不满可以说是 1959 年 3 月以来所仅见。数万人走上街头。中国的安全部队改变策略，第一天一整天，他们袖手旁观，只拍摄一些照片，晚上在电视上播放。

其原文如下：On 5 March 1989, there began three more days of demonstrations in Lhasa. In some of the most vigorous expressions of discontent since March 1959, many tens of thousands took to the streets. Changing their tactics, the Chinese security forces remained on the sidelines throughout the first day, merely filming scenes which they showed on television that night.(37)

我们应该相信谁呢？《刺刀》还是达赖自传？我倾向于后者。如前所述，达赖喇嘛一贯造谣撒谎，然而那都是为了夸大或捏造中共罪恶的，当他也不得不承认中共对藏独骚乱表现克制时，那显然是真的。既然达赖喇嘛都说 3 月 5 日那天一整天中共武警根本没有动手、只拍摄照片，那么《刺刀》所栩栩如生地描写的那天武警用冲锋枪与机关枪扫射藏人的骇人听闻的场面纯属虚构。至于《刺刀》描述的武警便衣制造“国会纵火案”，不仅与《刺刀》自己的描写自相矛盾，也只有极端幼稚的人才会信以为真。中共最怕西藏骚乱引起西方指责，它怎么会主动制造暴力事件呢？

上文已经在括弧里列举了《刺刀》的许多细节错误，《刺刀》还有一个重大错误。《刺刀》说：“3 月 7 日晚间，在自治区党委主持的联席会议上.....第一书记胡锦涛（按自 1985 年起，中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改称书记，其他书记改称副书记----引者）首先宣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这次事件的联合指示：.....九、中央将决定在西藏拉萨实行戒严，戒严令于 1989 年 3 月 8 日由国务院总理发布.....”；“8 日 10 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西藏人民广播电台、西藏电视台同时播送了由中共国务院总理李鹏发布的对西藏拉萨的戒严令”；“3 月 12 日。西藏电台记者杨小芳报导：.....从 3 月 8 日戒严令发出到 9 日晚 20 时 30 分，已有 198 名在拉萨旅游的外国人分八批离开拉萨戒严区”。上述三段文字都说戒严令发布于 3 月 8 日，可见不会是排印错误，而是作者的错误。

事实上，戒严令是3月7日晚上七点零五分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与中央电视台同时宣布的，我当时在上海，亲眼从电视里看到了这一新闻，当时拉萨可以同步收听、收看中央两台的节目。1989年3月8日的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也援引驻北京记者的话说，拉萨戒严令是北京3月7日晚上宣布的。《西藏文学》双月刊1989年第3期发表的罗布顿珠与阿依达写的《戒严第一夜》说：“3月7日19时零5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同时播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李鹏签署的命令——自1989年3月8日零时起在拉萨实行戒严。”1989年3月18日的《西藏青年报》发表的该报特约记者写的《1989年3月5日至7日拉萨骚乱真相》也说：3月7日19点零5分，中央电视台播出戒严令。欧洲议会1989年3月15日的声明也说：“中国3月7日宣布在西藏戒严（原文：The European Parliament,... B）having regard to the fact that on 7 March China declared martial law in Tibet——European Parliament, Strasbourg, March 15, 1989）。

既然戒严令是从3月8日零点生效，当然要提前在3月7日晚上宣布，怎么可能迟至3月8日10点宣布呢？如果《刺刀》的作者当时在拉萨，那是绝对不会搞错的，《刺刀》把这样重要的细节都搞错，可见作者当时根本不在现场，事后是否作过认真的调查也大可怀疑。

关于3月6日与7日的情况，《刺刀》与达赖自传大同小异。《刺刀》说3月6日上午，武警用机关枪和冲锋枪铺天盖地向八廓街的藏人射击，密集的枪弹把藏人当作活靶。然后武警又向受伤的藏人补枪，将他们击毙。在拉萨其它地方，武警也不分青红皂白地开枪杀人，甚至冲进一居民家里打死了全家九口人。3月7日武警沿街搜查示威者，许多被捕者被拷打致死或致残，如此等等。《刺刀》最后说：“截止3月10日，拉萨市民共有387人在骚乱中丧生，其中多数是被枪弹击毙致死的。721人在骚乱中受伤，其中伤势较严重者126人。354人失踪。2100多人被捕或在押。宗教界人士82人死亡。37人受伤。100多人失踪。650人左右被捕或在押。外地藏人死亡数正在统计中。”将市民死亡数与僧尼死亡数相加，总共469人，外地藏人死亡数还不在此内。

达赖自传说：“但第二天（3月6日——引者），他们（武警——引者）又恢复用棒子打人和不分青红皂白地开枪，目击者指出，他们用机关枪扫射民宅，把全家人都杀死。不幸的是，藏人的反应不但包括攻击警方与安全部队，在若干场合中，无辜的中国平民也成为攻击的对象。……我虽然决不宽容暴力，但我承认某些程度的暴力是不可避免的。……中共至少杀害250无武装的藏人。（38）”

在领取诺贝尔和平奖的演说中，达赖喇嘛把被杀藏人数缩小到200多人（39）。

国际法学家委员会1997年发表的《西藏：人权与法治》（40）没有理睬《刺刀》与达赖喇嘛的数字，只引用了国际大赦组织的数字。后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西藏的镇压，1987-1992》（41）中估计，中国警察在1989年3月拉萨骚乱中枪杀了60到80个藏人。比达赖喇嘛的数字又小了很多。

美国众议院1989年5月16日通过的决议又把被杀人数缩小到30到60人（42）。

不知谁在造谣？

中共承认有16名藏人死亡，一名武警班长被藏人用枪打死（43）。事件真相究竟如何呢？根

据我的在现场的朋友，大致如下：

1989年2月8日清早（藏历新年初一），大昭寺顶上悬起一面雪山狮子旗。这旗并不随风飘扬，原来是用钉子钉在板上的。武警奉命进寺摘旗，寺庙紧闭，门后站着手持木棍的喇嘛。自治区民族宗教委员会出面劝导，当天深夜，大昭寺喇嘛自己把这面旗摘下来。拉萨城里议论纷纷：八廓街独立了一天。

3月5日中午，照例由喇嘛尼姑在八廓街游行并用石头攻击八廓街派出所，拉开骚乱的序幕。武警奉命不得朝人开枪，这就注定了骚乱会越闹越大。与前两年相比，这次骚乱参加者更多，组织得更好，估计有好几千人。加上以同情态度围观、喝彩的，有上万人之多。当时有人用哨子指挥，有人用摩托车联络，许多骚乱者脸上缠着毛线套头帽或带着口罩与墨镜，怕被录像、照相。他们集中攻击八廓街与北京路上的机关、学校与商店，特别是汉回个体户。据统计，有24个政府机关与学校被攻击，其中有城关区政府、城关区公安分局、城关区各派出所、城关区各居委会、新华社西藏分社、西藏日报社、拉萨市城建局、自治区外事办公室、城关区工商管理局、城关区税务局等。工商管理局被打砸抢后点火焚烧，全部档案化为灰烬。有99家个体户商店与饭店、八家国营与集体商店遭到彻底破坏，里面的商品与设施几乎全部被砸抢烧。有20多辆汽车、50多辆三轮车与自行车（自行车大都是过路行人的私人财产）被砸、烧。骚乱者甚至砸了街上的交通警察亭、红绿灯与变压器，结果自食其果——家中停电。有许多汉回平民与若干藏族职工被骚乱者殴打。骚乱者甚至企图焚烧清真寺，阿訇告诉骚乱者：我们在印度有几千万穆斯林兄弟，你们胆敢烧我们的清真寺，我们就叫印度的穆斯林兄弟烧达赖喇嘛的住宅。骚乱者才不敢烧。藏人烧清真寺是有传统的，1959年3月20日，拉萨叛乱时叛匪曾烧了清真寺与19间回民住房，抢劫了20家回民财物（44），可见藏人对自古以来居住在拉萨、以藏语为母语的回族都毫不宽容，那情景颇类德国纳粹党人虐待国内的犹太人。

3月7日下午3点，骚乱者本打算进攻拉萨市政府。有中共高级藏官把中国政府要在次日零点戒严的消息提前泄漏给骚乱者，当天下午两点多钟，一个戴口罩的喇嘛与一个戴口罩的尼姑站在八廓街与北京路之间的冲赛康市场的货架上先后演说：“今天的游行就到这里结束了，晚上共产党要采取行动，大家散开吧！”

在实施戒严前，中共严禁武警对人开枪，所以骚乱才会延续三天之久。如果可以对人开枪，第一天就把骚乱镇压下去了，怎么可能闹上三天？当骚乱者进攻重要机关时，武警曾朝天开枪警告，有子弹打中了远处楼上的一个了望者。当有个骚乱者用小口径步枪向武警开枪，打死一名武警班长，打伤三名武警战士时，武警破例还击，这便是藏人总共死16人、武警死一人的来由。藏人从何处搞到的枪，至今是个谜。前引达赖自传说起1987年10月1日骚乱时，有警察丢下枪逃跑（实际上是因为警察有枪不能开，被数量占优势的骚乱者抢走的）。可见确有枪支被藏人夺走。也可能是从境外偷运来的。也可能是1959年叛乱时留下的。戒严令发布前四个多小时，骚乱者就主动撤退了，所以除了那次例外外，根本就没有发生过军警朝人群不分青红皂白地扫射的事。戒严后中共逮捕了许多骚乱者，具体数目不详。

拉萨戒严震动了全世界，达赖喇嘛马上谴责中国政府侵犯人权、镇压“和平的示威者”，虽然他也承认这些“和平的示威者”曾殴打无辜的汉族平民。欧洲议会与美国国会也发表前引决议，谴责中国政府侵犯人权、镇压“和平的示威者”。在他们的辞典里，藏人打砸抢烧杀都不算暴力，只有中共镇压暴力骚乱才算暴力。不知他们镇压自己国内的暴力骚乱算不算侵犯人权？

“六四”大屠杀后，我也对中共在拉萨骚乱中的克制感到疑惑，问过我在西藏的朋友（这位朋友

在西藏参加了八九民运，在西藏 111 名汉藏新闻、文艺工作者声援北京绝食学生的公开信上签了字，还参加了拉萨声援北京绝食学生的游行，“六四”后遭到迫害），他说，拉萨三次大骚乱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是赵紫阳，他在西藏问题上一贯反“左”。在他的管束下，西藏谁敢下令开枪？人们应该还记得，八九民运刚开始时，赵紫阳不仅不准镇压，反而公开表示同情，还命令全国新闻媒体正面报道学生运动，即所谓的新闻自由 30 天，这在中共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正因如此，民运才会如此迅速地蔓延全国、规模越来越大。邓小平下令戒严时，赵紫阳公开抗命，始终拒不检讨。据戈尔巴乔夫的回忆录，赵紫阳与戈氏会见时，曾说过社会主义国家也要搞多党制。所以赵紫阳在西藏问题上的温和态度与他在民运问题上的温和态度是一脉相承的，我们在探讨中共西藏政策演变时，切不可忘记这一点。诚然，赵紫阳是同意拉萨戒严的，那是因为拉萨骚乱与八九民运根本不同。八九民运始终遵循“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而拉萨骚乱是不折不扣的暴乱，当时拉萨局势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实际上已经变成叛乱。世界上哪个政府能容忍成千上万暴徒连续三天打砸抢烧政府机关、商店、学校、车辆、警察与平民？美国政府能容忍 1967 年 7 月底特律与 1992 年 4 月洛杉矶的黑人骚乱吗？法国政府能容忍 1968 年“五月风暴”吗？

注释：

(33) 作者：唐达献，《民主中国》，第 3 期，1990 年 8 月出版于美国，33-50 页。

(34) 《西藏论坛》，1991 年 3 月号。

(35) 1933 年 2 月 27 日晚，纳粹党徒焚烧了德国国会大厦，然后诬指德国共产党所为，当夜进行全国大逮捕，史称“国会纵火案”。

(36) 秦文玉，《拉萨骚乱备忘录》，《神秘雪域》，天地图书有限公司，香港，1995 年。

(37) (38) Dalai Lama, *Freedom in Exile, the Autobiography of the Dalai Lama*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0), pp.260-261.

(39) "The Nobel Peace Prize Lecture, Delivered by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in Oslo, Norway, December 11, 1989", Congressional Ceremony to Welcome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of Tibet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2).

(40) Tibet: Human Rights and the Rule of Law (Geneva: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1997).

(41) Amnesty International,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epression in Tibet 1987-1992*, p.46.

(42) U.S. Congress House Concurrent Resolution 63, Washington, DC, May 16, 1989.

(43) 秦文玉，《拉萨骚乱备忘录》，《神秘雪域》，天地图书有限公司，香港，1995 年。

(44) 西藏自治区教委、西藏大学编，《雪域风云》，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1995 年，139 页。



## 6、九十年代：胡萝卜加大棒

拉萨戒严后一个多月，八九民运爆发。西藏的八九民运至今鲜为人知，为了保存史料，现将1989年5月20日《西藏青年报》第126期（国内统一刊号CN54-000）发表的有关材料全文转载如下：

西藏 111 名新闻、文艺工作者发往北京的声援书

本报讯：5月18日，西藏 111 名新闻、文艺工作者联名致电北京，声援北京大学生和新闻工作者要求民主，铲除腐败，以及要求新闻自由的请愿和绝食爱国运动。

《声援书》全文如下：

首都绝食请愿的大学生们

首都新闻工作者请愿团

我们是工作在祖国边疆---西藏的新闻和文艺工作者。你们在天安门广场为推进中国民主进程的壮举，我们非常理解，请接受西藏首批声援者诚挚的敬意和问候！

为了中国的光明未来，我们呼吁新闻要讲真话，给新闻以自由。

为了中国的安定，我们强烈呼吁党中央、国务院与绝食学生平等对话，尽早结束有伤中国未来精英的绝食行动。内地安定，才能保障西藏的安定。

我们相信，在每一个炎黄热血子孙的努力下，一个伟大、民主、强盛的中国必将屹立于世界。

西藏新闻、文艺声援团（名单略，其中藏族至少 26 人---引者）

1989 年 5 月 18 日

声援团绝大多数是年轻人，来自区内的数十家新闻和文艺单位。民族成份包括汉、藏、回、彝等民族。截止记者发稿时，还有许多人陆续要求在声援书上签字。

声援团的新闻和文艺工作者考虑到拉萨正处于戒严期。为维护戒严令的严肃性，决定不搞上街游行声援活动。但同时委派专人前往北京天安门广场打出声援横幅。

西藏大学发生大规模学生声援活动

本报讯：5月18日上午，西藏大学 600 余名大学生打着横幅，喊着口号，走上拉萨街头游行请愿，声援北京高校学生的绝食请愿爱国活动。

学生们的这次行动是从早晨 9 点 15 分开始的。他们先在学校礼堂前集合开声援会，呼喊口号，然后在校内游行。游行中，学生们的情绪渐渐高涨，纷纷要求走出校园，上街游行。

自治区党政有关领导及时赶到西藏大学，与校方一起同大学生们协商，劝导同学们不要上街游行。他们对同学们表现出来的极大的爱国热情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指出拉萨目前正处于戒严的非常时期，西藏当前最大的矛盾是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同学们在表达爱国热情时要考虑妥当的方式与方法，不要上街游行，以免给少数分裂主义分子以可乘之机。

但此时热血沸腾的学生已听不进任何劝阻，在几个情绪激动的学生带领下，走上了大街。这期间，校方曾一度关闭大门，继续苦劝学生，但铁门很快便被同学们冲开，游行队伍开始了沿金珠东路由东向西的声援游行。部份青年教师也参加了游行。

游行学生打出的横幅上写着：“拥护共产党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声援北京高校绝食请愿运动”、“维护祖国统一”、“坚决要求国家主要领导人与学生对话”等。他们呼喊的口号是：争取民主自由、清除腐败、铲除官僚、打倒官倒、新闻要说真话、学生运动万岁等等。

自治区领导又赶到街上劝说游行队伍不要走得太远，以免发生意外。经过与同学们反复磋商，同学们走到拉萨市政府门前便停住了。他们在市府前发表了慷慨激昂、感情真挚的声援演讲。

最后，同学们向自治区有关领导提出三点要求并得到肯定答复后，于中午 12 点过返回了校园。他们提出的三点要求是：

一、立即向党中央、国务院和首都高校绝食请愿学生致电：声援学生的爱国运动，要求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尽快与绝食学生见面对话。

二、北京的绝食请愿活动不结束，西藏大学的同学就要保留继续罢课、游行请愿的权力。

三、拉萨的新闻单位要立即如实报道这天的学生爱国请愿活动。

拉萨一中部分青年教师上街游行

本报讯：5 月 18 日下午 3 点 50 分拉萨市第一中学的部分青年教师从学校侧门走上街头，举行声援北京爱国学生运动的游行。

他们打着“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行动”、“国家兴亡老九有责”等横幅，他们的口号是：民主万岁、人民万岁、废除专制、打倒官僚等。

教师们认为这是一次表示对北京学生和群众敬意的和平游行。在沿金珠东路向东行进时，与前来阻挡的武警发生了一些小的冲突。

在声援书上签字的 111 人中至少有 26 名藏族，其中包括扎西达娃与俄珠多吉（我说至少，因为有些藏人使用汉名，我难以辨认），声援书中有“祖国”与“炎黄热血子孙”的提法，而藏独分子从来不承认他们是炎黄子孙，当然也不承认中国是他们的祖国。西藏大学当时学生不足一千人，大部分是藏族，可见参加游行的 600 多学生中至少有一半是藏族。他们的横幅中有“维护祖国统一”，想必是汉族学生准备的，参加游行的藏族学生也不曾反对。游行中始终未喊“西藏独立”的口号。毫无疑问，声援书与游行的组织者都是汉人。我不知道参加签字与游行的藏人有多少是真心把自己当作中国人来忧国忧民的，有多少是盲目起鬨的。但他们参加这种活动时

，至少心中并无西藏独立的念头，否则决不会参加这种以“爱（中）国”为旗帜的活动。这一现象说明，并非所有的藏族精英都坚决要求西藏独立。至少也说明，藏人的情绪多么容易被煽动，服务于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目的。

1989年10月19日，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西藏问题。会议批判了赵紫阳关于西藏骚乱是长期“左”的结果的看法，强调“不能把骚乱简单地说成是长期‘左’的结果”。会议认为西藏骚乱是“境内外分裂势力在国际反动势力支持下掀起的旨在分裂祖国、反对共产党、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严重政治斗争”。“落实政策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落实宗教政策是为了照顾和尊重群众的宗教感情和需要，而不是去适应分裂主义分子或他们头子们搞分裂活动的需要。因此，要加强寺庙的管理，一切宗教活动都必须在宪法、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范围之内，不允许寺庙干涉政治、经济、文化事业和恢复封建特权”。“今后要坚定不移地带领广大群众把反分裂斗争进行到底，坚决反对搞‘西藏独立’、‘半独立’和‘变相独立’的一切主张和行为。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推动西藏的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45)。

关于宗教政策的那段话显然是一年前去过西藏的乔石的意思，可见被人视为改革派大将的乔石在西藏问题上强硬派。这次会议表明，中共决心结束胡耀邦--赵紫阳的绥靖政策，改行胡萝卜加大棒政策。一方面继续用巨款提高藏人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严厉镇压一切藏独活动。尽管如此，中共在对外宣传中，仍然避免直接攻击达赖喇嘛。

戈茨坦这样评论新政策：“作为这些措施的结果，新的示威一开始就遭到控制，不至演化为骚乱。实际上，1990年戒严令解除后的七年里，虽有频繁的示威，却没有骚乱发生。这种控制并未限制拉萨居民的日常生活，只要他们不参与政治异议活动，他们可以去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会朋友，邀请僧侣进行宗教活动，聚会，等等。这一成功使北京领导人相信他们的安全力量足以对付任何异议分子或流亡藏人的战术。(46)”

国际法学家委员会的《西藏：人权与法治》也承认：“自从1987年到1989年的示威与骚乱之后，没有确凿证据表明再发生向和平示威者开枪的事例。(47)”

1995年5月14日，达赖喇嘛抢先指定十世班禅的转世灵童，激怒了中国政府，从此公开点名批判达赖喇嘛。按照《钦定藏内善后章程》，达赖喇嘛与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必须由中国的驻藏大臣用“金瓶掣签”认定。甚至在民国年间，现世达赖也是由噶厦政府报国民政府批准免予抽签并派员主持其坐床仪式的。那么很自然的，十一世班禅也应由中国政府认定、批准和主持坐床。达赖喇嘛既已自行逃亡在外，本已失去了过问班禅转世的资格，更无权力抢先认定班禅灵童。达赖喇嘛在抢先认定十一世班禅的声明中说：“认可转世灵童是宗教事务，并非政治事务；我希望中国政府.....能给予谅解、合作与协助。(48)”这话单独看似有理，然而既然达赖喇嘛自己仍在搞政教合一（按照“西藏流亡议会”1963年公布的“西藏国宪法草案”，达赖喇嘛既是宗教领袖，又是“国家元首”；他一贯以宗教的名义煽动西藏独立，以宗教领袖的名义从事政治活动），他又有什么资格要求中国政府将宗教事务与政治事务分开？己身不正，焉能正人？

从1995年秋天到1996年底，西藏出现了好几起小型爆炸事件。大都发生在夜深人静时、公共建筑处（自治区、拉萨市政府大门口、青藏与川藏公路纪念碑等----知情者告诉作者），无人受伤，也无人知道是谁干的。拉萨城里议论纷纷，一致认为是藏独分子所为。中共也持同样看法(49)，虽然至今破不了案。中共在1989年拉萨戒严后，对上街示威的僧尼采取一出现就

抓的策略，使之来不及扩散成大规模的骚乱，因而成功地控制了局势。但小股僧尼示威不断，终究是隐患。1996年5月14日陈奎元在自治区人大和政协六届四次会议党员大会上说：

目前，我区大多数僧尼是守法的、爱国爱教的，但要看到寺庙内的确有一些死心塌地追随达赖的反动分子，敌对势力一直企图利用达赖的宗教影响和这些反动分子，把寺庙变成他们在内部从事分裂活动的基地、据点。今年3月9日达赖集团的头面人物之一桑东活佛一语道破天机，他说，他们37年的‘主要教训在于未能一贯地执行政教合一的政策，过分地强调了宗教而忽视了政治。’他强调指出，‘要利用宗教把人民组织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敌人明明在利用宗教搞分裂，我们怎可坐看他们控制寺庙颠覆我们的人民政权而无所作为？为了打击达赖集团的分裂活动，保护广大信教群众正常的宗教生活，必须对区内寺庙进行有区别的整顿。坚决支持爱国爱教、遵经守法的僧尼，同时，对受达赖集团操纵、僧尼经常闹事的寺庙坚决整顿，维护寺庙的圣洁本色和佛教的教义教规，使其不为敌对分子所操纵、所利用（50）。

陈奎元讲话后，西藏当局派出以藏官与藏干为主的工作组，以“爱国主义教育运动”的名义进驻各寺庙——首先是三大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要求僧尼通过“学习”（西方称之为“洗脑”）逐一签字保证：拥护中国政府、承认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承认中国政府确认的班禅灵童、谴责达赖喇嘛的分裂活动、交出达赖喇嘛的相片、保证不再参加藏独活动等。拒不签字者开除出寺庙，不得进入其他寺庙。反抗者（张贴藏独标语、呼喊藏独口号、挥舞雪山狮子旗、进行藏独宣传、行凶等）以危害国家安全罪逮捕。年龄不足16岁的僧尼一律遣送回家。没有寺庙编制自行出家的僧尼也一律遣送回家。据一位参加了工作组的朋友告诉我，甘丹寺闹得最凶，工作组入寺时，该寺喇嘛向他们扔石头，护送工作组的武警朝天鸣枪警告，抓了一些喇嘛，工作组才得以进寺。在其他小寺，运动颇为顺利，僧尼们恭恭敬敬地迎接工作组入寺，认真学习，乖乖地签字。有些年轻僧尼是在父母压力下出家的，他们向往寺外的花花世界。这次运动中，他们趁机拒绝签字，故意让工作组把他们开除出寺，达到还俗的目的。与此相反，有的虔诚信教的老喇嘛写了书面的长篇“思想认识”，谴责藏独运动、用自己的语言与论据深刻论证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工作组告诉小寺僧尼，本来政府还要进一步落实宗教政策、给你们寺庙更多钱的，都是三大寺闹藏独，政府决定不给钱了，于是小寺的僧尼们就怨恨三大寺的喇嘛。

与此同时，1996年6月，自治区政府给全体西藏职工（其中三分之二以上是藏族）3200元一次性补助（51），以稳定藏族市民。后者拿到了意外之财，对寺庙里发生的事也就无动于衷。

许多被开除出寺的僧尼逃亡印度，向达赖喇嘛哭诉。达赖喇嘛趁机大肆攻击中共侵犯人权。西方也掀起了新一波谴责中国政府侵犯宗教自由的浪潮。但“爱国主义教育运动”确实控制了西藏局势。由于陈奎元的主动出击，拉萨连小股僧尼的零星示威也绝迹了。1997年也未再发生爆炸事件。

陈奎元接着整顿内部，下文件禁止干部党员信教、把子女送到达兰萨拉学习，要求他们交出达赖喇嘛的相片。由于《民族区域自治法》的限制，西藏的行政官员几乎全部由藏人担任。陈奎元就让汉人担任各级党委书记（这些汉官大都是三年一换的对口援藏干部），考察、监督藏官。陈奎元还搞了个“调整地专班子”，前述文化厅长强巴平措就是那时因里通达赖而平调文联主席的，还有原拉萨市委的藏族书记在中美合资的拉萨假日饭店嫖妓被平调自治区外事办公室主任（如果他不在那种地方嫖妓就像强巴平措玩弄女演员一样不算一回事）。可以看出，这样的“处分”微不足道，几乎起不了作用，无怪乎收缴达赖喇嘛相片会走过场。对于自治区一级

的高级藏官，无论是里通达赖也好（1989年3月7日把戒严令提前泄漏给藏独骚乱组织者的藏官至今安然无恙，流亡藏人的电脑网至今源源不断发表自治区党委的机密），贪污腐化也好（用公款造豪华私宅、用职权玩弄女性下属、收受巨额贿赂、官倒、嫖妓等等----为了给这些身居高位的藏官留点面子，这里暂不点名），陈奎元根本不敢过问。由此可见，胡耀邦、赵紫阳的绥靖政策阴魂不散，新的大骚乱不可避免。

注释：

（45）《当代中国的西藏》（上），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1991年，458-459页；《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1995年，363-364页。

（46）Goldstein, Melvyn C.,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93.

（47）Tibet: Human Rights and the Rule of Law (Geneva: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1997).

（48）美联社新德里 1995 年 5 月 14 日电：《达赖喇嘛宣布寻获班禅转世灵童》，《世界日报》，1995 年 5 月 15 日。

（49）（50）《中国之春》，1996 年 10 月号，46-47 页。

（51）《威逼利诱迫藏人反达赖喇嘛》，《西藏通讯》，1986 年 7-8 月号。

## 第四部：新的冷战

### 第十二章：冷战在继续

#### 1、从国会山到奥斯陆

在美苏对峙的冷战时代，中共走过了先靠苏反美、后联美反苏、再与苏和解的“之”字形。在 1972 年 2 月尼克松(Richard Nixon)总统访问中国前，西藏问题是西方打击、遏制中共的一条战线。特别是 1959 年 3 月噶厦政府叛乱失败、达赖喇嘛逃亡后，西方阵营在西藏问题上掀起了滔天巨浪。前引联合国 1959 年、1961 年与 1965 年的三个决议与国际法学家委员会 1959 年与 1960 年的两个报告就是其集中表现。

1972 年起中美联合对付苏联后，美国放低了对达赖喇嘛的支持程度。1973 年达赖喇嘛首次申请对美国进行私人访问，尼克松总统拒绝给他签证。尽管那时正当文革肆虐西藏，美国却很少攻击中共侵犯西藏人权。1979 年 9 月达赖喇嘛首次以旅游签证访问美国，只谈宗教、和平、仁爱，美国官员与议员都不见他，国务院还拒绝了他访问太空中心 NASA 的要求。那时中共是西方反苏的得力帮手，达赖喇嘛在西方领导人那里根本挂不上号。

1986年起，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搞改革，推行亲西方政策，受到西方的喝彩，变成西方的宠儿。中国在西方反苏战略中的重要性大大降低。西方仇视中共与中国的势力开始行动。1987年6月18日，美国众议院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犯西藏人权的修正案》（1），首开八、九十年代西方议会干涉西藏问题的先例。正如前引董尼德所说的那样，写有这一决议要点的海报被人秘密张贴在拉萨街头，引发了一系列大骚乱。该年12月15日与16日，此案经增修后，再次交参众两院正式讨论、分别通过，附在《1988-1989年财政年度美国外交授权法》后面，同月22日由里根总统签署生效（2）。该案除了重复达赖喇嘛关于中共消灭了100多万藏人的谎言，谴责中国政府侵犯西藏人权外，还说：“国务院应通过国务卿对西藏人民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其他非汉民族---如东土耳其斯坦（新疆）的维吾尔人与内蒙古的蒙古人等---的权利表明态度并提请人们关注。”从此以后，美国国会几乎每年都要通过议案，谴责中国政府侵犯西藏人权，支持达赖喇嘛，而且调门越来越高。其他西方议会也跟上，纷纷通过干涉西藏问题、谴责中国政府侵犯西藏人权、支持达赖喇嘛的议案。

1987年9月21日美国国会人权委员会邀请达赖喇嘛演讲，这是他第一次登上美国官方的讲台，而且是在举世瞩目的国会山。达赖喇嘛在这次演说中除了大肆造谣外（诸如说西藏自古以来是独立国家，中共消灭了100多万藏人，中国在西藏生产与部署核武器并弃置核废料，中国在西藏实行种族隔离政策，中国大量移民使藏人在“大西藏”与自治区内都变成少数等等），还提出了“五点和平计划”。其要旨是：

一、把“大西藏”变成“和平区”和“缓冲国”。中国从“大西藏”撤军。

二、中国停止向“大西藏”“移民”，已经定居在“大西藏”的“中国人”必须“返回中国”。

三、尊重西藏人民基本人权与民主自由。达赖称西藏是世界上侵犯人权最严重的地区。中国在西藏实行“种族隔离”政策，使藏人变成“二等公民”。

四、保护西藏环境，停止中国在西藏生产核武器与弃置核废料。

五、就“大西藏”的未来地位与中国政府开始对话（3）。

美国议员为他热烈鼓掌，把他吹捧为人权斗士和英雄。八名议员写信给赵紫阳，要求他接受达赖喇嘛的计划。次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支持达赖喇嘛的“五点和平计划”，要求中国政府以此为基础与达赖喇嘛谈判（4）。从此以后，美国国会几乎年年邀请达赖喇嘛演讲，1988年7月美国国会还授予达赖喇嘛第一个人权奖---沃伦伯格奖。

1987年10月14日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就西藏人权问题举行听证会，三位众议员作证时说西藏是个独立国家，有个议员要求美国政府敦促中国政府考虑达赖喇嘛的“五点计划”。助理国务卿芮孝俭（J. Stapleton Roy）作证时说美国政府不支持达赖喇嘛的“五点计划”，因其基本要求是西藏独立，而美国一贯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5）。

1988年6月15日，欧洲议会邀请达赖喇嘛演讲。除了继续大肆造谣外，达赖喇嘛重新解释了“五点计划”。他提出把“大西藏”变成“一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相联系的自治民主政治实体”，中国可以继续负责“大西藏”的外交政策。“大西藏”将有一个自己的宪法与政府，有权决定同“大西藏”与西藏人民有关的一切事务---这就否定了中国可以负责“大西藏”的外交。他还建议召开一个地区和平会议来保证“大西藏”通过非军事化和中立化而成为一个真正的和平圣地。在

这之前，中国可以在“大西藏”保持有限数量的旨在自卫的军事设施（6）----这就是说，在召开了这样一个会议以后，中国必须从“大西藏”全面撤军。由于欧洲议会位于法国的斯特拉斯堡，达赖喇嘛把这一方案叫做“斯特拉斯堡方案”。它与“五点计划”并无实质性的不同。

达赖喇嘛这两次演讲虽然没有得到任何政府的支持，却大大提高了他的身价。这一方面得益于国际局势的改变，另一方面也得益于1987年10月1日与1988年3月5日的两次拉萨大骚乱。

1989年是达赖喇嘛大交好运的一年：3月拉萨爆发了自1959年叛乱以来最严重的骚乱，使达赖喇嘛获得了更多的资本。中共镇压民运的“六四”大屠杀给了全世界极为恶劣的印象，坐实了达赖喇嘛关于“中共消灭了120万藏人”、“西藏是世界上侵犯人权最严重的地方”等谎言。年底，东欧各国共党全部垮台，苏联内部剧烈动荡，达赖喇嘛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美国国会立即专门通过决议，对达赖喇嘛荣获诺贝尔和平奖表示祝贺与支持（To congratulate His Holiness the XIV Dalai Lama of Tibet for being awarded the 1989 Nobel Peace Prize）（7）。

1989年诺贝尔和平奖被颁发给达赖喇嘛而非八九民运领袖令许多中国人大吃一惊。挪威诺贝尔协会会长解释说：“达赖喇嘛具备了包括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内的其他候选人所不具备的有利条件，主要是因为中国对民主运动实行了镇压和随后整个世界都感到义愤。选中达赖喇嘛是为了影响中国的局势，也是为了承认中国学生从事民主运动的努力。达赖喇嘛获奖人权问题不是新因素，政治则起了作用。（8）”

这位先生说，把和平奖发给达赖喇嘛是为了影响中国的政治局势，而非西藏人权状况，此言非常坦诚。但他说此举是“为了承认中国学生从事民主运动的努力”，则是指鹿为马、荒谬绝伦。八九民运曾被所有参加者和同情者称为爱国民主运动，这个国当然是中国。在爱国的旗帜下，中国各族学生团结一致，不分彼此，没有任何民族偏见。维吾尔人吾尔开希被汉族占压倒多数的北京学生推为领袖就是明证。西藏的藏族新闻、文艺工作者与藏族学生同汉族一起声援北京学生也证明了这一点。然而达赖喇嘛领导的藏独运动是要分裂中国，在中国挑起波斯尼亚式的种族战争，使包括藏族在内的中国各族人民陷入血海与浩劫之中（下章详述），这与北京学生从事民主运动的目的----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富强的中国----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一位参加过八九民运的学生说：“六四”死难者做梦也想不到他们流的血换来的是达赖喇嘛得到诺贝尔和平奖，而他们如果活着，都会坚决反对西藏独立（9）。我当时在国内，听到许多参加过八九民运的学生与知识分子对此表示困惑与失望。

确实，洋大人们的想法与其中国崇拜者完全不同。崇拜西方的中国学生天真地认为，既然他们听从洋大人们的教诲，把西方的自由民主奉为至宝，不惜为之流血牺牲，洋大人们就一定会不遗余力地支持他们、嘉奖他们。殊不知西方对分裂中国比使中国民主化更感兴趣。在他们看来，一个拥有十几亿黄种人口、上千万平方公里领土的中国即便民主化了，也是对西方白人世界的巨大威胁。只有让中国分裂、解体，才符合西方白人世界的利益，达赖喇嘛就是他们分裂、肢解中国的头号得力工具。为了分裂、肢解中国，哪怕让达赖喇嘛把中国拖到种族战争的血海中去也在所不惜。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达赖喇嘛所传递的就是这样的信息。这里的要害已经不是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或社会制度的分歧，而是种族的分野。隐藏在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关于“和平、自由、民主、人权”的华美词藻背后的，正是这种令中国人不寒而栗的，与和平、自由、民主、人权背道而驰的冷酷计算。

台湾藏学家、前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张骏逸教授指出：“西方有些人企图分裂西藏是害怕中国的强大，近几年‘中国威胁论’声嚣尘上，西方强权害怕如果中国保持一个统一强大的国家，它

们的利益可能就会受到损害。尤其是近年来祖国大陆在经济上的发展和各方面的建设，大家有目共睹，但这是西方国家的某些人不愿意看到的。”台湾藏学界元老吕秋文教授也认为“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少数人图谋西藏独立，是不希望中国强大”（10）。

1989年10月7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了如下社论：

达赖喇嘛因何得和平奖？

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是颁给流亡国外的西藏人“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这个决定可能会使许多人感到意外，但在深一层分析后，人们就会觉得这其实也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

首先，诺贝尔奖颁发，本来就没有一个可令各方面心悦诚服的标准，尤其是和平奖的提名遴选与颁发过程，更是经常引起众多非议。这是挪威国会一个委员会的决定，它的决定常有令人啼笑皆非之处，最“传为佳话”的例子，莫过于它在1973年把和平奖颁给基辛格与当时北越和谈代表黎德寿共享。和平奖委员会的这番盛情，连黎德寿本人都不好意思接受。越南过后侵占柬埔寨，以及黎德寿本人的表现，充分反映了所谓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发，有时候真是形同儿戏。

在中国发生“六四事件”后不久，就已盛传中国异议分子的领袖柴玲可能获颁和平奖，如果柴玲或吾尔开希等人真的得到诺贝尔和平奖，虽然还是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但也许还可以反映有关的委员会至少还有根据某种原则来决定，如今和平奖颁给达赖喇嘛，就非常令人匪夷所思了。

达赖喇嘛凭什么得到和平奖呢？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表扬他“避开暴力，使用和平方法，要使西藏自中国统治解放出来”。姑不论达赖是否完全不鼓吹暴力，委员会如此表扬他，决定颁之以重奖，就等于公然支持他的脱离中国运动，也就等于公开声明他们认为西藏并非属于中国。

西藏主权属于中国，这是连美国政府都承认的事。即使对这个问题还存有疑点，也纯粹是中国政府与西藏人民之间的问题，如果要找任何国际组织“主持公道”，那联合国之类的组织也许更加恰当。无论如何，像这类高度政治性、争论性的事情，却是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之类的组织所不应为的。

达赖喇嘛所象征的，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一种“政治斗争”。一个以促进和平为己任的委员会，的确不应该在这种高度争论性的政治斗争中，如此明目张胆地偏向其中一方。

一个地区的人民基于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而不愿意接受中央的统治，并不是现在才有的事，更不是中国才有的问题。这类的问题，必须通过理性与忍让的态度来解决。但诺贝尔委员会的这项决定，却可能开一个“危险的”先例。达赖喇嘛到西方求援之时，西方“好打抱不平”的人也只是给他口头上的支持，因此诺贝尔委员会这次的决定，真正的用意其实只是在给中国政府好看，这跟北京“六四事件”的发生及其余波，相信也不无关系。中国政府如能平心静气想想，也应理解出其中值得他们反思的地方；但诺贝尔委员会为了要做给人好看，甘冒干涉别国内政之指责，有违它原有的宗旨，有损它本身的形象，恐怕也是“得不偿失”。

这篇文章说得多么好啊。顺便说说，挪威在历史上虽然从未派兵侵略过中国，却分享过庚子赔款，挪威是欠了中国人民的债的。如前所述，达赖喇嘛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一方面得益于戈尔



巴乔夫的改革，它使西方不再需要利用中国反苏，从而可以放手支持达赖喇嘛分裂中国；另一方面得益于拉萨戒严与“六四”大屠杀，它们使达赖喇嘛身价倍增、使中共声名狼藉，而拉萨大骚乱是邓、胡、赵宠出来的，“六四”是邓小平的最大败笔，所以达赖喇嘛的和平奖实际上是戈尔巴乔夫与邓小平联合奉送给他的。

注释：

(1) U.S. Congressional Record, vol. 133, no. 98 and 100, 1987.

(2) United States Public Law 100-204, Foreign Relations Authorization Act, Fiscal Years 1988 and 1989, Washington, DC, December 22, 1987.

(3) "Address to the U.S. Congressional Human Rights Caucus----Five Point Peace Plan for Tibet", Congressional Ceremony to Welcome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of Tibet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2).

(4) 董尼德 (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与死》(Tibet mort ou vif)，苏瑛宪译，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台北，1994，165 页；United States Congress, S. Con. Res. 129, Washington, DC, September 16, 1988.

(5) Human Rights in Tibet,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s on Human Rights, and on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of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100th U.S. Congress 1st session, October 14, 1987.

(6) "Address to members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Congressional Ceremony to Welcome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of Tibet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2).

(7) United States Congress, S. Con. Res. 75, Washington DC, October 5, 1989.

(8) 转引自：直云边吉，《达赖喇嘛----分裂者的流亡生涯》，海南出版社，海口，1997 年，109 页。

(9) 《天葬》，517 页。

(10) 张永清，《出席藏学讨论会的台湾学者表示反对西方分裂西藏的行径》，《人民日报》海外版，1997 年 8 月 25 日。

## 2、从后冷战到新冷战

达赖喇嘛的一贯策略是，一方面利用其宗教领袖（神、观音菩萨化身）的号召力与西藏政教合一的传统、以及中共对西藏宗教势力即藏独势力姑息忍让的空子，不遗余力地、不择手段地借宗教之名煽动藏人闹独立；另一方面千方百计乞求西方的支持，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西方则根据其全球战略需要，决定其对达赖喇嘛的支持程度与支持方式。达赖喇嘛乞求西方支持的主要方式是以西藏宗教领袖的身份访问西方国家。反过来，西方支持达赖喇嘛的主要方式也是

邀请达赖喇嘛访问、由政界要人接见他、为他提供讲台、大肆宣传达赖喇嘛的主张与谎言、由各国议会和国际组织通过决议支持达赖喇嘛的主张与谴责中国政府等等。这是名副其实的冷战，或者说是全球冷战的一翼。达赖喇嘛不过是西方反对中国的冷战中的一名过河小卒而已。

七十年代，由于西方联中反苏，达赖喇嘛的外交毫无成勳可言。八十年代，达赖喇嘛出访了20个国家，43国次，超过前20年出访国次的总和。但始终没有得到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接见。从1990年到1994年五年中，达赖喇嘛出访48国、77国次，超过前30年出访国次的总和。尤其重要的是，他得到了许多大国元首与首脑的接见。达赖外交取得空前成功，这不是因为他个人有什么魔力，而是世界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继1989年底东欧易帜后，1990年苏联各加盟国掀起了独立的狂潮。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议会率先宣告立陶宛独立，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要求布什总统与之建交，爱沙尼亚与拉脱维亚立即跟上。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要派兵镇压，布什致函戈尔巴乔夫，支持波罗的海三小国自决，戈尔巴乔夫不敢派兵。6月，俄罗斯宣布为主权国家，其他加盟国也跟上。是年底，几乎所有加盟国都发表了主权宣言，亚美尼亚则宣布独立。1991年苏共“八一九”政变失败后，苏联各国纷纷正式独立，西方欢欣鼓舞、坚决支持。1991年圣诞节，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讲话，宣告自己辞职与苏联解体。

还在苏联分崩离析、尚未最终解体之时，西方就加强了支持达赖喇嘛的力度。1990年10月，达赖喇嘛到法国推销其自传的法文版，法国外交部副部长接见了，这是法国外交部长官第一次接见他。法国文化部长则陪同他参观展览。1991年3月9日，英国查尔斯王子接见达赖喇嘛。同月17日与20日，英国上、下议院议长分别接见达赖喇嘛。

1991年4月16日，布什总统在白宫“私人会见”了达赖喇嘛，这是第一个西方国家元首接见他。台湾的《中央日报》在1991年4月19日以《布什私下会见达赖，创下国际先例》为题报道此事。西方各国纷纷仿效。是年3月英国首相梅杰还以英国不承认也不鼓励西藏独立为由拒绝接见达赖喇嘛，同年12月1日就接见了。1993年4月27日，美国副总统高尔以私人身份接见达赖喇嘛，克林顿总统以“路过高尔的办公室时顺道进去”的方式接见达赖喇嘛。从此他们几乎年年以此方式接见达赖喇嘛。克林顿还一再敦促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谈判。1997年10月，美国国务院任命了一名“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其任务是观察西藏局势、促进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对话（11）。

1991年5月21日，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案，其标题为：“表达国会意见的共同决议，根据国际法，西藏---包括历史上为西藏的一部分，今已并入中国的四川、云南、甘肃及青海等省的地区---是一个被占领的国家，它的真正代表是西藏人民所承认的达赖喇嘛及西藏流亡政府”（12）。这是美国国会在西藏问题上的一大飞跃，从人权问题陞级到主权问题。同样的内容也出现在1991年10月28日美国国会通过的《1992-1993财政年度美国外交授权法》中，由布什总统签署生效（13）。从此以后美国国会几乎年年通过类似的决议案，直接了当地支持西藏独立。不过美国国务院坚持说，国会决议只反映国会的看法，对美国政府与美国政策并无约束力（14）。如前所述，美国政府的政策始终是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1992年7月22日，美国参议院举行听证会，达赖喇嘛驻美国首席代表洛地甲日（Lodi Gyari）、美国影星 Richard Gere、美国藏学家 Jeffrey Hopkins 及参议员 Claiborne Pell、David Boren 等都要求美国承认西藏为独立国家。助理国务卿 L. Desaix Anderson 重申美国认为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立场，并说中国政府并非故意用移民汉化西藏，自1980年以来中国政府开始在西藏执行文化宗教宽容政策（15）。这话出自美国助理国务卿之口，实属难得，因为美国国务院每年发表的中国--西藏

人权报告都要谴责中国侵犯西藏人权、大量移民西藏、毁灭西藏文化与宗教（详见后文）。

美国而外，欧洲议会自 1987 年起也几乎年年通过决议干涉西藏问题，公然称西藏、内蒙古与新疆为“被占领的西藏、内蒙古与东土耳其斯坦”（但不敢说“被占领的国家”）。澳大利亚、西德与德国、意大利、比利时、瑞士、捷克共和国、爱尔兰与列支敦士敦等国议会也通过决议支持达赖喇嘛、干涉西藏问题，其中澳大利亚最为积极。

自从 1971 年中共取代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成为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后，联合国再也不能干涉西藏问题了。西方于是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里做文章。1991 年 8 月 23 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下属的第 43 届小组委员会以秘密投票的方式通过“西藏局势”决议，九票赞成，七票反对，四票弃权。决议代号 1991/10，其全文如下：

小组委员会：遵循《联合国宪章》、《国际人权公约》和人权领域的其他国际文件，对连续不断有报道反对侵犯人权与基本自由的行为威胁到西藏人民特有的文化、宗教和民族特征的情况感到关切；1、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完全尊重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与自由；2、请联合国秘书长向人权会转交中国政府和其他可靠来源提供的有关西藏局势的资料。

1992 年 1 月 27 日至 3 月 6 日，联合国第 48 届人权大会在日内瓦召开。小组委员会的 1991/10 号决议按规定被提交大会讨论。2 月 24 日欧洲共同体宣布要当“西藏局势”的共同提案国。2 月 28 日美国反对“西藏局势”决议，认为只谈西藏问题有违于美国关于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立场，有分裂主权国家之嫌。美国提出一个批评全中国人权记录的决议草案。3 月 2 日美国与欧共体达成妥协，决定不单独提出“中国局势”，也不单独提出“西藏局势”，而改成“中国/西藏”决议草案，欧共体、美国与日本都成为提案国。

3 月 4 日表决前，中国代表说，“中国/西藏”决议草案本身就是一个旨在分裂中国的决议。流亡境外的分裂主义分子对这个决议的出台感到高兴，而某些非政府组织在鼓动决议之时，就主张西藏独立；欧共体与美国妥协后提出的“中国/西藏”决议草案本身也说明，它把中国的一部分领土挑出来，旨在分裂中国。

美国代表则说，决议应该付诸表决，尽管标题中说明了西藏，但这是由于那里出现的连续不断的侵犯人权事件而对中国整体上的谴责。美国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也为对该地区人民的过火行动表示关切。

巴基斯坦代表提出不对“中国/西藏”决议草案采取行动。结果以 27 票赞成，15 票反对，10 票弃权通过。法新社 1992 年 3 月 4 日日内瓦电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今天决定不就一项谴责北京在中国和西藏侵犯人权的决议案进行表决，这是中国在外交上取得的一个胜利。”

联合国人权大会有 53 个会员国，其中 38 个是发展中国家。许多发展中国家自己也有民族分裂问题，所以他们投票反对干涉西藏问题的决议。

曾经在 1959 年与 1960 年发表过两个有关西藏问题的报告的联合国咨询机构国际法学家委员会自然不甘落后，在 1997 年发表了第三个报告：《西藏：人权与法治》，重谈中国侵略西藏、侵犯人权的老调，要求中国让全体藏族在联合国监督下举行公民投票决定“大西藏”的前途，美国参议院次年通过决议支持这个报告（16）。

上面只是介绍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议会与国家要人、联合国及其下属组织在西藏问题上的活动，至于各国议员与名流、各种非政府组织为了支持达赖喇嘛和西藏独立、谴责中国侵犯西藏人权而召开的各色各样的讨论会、声援会、报告会、抗议会，发表的各色各样的声明、宣言、决议、呼吁，举行的各色各样的活动---诸如游行示威、“国际西藏年”、展览会、抵制中国商品等，出版的各色各样的书籍、报刊、录像、电影等，更是普天盖地、难以计数。这一切构成了对中国政府的巨大压力，实际上是冷战的继续。

苏联崩溃后，人们都说冷战结束了。可惜苏联的崩溃不仅没有使西藏问题上的冷战结束，反而使之变得更加集中、更加激烈了。那是一场新的冷战，其目的不仅为了搞垮中共，而且为了分裂中国，防止其成为黄种人的超级大国，威胁西方白人世界的安宁。西方民众之所以狂热支持达赖喇嘛与藏独运动，一方面固然由于西方一边倒的舆论误导（洗脑）以及中共在“六四”时的愚蠢行为（它从反面证实了西方的舆论误导），善意而盲目地同情弱者（藏人）；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西藏问题触动了他们从来不会明说、却最为敏感的种族神经---“白人世界霸权不容挑战”---他们也巴不得中国像苏联那样崩溃。隐藏在“为弱势民族主持公道、申张正义”这样冠冕堂皇的借口背后的，就是这种说不出口的、根深蒂固的、强势种族的霸权心态---任何“有色人种”在美国或欧洲生活上一段时间，都能感觉到白人的这种集体无意识（这里所说的白人系指欧美澳洲的白人，特指西方发达国家的白人。虽然人类学家把阿拉伯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伊朗人等都算作白人，但西方白人并不承认他们为“真正的”白人）。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把这种集体无意识提升到了理论的高度。他的名噪一时的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构》(17)说：冷战结束后（指苏联崩溃），文明（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等）的冲突取代了原来的意识形态（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冲突，成为今日世界上各种冲突的根源。穆斯林的人口爆炸与东亚的经济起飞向西方在世界上的支配地位（dominance）与一向被认为“普遍的”西方价值观念提出了挑战。穆斯林的人口爆炸已经导致了欧亚结合部的许多小型战争（以色列与阿拉伯、波斯尼亚、车臣、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塔吉克、库尔德、伊拉克、阿富汗、克什米尔、索马里、苏丹等），中国的崛起可能导向一场全球性的文明之间的战争（the rise of China could lead to a global war of civilizations）。这里所谓全球性的文明之间的战争当然是指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之间的战争。也就是说，他不仅把中共视为西方的敌人，而且把中华文明即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负荷者）视为西方文明即西方世界（西方文明的负荷者）的敌人。那么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为了保卫西方的“支配地位”（霸权的婉转说法）与价值观念，必须发动一场反对中国的圣战。所以 1995 年 7 月美英两国的两个影响极大的杂志《时代》与《经济学家》不约而同地发表了号召遏制中国的文章《为什么我们必须遏制中国》与《遏制中国》(18)。当然，最好的办法是让中国像苏联那样崩溃。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说：“不幸的是，有那么多共和党人已经用中国取代了业已崩溃的苏联，试图采用促使苏联帝国崩溃的各种办法---外交对抗、经济排斥和意识形态战争---去对付中国。有那么多民主党人似乎想把美国政策的原则目标确定为让中国仿效我们的宪法与价值，为此不惜牺牲我们在亚洲的许多其它利益，也不考虑中国历史的复杂性。(19)”一般认为，在美国共和党代表富人，民主党代表平民。富人最恨共产党，平民最关心人权。无论是富人还是平民，大多数都是白人，都不希望世界上出现一个黄种超级大国与美国平起平坐。于是西藏问题就成为各色各样的美国白人出于不同的政治信念与共同的种族意识反对中共与中国的聚焦点与突破口。西方其他国家的情况也类似。

有趣的是，在美国支持藏独的示威、集会与其它活动中，几乎从来看不到黑人的身影。按理说

，美国黑人在历史上曾长期遭受种族歧视与压迫，对种族歧视与压迫最敏感也最反感，在西方媒体大肆宣传“中国歧视与压迫藏族”的情况下，他们应该比白人更加同情与支持藏独才对，为什么他们反而对藏独漠不关心呢？因为黑人并没有“白人世界霸权不容挑战”的集体无意识，所以也并不热衷于利用藏独分裂中国。

还有美国最坚定的盟国日本也很少在西藏问题上做文章，其领导人从不接见达赖喇嘛，也不发表“关切西藏人权”的言论，其国会也从不通过干涉西藏问题的决议，民间也没有什么支持西藏独立或“关心西藏人权”的组织或运动。是日本人喜欢中国统一而强大吗？当然不是，他们在台湾问题上就坚决反对中国统一。然而日本人并无“白人世界霸权不容挑战”的念头（他们自己也曾向白人世界霸权挑过战），所以也就不想利用藏独分裂中国大陆。

站在美国的立场上，美国白人那样想那样做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否明智呢？连基辛格这样老练的政治家都表示怀疑。他在上文中继续说：“没有任何认真的历史系学生能够怀疑：中国变成世界超强将会构成对美国外交政策的严重挑战。”“万一中国直接威胁美国的安全或寻求亚洲霸权，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加以抵制。”“我们的利益在于使中国在保证区域性和全球性的稳定与进步方面成为国际社会中有责任的成员。”“中国现在并不支持危害美国利益的政治运动，除了台湾，中国也并不向现存的世界秩序提出挑战。而正如我们将要讨论的那样，台湾并不被北京认为是外交事务。”“防止任何一个潜在的超强的出现对于美国的外交政策都是前所未有的课题。这样的新帝国主义路线迟早会使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反对我们。”他的结论是美国必须寻求与中国建立合作关系（A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should be given a chance）。

注释：

（11）"Special Coordinator for Tibet", Tibet Press Watch X:I (February 1998).

（12）U.S. Congressional Record, 102nd Congress 1st Session, 1991, p. S-6764.

（13）U.S. Public Law 102-138, H.R. 1415, Foreign Relations Authorization Act, Fiscal Years 1992 and 1993, Washington, DC, October 28, 1991.

（14）Grunfeld, A Tom, 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New York: M. E. Sharpe, 1996), p.238.

（15）Washington Post 29 July 1992, A18.

（16）Tibet: Human Rights and the Rule of Law (Geneva: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1997); United States Congress, S. Con. Res.103, Washington, DC, September 17, 1998.

（17）Huntington, Samuel P.,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6).

（18）Krauthammer, Charles, "Why We Must Contain China", Time 31 July 1995; "Containing China", The Economist 29 July 1995（原文无署名）。

（19）Kissinger, Henry A., "No Room for Nostalgia", Newsweek 29 June 1998.

### 3、从双重标准到怪圈 22

如前所述，邓、胡、赵自 1980 年以来在西藏实行怀柔--绥靖政策的目的是，不仅是为了安抚藏人、稳定西藏，更重要的是想从西方特别是美国那里赢得“尊重西藏人权”的好评，缓和西方特别是美国在西藏问题上对中国政府的谴责与压力，在经济上从西方特别是美国得到更多的好处，其结果也像用巨款安抚藏人那样适得其反。

《天葬》指出：“在观众围聚的国际拳台上，中共虽是势力强大的一方，却因为规则是西方的，并且由西方进行裁判，频频得分的倒是对西方规则游刃有余的达赖喇嘛。中共在拳台上步履蹒跚，破绽百出，不断被动挨打，丢尽脸面。(20)”中国政府在国际政治拳台上之所以只输不赢，并非达赖喇嘛的拳术多么高明或多么精通比赛规则，而是西方裁判极不公正，毫无遮掩地袒护达赖喇嘛，从而使中国政府永远不可能赢。

记得新加坡元老李光耀说过：当东方学会了西方的游戏规则之后，西方就修改游戏规则。在西藏问题上，西方岂止修改游戏规则，他们采取绝对有利于达赖喇嘛的双重标准，或者干脆就无视他们自己制定的游戏规则，随心所欲地给中国政府横加罪名。

如前所述，西方可以不顾达赖喇嘛自己都承认的藏人首先使用暴力的事实，把打砸抢烧的藏独骚乱叫做“和平示威”；也不顾他们在自己国内也镇压暴乱的事实，谴责中国政府镇压藏独暴乱是“侵犯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与自由”，这不是对 1948 年联合国《普遍人权宣言》第 20 条“每个人都有和平集会的自由”的公然篡改与双重标准吗？至于说他们毫无保留地、不厌其烦地重复达赖喇嘛的谎言，诸如西藏自古以来是独立国家，中国侵略西藏、消灭了 100 多万藏人、大量移民西藏、正在毁灭西藏文化宗教等更是违背了起码的公正原则与客观态度，令人想起“谎言重复一千遍就变成真理”这句话。

在民族自决问题上也是如此。联合国 1960 年《给予殖民地国家与人民独立的宣言》(21) 第二条规定：“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根据这一权利，他们可以自由地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自由地发展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第六条与第七条却规定：“任何旨在部分或全面分裂一个国家的团结与破坏其领土完整的企图都是与《联合国宪章》的目的和原则相违背的”；“一切国家应在平等、不干涉一切国家的内政和尊重所有国家人民的主权及其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忠实地、严格地遵守《联合国宪章》、《普遍人权宣言》和本宣言的规定”。这文件本身就有矛盾，西方于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时而引用第二条，时而引用第六、七条，从而构成双重标准。比如说，当他们支持西藏、苏联各加盟国与南斯拉夫各国独立的时候，就援引“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当他们禁止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独立的时候，就援引“主权国家不得分裂”。甚至派飞机去轰炸、派军队去弹压塞尔维亚人。

西方也从不支持英国的北爱尔兰、苏格兰与威尔士独立、不支持法国的科西嘉、巴斯克、布列塔尼与大西提独立、不支持加拿大的魁北克独立（美国总统曾公开反对）、不支持西班牙的巴斯克与加泰罗尼亚独立、不支持意大利北部独立、不支持土耳其与伊拉克的库尔德人独立、不支持印度的克什米尔与锡克独立、不支持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独立、不支持俄国的车臣独立、不支持乌克兰的克里米亚独立、不支持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独立、不支持阿塞拜疆的纳---卡地区独立、不支持摩尔多瓦的“德涅斯特沿岸共和国”独立、甚至也不支持南斯拉夫的科索沃独立，也不承认已自行独立 25 年之久的“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他们单单支持西藏、苏联各加盟国与南斯拉夫各国独立。这不是地地道道的双重标准吗？

不难看出，西方的双重标准是为冷战服务的。凡是他们的冷战对象国内闹独立，他们就一概支持；否则就反对。当克罗地亚与波斯尼亚宣布独立时，德国抢先承认，还向他们提供武器，其目的是肢解南斯拉夫。结果自食其果，德国被迫接受了 20 万波斯尼亚难民。波斯尼亚战争结束后，德国要遣返他们，他们却赖在德国不走。当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援引西方支持波斯尼亚独立的同一理由——民族自决权——要求独立时，西方却坚决反对，不惜大动干戈。因为塞尔维亚人是俄国的传统盟友，禁止他们独立与北大西洋公约集团东扩一样，是为了遏制俄国的势力。虽然俄国已经“民主化”并得到了西方的赞扬，但西方仍然把俄国看作军事上的头号敌人。由此可见，即便中国也“民主化”了，西方也不会拿它当“自己人”看。

西方支持西藏独立的借口是人权问题，然而西班牙至今仍把 500 多名巴斯克独立分子关在监狱里，占该国该族人口的万分之五（22）。西班牙政府还派出暗杀小分队追杀巴斯克独立分子（23）。土耳其正在血腥镇压库尔德独立分子——库尔德工人党游击队，甚至越过边境到伊拉克境内追杀库尔德游击队。据土耳其军方宣布，自 1984 年到 1998 年，土耳其消灭了 39900 名库尔德独立分子（24）。西方各国领导人与议会对此或者装聋作哑，或者轻描淡写，从未施加过像他们在西藏问题上施加过与正在施加的那么大压力。更未像他们对付南斯拉夫的科索沃问题那样以武力威胁，强迫其撤军。因为西、土两国都是北大西洋公约集团的盟国。印度曾经血腥镇压锡克族的独立运动（英迪拉甘地总理就是因此被其锡克卫兵刺杀的）、正在血腥镇压克什米尔穆斯林的独立运动。斯里兰卡正在血腥镇压泰米尔人的独立运动，并受到印度的支持（拉吉夫甘地总理就是因此被一名泰米尔妇女刺杀的，他们母子两代总理都死于民族矛盾）。然而西方对此也装聋作哑、轻描淡写，因为印、斯两国都是“民主国家”。西方在人权问题上也持双重标准。

有鉴于波斯尼亚战争的教训，1993 年世界人权大会通过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规定：“实现自决权不得被解释为授权或鼓励采取任何行动去全面或局部地肢解或侵犯主权和独立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统一。（25）”西方人权卫士也终于认识到滥用自决权的危害了。1996 年 6 月 21 日，我在德国波恩“汉藏对话会”上作完报告后，有个德国学者站起来说：“西藏独立的法律根据并不充分，要说西藏与中国在历史上毫无关系，那是胡说八道。《联合国宪章》与《普遍人权宣言》都是从理想主义出发的，我们不是幼稚的理想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忘记波斯尼亚战争的教训。所以我赞同徐先生的意见，西藏只能自治，不能独立。”

世界上共有两三千个民族，其中人口超过百万的有三百多个（26），却只有一百多个国家。除了少数几个岛国外，世界上 170 多个国家里，只有不足一打的国家是语言与民族单一的。而即使是它们，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全包容一个种族（27）。如果每一个民族都要求自决、独立建国，那还得了？国界如何划？领土如何分？只有靠武力解决，那么绝大多数国家都将陷入种族战争，那将是人类的浩劫、世界的末日。正如英国政治学家 Eric Hobsbawm 指出的：由马志尼在十九世纪创立的民族主义信念——每个民族应该形成一个国家，每个国家只有一个民族——是永远行不通的。比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自决的模式，来解决现在的危机，并不是万灵妙药（28）。为了人类生存与世界和平，西方人权卫士只好将民族自决或人民自决束之高阁。然而正因如此，他们对“西藏人权”的特殊关心就显得格外可疑。

且不说美国国会九十年代的一系列决议案与外交授权法把西藏叫做“被占领的国家”，也且不说国际法学家委员会 1997 年的报告还要求中国让全体藏族在联合国的监督下就“大西藏”的前途进行“自决”，单说西方对中国政府镇压藏独暴乱的谴责，实际上就是要逼迫中国允许西藏独立。试想，如果中国政府听任藏独分子在拉萨打砸抢烧政府机关、商店学校与警察平民，其

后果当然是听任藏独分子占领拉萨，宣布西藏独立。某些西方人权卫士碍于国际公法，口头上不得不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一再表白他们只是关心西藏人权，而不是支持西藏独立。但他们所谓的“西藏人权”，其实就是打砸抢烧、分裂中国与西藏独立的代名词，只不过转了一个弯而已。

西方在其它许多问题上对“中国侵犯西藏人权”的指责也似是而非，常常令人想起美国成语 Catch 22。Catch22 本是美国作家海勒（Joseph Heller）1961 年发表的小说的标题，中文翻译成《第二十二条军规》。这条军规是这样的：如果一个飞行员不停地飞行而不要求休息，说明他精神不正常；但是如果他真的要求休息，又说明他的精神很正常，必须继续不断地飞行。Catch 22 从此变成了美国成语。据《美国遗产成语词典》的定义，Catch 22 就是“永远不可能赢的怪圈或悖论”（A no-win dilemma or paradox）。比如：没有工作经历就找不到工作，然而找不到工作就永远不会有工作经历（29）。把 Catch 22 翻译成“第二十二条军规”未免冗长拗口，我想称之为“怪圈 22”更简洁传神。

比如说：《1988-1989 财政年度美国外交授权法》（30）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犯西藏人权”的小标题下说，“发现——国会发现：”“九、西藏的经济、教育、卫生和人类服务远远落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平均水平；十、中华人民共和国鼓励大批汉人去西藏，损害了藏族人民的政治与文化传统”。

这两条单独看都很有道理，放在一起就荒谬绝伦。正因为西藏的经济、教育、卫生和人类服务远远落后于中国的平均水平，所以中国政府才派出大批工程技术人员、经济管理人员、医疗卫生人员、教师、科研人员、文化工作者及其辅助人员到西藏去大兴土木，建造医院、学校、发电厂、输电网、电视台、电视转播网、电话局、电台、公寓楼、自来水厂、上下水道、公路、飞机场、输油管、加油站、商场、饭店、电影院、舞厅、图书馆以及各种各样的金融机构、通讯机构、运输机构、科研机构、维修机构、管理机构……提高西藏的经济、教育、卫生和人类服务水平，让藏人享受现代物质文明。然而这样尊重西藏人权的大好事却被叫做“鼓励大批汉人去西藏，损害了藏族人民的政治与文化传统”。那么如果中国政府不派大批汉人去西藏大兴土木，建造医院、学校、发电厂……呢？又会被指责为“西藏的经济、教育、卫生和人类服务远远落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平均水平”。

中国政府要逃脱美国的议员先生们的谴责，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给每个藏人发一盏阿拉丁的神灯。藏人只消对着这个灯说一声“我要电灯、电视、电影、电话、自来水、煤气灶、公寓楼、医院、学校、自行车、摩托车、汽车、飞机、商场、舞厅……”那些东西就会自动出现，毋需中国政府派出大批工程技术人员、经济管理人员、医疗卫生人员、教师、科研人员、文化工作者及其辅助人员去西藏。可惜自从《天方夜谭》的时代消逝以后，伊拉克就不再生产阿拉丁的神灯了。中国政府无从进口阿拉丁的神灯，自己又不会制造，只好顶着“损害藏族人民的政治与文化传统”的罪名派人去西藏大兴土木。这就叫做怪圈 22，教中国政府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永远无法逃脱“侵犯西藏人权”的罪名。

顺便说说，美国国会关于“中国向西藏大量移民”的指责也像它关于“中国消灭了 100 多万藏人”的指责一样，是从达赖喇嘛那里听来的。达赖喇嘛在 1987 年 9 月 21 日演讲“五点计划”时，就大肆指责“中国的移民政策”，后文将详论。

如果中国政府真的给每个藏人发一盏阿拉丁的神灯，使藏人的经济、教育、文化和人类服务水平在没有一个汉人进藏的情况下大大提高了，美国的人权卫士是否就会说好呢？也不会。美



国国务院 1996 年的人权报告中国部分说：“最近几年来，政府的开发政策改善了少数民族的生活条件。据政府的统计，从 1991 年到 1995 年，少数民族地区的年经济增长率为 11%。但是，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的收入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开发计划破坏了少数民族传统的生活方式，如西藏人和新疆西部维吾尔族人的生活方式。（31）”这“但是”后面的第一句话谴责中国政府未能把少数民族的收入提高到中国平均水平，第二句话又谴责中国政府旨在提高少数民族收入的开发计划破坏了少数民族的传统生活方式，又是一个怪圈 22。

美国国务院 1997 年的西藏人权报告（32）也说：“总的来说，政府的发展政策提高了许多藏人的生活水平”——按照上述《1988-1989 财政年度美国外交授权法》的意思，这应该是尊重西藏人权的大好事囉？不料该报告话锋一转，“中国政府补贴的经济发展政策使西藏社会部分现代化，改变了西藏的传统生活方式。”“经济的高速增长、旅游业的发展和现代文化的影响破坏了传统的生活方式与风俗，导致环境问题，威胁西藏的传统文化。”还是一个怪圈 22。

按照世界公认的定义，提高生活水平就是现代化，那当然要改变传统生活方式，使部分社会现代化。比如藏人以前点酥油灯，现在点电灯；以前烧牛粪，现在烧煤气灶；以前要下河背水，现在家里就有自来水；以前每年只在沐浴节（九月间，为期一周）去拉萨河洗一次澡，现在天天可在家中浴室洗澡；以前没有电视、电话、电脑、电影、收录机、音响、自行车、摩托车、汽车、飞机、西式医院、现代学校、百货公司、舞厅、卡拉 OK、游泳池、体育馆、图书馆、电教馆、西服、牛仔裤、可口可乐、啤酒、耐克鞋……现在有了。这本是全世界经济落后民族，包括美国的印第安人、爱斯基摩人、阿留申人、夏威夷土着波里尼西亚人都无限向往，美国政府正在努力向他们提供的东西呀。如果中国政府不向藏人提供这些东西，西方人权卫士一定会指责说：藏人的生活如此落后、贫穷，他们没有电灯、电话、电视、电影、电脑、汽车、飞机、西式医院、现代学校、百货公司、图书馆……这是种族歧视。现在中国政府用汉人的血汗提供了这些东西，他们又说是改变西藏传统生活方式，威胁西藏传统文化。那教中国政府怎么办？

从美国电影《在西藏七年》（Seven Years in Tibet）里可以看到，少年时期的达赖喇嘛就在玩汽车、电影放映机、收音机、留声机、望远镜、画报等物。这个电影是根据达赖喇嘛的英文老师、奥地利人哈勒（Heinrich Harrer）的同名回忆录拍摄的，所以这些细节都是真的。那些洋玩意儿都来自英国，是西藏传统生活中没有的。而且当时全西藏只有达赖喇嘛一人有电灯、汽车与电影放映机。由此可见，正是达赖喇嘛在中共进藏之前就带头使西藏社会部分现代化、带头改变西藏传统生活方式、带头毁灭西藏传统文化。

按照美国国务院的西藏人权报告的逻辑，中国政府只有让藏人滞留在中世纪生活方式中才算尊重西藏人权。他们大概不知道，今日藏人是如何如飢似渴地、如痴如狂地追求现代物质文明与现代商业娱乐。谁要想剥夺他们享受现代物质文明与现代商业娱乐的权利，他们大概就会同谁拼命。美籍华人作家陈若曦去西藏时问过许多藏人“西藏最需要什么？”不约而同的回答都是“现代化”（33）。连董尼德都发现：“老一辈的还在手转经筒，口诵咒语，年轻的一代却梦想没有神祇，没有菩萨，只有金钱、时装、物质享受的天堂。（34）”1986 年联合国《发展权宣言》说：“确认发展权也是不可剥夺的人权”。世界公认，发展就是现代化，“发展中国家”就是想现代化而尚未现代化、正在向现代化发展的国家。美国的人权卫士要剥夺藏人的发展权，是不是另一种形式的侵犯西藏人权呢？美国让印第安人、爱斯基摩人、阿留申人与夏威夷土着波里尼西亚人享受现代物质文明，是不是也在改变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威胁他们的文化、侵犯他们的人权？

美国国务院 1996 年中国人权报告还说：“在少数民族人口众多的许多地区，学校分别用普通话（汉语---引者）和当地少数民族的语言教学，学生可选择到使用其中任何一种语言的学校上课。这种做法的意图是保护和保存少数民族文化，但它的一个副作用是强化了一种隔离式的教育制度。”---又是一个怪圈 22。

美国国务院 1997 年西藏人权报告也指责说：“乡村小学用藏语教课”，“大部分地方的中学生继续用藏语文接受某些课程，但汉文知识对于进大学是必不可少的”。“虽然在大学招生中给予藏族优惠，但汉族学生也因汉文优秀而得以录取”。

美国国务院的先生们可能不知道，藏文没有科技词汇与现代社会科学词汇。中国政府虽然下大力发明创造藏文数理化词汇，但由于藏文翻译队伍的素质关系，所创造的藏文数理化词汇还不够成熟。而大学理工医农与现代社会科学（经济学、法学等）的词汇在藏文里更是尽付阙如。这是连达赖喇嘛都无法解决的难题，他开办的流亡藏人学校也不得不用英语教授数理化。如果中国政府在西藏的中小学里只教藏文不教汉文，藏人将永远无法进大学与中专学习，那么西方人权卫士与达赖喇嘛一定会说这是种族歧视；如果中国政府在西藏的中小学里既教藏文也教汉文，那么他们又说这是“毁灭西藏独特的语言遗产”（美国国务院 1997 年西藏人权报告语）---还是一个怪圈 22。

美国的人权卫士可以不知道西藏语言的独特就独特在没有科技词汇与现代社会科学词汇，但他们应该知道印第安语与波里尼西亚语也没有科技词汇与现代社会科学词汇，所以在美国的印第安保留地与夏威夷的中小学里也不得不用英语教授数理化生与社会科学。美国的印第安人与波里尼西亚人要上大学，英语更是必不可少的、头等重要的语言，那么这是否也是在毁灭他们独特的语言、侵犯他们的人权呢？

尤其可笑的是董尼德把西化指鹿为马地叫做“汉化”。他在《西藏生与死》里化了一节十多页的篇幅来谴责“汉化的武器”（该节小标题）（35）。除了前述语言问题外，他还说：“西藏汉化的另一种措施，就是开放旅游”。“这种利用外国第三者进行颠覆活动的策略，从某些角度来看，已经成功地动摇了拉萨及其他列入开放旅游城市的习俗与生活方式。”这真是天下奇文。去西藏旅游的外国游客带去的当然是西方的思想、习俗、语言与生活方式，怎么会成为汉化的武器呢？莫非西方游客在去西藏前，先使自己完全汉化，然后再使西藏汉化？

他也把西藏流行西服、西方流行音乐、迪斯科与摇滚舞叫做汉化，甚至说：“电视又将要谋杀西藏文化”。他还有起码的常识吗？

董尼德也承认中国政府花费巨款造房子，使大批藏人“离开破旧危险的房子，搬进有自来水、有卫生设备的新房子”。然而这只是“汉化”的阴谋。“到处可以看到高大的中国楼房取代了传统房子”，“白柱蓝窗的低矮藏式建筑消失了”。“这些新的建筑物有些外貌看起来有点像藏式建筑，它们可全部都是用水泥盖的中国式楼房”。他忘记了钢筋水泥与钢筋水泥楼都是西方的发明，中国传统建筑是砖木结构的四合院，没有楼。他把藏式建筑的特征概括成“白柱蓝窗”是错误的。随便找本西藏画册看看就可发现，藏式建筑的柱子一般是红色的，也有黄色的，没有白色的；窗框一律是黑色的。当他赞美“十七世纪时期建筑的达赖喇嘛的故宫，布达拉宫纤细优美的金顶”时，也忘记了：布达拉宫的金顶乃是仿倣汉式大屋顶的（请比较北京故宫的金顶）。大昭寺、扎什伦布寺、色拉寺与罗布林卡都有这样的仿汉式金顶，建于十四世纪的夏鲁寺甚至有地地道道的汉式琉璃瓦歇山顶、斗拱、飞檐翘角与四合院布局。不过这些都是藏人在中共诞生前很久就自觉自愿“汉化”的证据，与董尼德说的“共产党阴谋”毫不相干。董尼德的文化学与

建筑学知识几乎等于零，却硬要挖空心思地指责中共“汉化”西藏文化与建筑，结果只能当众出丑。

无独有偶，1993年9月27日我在华盛顿参加美国和平研究所召开的西藏问题讨论会时，有个美国教授在会上得意洋洋地朗读了他的新书的开头的文字。那段文字说：他一到拉萨，满眼只见穿汉式服装的汉人和汉式房屋，几乎看不到藏人与藏式房屋，这是中国的人口侵略与文化侵略！他说完后，我拿出美国报纸发表的西方游客拍摄的1993年5月24日拉萨藏人示威的照片说：这位先生所谓的汉式服装，其实是西式服装，现在连汉人都很少穿中山装了。这些藏独示威者都穿着西式上衣（jacket），就像我一样（我指了指自己的西服），如果他们没有举着写有藏文的标语，谁能分辨出他们是藏人还是汉人？这位先生把穿西服的藏人当成了汉人，所以得出汉族人口侵略的结论。至于中国政府在拉萨修建的医院、学校、公寓楼、商厦、影剧院、办公楼等，大都是钢筋水泥的西式建筑，没有一幢是汉族传统的四合院。如果说这是文化侵略，那是西方的文化侵略，不是汉族的文化侵略。今天，不仅藏族市民大都穿西服、住西式楼，中国内地的汉族市民也大都穿西服、住西式楼，连亚洲各国的市民也大都穿西服、住西式楼，可见西方的文化侵略已经深入到亚洲各国各地。那位美国教授哑口无言。

董尼德在西方人中颇具代表性。许多西方游客去西藏，就是为了看看中世纪生活方式。他们在西藏一看见现代物质文明，就大骂中共侵犯西藏人权、毁灭西藏文化。他们自己在西藏旅游时是要用电灯、看电视、打电话、坐汽车、住有自来水与卫生间的洋楼的，却希望藏人永远不要享用这些东西，像中世纪留下的活化石一样供他们观赏。

前引陈若曦的文章也说：“保存佛教文化的迫切性实超过现代化”，“真正要保护的是佛教文化的精华，以及藏族的生活方式”，“若现代化伤残了难能可贵的藏族文化，对中华民族、对全世界，都将是无可弥补的损失”。她尤其欣赏藏北牧民的生活：“一顶帐篷伴着嬉耍的小狗和幼童，主妇一旁捣桶打酥油，远方一群牛羊，山坡上坐着喝青稞酒的男子。任谁也会承认，这是世界上最和平自足的生活。只须存一点盐和茶，他们可以一整年不与外人接触。牛粪烧火，酥油点灯，肉奶不断，骨针缝皮袍，大地任徜徉，来生有希望，今生夫何求？这种生活方式不会烧山毁林，一切取自自然，又回归自然，与天地和谐如一，原始也健康。若把电灯、塑料和可口可乐强加给这些自然的儿女，对造物毋宁是种褻渎。何况尊重各民族的生活方式，已普遍公认为一项基本人权。”这是典型的观光客感想。

陈若曦是否知道，由于藏人几千年来一直以牛粪为燃料，又因人口爆炸而过度放牧，西藏草场的有机质越来越少，产草量越来越低，大片草场退化、沙化，已严重威胁到西藏的畜牧业与“自然的儿女”的生存？她去西藏时正当夏季，所以看到如此美妙的图画。她是否知道，本世纪二十年代末，藏北发生大雪灾，噶厦政府不闻不问，无数牲畜与牧民冻死饿死；1985年、1990年与1997年藏北又遭大雪灾，全靠中国政府出动军队与飞机救援，无偿给予大量物质，才使这些“自然的儿女”免遭自然的毒手？中国政府并不曾强加电灯、塑料与可口可乐给藏农牧，只强加公费医疗给藏农牧，又不敢要求藏农牧计划生育，致使藏族人口爆炸，草场更加超载，燃料更加缺乏。我在十几年前就在拉萨街头看到藏农牧大量出售草根（供市民作燃料），这无异于毁灭他们的自然母亲。这样的生活方式原始则原始矣，和平则和平矣；健康则未必，自足也未必---需要中国政府用汉人的血汗去给予医疗与救济。董尼德强调：“昔日的西藏已经不存在了，如果她想要生存，她就必须能要能适应现代的世界。（36）”然而他却愤怒谴责中国政府用巨款使西藏现代化，他还有起码的逻辑概念吗？

还有一点必须指出，中共从来没有强迫藏人穿西服与牛仔裤、跳迪斯科与摇滚舞、看好莱坞

电影、听西方流行音乐.....那都是藏人自己的选择。如果中共禁止藏人选择那些洋玩意，就像中共在 1983 年秋“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时在汉地所做的那样，董尼德一定会谴责说：中共不准藏人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那是侵犯西藏人权。又是一个怪圈 22。

注释：

(20)《天葬》，449 页。

(21) 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 on the Granting of Independence to Colonial Countries and Peoples,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1514(XV), New York, December, 1960.

(22)《挽救人质，西班牙大示威》，《世界日报》，1997 年 7 月 13 日。

(23) "Short Takes", The News Tribune 21 July 1995, South King County Edition, Tacoma, WA, USA.

(24)《土国宣称 14 年消灭 4 万叛军》，《世界日报》，1998 年 4 月 26 日。

(25) 转引自：王贵，《西藏历史地位辩》，民族出版社，北京，1995 年，712 页。

(26)《世界民族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北京，1993 年，31-32 页。

(27) (28) Eric Hobsbawn，《新民族主义的危险》，美洲《时报周刊》(China Times Weekly)，总 350 期，1991 年 11 月 9-15 日。

(29) Ammer, Charistine, 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Idiom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97).

(30) United States Public Law 100-204, Foreign Relations Authorization Act, Fiscal Years 1988 and 1989, Washington, DC, December 22, 1987.

(31)《北京之春》，1997 年 5 月号，54 页。

(32) "Full Text of U.S. State Department's 1997 Report on Tibet", Tibet Press Watch X:I (February 1998).

(33) 陈若曦，《西藏最需要什么？》，《明报周刊》，1085 期。

(34) (35) (36) 董尼德 (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与死》(Tibet mort ou vif)，苏瑛宪译，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台北，1994 年，26-27 页、223-233 页、27 页。

## 4、从宗教迫害到政教分离

自从中共 1996 年起派工作组进寺庙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运动”以来，美国对“中国在西藏进行宗教迫害”的谴责声浪陡然升高。1997 年 8 月 9 日至 13 日，美国众议员沃尔夫 (Frank R. Wolf)

以普通旅游者的身份（不让中国政府知道他是美国议员，从而摆脱了中国政府的监视）、带着一名藏语翻译与一名助手访问了西藏。他在那里采访了许多藏人，听到了许多故事，回来后又是举行记者招待会，又是在国会作报告，又是向国会提案，着实热闹了一番。他向国会递交的报告（37）说，中国政府在西藏正在实行“文化绝灭”与“宗教迫害”，西藏成了恐怖世界；西藏现在最兴旺的工业是监狱，许多藏人因为同西方人说话、保留达赖喇嘛的相片而被捕；每个寺庙里都有一小群中国监视者，他们严密控制寺庙的活动；许多僧尼因为拒绝谴责达赖喇嘛而被捕或赶出寺庙，15岁以下的僧尼全部被迫回家，僧尼们不能唸经，被迫接受“再教育”；西藏已经被汉人淹没，拉萨的藏汉人口之比是10万对16万，拉萨所有的商店都是汉人开的，招牌上的汉字大于藏字；他重复了达赖喇嘛关于中国消灭了100多万藏人等谎言，甚至中国政府拆毁拉萨老城的破旧危房为藏人建新居、修建布达拉宫广场也成了“毁灭西藏文化”的罪证。拆房问题不值一驳，难道只有让藏人继续住在破旧危房里才算保存西藏文化？他说修布达拉宫广场是毁灭西藏文化的理由是布达拉宫广场像天安门广场，其实一点不像。顺便说说，天安门广场倒是仿效美国华盛顿的国家广场（National Mall）的，它们中间都是纪念碑，四周都是国会、博物馆与伟人纪念堂。布达拉宫广场中间没有纪念碑，四周除了布达拉宫外也没有高大建筑，无非是一块衬托布达拉宫的雄伟（建筑学认为高大的建筑只有配以大广场才能显得更加雄伟，所以美国人要把国会山造在国家广场边上）兼供藏人散步、观赏鸽子（这鸽子是上海人民捐赠的）、放风筝的平地而已。沃尔夫先生为什么不指责中共仿效美国修建天安门广场是毁灭中国文化呢？

沃尔夫的报告还说，他遇到的每个藏人都要求美国拯救西藏，帮助达赖喇嘛实现西藏独立。他最后提出了一系列措施，要求美国国会、政府与宗教人士向中国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促使中国政府释放“良心犯”（藏独分子）、与达赖喇嘛谈判。

可能是行色匆匆的缘故，沃尔夫的报告充满了愤怒与激情，却没有多少细节，与其说像个调查报告，不如说像个印象记录，所以很难与之论理。相比之下，美国国务院同年（1997年）的西藏人权报告倒比它翔实、客观一些，它描绘的图画与沃尔夫的报告也不尽相同。该报告承认：“政府继续修复寺庙，其中许多寺庙毁于文化革命。政府为修复寺庙拨出了巨款，部分是为了发展旅游业。寺庙继续招收与训练年轻僧侣以继承西藏佛教传统。虽然法律禁止16岁以下的孩子出家，许多小孩事实上仍然进入了寺庙。”这与沃尔夫说的西藏僧尼不能唸经、16岁以下小孩全部被赶出寺庙相矛盾。顺便说说，中国政府禁止16岁以下的小孩出家，是为了保护儿童的人权。他们在思想没有成熟、无力决定自己的人生道路以前就被父母送进寺庙、终生不能结婚，实际上被剥夺了自主选择人生道路的自由。美国允许小孩出家当修道士吗？中国政府做得不够的，不是把16岁以下的小孩赶出寺庙，而是没有采取更有力的措施禁止小孩偷偷摸摸地进寺庙当僧尼。

美国国务院的上述报告继续说：“在西藏佛教寺庙与藏独势力关系密切”，“当局允许许多传统的宗教活动与群众性的宗教信仰，只有会引起政治异议的活动被禁止，并遭到迅速镇压”；“政府允许许多宗教活动，但不允许鼓吹西藏独立与分裂主义的活动”；“政府谴责达赖喇嘛的政治活动与流亡政府领导人。政府的媒体不断反对他（达赖喇嘛——引者），把他描绘成阴谋分裂中国的罪犯，以此损害他的宗教权威与威信。官员们坚持说与达赖喇嘛对话是不可能的，达赖喇嘛的行为与他反复公开声称的不追求西藏独立的说法不相符合”；“今年以来，政府把去年从三大寺开始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推广到西藏自治区各地的寺庙。这个在改变藏人的态度上很不成功的运动旨在控制寺庙与驱逐藏独与达赖的支持者。据达赖喇嘛说，僧侣们被要求‘爱国’，签字反对藏独、不承认达赖认定的班禅灵童、谴责达赖、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保证不听美国之音”。这些话也比沃尔夫的报告更具体、客观，但中国政府的上述行为是否

侵犯宗教自由呢？

让我们来看看西方的宗教政策。众所周知，反自由反人权的政教合一欧洲中世纪黑暗与残酷的根源，它导致了欧洲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如今所有西方民主国家都把政教分离当作立国原则。法国宪法第二条说：“法兰西是一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政教分离的、民主的与社会的共和国。”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说：“国会不得通过法律确立宗教或禁止宗教自由”。据美国法学家解释，它的精神就是宗教自由与政教分离（38）。可见宗教自由是以政教分离为前提的。政教合一意味着教权与政权合而为一，在这样的体制下，怎么可能有宗教自由呢？日本政教合一的天皇制曾导致日本偷袭珍珠港与侵略亚洲各国，在美军占领下，日本战后宪法规定政教分离，天皇不得干预政治，日本才走上民主化的道路。

美国前总统肯尼迪 1960 年 9 月 12 日在休斯顿演讲时说：“我认为在政教绝对分离的美国，天主教神父不可以告诉一个信仰天主教的总统怎样行事，新教牧师也不可以告诉他的信徒投谁的票。任何教堂或教会都不可以获得公共基金或政治特权。总统或人民不可以因为被任命者或被选举者与自己的宗教信仰不同而不任命或不选举他（她）为官员。我认为美国没有官方宗教，不管是天主教也好，新教也好，犹太教也好。任何美国官员都不得请示或接受罗马教皇、全美新教理事会或其他新教组织的政治性指示。任何美国宗教机构都不得直接或间接地将自己的意志施加于公众或政府官员。而人们的宗教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反对某一教会的行为应被视为对所有教会的反对。（39）”

西藏以前的制度则与此相反，达赖喇嘛作为西藏的教皇，拥有（在清朝时仅次于中国皇帝的）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那是彻头彻尾的专制独裁制度。正如藏独人士阿沛晋美承认的：“我认为西藏以前的制度是一个过时的、相对来说是落后的封建制度，它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国家，不是什么奴隶制度。当然不是说它一无是处，但基本上来说，这种政教合一的、封建的制度已经不合乎世界的潮流。它有许多弊病，比如于大海在《北京之春》的文章里提到的达赖喇嘛制度。于大海说也许今天的达赖是个好人，但是如果以后的达赖喇嘛是个坏皇帝怎么办，出现的概率很大。他说得是对的，这种制度应该改革。（40）”

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后是否学会了民主呢？没有。“西藏流亡议会”1963 年通过的“西藏国宪法草案”仍然规定达赖喇嘛是“国家元首”，有权任命“内阁”、否决“议会决议”、“颁布法律”等（41）。达瓦才仁也承认：“现在的西藏流亡政府还是政教合一的”（42）。1992 年达赖喇嘛公布了一个《西藏未来政体与宪法特征要旨》（43），按照“西藏流亡政府”机关刊物《西藏通讯》的诠释，“对未来西藏，达赖喇嘛指出：西藏将成为一个和平中心；以非暴力的和平思想为基础，致力于自由、社会福利、政教合一、民主、联盟以及环保等各项建设”（44）。把自由民主与政教合一相提并论，真是对自由民主的极大讽刺。1998 年 5 月，达赖喇嘛访问美国时，竟然多次遇到藏族喇嘛与美国白人喇嘛的示威，他们打“达赖喇嘛还我宗教自由”的标语，抗议达赖喇嘛在印度流亡藏人中迫害金刚派（喇嘛教的一个派别）教徒。美国著名时事杂志《时代》以《僧侣对僧侣》为题、《新闻周刊》以《给铁氟龙喇嘛搔痒》（45）为题都作了报道，前者还发了示威的照片，可以清楚地看到上述标语。这已经不是对异教徒的宗教迫害，而是在喇嘛教内部的教派迫害了。这对达赖喇嘛作为“民主领袖”与“人权斗士”的形象都是无情的嘲弄。1998 年 5 月印度核试验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同声谴责，惟有达赖喇嘛公开为印度辩护，说是印度有权发展核武器（46）。他还能算“和平主义者”吗？

然而西方舆论却继续大肆吹捧达赖喇嘛为民主英雄、人权斗士、和平主义者，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上述《僧侣对僧侣》在报导金刚派抗议达赖喇嘛的同时说：“那些率先开创了全球性运

动的众神都要向他低头。除了德莱莎妈妈（Mother Teresa）与曼德拉（Nelson Mandela），近年来很少有人能像达赖喇嘛那样获得对圣人般的欢呼。他被其信徒当作慈悲佛来崇敬。这位西藏政教领袖不仅因为替他的被中国占领的祖国奋斗而荣获 1989 年度诺贝尔和平奖，而且在信奉犬儒哲学的、沉溺于咖啡因的世界里一致获得了作为真理、和平与宁静的源泉的声誉。《给铁氟龙喇嘛搔痒》则说：“达赖喇嘛当然是世界上最慈祥的宗教人物。作为西藏政治与精神领袖，他通过呼吁人权与宗教自由，使他的国家的困境变成了国际热点。虽然对于其他国家与其它传统的佛教徒来说，达赖喇嘛不过是另一个国家与传统的僧人，但对大多数西方人来说，他的脸却是佛教的招牌。那是一张开放、乐观和热情的脸，它的微笑几乎每个月都出现在西方杂志上，错杂在巴黎时尚、各种名人与摇滚乐之中。别的西藏喇嘛沉溺于酒、女人与金钱。但是尽管达赖喇嘛经常与政治家、基金会、媒体及电影明星做交易，他陛下的声誉仍然像喜马拉雅山一样崇高。他是一个铁氟龙喇嘛。”（“铁氟龙”----Teflon----即聚四氟乙烯，是一种非常光滑的塑料物质，美国人用以称呼总是能从困境里滑脱出来的、八面玲珑、永远幸运的人----引者）

这种肉麻的语句在西方报刊中比比皆是，我常常为此感叹：当历史的错位与政治的阴谋与种族的偏见揉合在一起时，可以将西方人误导到何等荒谬的地步。达赖喇嘛所代表的本是比路易十六的法国还要黑暗、反动与残酷的社会制度，然而因为摧毁这一制度的是对中国人民犯下了许多暴行的中共，所以被中共摧毁的农奴制也就变成了美德与圣物，农奴制的代表也就变成了天使与圣人。传统的西藏文化本与被西方人自己革命革掉了的中世纪欧洲文化极为相似，然而因为革这一文化命的是发动过臭名昭着的“文化大革命”的中共，又因为中共使西藏现代化时西方人正“腻烦”与“餍足”了现代化，于是中世纪西藏就变成了天堂与乐土，传统西藏文化的象征就变成了救星与上帝。西方某些势力支持藏独本是为了分裂中国，然而当这一阴谋与西方的“白人世界霸权不容挑战”的集体无意识相共鸣时，达赖喇嘛就成了西方的头号英雄与明星。

达赖喇嘛不满足于在流亡藏人中搞政教合一、为未来的西藏设计政教合一，他还利用绝大多数藏人深受政教合一传统的影响、不懂政教分离的弱点，借助于自己作为宗教领袖与观音菩萨化身的号召力，把佛经中根本没有的西藏独立这样一个政治口号说成是佛的旨意，日夜不停地煽动藏人分裂主权国家，这是不折不扣地以宗教的名义干涉政治。他在国外煽动，西藏的僧尼就在国内响应。僧尼们打着雪山狮子旗、高喊“西藏独立”上街示威，或者在寺庙里借讲经为名宣传西藏独立，利用宗教对民众的影响力煽动分裂主权国家。这也不是宗教活动，而是政治活动。达瓦才仁狡辩说：“有人说僧侣不能干涉政治，可是僧侣也是人，也有参与政治的权利，这种权利不能剥夺。（47）”首先，根据国际公法与《联合国宪章》，任何人都无权分裂主权国家。联合国《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第 19 条在规定人人有思想、言论、出版等自由时，又规定这些权利的行使要受下列条件的限制：A、尊重他人的权利或名誉；B、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公共卫生、公共道德。林肯总统用武力镇压南方独立、美国现政府用武力镇压“德克萨斯共和国”就是光辉榜样（case law）；其次，达赖喇嘛与西藏僧尼都违背了肯尼迪说的“任何美国宗教机构都不得直接或间接地将自己的意志施加于公众或政府官员”的精神（藏独示威与宣传就是要将喇嘛教会的意志以佛与菩萨的名义施加于公众与政府官员），所以中国政府镇压藏独骚乱、取缔藏独示威、要求（逼迫）僧尼保证不参与分裂活动、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等不过是在学习、贯彻美国的民主制度。

达赖喇嘛作为政治领袖，是一个 40 年来不遗余力地分裂中国的叛国集团首领，这样的叛国首领放在法国与美国一定会受到法律追究，因为他违反了法国宪法规定的法国的“统一而不可分

割”性；美国宪法第三条规定：“背叛合众国与合众国作战，依附、帮助或安慰合众国的敌人者，犯叛国罪。”所以他放在美国也是叛国犯。中国政府禁止藏人悬挂、崇拜这样一个叛国首领的相片，也是合理合法的事。中国法庭没有缺席审判他，已经是非常宽大了。难道因为他是宗教领袖，就可以不受法律的约束，肆无忌惮地、随心所欲地从事叛国活动？美国的宗教领袖有这样的豁免权吗？

沃尔夫秘密访问西藏离中国主席江泽民首次访问美国只有两个月，他在美国国会与舆论界掀起的谴责中国在西藏的“宗教迫害”的狂飙使中国政府非常难堪。美国国会甚至有人提案，要禁止参与宗教迫害的中国官员进入美国（48），隐然把矛头指向了江泽民。为了给自己的宗教政策辩护，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1997年10月16日（江泽民访美前夕）发表了《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白皮书。可笑的是，它对于美国攻击最力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一字不提，这就给人以心虚理亏的感觉。尤其可笑的是，在这份谈论宗教政策的白皮书里，始终没有出现“政教分离”的字样（只提到了“宗教与教育分离”），真是荒谬绝伦。本来中共把那场运动叫做“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就很不策略。西方人权卫士与达赖喇嘛可以说，西藏自古以来是个独立国家，你们现在要强迫藏人爱中国而不爱西藏国，这不是殖民主义吗？---所以，“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就是“殖民主义教育运动”。如果中共将其称为“政教分离教育运动”，并理直气壮地宣称：这场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学习美英法国的民主制度，禁止西藏僧尼利用宗教干涉政治，西方人权卫士与达赖喇嘛就哑口无言。这份白皮书说明，中国国务院的理论家们对于西方政治制度与西方政治理论十分隔膜、极为无知，所以根本想不到用西方的制度与理论来反驳西方人权卫士。它发表的当天，有家对中国广播的电台就来采访我，要我对它发表评论。我讲了上述意思。四个月後，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西藏自治区人权事业的新进展》白皮书（1998年2月24日），文中终于出现了“政教分离”的字样。

注释：

（37）"Tibet: A First Look, Representative Frank Wolf's Report on His Visit to Tibet", Tibet Press Watch IX:IV (October, 1997).

（38）United States History, 1600-1987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7), p.40.

（39）Shafritz, Jay M., The Harper Collins Dictionary of American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1992, p.519.

（40）亚衣，《以佛的善念对待世界----访国际声援西藏中心政治分析员阿沛晋美先生》，《北京之春》，1995年5月号。

（41）（44）《西藏的民主道路》，《西藏通讯》，1995年冬季号。

（42）（47）亚衣，《让西藏流亡者早回家园----访<西藏通讯>主编达瓦才仁先生》，《北京之春》，1997年11月号。

（43）Dalai Lama, "Guidelines for Future Tibet's Polity and Basic Features of its Constitution", Tibetan Review (October, 1992).



(45) Biema, David Van, "Monks vs. Monks", Time 11 May 1998, p.70; Woodward, Kenneth L., "A Scratch in the Teflon Lama", Newsweek 11 May 1998, pp. 64-65.

(46)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s View on India's Nuclear Tests", World Tibet Network News 20 May 1998.

(48)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Moves Tibet Resolution", Tibet Press Watch X:I (February, 1998).

## 5、从“六四”到“一一一”

无数事实告诉我们，民族主义是一种非理性的情绪，极容易被煽动起来，特别是有超级大国在煽动的时候。如果美国也像煽动藏独一样不遗余力地煽动苏格兰、威尔士、科西嘉与布列塔尼独立，不出十年，苏格兰、威尔士、科西嘉与布列塔尼的独立运动就会像藏独运动一样闹得不可收拾（苏格兰已经有一个闹独立的政党，就叫苏格兰独立党；科西嘉也有个科西嘉解放阵线，不时搞点恐怖活动。顺便说说，苏格兰与威尔士的民族与英格兰族不一样；科西嘉与布列塔尼的民族也与法兰西族不一样）。至于北爱尔兰、魁北克、巴斯克等独立运动，毋需别人煽动就闹得如火如荼。美国夏威夷土着波里尼西亚人的后裔也在闹独立，还有自己的政党夏威夷自由党。它们所在的美、英、法、加拿大与西班牙等国可都是地地道道的民主国家。

1993年6月12日，美国众议院人权委员会以口头表决的形式通过决议“敦促克林顿总统向中国政府的最高层提出汉族人口迁进西藏的问题”。美国国务院一官员在参议院通过此修正案后说：“参议院这一行动可能给西藏人民带来的任何好处，都不足以盖过几乎肯定会给中美关系造成的损害。达赖的五点和平计划是一个隐蔽的独立计划，而在这个特别时候，国会支持西藏独立就是向更凶暴的分子发出错误的信号，只能导致更多的流血事件。（49）”

美国的议员先生们也许巴不得藏独分子在西藏挑起更多的流血事件，这样他们就可以通过更多的决议谴责中国政府侵犯西藏人权。教中国政府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只有听任西藏独立。他们的目的本是要中国像苏联那样崩溃，然而他们这样做的效果却也像中国政府用巨款包养西藏一样适得其反。

苏联与中国最大的区别在于：俄罗斯族仅占苏联人口的一半（50），而汉族却占中国人口的92%（51）。所以只要汉族不分裂、不打内战，中国就不可能像苏联那样解体；而只要中共不垮台，汉族就不会分裂、不会打内战。西方对达赖喇嘛与西藏独立的支持恰恰起到了帮助中共团结汉族、巩固统治的作用。

1995年4月号《北京之春》刊登了中国民联南非支部负责人尹超的来信《一个值得警惕的倾向》，信中说：中国国内亲友读了《北京之春》1994年11月号发表的某些中国民运人士支持或赞同西藏独立的文章后议论纷纷，“大家议论的结果还是支持共产党，因为至少共产党掌权的时候，中国还不至分裂”。“大家不愿意看到共产党如此‘国’不下去，但更不愿意看到某些民运先生们如此的去‘不国’。现在大陆的许多人都持相同的看法，现在不是共产党说服他们去忍受共产党了，而是某些民运人士‘说服’他们去选择共产党了。”

某些民运人士支持或赞同西藏独立也许是出于毛泽东的逻辑：“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52）”在民族问题上，事情不是那么简单。蒋介石与蒋

经国也坚决反对西藏独立，中共并未因为自己的敌人蒋氏父子反对藏独就拥护藏独；反之，中共也未因为自己的敌人藏独分子反对蒋氏父子就拥护蒋氏父子。敌人的敌人并未成为朋友。这是因为在西藏问题上，历代中国政府----清朝、北洋军阀、国民党、共产党----所代表的都是中国的合法（国际法）利益。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复辟帝制当皇帝，被陈伯达称为“窃国大盗”，中国人皆曰可杀。然而当他拒绝在《西姆拉条约》上签字时，中国人也应反对或谴责他吗？

反之，藏独分子包括十三世与现世达赖喇嘛从来把中国当成敌人，不仅仅把中共当成敌人。他们在满清、北洋军阀与国民党时代就投靠英国闹独立，制造过两次驱汉事件，十三世达赖喇嘛还派兵主动进攻国民党的军队。中共政府在他们眼里也不过是与国民政府一样的中国政府而已。假如中共垮台，中国成立了民主政府，他们也一定会把中国民主政府当成敌人。

“六四”大屠杀后，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都认为，中共已经丧尽人心，中国的学生与精英将会一代比一代更恨中共，一代比一代更亲西方----特别是美国。然而事实并非如此。1997年11月1日江泽民去哈佛大学演讲时，有上千人向他示威，分属于西藏独立、台湾独立与中国民运三派，即所谓3T运动（Tibet, Taiwan, Tiananmen）。其中人数最多的是藏独示威者，绝大多数是美国白人。有两个美国白人学生在会场里始终背对江泽民站着，向他显示其背上的“给西藏以自由”（Free Tibet）的字样。与此同时，却有大约四千名中国人与华人欢迎江泽民，其主力是哈佛大学与麻省理工的中国学生学者，也有许多其他学校的学生学者、来自大陆台湾香港与其它地方的华侨与当地华人。他们挥动五星红旗，不断高喊“热烈欢迎江主席”，不断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歌唱祖国》与《团结就是力量》，自始至终情绪饱满，态度激昂。最令人意外的是，剑桥中文学校的学生娃娃也举着“江爷爷您好”的标语，手持五星红旗沿街列队欢迎。欢迎者与示威者不时发生辩论（由于大批美国警察在场，没有任何暴力冲突发生），有一段对话令我震惊：一个年轻的女示威者走到欢迎人群前面说：“永远不要忘记六四屠杀，我看到他们杀人，他们杀男孩，他们杀年轻人，他们杀抗议者。”一个女欢迎者高声反驳说：“我住在北京，我没有看到这种事。”（53）

那些中文学生娃娃的父母绝大多数是中国学生学者，其年龄在30岁出头，“六四”时当为大学生、研究生或大学教师、科研人员，想必也参加过或同情过八九民运。那些年轻的中国留学生在“六四”时大多当为中學生，想必也同情过八九民运。为什么在八年后，一齐欢迎起“江主席”来了呢？我想不是因为他们来到了自由民主的美国后改变了观点，喜欢起中共的专制独裁了，而是愤慨于美国朝野对西藏独立的狂热支持。也不知有意还是无意，哈佛当局把离江泽民演讲的会场最近的地方划给了藏独示威者。有个哈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一针见血地告诉我：“如果没有那么多美国人参加藏独示威，就不会有那么多中国人欢迎江泽民。”江泽民到哈佛的前几天，哈佛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召开“西藏问题讨论会”，实际上是声讨藏独大会。会场爆满，群情激昂，开成了欢迎江泽民的动员、誓师大会。诚然，中共驻纽约总领事馆也派人到波士顿组织欢迎，但没有这种共同的逆反心理，他们再有天大的本领也拉不到那么多人的。

不仅大陆人反对藏独，某些台湾人也反对。来自台湾的阎公骏对记者说：“江泽民访美活动中的几次讲话都满有水平。”他的妻子，大波士顿华人文化协会主席熊晶则说：“美国人根本不了解中国历史，不懂得西藏早已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受藏独分子蒙蔽谴责中共进藏，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与自己的孩子都经常争论。实际上，中国政府派兵进藏与当年林肯总统打南北战争的目的很相似，一是消灭农奴制，二是防止国家分裂。如果说中共迫害藏人压制人权，那么当年在农奴制下遭受残酷迫害的藏民就有人权吗？”（54）

有意思的是，美国主流社会的电视与报刊几乎不报导多达四千人的欢迎人群，却大肆宣传只有一千人的抗议示威，甚至把欢迎者的人数也算进抗议者中去，有个电视台干脆把欢迎者说成是抗议者。当许多中国人打电话给这些电视台与报刊表示不满时，后者竟然反问前者是不是中国政府派来的。这种傲慢与偏见进一步加深了中国人的反感，并对美国的“言论自由”产生幻灭。倒是亲国民党的美国《世界日报》在报导此事时比美国主流媒体公正、客观得多（55）。

从中文网络也可看出，中国留学生一代比一代更激烈地反对藏独与台独，其民族主义情绪远远超过老一代留学生。这与国内“中国可以对美国说不”的声浪是一致的。诚然，“六四”以后，中共的意识形态彻底破产，不得不把爱国主义当作救生圈。但要说留学生的民族主义也是中共煽动起来的，未免高估了中共的号召力与影响力。真正的原因还在于美国对达赖喇嘛与西藏独立的支持所引起的逆反心理。

五四运动与八九民运都证明，精英是中国民众的灵魂。留美中国学生学者可谓精英了，能够到哈佛大学与麻省理工来的更是精英中的精英了。他们中即便有一小半人回国，也会对中国未来的局势产生深刻的影响。何况国内本来就有对西方的逆反心理。西方不遗余力地支持藏独一方面给中共制造出许多麻烦，另一方面又帮助中共强化汉族的民族主义情绪。于是出现了这样的悖论：西方越是支持藏独达赖就越活跃----中国的精英就越加对西方反感越加拥护中共----中共统治就越加巩固汉族就越加团结（岂止汉族，如前所述，回族对藏独也极为反感）----藏独疆独蒙独就越加不可能成功中国就越加不会分裂。西方某些势力与达赖喇嘛本想搞垮中共、分裂中国，结果在客观上起到了帮助中共巩固统治、增强合法性、凝聚中国与防止分裂的作用，他们自己也陷入了怪圈 22。这对促进中国民主化也没有什么好处，毋宁是帮倒忙。

我愿借此机会奉劝达赖与藏独的西方支持者，你们如果真的希望中国民主化，就应当停止刺激中国各族的民族主义（无论是汉族的还是藏族维族蒙族的），像克林顿那样告诫达赖喇嘛接受中国对西藏的主权（56）。你们如果执意要分裂中国，那就要考虑玩火的代价。不要以为你们可以隔岸观火，那时会有几亿难民像《黄祸》描写的那样漂洋而来，你们如何对付？

注释：

（49）转引自：直云边吉，《达赖喇嘛----分裂者的流亡生涯》，海南出版社，海口，1997年，82-83页。

（50）1990年数字，见 Time 9 September 1991。

（51）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司编，《中国 1990 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1993 年，第 1 册，19 页。

（52）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毛主席语录》，14 页。

（53）徐德清，《百闻不如一见----评美国主流媒体对江泽民访问哈佛的报导》；韩恩厚，《江泽民主席访问波城观感》，两文均见《波士顿新闻》，1997 年 11 月 7-13 日。朱伟忆，《中国主席江泽民来访波士顿与美中台关系》，《舢舨》，1997 年 11 月 7 日。曾慧燕，《江泽民哈佛演讲》，《世界日报》，1997 年 11 月 2 日。以及上述三报发表的照片新闻。

（54）朱伟忆，《中国主席江泽民来访波士顿与美中台关系》，《舢舨》（波士顿中英文合璧

报》，1997 年 11 月 7 日。

(55) 徐德清，《百闻不如一见----评美国主流媒体对江泽民访问哈佛的报导》，《波士顿新闻》，1997 年 11 月 7-13 日。

(56)《江泽民克林顿记者招待会》，《北京之春》，1998 年 8 月号。

## 第十三章达赖喇嘛向何去？

### 1、“大西藏”的神话

1987 年 9 月 21 日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人权委员会演说“五点和平计划”时说：“中国公民大量移民西藏违反了第四届日内瓦会议，威胁藏人作为独特民族的生存。在西藏的东部，中国人口远比藏族人口多。举例来说，在我出生的安多省（指青海省----引者），根据中国统计，有 250 万中国人，但只有 75 万藏人。即使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西藏中部与西部），中国官方资料也证实中国人口比藏人多。（1）”如前所述，最后一句话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公布过那样的资料。

三年后出版的达赖自传说：“中国公民大量移民西藏直接违反了第四届日内瓦会议，其结果是，在我国的东部，中国人比藏人多。以我的出生地、现被划入青海省的安多为例，据中国的统计，现有 250 万中国人，只有 75 万藏人。即使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西藏中部与西部），我们的资料表明，中国人也比藏人多。（2）”前面的话一模一样，最后一句话把“中国官方资料”悄悄改成了“我们的资料”，可见达赖喇嘛自己造谣心虚。

达赖喇嘛这里说的“西藏”当然是指“大西藏”。王力雄对达赖喇嘛说“大西藏”内有 750 万中国人深感困惑。他说根据中国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与西藏自治区人口普查办公室写的《当代中国西藏人口》，1987 年西藏自治区汉人只有 78800 人，即便加上一、二十万流动人口，也不过二十几万，怎会超过自治区的藏族人口 190 万？按照同书的数字，即便在“大西藏”----西藏自治区加上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的十个藏族自治州、两个自治县与一个自治乡----汉人总数也仅为 152.1 万（占总人口的 26.9%），只有达赖喇嘛所说的五分之一。王力雄认为：“在数字化管理越来越成为治理现代国家的关键因素时，它（指中国政府----引者）不可能把所有的数字都做成给别人看的假数字。除此之外，我还有亲身在西藏的所见。虽然我不可能搞人口统计，但以我在西藏接触的范围和深入程度，应该已经达到比较充分的随机化。在这种随机化基础上产生的感觉，我判断中共方面的数字更接近实际。达赖喇嘛之所以提出这样一个数字，除了他的情报系统有放大，以及为了加强政治宣传的效果，我想可能还有一个因素，即达赖喇嘛的大西藏版图比中共认定的藏区更大，进入了汉人稠密区，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3）

把国际法学家委员会 1997 年的报告《西藏：人权与法治》（4）扉页的“大西藏”地图（该地图当然是达赖方面提供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仔细对照，就可发现达赖喇嘛的“大西藏”版图不仅包含了西藏自治区，还囊括了整个青海省、半个四川省、半个甘肃省与四分之一云南省，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南部。其面积占中国的四分之一强。其中包含如下非藏地区：

青海省的西宁市与海东专区（主要居民是汉族与回族）、门源回族自治县、化隆回族自治县、互助土族自治县、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河南蒙古族自治县，还有一个混合自治州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云南省的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丽江纳西族自治县、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宁蒗彝族自治县、大理白族自治州北部、楚雄彝族自治州北部；四川省的混合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西部（包括其首府西昌市）和许多汉人县如平武、宝兴、石棉、盐边等；甘肃省的临夏回族自治州、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以及汉人居住的整个河西走廊，包括安西、玉门、嘉峪关、酒泉、金塔、高台、临泽、张掖、山丹、民乐、永昌、金昌、武威、古浪、永登等市、县，还有甘南汉人县如岷县、宕昌、武都、文县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南部。

除藏族外，在达赖喇嘛的“大西藏”内还居住着汉、回、蒙古、土、撒拉、哈萨克、傈僳、纳西、独龙、怒、彝、白、裕固、东乡、羌、维吾尔、保安等 17 个非藏民族。达赖喇嘛说他们都是中国政府送去的移民，又是弥天大谎。众所周知，1949 年前的青海省主席马麒、马步芳父子都是回民，他们拥有一支强大的骑兵，曾在 1932 年击退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对青海玉树地区的进犯，又在 1935 年消灭了中共红军的西路军。可见青海的回民决不是中国政府移民过去的。达赖喇嘛自己也明白，把上述 16 个非藏非汉少数民族都说成是中国政府送去的移民是无人相信的，所以他故意含糊其辞地把他们都叫做 Chinese（中国人），从而给西方人以他们都是汉人的印象，制造“汉人在藏人自己的土地上（指“大西藏”）淹没藏人”的神话。

那么“大西藏”内的汉人呢？众所周知，早在两千一百年以前，丝绸之路的要道河西走廊就已经是西汉皇朝的领土——凉州。比松赞干布定都拉萨，建立第一个藏族国家吐蕃王朝早了七、八百年（我把松赞干布建立的吐蕃王朝称为藏族第一个国家基于如下理由：第一，据“西藏流亡政府”机关刊物《西藏通讯》每期末页介绍，藏族有文字始于松赞干布时代，可见此前藏族无文字记载的历史，只有传说中的历史，不足为凭。第二，藏族的政权从松赞干布开始才与西藏周围的国家如中国唐朝与尼泊尔发生交往，用现代的政治术语来说，即发生外交关系并获得国际承认。此前藏族传说中的赞普只能算部落酋长，算不得国王）。唐王昌龄诗《出塞》云：“秦时明月汉时关”，这关就是河西走廊的咽喉、汉朝建立的玉门关。达赖喇嘛及其“西藏流亡政府”竟然把自古以来属于汉人的河西走廊也划进了“大西藏”，足见其领土野心已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

让我们再来看被达赖喇嘛叫做“安多省”的青海省。达瓦才仁说：“青海自古是藏人生息繁衍的地方，现在青海境内的各民族中，除藏族外，其余全是十三世纪后逐渐迁入青海的，而汉族迁入更是本世纪中叶以后的事。汉族最早进入青海是新朝的王莽，曾拓边到青海并设立西海郡，徙犯人屯田，不过几年，这些地方又为藏人收复。（5）”这话自相矛盾。王莽新朝在公元 9 至 23 年，达瓦才仁既然承认汉族那时已在青海设郡屯田，又怎能说“现在青海境内的各民族中，除藏族外，其余全是十三世纪后逐渐迁入青海的”呢？

看来达瓦才仁对青海的历史十分无知，有必要多花点笔墨介绍青海历史。据《后汉书》《西羌传》，西羌祖先是三苗，原居湖南衡山附近。舜将三苗迁移到三危（今甘肃境内，敦煌附近）、河关（今兰州附近）西南地区，在赐支河（今青海东部黄河弯曲处）沿岸定居，其活动范围东起陇西，西迄黄河源，南下青藏高原，西北达新疆中部。羌人的后裔至今仍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生活。

青海的第二代移民是汉人。公元前 121 年（比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早了 754 年），西汉皇朝

设立令居塞（今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以控制河湟地区。在湟水沿岸筑西平亭（今西宁），设置临羌县（今西宁市境内）、破羌县（今青海乐都县境内）、浩门县（今青海民和县境内），还设护羌校尉管辖羌人并屯田。公元9年，王莽建立新朝，在青海三角城（今青海海晏县境内）设置西海郡。1944年10月在三角城遗址挖出一个花岗石虎，下有石座，上刻“西海郡始建国X河南”九字（第七字不清）。这“始建国”是王莽称帝后第一年年号。600多年后，松赞干布大臣吞米桑布才仿照梵文字母创制了藏文字母。

王莽死后，西海郡废弃。公元25年（比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早了608年），东汉皇朝在青海除了恢复原有的临羌、破羌、浩门三县外，增设安夷县（今西宁市东）、白土县（今民和县南）、龙支县（今民和县境内），又分置临羌县为西都县；公元210年设西平郡（今西宁市），复置护羌校尉，管辖青海羌人，并移民屯田。那时松赞干布与吐蕃王朝尚未诞生，何来达瓦才仁所说的“不过几年，这些地方又为藏人收复”？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汉人比藏人更有权利说，青海自古以来就是汉人的地方。

三国年间，魏国继续以西平郡管辖临羌、破羌、安夷、白土、浩门、西都等县。

青海的第三代移民是鲜卑——土谷浑。公元280年，辽东鲜卑慕容氏迁移到阴山；公元310年（比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早了323年），再迁到甘肃南部、青海与四川北部，与当地羌人融合，以土谷浑为称号，以西晋为正统。《北史》《土谷浑传》云：土谷浑“治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青海周围千余里”。唐王昌龄诗《从军行》云：“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桃河北，已报生擒土谷浑。”（诗中“桃”字左边应为三点水，我的中文软件没有这个字）这桃河在今甘南藏族自治州内，按照达瓦才仁的逻辑，土谷浑也有权说，青海与甘南自古以来是土谷浑的土地，可惜今天已经无从考证其后裔了。

公元596年（比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早了37年），隋文帝以光化公主嫁土谷浑首领世伏。公元609年（比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早了24年），隋炀帝亲自率军赶走土谷浑首领伏允，在土谷浑首府伏俟城设西海郡，在赤水城（今青海南部）设河源郡。隋灭后，伏允重返青海东部。公元640年，唐太宗以弘化公主嫁土谷浑首领诺曷钵。次年，文成公主经青海入藏时，诺曷钵与弘化公主夫妇为文成公主沿途建行馆、设盛宴，赠送厚礼。

青海的第四代移民才是藏人。公元660年左右，吐蕃王朝恩将仇报，袭击土谷浑。663年诺曷钵、弘化公主夫妇逃到凉州，向唐朝求援。670年唐朝派薛仁贵率军入青海，帮助土谷浑收复失地，大败。公元734年唐使张守圭、李行韦与吐蕃使者奔布支会同在赤岭（今青海湟源县日月山）分别立碑为界。不久，唐蕃战事又起，唐将哥舒翰屡败吐蕃，封西平郡王。《唐书》《哥舒翰传》云：“吐蕃盗边，翰持半段枪迎击，所向披靡，虏骇走，只马无还者。逾年，筑神威城青海上，谪罪人二千戍之，由是吐蕃不敢近青海。”故唐西鄙人诗《哥舒歌》云：“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公元755年安史之乱时唐军东调，吐蕃趁虚而入，于757年占领鄯州首府西平（西宁），760年占领廓州（青海东部），只在这时，藏人才控制了青海全境。然而好景不长，吐蕃王朝于842年赞普朗达玛被刺身亡后即告崩溃，此后四百多年，西藏陷入群雄割据、争战不休的极度混乱之中，直至被蒙古人征服，没有统一的政权。

公元1099年，宋军收复河湟地区，置陇右节度。公元1104年，改鄯州为西宁州，设陇右都护府，是为西宁这一地名的起源。

青海的第五、六代移民是蒙古人与蒙古人带来的中亚穆斯林(回族的祖先)。公元 1372 年明朝改西宁州为西宁卫, 1375 年至 1397 年在柴达木地区设立安定、阿端、曲先、罕东四卫, 归西宁卫统辖。清朝年间青海东部属于甘肃省, 西部由钦差办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管辖。

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后, 青海东部仍属甘肃省西宁道, 西部由青海办事长官管辖。

1929 年中华民国在青海建省, 以西宁为省会, 由孙仲良任省主席。同年中原大战爆发, 孙率军东去, 回民马麒代省主席。1932 年十三世达赖喇嘛趁国民政府忙于对付国难(日本侵占东北的“九一八”事件), 派军进袭青海与西藏交界的玉树地区, 被马家军击败。1936 年马麒之子马步芳代省主席, 1938 年正式任省主席, 直至 1949 年逃亡台湾(6)。

由此可见, 中国皇朝最先将青海纳入中国版图, 治理青海的时间也最长。历代达赖喇嘛与噶厦政府从来没有统治过青海, 青海在中共建政之前就是一个以汉人为主的省。连国际法学家委员会 1997 年的报告《西藏: 人权与法治》都承认, 1949 年青海已有 70 多万汉人, 只有 43 万 8 千藏人(7)。达赖喇嘛总不能说, 那 70 多万汉人也是中共移民吧? 既然青海自古以来是汉人为主的土地, 此后无论有多少汉人迁入青海, 藏人都没有资格说三道四。达赖喇嘛借口青海境内有藏人而企图吞并整个青海, 就像希特勒借口捷克境内有德意志人而吞并捷克一样无耻。

本书第八章开头引用过噶厦政府 1949 年 11 月 4 日给英国的呼吁信, 信中说: “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已经占领了中国的省份兰州(原文如此, 当为甘肃---引者)、青海和西康, 因为这些省份邻近西藏边境, 我们已经给中共政府领袖毛泽东先生发信, 要求他尊重西藏的领土完整。”可见那时噶厦政府也承认青海省、包括甘南藏区在内的甘肃省、包括甘孜与阿坝藏区在内的西康省都是中国的省份。

戈伦夫指出: “历史事实是达赖喇嘛自从十八世纪中叶从未统治过西藏自治区外的藏族居住区。在 1913 年的西姆拉会议上, 十三世达赖喇嘛甚至愿意签字放弃对它们的权利。(8)”戈茨坦也说: “无论如何, 大西藏的目标在政治上是现实的。西藏已有一个世纪或更长时间未曾统治过那些地方, 也难以想像中国会将四川、青海、甘肃与云南的大片土地交出来。那里的许多汉族与回族早在 1949 年中共建政前很久就定居在那里了。(9)”连一贯坚决支持藏独的美国人权组织亚洲观察委员会都说: “西藏流亡政府提供的关于 750 万汉人这个数字, 包括了居住在一些区域例如西宁这个青海省会城市中的汉人, 这个城市几个世纪以来就不属于藏族, 而且位于由各类藏人、半藏人自治地区所组成的藏族居住区域之外”(10)。

达赖喇嘛把那么多自古以来就是汉、回、蒙古、土、撒拉、哈萨克、栗粟、东乡、羌、保安、维吾尔、纳西、独龙、怒、彝、白、裕固等 17 个非藏民族的土地统统划入“大西藏”版图, 自然会使藏族人口在“大西藏”内变成少数。按照他的地图, “大西藏”内何止 750 万“中国人(上述 17 个非藏民族)? 单单河西走廊就有好几百万汉族居民。达赖喇嘛在地图上吞并了那么多其他民族的土地后反咬一口, 诬指“中国移民”使藏族“在自己的土地上也正在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少数民族”(11)。借用达赖喇嘛自己的话说, 他的指责是“一种卑鄙而令人遗憾的遁辞”(12)。而所谓“大西藏”不过是俄国极端民族主义狂人日里诺夫斯基的“大俄罗斯”(包括整个苏联、东欧的大部、伊朗、阿富汗与美国的阿拉斯加)的翻版。

达赖喇嘛在 1987 年美国国会讲话与自传里都说: “这套移民政策并不新鲜, 中国曾有系统地在其它地区运用。本世纪初, 满洲人还是个拥有自己独特文化与传统的民族, 现在满洲只有两至三百万满洲人, 却有 7500 万中国移民。(13)”达赖喇嘛大概从来没有读过中国历史, 所以

不知道满洲人入关后，曾用武力向汉族地区大量移民(做官、驻军)，从而抽空了自己的家乡。满清政府还派出许多蒙古兵去汉族地区镇压汉人，使蒙古人口空虚。十九世纪中叶，为了抵御俄国的侵略，满清政府推行“移民实边”政策，允许与鼓励汉族迁入满洲、内蒙古与新疆，甚至派出“垦务大臣”去内蒙古督办此事(14)。1912年内蒙古的汉人达到100万，超过了蒙古人80万(15)。满洲人走得更多，汉人去得自然更多。满洲人作为中国的统治民族，自愿放弃了自己的文化传统，接受了汉族的文化传统，这也是汉人(达赖喇嘛所谓的“中国人”)的罪过吗？

尤为奇妙的是，达瓦才仁竟然把其他民族也说成是藏族。例如他说青海的回族是“信奉伊斯兰教的藏人”(16)，以此证明青海自古以来就是藏族的土地。他为什么不把汉族也说成是“不信喇嘛教的藏人”呢？那样就可以把全中国都划入“大西藏”的版图了。

注释：

(1)(13) Dalai Lama, "Address to the U.S. Congressional Human Rights Caucus----Five Point Peace Plan for Tibet", Congressional Ceremony to Welcome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of Tibet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2).

(2) Dalai Lama, Freedom in Exile, the Autobiography of the Dalai Lama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0), p.250.

(3) 《天葬》，352-353 页。

(4) Tibet: Human Rights and the Rule of Law (Geneva: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1997).

(5) 达瓦才仁，《谁在制造西藏的神话？》，《北京之春》，1997年2月号。

(6) 以上参见：青海省志编纂委员会，《青海历史纪要》，青海人民出版社，西宁，1979年。

(7) Tibet: Human Rights and the Rule of Law (Geneva: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1997), p.101.

(8) Grunfeld, A. Tom, 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New York: M. E. Sharpe, 1996), p.245.

(9) Goldstein, Melvyn C.,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71.

(10) Merciless Repression: Human Rights in Tibet (Washington DC, Asian Watch Committee, 1990), p.74.

(11)(12) 《达赖喇嘛在西藏自由抗暴38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中国之春》，1997年4月号。

(14) 翁独健主编，《内蒙古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呼和浩特，1985年，276页。



(15) 马戎,《西藏的人口与社会》,同心出版社,北京,1996年,215页。

(16) 达瓦才仁,《对西藏的殖民与藏人的生存危机》,《中国之春》,1998年2月号。

## 2、西藏独立的灾难

我们既已弄清达赖喇嘛的“大西藏”的真相,就不难想象“大西藏”独立的后果。自古以来就居住在那里的汉、回、蒙古、哈萨克、东乡、撒拉、裕固、白、彝、纳西、怒、独龙、保安、维吾尔、土、羌与栗粟等17个非藏民族一定会奋起反抗,那时在中国四分之一强的土地上就会爆发波斯尼亚式的种族--宗教战争,这是包括藏族在内的各族人民都难以承受的浩劫。早在1932年青海的回民骑兵就击退过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藏军,1993年初甘南与阿坝都发生过因掌权的藏人禁止当地回族修清真寺而起的大规模流血冲突(17),可见回族第一个会起来反抗达赖喇嘛,其他穆斯林民族也一样,更不必说汉族了。由于达赖喇嘛的扩张主义野心,“大西藏”内非藏人口超过了藏族人口,即便中国政府从“大西藏”撤军,达赖喇嘛也绝无胜利的希望。北大西洋公约集团可能派兵越过印度洋与南亚次大陆、穿过喜马拉雅山与雅鲁藏布江去帮助达赖喇嘛镇压17个非藏民族的反抗吗?如不能,那么“大西藏”独立就只能是梦呓而已。

更有甚者,1993年10月5日,在“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与《西藏论坛》联合召开的汉藏对话会上,有藏人扬言要请美国像组织联合国军打伊拉克解放科威特那样组织联合国军打中国解放西藏,真是幼稚得可爱。

达赖喇嘛在1987年美国国会演讲“五点和平计划”时,还要求“中国人”(上述17个自古以来就居住在那里的非藏民族)全部撤出“大西藏”,这同“种族清除”有何区别?

那么西藏自治区----“小西藏”----有无可能独立?

藏族在西藏自治区人口中占96.4%,所以如果西藏自治区独立,不会爆发种族战争,然而达赖喇嘛立即要面对的难题是如何养活那里的两百多万藏人。

如前所述,中国政府每年都要给西藏自治区三十几亿元财政补贴,且以每年10%以上的速度递增,其中很大一部分用以包养十几万藏族职工(官员、干部与工人)及其十几万家属。假如西藏独立,中国政府当然没有义务再包养他们,那时他们就会向达赖喇嘛要饭吃、要钱花。达赖喇嘛有钱包养他们吗?如没有,这些飞扬跋扈、不学无术、养尊处优、游手好闲的寄生虫就会立即失业、挨饿。那时他们就会重新上街向达赖喇嘛示威,打砸抢烧达赖喇嘛的政府机关。无论达赖喇嘛用来世天堂去安慰他们,或者用来世地狱去恐吓他们,恐怕都无济于事。当然达赖喇嘛有一大法宝----向西方行乞,然而苏联与东欧各国“民主化”后,也一再向西方行乞,西方给了多少?

达赖喇嘛还可以让他们回乡种地放羊,且不说这些过惯了不劳而获的寄生生活的藏族新贵是否还愿意劳动,即便愿意,也必须把1980年以来分给藏农牧自由经营的土地牲畜收一部分回来重新分配,那就会引起藏农牧的坚决反抗。

还有十多万流亡藏人怎么办?印度、尼泊尔与不丹等国自己人口爆炸,那时决不会再收留他们。达赖喇嘛如何安置他们?他将面临与养活藏族市民同样的问题,甚至更严峻----流亡藏人

可是藏独的大功臣哩。

王力雄认为，“达赖喇嘛不但不会在西藏复辟旧制度，还将在西藏实行远比现在的共产极权制度更有利于人民的民主制度。(18)”如前所述，根据《西藏未来政体与宪法特征要旨》(19)，达赖喇嘛的“民主制度”就是政教合一，那是对民主的讽刺与嘲弄。该《要旨》还说西藏的政治必须遵循佛法的指导，多么像中共宪法关于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条款。当然，那时藏人可以充分享受自由与人权——自由地高喊西藏独立，自由地崇拜达赖喇嘛，自由地修建无限多的寺庙，自由地招收无限多的僧尼，自由地打砸抢烧汉回个体户(如果后者赖在西藏不走的话)……自由地做中共现在禁止他们做的一切事情；但不能自由地做达赖喇嘛禁止的事，诸如崇拜金刚派。还有 12%的藏农牧已不信教，藏官与藏干不信教的比例恐怕还要高，当达赖喇嘛复辟了政教合一的体制后，他们的信仰自由(即不信教的自由)还能否得到保障呢？焉知达赖喇嘛手下的人不会根据达赖喇嘛制订的宪法迫害他们或强迫他们重新信教？王力雄断言达赖喇嘛将在西藏实行民主制度未免言之过早。

而况常识告诉我们，除了饿死的自由外，世上所有其它自由都要以“有饭吃”为前提。美国前总统罗斯福(Roosevelt)提出的“四大自由”中就有一条“免于匮乏的自由”(其它三条是“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与“免于恐惧的自由”)，达赖喇嘛如何保证藏人享受“免于匮乏的自由”呢？

关于西藏独立后的经济制度，达赖喇嘛在《西藏未来政体与宪法特征要旨》里只说了三句话：“西藏应有独特的经济制度。根据它自己的需要，不走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极端。税制以收入为准。”这个既非资本主义亦非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究竟是什么东西——比如说，是不是农奴制？——达赖喇嘛语焉不详，我不敢妄加猜测。但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他要收税。如前所述，西藏的企业只亏不赢，全靠中国政府拨款维持。西藏一旦独立，这些企业就会马上破产，叫达赖喇嘛无税可收。所以达赖喇嘛计划中的收税的主要对象只可能是农牧民。然而中国政府自 1980 年以来就不收农牧税，藏农牧已近 20 年不用缴税，早已把不缴税视为天经地义，如今达赖喇嘛要叫他们缴税又谈何容易？中国政府自 1980 年以来，不仅不收农牧税，而且大量提供无息或低息贷款、免费或廉价的生产资料与技术以及廉价生活必需品，但由于西藏的自然条件实在太差与农牧民人口爆炸，藏农牧的人均纯收入也只及全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一半，大多数只是维持温饱而已。西藏独立了，中国政府的资助就没有了，藏农牧的收入就要大幅度下降，许多人就会落到贫困线以下去。在这样的情况下，达赖喇嘛还要向农牧民收税，难保农牧民不会起来反抗——不要忘记藏农牧中还有许多与达赖喇嘛同辈的、对旧西藏持仇视态度的、不信喇嘛教的翻身农奴。达赖喇嘛收不到税，用什么钱来养活他的政府与军队？没有政府与军队，达赖喇嘛又如何收税与镇压反抗？

当然，最严重的问题仍是藏族职工及其家属——二十几万藏族市民。他们早已被中共的高工资、高奖金、高津贴与高福利宠坏了，把这一切视为天经地义。他们中的年轻人已经像老一代藏人酷嗜喇嘛教一样酷嗜现代物质文明与现代商业娱乐。如果达赖喇嘛没有钱包养藏族市民，给予他们同样的收入与福利，让他们享受同样的现代物质文明与现代商业娱乐，他们就会像鸦片烟鬼断了鸦片一样难受。这时，同样由于失去了权力与特权而像断了鸦片的鸦片烟鬼一样难受的原中共藏官就会组织他们起来造反，以要求中国政府重新补贴西藏为号召，并联合不愿意缴税的农牧民，一起反抗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或者名义上拥护达赖喇嘛，却把矛头指向其主要追随者，先架空达赖喇嘛，然后剥夺其实权，将其软禁。中共藏官在藏族职工中约占三分之一，有四万人左右，加上家属有十来万，如把由中共津贴的农牧民干部及其家属也算上，就有十几万之众。他们分布在西藏城乡各地，有现成的组织联系，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这可是中共教给他们的看家本领)与广泛的社会影响，许多人还受过军事训练。单单他们就完全

有能力也有胆量发动内战。北大西洋公约集团可能派兵越过印度洋与南亚次大陆、穿过喜马拉雅山与雅鲁藏布江去帮助达赖喇嘛镇压藏族人民的起义吗？如不能，那么“小西藏”的独立也只能是梦呓而已。

注释：

(17)《世界日报》，1993年3月9日。

(18)《天葬》，340页。

(19) Dalai Lama, "Guidelines for Future Tibet's Polity and Basic Features of its Constitution", Tibetan Review (October, 1992).

### 3、戈茨坦的幻想

至少有一个美国人看出了达赖喇嘛的困境，那就是戈茨坦。他在1997年出版的新着《雪狮与龙》中指出：达赖喇嘛目前的战略是利用他的个人魅力，通过持续不断地攻击中国侵犯人权，从美国与欧洲得到尽可能多的支持。他与他的追随者越来越依赖这一点。但美国与其它西方国家已经表明，他们并不想因为人权问题而疏远中国。于是达赖喇嘛就像一个正在输球的足球队（原文如此---引者），虽然因为其出色的表演而赢得满场喝彩，却不能改变失败的结果。达赖喇嘛在国际上的成功只能激怒中国，使流亡藏人变得更加顽固不化，从而使西藏的局势越来越恶化。毫无疑问，达赖喇嘛的这种政策建立在指望中共很快像清朝在1911年、苏联在1991年那样崩溃，这样西藏就可以得到独立。所以达赖喇嘛目前的政策是一种等待政策，等待历史来圆满地解决他的两难处境。为此他企图保持国际上对西藏问题的热度，然而时间不在达赖喇嘛一边。

戈茨坦忠告达赖喇嘛：作为一个62岁的人，他必须考虑如何在其余生更好地维护自己的人民和他们的生活方式。达赖喇嘛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不顾流亡藏人的反对，把400万本土藏人的利益放在13万流亡藏人的利益之上，向中国作出更大的让步；还有一种是组织恐怖活动，迫使中国向他让步。如果恐怖活动真的搞起来了，中国政府一定会用铁腕镇压，那就会使美国陷入两难处境。如果不支持恐怖活动，美国政府就会面临来自国内的压力；如果支持，就会损害中美关系。戈茨坦认为，美国在过去几十年里未能解决西藏问题或软化中国的西藏政策，而只是帮助达赖喇嘛在西方越来越走红。美国的这种参与有害无益，因为它使藏人相信美国坚决支持达赖喇嘛在西藏实行民主（独立的代名词---引者），并鼓励藏人继续反对（分裂---引者）中国。

戈茨坦回忆了一件事。他在西藏哲蚌寺从事研究时，有个喇嘛悄悄问他，美国什么时候把中国赶出西藏、让达赖喇嘛回来？当戈茨坦告诉他，中国是个强国，美国不可能做任何切实有力的事时，那个喇嘛拒绝听下去。他强调说：“不，不，我知道美国比中国更强大，美国会帮助我们的。”戈茨坦继续写道：可见北京认为美国正在搅乱西藏、威胁中国在西藏的战略利益并非毫无根据。而美国这样做，只能使中国政府内部主张对西藏实行温和政策的那一派受到强硬派的批评，并使西藏局势更加恶化。戈茨坦认为美国的西藏政策是错误的，因为它既未能向中国与达赖两方面都施加压力，迫使他们达成妥协；又未能预防流亡藏人转向恐怖活动。

戈茨坦随后提出了他自己的解决方案。他认为对西藏来说，政治上的自由（独立的代名词----引者）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保存西藏的语言、文化、宗教与人口的单纯性。在流亡藏人看来，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办法当然是独立或高度自治（“斯特拉斯堡方案”或“一国两制”）。但既然这是中国所不能接受的，所以是不现实的。达赖喇嘛必须降低要价以求妥协。虽然这对藏人来说很不公平，但双方的力量对比实在太悬殊了，如果藏人再不让步，达赖喇嘛死后独特的西藏将不复存在。

戈茨坦指出，关键是在北京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即在不改变共产制度的前提下建立一个纯藏人的西藏。他认为这是可以做到的，其方案如下：

中国必须让步，让西藏自治区成为纯藏人与纯藏语区。政治上，这个“新”自治区将保留现有的社会制度，但北京必须逐步让藏人出任所有党政官员，包括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十年以后，藏官的比例将从目前的 60-70%上升到 85-90%。

在文化上，必须保证藏语文的主导地位。西藏各级政府必须用藏语文作为基本工作语言，虽然所有藏族高干必须懂得汉语文，在西藏大学里也可以教授汉语文。

在宗教上，必须取消对僧侣数量的限制，并允许国外的僧侣（指流亡藏僧----引者）给予指导。

在人口上，北京必须坚决减少在西藏的非藏人，从而降低外省人与藏人之间的经济竞争，使藏人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得益者。北京将继续发展西藏经济（给钱----引者），因为藏人希望经济发展（享受现代物质文明与商业娱乐----引者），但发展的速度可以放慢。在藏非藏人的比例应降低到 1959 年叛乱前的程度。

这样，西藏将恢复为藏人的西藏，虽然仍在藏族共产党人的领导下，这将得到绝大多数藏人的支持。如果中国民主化了，实行多党制，西藏也可以跟上。这样做的前提是使西藏在现代化的同时又完美地保持其语言、文化与宗教，这将符合双方的利益。最大的障碍来自流亡藏人要求建立“大西藏”。虽然从文化、宗教与人种上说，安多与康与西藏相似，但历史差异与现实政治使“大西藏”根本不可能。可能的解决办法是北京在其它藏区进行与自治区平行的改变。五年或十年后，双方建立了信任、信心与尊重后，再讨论合并问题。

北京当然会担心这一方案会威胁中国在西藏的地位，只有达赖喇嘛可以让北京放心。达赖喇嘛必须回中国西藏，公开接受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承认中国认定的十一世班禅，说服藏人不要闹事、接受西藏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关键在于中国领导人与达赖喇嘛必须发展新的互相信任与尊重的关系。根据达赖喇嘛过去的脾气，他似乎很难接受这样的方案，双方很可能重新转为对抗。美国可以发挥促进者与保证人的作用。美国将向达赖喇嘛保证，如果中国在达赖喇嘛回藏后违约，美国将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

戈茨坦最后说，西藏局势正在迅速恶化，达赖喇嘛可以继续袖手旁观，希望外力推翻他的敌人。但他最好行动起来，或者接受上述方案，或者组织恐怖活动。就美国的利益而言，应该促使达赖喇嘛接受前者而非后者（20）。

戈茨坦是位文化人类学家，所以他最关心的是文化问题。他似乎不明白，西藏问题之所以闹得

如此凶，首先是西方(本世纪上半叶主要是英国，下半叶正如戈茨坦自己指出的那样主要是美国)干涉的结果。而西方干涉西藏的目的是分裂中国，所以西藏问题首先是个政治问题，文化不过是个借口。当年英俄两国之所以干涉西藏，并非清朝毁灭西藏文化，英俄也从来不曾提出保护西藏文化的问题，他们干涉西藏纯粹是为了自己的殖民利益。今日美国打着保护西藏文化的旗号干涉西藏问题，是为了搞垮中共、分裂中国，美国何曾热心保护过印第安、爱斯基摩与波里尼西亚文化？

戈茨坦的方案没有提到如何处置十几万流亡藏人与“西藏流亡政府”，似乎是让他们继续留在国外，因为他说要允许流亡藏僧指导国内藏僧。这是行不通的，因为他的方案要求达赖喇嘛回西藏。而只要达赖喇嘛一走，人口爆炸的印度、尼泊尔与不丹马上就会对流亡藏人下逐客令。1994年4月23日，达兰萨拉的一名流亡藏人持刀杀死了一名当地的印度青年。当地居民在当地官员的支持下，打砸抢烧了一些藏人的商店、学校、机关与汽车，并在达赖喇嘛住宅前示威，要求达赖喇嘛与流亡藏人滚蛋。达赖喇嘛曾打算“迁都”，被印度政府“劝阻”（21）。类似的事件多次发生，究其因是流亡藏人有西方援助，生活比当地居民富裕；又仗着有西方支持，对当地居民横行霸道。由此可见前引达赖喇嘛对国际法学家委员会说流亡藏人何等和平、富于同情心、绝少谋杀案的言论是何等虚伪。

再说达赖喇嘛也不会甘心回藏当光杆司令，同与他格格不入的中共藏官合作。他一定要带他的“流亡政府”回藏。然而这一来问题就大了。“西藏流亡政府”1992年就有1300多人员（22），他们都是西藏独立的大功臣，又自恃有西方支持，客居印度、寄人篱下时尚且敢对当地居民耀武扬威，如果他们也跟着达赖喇嘛回到西藏，怎会甘心情愿地接受中共藏官的统治？191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从印度回到西藏后，曾血腥镇压亲汉藏官、贵族与喇嘛，逼走九世班禅，迫害其亲属。现世达赖喇嘛的摄政大扎曾杀害其前任热振活佛，血腥镇压亲热振的喇嘛。1934年藏军总司令龙厦甚至被剜眼。由于达赖喇嘛迫害流亡藏人内部的金刚派，后者在1997年2月刺杀了达赖喇嘛手下的一名重要僧官，还企图刺杀达赖喇嘛本人（23）。无论证诸历史与现实，藏人一向有党同伐异、相互倾轧、自相残杀的传统，何况还有前述极为棘手的生活、工作安置与权力、资源重新分配问题。所以在流亡藏官与中共藏官、流亡藏人与本土藏人之间一定会发生尖锐的冲突，很可能会爆发内战。

退一步说，即便印度、尼泊尔与不丹允许流亡藏人及其“流亡政府”在达赖喇嘛回藏后留在那里，他们又怎会甘心被达赖喇嘛“抛弃”？他们一定会千方百计地破坏戈茨坦设计的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进程，就像哈玛斯千方百计地破坏巴勒斯坦的和平进程一样。

戈茨坦说西藏的语言、文化与宗教正面临毁灭，达赖喇嘛死后独特的西藏将不复存在，看从什么角度理解。如果只有让西藏像活化石一样停留在中世纪的政教合一、农奴制与近乎原始的生产、生活方式中才算保存了独特的西藏，那么的确，这样的西藏也像中世纪欧洲一样已经灭亡。戈茨坦自己的《西藏现代史》的结论也指出，“喇嘛王国”灭亡的原因就是宗教势力顽固拒绝任何现代化的改革。可见戈茨坦自己也认为中世纪西藏是必然要灭亡的，然而他又千方百计地要恢复中世纪西藏，岂不自相矛盾？

戈茨坦在《西藏现代史》里指出，西藏有喇嘛越多越好的传统，西藏曾有四分之一的男子出家为僧，消耗了社会的大部分财源，这也是导致“喇嘛王国”灭亡的原因之一。可是他的方案却要求取消对僧侣数量的限制，不又自相矛盾吗？

戈茨坦通晓藏语文，曾用英文编过藏语文教科书，想必也知道藏文没有科技词汇与现代社会

科学（经济学、法学等）词汇。然而他一方面要求发展西藏经济、使之现代化----这就意味着必须在西藏使用有科技词汇与现代社会科学词汇的非藏语文（诸如汉语文、英语文等），否则如何发展西藏经济、使之现代化？----另一方面又要求把西藏变成“纯藏语区”，不又自相矛盾吗？

同样，由于藏族专业与管理人员的教育程度与业务水平远不足以担负起发展西藏经济的重任（参见本书第十章的西藏专业与管理人员文化程度统计表），要发展西藏经济、使之现代化就必须保留大量汉族专业与管理人员，或从国外聘请大量专业与管理人员，但戈茨坦又主张把西藏变成“纯藏人区”，不又自相矛盾吗？

戈茨坦的矛盾反映了文化人类学的矛盾，本书在导论里已作过论述。文化人类学家总是希望他们的研究对象越古老越原始越纯朴越好，并且像活化石一样永远不变，这与某些腻烦了现代文明的西方游客希望他们的鉴赏对象永远古老原始纯朴有异曲同工之妙。可惜人类的本性是贪图物质与感官享受的，任何古老原始纯朴的民族都挡不住现代文明的诱惑，而且一经尝试便如醉如痴难以自拔，本书第十章引用的《天葬》关于藏农为了看电视而与驻军打架的故事就是明证。人们同时又怀恋从小习惯的旧风俗旧习惯旧观念旧文化，既喜新厌旧，又喜旧厌新。即便在汉族内部，自改革开放以来，不也有既要享受现代物质文明，又摇头感叹“人心不古”的矛盾现象吗？他们认识不到，现代物质文明必然要改变传统的价值观念、风俗习惯与语言文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早已被证明是行不通的。当西方学者论述欧洲的文化变迁时，从来不曾把中世纪文化被现代文化取代叫做“毁灭欧洲文化”，而是称之为“发展与进步”。中国汉族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确乎有一批国粹派痛心疾首于“国粹沦亡”，还有掌权者一再下令“尊孔读经”，如今这一切已成笑谈。为什么西藏文化就无权发展与进步，一发展就是“毁灭西藏文化”、“侵犯西藏人权”？

在西藏问题上，上述人性本身的矛盾（既贪图现代物质享受又怀恋传统文化风俗）又与另外两个矛盾纠缠在一起。一是藏人出于人类本性向往现代化生活与西藏的自然资源不可能提供现代化的矛盾。这就意味着要让藏人享受现代化生活，必然要有外力介入，要有外人大量进入西藏，提供金钱、物质、技术与管理。本来现代化就必然要改变传统文化，外族与外族文化送来的现代化，自然更要改变西藏的传统文化。汉族传统文化----还有日本、韩国及亚洲其它各国的传统文化----不也是被西方人与西方文化改变得面目全非了吗？迄今为止，似乎还没有人----不论是亚洲人自己还是西方人权卫士----指责西方改变亚洲各国的传统文化是毁灭亚洲文化、侵犯亚洲人权。如果没有西方与冷战的介入，那么藏人也会像阿拉斯加的爱斯基摩人与夏威夷的波里尼西亚人平静地接受美国人送去的现代化那样平静地接受汉人送去的现代化。不幸的是，西藏的现代化遇到了西方发动的新冷战的旋风----这是由黄种人的中国要发展而白种人的西方害怕中国发展的矛盾引起的----于是在国际舞台上掀起了滔天巨浪。

如前所述，西方人权卫士在西藏的现代化问题上为中国政府设置了怪圈 22 的陷阱。如果中国政府不派人送现代化去，他们就指责它让西藏如此贫穷落后，是种族歧视；如果中国政府派人送现代化去，他们就指责它向西藏大量移民、用汉人淹没藏人；当藏人享受到汉人送去的现代化、文化风俗发生变化时，他们又指责中国政府改变西藏传统生活方式、毁灭西藏独特的语言、文化与宗教。这的确是一个战无不胜的武器。西方人权卫士为什么不指责西方改变中国、日本、韩国以及其它亚洲国家的传统生活方式、毁灭亚洲各国的独特文化？为什么不指责美国在阿拉斯加与夏威夷的现代化和英国在苏格兰、威尔士与北爱尔兰的现代化改变了当地土着的传统生活方式、毁灭了他们的独特文化？

曾去西藏考察的美国文化人类学家莎拉给马丽华的信说：“干预和帮助之间的区别在于对方是否在寻求。在西藏人寻求帮助以达到进步时，也只是在此时，如果你想要并能够帮助，你的帮助才会被理解为是一种社会的进步受到欢迎。然后你才能成为帮助者，成为身穿铮亮盔甲的骑士，成为救星。而如果没有接受能力，所谓的帮助者就会成为反派人物，成为压迫者，你希望给予的所有帮助，你所有的美好动机，都会浪费在敌意的环境中。因此帮助必须是他们所寻求的，希望的，已经提出来的。（24）”

假如藏人从来没有看见过、听说过电灯、电话、电影、电视、自行车、摩托车、汽车、飞机、自来水、煤气灶、西式医院、现代学校、西装、牛仔裤、耐克鞋、啤酒、可口可乐、迪斯科、摇滚乐、卡拉 OK……他们当然不会产生要求汉人帮助他们享受这些东西的念头。然而那时西方人权卫士就会出来帮藏人打抱不平，他们会指责中国政府说：藏人没有电灯、电话、电影、电视、汽车、飞机、自来水、煤气灶、西式医院、现代学校……其生活水平远远低于中国平均水平，这是种族歧视！于是中国政府只好派汉人送去。藏人倒是欣然接受、欢喜若狂，只厌其少、不厌其多，莎拉却说中国政府是“反派人物”、“压迫者”，因为它在藏人没有“寻求帮助”时帮助他们，多么高明的逻辑啊。

在西方不遗余力的煽动下，藏人也学会了怪圈 22。陈若曦去西藏时问过许多藏人“西藏最需要什么？”“不约而同的答案都是‘现代化’。若再追问下去，有的说‘同时要保持藏族文化’（即只用藏语文不用汉语文、只学佛经不学科技、寺庙与喇嘛越多越好、恢复政教合一的达赖喇嘛体制等等——引者），有的说‘也要高度自治’（即不要汉人在西藏——引者）。（25）”与戈茨坦的“现代化的纯藏人藏语区”的乌托邦方案非常相似，这就叫做“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至于拉萨的某些藏族青年，一方面用中国政府给他们的钱大穿其西装、牛仔裤与耐克鞋，大喝其啤酒、咖啡与可口可乐，天天去夜总会在摇滚乐伴奏下大跳其迪斯科、大看其西方黄色录像、对着卡拉 OK 机大唱其港台流行曲，另一方面却学着西方人权卫士的腔调严厉谴责中国政府毁灭西藏文化、侵犯西藏人权——其目的只是为了逼迫中国政府给他们更多的钱去狂歌劲舞、纵情声色，让他们更加起劲地“改变西藏传统生活方式”、“毁灭西藏文化”、“侵犯西藏人权”——更是虚伪得令人作呕，这就叫做“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

《天葬》指出：“西藏却由于‘天’的因素，决定了其内部不具备现代化的条件和可能，它的现代化只能是外力加于西藏、并且由外力维持的。这被外力施加给西藏的现代化，与西藏社会的本质并不相容，因此它就不可能完成把西藏传统社会也拉进现代化的任务。西藏社会的二元化状态将长久地存在，呈现为文明的一种分裂状态。”“具有本质意义的现代化，是通过中共对西藏的占领而强行‘嵌入’西藏社会的。我用‘嵌入’这个词汇，是强调那种现代化并非出于西藏社会自身的需要，也没有同西藏的传统社会相融合，而是从外部进入并且自成一体的。”“因为西藏的现代化只能是外来的，并且是西藏自身所不能供养的，因此无论这种现代化在今日西藏凸起到如何显眼的程度，我也只将其视为生长在西藏肌体上的肿瘤——它给西藏带来的不是繁荣，而是病。”（26）

上引王力雄的第一段话是颠扑不灭的真理，本书开头论证过了。但他说现代化并非出于西藏社会自身的需要，这话与陈若曦发现的藏人的头号需求是“现代化”相矛盾，更与拉萨藏族青年如醉如痴地追求现代物质文明与现代商业娱乐的事实相矛盾，颇有“饱人不知饿人饥”的味道，本书导论已作过论述。王力雄还忽略了另一种“强行嵌入”的外力——西方人权卫士。中共何尝心甘情愿掏出大把钞票来供养西藏的现代化？他们是害怕西方人权卫士的攻击与压力，不得不掏钱呀。当然，他们掏钱后，西方人权卫士就换一种罪名，更加起劲地攻击他们，这就叫

做“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注释：

(20) Goldstein, Melvyn C.,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p.113-131.

(21) "Violence in Dharamsala Leaves the Tibetan Community Shaken", *Tibet Press Watch* VI:II (May 1994), p.13.

(22) "Tibet In Exile At A Glance", *Congressional Ceremony to Welcome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of Tibet*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2), p.101.

(23) Goldstein, Melvyn C.,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141.

(24) 马丽华，《走过西藏》，作家出版社，北京，1997年，631页。

(25) 陈若曦，《西藏最需要什么？》，《明报周刊》，1085期。

(26) 《天葬》，378、395、422页。

## 4、达赖喇嘛的骗局

达赖喇嘛自从1959年逃亡印度后，一直要求“大西藏”独立。1972年后，由于美国联中反苏，达赖喇嘛不得不改变策略，采取指鹿为马的办法，把变相独立说成是自治。1987年他的“五点和平计划”连美国国务院的官员都说是“隐蔽的独立计划”，1988年的“斯特拉斯堡方案”也是换汤不换药，达赖喇嘛却声称他已作了最大的让步，放弃了独立诉求。“西藏流亡政府”向中国驻印度大使说明，“斯特拉斯堡方案”符合邓小平1979年3月12日对嘉乐顿珠说的“除了西藏独立不能谈，其他问题都可以谈”的精神（27）。中国政府回答说，达赖喇嘛的“五点和平计划”与“斯特拉斯堡方案”没有从根本上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不能作为谈判的基础（28）。达赖喇嘛就说中国政府对谈判预设先决条件，而他们要求无条件谈判（29）。其实他们自己向中国驻印度大使说明“斯特拉斯堡方案”符合邓小平的意思，就等于承认他们接受邓的意思是谈判的先决条件。

苏联的崩溃给了达赖喇嘛极大鼓舞，他的调门不断升高。1991年3月10日，他在“抗暴纪念日”的讲话中说：如在不长的时间内，中国政府对他提出的谈判建议仍不做出积极反应，他将认为他不再受“斯特拉斯堡方案”的约束（30）。

同月22日，达赖喇嘛在伦敦提出“亚洲民主共同体”，把西藏、内蒙古与新疆当作独立会员，与中国平等（31）。

4月16日，美国总统布什接见达赖喇嘛，他的腰杆更硬了。



8月19日，达赖喇嘛宣布撤消“斯特拉斯堡方案”，坚决要求西藏完全独立（32）。

12月1日，乌克兰举行公民投票，90%的投票者要求独立。达赖喇嘛正在英国，第二天他被英国首相梅杰接见后对记者预言：西藏将在五到十年内完全独立（33）。

1992年3月10日，达赖喇嘛在“抗暴纪念日”讲话中说：“我相信在不远的一天，我们的人民和内蒙古、东土耳其斯坦(现称新疆)都要完全自由地回到各自的国家。（34）”显然他认为中共很快就会像苏共那样垮台，中国也很快会像苏联那样崩溃。尽管如此，中国政府一直与他的代表联系，商讨谈判事宜。

1993年8月11日与10月3日，达赖喇嘛突然在印度发表令西方大吃一惊的谈话。下面是这两个谈话的全文：

合众国际社与路透社 1993年8月11日印度新德里电----达赖喇嘛星期四说他只要求在喜马拉雅地区实行政治自治，不要求脱离中国完全独立。他在新德里的一个记者招待会上说，他认为现实的解决办法是西藏实行自治，其外交国防事务仍然由中国掌管。“我们要的是中间道路----一国两制。”达赖喇嘛说，“自治对我已经足够了----让西藏人民去决定独立问题。”

北京一直拒绝与达赖喇嘛谈判，除非他放弃独立诉求。达赖喇嘛说中国驻印度大使愿意会见他。“这是一个进步，”他说，“我非常非常乐观。我们期望在我的代表与这位大使之间会有认真的谈判。”但他说，“我只有在取得了确实的进展后才会会见他。”达赖喇嘛说中国希望他帮助寻找班禅的转世灵童，班禅是西藏第二号重要的精神领袖，死于1989年。“这对我们要做的事来说可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以前中国人一直说寻找班禅灵童是他们的内政，我们没有资格过问。”

在过去14年里有11个西藏代表团访问过中国。达赖喇嘛说，上个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官员与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之间的会谈是好的。他请求印度总理拉奥在下个月访问中国时提起西藏自治问题。新德里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个自治区，禁止在印度的十万流亡藏人从事反华活动。1991年印度逮捕了几百名藏人，因为他们向访问新德里的中国总理李鹏示威。

合众国际社 1993年10月3日加尔各答电----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星期天说，以色列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最近达成的协议可以作为解决西藏自治问题的榜样。

“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我朝前看。”他说，“甚至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都摆脱了几十年的仇恨与暴力，在和解的精神下谋求和平。我坚信如果西藏人与中国人双方都采取理性态度，我们将会发现和谐的解决办法。”

这位西藏神王把他的方案叫做“中间道路”，他说他愿意接受在中国内部实行有限自治，而不是脱离中国完全独立。

达赖喇嘛这两个谈话比起“五点和平计划”与“斯特拉斯堡方案”来，似乎是作了大幅度的让步。那两个计划都要求中国从西藏撤军，这两个谈话却允许中国掌管西藏的外交国防大权。他甚至引用了中国政府许诺给香港台湾的政策“一国两制”，似乎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尤其重要的是他明确宣布放弃独立诉求，只要自治，这同他在两年前宣布撤消“斯特拉斯堡方案”、坚决要求完全独立，简直判若两人。

他为什么（至少是在口头上）要作 180 度的转弯呢？因为中国的形势并未按照他预计的那样发展。1992 年邓小平南巡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曾经预言中共与中国很快将垮台与崩溃的西方观察家们纷纷改变腔调，预言中国将在 21 世纪上半叶赶上美国，成为世界新超强。为了从高速发展的中国市场捞取实惠，西方各国争先恐后地向中国示好。达赖喇嘛极其被动，不得不也改变腔调。他在改变腔调之前大概没有通知他的部下，所以我在 1993 年 9 月 27 日至 28 日美国和平研究所于华盛顿召开的西藏问题讨论会上引用并散发达赖喇嘛 1993 年 8 月 11 日的谈话时，达赖喇嘛驻美国与联合国首席代表洛地甲日（Lodi Gyari）竟然说那个谈话是媒体捏造的，达赖喇嘛根本不可能说出那样的话（指不要独立）。而与会的美国教授们（都是赫赫有名的西藏问题专家或中国问题专家）虽然并不否认这一谈话的真实性，却继续大谈西藏独立，根本不理睬达赖喇嘛的新意图。看他们的口气，似乎西藏问题应该如何解决（独立还是自治）并不由达赖喇嘛或中国政府决定，而要由他们决定。

中国政府对达赖喇嘛的政策与达赖喇嘛的要求大相径庭。1981 年 7 月 28 日胡耀邦接见嘉乐顿珠时宣布了对达赖喇嘛的“五条方针”：一、我们的国家，已经走上政治上能够长期安定，经济上能够不断繁荣，各民族能够更好地团结互助这样一个新时期。达赖喇嘛和跟随他的人都是聪明的，应该相信这一条。如果不相信，要多看几年也可以。二、达赖喇嘛和他派来和我们接触的人，应该是开诚布公，不要采取捉迷藏或者是做买卖的办法。对过去的历史可以不再纠缠。即 1959 年那段历史，大家忘掉它算了。三、我们诚心诚意欢迎达赖喇嘛和跟随他的人回来定居，目的是欢迎他能维护我们国家的统一，增进藏汉民族和各民族的团结，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做贡献。四、达赖喇嘛回来定居后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照 1959 年以前的待遇不变，党中央可以向人大建议，还当副委员长。至于西藏就不要回去了，西藏的职务就不要兼了。当然也可以经常回西藏去看看。五、达赖喇嘛什么时候回来，他可以向报界发表一个简单声明，声明怎么说，由他自己定（35）。

胡的讲话是对外的，1984 年 10 月 2 日，西藏自治区党委印发了中央对达赖喇嘛的方针政策，供内部掌握。其主要内容是：一、达赖出走外逃，在国外搞“西藏独立”并散布了许多错误言论，这两件事干得不好，他对不起国家，对不起西藏人民，也败坏了他自己的名誉。二、我们对达赖仍然是继续做工作，争取他向好的方向转化，跟着达赖外逃的一批人，愿意回祖国的，我们一律欢迎；回来不走的，妥善安排；回来有要走的，礼送出境；早回来，我们欢迎；迟回来，我们等待；不回来，我们争取；搞分裂，我们反对。三、中央对达赖喇嘛的五条方针不变。四、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能搞独立，也不能搞半独立。对台湾的“九条”（即“一国两制”——引者）不适用于西藏，西藏和台湾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区别很大，西藏解放 30 多年，已实行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废除了旧制度，是中央统一领导下的自治地方，因此西藏和台湾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美国在搞“一中一台”，还有人想搞“一中一台一藏”，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要搞什么“大藏族自治区”也是不现实，不可能的。五、达赖集团一再提出要派国外藏胞中的青年知识分子回藏教学（教藏文——引者），有他们的目的。我们的答复：愿意回国工作，我们欢迎，但必须承认是中国公民，服从分配，有长期打算（达赖方面听说要他们的藏文教师承认自己是中国公民，就打退堂鼓了——引者）。六、中央和达赖之间不存在谈判问题（36）。

也许是意识到胡耀邦的“五条方针”不准达赖喇嘛回藏居住太过分，赵紫阳作了修改。1988 年 4 月 4 日班禅在人大记者会上说：“对达赖喇嘛的方针，中央已明确阐述过五条方针，是没有变动的。达赖喇嘛回到祖国、回到西藏有什么条件？唯一的条件就是要他放弃搞西藏独立，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且同全国各民族一道为维护祖国统一、增强民族团结、建设社

会主义祖国和社会主义的西藏共同努力，这是唯一的条件。有了这样一个条件，回到祖国，对他的政治地位，中央已经明确宣布：仍然可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至于他住在哪里，按照我们国家的宪法，任何一个公民都有自己的居住自由。他想住北京可以住北京，想住西藏可以住西藏。但是必须有一个前面讲到的必要的条件，如果他在那儿说可以接受这些条件，而回来以后在内部继续从事分裂活动，那我们是不能答应的。因此，如果他坚持独立，坚持搞分裂，那么上面所说的也不存在，谈判没有基础，也就没有什么好谈的。（37）”

中共一贯声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西藏”。如果允许达赖喇嘛回藏搞“一国两制”，岂非意味着社会主义救不了西藏、进而危及“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吗？（香港本来是资本主义，中共允许它再搞 50 年资本主义也无妨）中共拒绝让达赖喇嘛回西藏搞“一国两制”，只许诺一个有名无实的人大副委员长，达赖喇嘛有洋大人撑腰，怎么会接受？中共却还要“争取”他，真是痴心妄想、异想天开，天真得可爱。其实际效果只能是向达赖喇嘛示弱，使他更加趾高气扬、狂妄自大。同时也给本土藏人“中共怕达赖”的感觉，使他们更加崇拜达赖喇嘛。达赖喇嘛本来一无所有，他在谈判中只能得到，不会失去；中共本来控制着西藏，却要与达赖喇嘛谈判，它在谈判中只能失去，不会得到。这样简单的道理，中共居然也不懂得。

奇怪的是，正当达赖喇嘛 1993 年 8 月 11 日谈话从“五点和平计划”与“斯特拉斯堡方案”作了大幅度后退，中国驻印度大使也愿意会见达赖喇嘛，达赖喇嘛表示他“非常非常乐观”时，达赖方面突然就在这个月单方面中止了与中国政府的联系，自己关上了谈判的大门（38）。个中的奥秘至今无人知晓。我想是因为“西藏流亡政府”听到了达赖喇嘛的上述谈话后，害怕他真的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与中共达成妥协，干脆中断与中国政府的联系。“西藏流亡政府”已经被“少壮派”控制，他们不是出生在印度，就是在十岁以前就离开了西藏，对西藏的自然与社会没有切身体验，不明白西藏在政治与经济上都无法自立，却自小接受达赖喇嘛关于“西藏自古以来是个独立国家”、“中国消灭了 120 万藏人”的教导，满脑袋自由、民主、自决、独立的口号与仇恨中国的思想，当然不会允许达赖喇嘛与中国政府达成妥协。达赖喇嘛正在收获他自己播下的仇恨的种子所结出的苦果，变成他自己教育出来的流亡藏人的人质。还可能是西方人权卫士害怕达赖喇嘛与中国政府达成妥协，指示“西藏流亡政府”切断与中国政府的联系，教达赖喇嘛谈不成，达赖喇嘛也已变成他投靠的洋主子的人质。由此可见，阻碍谈判的不是中国政府，而是达赖喇嘛自己手下或背后的人。

尤其奇怪的是，尽管达赖方面自己关上了谈判的大门，达赖喇嘛却继续不知疲倦地呼吁中国政府与他谈判，并反复声称他不要独立、只要自治，他愿走“中间道路”、搞“一国两制”。例如，1994 年 6 月 6 日，他告诉《中央日报》记者陈王慧，他愿意接受“一国两制”，由北京负责西藏的国防外交（39）。1997 年 3 月他访问台湾时也说他不独立（40）。1997 年 7 月 1 日香港回归中国后，他又说，他从“一国两制”看到了解决西藏问题的道路（41）。与此同时，他继续在世界各地演讲，不遗余力地宣传西藏自古以来是独立国家，谴责中国移民西藏、毁灭西藏文化、消灭 120 万藏人等，还要求由藏族举行公民投票，决定西藏前途（42）。---他所说的西藏当然是“大西藏”，撇开占“大西藏”总人口一半以上的 17 个非藏民族，单单由藏族投票决定西藏前途，可谓居心险恶。如果北爱尔兰的天主教徒能单独投票决定北爱尔兰的前途，北爱尔兰早就独立了或与爱尔兰合并了。如果魁北克的法裔能单独投票决定魁北克的前途，魁北克也早就独立了。可惜国际公法与国际舆论都不允许。达赖喇嘛要剥夺占“大西藏”总人口一半以上的、自古以来就生活在那里的 17 个非藏民族的投票权，这是骇人听闻的独裁专制与侵犯人权。

达赖喇嘛还不时漏出独立的言论。他告诉台湾记者，他对台湾有人支持藏独深受感动，但不能

明说（43）。他还对民进党省议员余政道说：“西藏独立永远有希望。（44）”与此同时，“西藏流亡政府”的出版物与“官员”的言论继续大肆宣传西藏独立，好像达赖喇嘛从来没有说过不要独立似的，又好像“西藏流亡政府”已经不再受达赖喇嘛的领导。

例如在 1996 年 6 月 21 日至 22 日于波恩与 1997 年 10 月 11 日至 12 日于伦敦举行的“汉藏对话会”上，尽管我的报告及散发的论文都引用与附录了前引达赖喇嘛 1993 年的两个谈话的英文文本。“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负责人”索南达波仍然只提“五点和平计划”与“斯特拉斯堡方案”（如前所述，这两个计划要求中国从西藏撤军，所以是独立计划，美国国务院也这样认为），却闭口不提达赖喇嘛后来发表的不要独立只要自治、允许中国政府掌管西藏国防外交的言论（见其在会上的报告与散发的论文）。“西藏流亡政府安全部研究中心主任”才嘉则在后一个会上说：“由于一国两制这一词组包含着西藏原本则为中国之一部分的含义……这样的自治难以为西藏所认同。如前所述历史上西藏与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未来西藏自治的法律也必须有西藏人民自己制定，所以西藏问题的解决无法直接套用一国两制模式，但可将一国两制作为参考和先例，通过谈判，以中庸之道解决中藏间的纠纷。（45）”可见他连达赖喇嘛向中国政府乞求的“一国两制”都不接受。其他与会的“流亡政府官员”也无不高谈自由、自决、独立，根本不理睬达赖喇嘛放弃独立的言论。

流亡藏人中的“少壮派”显然越来越不把达赖喇嘛放在眼里，曾任达赖喇嘛驻英国代表的平措旺杰说：“他们相信达赖喇嘛什么都知道。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他是神，所以他不会犯错。我可不信这一套。我是佛教徒，没错。然而就我而言，他也只是个普普通通的人。因此，他有他的优点，也有他的缺点。我常常对我的同胞说，达赖喇嘛变老了，我们必须问这个问题：他到底是不是菩萨的化身？不过他现在身体状况不是很好，没有人去想这个问题。同样的，当他做错事的时候，我们也应该问这些问题。当他犯错的时候，我们有义务提醒他。（46）”——他所谓的达赖喇嘛的错事，就是指口头上放弃独立。

戈茨坦曾批评流亡藏人的领导人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非常幼稚（47）。其实从利益的角度看，流亡藏人继续高喊独立也有其现实意义。他们把独立叫得越响，西方人权卫士给他们的钱就越多，他们的日子就越好过。如果他们停止叫喊独立，洋大人就不给钱了，他们就会饿死。

达赖喇嘛的两面派言行当然无法叫中国政府相信他真的不要独立了，所以中国政府一贯把达赖喇嘛公开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停止分裂活动作为与他谈判的前提，而达赖喇嘛坚决拒绝作此承认。1992 年 12 月 27 日达赖喇嘛在巴黎告诉法新社记者：“假如他们（指中国政府——引者）愿意会见我的代表团，那就让谈判从此开始。不过，他们如果还是坚持我必须首先发表声明，宣布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我是不会同意的。”1997 年 11 月 1 日江泽民在哈佛大学演讲时，有人问他为何不与达赖喇嘛对话，他说：“我想我们对达赖的方针非常明确，他必须公开承认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公开放弃西藏独立，同时停止一切分裂祖国的活动。但我感到十分遗憾的是，达赖并没有这样做，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分裂祖国的活动。（48）”两天以后，达赖喇嘛的首席代表才旺单东（“西藏流亡政府”的“外交部长”）发表谈话说：“江泽民主席要求达赖喇嘛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等于要求达赖喇嘛重写西藏历史，接受西藏在历史上是中国一部分这一种说法。达赖喇嘛永远不可能这样做，他一贯说这样做是撒谎，而他作为一个佛教徒是不可以撒谎的。（49）”

联合国与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法律事实。《联合国宪章》规定，必须尊重主权国家的领土完整。中国政府要求达赖喇嘛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完全符合国际公法与《联合国宪章》。1998 年 6 月 27 日，江泽民在北京与克

林顿举行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重申了上述条件并增加了要达赖喇嘛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后，克林顿马上说：“我同意西藏为中国的一部分，为中国的自治区之一。我能理解为什么承认这一点必须是与达赖喇嘛展开对话的先决条件。”（50）6月29日“西藏流亡政府”一方面承认达赖“不寻求独立”，另一方面又坚持要求和中国政府“无条件谈判”（51）。他们连克林顿都赞同的先决条件都不承认，说明他们蔑视国际公法与克林顿总统，根本没有谈判的诚意。

达赖方面既说不要独立只要自治，又拒不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自相矛盾的。美国所有的政治学教科书都指出，自治的前提是承认中央政府对自治区的主权；《美国政府与政治学词典》则说：自治低于独立，自治是在一个主权国家内部的某个地区拥有某种程度的管理内政的权利（52）。达赖喇嘛既然拒不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说明他们所谓的自治不过是变相独立，是他精心设计的骗局与暗藏杀机的陷阱。达赖喇嘛的弟弟丹增曲加在接受董尼德采访时一语道破了达赖喇嘛的策略：“我们先求自治，然后再把中国人赶走！……就像英国人被赶出印度一样！……自治将是个起步。”（53）达赖喇嘛的如意算盘是，先在不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前提下回“大西藏”“自治”，等站稳脚跟后再宣布独立，重演1959年的事件。他把江泽民与克林顿都当成傻瓜，这是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谈不起来的根本原因。

就像流亡藏人继续高喊独立有其经济上的考虑一样，达赖喇嘛在口头上放弃独立也有其经济上的考虑。他已经认识到，假如西藏完全独立，他没有能力养活如今由中国政府包养的西藏藏族市民，更无力安置流亡藏人。他在1997年接受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新闻学院院长夏伟（Orville Schell）时说：他1997年3月访问台湾与民进党领导人会谈时，“我还进一步对他们谈了对台湾独立的看法。从感情上来说，每个人都希望独立，但是，从感情上来看待这个问题是不对的。我们必须冷静地从经济方面来考虑这个问题。首先是几乎没有彻底独立的条件，台湾经济非常依赖中国大陆。……我们西藏也是处于这种情况。我认为，即使为了西藏的长远利益，经济方面的利益，我们也应该在这个基础上处理和中国的关系。西藏是个内陆国家，地域广阔，人口稀少，交通不便，但同时自然资源很丰富。为了更快速地进行物质建设，如果我们和另外一个比我们先进的大国结合起来，我们就会比完全独立获得更大的利益。这就是我的基本立场，这就是我寻求真正自治而不是寻求独立的原因。”达赖喇嘛甚至从“西藏自古以来是独立国家”后退了半步，他说：“我的立场是寻求真正的自治，而不是寻求独立。当然，我认为从历史上看西藏是一个独立的民族。西藏过去到底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需要历史专家和法律专家来回答，而不是靠政治来解答，不是靠政治人物来回答。如果追溯过去，有许多问题需要解答。所以，最好还是忘记过去。历史就是历史，现在应该向前看，这样甚至两个毫不相干的民族都可以很容易地合并为一个国家。这就是我的基本立场。”（54）

1997年11月28日，达赖喇嘛又在达兰萨拉告诉一个汉人：“如果我回到西藏，会把西藏建成一个和平区，不建立任何军队，除了少数必要的警察。因此我们需要强大的中国的保护，也需要中国的物质援助。虽然我们也能得到其他国家的援助，但如果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就有责任在物质上帮助我们。而我们回馈给中国佛教文化，这样双方可以互助互益。中国现在就有几百万佛教徒，将来更需要佛教。西藏的佛教是最好的佛教，当然不是唯一的宗教。我们非常尊重其他的宗教，西藏佛教不仅对藏人有益处，也对十二亿中国兄弟姐妹，尤其是对中国青年人重建精神信仰有益处。当中国的佛教徒和其他中国人认识到这一点时，他们就会主动关心佛教文化不被毁灭。如果中国人尊重西藏文化，尊重西藏的环境，把藏人当做兄弟姐妹，我们干嘛要独立，要分离？正因为在我眼里，佛教文化比西藏的政治地位更重要，所以我才寻求西藏真正的自治，而不是独立。（55）”

在这两个谈话里，达赖喇嘛照例大肆攻击中国政府毁灭西藏文化、宗教与环境。关于西藏文化与宗教问题，前面已经说过很多。至于环境问题，主要是由西藏人口爆炸造成的。本来人口爆炸破坏环境是全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世界环境大会每次开会都要讨论这个问题；联合国还专门成立了人口基金会，鼓励与帮助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各国科学家更是大声疾呼，呼吁人类节育。达赖喇嘛自己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也说：“人口问题是一个严峻的现实。在印度，由于宗教的传统，一些人难以接受计划生育。……我想，这种情况最好从一开始就被制止——计划生育。当然，总的说来，从佛教的观点来看，堕胎是一种杀戮行为，是不好的。但这要看情况而定。如果未出生的孩子将来会有残疾，或者孩子生下来会给父母带来严重问题，这些都是可以例外的情况。（56）”他在“抗暴 38 周年纪念会”上还说：“由于军事基地的扩张、各种建设以及人口增长等因素，环境正在遭到破坏。（57）”

如前所述，西藏面积虽大，但大部分是雪山、石山、寒漠土与冰缘寒冻土，可耕地与可牧地面积很小；由于高寒、干燥、缺氧与大风，产量也很低。1980 年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孙鸿烈去考察时就已发现西藏的牧场已经严重超载。我在拉萨时经常看到藏人把草根挖出来当燃料卖。这都是中国政府慑于西方舆论，不敢要求藏农牧实行计划生育所致。达赖喇嘛也承认：人口爆炸会破坏环境，实行计划生育势在必行。然而他在一贯攻击中国政府破坏西藏环境的同时又一贯攻击中国政府要求西藏市民只生两个孩子是“侵犯人权”与“种族绝灭”，足见他何等虚伪、阴险、狡诈、毒辣。

国际法学家委员会 1997 年的报告《西藏：人权与法治》也是如此。它一方面指责说：“中国政府不允许藏妇生产超过当局规定的数目的孩子，但限额没有像对汉妇那么利害。在实施这一政策方面，也因地区不同而差别甚大。对超生者会采取侵犯其合法权利的措施，如罚款、强制堕胎与绝育手术。”它故意隐瞒了中国政府对藏农牧不实行计划生育的事实，把中国对西藏市民的生育政策夸大为对全体藏人的政策。另一方面它又指责说：“中国人所造成的对环境最严重的破坏是使牧场退化，使大片牲畜与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广大地区变成沙漠。”（58）它所谓的中国人是指汉人，汉人会跑到西藏的牧场去过度放牧、挖掘草根吗？汉人也吃不惯西藏的牛羊肉与酥油奶茶，西藏牧场的退化沙化纯粹是藏农牧人口爆炸造成的。达赖喇嘛与西方人权卫士一方面大造舆论，指责中国政府要求藏族市民计划生育是“种族绝灭”，使中国政府不敢控制藏农牧人口；另一方面又把藏农牧人口爆炸造成的灾难性的环境问题嫁祸于中国政府，这又是一个怪圈 22。

达赖喇嘛说“西藏的佛教是最好的佛教”，纯属夜郎自大。且不说泰国、缅甸、斯里兰卡与柬埔寨等佛教国家从来不请他去当太上皇或太上师；日本与韩国的广大佛教徒也从不崇拜他。单说汉族佛教徒对他也不感兴趣。这也难怪，达赖喇嘛不懂汉文，也不读中国历史（参见前文），所以他不知道佛教传入汉地比传入西藏早得多；汉译佛教典籍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较之藏译佛教典籍毫不逊色，时间上也要早得多。史载公元前 2 年，大月氏王的使者伊存来到长安，向西汉文官景卢口授《浮屠经》。1998 年 3 月，中国佛教协会对“伊存授经”作为佛法初传中国的标志予以确认，并于同年 11 月 22 日在北京举行大会，纪念中国佛教二千年（59）。“伊存授经”后约 500 年，公元五世纪，传说有宝盒自天降落西藏，内有佛像、佛经、宝塔等，然而当时藏族尚无文字，也无人能识用梵文写成的佛经（60）。直到公元七世纪，尼泊尔尺尊公主与唐朝文成公主从西东两方带了释迦牟尼像、佛经、法器嫁给松赞干布，佛教才开始在西藏传播开来。这是“西藏流亡政府”的《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也承认的：“由于迎娶尼泊尔和中国的公主对佛教在西藏的传播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所以，在西藏历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顺便说说，尺尊公主带去的是密宗，文成公主带去的是显宗）公元 645 年，玄奘法师从印度取经回来，在长安主持翻译佛经，共译出佛经 75 部 1335 卷，是为中原大规模翻译佛

经的开始（61）。西藏大规模翻译佛经是从赤松德赞公元 775 年建立桑耶寺开始的，比玄奘法师译经晚了一百多年（62）。汉传佛学较之藏传也毫不逊色。如果汉人认为佛教对他们重建精神信仰有用，自会去请教汉族佛学大师，何须求助于达赖喇嘛？

如果汉人都像达赖喇嘛所希望的那样把全部心思与精力都放在转经拜佛、超度来世上，怎能惮精竭虑地发展科技、废寝忘食地工作，从而创造出大量物质财富来包养经济上无法自立的藏人，让藏人既能不费吹灰之力地坐享现代物质文明，又能逍遥自在地转经拜佛、超度来世？

达赖喇嘛还告诉留美中国学生学者：“最近几十年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中出现了极端的功利主义的倾向，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在极大的程度上破坏了中国的精神世界和道德价值观。一个精神和道德价值观的荒漠正在中国社会迅速蔓延，在这种情况下，西藏的佛教和佛教哲学能够帮助千百万中国兄弟姐妹找到精神上的归宿。（63）”众所周知，全民信佛的泰国自从经济起飞后，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与世俗主义泛滥，僧尼作为民众精神与心灵导师的地位一落千丈。可见现代化必然导致佛教衰落，这一历史趋向既不是共产党的阴谋造成的，也不是哪个佛教大师或教主所能阻挡的。何况汉人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是实用理性，天生拒斥非理性的喇嘛教，元清两朝皇帝如此礼遇喇嘛教主、广大汉人始终不为喇嘛教所动就是明证。达赖喇嘛在二十世纪即将告终的时候来向汉人推销喇嘛教，企图重温“大元帝师”的旧梦、当 12 亿汉人的教主，可谓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达赖喇嘛 1997 年 4 月在华盛顿会见中国民运人士时说过：西藏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无法自立，只能依靠中印两大邻国中的一个，比较起来，靠中国更好些（据与会者告诉我）。他没有解释为什么，达瓦才仁倒是透露了一点信息。他说：“西藏夹在中国与印度两个大国之间总是左右为难，两面压，两面挤。因为西藏的地理位置，总要靠一边，我认为靠中国比靠印度要好，因为中国人的宗教意识比较淡薄，容易跟西藏人相处。而印度人的宗教意识非常浓，宗教之间的冲突引发起来不得了。……我们在印度就感觉到，有些西藏人在印度呆了三、四十年，却很难看到有印度人朋友。（64）”

佛教在印度早已衰落，印度人大都信印度教，又属高加索人种（白种人），无论在宗教与人种上与藏人差距都很大。达赖喇嘛曾说：“因为佛教是从印度传到西藏的，伴随佛教传入，还有许多其它重要的文化影响。因此我心中毫无疑问地认为印度比中国更有理由声称拥有西藏的主权，中国对西藏只有很小的影响。（65）”等藏人在印度住下来后，才发现满不是这么回事。达赖喇嘛与达瓦才仁都没有解释，他们所谓的“靠”是什么意思，想必不是指宗教——达赖喇嘛自信西藏的佛教是最好的佛教，还用得着靠谁吗？——而是政治经济。因为中国比印度更富裕更慷慨，肯出大钱包养藏人。达赖喇嘛的如意算盘是：既要中国政府继续包养藏人，又要中国政府把“大西藏”的行政权交给他，还要中国政府把占“大西藏”总人口一半以上的 17 个非藏民族强行迁走（种族清除），最后，还要允许他保留随时宣布独立的权利，他真是精明到家了。

达赖喇嘛为了欺骗国际舆论，无所不用其极地造谣，本书已经揭露了许多，这里再举几个例子。

达赖自传说：“中国把三分之一以上的核武器部署在西藏的土地上。因为西藏是世界上铀矿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中国似乎想通过开采铀矿使西藏大部分地区遭受放射性污染。在我诞生的安多——西藏东北部的省份——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大型古拉格（苏联关押政治犯的集中营——引者），有人估计可以监禁一千万人。（66）”他在 1987 年美国国会演讲“五点和平计划”时也说中国

在西藏部署核武器与安放核废料。1993年9月美国和平研究所召开的西藏问题讨论会的总结报告却否定了达赖喇嘛的这些谎言。这个报告充满了对中国政府侵犯西藏人权的谴责与对西藏独立的同情，却也不得不说：“有在西藏放置核废料的传闻。这些核废料据说来自西藏高原东部的铀矿与西藏中部的核设施。这种指控从未被法官或国际社会所证实。(67)”青海省一共只有四百多万人口，居然有一个可以关押一千万人的集中营，连劳改专家吴宏达都闻所未闻，有谁会相信这样的神话呢？（根据吴宏达主持的美国劳改研究基金会 The Laogai Research Foundation 编印的 1997-1998 年《劳改手册》，青海省最大的劳改农场共和县哇玉香卡农场也只有 11134 人）

又如：“有些藏族小孩被迫当奴工”（68）；“中国夸口说要在‘15 年内’根除藏语”；“许多西藏学校只是孩子的劳动营。真正得到适当教育的孩子只有 1500 人左右”（69）；“中国领导人要绝灭藏人”（70）；“中国人在西藏推行被他们自己叫做‘隔离与同化’的种族歧视政策”（71）。前面这些指控一看就知道是假的，最后一条自相矛盾——如果汉人要同化藏人，怎么会把藏人与汉人隔离开来呢？

达赖喇嘛也学会了怪圈 22，他一方面指责中国政府让藏人处于悲惨的、可怜的贫穷中，诸如缺少医疗、教育与电力等（72）；另一方面又指责说：“1984 年 5 月，中国对西藏的政策已有明显的改变。胡耀邦提出的减少在西藏的 85% 的中国官员的要求未被采纳，相反的却开始大力鼓励移民。在‘发展’的口号下，六万名有技术和无技术的工人，在政府提供工资、房屋与休假条件下进入西藏。(73)”在达赖喇嘛统治西藏时代，西藏根本没有现代医院与学校（我对现代学校的定义是不仅教授语言文字，还教授数理化学），除达赖喇嘛本人与极少数与之关系密切的豪门外，也无人有电灯，所以达赖喇嘛根本没有资格指责中国政府治下的西藏缺少医疗、教育与电力。达赖喇嘛所谓的“有技术和无技术的工人”正是建设 43 项工程的工程技术人员、经济管理人员、医疗卫生人员、科研人员、文教工作者与他们的辅助人员，其任务是建造与管理医院、学校、发电厂等，提高藏人的生活水平，却被达赖喇嘛叫做旨在消灭藏族的大规模移民。达赖喇嘛的卑劣正堪与他的狂妄相媲美。

尤为荒谬的是，达赖喇嘛在 1998 年 11 月 2 日在“国际声援西藏会议”上说：中国政府一贯拒绝承认西藏独特的文化（74）。如前所述，胡耀邦在 1980 年西藏讲话时就大肆吹捧西藏文化，要求大力繁荣与发展西藏文化，将其与发展经济并列，称为“两个发展”。他在 1984 年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又强调西藏文化的特殊性即宗教性，要求大力繁荣与发展西藏宗教文化。1984 年，江泽民在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又说“要注意弘扬藏族传统的优秀文化”（75）。如前所述，中国政府拨款 3 亿元修复了 1787 座寺庙，开办了许多佛教学院、藏学研究机构与藏学刊物。1987 年西藏自治区四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西藏自治区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若干规定（草案）》，并认真付诸实践。如今西藏电视台与电台都用汉藏两种语言运作，还有专门的藏语电影译制厂，藏文报刊书籍随处可见、汗牛充栋，小学绝大部分用藏语教学，大中学里也都有藏文课。中国政府还成立了许多专门机构搜集、整理、研究、出版西藏的文化遗产。达赖喇嘛大概实在想不出罪名来攻击中国政府了，只好信口开河造谣，这只能证明他已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

注释：

（27）（29）（30）《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

（28）新华社评论员，《是要求谈判，还是假谈判之名搞分裂？——评达赖近年来要求谈判的



言论》，《人民日报》海外版，1997年4月18日。

(31)《达赖鼓吹“亚洲民主共同体”》，《中央日报》国际版，1991年3月24日。

(32) 董尼德 (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与死》(Tibet mort ou vif)，苏瑛宪译，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台北，1994年，261页。

(33)《达赖喇嘛访伦敦，会晤英相梅杰尔》，《世界日报》，1991年12月3日。

(34)《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言论选集》，西藏流亡政府外交新闻部印行，1993年，84页。

(35) (36)《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1995年，259、295页。

(37)《阿沛和班禅就西藏问题答记者问》，《人民日报》，1988年4月5日。

(38) 新华社评论员，《是要求谈判还是假谈判之名搞分裂？——评达赖近年来要求谈判的言论》，《人民日报》海外版，1997年4月18日；记者林照真，《达赖：目前与中共对话比访台重要》，《中国时报》，1998年7月17日。

(39)《中央日报》国际版，1994年6月7日。

(40) 路透社 1997年1月20日印度达兰萨拉电；法新社 1997年3月27日台北电。

(41)《联合报》国际版，1997年7月21日。

(42) 法新社 1995年9月3日新德里电。

(43) 本报台北电，《达赖访台前曾知会北京》，《世界日报》，1997年3月24日。

(44) 本报台北电，《达赖余政道会谈藏独台独》，《世界日报》，1997年3月24日。

(45) 才嘉，《寻求解决西藏问题的途径》，《中国之春》，1997年11月号。

(46) (53) 董尼德 (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与死》(Tibet mort ou vif)，苏瑛宪译，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台北，1994年，274、271页。

(47) Goldstein, Melvyn C.,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72.

(48)《江泽民哈佛演讲》，《世界日报》，1997年11月2日。

(49) 法新社 1997年11月4日电，《达赖喇嘛拒绝北京关于西藏谈判的条件》。

(50)《江泽民克林顿记者招待会》，《北京之春》，1998年8月号。

- (51) 《西藏通讯》，1998 年 7、8 月号。
- (52) Shafritz, Jay M., *The Harper Collins Dictionary of American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1992, p.46.
- (54) 达赖喇嘛这一谈话由美国之音焦点透视节目 1997 年 9 月 13 日播送，本书引文摘自美国之音中文部向笔者提供的该谈话记录。
- (55) 曹长青，《抵抗撒旦的和平偶像----达兰萨拉采访达赖喇嘛记》，《世界周刊》，1998 年 4 月 26 日。
- (56) *The New York Times* 28 November 1993.
- (57) 《达赖喇嘛在西藏自由抗暴 38 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北京之春》，1997 年 4 月号。
- (58) *Tibet: Human Rights and the Rule of Law* (Geneva: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1997), p.20, p.16.
- (59) 陈晓钟，《首都佛教界集会纪念中国佛教二千年》，《人民日报》海外版，1998 年 11 月 23 日。
- (60) 赤烈曲扎，《西藏风土志》，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1985 年，21 页。
- (61) 郑云山主编，《中外史地知识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年，22 页。
- (62) 彭英全主编，《西藏宗教概说》，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1983 年，21 页。
- (63) 《达赖喇嘛在波士顿给中国学生学者的讲话，1996 年 10 月 9 日》，《西藏通讯》，1996 年 11-12 月号。
- (64) 《汉蒙藏对话----民族问题座谈会纪要》，《北京之春》，1997 年 11 月号。
- (65)( 66)( 68)( 69)( 70)( 71)( 72)( 73) Dalai Lama, *Freedom in Exile, the Autobiography of the Dalai Lama*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0), p.150; p.237; p.231; p.234; p.268; p.251; p.233-234; p.245.
- (67) Little, David; Hibbard, Scott W., *Sino-Tibetan Coexistence, Creating Space for Tibetan Self-Direction, A Conference Report*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1994), p.20.
- (74) 法新社 1998 年 11 月 2 日德国电，《达赖喇嘛希望西藏真正自治》，《世界日报》，1998 年 11 月 2 日。
- (75) 新华社 1994 年 7 月 26 日北京电，《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京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人民日报》海外版，1994 年 7 月 27 日。

## 5、西藏的未来

克林顿 1998 年对中国的访问给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双方增加了压力。克林顿在与江泽民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说：“我敦促江主席与达赖喇嘛恢复对话，以换取双方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并承认西藏具有独特的文化和宗教传统。”江泽民在招待会结束时说：“很抱歉，还要耽误你们五分钟，我想讲讲关于达赖喇嘛的问题。”他先列举了 1959 年达赖喇嘛逃亡后西藏的变化，特意指出：“第一，政教合一的制度从此一去不复返。虽然很遗憾的，它比欧洲的文艺复兴之前的政教合一分开的时间要晚得多。”其次是解放农奴、民族自治、巨额补贴、宗教自由等。然后他提出了与达赖喇嘛谈判的条件：“如果达赖喇嘛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也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那么，我看我们谈判的大门是敞开的，而且我们有若干的沟通的渠道，这一点，我希望达赖他能有积极的回应。”克林顿接着说：“首先，我同意西藏为中国的一部分，为中国的一个自治区之一。我能理解何以承认此点必须是与达赖喇嘛展开对话的先决条件。不过我也认为，有许许多多的西藏人仍然十分敬重达赖喇嘛，视他为他们的精神领袖。江主席指出，达赖喇嘛甚至在美国与欧洲也有一些西藏佛教跟随者。不过，达赖喇嘛的大多数跟随者并未放弃他们自己的宗教信仰。他的跟随者中有基督徒---支持者---对不起，不是跟随者而是支持者，有基督徒、犹太教徒、回教徒，这些人相信神的统一，也相信他是一位神圣的人。对于我们而言，问题的根本不在宗教，而在政治。也就是说，我们相信其他人有权去信奉他们的宗教信仰，而如果有此一人，诚诚恳恳地提出这样的条件，中国即应与他展开对话。容我说句可能不受用的话。我曾与达赖喇嘛会面，我相信他是一位诚实的人。而且我相信如果江泽民和他对话，他们将会互相欣赏。”（76）

达赖方面大声欢呼克林顿的讲话，称之为“西藏的一大突破”（77）。有的“西藏流亡政府官员”甚至造谣说中国政府与他们的秘密谈判已经在美国的沟通下在国外开始（78）。达赖喇嘛的反应并没有那么乐观，他对江泽民增加了“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作为谈判条件感到“更加陷入困境”，决定无限期推迟访问台湾，还申明他不支持台湾独立运动，以免激怒中共（79）---达赖喇嘛 1997 年访问台湾时受到台独势力的热烈欢迎，达赖喇嘛自己也对民进党省议员余政道说过：“西藏独立永远有希望”，所以中共认为藏独与台独同流合污并非毫无根据（80）。但他仍然拒绝公开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狡辩说：“我已经非常明确地说我不寻求西藏独立，我只寻求真正的自治，这就间接地承认了中国的主权。（81）”为了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达赖喇嘛还请求法国总理乔斯潘（Lionel Jospin）在 1998 年 9 月 25 日访问中国会见江泽民时传话，要求谈判，江泽民称他的传话毫无新意，并重申了他的条件（82）。

1998 年 10 月 26 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唐国强又重申关于谈判的条件：达赖喇嘛必须公开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并停止分裂活动。他还说，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有某些接触的渠道。如果达赖喇嘛不理睬既有的渠道而在国际上大造舆论，说明他没有诚意（83）。西藏自治区副主席尼玛次仁也在 10 月 15 日告诉来访的美国新闻基金会主席：达赖喇嘛提出的国防外交由中央政府决定，其它的事由西藏自己解决的提法是一种半独立或变相独立的做法，不符合广大西藏人民的愿望。西藏目前在《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指导下，已经享有充分的自治权（84）。

其实只要达赖喇嘛公开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完全可以把西藏自治区交给他治理，撤退除驻军与外事官员外的所有汉人，停拨一切财政补贴，只保留西藏的国防外交大权，随达赖喇嘛搞什么制度，就像对香港一样。达赖喇嘛谗经与造谣的本领再大，也无法解决西藏的经济问题，西方也不可能每年送他几十亿财政援助，那时西藏就会大乱。那些吃

里爬外、恩将仇报的中共藏官只有在失去了中国政府给他们的高官厚禄与权力特权后才会感念中国政府的好处（姑且假设流亡藏人不报复他们），他们一定会组织起来反对达赖喇嘛，要求中国政府重新直接治理西藏；那些吃里爬外、恩将仇报的藏族精英与藏族市民只有在失去了中国政府奉送的高工资、高奖金、高津贴与高福利之后，才会感念中国政府的好处，那时他们就会重新上街示威，打砸抢烧达赖喇嘛的政府机构与流亡藏人开设的商店，要求中国政府重新拨款包养西藏；那些对达赖喇嘛无限崇拜、无限虔诚的农牧民也只有在失去了中国政府的免税优惠、免费或廉价生产资料与技术及廉价生活必需品、尝到了横征暴敛的滋味后才会感念中国政府的好处，那时他们就会抗拒缴税；那十几万流亡藏人回到西藏，开始也许欢天喜地，但他们马上会要求达赖喇嘛给他们工作或土地，那时达赖喇嘛只有两条出路：或者跪在新华门前，哀求中国政府重新拨款包养西藏；或者翻过喜马拉雅山，重新逃亡印度---如果印度还愿意收留他的话。

也许是意识到自己来日无多，达赖喇嘛决心在 2000 年前回到西藏。1998 年 11 月 5 日到 13 日，他再访美国，向主子求援。行前他大造舆论，10 月 24 日他的驻美国与联合国的首席代表洛地甲日无中生有地告诉《南华早报》记者说：达赖喇嘛将去中国五台山朝圣，并会见江泽民，讨论西藏问题。他又说，达赖喇嘛将发表一个声明（statement），回答江泽民提出的与他进行对话的先决条件（85）。11 月 2 日，“西藏流亡议会议长”桑东活佛也放风说，达赖喇嘛 12 月可能去五台山朝佛，去北京会见江泽民。他要求的高度自治不限于西藏自治区，而是“大西藏”（86）。11 月 4 日，达赖喇嘛的一名“高级助理”向德国报界透露，达赖喇嘛愿意承认西藏和台湾都是中国的一部分，以求中国政府与他谈判（87）。西方舆论纷纷猜测，达赖喇嘛将在美国期间发表这个声明，承认中国对西藏与台湾的主权。看来他似乎真的要迈出江泽民提出的、克林顿也赞同的关键的一步了。

11 月 3 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否认了达赖喇嘛 12 月将去五台山朝圣与会见江泽民两事，并重申了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谈判的先决条件，要求他拿出实际行动来（88）。11 月 5 日，即达赖喇嘛到达美国之日，中国驻美大使馆举行记者招待会，指责达赖喇嘛撇开已有的与中国政府联系的渠道，大肆宣传中国毁灭西藏文化，误导国际舆论，继续进行分裂活动。并说西藏已经实行了真正的自治，达赖喇嘛要求西藏高度自治是什么意思（89）。

11 月 6 日，达赖喇嘛在美国回答是否承认西藏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时说，他要先“跟中国政府讨论”，“我还没有准备好”，“现在不是我说话的时候”（90）。第二天，他对旅美藏人说：他只追求西藏完全自治，并非分离。如果他的要求得到满足，他愿意让西藏加入中国。但目前并未获得中方善意的回应，因此他仍呼吁国际社会大力支持西藏运动（即西藏独立运动---引者）。他还说，最近新闻界频频报道，说他可能在访美期间发表重要声明，回答江泽民的要求，弄得流亡藏人人心惶惶。他要旅美藏人放心，他说江泽民的要求（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引者）是重大问题，须从历史、现实、法律各方面考虑，不是能在短期内决定的。他说他希望经由不断接触、了解，与北京逐渐寻求共识，所以他不会在这次访美时作出重大声明（91）。很显然，他的洋主子不允许他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这也难怪，洋大人们豢养了他 40 年，吹捧了他 40 年，就是为了利用他搞垮中共、分裂中国，他们怎会允许他接受江泽民的条件、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中共妥协？

曾在 1995 年 7 月 29 日发文鼓吹“遏制中国”的英国杂志《经济学家》在达赖喇嘛 1998 年 11 月访问美国后几天发表的《西藏的突破》（92）颇能说明某些西方人的心态，对于读者理解西藏问题的实质大有补益，其全文如下：

如果中国不与达赖喇嘛谈判，西藏将变得更加险恶。

那些认定中国是个负责任的、实用主义的强国的人由于它对待西藏的态度而产生了惶惑。北京在这个星期里投向藏人和他们的流亡领袖达赖喇嘛的严厉而语无伦次的话简直就是列宁用以使土耳其斯坦屈服的话的翻版。在国际场合进行诡辩与禁闭一个小孩的正是同一批共产党领导人。那小孩的罪过不过是因为被达赖喇嘛抢先宣布为班禅灵童。班禅是西藏第二号最受尊敬的佛教人物。中国的强硬政策正在毁灭一个独特民族的文化最后一点残余。这是不应该发生的。事实上，许多中国人私下里也说这是不应该发生的。现在达赖喇嘛正在发出和解的声音，中国遇到了一个罕见的机会一劳永逸地解决它的“西藏问题”。

要这样做，中国必须抛弃许多陈词滥调。它一贯沉溺于它自己的历史观点，声称西藏从来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人大肆宣传 1792 年他们的清朝皇帝乾隆命令达赖喇嘛和其他转世活佛必需在北京通过金瓶掣签加以认定（根据《钦定藏内善后章程》，“金瓶掣签”由驻藏大臣监督在拉萨举行---引者）。他们说这证明了中国对西藏的霸权（中国政府用的是“主权”sovereignty，该文别有用心地将“主权”一词偷换为“霸权”hegemony---引者）。现代西藏学生的基本观点是：中国从来没有直接统治过西藏；从 1913 年到 1950 年中共入侵西藏前，西藏是一个事实上独立的国家---如果它玩牌玩得巧妙，今天也仍然是个独立国家，就像蒙古一样。

中国在西藏有合法的利益吗？过去，中国皇帝只有在西藏的混战威胁到自己家里时才去干预（此言不合史实，清朝自 1727 年起派驻藏大臣进藏到 1912 年辛亥革命，从未中断---引者）。今天并无这样的危险。很长时间里，西藏也未曾成为外国军队入侵的战场（该文作者忘记了正是英国军队在 1904 年侵略了西藏，屠杀了几千藏人，一直打到拉萨，迫使十三世达赖喇嘛逃亡---引者）。如今中国的最大利益在于从西藏撤退。它在西藏的警卫部队---其主要任务是镇压内部---正在消耗国库。它在西藏放置核废料正在引起怨恨。总而言之，中国一方面镇压一方面给予大量财贴---其中大部分使汉族移民受益---使 240 万藏人更加坚决地反对中国的统治。继续诋毁达赖喇嘛将是最后一根（压断骆驼背的---引者）稻草。还要多久藏人将重新发动血腥的、哪怕是徒劳的起义？

双方都应当让达赖喇嘛知道西方的抗议者具有两张面孔（这句话令人费解---引者）。事实上，中国人可以在西藏做他们想做的事情。但只有达赖喇嘛有权威说服藏人接受中国的统治。达赖喇嘛周围的人说他准备做出让步，只要能得到相应的回报。实际上，他将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以此换取西藏的自治。这虽然比他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小得多，但却比藏人现有的东西更有价值。达赖喇嘛是勇敢的，因为他放弃了许多流亡藏人和他们的时髦的好莱坞支持者的更加崇高的目标。他还排除了他担任公职的可能性。

中国主席江泽民必须抓住这个机会。他必须把藏语文作为西藏学校与政府的主要语文（该文作者大概不知道藏文没有科技与现代社会科学词汇---引者），保证真正的宗教自由（即宗教势力干涉政治、分裂国家的自由---引者），释放 600 多名政治犯---大多数是僧尼。统治这个国家（指西藏---引者）的汉族共党强硬派必需换成藏人，江先生必须承诺不仅把军队、而且把淹没西藏的几十万汉族非法移民从西藏撤出来。

中国不会从这一政策中失去什么，却会得到很多。这将有助于让台湾相信中国将负责地保证它的领土（指不吞并台湾---引者）。这将使中国去掉内政与外交上的一大麻烦。不仅如此，这还可使中国领导人在世界上更高地抬起头来。

这篇文章也像西方报刊上的大多数有关西藏的文章一样重复了达赖喇嘛的许多谎言，诸如说西藏自古以来是个独立国家、中国正在毁灭西藏文化、中国在西藏放置核废料、中国向西藏大量移民、中国给西藏的巨额补贴只使汉族移民获益等等，对于这些谎言本书已经用事实驳斥过了。

该文虽然发表于达赖喇嘛离开美国后（达赖喇嘛是 11 月 13 日离开美国的），想必是在达赖喇嘛访美前写的，所以它说达赖喇嘛周围的人（指“西藏流亡政府官员”）说达赖喇嘛愿意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以换取西藏自治。该文作者没有想到达赖喇嘛到美国后改换了口风，不肯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了，所以该文说达赖喇嘛愿意让步与和解、这是中国政府解决西藏问题的罕见机会并威胁中国政府如不与达赖喇嘛谈判西藏局势就会更险恶云云就变成了对达赖喇嘛的讽刺与嘲弄。该文与西方大多数有关西藏问题的文章不同之处在于：它公然用藏人再次发动血腥起义来威胁中国政府，实际上是在号召藏人使用暴力，它为什么不号召北爱尔兰天主教徒与苏格兰人发动血腥起义？它还公然用命令的口气要求中国政府从西藏撤出军队，而且是在达赖喇嘛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后从西藏撤军，不知国际公法中有哪个条款要求一个主权国家从它自己的合法领土上撤军？它为什么不命令英国从北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以及马尔维纳斯群岛撤军？那样英国领导人不是更可以在世界上更高地抬起头来了吗？

该文还要求中国政府从西藏撤出汉官。中国政府在西藏保留少量汉族专业人员及其辅助人员（占西藏国家职工的四分之一），是为了提高藏人的教育、医疗、生活水平，让藏人享受现代物质文明。否则藏人就会上街打砸抢烧、西方人权卫士就会指责中国政府侵犯西藏人权。中国政府在西藏保留少数汉族官员（总数不足西藏党政官员的五分之一），是因为达赖喇嘛蔑视国际公法、违背西方所有民主国家都视为立国基础的政教分离原则，利用藏人不懂政教分离的传统，不择手段地、不遗余力地利用宗教煽动藏人分裂中国、破坏社会秩序。所以中国政府不得不派汉官去西藏贯彻、执行政教分离政策，维护国家主权，维持社会秩序——也是为了学习西方民主制度。要问中国政府有什么权利派官去西藏贯彻、执行政教分离政策，维护国家主权，维持社会秩序？回答是《联合国宪章》规定必须尊重主权国家的领土完整，而国际公认西藏是中国的合法领土，就像国际公认北爱尔兰、苏格兰与威尔士是英国的合法领土一样。英国甚至还派兵派官到远在万里外的、从未被国际公认为英国领土的马尔维纳斯群岛去大动干戈，英国人有什么资格要求中国从西藏撤军撤官？如果中国政府在西藏保留不足五分之一的汉官违背了民族自治的民主原则，那么这是因为达赖喇嘛首先违背了政教分离的民主原则。既然达赖喇嘛首先违反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中国政府也只好违反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达赖喇嘛违反游戏规则的同时也违反了国际公法，中国政府违反游戏规则是为了维护国际公法。西方人权卫士只指责中国政府违反民族自治的民主原则，却纵容与支持达赖喇嘛违反政教分离的民主原则，动辄指责中国政府贯彻政教分离原则是宗教迫害、侵犯人权。这是极不公平的游戏，也是极不公正的裁判。

该文的语气极其蛮横、霸道，似乎是一篇最后通牒。我不知道该文作者把自己当成什么——上帝还是将要向中国宣战的国家元首？我也不知道该文作者还有没有起码的时代感，莫非他认为今日还是鸦片战争时代？

按照政治学常识与国际公法，无论什么样的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谈判，都必须以国际公法为基础。正因国际公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克林顿才会在北京赞同江泽民提出的与达赖喇嘛谈判的先决条件。达赖喇嘛连克林顿都同意的先决条件都拒不承认，说明他不仅毫无诚意，而且极其狂妄，根本不把克林顿放在眼里，更不把国际公法放在眼里。也进一步说明了他反复声称的“不要独立，只要自治”不过是指鹿为马的骗局与暗藏杀机的陷阱。我不知道他的后台有多么

硬，但我相信无论他的后台有多么硬，毕竟不会是万能的主。达赖喇嘛可以继续玩弄两面派手法，在国际上信口雌黄、欺骗舆论、乞求援助、大出风头。然而正如戈茨坦指出的，时间不在他那一边。他在 1998 年 7 月 6 日即已满 63 周岁，一旦去世，藏独运动就失去了举世闻名的领袖，就会被国际社会冷落。他很怕这一点，1997 年 7 月 29 日他在达兰萨拉对流亡藏人说：如果十四世达赖喇嘛（指他自己——引者）有生之年未能返回西藏，而西藏人民又觉得有必要寻找，则十五世达赖喇嘛必将会在自由世界转世，而绝对不会转世在现今中国政府控制的地区。他还表示十五世将会继续十四世的未竟事业（93）。

达赖喇嘛忘记了，他自己在九十年代初为了标榜“民主”而作的声明：达赖喇嘛这种制度，随着时代的变迁，已不再成为必要了。他可能就是最后一任达赖喇嘛（94）。如今他不要民主了，这对大肆吹捧他为“民主领袖”的西方人权卫士来说不啻是又一辛辣的嘲弄与讽刺。

诚然，“西藏流亡政府”可以抛开“民主”的假面具，在达赖喇嘛身后推出他的转世灵童，后者也可以继承达赖喇嘛的名号，但不能继承诺贝尔和平奖，在国际上毫无号召力。西方人权卫士再支持藏独，也无法把一个几岁的小孩吹捧成“民族英雄”、“民主领袖”与“人权斗士”。中国政府则可以告诉本土藏人：“西藏流亡政府”违反了西藏寻找达赖灵童的传统办法（在西藏任布县与加查县的神湖察看神意，在布达拉宫占卜、坐床——因为那些地方都在中国政府控制下），所以他们找到的灵童是假的，这就使他对本土藏人也毫无号召力。中国政府倒是可以自寻自认达赖灵童，命令本土藏人接受。大多数藏人并不在乎真假，只要有个偶像供他们崇拜就行。失去了国际社会的支持与本土藏人的拥戴，藏独运动就会自行瓦解，流亡藏人则会被当地社会同化，西藏问题也就不了了之、烟消云散。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中共成功地控制了西藏局势，所以它并不急于和达赖喇嘛谈判，宁可静待他自动消失。如果不是西方的压力，它可能连愿意谈判的姿态都懒得做。当然，中共的这一策略能否成功，取决于它在达赖喇嘛消失前能否保持经济增长。中共现在给西藏的财政补贴每年递增 10% 以上，还有大笔基建款与专项款，大大超过了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如果中国经济停滞或恶化，拿不出那么多钱来包养西藏，藏人就会重新上街打砸抢烧。中共将不得不与达赖喇嘛谈判，那时达赖喇嘛一定会漫天要价，叫中共无法接受，中共将不得不恢复毛泽东的高压政策，所以达赖与中共妥协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如果中共在达赖喇嘛生前垮台，藏人一定会大闹特闹独立。中国民主政府只好与达赖喇嘛谈判，达赖喇嘛更会漫天要价，诸如把“大西藏”交给他统治，这将引起占其总人口一半以上的 17 个非藏民族的反抗、在中国四分之一强的土地上引发波斯尼亚式的种族战争，并在新疆、内蒙引起连锁反应，这是任何人、任何党在北京当权都不敢答应的；又如要求完全独立或在不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的条件下让达赖喇嘛回藏“自治”、即保留随时宣布独立的权利，这将引发新的五四运动，数亿汉人将上街抗议示威，指斥民主政府卖国，军队就会打出“顺应民意、维护国家统一、主权与领土完整”的旗号发动政变，立足未稳的民主政府就会顷刻垮台，导致共产党复辟，再用铁腕镇压藏独运动。

何况民主政府就一定不能镇压藏独运动吗？美国、英国、法国、西班牙、印度等民主政府都已做出了以武力镇压分裂运动的榜样。

流亡藏人也最怕达赖喇嘛消失后藏独运动自动瓦解，纷纷鼓吹恐怖活动。达赖喇嘛的弟弟丹增曲加说：“非常难以想像中国人会洒脱地自己离去；除非是我们使用这个（他用右手比了比扣扳机的手势）。……我们必须制造流血事件……我想中国人只听得懂暴力的语言。他们不是

说过枪杆子里出政权吗？很好，我们就在这上面较量较量吧！”曾任达赖喇嘛驻英国代表的平措旺杰说：“当阿拉法特杀人，制造恐怖的时候，各国政府争相会晤他。他由此得到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援助和同情。”流亡藏人中的少壮派“西藏青年大会”更为激烈。该会秘书长扎西南杰说：“如果我们杀了中国人，没有人可以指责我们是恐怖分子，因为没有有一个在西藏的中国人是无辜的……在这场战争中，任何手段都是正当的，绝对正当的……我们使用恐怖手段，所有对抗中国人的手段都是正当的！”（95）该会副主席葛玛益西说：“在争取独立与自由的斗争中，采取暴力或非暴力的手段都是合法且正义的。（96）”该会主席才旦诺布则说，现在达赖喇嘛在世，一切听达赖喇嘛的；达赖喇嘛不在世了，就搞暴力恐怖活动（97）。

甚至“非暴力主义者”达赖喇嘛本人也在悄悄地认可暴力，他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说：“意图比行动更重要，如果行动，即便是暴力，是出于纯洁的意图的话，那不是邪恶的东西。（98）”

丹增曲加有一句话说对了，就像美国人不会洒脱地离开德克萨斯、夏威夷与阿拉斯加、英国人不会洒脱地离开北爱尔兰、苏格兰与威尔士、法国人不会洒脱地离开科西嘉、巴斯克与布列塔尼、西班牙人不会洒脱地离开巴斯克与加泰罗尼亚、加拿大人不会洒脱地离开魁北克、印度人不会洒脱地离开克什米尔与锡克一样，中国人当然不会洒脱地离开西藏——不管是“大西藏”还是“小西藏”——国际公法保证他们拥有那些地区的主权，谁也无权要求他们离开。

流亡藏人中的少壮派想仿效巴勒斯坦人搞恐怖活动，未免不自量力。阿拉法特靠恐怖活动赢得了部分土地，这是事实。他成功的因素很多，首先，巴勒斯坦有四百万人口，以色列有六百万人口，双方差距不大；而藏族至多只有六百万人口，汉族有 12 亿人口，简直天差地别。其次，在巴勒斯坦背后站着一亿多阿拉伯人，他们包围着以色列，掌握着西方的经济命脉——石油。1973 年阿拉伯—以色列战争时（赎罪日战争），阿拉伯国家曾用停止向西方国家出售石油的办法迫使西方压以色列停战。西藏有那样雄厚的资源吗？再次，也是最重要的，巴勒斯坦人敢于牺牲，用自杀炸弹炸得以色列人胆战心惊、鸡飞狗跳。藏人却怕死，不敢牺牲。近年来西藏的爆炸事件都发生在夜深人静时、无人居住处，说明爆破者胆小怕死。这也难怪，如今西藏民族主义情绪最激烈的是城镇青年，他们（包括藏族精英）最贪图现代物质享受与现代商业娱乐，每天狂歌劲舞、纵情声色，而贪图声色之乐的人是决不肯为了独立自由之类牺牲自己的生命的。即便是 1959 年的“自由战士”也怕死，布达拉宫、大昭寺与三大寺的叛军都是高举哈达向解放军投降的。

如果流亡藏人潜回西藏搞恐怖活动，中国政府就有借口对西藏实行军管，派军队接管西藏各级政府，控制各大寺庙，甚至重新宣布拉萨戒严，把西藏牢牢地捏在手心里。中国政府还可以根据联合国有关反恐怖主义的文件，要求印度严厉控制流亡藏人，取缔其恐怖组织。就像爱尔兰共和国应英国要求宣布爱尔兰共和军非法一样。当然印度不会轻易听从，那不要紧，印度有自己的阿契里斯之踵——克什米尔穆斯林独立运动。中国只消告诉印度：如果印度继续放任流亡藏人搞恐怖活动，中国就要向克什米尔穆斯林独立运动提供武器与基地——不巧的是，印占克什米尔与中国接壤——印度一定会吓得魂不附体，马上对搞恐怖活动的流亡藏人采取严厉措施。那时西方人权卫士也救不了他们，因为恐怖活动是违反国际公法的、人人痛恨的。所以我猜想，中共很可能巴不得流亡藏人搞恐怖活动，那样它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理直气壮地回到毛泽东的高压政策上去，省下大笔财政补贴。

本书不打算给西藏问题开药方，那是没有意义的。我把解决方案设计得再好，有关方面不接受，只不过是纸上谈兵。我只想探讨西藏问题的几个可能的发展方向，供有关各方参考。王力雄希望“从一个汉人的角度，把对西藏的热爱变成改造中国的动力，使中国能够变得更为民主、



宽容、平等，从而可以从中国这一方面主动化解民族冲突，把中藏人民迎接未来的代价降到最低。(99)”我对他的真诚愿望甚为欣赏，但现实政治是严酷的，真诚的愿望并不一定能换来真诚的回应。民主也不是解决民族问题的灵丹妙药，否则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西班牙与印度等民主国家的民族分裂问题早就烟消云散了。胡耀邦、赵紫阳对藏人可谓宽容之至了，得到的回报却是三次大骚乱。即便中共垮台，成立了民主政府，只要不宽容到把占中国领土四分之一强的“大西藏”交给达赖喇嘛与流亡藏人独立建国，同时帮他们在“大西藏”进行种族清除---把占“大西藏”总人口一半以上的、自古以来就居住在那里的17个非藏民族全部强行撤回中国剩下的领土上去---达赖喇嘛与流亡藏人是决不会罢休的。

至于流亡藏人的洋后台，除非民主政府宽容到让“大西藏”、“东土耳其斯坦”(新疆)与内蒙古也一起独立，并把那里的汉回等族全部清除干净，否则他们也永远不会满意的。不过那样的话，中国一半以上的土地上必将爆发空前残酷的种族战争，不仅“大西藏”内18个民族会互相厮杀，新疆各族(维吾尔、哈萨克、塔吉克、乌孜别克、柯尔克孜、锡伯、回、蒙古、塔塔尔、达斡尔、俄罗斯、满、汉等族，其中维吾尔族人口也未过半)也会互相厮杀，内蒙古更不必说。由于达赖方面的“大西藏”地图还囊括了新疆的一部分，那时“大西藏国”还会同“东土耳其斯坦国”互相厮杀。中国大地上绝不会出现王力雄所希望的民主、宽容与平等，而只有空前规模的大屠杀、大饥荒与大逃亡，就像他的小说《黄祸》所描写的那样---《黄祸》描写中国的崩溃始于黄河决堤、福建(以一国两制的名义)独立与台湾介入，我以为更可能始于西藏独立---那些日夜盼望中国像苏联那样崩溃的西方人权卫士愿意接受几亿中国难民吗？

注释：

(76)《江泽民克林顿记者招待会》，《北京之春》，1998年8月号。

(77) "A Breakthrough For Tibet!", Tibet Press Watch X:III (August, 1998).

(78) Pomfret, John(Washington Post Service), "Jiang Cracks Open Window to Tibet", Tibet Press Watch X:III (August 1998).

(79) 林照真，《达赖：目前与中共对话比访台重要》，《中国时报》，1998年7月17日。

(80) 新华社1997年2月28日北京电，《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就达赖将访台一事发表谈话》，《人民日报》海外版，1997年3月1日。

(81) "Dalai Lama's Hopes Are Raised by Summit Debate", Tibet Press Watch X:III (August, 1998).

(82) 法新社合肥1998年9月25日电。

(83) 法新社1998年10月26日北京电。

(84) 新华社拉萨10月15日电，《西藏自治区官员会见美国新闻基金会主席》，《人民日报》海外版，1998年10月17日。

(85) 法新社香港1998年10月24日电。

- (86) 法新社新德里 1998 年 11 月 2 日电。
- (87) 法新社波恩 1998 年 11 月 4 日电。
- (88) 王玉燕，《北京否认达赖将赴五台山》，《世界日报》，1998 年 11 月 4 日。
- (89) 林宝庆，《北京反对克林顿见达赖》，《世界日报》，1998 年 11 月 6 日。
- (90) 中央社华盛顿 1998 年 11 月 6 日电；路透社维吉尼亚州夏洛蒂市 1998 年 11 月 6 日电。
- (91) 林宝庆，《达赖访美期间不会宣布对北京重大让步》，《世界日报》，1998 年 11 月 8 日。
- (92) "A Break for Tibet", The Economist, 14-20 November 1998.
- (93) 《达兰萨拉简讯》，《西藏通讯》，1997 年 7-8 月号。
- (94) 《流亡政府实行民主化改革》，《西藏论坛》，1991 年第 3 期。
- (95) 董尼德（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与死》（Tibet mort ou vif），苏瑛宪译，时报文化企业出版有限公司，台北，1994 年，269-273 页。
- (96) 《有关西藏前途的讨论》，《西藏通讯》，1997 年 1-2 月号。
- (97) 曹长青，《西藏独立与政治改革----访问西藏青年大会主席才旦诺布》，香港《开放》，1998 年 2 月号。
- (98) Goldstein, Melvyn C.,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141.
- (99) 《天葬》，540 页。

## 后记

经过近一年断续苦战，这本书终于完成了，我在轻吁一口气、舒展身体与手指时，不禁感到一丝惆怅。这本书凝结了我十多年的观察与思考，特别是我在西藏度过的四年流放生涯中的体验与心血。如果读者读了本书后，能用更为冷静的眼光看待达赖与西方的宣传，我将感到无比欣慰。

记得范普拉赫在写作证明西藏应该独立的《西藏的地位》时，曾得到美国两个基金会、英国与荷兰各一个基金会的资助----足见西方何等热心分裂中国----使他得以几年无衣食之虞，并走遍西方各大图书馆（详见该书前言）。可惜我没有这样的幸运，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基金会愿意为我写书证明西藏没有理由独立提供资助。由于我在西藏期间得的高山病至今尚未痊愈、也永

远不可能痊愈，我是在贫病交迫的困境中写作本书的。这本身就是一场极不公平的游戏（unfair play），更不必说西方媒体对我的无情封杀。

我下一步的计划是把本书翻译成英文出版，让西方主流社会能够了解西藏问题的真相。可惜我在目前的健康与经济状况下绝无可能完成此事。希望有经济能力的读者出于民族大义，为了中国的未来与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也为了实现孙中山的“五族共和”理想，慷慨资助我从事这项工作。我的 E-mail 是 <britexu@hotmail.com>。如此，则笔者幸甚，中国幸甚，中华民族幸甚。

徐明旭

1998 年 11 月 11 日记于美国波士顿贝思斋